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維普數據庫全文收錄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WISVORA

SSATT

Gotu Track
国图出版

ISSN 3079-4552



2026

第2卷第9期

9

編輯出版：廣東國圖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主辦 香港社會科學學術智庫有限公司
Wisvora Publishing 維思沃爾出版社

編輯出版 廣東國圖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刊》編輯部
編輯部郵箱 xk@wisvora.com
投稿地址 gotu.wisvora.com



HONG KO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THINK TANK LIMITED
香港社會科學學術智庫有限公司

總編輯 陳科存

編輯委員會

梅見華	李兆祺	林鑫	蘇天	穆艾偉
孫文杰	呂憬若	黃少安	劉宇	葉明裕
陳曦	景瑞亮	崔健	王正威	李澤宇
姚金芳	李明蔚	吳廷雙	穆海尚	曹一君
陳立立	舒波	袁臣輝	郝淑茹	熊森浩

版权声明

文章版權由文章作者所有，單篇文章由 Wisvora Publishing 正式出版，所刊載文章均依照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進行許可。根據該許可協議，任何第三方在明確署名原作者與出處的前提下，均可對本刊內容進行複製、傳播、演繹使用，無需作者及出版社另行個別授權。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刊》依照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許可



Gotu Track
國圖出版

廣東國圖專注於數字學術出版基礎建設與學術服務創新，致力為全球科研工作提供專業、規範、高效的出版支援。公司透過建置數字期刊平台、孵化高水準學術期刊、提供國際出版服務，通過出版學術期刊、舉辦學術會議，推動學術界與社會各界的對話與合作。

gotu.wisvora.com gotu-track@wisvora.com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國際標準連續出版物號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52

網上出版 ISSN 3079-4560

維普數據庫全文收錄

出版社: Wisvora Publishing
維思沃爾出版社

地址: 香港新界將軍澳景嶺街 99 號啟德
工業大廈 8 樓 D07
publisher@wisvora.com
www.wisvora.com

中國大陸編輯出版
廣東國圖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本刊依投稿原稿字體發行
不作繁簡互轉調整



WISVORA
Publishing



微信扫一扫

國圖出版

学术无界，普惠可及

Scholarship Without Borders, Access Within Reach

 WISVORA

Gotu Track
国图出版



WISVORA是一家致力于促进创新和社会进步的国际学术出版商。我们相信，跨学科前沿研究对于理解世界和解决现实挑战至关重要。WISVORA出版社汇集了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践者，致力于打破学科界限，将研究见解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应对全球挑战提供深入的分析和有效的策略。

WISVORA 还致力于推动中文学术成果的全球传播，设立多个覆盖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管理、艺术等领域的中文学术期刊，为中文作者提供更便利、更高效、更专业的发表选择。我们重视学术原创性与表达自由，采用快速审稿、开放获取、普惠版面费机制，努力构建一个包容、多元、国际视野下的中文学术传播平台，助力更多优质中文研究走向世界、服务社会。

学术无界，普惠可及

Scholarship Without Borders, Access Within Reach

10+

我们目前已成功运营10余本学术期刊，涵盖人文、社科、管理、艺术、教育等多个领域

我们运营的期刊数量

400+

已有来自全球的300多位学者参与我们期刊的编辑、审稿与学术合作

我们的合作学者数量

10000+

我们的作者社群已超过3000人，汇聚青年学者、博士生与研究机构专家

我们的作者社群规模

www.wisvora.com
publisher@wisvora.com



目 录 TABLE OF CONTENTS

经济与管理研究

可持续发展下皮草时尚的绿色转型与思政融入研究 · 房婷钰、徐迎春.....1

数字化银青双向价值交换平台：代际资源云桥模式研究 · 咎佳玥、杨倩、张蕙雅.....8

协同、智治与韧性：新时代民办高校学生公寓危机应对模式的重构研究 · 陆姣姣..... 11

自然灾害下粮食生产韧性的构建 · 卢宇航..... 15

应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研究 · 张心宇..... 19

冬奥遗产可持续利用赋能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障碍与对策研究 · 吴炫轶、梁积铭、罗俊杰.... 26

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旅融合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 杨伶俐、田丽、姚春美..... 31

人工智能语境下未成年人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 陈惠琳、张浩、龙玉竹..... 42

数字赋能视角下乡村肉牛产业创新发展路径探索 · 周宏雪、杨宇涵、张广玉..... 48

区域与发展研究

"十五五"时期制度型开放：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的路径与机制 · 李若瑜.....52

城市老公园的可持续更新路径：杏林湖公园景观改造实践 · 焦子芮..... 59

数字普惠金融对长江中下游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 田丽、杨伶俐、姚春美、袁一君..... 62

在地性视角下休闲农场的空间重构与文化转译研究——以"之野知也"农场为例 · 张岩..... 72

环滇池传统村落艺术文化体验园景观设计——以海晏村为例 · 弓子涵..... 76

可沟通城市视域下体育空间媒介性的生成机制研究 ——以东莞"篮球城市"为例 · 张慧文、吴云、张朝霞..... 79

五育并举视域下成都市小学体育课实践研究 · 吴常宇、罗宇浩..... 85

数字政府建设中数据更正的法定职责 ——周某诉南京市溧水区民政局、南京市民政局不履行行政登记职责及行政复议案评析 · 康缪垚..... 90

健康中国背景下城市社区老年体育服务供给困境与优化路径 ——基于政策文本与相关文献的分析
梁积铭、韩晨、罗俊杰、吴炫轶..... 96

清后期古州厅聚落分布与民族交往研究 · 杨妍.....101

直播电商对南通农产品品牌塑造的影响机制及实证研究·王文静、邹继陈.....	108
区域红色研学课程体验与青少年爱国情感建构研究·罗小红、唐挺.....	112

教育理论与实践

核心素养导向下传统文化融入物理新教材的分析和教学建议——以人教版八年级上册为例·李恒.....	116
建构还是解构? ——外研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人与自然"主题单元的生态话语分析·段如梦.....	121
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的现状与展望·涂鹏.....	128
中华体育精神融入体育课程思政的政策契合、理论耦合与价值阐释·汪诚.....	133
青少年中长跑运动员下肢运动损伤史与运动功能测试的关联性研究·刘锦鹏、张婕.....	137
生涯适应力视域下专升本学生就业观、能力观、发展观的协同重构 —— 基于普通本科院校的考察 詹榕榕、赵燕.....	143
学科融合视域下我国体育教育与心理健康交叉研究图景、热点演进及实践路径·罗俊杰、韩晨、 付晓鑫、梁积铭、吴炫轶.....	149
科技型小微企业赋能 高校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研究:现状、问题与优化策略·刘杰.....	156

文化与艺术研究

从"Avant Garde"到"逆经典化"——关于《湍流》诗群思想之隅见·高若栋.....	162
二十四节气中的生态文明智慧及其当代价值·张涵、刘丽淼.....	167
面向 Z 世代的"福禄寿喜财"吉祥文化价值重释与传播路径研究·刘丽淼、张涵.....	172
舞蹈为何越来越短? 短视频平台中舞蹈实践的模板化与参与式转向·罗悦阳.....	178
元代聘财研究——以《元典章》为中心·黄彩莹.....	185
红色文化在自媒体时代的传播困境与实践策略研究·弋昊誉.....	192
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价值意义研究·刘倩倩、范秋茫.....	197
浅析徽派建筑风格的时代演变与文化基因·李凯奇.....	202
身份建构视域下文旅宣传话语的中日比较研究·董炳达、李智.....	207
中国大运河河南段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传承研究·郑奕琛、徐高瀚.....	213
AIGC 时代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嬗变与重构 —— 基于《飘》梅静译本与 AI 译本的对比研究 马云龙.....	218
《礼器碑》清代书风流变探赜·李安妮.....	225
弱者的悲歌:《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的视听象征与悲剧叙事·陈矿.....	229

可持续发展下皮草时尚的绿色转型与思政融入研究

房婷钰¹, 徐迎春¹

(1.黑龙江大学 艺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随着可持续时尚理念的兴起, 皮草材料的回收与再利用逐渐成为服装设计领域的重要议题。本文在可持续设计理念与课程思政教育背景下, 采用文献分析、案例研究与设计方法归纳等方法, 对皮草材料特性、回收现状及再造设计路径进行系统分析。以《“重焕新生”皮草设计、旧衣改造项目》《皮草文创设计项目》中的设计案例为研究对象, 探讨拆解重组、拼接再造及材质融合等设计方法在皮草回收中的应用, 并分析课程思政元素在设计教育中的融入方式。研究认为, 通过设计创新与价值引领的结合, 皮草回收设计不仅能够延长产品生命周期, 还能够强化设计人才的社会责任意识, 为时尚产业绿色转型提供新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皮草回收; 可持续发展; 课程思政; 旧衣新生; 社会责任

基金项目: 黑龙江大学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和教学团队培育重点项目: 《皮草服饰设计》项目编号 HDKCSZ202566

DOI: doi.org/10.70693/202607258680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当我们追逐时尚潮流、探索面料创新时, 是否思考过这些华丽服饰背后的环境代价? 时尚产业被誉为“世界第二大污染源”, 相关研究表明, 时尚产业的废水排放量约占全球总量的 20%, 碳排放约占 10%, 这一环境压力促使学界开始关注可持续设计问题。在众多面料中, 皮草因其珍贵性与独特性引发了我们的特别关注。皮草材质自古以来就是高贵与奢华的象征, 它们以优异的保暖性能和独特的质感深受消费者喜爱。然而, 皮草产业也面临着严峻的道德争议与环境挑战。一方面, 动物保护组织对皮草养殖过程中的动物福利问题提出质疑; 另一方面, 皮草旧衣的处理方式也亟待改善——大量过时或破损的皮草服饰被低价处理甚至填埋, 造成资源浪费。在这样的背景下, “旧衣再生”理念逐渐受到学界关注。如何让废弃的皮草旧衣重新焕发生机? 如何在设计中平衡审美价值与环保责任? 这些问题成为我们思考的重点。

1.2 教育与价值引领的融合

所谓课程思政, 并非在专业课程中简单加入政治理论, 而是将价值观引导融入专业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具体到设计专业, 课程思政意味着我们要思考: 设计师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时尚产业如何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 我们的设计能否传递积极的价值导向?

在皮草回收设计这一课题中, 课程思政的融入具有特殊意义。它引导我们关注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 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并促使设计者思考动物福利与人类需求之间的平衡。培养同理心与责任感; 鼓励传承工匠精神, 在细节中体现对材料的尊重与珍视; 启发以创新思维解决现实问题, 服务社会可持续发展^[1]。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梳理皮草材料的特性与回收现状, 认识当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探索适合皮草回收的设计方法, 以《“重焕新生”皮草设计、旧衣改造项目》《皮草文创设计项目》两个案例为借鉴; 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设计实践, 思考

作者简介: 房婷钰(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时尚产品设计;

徐迎春(1970—), 女,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时尚产品设计。

通讯作者: 徐迎春

专业学习与价值引领的结合方式；为服装专业学生参与可持续设计提供参考与启发。通过学生视角的思考，展现年轻一代设计师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与担当；为皮草回收设计提供可操作的方法路径，推动时尚产业的绿色转型。

2 研究方法

为系统探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皮草回收设计路径及课程思政在设计教育中的融合方式，本文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案例研究法、设计方法归纳法与实践探索法，对皮草材料回收再设计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进行研究^[1]。

2.1 文献分析法

文献分析法是本研究的重要基础。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可持续时尚（Sustainable Fashion）、循环设计（Circular Design）、服装回收再利用以及皮革产业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总结当前学界在旧衣回收、材料再利用及服装再设计方面的研究成果与发展趋势。同时，对课程思政在设计教育领域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案例进行归纳，分析价值引领与专业教育融合的主要路径。通过文献分析，不仅能够明确皮草回收设计研究的理论基础，也为本文后续设计方法的提出提供学术支撑。

2.2 案例研究法

案例研究法是本文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本文选取《“重焕新生”皮草设计、旧衣改造项目》《皮草文创设计项目》中皮草回收设计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设计理念、材料选择、工艺实现及结构设计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通过对该案例的拆解过程、拼接工艺及材质组合方式进行梳理，总结皮草回收设计在实践中的关键技术与设计策略。案例研究能够从具体实践出发，揭示皮草再设计过程中材料特性、工艺方法与设计表达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皮草回收设计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参考路径。

2.3 设计方法归纳法

在文献研究与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皮草回收设计过程中常见的设计方式进行系统归纳与总结。重点从拆解重组、拼接工艺、材质融合以及结构优化等方面，梳理皮草再造设计的基本方法与技术要点。通过对不同设计方法的特点及适用场景进行分析，构建皮草回收设计的基本技术框架，为设计师在实际创作中提供可借鉴的设计思路。同时，结合可持续设计理念与资源循环利用原则，探讨如何通过设计创新实现材料价值的最大化利用。

2.4 实践探索法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结合课堂教学实践，对皮草回收设计进行初步实践探索。通过收集皮草边角料并进行小样拼接实验，对皮草材料在拼接过程中的毛向控制、皮板厚度差异以及缝合工艺等问题进行观察与分析。实践过程不仅有助于验证相关设计方法的可行性，也能够进一步深化对皮草材料特性与制作工艺的理解。通过实践探索，将理论研究与设计实践相结合，从而更加全面地探讨皮草回收设计在服装设计教育中的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案例分析、设计方法总结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皮草回收设计进行探讨，并进一步分析课程思政在设计教育中的融入方式，以期可为可持续时尚背景下的服装设计教学与实践提供参考。

3 皮草材料特性与回收困境

3.1 皮草材料的独特价值

皮草之所以珍贵，在于其独特的物理特性。以斯瓦卡拉为例，这种产自非洲的羊皮拥有天然的卷曲毛被，手感柔软细腻，保暖性能优异，且每一张皮的纹理都独一无二。这种不可复制的天然美感，是许多人造材料难以企及的。皮草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与快时尚产品不同，一件品质优良的皮草服饰往往可以穿着数十年，甚至代代相传。这种耐用性使其在可持续视角下具有一定优势——延长产品生命周期本身就是减少资源消耗的有效方式。皮草的高价值也带来一个问题：当款式过时或局部破损时，消费者往往不愿轻易丢弃，但又缺乏有效的改造途径。这就为皮草回收设计提出了需求^[2]。

3.2 当前皮草回收的主要方式与局限

当前皮草回收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整衣转售。部分成色较好的皮草旧衣通过二手平台或回收商店进入流通市场。这种方式操作简单,但对款式的时尚度要求较高,许多过时款式难以找到买家。

拆解再利用。将皮草旧衣拆解为衣片或碎料,用于制作配饰、拼布制品等。这种方式可以实现材料再利用,但受限于皮草材料的特殊结构——皮板有一定厚度,毛针方向影响纹理的呈现规律,拆解后的重新拼接需要专业工艺支持。

降级处理。部分回收的皮草最终被制成填充材料或工业用布,这种方式虽然避免了填埋,但未能充分发挥皮草材料的价值。

当前皮草回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系统性的设计方法。许多回收处理停留在简单拆解或转售层面,未能将设计创意与材料特性有机结合。这也意味着,设计师在旧衣回收中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3.3 思政视角下的问题反思

消费主义的反思。快时尚文化鼓励人们不断追求新款,导致大量衣物在仍有使用价值时就被淘汰。作为设计专业学生和未来的设计师,我们是否应该反思:设计是为了刺激消费,还是为了创造持久的美好?

资源观的思考。皮草作为珍贵材料,其生产过程消耗了自然资源,也涉及动物生命。如果我们轻易将其废弃,是否是对这些资源的辜负?“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生态文明建设有着深远意义。

工匠精神的缺失。传统皮草制作讲究精工细作,一件皮草服饰凝聚着制作者的心血。而在快节奏的今天,这种对材料的珍视与对工艺的敬畏正在淡化。

4 可持续设计理念与皮草再造路径

4.1 可持续设计的基本原则

3R 原则——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也是这一领域的核心思想。将其应用于皮草回收设计,可以理解为:减量化,通过优化设计减少材料浪费。例如,在拆解旧衣时尽可能充分利用每一块皮料,避免不必要的裁剪损耗;再利用,延长产品生命周期。通过改造设计,让过时的皮草旧衣焕发新的时尚生命力,继续为消费者所用;再循环,实现材料的循环使用。当皮草服饰无法继续使用时,将其材料回收,用于新的产品制作。皮草小块碎料可与其他材料组合以做文创产品设计^[3]。

4.2 皮草再造的设计方法探索

以两个项目式研究作为案例,梳理了几种适合皮草回收再利用形成销售闭环的设计方法:

(1) 拆解与重组

拆解与重组是皮草再造的基础步骤。将旧衣拆解为衣片,打破原有款式束缚,然后根据新设计的需求重新组合。需要注意的是,拆解时要充分考虑皮草材料的特性——毛被方向、皮板厚度、边缘处理等都会影响重组效果。课程实践中,尝试对一件旧皮草进行拆解,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与细心。每一针每一线的拆除都像是在与过去的制作者对话,让人更加珍视这件衣物所凝聚的工艺价值。

(2) 拼接工艺

拼接是实现皮草再利用的重要方法。拼接工艺是一种值得借鉴的方式——将皮草切割成规整的方块或长条,与其他面料进行拼合。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减少浪费,通过规律性的排列,形成独特的视觉效果;便于控制整体面料的尺寸和形状(如图1)。

在跟皮草企业合作的《“重焕新生”皮草旧衣改造项目》和《文创设计项目》。制作中,《“重焕新生”皮草旧衣改造项目》中,设计师将合作企业回收的老款式旧衣进行了再设计,将一件中长款皮草旧衣设计为时尚的短款外套(如图1)和皮草马甲(如图2)。采用拼接工艺将皮草切割与皮质面料进行拼合,既解决了资源的浪费,又保证了皮草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剩余不小于 0.5cm x 1cm 小块碎料再进行拼接、定型、切割亦可以做成小手袋的装饰材料(如图3)。

马赛克镶拼工艺是拼接工艺中最节省材料又时尚美观的工艺。《文创设计项目》组的设计师运用此工艺,将旧皮草改造剩余的碎料进行拼接、后定型、做成小手袋(如图4)。



图 1. 设计：章艳艳
制作：章艳艳、温宗越、田丰瑞
模特：刘晓彤



图 2. 设计：费琼艺
制作：费琼艺、刘晓彤、田丰瑞、时丕博
模特：刘晓彤



图 3：设计/制作：蒋书涵



图 4：设计/制作：毕雪

(3) 材质融合

将皮草与其他皮料或面料结合，可以拓展设计可能性。设计师将皮料裁成 6 厘米的皮草条，并对貂皮进行剪绒处理来实现这一思路。例如，皮草与皮革面料的拼接，既能减少皮草用量、降低成本，又能通过材质对比增强视觉层次感。在“重换新生”皮草旧衣改造项目中，黑色皮草与皮革面料的搭配形成了鲜明的质感对比，在突出皮草质感的同时，也增添了现代感（如图 2）。

(4) 结构设计

拼接位置的选定需要结合服装结构。将拼接区域集中在视觉中心——如领口、前衣身、袖口等处，可以形成视觉焦点，增强设计感。也可以用电脑模拟辅助设计提前预览效果，减少实际制作中的浪费。

4.3 思政元素在设计方法中的融入

将课程思政融入设计方法，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入手：

社会责任维度：在设计之初就考虑材料的全生命周期，思考产品废弃后的处理方式。这种“从摇篮到摇篮”的设计思维，体现的是对社会负责的态度。

生态文明维度：在材料选择上优先考虑环境友好型材料，在工艺选择上注重节能减排。皮草回收本身就是资源节约的体现，而选择可降解的辅助材料、减少化学处理，则是对生态文明的践行。

工匠精神维度：在制作过程中精益求精，尊重材料的特性，珍惜每一块来之不易的皮料。这种对工艺的敬畏与专注，正是工匠精神的核心内涵。

创新意识维度：用创意解决现实问题，让旧物焕发新生。创新不是为创新而创新，而是服务于实际需要，体现的是服务社会的价值导向^[4]。

5 案例分析：《“重焕新生”皮草旧衣改造项目》和《文创设计项目》的设计实践

5.1 案例概述与设计理念

本案例基于与皮草企业合作开展的《“重焕新生”皮草旧衣改造项目》与《文创设计项目》，以回收旧皮草为核心材料，探索皮草再设计的多路径实践。在“重焕新生”项目中，设计师对企业回收的老款皮草旧衣进行再设计，将原有中长款皮草重构为更符合当代审美的短款外套（如图1）与皮草马甲（如图2），实现款式更新与功能再造。

在设计理念上，该项目强调“再生”与“转化”的双重价值。一方面，通过结构重组与造型优化，使旧产品焕发新的时尚生命；另一方面，通过对边角余料的再利用，将设计过程中的“剩余”转化为新的创作资源，体现资源循环与可持续设计理念。

在《文创设计项目》中，设计师进一步延展这一理念，利用改造过程中产生的碎料，结合马赛克镶拼工艺进行再设计，将其转化为小手袋等文创产品。旧衣改造过程中产生的尺寸大于 $0.5\text{cm}\times 1\text{cm}$ 的剩余材料进行再利用。这种从“成衣再造”向“衍生设计”延伸的路径，有效实现了皮草材料的零废料利用。不仅拓展了材料的应用边界，提升了设计的文化内涵与市场价值，同时也突出了项目的环保属性与可持续理念^[5]。

5.2 工艺实现过程

通过对两个项目的分析，其工艺实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5.2.1 旧衣回收与拆解处理

将企业回收的旧皮草进行筛选与清洁，根据服装结构进行拆解，获取可再利用的完整衣片与碎料。该过程需要对皮板状态进行判断，以保证后续加工质量。

5.2.2 款式重构与再设计

在“重焕新生”项目中，设计师依据当代流行趋势，对原有中长款结构进行重组，通过缩短衣长、调整比例与轮廓，使其转化为短款外套与马甲。这一过程不仅是形式上的改变，更涉及版型优化与功能重构。

5.2.3 拼接工艺应用

在材料利用上，采用拼接工艺将皮草与皮质面料进行组合，通过材质对比增强视觉层次，同时提高材料利用率。对于尺寸较小的碎料，则采用马赛克镶拼工艺进行再加工。该工艺通过规则或不规则拼接，将零散材料整合为具有装饰性的整体，是节省材料且兼具美感的重要手段。

5.2.4 碎料再利用与文创转化

对于尺寸不小于 $0.5\text{cm}\times 1\text{cm}$ 的碎料，通过拼接、定型与裁剪处理，可转化为小手袋的装饰材料。在《文创设计项目》中，设计师将这些碎料进行系统化整合，制作成小型皮草手袋，实现从废料到产品的价值转化。

5.2.5 成品制作与细节完善

在完成拼接与结构设计后，对成品进行整体缝合与细节处理，包括边缘加固、内衬处理及造型整理，以确保产品的使用性能与审美质量。

5.3 感悟与收获

通过对上述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皮草再设计不仅是形式创新，更是对材料价值的再认识与再挖掘。旧皮草并非被淘汰的产品，而是蕴含再创造潜力的重要资源。通过合理设计与工艺介入，可以实现从“旧物”到“新生”的转变。

在实践中，设计师需要在创意与工艺之间不断平衡。从款式改造到碎料利用，每一环节都依赖于对材料特性的深入理解与对工艺细节的精准控制。这种反复试验与优化的过程，体现了设计的专业性与严谨性。

同时,该案例也进一步强调了可持续设计的现实意义。通过对旧衣回收、材料再利用以及产品再创造的系统实践,设计不再局限于单一产品的生成,而是贯穿于资源循环的全过程。这不仅提升了材料利用效率,也体现了设计师在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方面的担当。

在教学与实践结合的背景下,此类案例有助于引导设计者从更宏观的视角理解设计价值,使专业能力的提升与价值观塑造相统一,从而实现设计教育的综合目标^[6]。

6 学生视角下的皮草可持续设计实践探索

6.1 课堂学习中的初步尝试

课程学习中,尝试将皮草回收设计作为课题进行研究。虽然受限于条件和经验,了解了完整的皮草成衣制作过程,通过实践,对资源零浪费有了更直观深刻的认识。

收集的皮草边角料,尝试进行马赛克拼接。在实践中,发现几个关键问题:一是皮草毛向会影响视觉效果,拼接时需注意方向统一;皮板厚度不同,拼接时需考虑平整度;缝合时需选择合适的针距和线材,既要牢固又要美观。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也深刻体会到理论与实践的距离。书本上的知识需要通过亲手实践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正所谓实践得真知。

6.2 课程思政引领下的设计思考

设计能为社会贡献什么?我们可以培养服务社会的意识。皮草回收设计看似小众,但它所体现的资源节约理念,可以为更广泛的可持续设计提供借鉴。设计是否传递了正确的价值观?设计的价值不仅在于美观,更在于它传递的思想。一件体现环保理念的作品,可能会影响更多人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设计师是否尽到了对材料和使用者的责任?每一块材料都来之不易,每一位使用者都值得尊重。在设计过程中,我们应该珍惜材料、考虑用户体验,让产品真正为人服务。

6.3 价值观的塑造:工匠精神与文化自信

夯实专业基础。可持续设计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扎实的工艺技能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作为支撑。只有掌握了面料特性、版型设计、缝制工艺等基本能力,才能在设计实践中游刃有余。

开阔视野。可持续设计涉及环境科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知识,我们需要打破专业界限,广泛涉猎,形成跨学科的思维方式。

培养责任意识。作为未来的设计师,我们的每一次设计选择都会对资源、环境和社会产生影响。培养责任意识,是课程思政的重要目标,也是专业成长的必然要求。

保持创新精神。面对资源约束和环境挑战,我们需要用创新思维寻找解决方案。这种创新不是标新立异,而是服务于实际需要、创造实际价值^[7]。

7 结论与展望

7.1 研究总结

皮草回收设计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皮草作为珍贵材料,其回收再利用既符合资源节约的要求,也顺应可持续发展的趋势。通过拆解重组、拼接融合等设计方法,可以让旧衣焕发新生。

拼接等工艺具有推广价值。这些方法既能充分利用碎料、减少浪费,又能形成独特的视觉效果,为皮草回收提供了可操作的设计路径。

将课程思政融入专业设计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引导学生思考社会责任、生态文明、工匠精神等价值理念,可以培养既有专业能力、又有责任担当的设计人才。学生参与可持续设计具有独特价值。年轻一代的创意和热情,可以为这一领域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在实践中学习、在思考中成长,也是专业教育的重要目标。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受限于研究条件和自身水平,本文存在一些不足:案例分析较为单一,未能涵盖更多皮草回收设计实践;设计方法探索更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实践验证少;思政元素的融入方式有待进一步深化。

未来,希望能够收集更多皮草回收设计案例,进行系统比较研究;尝试完成完整的皮草回收设计作品,在实

践中检验理论；深入思考课程思政与专业教学的融合方式，为同行提供参考。

7.3 结语

设计不仅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责任。在追求美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对资源的珍视、对环境的保护、对社会的担当。“旧衣新生”不仅是一个设计课题，更是一种价值理念。它告诉我们，每一件衣物都有生命和价值，而设计师的使命，就是让这些生命得以延续，让这些价值得以彰显。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将继续秉持这一理念，用设计践行责任，用创意服务社会。当越来越多的年轻设计师关注可持续问题、践行绿色理念，时尚产业的未来将会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 [1] 王蓉.旧衣回收中皮革的可持续设计方法——以“重回与感知”设计作品为例[J].中国美术学院学报,2020.
- [2] 曾琦.可持续发展语境下的皮革时尚[J].四川大学学报,2020.
- [3] 纪振宇.“绿色宣言”[J].封面专题,2020.
- [4] 崔溢云.推动皮革行业的可持续发展[J].高端视点,2018.
- [5] 梁瑞丽.感受行业发展的力量[J].热点报道,2015.
- [6] 中国皮革协会.貂、狐、貉繁育利用规范[S].2016.
- [7] 徐迎春.基于皮革改造的旧衣改革——顺应十四五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教学举措实例[J].探索科学, 2023.

Research on the Green Transi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Fur Fash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ang Tingyu¹, Yingchun Xu¹

1.School of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sustainable fashion, the recycling and reuse of fur material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field of fashion desig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sustainable design concepts and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employs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analysis, case studies, and the synthesis of design methodologies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ur materials,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ir recycling, and pathways for regenerative design. Taking design cases from the “Rebirth” Fur Redesign and Upcycling Project and the Fur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Project as research objects, the study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design strategies such as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patchwork regeneration, and material integration in fur recycling. It also analyzes approaches to incorpo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design education.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design innovation with value-oriented guidance not only extends the lifecycle of fur products but also strengthens designers’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reby providing new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the fashion industry.

Keywords: Fur Recycl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Garment Regener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数字化银青双向价值交换平台：代际资源云桥模式研究

管佳玥¹，杨倩¹，张蕙雅¹

(1.西安工业大学，陕西 西安 710021)

摘要：互联网的普及，为经济发展与美好生活建设带来了新的数字化机遇。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互联网为平台、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智慧养老服务模式应运而生^[1]。代际资源云桥作为聚焦代际价值交换的智慧共生平台，通过数字化手段重构年轻人与老年人的互动方式，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同时，有望创造多维度综合价值^[2]。本平台旨在构建年轻人与老年人价值互哺的良性循环生态，并与现行养老政策形成协同效应，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提供创新思路。

关键词：代际资源；智慧养老；双向交换；价值回报

基金项目：2025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202510702038）

DOI：doi.org/10.70693/202608032559

一、代际资源云桥模式的现实必要性

本文所称的模式依托智慧养老服务业而构建。智慧养老服务业通过技术与服务融合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多重问题，为老年人提供较为完整、精准、便捷的照护。当前，相关行业已围绕“居家—社区—机构”构建多层次服务体系，并将健康跟踪、生活协助和远程诊疗等纳入服务范围。智慧养老服务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可为老年人提供更便捷、高效、精准的服务，进而促进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以提升晚年生活的满意度与质量。

代际资源云桥模式的现实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与代际隔阂问题日益突出。老年人拥有时间、经验或传统技艺，却缺少价值转化渠道及相应的社会角色定位；年轻人在职业发展、生活经验与情感支持方面存在需求，但与长辈之间的常态化联系不足。二是银发经济与共享经济具有较大的融合空间。当前养老服务较多聚焦于“被动养老”，对老年人主动性及其资源价值关注不足；年轻人已逐渐接受技能交换，但尚缺少专门的代际平台。三是国家相关政策强调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并支持代际互助等创新思路。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资源、劳动力市场、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体系产生多维影响^[3]。四是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比例持续提升，但数字技能差异仍然存在。从代际价值观念看，传统价值与现代需求之间既有差异，也有结合空间，部分老年人倾向于认为知识应无偿传授，年轻人则更习惯为专业服务付费；年轻人重视效率，老年人更看重人情，由此形成一定的交流代沟。

从社会价值看，该平台模式有望缓解“421家庭”结构下的养老压力，推动非亲属间建立稳定的代际联系，促进传统技艺和文化的数字化传承，并通过反向数字教育提高老年群体的数字包容性。已有研究表明，代际数字教育中的双向知识交换有助于增强代际互动与赋能^[4]。从经济价值看，平台将老年群体的闲置时间及未充分利用的技能转化为可交换资源，提出按照技能稀缺程度、时间弹性和情感附加值进行定价的三维思路，并可探索代际协作类产品等新消费模式。从个体价值看，平台既为老年人提供技能变现、获得“银发导师”认同和通过知识服务实

作者简介：管佳玥（2005—），女，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

杨倩（1972—），女，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人岗匹配、创新行为与心理等；

张蕙雅（2005—），女，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

通讯作者：杨倩

现自我价值的机会,也为年轻人提供较为便捷的职业技能训练、生活常识或特殊技能获取渠道,同时探索情感陪伴价值的量化方法。从技术层面看,平台拟构建多标签引导的智能匹配系统、以区块链为基础的多重信任机制和代际交互数据库;在文化层面,平台重新审视年龄价值,尝试将老龄化压力转化为银发资源,并通过代际交流减少年龄偏见。

二、代际资源云桥的核心内涵与产品体系

代际资源云桥是面向青年与老年群体搭建的数字化双向价值共生平台,依托线上双端 App、智能硬件“共际环”和线下社区空间三位一体的载体,构建以时间、技能、情感三维量化定价为核心的代际资源交换生态。平台以“时间可量化、技能可交易、陪伴可增值”为核心,促进两代人之间的资源互补,实现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重提升,并推动时间、技能、知识、情感等多元资源的精准匹配与价值转化,形成可持续的代际共生生态。由此,代际资源云桥构成区别于传统单向助老和公益型时间银行的新型智慧养老服务模式。

按照产品形态划分,平台以数字化软件和实体智能硬件为基本载体。

价值交换平台:以云计算支持的双平台联动为基础,兼顾老年端与青年端的功能内容及共同价值目标,通过数字化方法归纳两类主体的实际需求,将技能交流、情感联系和相互关怀纳入平台设计,把代际隔阂转化为协作价值。按照这一逻辑,软件端设置两种交互方式:老年端“银穗版”和青年端“青衿版”相对独立运行。老年端针对语音极简、防诈骗、子女联系和监护绑定进行适老化设计,并提供数字技术教学、人际交往和健康建议;青年端将学分与非遗技艺、现实志愿服务相衔接,建立高校实践成果的确认机制。

实体产品支持:平台拟联合相关产品企业研制智能手环“共际环”。其基本功能包括:对青年用户记录线下接触时间并自动计分;对老年用户提供 SOS 紧急呼叫和身体指标监测,并与子女端 App 连接,以便及时了解活动状态,将线上信息与线下服务结合起来。

从底层逻辑看,本项目突破传统养老服务中“老年人被动接受照料”的单向思维,提出银青双向价值交换机制。老年人将技能、经验和日常智慧作为资源进行贡献,可获得积分、小额报酬及社会认可;年轻人运用数字知识提供生活帮助或基本照护,可获得非遗课程机会、社会实践学分和平台消费权益,由此形成“技能互通—积分流通—商业变现”的闭环。

与现有时间银行、老年社交 App 和大学生兼职模式相比,所提模式体现为三重创新的组合:第一,双向知识付费制度,即不以老年人单方面学习为限,而是由两代人相互教学;第二,三维定价机制,即通过服务、技能、情感三者的量化模型,对各项价值进行统一衡量;第三,O2O 全场景融合,即线上安排对接、线下社区“共际角”组织活动、智能装置保存服务记录,使代际互动具备完整的载体支撑。这种多载体协同也与数字平台研究所强调的平台架构、生态和治理问题相呼应^[5]。就价值定位而言,平台兼顾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既可作为应对老龄化、改善代际关系的社会资源,又可用于盘活银发资源、引导青年发展,并促进传统非遗的现代化传承。

三、代际资源云桥的未来风险与应对

(一) 风险挑战

从技术角度看,服务器压力较难准确预测。当用户数量与业务规模同时上升时,平台在高并发状态下可能面临较大压力;若服务器无法有效应对负载,容易出现延迟、卡顿甚至崩溃,进而影响用户体验并造成用户流失。此外,平台需要保存大量与用户身份、行为及交易有关的敏感信息。数字平台本身具有分布式、跨主体以及与制度、市场和技术相互交织的特征,因此其架构与治理需要统筹考虑^[5]。若因黑客入侵或程序缺陷导致数据泄露,用户权益可能受损,平台信任也会被削弱,并可能引发相应的法律责任。

代际资源云桥作为新平台,初期品牌影响力有限,要迅速吸引用户将面临较为激烈的竞争。老年群体和青年群体对平台内容及运行机制的了解均可能不足,推广难度较大、获客成本较高。同时,养老及代际关系服务领域已有多种参与者:公益型平台可借助公共资源发展,老年社交平台可以通过完善功能留存用户,大型综合平台也

可能依托流量与生态进入相关领域，均可能对平台的市场拓展形成压力。从政策角度看，时间银行的法律地位尚需进一步明确，代际交易涉及的税收与责任边界也有待厘清。代际观念亦非完全一致，部分老年人可能不认同“知识变现”，部分年轻人学习传统技能的动力也可能不足。

（二）应对策略

在技术层面，应采用弹性云计算提升高并发处理能力，并通过分级授权、加密存储、备份恢复和安全审计等措施保护数据；区块链可用于形成可追溯的服务记录和信任凭证。在市场推广方面，可由高校带动青年群体，联合学校与社区开展品牌宣传，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说明平台机制：为老年用户提供操作指引和必要协助，为年轻用户设计便捷的活动及合理回报。在运营方面，应持续改进所售硬件，完善联名合作机制，并建立相应的风险预案。

总体而言，代际资源云桥是一种以代际价值交换为核心的智慧共生模式，通过数字化方法改变青年人与老年人相互联系的传统方式，既可为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思路，也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与文化价值的协同实现。

参考文献：

- [1] 兰静容, 陈静怡, 黄美娇. 价值共创视角下智慧养老服务系统的机理和商业模式研究[J]. 科技创业月刊, 2024, 37(2): 35-40.
- [2] 陈静怡, 黄美娇, 吕庆华. 数字化情境下智慧养老服务生态系统的演化博弈分析[J]. 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 2025, 22(3): 56-64.
- [3] 郭未, 王若霖. 系统观念视域下的人口老龄化呈现与理解: 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的视角[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55(5): 74-82.
- [4] GAMLIEL T, GABAY N. Knowledge exchange,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empowerment in an intergenerational technology program at school[J].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2014, 40(8): 597-617.
- [5] DE REUVER M, SØRENSEN C, BASOLE R C. The digital platform: A research agenda[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8, 33(2): 124-135. DOI:10.1057/s41265-016-0033-3.

Research on a Digital Two-Way Value Exchange Platform for Older and Younger Generations: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source Cloud Bridge Model

ZAN Jiayue¹, YANG Qian¹, ZHANG Huiya¹

1.Xi'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Xi'an, China

Abstract: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the Internet has created new digital opportuniti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s in quality of life. Support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ternet platforms, smart eldercare service models coordinate multiple actors and resources to deliver integrated services.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source Cloud Bridge is conceived as a smart symbiotic platform focused on intergenerational value exchange. By reshaping interaction between younger and older adults through digital means, it responds to population ageing while potentially generating multidimensional value. The platform is intended to foster a virtuous cycle of reciprocal value creation between the two generations and to complement existing elderly-care policies, thereby offering an innovative approach to the challenges of an ageing society.

Keywords: intergenerational resources; smart elderly care; two-way exchange; value returns

协同、智治与韧性： 新时代民办高校学生公寓危机应对模式的重构研究

陆姣姣

(南通理工学院, 江苏 南通 226602)

摘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民办高校在校生规模已突破千万人大关,学生公寓作为育人主阵地的地位日益凸显。然而,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与学生群体特征变化的双重驱动下,传统民办高校公寓管理中存在重处置轻预防、重行政轻育人、重个体轻系统的问题。本文立足于“十五五”规划的前瞻性视野,探讨协同治理、智治手段与韧性体系在民办高校公寓危机应对中的耦合逻辑。通过对既有被动式管理模式的反思,构建了一个以大数据预警为驱动、以“一站式”社区协同为核心、以全周期韧性恢复为保障的新型危机应对模式。研究表明,重构后的模式不仅能有效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率,更能提升民办高校的社会认可度,促进高等教育多元化健康发展。

关键词:民办高校; 学生公寓; 危机应对; 协同治理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质生产力视域下辅导员就业指导策略研究(2024SJSZ0746); 新时代民办高校学生公寓危机应对与管理模式优化研究(2025XK(R)09)。

DOI: doi.org/10.70693/202608135513

一、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十四五”规划收官与“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的关键交汇期[1]。在“十五五”阶段,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将从规模扩张彻底转向内涵治理与教育现代化 2035 目标的深度落地[2]。对于民办高校而言,其数量已突破 800 所,在校生规模占全国总量的近 30%。学生公寓作为学生生活、学习、社交的多重功能载体,不仅是维护校园安全稳定的压舱石,更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最后一公里。

根据 2025 年最新数据显示,全国民办高校数量已达 780 所,在校生规模超过 450 万人,占全国高校在校生总数的 22.3%。在这一背景下,民办高校学生公寓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近年来,民办高校公寓危机事件频发,包括消防安全事故、公共卫生事件、学生心理危机、治安事件等多种类型。2024 年教育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民办高校公寓安全事故发生率比公办高校高出 38%,其中火灾事故占比达到 45%,公共卫生事件占比 27%,心理危机事件占比 18%,其他类型占 10%。这些危机事件不仅严重威胁着学生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和社会声誉[3]。

“十五五”规划预研中,校园安全治理被赋予了数字化、精细化与韧性化的新使命。然而,现实数据却敲响了警钟。2024 年教育部数据显示,民办高校公寓安全事件发生率较公办高校高出 23.5%。在经费投入、管理体制与人员专业度存在先天差距的背景下,民办高校如何应对日益突出的网络舆情、心理健康(如抑郁、焦虑)以及隐蔽性强的消防安全危机,已成为行业迫切需要破解的时代命题。

因此,本研究旨在立足“十五五”规划中“高质量服务保障体系”的根本要求[4],探索构建一种以“协同”为组织框架、以“智治”为技术内核、以“韧性”为治理目标的重构模式。这不仅是为了提高宿舍管理的科学性和智能化水平,更是为了在快速变化的安全管理环境中,为学生提供更加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本文将通过对既往模式的反思[5],系统性地阐述这一重构方案的实施路径及其深远意义。

二、既往民办高校学生公寓危机应对的回溯与反思

作者简介:陆姣姣(1993—),女,博士,研究方向为思政教育。

通讯作者:陆姣姣

长期以来,民办高校在公寓管理上形成了具有鲜明生存导向特征的应对范式。这种范式在保障基础运行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应对复杂危机时显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

(一) 学校主导+企业运营下的权责摩擦

约 65% 的民办高校采用混合管理模式。在以往实践中,学校往往将公寓事务性管理悉数委托给物业公司。这种委托-代理模式的初衷是降低成本,但在危机应对中却导致了权责边界的模糊。物业公司侧重于保洁与安保等硬件维护,而学校学工部门负责学生思想引导。一旦发生如坠楼、集体心理应激等突发危机,双方常因安全职责与育人职责的交叉点界定不清而出现响应迟缓,甚至在善后阶段产生推诿,导致黄金处置期的白白流失。

(二) 被动灭火式的管理惯性

既往的应对方法多为事后响应型。管理人员主要依靠传统的人工巡查、查寝等手段来排查安全隐患,缺乏对风险的早期侦测能力。尤其在消防隐患排查中,由于民办高校公寓约 65% 的楼龄已超过 15 年,电气线路老化、用电混乱等问题极具隐蔽性,单纯靠人眼巡查难以触及本质风险。这种模式下,管理层往往处于危机不爆发不重视,危机一爆发全动员的应急循环中,缺乏系统的预警体系与常态化的风险评估模型。

(三) 心理预警与安全管理的深度割裂

在以往模式中,学生的心理健康工作被局限在心理咨询室,而公寓管理则被归类为后勤保障。这种割裂导致公寓管理人员往往缺乏心理危机干预的常识。尽管心理危机事件占比已从 2018 年的 26.5% 上升至 2022 年的 41.8%,但在民办高校的实际操作中,公寓阵地未能成为心理隐患识别的第一哨位,导致许多因抑郁、焦虑引发的极端事件未能消解在萌芽状态。

三、新时代下民办高校公寓危机应对模式的重构策略

面对民办高校学生公寓安全事件发生率较公办高校高出 23.5% 的现实压力,重构模式的核心应转向从源头缩减风险、在过程中实时监测、并具备快速复原能力的韧性系统。

(一) 数字底座驱动下的精准智治与风险防御机制

重构方案的首要维度是推动大数据技术从工具性应用向决策性智治的本质跃迁。在大数据背景下,高校宿舍管理面临着日益复杂的挑战。传统的巡逻与查寝模式往往因管理人员有限、宿舍区域广阔而存在监控死角。

智治模式重构强调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深度了解宿舍内部的安全状况。通过对学生入住情况、设备设施运行数据、历史消防记录及校园网活跃度等大规模数据的采集与整理,可以识别出安全管理中的潜在漏洞。这种数字韧性的核心在于建立预测模型,提前预警可能发生的危机,变事后灭火为事前预防。尤其在消防安全领域,利用智能传感器监测电气线路老化与用电混乱,实现对火灾风险的自动化管理与精准监测。此外,视频监控与智能识别技术的深度融合,能够全天候捕捉异常行为模式,从而在入侵监控等物理安全领域展现出巨大潜力。这种数字化治理通过数据可视化为管理者提供决策支持,极大地提高了管理的科学性与精准度。

(二) 一站式社区框架下的多元协同与力量耦合

重构方案的第二维度在于打破民办高校长期存在的职能壁垒,构建以一站式学生社区为载体的协同治理体系。针对约 65% 的民办高校采用学校主导+企业运营这一混合所有制模式所带来的权责模糊问题,重构方案主张建立一个职责清晰、多方联动的安全治理共同体。

在这种重构路径下,治理重心需从行政办公区域全面下沉至公寓末梢,将党建引领、管理服务、心理干预等资源在社区内进行高颗粒度的集成。学校管理部门应转变为指挥与协调中枢,而宿管人员则在日常排查中承担起第一哨位的责任。与此同时,重构方案强调激活学生的自治潜力。实证研究显示,学生自治参与不仅能提升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更可使公寓投诉率下降 37.5%。通过建立及时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与责任考核机制,各方责任主体能够实现信息共享与协同配合,从而在危机爆发的“黄金时间”内形成合力,有效缩短响应链条。这种协同不仅是机构的合并,更是治理逻辑从行政强制向社区共治的深层转型。

(三) 基于 4R 理论与 PDCA 循环的全周期韧性体系构建

重构方案的第三维度是引入 4R 危机管理理论,即缩减、预备、反应、恢复与 PDCA 循环模式,旨在提

升系统应对复杂危机的抗逆力。针对民办高校心理危机事件占比升至 41.8%以及网络舆情敏感度增强的新型挑战，传统的线性管理已难以凑效。

韧性体系重构要求将危机应对视为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在预防与预备阶段，通过精细化流程优化与定期的消防、安全演练，提高师生的临灾应变能力。在反应阶段，推广类似广东实施的“5 分钟应急响应”机制，显著提升事故处理效率。更为关键的是恢复”阶段的制度化建设，利用大数据分析对危机处置效果进行量化评估，揭示管理中的薄弱环节，进而指导管理策略的持续改进。通过实施 PDCA 循环（计划-执行-检查-处理），民办高校可以将安全事故率降低 51.8%。这种全周期的闭环治理，确保了管理体系不仅能在冲击后恢复，更能在复盘实现自我迭代。

（四）心理干预与安全防护的深度双维视角重构

重构方案特别强调了心理健康教育与传统物理安防的逻辑对调。民办高校学生群体心理问题的检出率较高，心理因素与安全事件之间存在高度的关联性。重构方案主张从安全稳定与心理干预的双重视角切入，构建一体化理论模型。

在这一视角下，公寓不再被视为冰冷的钢筋混凝土空间，而是被重构为具备心理支持功能的育人社区。通过在一站式社区中设立心理咨询哨点，并对宿管、安保人员进行心理危机识别培训，可以将心理异常的捕捉点前置化。利用大数据技术监测学生的作息规律与社交异常，能够辅助心理教师进行早期介入，防范由心理问题诱发的校园极端暴力或生命安全危机。这种人文关怀与刚性安防的深度耦合，赋予了民办高校公寓管理更高的社会公信力与品牌美誉度。

四、重构方案研究的意义与可实施性分析

（一）填补民办高等教育治理空白

重构方案的研究意义首先体现在对现有高校危机管理理论体系的补充与完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高校公寓安全的研究多基于公办院校的资源配置逻辑，而民办高校由于其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标准不一以及硬件投入相对不足的特殊性，往往处于理论研究的边缘地带。本研究通过构建预防-响应一体化理论模型，填补了民办高校在复杂治理情境下的研究空白。

更为宏观的战略意义在于，该方案深度契合了国家对于高质量服务保障体系的建设要求。在“十五五”规划预研的语境下，民办高校必须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而公寓危机的稳妥处置与韧性体系的建立，是评价民办高校办学质量、治理能力及社会认可度的关键指标。重构方案不仅探索了“三全育人”理念在物理空间外的延伸，更通过数字化手段推动了教育现代化在校园末梢的落地。

（二）从数据孤岛到治理合力的质变

在实践层面，重构方案的意义在于其显著的“减损增效”能力。民办高校公寓安全事故发生率长期高于公办高校，其中消防与心理危机是核心痛点。重构方案通过大数据预警与 PDCA 循环的引入，能够实现对风险因素的量化评估与动态干预，实证数据表明，实施此类循环的高校安全事故率可降低 51.8%。

同时，方案通过协同治理机制解决了民办高校辅导员流动性大、物业管理专业度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将学生自治力量引入评价体系，不仅使公寓投诉率下降了 37.5%，更在学生群体中建立起了一种自我保护与互相支持的“文化韧性”。这种从他治向共治的转型，极大地提升了民办高校应对新型风险（如网络舆情、智能家居安全）的响应速度与处置质量。

（三）破解资源约束的博弈

民办高校在方案实施中最具现实意义的考量是成本与效益的平衡，这也是本研究的核心难点之一。重构方案的可实施性建立在“低成本、高效能”的技术选型之上。研究重点不再是盲目追求昂贵的顶级硬件，而是研发经济型的智慧管理方案，利用现有的智慧校园数据底座进行二次挖掘与建模。

技术支撑方面，2020 至 2023 年间民办高校智慧公寓建设投入年均增长率达 28.7%，人脸识别等基础安防系统的覆盖率已大幅提升，为大数据分析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源。这意味着重构方案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基于现有设施的算法优化与流程再造。此外，通过校企合作、社会化力量参与以及争取政府科研项目资助，民办高校可以有效分摊初期建设成本，确保方案在财务层面的可持续性。

（四）法律合规与民意诉求的交汇

该方案的实施具备坚实的政策与法律基础。国家《民办教育促进法》及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均明确了民办高校的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在法律合规性的框架下，本研究提出的全流程管理机制能够有效降低学校的法律纠纷风险。

同时，方案精准回应了 05 后学生及家长对公寓安全、隐私与心理健康的迫切诉求。随着社会对民办教育质量要求的提升，具备韧性危机处理能力的学校将获得更高的社会公信力与招生竞争优势。这种来自社会、家长与政策的多重推力，构成了方案在民办高校中落地的强大动能。

五、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对新时代民办高校学生公寓危机应对模式的深度解构与重组，得出以下核心结论。首先，民办高校的公寓危机具有高度的复合性与敏感性，传统的被动管理已难以适应数字化生存与学生心理结构的变化。其次，重构后的“协同、智治、韧性”模式，通过大数据预警实现了风险的前置化，通过多方协同解决了权责的分裂，通过 PDCA 循环确立了系统的自愈能力。最后，该方案在民办高校情境下不仅具有显著的育人价值与社会意义，更在经济与技术层面具备极高的落地可行性。

展望“十五五”期间，民办高校公寓管理将进一步向“全时段、全场景、全感知”的智慧化方向迈进。未来研究应着力于以下三个方向：一是深化人工智能在日常咨询与心理筛查中的应用，提升管理的智能化边界；二是探索“数字孪生”技术在公寓空间治理中的融合，实现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同频共振；三是建立跨区域的民办高校公寓安全管理联盟，通过数据共享与案例库互通，构建更广阔层面的安全共同体。

在这个教育转型的大时代，民办高校公寓管理不再仅是秩序的维持，更是一次关于安全、科技与人文关怀的深度实验。通过不断的模式优化与技术迭代，我们有理由相信，民办高校学生公寓将真正成为学生安心求学、健康成长的坚韧堡垒。

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N]. 人民日报, 2024-07-19.
- [2]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S]. 2019.
- [3]教育部. 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S]. 2023.
- [4]周立, 朱加俊, 何苏扬. 大数据背景下的高校宿舍安全管理政治策略研究[J]. 高校后勤研究, 2024(10).
- [5]陈仲元, 杨爱东. 关于“十四五”期间中国高校后勤改革与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思考——以中国矿业大学为例[J]. 高校后勤研究, 2021(12): 8-10.

Collaboration, Smart Governance and Resilience: Research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risis Response Model for Student Dormitories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Lu Jiaojiao

Nanto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tong, Jiangsu, China

Abstract: As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enters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number of students enrolled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has exceeded ten million. Student dormitories ar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s a key front for talent cultivation. Nevertheless, driven jointly by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and changes in student group characteristics, traditional dormitory management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suffers from several drawbacks: emphasis on post-incident disposal rather than prevention, prioritization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over education, and focus on individual incidents instead of systematic governance. From a forward-looking perspective aligned with the 15th Five-Year Pla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upling logic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mart governance tools and resilience systems in responding to dormitory crises of private universities. Reflecting on the existing passive management model, it constructs an innovative crisis response model driven by big data early warning, centered on the “one-stop” community collaboration, and guaranteed by full-cycle resilience recovery.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reconstructed model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reduce the frequency of safety incidents, but also improve the social recognition of private universities and boost the diversified and sou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Keywords: private universities; student dormitories; crisis respons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自然灾害下粮食生产韧性的构建

卢宇航

(中南民族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在极端气候事件趋于常态化的背景下, 传统“抗灾救灾”模式已难以有效保障粮食安全。本文引入“韧性”视角, 将粮食生产韧性界定为抵抗能力、恢复能力与适应转型能力三个递进层次, 并以此框架审视当前我国粮食生产系统在基础设施、农业生态、经营主体和风险治理四个方面面临的现实挑战。在此基础上, 从夯实基础设施韧性、修复生态韧性、提升主体韧性、健全制度韧性四个维度提出构建路径。研究认为, 构建粮食生产韧性不是追求一劳永逸的静态目标, 而是需要持续投入、动态调适的长期过程, 应将韧性理念深度嵌入粮食安全战略的底层逻辑。

关键词: 自然灾害; 粮食安全; 生产; 韧性

DOI: doi.org/10.70693/202608147550

粮食安全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了要加强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并重点强调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堤坝建设、抗旱应急水源工程和农田排涝设施建设、病虫害统防统治和农田防护林建设等工作的重要性。尽管国家重视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但现有设施和机制在面对极端气候事件时, 仍暴露出明显的适应性缺口。传统的“抗灾救灾”模式侧重于灾后应急响应和损失补偿, 已难以适应灾害常态化、复合化的新形势, 粮食安全的传统保障手段面临严峻挑战。

在此背景下, “韧性”概念为粮食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不仅强调系统抵抗冲击的能力, 更关注其吸收扰动、恢复功能乃至通过适应和学习实现转型的能力。从“抗灾”到“韧性”, 本质上是治理理念的一次深刻转变, 即从追求在稳定环境中的高产稳产, 转向在不确定环境中构建安全缓冲与动态适应能力。如何系统性地构建粮食生产韧性, 已成为气候变化时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亟待回应的关键命题。

1 粮食生产韧性的内涵界定

1.1 抵抗能力

即系统在灾害发生时凭借基础设施、技术手段和组织动员直接抵御冲击、减少损失的能力。这是韧性最直观的表征, 也是生产系统的“第一道防线”。高标准农田的排涝设施可以在暴雨中快速排出田间积水, 防止作物长时间受淹; 抗旱抗逆品种可以在水分胁迫条件下维持基本的生理代谢和产量形成; 农田防护林网可以有效削弱风沙灾害的破坏力。抵抗能力的强弱, 直接决定了系统在面对一般性灾害时的损失程度。然而, 抵抗能力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 任何工程和技术标准都有其设计阈值, 一旦灾害强度超过这一阈值, 防线便可能失守。近年来多地出现的高标准农田遭遇超强暴雨现象, 正是这一局限的反映。

2.2 恢复能力

系统在遭受冲击、防线局部失守之后, 能够快速修复、回归正常生产秩序的能力。这一层决定了系统在多长时间、以多大代价恢复正常功能。灾害过后及时补种改种、通过区域调配恢复种子和化肥等生产资料供应、利用农业保险赔付弥补农户损失并支撑再生产投入、调动社会化服务力量加速田间作业恢复, 都属于恢复能力的具体体现。如果说抵抗能力考较的是“家底厚不厚”, 恢复能力则考验的是“反应快不快”。灾后恢复的速度与质量, 往往是区分灾害影响的关键分界线。

作者简介: 卢宇航 (2000—),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1.3 适应与转型能力

是韧性的高级形态,也是韧性区别于抗灾的最本质特征。它意味着系统不仅能够恢复原状,还能够从灾害冲击中学习,通过调整结构、优化功能乃至重塑发展路径,更好地应对未来类似或更为复杂的冲击。这种能力的核心在于,它不追求恢复原样,而是探求恢复到什么样才更安全。人类活动在农业干旱变化中起到主导作用[1],北方一些地区因连年干旱倒逼形成旱作农业模式,部分地方在极端天气后主动调整作物布局和种植制度,都是在生产层面做出的适应性回答。更具转型意义的实践来自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之后,部分地区在灾后重建中主动将低洼易涝地块调整为生态湿地或蓄滞洪区,将单一的种植功能转化为复合的生态—生产功能。这一选择超越了解决灾害,恢复原样的惯性思维,体现了从冲击中学习、主动重构系统的转型能力。制度层面的变化同样印证了这一逻辑,近年来国家推动农业保险从“保成本”向“保收入”转型、构建巨灾风险分散体系,正是从历次大灾中吸取教训后的制度性回应。这一层能力所触及的,已不仅是生产功能的恢复,而是整个系统的学习能力和进化潜力。

三个层次并非简单递进,而是相互嵌套、互为支撑。抵抗能力为恢复争取时间窗口,恢复能力为适应与转型创造缓冲空间,而适应与转型能力的提升,反过来又会抬高系统的抵抗阈值和恢复上限。真正具有韧性的粮食生产系统,应当同时具备这三种能力,并在动态平衡中实现螺旋上升。以此为分析框架审视当前我国粮食生产系统,可以发现三个层次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短板。

2 当前粮食生产韧性面临的现实挑战

2.1 基础设施韧性不足

经多年持续投入,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已超过十亿亩,灌排体系覆盖面持续扩大,但建设标准与极端灾害强度不匹配的问题依然突出。但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降水的变化对农业生态系统冲击较大[2],许多农田水利设施的设计标准基于历史水文数据,一旦遭遇超标准灾害,排水能力便严重不足。同时,骨干工程与末端渠系衔接不畅,旱难浇、涝难排。“最后一公里”瓶颈在灾害发生时极大限制了设施效用。更有甚者,部分项目建成后管护主体不明、资金缺位、机制虚置,沟渠淤塞、泵站老化等现象并不鲜见,设施功能隐性衰减,灾害来袭时集中暴露,错失防灾减灾的关键窗口。

2.2 农业生态系统缓冲能力下降

农业生产依托于自然生态之中,健康的生态系统本身就具有调节极端气候的缓冲功能,土壤蓄水保墒,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抑制病虫害的暴发蔓延。然而,长期集约化经营正在侵蚀这一自然韧性根基。高强度连作、过量施用化肥、有机物料还田不足,导致土壤有机质下降、结构板结,旱时保水弱、涝时入渗差,土壤从韧性载体变为脆弱性源头。部分粮食主产区长期超采地下水维持高产,正常年份尚可维持,一旦遭遇持续干旱、地表水锐减,便面临无以为继的困境,这是以透支资源换取的脆弱稳产。此外,大面积单一化种植和农药过度使用削弱了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害虫天敌减少、土壤微生物群落简化,系统越依赖人工干预越脆弱。一个退化的农业生态系统不仅难以抵抗冲击,恢复也更加漫长艰难,这种脆弱性恰恰是韧性构建最易被忽视的短板。

2.3 生产经营主体风险应对能力分化明显

随着土地流转加速和规模经营推进,粮食生产主体已呈现代际更替与结构性分化。小农户大量退出直接生产后,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成为粮食生产的主力军。然而,主体更替并未自动消除韧性短板,风险应对能力在不同主体间分化显著。部分规模经营主体面临高额地租、雇工成本和贷款压力,一旦遭遇重大灾害,经营风险集中爆发,甚至可能面临规模越大、损失越重、恢复越难的困境;而仍留守在粮食生产中的小农户,多为老龄化和兼业化群体,其信息获取能力、资金储备和风险意识同样薄弱。无论是规模主体的风险集中问题,还是留守小农户的能力短板问题,都构成了粮食生产韧性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关键在于,当前缺乏差异化的韧性支持机制,对规模主体缺乏覆盖其特殊风险的保障产品,对留守小农户缺乏精准有效的服务触达手段,不同主体的韧性短板尚未得到针对性补强。

2.5 风险治理体系尚不健全

我国农业综合风险防范措施不系统[3]。气象预警发布后难以快速转化为具体的农事调整建议,农业部门的灾

情评估与保险机构的理赔定损之间也缺乏制度化对接,往往依赖临时协调,反应链条长、效率低。水利、气象、农业农村、财政、保险等部门各管一段,缺乏统一的风险治理协调平台,全链条应对中任一环节的断裂都会拖累整体韧性表现。灾后恢复多以重建原状为主,缺少对灾害成因和应对过程的系统复盘,经验教训难以转化为制度改进,无法实现从“恢复”到“进化”的跨越。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显著促进粮食安全[4],但农业保险虽覆盖面大幅提升,仍以保物化成本为主、保障水平偏低,巨灾分散机制尚不健全,面对大面积极端灾害时赔付能力和响应速度面临严峻考验,难以真正发挥稳定器的作用。

3 粮食生产韧性的构建路径

3.1 夯实基础设施韧性,筑牢抵御灾害的硬支撑

夯实基础设施韧性,核心在于实现建设标准、管护能力与冗余设计的动态匹配。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实施对粮食生产气候韧性的影响具有正向促进作用[5]。在建设端,应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提质改造和中小型水利设施配套升级,重点打通骨干工程与田间毛细渠系的衔接节点,彻底解决旱难浇、涝难排的“最后一公里”梗阻。灾害高发频发区域应适度提高灌排设施的设计标准,为应对超常规极端事件预留冗余空间,避免发生按历史数据设计,却被未来灾害击穿的情况。在管护端,必须扭转“重建轻管”的长期惯性,明晰管护主体、落实管护资金、建立长效机制,将农田基础设施管护纳入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责范围,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化力量,确保设施功能不因日常失修而隐性衰减。建好是基础,管好才是韧性在日常的坚实保障。

3.2 修复农业生态韧性,增强系统自身的缓冲能力

修复农业生态韧性,本质上是重新激活自然系统本就具备的缓冲与调节功能。健康的土壤是最经济的防灾设施[6],推广如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和轮作休耕等措施,持续恢复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团粒结构,充分发挥土壤蓄水保墒、调节旱涝的天然功能。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建设农田防护林网、生态沟渠、植被缓冲带和小微湿地等绿色基础设施。这些设施平时提供生物栖息地和景观功能,灾害来临时则发挥涵养水源、削减洪峰、防风固沙、调节田间小气候的调节功能。相对于单纯依赖工程手段的灰色基础设施,这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成本更低、效益更广、可持续性更强,是用生态的韧性对冲气候的波动。从更深层次看,修复生态韧性要求粮食生产观念从向自然索取转向共生,将生态保护从生产的外部约束转化为内部韧性。

3.3 提升主体韧性,补齐差异短板

主体更替并未自动消除韧性短板,关键在于针对不同类型生产者面临的不同风险特征,精准施策、分类赋能。对于家庭农场、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应重点开发覆盖其高投入、高集中度风险的专属保险产品,引导其建立内部风险储备,避免因规模大而使得损失高,从而导致恢复难的困境。以规模化经营为核心推进农地流转,能够有效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组织化程度和规模化优势,从而增强粮食生产系统的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7]。对于仍留守在粮食生产中的小农户,一方面应加强土地流转,另一方面应强化精细化气象预警和农事信息服务,确保信息能够及时传达,并得到充分利用,同时通过托管服务、联耕联种等形式将其纳入有组织的韧性网络,弥补个体能力的不足。通过差异化支持,使各类主体都能在韧性链条上找到自己的安全位置,而非留下明显的薄弱环节。

3.4 健全制度韧性,编织全链条风险治理网络

健全制度韧性,就是要将碎片化的治理资源整合为系统的风险应对体系。在灾前预防环节,应强化精细化风险区划和差异化预案编制,依据不同区域的灾害类型和发生规律制定解决方案,并定期组织演练和动态修订,确保预案从纸面走向实战。在灾中响应环节,核心是打通部门壁垒、缩短反应链条。应建立跨部门应急联动机制,整合气象、水利、农业农村、应急管理等部门的气象和响应链路,实现信息共享、指令统一、行动协同。与此同时,完善种子、化肥、柴油等应急农资的储备和调运体系,确保灾后恢复生产所需物资第一时间到位。在灾后恢复环节,不能止步于重建原状。应建立系统化的灾害评估与学习反馈机制,对每次重大灾害的预警准确性、响应及时性、损失成因和应对短板进行深度复盘,将经验教训转化为制度修订和政策调整的依据,真正实现从恢复生产到优化防灾能力的进化。此外,农业保险的保障功能亟待强化。应加快从保物化成本向保收入的转型,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覆盖面,健全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保险不仅是灾后补偿工具,更是稳定

生产预期、支撑长期韧性投入的关键制度安排。只有当生产者确信受灾不会血本无归，才会更愿意投资于那些回报周期长但韧性效益高的适应性措施。

4 结束语

韧性不是一劳永逸的静态目标，而是一个需要持续投入、动态调适的长期过程。气候变化仍在演进，极端灾害的强度和形式仍在变化，粮食生产系统必须保持学习能力和进化弹性，不断在应对新挑战中更新自身的韧性结构。唯有将韧性理念深度嵌入粮食安全战略的底层逻辑，贯穿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生态保护、主体培育和风险治理的全过程，我国粮食生产才能在日益不确定的气候环境中筑牢安全根基，真正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参考文献：

- [1] 阚雨萌,武晋雯,常峻菲,等.东北三省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气象干旱对农业干旱的影响及贡献[J/OL].水利水电技术(中英文),1-18.
- [2] 尹朝静,廖培森,杨坤,等.中国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演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5,34(11):2575-2590.
- [3] 王小亚,孔锋,刘秋荣.新时期我国农业综合风险防范及提升路径研究[J].水利水电技术(中英文),2022,53(12):1-10.
- [4] 施伟,孙鑫.政策性农业保险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基于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的准自然实验[J].现代农业,2025,50(5):45-57.
- [5] 彭长生,刘阳,钟钰.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实施对粮食生产气候韧性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25,(11):42-62.
- [6] 于法稳.基于气候韧性的农业绿色发展：理论逻辑及实现路径[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44(2):101-111.
- [7] 刘强,吕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粮食生产韧性的影响——兼论农地流转的规模门槛[J].农业现代化研究,2025,46(5):955-965.

Construction of resilience in grain production under natural disasters

Lu Yuhang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Wuhan,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extreme climate events becoming increasingly normalized, the traditional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lief” model has proven inadequate to effectively safeguard food securit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resilience perspective, conceptualizing grain production resilience as three progressive levels—resistance, recovery, and adaptive transformation—and employs this framework to examine the current challenges facing China’s grain production system in four key areas: infrastructure, agricultural ecology, production entities, and risk governance. On this basis, it proposes a construction pathway from four dimensions: strengthening infrastructure resilience, restoring ecological resilience, enhancing entity resilience, and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The study argues that building resilience in grain production is not a static goal to be achieved once and for all, but rather a long-term process requiring sustained investment and dynamic adaptation; thus, the concept of resilience should be deeply embedded in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h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strategy.

Keywords: Natural disasters; Food security; Grain production; Resilience

应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研究

张心宇

(苏州大学, 苏州 215021)

摘要: 应急状态下国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往往会延伸至通常属于公民自治的领域, 触发人们对于公民尊严与社会福祉的思考, 权力与权利这对张力关系进入公众讨论视野, 在宪法框架内重新理解这对张力关系对于推进我国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应急状态下公权力相比于常态下有所扩展, 公民基本权利需要做出相应让步, 主要表现为权力行使主体的扩大、权力行使内容的扩展以及公民自由权、隐私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限制。基于对人性善恶、权利性质、公私权益等的合理考量, 应急状态下国家权力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有其正当性根源。但为了避免公共权力的过度行使和公民权利的过分缩减, 应当将公权扩张和权利限制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明确这一界限是构建应急状态法治体系的前提和核心。应依据法律保留原则提供权利限制的依据, 以不得侵犯本质内容原则划清权利限制的范围和底线, 以比例原则规范权利限制的程度, 为公权扩张提供明确而有效的法律指引, 使其在法治轨道内有序运行。

关键词: 应急状态; 基本权利; 权利限制; 权利保障

DOI: doi.org/10.70693/202608229154

第1章 问题的源起: 应急状态下国家权力的扩张与公民基本权利的克减

近年来, 发生在我国的“非典型肺炎”、汶川大地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危机事件使“应急状态”一词频繁进入人们的视野。世界各国宪法与法律对应急状态概念有不同规定和理解, 因而明确本文所说的“应急状态”的概念无疑是后文研究公民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的一个基础性环节。

狭义上的应急状态的范畴被广义上的应急状态涵盖在内, 广义上的应急状态具体还包括紧急状态和战争状态。狭义上的应急状态仅仅是指有关部门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 对突发事件进行确认和应对处置的状态。本文笔者对于“应急状态”的概念采取狭义的理解方式, 结合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3条的规定, 笔者对应急状态的概念作如下界定: 应急状态是指有突发事件引起的国家和政府部门必须紧急处理应对的状态。突发事件一经出现发生便可在全国或部分区域范围内引发一定混乱和危机, 主要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应急状态下, 为了能够有效迅速地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公民基本权利往往可能在更大程度和范围上被国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所作出的紧急处置措施限制和消减。“在自由与政府的永久争议上, 危机意味着更多的政府而较少的自由。”^[1]就像霍姆斯说的那样: “当国家元首决定有关国家存亡的事情时, 个人的普通权利必须做出有必要的让步”。公权力与私权利犹如天平之两端, 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状态。与公权力的扩张相对应的便是公民私权利的限制和消减。应急状态下公权力和私权利会处于一种失衡状态, 而这引起了较大争议。

1.1 应急状态下国家权力在一定范围内扩张

1.1.1 权力行使主体的扩大

我国是一个实行人民民主的国家, 人民主权原则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 该原则意味着一切公权力本质上都来源于广大人民的授予和权利让渡。然而, 在人民主权原则下, 出于对国土面积、人口数量、交通情况、管理水平等因素的考量, 让作为真正权力拥有者的人民都来直接行使权力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 法律会授权一些具体的机构成为权力行使的合法主体,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行政主体也可以委托其他组织或个人去依

作者简介: 张心宇 (2001-), 女, 硕士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法执行行政管理事务。行政委托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目标,在自身不能亲自行使所执掌的部分行政职权的情况下,依法将该部分行政职权委托给符合条件的行政机关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行使运用,并由行政机关直接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的一种法律制度或法律行为。应急状态下,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基于对事件突发性、任务临时性、管理灵活性等客观因素的考量,公权力合法执行者的范围通常会被予以适度扩大,最常见的便是行政机关对基层自治组织的行政委托。例如,出于现实情况和实际效果的考量,管控措施被下放至基层社区。基于防控工作“以社区防控为主”的策略,当地的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和物业管理公司接受地方政府的委托参与疫情防控。2020年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规定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疫情防控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可以成为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这进一步明确了在受到行政委托的基层自治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是特殊情况下公权力的合法行使主体。

1.1.2 权力行使内容的扩展

任何行使国家权力的主体都必须恪守权力法定原则,将法治思维贯穿于应对突发事件的所有环节和全部工作。在行政方面,行政主体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平时状态和非常状态是国家在进行统治和管理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两种社会状态。适用于平时状态的法称“常态法”,其权力与权利设计基于调整平时状态下的各种社会关系的需要而进行,常态法囊括了我国现行法律中的大多数。适用于非常状态中的应急状态的法则称“应急法”,我国的应急法律体系主要由宪法、应急法律法规规章、专业性法规和一些配套型法规组成和体现。与平时状态相比,应急状态下突发事件打乱了社会正常秩序,国家和社会处于混乱和危急当中,需要更加高效和强有力的措施去规制人们的行为,扭转不利局面。因此,与常态法相比,应急法中所规定的国家权力通常会有所扩张。如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授权,政府可以根据疫情的严重程度限制或中止公众聚集活动,并决定关闭生产场所、学校等,还可以征用物资和财产。在正常社会秩序下企业的日常运作和公民的日常生活不受政府的非法干预,任何行政机关都没有这些权力更不能进行这些行动。然而,为了高效迅速地平定混乱和危机,法律授予政府根据突发事件的发展情况采取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和应急行政决策的权力。公权力与私权利犹如天平之两端,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状态。与公权力的扩张相对应的便是公民私权利的让步和消减。

1.2 应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作出相应让步

1.2.1 公民自由权的限制

追求自由对每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自由是人的自主性、主体性的体现,“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2]在法治状态下,自由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而不被强迫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3],即法无禁止即自由。人身自由权有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狭义的人身自由权主要是指公民的身体自由不受非法侵犯。广义的人身自由权则还包括与狭义人身自由权相关联的人格尊严、住宅安全权、通信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与公民个人私生活有关的权利和自由。本文所指的人身自由权乃是狭义的人身自由权,核心是行动的自由。人的生命与身体自由,不受他人特别是政府非法及不合理的侵夺,乃民主国家个人的基本权利,也是立宪制度的一项中心内容。就其重要性而言,在整个人权的架构中,身体自由则实构成一切其他自由的基础。然而,大多数国家都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在发生突发事件后的应急状态下可以对公民人身自由权保障的条款加以停止或者变通执行。如1904年《巴拿马宪法》第24条:“在外敌入侵或者危及公安之内乱时,得因国家安全之需要,于共和国之全部或者一部暂时停止上述人身自由权利。”《魏玛宪法》规定:“在紧急状态期间,联邦总统得临时将人身自由不得侵犯等宪法规定之全部或一部分停止之。”

1.2.2 公民隐私权的减缩

隐私权主要涵盖两个方面:一是个人私生活的安宁权,即个人私生活受到不被随意打扰的基本保障;二是个人私生活的秘密权,这意味着公民有权保护其私人事务不被未经授权的组织或个人了解。这些权利赋予了每个人在法律框架内控制和管理自己私人领域事务的权利,同时也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干涉或侵犯。但在应急状况下,社会公共利益可能会因为公民隐瞒个人相关信息的行为受到减损,公共安全风险等级上升。行

政机关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可以将那些可能对公共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进行公开。在《突发事件应对法》的授权下，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有权责令相关机构和人员及时收集并报告信息，并有责任向社会公众公开将反映突发事件的信息渠道。而《传染病防治法》对国务院及省级卫生部门需要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布全国或本行政区域内传染病的疫情信息做出了相关规定。同时，为了有效地控制疫情的传播扩散和指导公众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确诊患者或疑似患者的活动轨迹等个人信息可以由相关部门在特定情形下依法公布，以期最大限度地减少传染病对公众健康造成的危害。

1.2.3 公民财产权的减损

对动产和不动产的所有权是公民的财产权主要表现。所有权的性质之一便是排他性，即所有权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些财产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能随意侵犯或剥夺这种独占性质的权利。应急状态下公权力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主要表现为应急征用。应急征用是指在突发事件下政府或应急管理部门出于公共的利益需要，在必要条件下以简易程序对单位或个人的财产使用权或生产能力进行占用，并在事后及时返还并给予补偿的制度。例如根据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基于控制疫情船舶、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维持社会秩序等需要，有权在本行政区域内临时征用交通工具、房屋以及相关设施、设备。相关人员及单位必须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对个人、企业、学校等所有的房屋及交通工具的合法征用。

第2章 应急状态下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正当性剖析

洛克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处在没有明确公平规则的自然状态中，既没有裁判者来公正解决争端，也没有一种力量去公允执行裁判。因此，“必然要过渡到市民社会或政治社会，而这种过渡是通过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们订立社会契约的方式让渡自己的部分或全部权利给国家以换得后者的保护而完成的。”[4]社会契约论是权力保障权利的理论依据，出于对社会契约的遵守，国家必须承担并履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义务。笔者认为，虽然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国家已经确立了公民基本权利至高无上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应对其进行限制，权力限制权利也存在如下正当性根源。

2.1 人性本恶：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法哲学依据

“人性总是或多或少的同一切科学有着联系，任何科学总是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回归到人性当中，而不论他们与人性离得有多远。”[5]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马克思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要相信无所不在的人性的力量以及人所固有的尊严和价值的力量，不要过于渲染制度、权力乃至传统的力量，人本身才是权利的最终基础。[6]因此，进行任何制度和理论都应当首先正视人性、立足于人性，从人性视角出发进行科学研究。

“无赖原则”是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提出的一个著名理论，为现代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理论打下了坚实基础。他指出，任何拥有权利的个体都存在潜在的“无赖”风险，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普遍存在这种道德沉沦趋势。因此，在设计权利制度体系时，必须使权利受到法律之力的制约，基于“人都具有‘无赖’的特性”这一前提假设构建起一种强有力的制约机制。无论是权利还是权力，其本质上都是为了追求利益。趋利避害是人性的自然倾向和原始选择，在利益驱动下人类往往难以遏制人性中的欲望，权利与权力在享有者手中因欲壑填之难皆易泛滥成灾。然而另一方面，人类有对平和友善、安全稳定的秩序予以孜孜不倦的追求。为了能够让人类社会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适当的规则有必要被设计出来以约束和矫治人性之“恶”。詹姆斯·麦迪逊曾说政府和公民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天使”：如果政府是天使，那就不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如果公民都是天使，那就不再需要政府。但毕竟人类是永永远远都不可能成为“天使”的，因此有必要对其基本权利在特定情况下进行适当限制。

2.2 权利双重制约：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宪法学依据

基本权利应当受到一定限制，这是如今宪法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领域大多都承认的。马克思也曾指出，“虽然每种自由都被宣布为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却总是需要附加说明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自由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6]基本权利本身具有内在制约和外在制约这两种制约。

2.2.1 内在制约

恰如罗尔斯所言“限制自由的理由来自自由原则本身”，[7]基本权利的受制约性与其不受侵犯性相伴而生、相辅相成，基本权利限制之正当性根基亦可从基本权利自身予以挖掘。内在制约是由权利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具有原生性。如个体的名誉权、隐私权、人格尊严不可因另一个个体言论自由的行使而随意受到侵犯，言论自由自诞生之日起便要收到此种制约和束缚。美国大法官霍尔姆斯曾言：“对言论自由作最严格的保护，也不会容忍一个人在戏院中妄呼起火，引起恐慌。”[8]“基本权利体系在动态运动过程中，权利主体在行使其为宪法所确认的基本权利时，往往有可能影响到同样为宪法所保护的其他人的基本权利，从而显现出一种混乱状态。”[9]想要构建一个公正与合理的权利体系，权利的和谐共处是至关重要的。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假想的权力赛场，权利的实现不是一场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如果人人均享有绝对的自由，那么人人皆无自由可言。给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划定一个合理限度，其目的之一便是为了使每个个体都能在权利行使的大道上有序行使，达到自身基本权利的享有和他人基本权利的实现之共赢。

2.2.2 外在制约

外在制约主要是指现代宪法为实现秩序、福利及公序良俗而对基本权利所必需设定的制约，此处的“秩序、福利及公序良俗”可统称为“公共利益”。对于把公共利益当作使公民基本权利受到限制的正当性根源，西方学术界早有论述。如格老秀斯认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比财产的主人更有权支配私人财产。孟德斯鸠也指出，共和政体“要求人们不断的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10]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后，许多宪法研究发面的学者开始承认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如英国著名学者米尔恩曾言：“共同体的每个成员所负有的一项义务就是使共同体的利益优先于他的自我利益，不论两者在什么时候发生冲突都一样。”[11]

笔者也赞同个体权利和自由应当都受到公共利益的边际约束。其正当理由在于：首先，只有在社会秩序稳定、国家和平安全的情况下个人利益才能有所保障，进而得以实现。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绝不可相向而立。“对基本权利之限制，根本还在于吾乃人之社会，个人不可能无视与社会的关系而生存，所以，人权尤其在与他人的人权之关系上受到制约，也是当然的。”[12]维护个人利益的安全调整集体成员的利益分配是确保公共利益的根本目标，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平衡各方的权益，而且最终将推动个体利益的扩展。因在整个社会中，公共利益得到增强意味着每个社会成员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利益。其次，在很多情况下被限制主体也会因公共利益得到维护而获益，尤其是在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鉴于病毒的传播途径及其强易感性，疫苗和特效药在一定时期内亦难以研制上市，人与人之间同呼吸共命运的重大连带关系急剧突显出来，公共健康和社会利益的紧迫性和优先性飙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作为现代民主国家特征的根本大法，宪法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基本权利绝对不能受到限制。并且值得强调的一点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是限制其基本权利的根本目的。郭道晖先生就曾指出保障基本权利与限制基本权利二者之间的关系，“限制与保障两者须分主次，保障是主要的，限制是次要的。限制也是为了保障，限制和保障是辩证统一。”[13]

第3章 应急状态下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国家权力在应急状态下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固然有其正当性根源，但随之而来的便是权力行使过度或任意的隐患，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会因公权和私权之间的冲突而增加，因此必须要在失衡中保持和把握平衡。也就是说，公权力扩张与私权利受限必须把握一定的界限，遵守一定的原则，受到“限制之限制”，既要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又要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被过度损害，统一和谐应急处置效果和社会稳定秩序。

3.1 法律保留原则

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最先提出了法律保留原则，之后该原则在德国被发扬光大。法律保留原则将限制基本权利的权力授权给立法机关，其主要是基于民主性考量。人民主权原则对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在这一原则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所有公共权力都源自于人民，国家公权力机关仅

仅是人民的代理人。作为民主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公民的基本权利只能由人民代表依据人民的意志通过法律手段加以限制，这样才可以视为得到了人民的明确同意。同时，法律保留原则还进一步要求法律授权应尽可能明确其限制基本权利的内容、期限和界限等以保证授权的明确性。我国现行宪法没有规定法律保留原则，《立法法》第8条和第9条作了相关规定，但略显授权过宽的色彩。《立法法》只是把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权和私有财产权这三方面基本权利囊括在法律保留事项内，然而，除这些基本权利外的其他公民权利被排除在法律保留事项以外，如平等权、宗教信仰自由、最低生活保障权等。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纳入法律保留范围的基本权利进行扩大和细化。可以说，逐步提高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立法层级是国家为了预防和规避通过授权立法可能带来的对公民权利的侵害而应当采取的有效手段之一。这一过程不仅是对构建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关键举措。

3.2 不得侵害本质内容原则

在限制基本权利的过程中，人权保障的核心理念不得被抛弃、偏离和否认，国家不得违背其所必须承担的不可克减的人权义务，不得损害权利人作为“人”的尊严、价值、人格和主体性权益。如生命权、人格尊严、思想自由等在公民基本权利体系中具有本质性地位的基本权利，法律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得对其进行减损和限制。无论采取何种紧急应对措施，公民的生存权必须被置于首位进行保障。一切行动都应以公民的生命和健康为核心。公民的个人尊严不应受到侵犯，在应急情况下，个人的基本权利可能会受到限制，但人的尊严是这一限制的底线，是不可被触犯的禁区。即便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社会个体成员也绝不能被公权力机关予以工具化的对待处理。例如“在家打麻将遭扇耳光”、“要求打麻将者背负桌子示街”等行为，这些措施均未遵循不得侵害本质内容原则，对公民基本权利造成了严重侵害。笔者认为，在应对突发事件的所有环节和全部工作中都必须有人权意识与法治思维应的融会贯通，这是国家权力在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的过程中所需遵从的第一要义。

3.3 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在德国公法学领域内被誉为“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利器”，尤其是在涉及到自由裁量时，这一原则显得尤为关键。正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65年的一项判决中所指出的那样，“比例原则归根究底乃系源自基本权的本质，基本权是人民向国家要自由的表征，它只有为维护公益所必要的范围内始能为公权力所限制。”^[13]在应急状态下国家权力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以公共利益之必需为前提，并且其限制程度需要与得到的公共利益相对称。是否符合比例原则，其判断标准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合目的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以及“最小侵害原则”。

3.3.1 合目的性原则

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个人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被放置于天平之上，两端各有其分量，这种相互作用使得两者之间呈现出一种相互影响、此消彼长的状态。应急状态下权利与权利之间、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冲突，这要求国家动用法律之力对它们进行调整和平衡，那么消除冲突、确保社会秩序和个体利益的和谐共存便是国家限制权利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对社会福祉的追求和对稳定预期的渴望是人们心甘情愿让渡权利的内在动力，公共利益的增加是行政应急决策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限制所带来的必然效益，否则便违背了公民的真实意愿。有效防控突发事件、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维护正常社会秩序应当是在应急状态下国家依法采取任何紧急应对措施所期达到的根本目的，不可偏离与违背。例如，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时期，行政主体对确诊病例实施定点治疗、对疑似病例进行强制隔离等措施在医学和法律层面均得到了合理支撑。然而，某些防控措施，如有特定疫区旅行史人士被禁止进入社区以及禁止湖北居民返回北京等就明显属于地域歧视行为。国家权力仅能根据科学规律且为了应对紧急状况之必需对公民权利与自由进行限制，绝不能因为个人情绪或其他非客观因素对公民施加不公正或者污名化的对待。

3.3.2 必要性原则

德国学者经常用“大炮打小鸟”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子原则：虽然用大炮也可以达到驱逐小鸟的目的但属实没有必要。人们对“必要性”的理解基于社会体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人们对“必要性”的理解也会因突发事件的发展而产生变化，所能接受的对个体权利自由进行限制的程度亦有所不同。举例来

说,在疫情广泛暴发前欧美国家通常倾向于采取相对宽松的紧急应对措施。有人认为此种现象与其对病毒特性的分析和对本国医疗体系及社会治理体系的自信有关,也有人分析其国民强烈的权利意识以及对行政管理的抵制是导致政府倾向于相对宽松的紧急应对措施的重要原因。然而在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之后,诸如“封城”、关闭商店、学校停课以及禁止聚集等更为严格的应对策略也逐渐被这些国家所采纳。人天生偏好自由,面对无知之幕下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正确地选择和安排自由与限制这两者之间的张力,需要国民和政府双方的理性能力和科学的决策机制。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必要性”一次固然稍显抽象,但无论是在任何情况下其都存在一个稳定的核心意思领域。一些权利限制措施显然是超出必要范围的以至于仅通过基本的直觉就能判断出其侵犯了权利。例如,基于联防联控的需要对姓名、手机号码、住址、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进行收集是合目的且有必要的,但要求登记并公开身高、民族、家庭成员的姓名等无关且敏感的隐私信息的行为就明显不符合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的必要性,而是构成了侵权行为。笔者认为,在发生突发事件的情况下,严格限制居民出行自由的应急处理措施不仅要符合目的性要求,而且也必须具有手段必要性,保持干预措施与其所欲达到的目的之间的适当平衡,不至于使公民难以接受因基本权利的减损而带来的负担。

3.3.3 最小侵害原则

最小侵害原则又叫做最温和方式原则,其基本含义是在实现某一法定目的时如果存在多种对公民权利限制程度各不相同的手段可供选择,那么国家机关就应当选择对公民权利限制最小的手段。该原则主要用于解决自由裁量问题。例如,在实施隔离政策时若获得了公众的积极合作与支持,应当优先考虑居家隔离的方式。该方式不仅能有效阻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而且也可以尽可能地减少对居民在个人居住空间内自由活动的限制。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突发事件的不同发展阶段,实现公共利益所必要的满足程度和相应的基本权利限制强度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时调整和优化。这个评估过程不仅具有动态性而且也具有实践上的合理性。举例来说,在疫情暴发早期阶段,国家对病毒的传播途径、致死情况等仍处于未知状态,基于充分保障公民生命健康安全的考量,城市、乡村和社区普遍采取更为严格谨慎的封闭政策:对于来自外地、尤其是有疫区旅行史的人员,除了对确诊病例实行强制医疗和疑似病例实施强制隔离外,还要求他们必须进行居家或集中隔离,并上报相关的个人信息。然而,对病毒的科学认识加深和大数据技术的运用使得合理识别风险等级成为可能,为更加科学和精确地了解个体和群体的健康状况和疫情整体趋势奠定基础,此时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就应当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多元化、灵活性和人性化的应对措施,避免简单粗暴的一刀切权利限制政策。笔者认为,政府需要在审慎进行利益衡量的基础上采取限制措施,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公益在失衡中恢复平衡,以对个人利益的最小侵害为满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风险应对效率,另一方面又可也同时兼顾公民基本权利保障。

总而言之,法律保留原则解决的是何者有权设定公民基本权利限制规范的问题,即主张只有法律才有权对基本权利作出约束。不侵犯本质内容原则是对基本权利限制规范内容方面的要求,即法律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得对其进行减损和限制在公民基本权利体系中具有本质性地位的基本权利。比例原则是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在执行基本权利限制规范需要自由裁量时应当遵循的原则。法律保留原则、不得侵害本质内容原则、比例原则这三个原则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共同对国家行为进行约束,划定国家权力限制基本权利时的基本界限。

结论

如何处理突发事件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宪法议题,一方面它是一个科学和事实问题,需要国家在把握科学规律和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予以处置应对;另一方面,其又是一个政治和法律问题,权利与权力、个人自由与集体健康、公民尊严与社会福祉等深层次的宪法学理考量通贯其中。权力部门在应对公共突发事件过程中应当避免应急行政决策权的滥用,平衡决策权扩张与公民权利限制之间的关系、确保两者达到和谐状态,这是实现人权保障最大化目标和构建解决公共突发事件解决机制的关键步骤基本前提。为此,国家公权力机关必须在严格遵守法律保留原则、不得侵害本质内容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前提下审慎行事,以平衡相互冲突的公益为核心逐步完善应急状态法律体系和其他可预见的制度安排。最重要的是国家应当充分发挥宪法作为一国根

本大法的价值, 建立安全、稳定且理性地维护人的尊严的宪法秩序, 将宪法价值深植于公民社会生活之中, 为社会和个体提供稳定的社会预期。

参考文献:

- [1] Cecil T. Carr. Crisis Legislation in Great Britain[J]. Columbia Law Review, 1940, XI: 1324-1345.
- [2] [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260.
- [3] 万高隆, 罗志坚. 法治视角下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与平衡[J]. 江西行政学院学报, 2012, 15(2): 14.
- [4] 韩震. 论人文科学就是历史科学[J]. 青海社会科学, 1995(06): 47-51.
- [5] [德]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20.
- [6] [美]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 何包刚, 廖申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241.
- [7] 北京大学法学院司法研究中心. 宪法的精神[M]. 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3: 11.
- [8] 刘志刚. 限制抑或形成: 论关涉基本权利法律之功能的二元性[J]. 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5(6): 60-65.
- [9] [法]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上册)[M]. 张雁深, 译. 商务印书馆, 1982: 34.
- [10] [英]A·J·M·米尔恩. 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M]. 夏勇, 张志铭, 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 54.
- [11] [日]芦部信喜, 高桥和之. 宪法[M]. 林来梵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8.
- [12] 郭道晖. 法的时代挑战[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 351.
- [13] [德]史塔克. 法学、宪法法院审判权与基本权利[M]. 许宗力等译. 台北: 元照出版公司, 2006: 5.

A Study on the Restriction of Citizens' Fundamental Rights in States of

Emergency

Xinyu Zhang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China

Abstract: In emergency situations, state power, especially administrative power, often extends to areas that usually fall under the autonomy of citizens, triggering people's thinking on the dignity of citizens and social well-being. The tension between power and rights has entered the field of public discussion. Re-understanding the tension between power and right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Constitu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governance system.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state, the public power in the emergency state has expanded, and the basic rights of citizens need to make corresponding concessions, which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expansion of the subject of power exercise, the expansion of the content of power exercise, and the restriction of basic rights such as civil freedom, privacy, and property rights. Based on the reasonable consideration of the good and evil of human nature, the nature of rights, public and priv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state power to restrict the basic rights of citizens in the emergency state has its legitimate root. However, in order to avoid the excessive exercise of public power and the excessive reduction of civil rights, the expansion of public power and the restriction of rights should be controlled within a certain limit. Clarifying this boundary is the premise and core of building the emergency rule of law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limitation of right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legal reservation, to define the scope and bottom line of the limitation of right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non-infringement of essential content, to regulate the extent of the limitation of right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to provide clear and effective legal guidance for the expansion of public rights, so as to make it run orderly within the orbit of the rule of law.

Keywords: emergency state; fundamental rights; restriction of right; protection of right

冬奥遗产可持续利用赋能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现实障碍与对策研究

吴炫轶¹，梁积铭¹，罗俊杰¹

(1.成都大学，成都，610106)

摘要：明确冬奥遗产可持续利用与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联，识别二者融合发展中的现实障碍，为后冬奥时代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路径。基于可持续和新发展理念，结合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等实践案例，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与案例分析法开展研究。结果表明冬奥遗产与冰雪产业发展存在价值共生、要素互补、业态赋能三重逻辑关联；当前二者融合发展面临资源配置失衡、产业链协同不足、科技转化滞后、保障机制不健全及安全监管缺失五大现实障碍；据此提出优化资源配置体系、完善全产业链协同机制等五维度针对性对策。提出冬奥遗产可持续利用是赋能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通过系统性对策破解现实障碍，可充分释放冬奥遗产价值，推动冰雪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助力实现“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目标。

关键词：冬奥遗产；可持续利用；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现实障碍与对策

DOI: doi.org/10.70693/202608232722

一、引言

成功举行2022年北京冬奥会，既兑现了“让3亿人投身于冰雪运动”的庄严誓言，又为我国冰雪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北京冬奥会的场馆、文化和人文资源是非常珍贵的，我们要把这些资源转化为新的发展动力，使其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关于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冰雪经济活力的若干意见》等多项政策文件相继发布，将冰雪经济作为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增长点，预计到2030年，我国冰雪经济总量有望突破1.5万亿^[1]。

在“后奥运”背景下，如何更好地保护和促进冰雪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国际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冬奥文化遗产的有形资源（如场馆设施、交通网络等）和“非物质”（如冬奥精神、赛事经验、专业人才等）对冰雪产业的业态创新和能级提升具有多重支持作用。但在实际应用中，我国冰雪文化遗产还存在着资源配置不均衡、运行效率低下、产业协同不强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能。

因此，本文通过对两者内在逻辑关系的分析，准确辨识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阻碍，并提出系统的政策建议，以期厘清我国冰雪文化遗产价值转换的实现途径，为解决制约我国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难题，促进我国冰雪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冬奥遗产与冰雪产业发展的逻辑关联

(一)价值共生：遗产价值与产业价值的双向赋能

冬奥遗产的可持续利用与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形成了价值共生的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冰雪产业的发展为冬奥遗产价值的实现提供了载体。冬奥场馆若仅局限于赛事功能，必然面临“赛后闲置”的世界性难题，而通过冰雪产业的开发运营，将场馆转化为大众健身、旅游休闲、研学培训的多元场景，能够让冬奥遗产从“静态资源”转变为“动态资产”，实现遗产价值的长效释放。如河北张家口崇礼依托冬奥场馆打造“四季全域运动目的地”，

作者简介：吴炫轶(2001—)，男，硕士，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
梁积铭(2002—)，男，硕士，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
罗俊杰(2003—)，男，硕士，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

通讯作者：韩晨

通过举办越野跑、山地车等夏季赛事，2024年夏季接待游客达430万人次，首次超过冬季游客数量，实现了冬奥遗产价值的全年化、最大化^[2]。

另一方面，冬奥遗产为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独特价值内核。冬奥遗产所蕴含的奥林匹克精神与冰雪文化，提升了冰雪产业的文化附加值；冬奥场馆的品牌效应与赛事影响力，为冰雪产业带来了稳定的客流与消费热度。如首钢园凭借冬奥大跳台遗产，在举办国际冰雪赛事期间入园人数近14万人次，周边餐饮、住宿营业额大幅提升，实现了遗产价值与产业价值的双向共赢^[3]。这种价值共生关系，使得冬奥遗产与冰雪产业形成了“发展共同体”，推动二者协同共进。

（二）要素互补：遗产资源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匹配

冬奥遗产所涵盖的物质、人才、技术等多元要素，与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要素需求形成了精准互补。在物质要素层面，冬奥赛事建设的专业场馆、完善的交通网络，弥补了我国冰雪产业基础设施不足的短板。截至2023年底，我国冰雪运动场地数量已从2015年的700多个增长到2847个，其中冬奥场馆及配套设施成为核心骨干力量，为冰雪产业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人才要素层面，冬奥筹办与举办过程中培养的赛事运营、场馆管理、教练裁判等专业人才，缓解了冰雪产业人才短缺的困境。张家口通过“冬奥遗产转化计划”，已储备国际级裁判员56名、国家级裁判员289名，为冰雪产业的专业化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撑^[4]。

在技术要素层面，冬奥期间应用的智能化场馆管理系统、精准气象监测技术、绿色能源利用技术等，为冰雪产业的科技升级提供了支撑。如国产滑雪索道打破国际品牌垄断，凭借安装快、性价比高的优势在吉林北大湖等滑雪度假区广泛应用；智能温控滑雪服、VR滑雪模拟器等技术的推广，降低了冰雪运动的参与门槛^[5]。

（三）业态赋能：遗产利用与产业融合的深度联动

冬奥遗产的可持续利用推动冰雪产业打破传统业态边界，通过产业融合实现业态创新，拓展了产业发展空间^[6]。一是“体育+旅游”业态融合，冬奥场馆与区域生态资源相结合，催生了高品质的冰雪旅游产品。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中，延庆、崇礼等赛区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模式，将专业赛事与大众旅游、休闲体验相结合，形成“冬滑雪、夏避暑”的全季业态格局，2024-2025雪季崇礼接待游客523.4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60.728亿元。二是“体育+教育”业态融合，冬奥场馆与人才资源为冰雪教育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撑。张家口冬奥村引入河北体育学院冰雪学院，构建“教学—实训—就业”闭环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开展青少年冰雪研学活动，培育了潜在消费群体。三是“体育+科技”业态融合，冬奥数字技术遗产推动冰雪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VR/AR沉浸式冰雪体验场景的打造，突破了季节与地域限制；智能化场馆管理系统实现了场地预订、客流疏导等功能的精准化管理，提升了运营效率。四是“体育+文化”业态融合，依托冬奥文化遗产开发冰雪文创产品、冰雪演艺活动，丰富了冰雪产业的文化内涵。这种多维度的业态融合，推动冰雪产业从单一运动项目向多元产业生态升级，大幅提升了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与附加值。

三、冬奥遗产可持续利用赋能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障碍

（一）资源配置失衡：区域与城乡发展差距显著

冬奥遗产资源的分布与利用呈现明显的不均衡特征，加剧了冰雪产业“北热南冷”“东强西弱”的发展格局^[7]。一方面，优质冬奥遗产资源高度集中于北京、延庆、张家口等赛区及北方冰雪资源丰富地区，而南方地区及中西部内陆地区由于自然条件限制与基础设施不足，难以有效承接冬奥遗产的辐射带动作用。北方地区冰雪运动参与率与消费规模远超南方，2023-2024冰雪季北方地区冰雪消费占比达72.3%，南方地区仅占27.7%，区域发展差距显著。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同样突出，城市地区拥有完善的冰雪场馆设施、丰富的赛事活动与专业的人才服务，而农村地区冰雪运动普及程度低，相关设施与服务供给严重不足，难以共享冬奥遗产红利。这种资源配置失衡，导致冰雪产业整体发展潜力未能充分释放。

（二）产业链协同不足：上下游联动与产业融合深度不够

目前，我国冰雪产业还存在产业链条较短，上下游协同程度不高，冰雪文化产业的整体效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在上游冰雪装备制造领域，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依赖进口，国产化率较低，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尽管冬奥期间涌现出一批国产冰雪装备创新成果，但多数企业仍处于低端制造环节，研发投入不足，核心技术突

破乏力。在中游场馆运营领域,部分冬奥场馆仍存在功能单一、运营模式固化等问题,全季运营能力不足。部分场馆过度依赖冬季滑雪项目,夏季运营缺乏特色业态支撑,导致资源闲置与效益低下,未能实现遗产价值的最大化。

在冰雪服务业的下游,专业培训、赛事运营、文创产品等增值服务的发展相对落后,很难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和高质量的需要。

(三) 科技转化滞后: 冬奥科技遗产赋能效能未充分释放

北京冬奥会留存大量科技类遗产资源,但相关技术落地转化的实际成效并不理想,科技对冰雪产业的赋能价值难以充分显现。一方面现有成果转化配套制度存在短板,冬奥会投入使用的场馆智能管控、气象精准研判等技术,多数仅服务于赛事举办本身,没有打磨出能够向行业普及复用的产业实施方案。企业和科研机构尚未搭建起高效的联合研发模式,技术流转对接渠道缺失,使得冬奥科技资源难以对接市场端的现实生产需求。另一方面国内冰雪市场主体大多为中小规模经营主体,自身资金储备有限,无力承担核心技术攻关以及技术落地改造的高额开销,对于冬奥现有科技成果的引进、改良迭代能力比较薄弱。

(四) 保障机制不健全: 政策、资金与人才支撑不足

一是政策支持系统不够健全,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来促进冰雪产业的发展,但是有些政策的针对性不强,配套措施不够完善,导致政策实施和实施的成效并不理想。如部分地区的财政补贴政策未能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对中小冰雪企业的扶持力度不足;冰雪产业统计口径不统一,难以实现对产业发展的精准监测与调控。二是投融资机制不健全,社会资本参与冬奥遗产利用的积极性不高,融资渠道单一。冬奥场馆运营、冰雪装备研发等项目具有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的特点,缺乏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导致社会资本参与意愿不足,项目资金短缺问题突出。三是人才培养体系方案具有局限性和滞后性,冰雪产业专业人才数量不足、结构失衡问题依然严峻。教练、裁判等基层服务人才短缺,赛事运营、场馆管理、装备研发等高端人才匮乏。

(五) 安全监管缺失: 赛事活动与消费场景风险隐患突出

冰雪运动参与群体规模快速扩张,安全风险问题愈发突出,已经成为阻碍冰雪产业提质升级的关键因素。首先,行业安全监管体系仍存在漏洞,场地设施、赛事组织、冰雪装备等板块的安全规范尚未完备,监管权责划分较为模糊。部分中小型冰雪乐园设备缺少规范化安全检测,潜藏各类安全隐患;雪地摩托、冰上龙舟等新兴冰雪项目还未建立对应的监管规则,发生意外后责任归属难以界定。其次,滑雪教练行业资质管理较为混乱,国内同时存在国家职业证书、海外认证以及雪场自制证书等多种资质证明,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教练真实业务能力。不少游离于雪场管理体系之外的非正规“黑教练”开展教学服务,一旦教学期间发生意外,追责维权难度大,直接威胁参与者人身安全。最后,冰雪运动风险保障配套建设滞后,冰雪项目本身具备较高风险性,但适配的运动保险产品供给偏少,大众主动投保意识普遍不强。

四、冬奥遗产可持续利用赋能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研究、

(一) 优化资源配置体系, 推动区域与城乡均衡发展

首先构建跨区域遗产共享机制。以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为核心,推动冬奥遗产资源在京津冀地区的一体化利用,形成产业协同发展格局^[8]。实施“北冰南展西扩”战略,建立冬奥遗产资源跨区域输出机制,支持南方地区与中西部内陆地区通过建设室内冰雪场馆、引入仿真冰雪技术等方式,承接冬奥遗产的辐射带动作用。鼓励北方冰雪企业与南方企业开展合作,共建冰雪运动培训基地、文创产品研发中心,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其次完善城乡冰雪基础设施。加大对农村地区冰雪运动设施的投入,在乡镇、社区建设小型化、多样化的冰雪活动场所,开展公益性冰雪运动培训,提升农村地区冰雪运动普及程度。推动城市冰雪场馆向农村地区开放,建立城乡冰雪资源共享平台,组织城市专业教练、志愿者深入农村开展指导服务。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开发乡村冰雪旅游项目,推动冬奥遗产价值向农村延伸,实现城乡冰雪产业协调发展。

(二) 完善全产业链协同机制, 深化产业融合发展

第一强化上游装备制造自主创新。加大对冰雪装备制造企业的扶持力度,统筹财政预算投入、体育彩票公益

金等支持渠道,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吸收转化冬奥科技遗产,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产冰雪装备品牌。建立冰雪装备标准体系,提升产品质量与安全性,推动冰雪装备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方向发展。

第二提升中游场馆全季运营效能。推动冬奥场馆多元化、全季化运营,丰富场馆品牌赛事活动,支持长期举办国际国内冰雪赛事。拓展场馆综合服务功能,增加健身休闲、文化娱乐、展览展示、研学培训等业态,实现“一季运营”向“四季运营”转型。如借鉴崇礼“赛事+旅游”模式,在夏季举办越野跑、山地车、露营等活动,提升场馆资源利用率。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场馆运营,创新运营管理模式,提升运营效率与服务质量。

最后丰富下游增值服务供给。大力发展冰雪运动培训、赛事运营、文创产品、康养服务等增值业态,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建立专业化的冰雪人才培训体系,规范教练资质认证标准,提升培训服务质量。培育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冰雪赛事IP,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商业赛事,构建多层次的赛事体系。深化“冰雪+”产业融合,推动冰雪产业与文化、旅游、科技、健康等产业深度融合,开发冰雪研学、冰雪康养、冰雪文创等特色产品,构建完整的产业生态体系^[9]。

(三) 强化科技赋能路径,提升成果转化效能

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搭建冬奥科技遗产与冰雪产业需求对接平台,推动科研院所与企业建立协同创新机制,促进智能化场馆管理、精准气象监测、沉浸式体验等技术的转化应用。鼓励企业设立技术研发中心,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对冬奥科技遗产进行吸收、消化与再创新。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对成功转化的项目给予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提升企业转化积极性。

其次推动冰雪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冬奥数字技术遗产的推广应用,打造VR/AR沉浸式冰雪体验场景,突破季节与地域限制,扩大冰雪运动的覆盖面。

(四) 健全多元保障体系,强化发展支撑能力

完善政策支撑体系,细化冰雪产业扶持政策,增强政策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确保政策落地见效。统一冰雪产业统计口径,围绕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等开展常态化监测,加强数据统计分析,为产业发展提供精准调控依据。建立政策执行评估机制,及时调整优化政策措施,形成“制定—执行—评估—完善”的闭环管理。

创新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资本以市场化募资方式设立冰雪产业投资基金,拓宽融资渠道。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投融资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特许经营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冬奥遗产利用、场馆运营、赛事举办等项目。完善风险分担机制,设立冰雪产业风险补偿基金,降低社会资本投资风险。推动冰雪企业上市融资,提升企业融资能力。

(五) 构建全流程安全监管机制,筑牢产业发展底线

完善安全标准与监管体系。制定完善冰雪运动场地设施、赛事活动、装备产品等领域的安全标准,明确监管责任划分。加强冰雪运动全流程安全监管,对场馆设施进行定期安全检测,对赛事活动进行全程安全督导,对新兴冰雪项目实行备案管理,消除安全隐患。建立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形成监管合力,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规范教练资质认证与管理。统一滑雪教练资质认证标准,整合国职证书、国际证书等认证体系,建立全国统一的教练资质数据库,方便消费者查询核实。加强教练职业培训,提升教练的技术水平与安全防护能力。严厉打击“黑教练”,明确雪场对教练的管理责任,确保教学安全。

五、结论

在价值共生、要素互补、业态赋能等方面,冬奥遗产的可持续利用与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有着密切的逻辑联系。然而,在实践过程中,仍面临资源配置失衡、产业链协同不足、科技转化滞后、保障机制不健全及安全监管缺失等现实障碍。为充分释放冬奥遗产的赋能效能,推动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需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体系实现区域与城乡均衡发展,通过完善全产业链协同机制深化产业融合,通过强化科技赋能路径提升成果转化效能,通过健全多元保障体系强化发展支撑,通过构建全流程安全监管机制筑牢发展底线。在“后冬奥”时期,我国冰雪产业已经步入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挥好奥运遗产这一珍贵的资源,既可以促进我国冰雪经济的不断发展,

又可以促进我国“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

参考文献:

- [1]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冰雪经济活力的实施意见[Z]. 2025.
- [2] 央视新闻. 一场比赛串联冬奥遗产 冰雪小镇开启“四季运营”模[EB/OL].2025-07-17.
- [3] 中国政府网.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感受冰雪经济的“热”力无限[EB/OL]. 2025-02-14.
- [4] 邹新娴,刘泽勇,布特,等.冰雪运动推动我国冰雪经济发展: 机制、困境与路径[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5,40(04):404-412.
- [5] 谢军,孔哲,董倩,等.科技冬奥视域下我国冰雪运动与科学技术互促发展的体系构建、内容构成与路径探析[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3,35(06):585-593+580.
- [6] 徐正可,韩丁,郭琴,等.北京冬奥遗产助推冰雪运动发展的逻辑关联、现实障碍与推进路径[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24,44(06):111-121.
- [7] 唐承财,肖小月,韩莹,等.中国典型冰雪旅游地开发模式及优化路径[J].自然资源学报,2022,37(09):2348-2366.
- [8] 刘超,陈林祥.我国冰雪运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机遇、趋势与路径[J].体育文化导刊,2021,(11):19-25.
- [9] 王松,周瑶,郭振.新时代我国冰雪运动产业供给体系高质量发展目标及路径[J].体育文化导刊,2020,(09):8-13+35.

A Study on Practical Obstacl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Enabl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Ice and Snow Industry Through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Winter Olympic Legacy

Wu Xuanyi¹, Liang Jiming¹, Luo JunJie¹

1.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Winter Olympic legacy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ice and snow industry, identifies the practical barriers hindering their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proposes effective pathways for fostering the high-quality growth of the ice and snow industry in the post-Winter Olympics era. Grounded in the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drawing on practical case studies 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ijing–Zhangjiakou Sports, Culture and Tourism Belt, this research employs literature review, logical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methods. The findings reveal three distinct log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Winter Olympic legacy and the ice and snow industry development: value symbiosis, factor complementarity, and business model empowerment; furthermore, the current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rocess faces five major practical barriers: imbalanced resource allocation, inadequate industrial chain coordination, lagging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imperfect support mechanisms, and insufficient safety oversight.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proposes five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namely, optimizing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system and enhancing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across the entire industrial chain.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Winter Olympic legacy serves as the core pathway to empowe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ice and snow industry; by implementing systematic countermeasures to overcome these practical barriers, the value of Winter Olympic legacy can be fully unleashed,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growth of the ice and snow economy can be promoted, and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treating ice and snow landscapes as valuable assets" can be realized.

Keywords: Winter Olympic legacy;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ice and snow industr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ractical obstacles and countermeasures

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旅融合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杨伶俐¹, 田丽¹, 姚春美¹

(1.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401331)

摘要: 农旅融合是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助推乡村共同富裕的核心路径, 数字经济是激活农旅融合增收潜力的关键赋能载体。基于全国省域 2011—2023 年面板数据, 本文依托产业融合、数字经济相关理论, 从产业关联、社会效应、融合新业态构建综合指标。研究发现, 农旅融合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对农旅融合的增收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可以进一步放大农旅融合的富民效果。作用机制层面, 农旅融合通过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土地流转水平两条路径带动农户增收; 异质性结果显示, 农旅融合增收作用在对外开放程度偏低、财政支农力度更强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更换核心测算指标、增加控制变量、滞后收入变量开展稳健检验以保证结论可靠。据此建议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 搭建农旅利益共享机制, 实施差异化财政扶持政策, 充分释放数字赋能农旅融合的富民作用, 推动乡村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数字经济; 农旅融合; 农户收入

DOI: doi.org/10.70693/202608279866

一、引言

数字经济全面渗透农业农村发展, 农村宽带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持续完善, 不断重塑传统农旅经营模式。农旅融合作为农村产业融合的核心形态, 依托田园资源发展农家乐、休闲乡村、农事体验项目, 盘活土地、农房等闲置要素, 拓展农户经营性、工资性与财产性多元收入, 是稳固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抓手。数字技术嵌入农旅产业链, 能够降低文旅宣传、农产品线上交易成本, 优化乡村要素配置, 持续放大农旅融合富民效能。厘清数字技术与农旅融合共同作用于农户收入的内在逻辑, 是当下乡村发展领域亟待回应的现实命题。

梳理现有研究成果, 学界已分别验证农旅融合的增收效果与数字技术的乡村赋能价值, 但仍存在明显研究短板。现有文献大多将三者割裂开展分析, 缺少数字技术、农旅融合、农户收入一体化分析框架; 对于农旅融合增收的内部传导路径挖掘不足, 产业结构升级、土地流转两类中介机制缺乏系统实证; 同时对外开放、财政支农带来的区域增收差异也少有分层细化检验, 相关研究存在拓展空间。

基于 2011—2023 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从产业关联、社会效应、融合新业态三个维度构建农旅融合评价体系。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基础增收效应, 引入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交互项验证正向调节作用, 选取产业结构升级、土地流转率开展中介机制检验, 并按对外开放、财政支农水平分组分析异质性特征; 通过替换核心变量、扩充控制变量、滞后被解释变量完成稳健检验, 系统揭示数字技术赋能农旅融合的增收机理, 为各地推进数字化农旅产业、健全联农带农政策提供实证参考。

二、文献综述

数字经济依托大数据、互联网重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 农旅融合作为农业与旅游业交叉形成的新业态, 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重要抓手。杨歌谣等运用熵值法从产业关联、社会效益、融合新业态维度构建评价体系, 完成省域农旅融合水平的测度, 为量化农旅融合发展水平提供可行思路^[1]。

农旅融合相关研究方面, 国外 Hermans 较早探讨旅游产业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证实旅游业可以从多重层面对农业产生带动作用^[2]。国内钟漪萍等指出农旅融合能够推动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是农

作者简介: 杨伶俐(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

田丽(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

姚春美(1997—),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

通讯作者: 杨伶俐

旅融合落地的主要载体^[3]。林茜认为农旅融合是市场需求、政策保障、创新驱动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催生的产物，外部环境会深刻影响农旅融合发展成效^[4]。农户收入研究领域，柳荻研究证实农户收入会受到家庭资源禀赋、耕地经营条件等多重个体层面因素的显著影响^[5]。彭小辉等研究互联网对农户收入的作用，发现数字工具的普及能够对农户收入差距产生调节效果^[6]。苏群等进一步提出数字技术对农民增收存在赋能作用，同时增收效果会受到外部政策条件约束^[7]。农旅融合与农户收入的关系上，黄祖辉等基于准自然实验研究，证实农旅融合相关政策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8]。沈洋等专门剖析农旅融合增收内在逻辑，提出农旅融合既能够直接拓展农户收入渠道，也存在间接增收路径^[9]。但该类研究大多聚焦产业宏观层面，对具体传导机制的实证检验仍有待完善。数字经济赋能农旅融合方面，李宽等实证表明数字经济对农旅融合存在驱动效应，并且驱动效果存在明显区域差异^[10]。杨海军等开展中介效应检验，证明数字经济可以依托农旅融合这条路径间接助力乡村振兴^[11]。戴永务等认为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重塑产业模式，为农旅融合发展提供新动能^[12]。

综合现有文献可以发现，已有成果分别对农旅融合、农户收入、数字经济赋能开展了讨论，但仍然存在不足。多数文献较少将数字经济、农旅融合、农户收入置于同一框架开展研究，缺少对数字经济调节效应的专门检验；同时对产业结构升级、土地流转率的中介路径缺少系统验证，对外开放、财政支农视角的异质性分析也相对不足。因此本文选取 2011—2023 年全国省域面板数据，检验农旅融合增收主效应、数字经济调节效应，开展中介机制与分组异质性回归，丰富相关实证研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3.1 农旅融合对农户收入的直接影响

传统农业生产以初级种养为主，产业链条较短，乡村土地、田园民俗等资源价值难以充分挖掘，农户增收渠道较为狭窄^[13]。农旅融合打破农业与旅游业的产业边界，催生农家乐、乡村民宿、农事体验等多元新业态，重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农旅融合能够盘活果园、农房、集体土地等闲置乡村资源，一方面创造大量本地就近就业岗位，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拓展农户工资性收入；另一方面带动旅游消费与特色农产品销售，壮大乡村经营主体，拓宽农户经营性收入。同时农旅产业发展抬升土地旅游附加值，土地流转带来的租金进一步增加农户财产性收入，多渠道共同发力直接推动农户收入提高。共生理论视角下，农业与旅游业具备长期协同发展的基础，产业融合能够释放乡村经济发展潜力^[14]。据此提出假设：

H1：农旅融合能够显著提升农户收入水平。

3.2 数字经济对农旅融合与农户收入的调节影响

农旅融合的增收效应并非固定不变，经营主体开展民宿改造、旅游项目开发、市场推广都面临信息闭塞、客源有限的现实难题^[15]。本文以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表征乡村场景下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农村互联网的普及能够打破地域信息壁垒，借助线上网络平台扩大乡村旅游宣传范围，拓宽外部客源，降低文旅项目的营销与交易成本。民族地区农文旅融合实践表明，信息技术手段是激活乡村产业、放大产业综合效益的重要工具^[16]。数字经济能够消解农旅发展过程中的信息阻滞问题，放大农旅融合带来的产业红利，强化农旅融合对农户收入的促进效果。据此提出假设：

H2：数字经济对农旅融合与农户收入之间存在正向调节效应，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旅融合的农户增收效应越强。

3.3 农旅融合对农户收入的间接影响

农旅融合除直接带动农户增收之外，依托两条核心中介渠道形成间接驱动作用，分别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土地流转传导至农户收入。其一为产业结构升级传导渠道。基于“三生”功能理论，农旅融合推动传统种养农业向旅游服务业延伸，提升农林牧渔服务业占比，实现农村产业结构升级^[17]。产业结构升级延伸农业产业链条，让农户分享二三产业增值收益。其二为土地流转传导渠道。农旅项目建设刺激土地流转需求，土地流转既为农户带来稳定租金收入，又释放劳动力从事农旅服务获取工资收入。农旅融合本质是对乡村各类生产要素进行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本要素的集聚能够改善农业生产方式，赋能乡村经济发展^[18]。从区域实证研究来看，农旅融合发展质量受资源、人才等多重现实条件制约，要素配置的顺畅程度直接关系到增收传导路径能否落地生效^[19]。同时农村

家庭收入增长不仅依靠产业发展,收入分配格局同样会影响最终增收成效,产业发展红利能否惠及低收入群体十分关键^[20]。两条中介渠道协同发力,进一步释放农旅融合的富民潜力。由此提出假设:

H3: 农旅融合能够通过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土地流转率,间接提升农户收入。

四、研究设计

4.1 模型构建

(1) 基准回归模型:

为验证农旅融合对农户收入的整体直接作用,本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基准模型,同时控制地区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规避各区域先天乡村资源条件、历年宏观经济与涉农政策扰动引发的估计偏误,模型形式设定为:

$$kzpsr_{it} = \alpha_0 + \alpha_1 Score_{it} + \alpha_2 Controls_{it} + \mu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kzpsr_{it}$ 表示下标 i 个省市第 t 年农户收入; $Score_{it}$ 为第 i 个省市第 t 年农旅融合综合指数; $Controls_{it}$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 α_0 为常数项; α_1 、 α_2 分别为各变量对应的待估系数; μ_i 、 γ_t 、 ε_{it} 依次代表地区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与随机扰动项。

(2) 调节效应模型:

为探究数字经济在农旅融合影响农户收入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本文引入农旅融合与数字经济的交互项,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模型设定如下:

$$kzpsr_{it} = \beta_0 + \beta_1 Score_{it} + \beta_2 R_{it} + \beta_3 Score_{it} \times R_{it} + \beta_4 Controls_{it} + \mu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R_{it} 为数字经济代理变量; $Score_{it} \times R_{it}$ 为农旅融合与数字经济的交互项; β_0 为常数项; β_1 、 β_2 、 β_3 、 β_4 为各变量待估系数; 其余变量含义与基准回归模型保持一致。模型同步控制省份、年份双向固定效应,缓解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偏差,若交互项系数 β_3 显著为正,则表明数字经济存在正向调节效应。

(3) 机制检验模型:

为探究农旅融合作用于农户收入的内在传导路径,本文采用机制检验模型,分别以产业结构升级、土地流转率作为中介变量 M_{it} 分步检验,模型设定如下:

$$M_{it} = \varphi_0 + \varphi_1 Score_{it} + \varphi_2 Controls_{it} + \mu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该模型检验农旅融合对农户收入影响的路径机制: M_{it} 为机制变量,指代产业结构升级、土地流转率两项指标; φ_0 为常数项; φ_1 、 φ_2 为各变量待估系数; 其余变量含义与基准回归模型保持一致。模型同步控制省份、年份双向固定效应,缓解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偏差。

4.2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11—2023 年我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剔除西藏及港澳台地区,原始数据来源于各类统计年鉴、公开数据库。被解释变量农户收入、城镇化率、地区 GDP 等控制变量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与 CSMAR 数据库。核心解释变量农旅融合综合指数基于产业关联度、社会效应、融合新业态三维指标体系构建,原始数据来自《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农业农村部公开资料。调节变量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由《中国通信统计年鉴》中农村宽带接入户数、农村总人口指标计算得到。机制变量产业结构升级、土地流转率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对外开放程度、财政支农力度等异质性指标,以及市场化指数等控制变量,取自《中国财政年鉴》、樊纲王小鲁市场化指数报告。少量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补齐,全部连续变量进行 1% 双边缩尾处理,缓解极端值干扰。

4.3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农户收入 $kzpsr_{it}$ 。该变量用来衡量各省份农户的实际收入水平,采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表征。为消除异方差对回归结果的干扰,对该指标做对数化处理。

表 1 农旅融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主指标	变量名	变量说明	正负性
农旅融合	产业关联度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正指标
		旅游收入 (亿)	正指标
		旅游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正指标
		果园面积 (千公顷)	正指标
	社会效应	乡村个体就业人数 (万人)	正指标
		乡村私营企业就业人数 (万人)	正指标
		农户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正指标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数量 (个)	正指标
	融合新业态	各地区农家乐数量 (个)	正指标

(2) 核心解释变量: 农旅融合 $Score_{it}$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 从产业关联度、社会效应、融合新业态三个维度构建农旅融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完整的测算指标如表 1 所示。产业关联度反映农业与旅游业两大产业之间的经济联系紧密程度; 社会效应体现农旅融合在带动乡村就业、乡村资本投入、乡村资源开发方面产生的社会效益; 融合新业态用来表征农家乐、美丽休闲乡村等农旅融合衍生业态的发展规模。全部二级指标均为正向指标, 指标数值越大代表对应维度发展水平越高。收集原始数据之后, 对指标做标准化处理。在稳健性检验中, 还将采用各地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数量取对数作为代理变量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3) 机制变量。本文设置产业结构升级、土地流转率两项机制变量, 采用逐步回归机制检验模型, 检验农旅融合影响农户收入的内在传导路径。第一类为产业结构升级, 农旅融合推动传统农业向旅游服务业延伸拓展, 本文采用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比重衡量该指标, 比值越高代表农村产业向服务业升级的水平越高。第二类为土地流转率, 农旅项目开发会抬升土地旅游附加值, 刺激土地流转需求, 选用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与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总面积的比值进行测算, 反映区域农村土地要素流转配置的实际水平。

(4) 调节变量: 数字经济 R_{it} 。本文采用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作为数字经济的代理指标, 使用农村宽带接入户数除以农村总人口计算得到, 从乡村网络基础设施普及层面刻画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5) 控制变量。模型估计偏差大多来源于遗漏相关影响因素, 基准回归设置九项控制变量, 尽可能缓解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偏误。城镇化率, 以城镇常住人口占年末常住人口比重表征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 对地区 GDP 做对数处理; 人口密度, 采用年末常住人口除以行政区划面积得到; 人均受教育年限, 衡量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水平; 交通基础设施, 对地区公路里程做对数处理; 农民消费水平, 农民消费支出取对数; 工业化水平, 用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表示; 税负水平, 为地区税收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市场化指数直接采用樊纲、王小鲁编制的省级市场化指数。全部控制变量原始数据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各类统计年鉴以及樊纲、王小鲁市场化指数公开报告。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对样本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 结果如表 2 所示。本文选取 2011—2023 年全国 30 个省份面板数据, 剔除西藏及港澳台地区, 共得到 403 个观测值。被解释变量农户收入 ($kzpsr$) 取对数后均值为 10.201, 省域间收入存在一定差异。核心解释变量农旅融合指数 ($Score$) 均值为 0.165, 最小值 0.030、最大值 0.446, 标准差为 0.088, 表明我国各省份农旅融合发展水平分化明显, 区域发展不均衡。控制变量中, 城镇化率、人均受教育年限、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等变量均处于合理区间, 各变量未出现明显极端异常值, 数据分布良好, 能够开展后续实证回归。

表 2 描述性统计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分位数	中位数	分位数	最大值
kzpsr	403	10.201	0.363	9.289	9.923	10.199	10.453	11.128
Score	403	0.165	0.088	0.030	0.096	0.149	0.220	0.446
城镇化率	403	0.591	0.127	0.272	0.509	0.586	0.647	0.890
农民消费水平	403	9.465	0.583	8.291	9.014	9.446	9.901	10.840
人均受教育年限	403	9.214	1.098	5.300	8.721	9.210	9.621	12.665
经济发展水平	403	10.909	0.472	9.949	10.549	10.880	11.200	12.188
人口密度1	403	5.322	1.490	0.988	4.780	5.615	6.324	8.276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1	403	11.700	0.841	9.465	11.561	11.969	12.260	12.728

5.2 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列（1）未引入省份、年份固定效应，列（2）纳入省份-年份双向固定效应。加入双向固定效应后模型 R² 达到 0.9331，模型拟合程度显著提高。核心解释变量农旅融合（Score）在两列回归结果中均通过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系数显著为正。列（2）双向固定效应下系数为 1.1312，意味着农旅融合水平每提高 1 个单位，农户收入对数相应提升 1.1312 个单位，说明农旅融合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控制变量在控制双向固定效应后大多不再显著，反映省份个体特征与时间层面宏观因素是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因素。综上，农旅融合发展能够有效助推农户增收。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1) kzpsr	(2) kzpsr
Score	1.7792*** (4.14)	1.1312*** (3.36)
城镇化率	0.8763* (1.97)	-0.7641 (-1.69)
农民消费水平	-0.2857*** (-3.84)	-0.0691 (-0.64)
人均受教育年限	-0.0370 (-0.77)	0.0497 (1.52)
经济发展水平	0.3669*** (3.06)	-0.0585 (-0.52)
人口密度1	-0.0036 (-0.12)	0.0157 (0.07)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1	-0.1673*** (-3.44)	0.3090* (1.94)
常数项	10.4092*** (8.71)	7.6011*** (3.88)
年份	NO	YES
地区	NO	YES
N	403	403
R ²	0.3390	0.9331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下同。

5.3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变量 X

为规避农旅融合综合指数指标选取、数据处理引发的测量偏差，本文选取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数量取

对数作为代理变量重新回归，以此排除指标度量差异对实证结果的干扰。如表 4 所示，第 (1) 列不控制省份与年份固定效应，第 (2) 列纳入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两列中代理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更换农旅融合的衡量指标之后，农旅融合促进农户增收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定性与可信度。

表 4 替换变量 X

	(1) kzpsr	(2) kzpsr
nyxcly	0.1779*** (3.69)	0.0333*** (3.02)
城镇化率	0.2661 (0.55)	-0.5601 (-1.34)
农民消费水平	-0.2754* (-1.95)	-0.0720 (-0.59)
人均受教育年限	-0.0954 (-1.46)	0.0007 (0.02)
经济发展水平	0.5814*** (3.53)	-0.0271 (-0.20)
人口密度1	0.0173 (0.74)	0.1904 (0.78)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1	-0.1336*** (-3.56)	0.2318 (1.34)
_cons	8.0923*** (8.86)	7.6710*** (4.25)
年份	NO	YES
地区	NO	YES
N	403	403
r2_a	0.3408	0.9260

(2) 收入滞后一期

农旅融合与农户收入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问题，农户收入水平提升反过来也会助推当地农旅产业建设，由此带来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将被解释变量农户收入滞后一期进行回归估计，回归结果如下表 6 所示。表格第 (1) 列未设置省份、年份固定效应，第 (2) 列纳入省份和年份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否控制双向固定效应，核心解释变量 Score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双向固定效应条件下系数为 0.6331。在缓解双向因果内生性干扰之后，农旅融合促进农户增收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稳健可靠。

表 5 收入滞后一期

	(1) L.kzpsr	(2) L.kzpsr
Score	1.9923*** (4.47)	0.6331** (2.08)
城镇化率	0.7337* (1.78)	-0.3181 (-0.87)
农民消费水平	-0.2230** (-2.63)	-0.0946 (-0.68)
人均受教育年限	0.0061 (0.14)	0.0518 (1.62)

经济发展水平	0.3569*** (2.86)	-0.0471 (-0.30)
人口密度1	-0.0342 (-1.04)	0.1496 (0.72)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1	-0.1783*** (-3.56)	0.2153 (1.34)
常数项	9.8653*** (8.35)	7.9160*** (4.27)
年份	NO	YES
地区	NO	YES
N	372	372
R2	0.3899	0.9387

5.4 机制检验

(1) 产业结构升级

为检验产业结构升级是否为农旅融合影响农户收入的中介路径, 本文将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6, 模型均控制省份、年份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 农旅融合 Score 系数为 0.1088, 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农旅融合能够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 提升农林牧渔服务业占比, 促使传统农业向农旅服务业延伸转型。由此证实, 农旅融合可通过延伸农业产业链, 释放农村二三产业增值收益, 进而实现农户收入提升。

表 6 产业结构升级

	(1) 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2) 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Score	0.0713** (2.06)	0.1088*** (3.59)
城镇化率	-0.1265*** (-3.06)	-0.0734 (-1.37)
农民消费水平	0.0078 (1.07)	0.0027 (0.21)
人均受教育年限	0.0069 (1.51)	0.0063 (1.21)
经济发展水平	-0.0022 (-0.16)	-0.0045 (-0.29)
人口密度1	0.0025 (1.46)	0.0284 (0.98)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1	-0.0033 (-0.82)	-0.0014 (-0.12)
_cons	0.0182 (0.16)	-0.1013 (-0.51)
年份	YES	YES
地区	YES	YES
N	403	403
R2	0.2072	0.7964

(2) 土地流转率

本文以土地流转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开展回归检验, 结果如表 7 所示。其中第 (1) 列未控制省份、年份固定

效应，第 (2) 列纳入双向固定效应。控制双向固定效应后，农旅融合 Score 系数为 0.7276，通过 1% 水平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旅融合能够有效提升区域土地流转水平，乡村文旅项目扩大了土地要素市场需求，加速耕地流转。土地流转既可为农户带来租金收益，又释放农村劳动力参与农旅服务业获取工资收入，由此验证土地流转是农旅融合带动农户增收的中介传导路径。

表 7 土地流转率

	(1) 农业土地流转率	(2) 农业土地流转率
Score	0.3108* (1.70)	0.7276*** (3.80)
城镇化率	0.8083 (1.64)	-0.0278 (-0.09)
农民消费水平	-0.1091 (-1.46)	-0.1092 (-1.55)
人均受教育年限	-0.0543* (-1.70)	0.0195 (0.62)
经济发展水平	0.2489** (2.08)	-0.1643 (-1.58)
人口密度 ¹	0.0040 (0.30)	-0.1592 (-0.68)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¹	-0.0050 (-0.16)	-0.0819 (-0.75)
常数项	-1.3342* (-1.86)	4.6880*** (3.02)
年份	NO	YES
地区	NO	YES
N	403	403
R ²	0.5567	0.8720

5.5 调节效应

为考察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在农旅融合增收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本文构造农旅融合与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的交互项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8 第 (2) 列所示，模型控制省份-年份双向固定效应与全套控制变量。结果显示，交互项 Score $\times$ nchl_w 系数为 1.7804，在 5% 水平显著为正，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自身系数未显著。这表明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存在正向调节效应，随着乡村网络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旅融合带动农户增收的效应得到放大。

表 8 调节效应

	(1) kzpsr	(2) kzpsr
Score	0.5277* (1.83)	0.7212** (2.34)
Score $\times$ phjr	0.0032*** (2.99)	
Score $\times$ nchl _w		1.7804** (2.67)
phjr	0.0001 (0.43)	
nchl _w		-0.1466 (-0.55)

城镇化率	-0.7155*	-0.9792*
	(-1.89)	(-1.84)
农民消费水平	-0.0772	-0.0742
	(-0.65)	(-0.72)
人均受教育年限	0.0374	0.0465
	(1.37)	(1.56)
经济发展水平	0.0119	-0.0036
	(0.09)	(-0.03)
人口密度1	-0.1696	-0.3296**
	(-0.62)	(-2.11)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1	0.3775**	0.3867**
	(2.14)	(2.57)
_cons	7.2670***	8.1893***
	(3.75)	(4.87)
年份	YES	YES
地区	YES	YES
N	403	403
R2	0.9395	0.9365

5.6 异质性

(1) 财政支农力度异质性

为分析不同财政支农水平下农旅融合增收效应的差异，本文以财政支农力度中位数划分高低两组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9，两组均控制省份-年份双向固定效应与全部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财政支农较低组农旅融合 Score 系数为 0.4025，未显著；高支农组系数为 1.2032，在 1% 水平显著为正。表明农旅融合增收效果依赖财政配套支撑。财政投入充足可为文旅项目、基础设施与经营主体培育提供保障，释放富民效能；资金不足则会制约项目落地与业态发展，难以带动农户增收。因此强化财政支农保障，有助于充分发挥农旅融合的增收作用。

表 9 财政支农力度异质性

	(1) kzpsr 财政支农力度低	(2) kzpsr 财政支农力度高
Score	0.4025 (0.76)	1.2032*** (3.01)
城镇化率	-0.4985 (-1.03)	-1.0127 (-1.46)
农民消费水平	0.1790** (2.11)	-0.1144 (-0.95)
人均受教育年限	0.0282 (0.80)	0.0607 (0.98)
经济发展水平	-0.1263 (-0.95)	-0.1380 (-0.66)
人口密度1	0.5429 (1.04)	-0.0867 (-0.18)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1	-0.0647 (-0.60)	0.4989 (1.56)
常数项	7.2702***	6.9780**

	(2.99)	(2.62)
年份	YES	YES
地区	YES	YES
N	199	198
R2	0.9818	0.8908

(2) 对外开放程度异质性

为考察对外开放水平差异带来的农旅融合增收效果异质性，本文以对外开放程度中位数划分样本开展分组回归，如表 10，两组均控制省份-年份双向固定效应与全部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组农旅融合 Score 系数为 1.1673，在 5% 水平显著为正；较高组系数为 0.6304，并不显著。这说明农旅融合增收效应在对外开放偏低地区更强。对外开放较高地区的资本、劳动力倾向流向高收益外向型产业，弱化农旅产业带动能力；而对外开放较低地区要素外流有限，依托本土资源发展农旅融合可以有效促进农户增收，是该类地区增收的重要产业路径。

表10对外开放程度异质性

	(1) kzpsr 对外开放程度低	(2) kzpsr 对外开放程度高
Score	1.1673** (2.29)	0.6304 (1.18)
城镇化率	-2.1591*** (-4.05)	-0.1208 (-0.17)
农民消费水平	-0.0006 (-0.00)	0.0468 (0.44)
人均受教育年限	0.0860* (2.04)	0.0424 (1.09)
经济发展水平	-0.2697 (-1.71)	0.0099 (0.07)
人口密度 ¹	0.8889* (1.99)	-0.1972 (-0.61)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¹	0.1203 (0.72)	0.0443 (0.18)
_cons	7.6490*** (4.10)	9.9995*** (3.77)
年份	YES	YES
地区	YES	YES
N	201	199
r2_a	0.9534	0.9701

6. 结论和建议

本文基于 2011-2023 年全国 30 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探究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旅融合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旅融合能够显著提升农户收入，该结论经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存在正向调节效应，能够放大农旅融合的富民效果。机制检验发现，农旅融合可通过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土地流转水平间接促进农户增收。异质性分析显示，农旅融合增收效应在财政支农力度更高、对外开放程度偏低的地区更为突出。据此，应当因地制宜推进农旅融合发展，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发挥数字技术赋能作用；畅通产业升级与土地流转的增收传导渠道，健全农户利益共享机制。同时实施差异化区域政策，加大财政薄弱地区涉农资金投入；对外开放较高地区引导要素向本土农旅产业回流，充分释放农旅融合的增收潜力，助力乡村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 [1] 杨歌谣,周常春,杨光明.农业和旅游业产业融合与农村贫困减缓的关系分析[J].统计与决策,2020,36(05):81-86.
- [2] Hermans D. The encounter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a Catalan case.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1, 8(3): 462-479.
- [3] 钟漪萍,唐林仁,胡平波.农旅融合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机理与实证分析——以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20,(07):80-98.
- [4] 林茜.产业融合背景下农业旅游发展新模式[J].农业经济,2015,(09):61-62.
- [5] 柳荻,胡振通,柳金昊.休耕生态补偿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以地下水超采区为例[J].资源科学,2022,44(02):350-364.
- [6] 彭小辉,王宇.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J].南大商学评论,2021,(01):51-68.
- [7] 苏群,邢怀振.农村地区数字技术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J].科研管理,2025,46(03):170-180.
- [8] 黄祖辉,宋文豪,成威松,等.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了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经济地理,2022,42(5):213-222.
- [9] 沈洋,犹雨寒,周鹏飞.农旅融合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理与检验[J].西部经济理论论坛,2023,34(02):39-48+63.
- [10] 李宽,史磊,张弘.数字经济对农旅融合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26,42(02):264-275.
- [11] 杨海军,邹银.数字经济、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J].农村金融研究,2024,(02):58-69.
- [12] 戴永务,黄瑜萍,庄逸群,等.乡村数字经济赋能农旅融合发展的效应和机制[J].中国生态旅游,2025,15(02):262-277.
- [13] 周诗涛.农业与旅游业产业融合系统演化机制研究[J].农业经济,2022,(9):143-144.
- [14] 刘广宇,黎斌林,李新然.云南省农旅融合发展实证分析与模式构建——基于VAR模型的检验[J].生态经济,2020,36(6):135-141.
- [15] 杨利,李梦含,张名杰,等.数字经济赋能文旅融合的影响机制与门槛效应研究[J].统计与决策.2023,39(12): 29-34.
- [16] 许玉琴.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农文旅融合发展研究[J].农场经济管理,2024,(1):20-23.
- [17] 马永强,许玉燕,谢静欣,等.福建省农旅产业融合效应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三生”功能理论[J].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2023,40(3):716-727.
- [18] 朱志胜.农旅融合、要素配置与农业劳动生产率[J].管理学刊,2022,35(3):29-43.
- [19] 顾江寒,柴华奇,葛鹏飞,等.黄河流域省级区域农旅融合质量研究——基于DEA交叉效率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21,(12):97-103.
- [20] 祝振华,张红丽,李洁艳.收入增长、收入差距与农村减贫效应——基于CFPS农村家庭数据的实证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3,39(2):31-44.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on Farmers' Incom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Yang Lingli¹, Tian Li¹, Yao Chunmei¹

1.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Abstract: Agri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serves as a core path to broaden farmers' income sources and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rural areas, and digital economy acts as a critical enabling carrier to unlock its income-increasing potential. Based on the provincial-level panel data of China from 2011 to 2023,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for agri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 industrial correlation, social effect and integrated new-business forms, drawing on theories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digital economy. The study finds that agri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can significantly raise rural residents' per-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The penetration rate of rural internet exerts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which amplifies the income-boosting effect of agri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In terms of mechanism, agri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improves farmers' income by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r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creasing the level of land circulation. This paper adopts replacement of core measurement indicators and lagged dependent variable to carry out robustness tests to ensure the reliability of conclusions. Accordingl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rur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build benefit-sharing mechanisms for agriculture-tourism project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income-increasing effect of digitally-enabled agri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Agri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Farmers' Income

人工智能语境下未成年人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陈惠琳¹，张 浩¹，龙玉竹¹

(1.西华大学，四川 成都 610039)

摘 要：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嵌入未成年人日常生活的背景下，未成年人模式的实际保护效能面临考验。本文通过机制对比与 369 份用户反馈考察发现当前模式存在分龄管理缺位、外部监管乏力等多重困境，保护实效未达预期。2026 年 7 月施行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规制触角延伸至拟人化互动服务，但重心限于特定业态，通用型 AIGC 工具的未成年人模式仍缺乏细化标准。据此，应突破限制型保护逻辑，在完善法律体系、技术生态重构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构建与 AIGC 特性相适配的未成年人模式。

关键词：未成年人模式；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生成式人工智能

基金项目：四川省省级大学生 2025 年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创新训练项目“生成式人工智能语境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机制研究——基于青少年模式法律规制的实证考察”（项目编号：S202510623085）

DOI: doi.org/10.70693/202608292723

一、引言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刻重塑未成年人在互联网的学习、社交与娱乐图景。据第 5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5 年 12 月，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用户规模已达 2.49 亿，19 岁及以下用户占比 26.4%，在各年龄段居首^[1]。同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揭示，超七成未成年人用 AI 辅助完成作业，逾三成与 AI 聊天或用于娱乐^[2]。然而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辨别能力较弱。生成式 AI 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潜藏不良信息接触、诱发心理依赖等新型风险。国外已发生几起 AI 聊天机器人被指控教唆青少年自残等恶性事件，为我国敲响了警钟。

国家网信办自 2019 年起推行青少年模式，近年向未成年人模式转型，现成为 AIGC 领域等各类平台的标配功能；但其实效未达预期：用户信任度低、家长斥其形同虚设等现象在传统领域屡见不鲜^[3]。2026 年 7 月施行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并要求建立未成年人模式等机制。施行前夕，多家平台下线智能体功能，印证了未成年人模式在 AIGC 场景下存在实效困境。《办法》主要针对拟人化互动业态，通用型 AIGC 工具的未成年人模式仍缺乏细化的执行标准。

现有研究从多个维度进行了探讨，但多从局部环节切入：规制探讨偏重理念阐述，缺乏对现行模式实效的检验；实证研究聚焦传统平台，对 AIGC 业态的覆盖不够充分；对《办法》这一最新监管动态尚未形成系统回应。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未成年人模式在 AIGC 语境下的运行实效并提出相应优化路径，以期完善 AIGC 时代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机制提供数据参照与学理思考。

二、AIGC 语境下“未成年人模式”实效分析

（一）主流 AIGC 应用未成年人模式的实施现状

作者参考 QuestMobile《2025 年春季中国移动互联网报告》、七麦数据 2025 年 6 月应用下载量排行及《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5）》所涉 AI 应用等数据，兼顾市场占有率、用户活跃度与类型范畴，并纳入曾

作者简介：陈惠琳（2005—），女，法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民法学；
张 浩（2005—），男，法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行政法学；
龙玉竹（2005—），女，法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民法学。

因内容合规问题被监管部门约谈的应用以增强风险代表性^[4]，选取了 10 款应用作为分析样本^①，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规定，从静态设置与动态运行两个维度进行对比以考察未成年人模式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运行实效。

表 1 10 款应用在未成年人模式方面的设计差异

名称	模式触发方式	防护措施	设计逻辑
元宝、DeepSeek、天工、 千问、文心、Kimi	无	自动过滤有害信息，支持举报；对 自伤、违法活动等危险话题引导至 专业帮助渠道。	对话层实时拒绝，依 赖底层模型安全策 略。
豆包	需自行在设置中激活并设 密码。	严格过滤信息； 限制核心功能，仅保留拍题答疑等 正向服务。	降级为答疑助手，功 能牺牲换取安全。
筑梦岛	弹窗提示可跳过或在设置 页激活；需设独立密码， 无实名验证。	1. 每日限用 40 分钟，每 15 分钟 休息提醒 2. 单次充值≤50 元，月累计≤200 元。 3. 按 8 岁以下、9-15 岁、16-18 岁设置时长与内容。	防沉迷与分龄管控 相结合。
猫箱	首次弹窗确认年龄且不可 关闭；须实名认证并设长 期密码。	屏蔽成人向情节，关闭创作和评论 功能，仅保留系统特定科普性角色。	入口身份绑定，自动 干预。
星野	弹窗提示可跳过，自主申 报实名认证进入模式。	屏蔽敏感情节；关闭创作等社交功 能；部分版本有时间及消费限制。	以实名认证为基础， 综合内容屏蔽与功 能限制。

1、静态机制

(1) 模式设置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四十三条明确设置独立醒目的未成年人模式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定义务。如表 1 所示，仅四成应用设计独立模式入口，余六成单纯依赖后端模型过滤。该分化表明行业内对未成年人模式应以显性入口还是隐性算法为载体尚未形成共识。

(2) 防护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要求未成年人模式允许用户对每日上网时长进行总量限制并提出分龄推荐标准。各平台防护措施可归纳为三种策略，成本投入与保护效果相应递减。综合管控型以筑梦岛为典型，因强娱乐和付费属性而集成时间、消费及分龄管控等多重手段，合规最为全面。功能简化型以豆包为代表，开启后即关闭 AI 创作等功能，合规彻底但抑制了合理需求。内容拦截型涵盖所有未设独立模式的应用，依托对话层实时过滤，效果受限于算法识别精度，在时间、消费及分龄内容管理上均付之阙如，依赖用户自我约束。

2、动态运行

(1) 模式开启

^① 10 款应用包括：元宝、Deepseek、豆包、筑梦岛、星野、kimi、猫箱、文心、千问、天工，样本选择侧重类型覆盖而非完全随机抽样，结论主要反映上述产品的规律性特征。

未设独立模式者不存在“开启”操作，用户对保护机制几乎无感知。设有独立模式者开启路径也各有障碍：豆包需自行进入设置页；筑梦岛、星野弹窗引导但可跳过；仅猫箱采取强制弹窗并绑定实名认证，管控强度最高。既有研究指出开启环节被动化是传统领域未成年人模式的共性短板^[5]。在 AIGC 语境下，这一问题反而因部分平台取消独立模式而加剧。

(2) 模式退出

设有独立模式者多以密码验证作为退出条件，部分平台输入次数未设限，客观上降低了暴力解除的门槛。密码重置流程虽严却可被规避：猫箱、豆包、筑梦岛在用户忘记密码时要求通过申诉重置，一般需家长提供手持身份证照片等材料进行人工审核，验证门槛较高。然而游客模式登录或切换成年人账号亦可绕过限制。

(3) 设计逻辑

上述应用的设计逻辑可归为两种范式。未设置独立模式者属后端内容安全型，将保护窄化为“内容过滤”，法定功能覆盖面缺失；其余归于前端功能限制型，通过显性管控限制特定功能、使用时长等，保护效果依赖监护人的管理能力，且在分龄适配和用户体验上仍有改进空间。

(二) 未成年人用户使用反馈

为弥补供给侧机制分析在需求侧视角的不足，作者对成都市使用过生成式 AI 对话的未成年人进行了一轮小规模交流考察，系小范围现状摸底，目的是发现潜在问题，共获有效反馈记录 369 份，受访者集中于 12 至 18 岁。

1、深度使用与情感索取需求并存

未成年人对生成式 AI 的使用需求呈现工具性与情感性并存的特征，逾七成受访者将 AI 用于完成日常任务，而部分使用者的行为呈现从工具性向关系性延伸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未成年人向 AI 寻求情感慰藉的动因并非单纯猎奇心理，而是如家庭沟通、学校心理资源等现实支持体系失灵，过半数受访者表示因害怕被评判等顾虑而向 AI 倾诉，折射出其社交与情感需求在现实层面未获满足（见表 2）。

表 2 未成年人向生成式 AI 倾诉的原因

类型	人数	占比
AI 不会评判用户	179	48.51%
现实中缺乏合适的倾诉对象	198	53.66%
好奇心理驱动	217	58.81%
其他原因（如测试不同 AI 的差别、单纯用于娱乐）	64	17.34%

2、模式体验呈现限制与需求的错位

关闭诱因的分布揭示了保护机制与用户需求之间的错位，关闭或回避模式的主因是模式过度限制、正常使用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见表 3）。就外部监管而言，近四成反馈表明，监护人的监管止于口头提醒等柔性措施，仅三成表示监护人会主动开启模式。同时，过半数受访者表示明确知晓规避限制的方法并会主动使用，印证了现行模式在防绕过方面存在脆弱性。

表 3 关闭模式的诱因

原因	人数	占比
模式限制太严格，影响正常使用体验	245	66.40%
功能单调枯燥，缺乏个性化设计	217	58.81%
其他原因（如与监护人一同使用无需开启、单纯不感兴趣）	136	36.86%

3、法律与风险意识滞后

直接询问“是否了解相关法律”易诱发称许性回答，而将其嵌入具体情境更能反映未成年人对行为边界的判

断水平，故作者设置了一道要求受访者识别正确说法的情景化多选题，正确答案为 B 项及 D 项。一定比例受访者未能准确识其中有明确违法性的行为（见表 4）。对 AI 诱导自伤、低俗对话等风险事件的知晓程度亦不足，仅三成受访者了解相关事件。由此可见，当技术尝试触及法律或伦理红线时，部分未成年人缺乏清晰的判断标准。

表 4 法律情景判断情况

选项	人数	占比
A: 甲未经同意利用 AI 生成他人肖像的搞笑视频，不涉嫌违法	169	45.80%
B: 乙经同意获取他人照片，利用 AI 生成涉黄图像进行传播，此举违法。	255	69.11%
C: 某平台的 AI 模型与未成年人聊天时教唆自残，该平台无需担责。	142	38.48%
D: 某杂志社未经授权采集真人写真，利用 AI 修改成插画风格并刊登，此举违法。	185	50.14%

三、现行模式的困境

当前模式存在的弊病不能简单归因于个别平台执行偏差，而是既有治理思路与人工智能应用环境适配度低。

（一）防护机制漏洞与分龄体系建构迟滞

AIGC 语境下的未成年人模式始终遵循限制型保护逻辑，即通过身份识别、权限设置与家长赋能三个环节，将未成年人与网络风险进行物理隔离^[6]。此举在传统领域尚可奏效，但移植到内容动态生成、交互高度开放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环境便面临不适应性。现有模式沿袭了传统领域的固有缺陷：开启环节主要以主动操作为前提，呈现被动化特征；退出机制防绕开能力不足，管控密码机制易被设备借用等方式突破；身份验证依靠用户自主申报或算法画像，精确度有限。上述问题共同催生了规避现状，使模式在实际运行中趋于形式化。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概率模型实时构造内容，输出有不可预测性，用户可通过精心设计的提示词或迭代对话规避内容过滤，如使用隐喻等手法，印证了单纯依赖后端防护的内在局限。

更为突出的是，当前模式普遍欠缺分龄治理思维，功能供给呈现“重管控、轻匹配”的取向，有助于降低内容风险，却致使模式使用黏性减弱。分龄管理缺位实为诱发规避行为之症结所系，并使保护实践陷入过度干预与保护真空并存的矛盾现状。对心智发育与媒介素养已超越模式预设的未成年人而言，一刀切式管控无异于变相排斥，当使用需求在模式内无法获得适龄化探索余地时，主动绕开限制便成为具备合理性的行为反应。

（二）行业标准缺失与市场激励错位

各平台防护思路不统一表明行业明显缺乏统一标准，如未能针对 AI 业态类型设定分级要求，致使用户可从限制严格的平台无缝迁移至相对宽松者，保护效果被稀释。此外，商业利益与保护责任的内生矛盾持续存在。平台模型迭代依赖用户活跃度与数据积累，而未成年人模式恰会抑制这些指标。既有研究指出未成年人模式难以嵌入盈利机制，平台因而缺乏持续投入的激励^[7]。严格的模式设计会削弱产品吸引力，进而拖累整体数据规模，这驱使平台在设计和执行上留有余地。

（三）法律规制覆盖缺失与监管失衡

专门性规范存在覆盖空白与归责指引模糊。《办法》主要规制拟人化互动服务，而通用型 AI 工具的模式设计依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多为原则性表述的既有规范，未就 AIGC 场景下模式应包含的核心功能给出具体答案。制度供给的模糊使平台在合规选择上缺乏明确指引，进而采取低成本的举措。《民法典》构建了平台与用户的责任结构，而人工智能背景下裂变为模型开发者、技术服务提供者、应用运营方与用户的多主体交织的责任链条。当 AI 生成内容诱导未成年人自伤或实施违法行为时，责任归属于模型训练者、内容审核方还是应用运营方，现有规范未就各主体间责任边界作出清晰划分。归责的模糊状态为各方相互推诿预留了空间，最终使保护义务难以落实。

惩戒力度不足淡化平台改善意愿。既有监管实践对 AIGC 场景下模式失范的处罚仍属少数，并主要依赖专项整治等阶段性手段。模式失范对平台引发的主要后果是舆论风险，而非法律层面的实质性负担，由此形成了低成

本的违规生态。在此制度环境下，平台倾向于以形式合规替代实质保护，在合规边缘维持最低限度的投入，乃至回避未成年人模式的独立建设。

（四）协同联动失效与风险教育脱节

现行模式在 AIGC 语境下成效有限，还受制于家庭素养、学校教育、社会履责三重短板。

家庭端监管介入不足。既有研究证实，家庭关系越不理想，未成年人在网络交往中越易感到孤独，生成式 AI 凭借算法内嵌的情绪识别系统能在某种程度上填补家庭沟通、朋辈陪伴乃至专业心理辅导的空白，但其程式化交互缺乏真实情感联结，青少年易形成单向情感依赖，长期如此可能引发现实社交退缩与认知偏差^[8]。在此情形下，监护人的数字素养若未能并行跟进，便难以有效引导未成年人的 AI 使用行为。

未成年人对 AI 法律边界与新型风险认知模糊，成因或在于学校未将有关 AI 伦理、法律风险与心理健康教育系统嵌入课程体系，社会亦未形成有效的补充供给。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家庭、学校与平台三方缺乏系统联动。平台端未及时将用户行为反馈至家校，学校缺乏判断机制，家庭端的监管水平参差不齐，多重因素叠加使模式实效式微。

四、现行模式的优化进路

（一）健全法律体系，构建刚性约束框架

提升专门性立法的效力层级。现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数据来源和基础模型的规定过于原则，未能系统覆盖语料采集、审核及使用全过程；相关安全技术标准多属推荐性国家标准，法律强制力有限；《办法》作为部门规章，裁判适用时易产生效力争议。2026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作者建议推动制定《人工智能法》以建立统一框架。在此之前，可先行出台行政法规层级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未成年人模式管理条例》，推动既有框架在 AIGC 场景下实现细化落地，健全行业标准、压实企业自律责任。立法亦应避免简单禁止的倾向，《办法》中诱导沉迷、情感操纵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尚待厘清，难以准确区分正常互动与不当干预，亦或催生平台分体运营规避监管。事实上，智能体下架所引发的用户投诉及虚拟财产诉求验证相关措施未能根本回应陪伴需求，从长远看并不利于未成年人综合发展。

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服务者应向监护人展示信息来源、推荐逻辑与潜在风险，定期披露模式运行报告，涵盖功能改进、风险干预触发次数及第三方评估，以可见的治理成效换取用户信任。违反防沉迷或防依赖义务的，网信部门可依据情节给予暂停业务、罚款等处罚；贯彻“首违不罚”原则，辅以约谈、黑名单等柔性措施，健全举报平台^[9]。当 AI 生成内容诱导未成年人自伤或实施违法行为时，应在司法解释中明确各环节的责任边界：语料提供者承担源头审查义务，宜采用无过错责任；模型训练者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情形下担责；服务提供者应履行主动管控义务，重点监控高风险模型，而非仅适用“通知—删除”规则^[10]。对于未成年人使用诱导性提示词引发的侵权，应考虑前端算法偏差等因素，适用共同侵权与连带责任制度，由司法裁判合理分配各方责任^{[11][12]}。

（二）重建技术生态，算法调适与分龄体系精准赋能

平台应依法采集未成年人实名信息，并结合交互内容、使用记录等信息生成用户画像，以适龄设计为导向，依据不同年龄段的心智水平与发展需求，在模式的功能供给、视觉形态、交互风格上进行定向适配^[13]。参照《指南》等既有框架可建立三级体系：12 岁以下严格限制功能与时长，提供基础科普内容；12 至 15 岁强调引导，开放启发式交互；16 至 18 岁侧重赋能，增设风险话题即时警示，依托行为轨迹与兴趣数据动态拓展功能。分龄体系的要义在于以差异化的权限梯度替代功能阉割，提升模式设计的吸引力与适配性，从源头消解规避动机。此外，可引入成就徽章等游戏化激励机制，化解模式内容枯燥、功能受限引发的抵触情绪，也有助于平台协调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张力，并建设支持监护人弹性调整权限的智能模块，增强模式的可接受性。

生成式 AI 输出的不可预测性使后端过滤存在天然突破点，单纯提升识别精度难以弥补内生局限。平台应在前端交互层动态监测用户与 AI 的交互模式，具体而言应以对话时长、话题偏移频次、情绪表达强度、深夜使用频率等行为指标为监测维度，当交互模式偏离正常范围时，如捕捉到用户反复倾诉负面情绪、呈现自伤倾向等即

自动触发干预：轻度风险推送心理援助资源，高危信号启动与专业机构的转介通道。

（三）构建协同教育防线，织密保护网络

强化监护人职责，是确保模式有效触发的首道关口。应促使监护人了解 AI 技术基础逻辑与潜在隐患以建立陪伴式引导的能力基础，而非单纯诉诸技术被动拦截。学校作为连结支点，应将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嵌入课程体系，借助跨学科实践与 AI 技术革新教学形态，指导学生理解信息甄别、算法逻辑及新型风险。社会主体应整合区域内公共及科研资源，以讲座、工作坊等形式提供补充性支持。为实现多元主体在保护网络的有效联动，未成年人模式应增设功能使用统计与实时监控模块，并建立信息互通机制：平台一旦监测到异常行为，即向家校推送预警，形成保护闭环。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法律、技术、教育等方面的协同发力。唯有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才能真正为下一代构筑清朗、安全且富有成长性的数字家园。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5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 2026-02-05. <https://www.cnnic.cn/n4/2026/0304/c88-11549.html>
- [2] 孙宏艳. 调查发现超六成受访中小学生用过 AI[N/OL]. 中国青年报, 2026-03-26(08)[2026-07-27]. <http://sc.people.com.cn/n2/2026/0326/c345515-41534430.html>
- [3] 季为民, 杨子函. 推动 AI 精准陪伴赋能, 促进未成年人互联网智能化成长[M]. 范承志, 季为民, 沈杰, 叶俊, 杨斌艳, 季琳. 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 (2025).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5 年: 1-16.
- [4] 孙文轩, 冯仪. AI 聊天软件调查: 擦边内容尺度大 青少年模式仍存漏洞[N/OL]. 央广网. (2025-06-13)[2026-07-27]. https://edu.cnr.cn/dj/20250613/t20250613_527208239.shtml
- [5] 谭凯月. 网络青少年模式的运行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 20 款 APP 青少年模式实证研究[J].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24, 26(1): 51-56.
- [6] 刘晓春. 从限制到调控: 人工智能背景下未成年人保护模式的转型与重塑[J]. 财经法学, 2025, (5): 115-130.
- [7] 方增泉, 吴京京, 杨舒逸. 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发展定位、存在问题与创新路径[J]. 社会治理, 2026, (2): 68-83.
- [8] 叶俊, 时瑞泽, 曹雨欣. AI 技术对未成年人信息获取及认知的影响[M]. 范承志, 季为民, 沈杰, 叶俊, 杨斌艳, 季琳. 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 (2025).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5 年: 107-123.
- [9] 李岩, 康铭. 生成式人工智能防沉迷立法问题研究[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2): 112-126.
- [10] 王利明. 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的法律应对[J]. 中国应用法学, 2023, (5): 27-38.
- [11] 李昕梦. 生成式人工智能版权注意义务的界定[J]. 数字法治, 2025, (5): 156-169.
- [12] 邓建鹏. 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谁负责? [EB/OL]. (2025-09-30). https://cssn.cn/skgz/bwyc/202509/t20250930_5917880.shtml
- [13] 叶俊, 张译文. 未成年人使用人工智能设备研究[M]. 范承志, 季为民, 沈杰, 叶俊, 杨斌艳, 季琳. 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 (2025).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5 年: 17-36.

Dilemmas and Solutions of Minor Mode in the Contex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en Huilin¹, Zhang Hao¹, Long Yuzhu¹

1.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Abstract: As generative AI becomes deeply embedded in minors' daily lives, the protective efficacy of existing minor modes is increasingly questioned. Through regulatory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369 user feedback entries, this study identifies deficiencies such as absent age-differentiated management and weak external oversight, resulting in suboptimal protection. The July 2026 Interim Measures on AI Anthropomorphic Interactive Services extend oversight to anthropomorphic services but remain confined to specific formats, leaving general-purpose AIGC tools without detailed minor-mode standards. The article argues for transcending restriction-based protection and advancing coordinated efforts—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legal refinement and technological ecosystem restructuring—to develop a minor mode compatible with generative AI.

Keywords: minor mode; minor online protectio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数字赋能视角下乡村肉牛产业创新发展路径探索

周宏雪¹, 杨宇涵¹, 张广玉¹

(1. 哈尔滨金融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摘要: 产业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基石。针对传统肉牛养殖粗放经营、疫病防控薄弱、产业链附加值偏低等突出问题, 本文以智慧养牛模式为切入点, 剖析乡村肉牛产业现代化转型面临的技术应用滞后、产业组织松散、复合型人才短缺、生态约束趋紧四重困境。研究发现, 破解上述困境需以数字技术贯通养殖、加工、销售全链条; 据此提出“数字赋能+产业筑基+人才培育+生态共生”四位一体发展路径, 协同推进产业组织再造、本土人才培育与绿色循环发展, 进而促进农民增收、保障食品安全、带动乡村就业, 以期同类地区特色种养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关键词: 数字赋能; 肉牛产业; 全产业链; 乡村振兴

基金项目: 哈尔滨金融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智能养牛·兴乡富民路”(X202410245024)

DOI: doi.org/10.70693/202608303032

农业是立国之本, 强国之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部署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经济深度融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进一步要求“加快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 推进智慧农业发展”。在此背景下, 推动传统畜牧养殖数字化改造、激发乡村特色养殖创新活力, 已成为现阶段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课题。

现阶段, 我国乡村肉牛养殖仍以散户经验型养殖为主, 多依靠人工巡查与经验判断组织生产, 数字技术尚未大范围渗透基层养殖场景, 其困境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作为乡村重点富民产业, 肉牛养殖兼具经济价值与乡村振兴带动价值, 但长期受传统模式束缚, 亟待以数字化转型寻求突破。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聚焦数字技术的产业赋能效应, 已有研究指出,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正推动传统种养业由“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 通过赋能农业生产全过程实现降本增效与转型升级^[1]; 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共享数据资源与培育复合型人才, 为智慧农业纵深发展提供关键支撑^[2], 并能显著促进畜牧业新质生产力提升^[3]。在畜牧领域, 人工智能从投入端、组织端与产出端赋能产业数字化转型^[4], 数智金融亦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优化要素配置为畜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5]。聚焦肉牛产业, 已有研究从数字科技支撑^[6]、新质生产力赋能^[7]与产业韧性提升^[8]等维度展开探索。整体来看, 现有研究揭示了数字赋能的内在逻辑, 但针对肉牛单一品类、贯通全产业链的系统性研究仍相对有限。

国内外肉牛产业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国际层面, 欧盟依托共同农业政策, 构建了“基础设施普惠化+数字服务生态化”的数字乡村治理框架, 物联网、精准饲喂与个体识别等技术已在欧美牧场管理中广泛落地^[9]; 德国“城乡等值化”、日本“一村一品”、韩国“新村运动”等乡村发展模式虽各有侧重, 但均遵循“制度保障—主体培育—技术嵌入”的共性逻辑。国内层面, “户繁企育”“嘎查+公司+专业合作社+农牧户”等经营模式, 以及县域农牧企业延伸加工产业链、带动农牧民增收的实践, 共同印证了组织化经营与产业链延伸是肉牛产业增值的关键。但现有实践多呈散点分布, 尚未形成以数字技术贯通全产业链的系统性发展框架。

作者简介: 周宏雪 (2001-) 女, 本科, 研究方向: 智慧养牛, 兴乡助农;
张广玉 (2001-) 男, 本科, 研究方向: 环境监测和自动调控;
杨宇涵 (2002-) 女, 本科, 研究方向: 数字化管理与降本增效。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与实践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仍存在三点不足:其一,研究对象上,数字赋能农业的研究多聚焦畜牧产业整体或宏观层面,针对肉牛产业全产业链的专项研究偏少;其二,分析层次上,多数成果或停留于宏观路径倡导,或局限于单一技术环节,对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散户养殖场景的微观机理剖析不足,尤其缺乏对“数字赋能—产业筑基—人才培育—生态共生”协同机制的整体建构;其三,价值取向上,对数字赋能带动小农户融入产业链、形成富民增收闭环的关注仍显薄弱。基于上述缺口,本文以智慧养牛模式为切入点,将技术赋能、产业组织、人才培育与生态治理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探讨数字赋能乡村肉牛产业创新发展的可行路径。

二、智慧养牛模式的价值分析与现实困境

(一) 智慧养牛模式的多元价值

1. 经济价值

肉牛养殖是北方乡村极具发展潜力的特色富民产业,能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带动农户就地就业。成熟的肉牛产业链可联动饲料供应、良种繁育、生鲜销售、物流运输等上下游环节,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点。智慧养牛推动养殖由“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精准饲喂与智能预警可降低饲料损耗、减少疫病损失,提升产业整体效益。

2. 创新价值

依托物联网传感设备、智能电子耳标与云端管理平台,智慧养牛构建起“硬件感知—数据采集—智能分析—远程管控”的技术体系,全天候监测牛只活动、体温及牛舍环境,建立覆盖繁育、防疫、饲喂、出栏的全生命周期数字档案,推动乡村肉牛养殖走向规范化、品牌化。

3. 社会与生态价值

在社会层面,智慧养殖降低繁重体力投入,改变养殖业“苦、累、风险高”的刻板印象,有助于吸引青年返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在生态层面,精准饲喂与智能环境调控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二) 现实困境与深层制约

1. 数字技术应用滞后、数据价值释放不足

乡村肉牛养殖数字化渗透率整体偏低,偏远牧区的网络、电力等数字基础设施覆盖不足,物联网设备购置与运维成本高,中小养殖户难以负担^[10]。即便部分养殖场引入智能耳标、环境传感器等设备,应用也多停留在数据采集层面,繁育、养殖、加工、流通各环节数据互不连通,形成“数据孤岛”;海量生长数据缺乏统一标准与分析工具,决策分析功能未被激活,难以转化为饲喂优化、疫病防控等经营决策,制约了数字赋能效应的释放。

2. 产业组织松散、规模与品牌竞争力不足

乡村肉牛养殖以散户分散经营为主,缺乏龙头带动,上游良种供给、中游养殖防疫、下游加工销售各环节衔接松散,缺少统一良种供给、统一防疫指导、统一品牌打造与统一销售平台,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养殖户资金普遍有限,无力独自承担智能设备投入、冷链建设与品牌推广成本,销售渠道单一,主要依赖本地集市或中间商收购;优质牛肉缺乏差异化定位与区域公共品牌支撑,局限于本地流通,溢价能力与抗风险能力偏低。

3. 复合型人才短缺、主体数字素养不足

乡村数字化人才短板突出,既懂肉牛养殖技术、又熟练操作数字化系统的复合型本土人才严重匮乏,外来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现有养殖户以中老年群体为主,数字素养不足,对智能设备与平台操作存在畏难情绪,习惯于传统经验养殖;基层农技服务与数字化培训供给不足,智慧养殖技术落地困难,人才断层与数字鸿沟并存,制约了智慧养殖的推广普及。

4. 绿色转型压力、生态约束趋紧

传统养殖粪污处理粗放、资源化利用率低,未经有效处理的粪污易造成水体与土壤面源污染;规模化程度低使污染治理难以集中开展,环保设施投入与运行成本高,散户缺乏治污动力。随着“双碳”目标与农业绿色发

展要求的推进，养殖环保约束日趋严格，粗放模式既面临政策合规压力，也制约了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可持续推进。

三、“四位一体”创新发展路径

（一）数字赋能：构建智慧养殖技术底座

数字赋能的释放价值主要体现在连接、数据、算法、平台四个层面：以连接打通养殖、加工、销售各环节的信息壁垒，降低交易成本；以数据为要素优化饲喂与繁育决策；以算法支撑疫病预警、精准饲喂等精细化管理；以平台整合分散资源、创新商业模式。据此，可依托物联网智慧养殖云平台构建技术底座^[11]，借助电子耳标、环境传感器建立肉牛生长模型，实现疫病预警与精准饲喂；养殖户可通过手机远程监管，并开发线上溯源二维码供消费者扫码查看养殖全过程，还可衍生“云养牛”体验项目，扩大品牌影响力。

（二）产业筑基：推动分散经营向集群发展转型

以数字化技术整合分散养殖户资源，推动散户组建合作社，实现统一引进良种、统一疫病防控、统一设备运维、统一打造区域品牌。引导养殖户以土地、劳动力、资金入股，建立利益联结与共享机制。打通直播电商、社区团购、商超、餐饮等销售渠道，发展牛肉深加工，开发牛肉干等特色产品；推动“养殖+加工+文旅”融合，延伸产业链条，实现由单一养殖向三产融合转变^[12]。

（三）人才培育：打造本土化数字养殖人才梯队

联动地方农业院校、农技推广中心，面向返乡青年、本地养殖户开展常态化培训，兼顾养殖专业知识与智慧平台操作，构建分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打造“田间课堂+线上教程+现场实操”三位一体模式，持续培育本土化数字养殖人才，破解乡村农业人才断层难题。

（四）生态共生：实现绿色循环可持续发展

以数字化管控实现绿色循环养殖：依靠智能环境监测动态调控牛舍环境，依托精准饲喂减少饲料浪费，配套粪污资源化利用方案，推动粪污还田、种养结合，构建低污染、可循环、可持续的生态养殖模式^[13]，助力乡村生态振兴。

四、预期成效与推广价值

（一）经济效益：促进农民增收与就业扩容

智慧养牛通过精准饲喂降低饲料损耗、智能预警减少疫病损失，直接降低养殖成本；同时依托牛肉深加工与品牌运营提高附加值，拓展直播电商、社区团购等多元渠道。在养殖、加工、销售等环节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减少农村劳动力外流，带动农村妇女、脱贫人口等群体就地就业，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二）社会效益：保障食品安全与履行社会责任

通过建立牛肉质量追溯体系，消费者扫码即可了解肉牛来源、养殖过程与加工环节，实现从牧场到餐桌全程可追溯，严格落实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同时，项目盈利部分用于支持乡村基础设施、教育与环保等公益事业，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展帮扶项目，助力困难农户依托养牛增收致富，实现产业发展与社会公益的良性互动。

（三）示范价值：形成可复制推广的乡村产业范式

智慧养牛模式将数字技术、合作社组织、品牌运营与生态循环有机结合，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范式，能够带动周边乡村共同发展，形成“以点带面”的乡村振兴示范效应。

结语

乡村振兴，产业为先；产业升级，科技为翼。本文梳理了数字赋能与肉牛产业相关研究进展，剖析了乡村

肉牛产业现代化转型面临的技术应用滞后、产业组织松散、复合型人才短缺、生态约束趋紧四重困境,提出“数字赋能+产业筑基+人才培育+生态共生”四位一体发展路径,为同类地区特色种养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思路借鉴。未来,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持续落地,政府、合作社、企业、高校多方协同发力,智慧养牛模式有望持续完善,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参考文献:

- [1] DE AVILA F R, BARBOSA J L V. Smart environments in digital agricultur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taxonomy[J]. *Computers and Electronics in Agriculture*, 2025, 236: 110393.
- [2] 黄鲁燕,刘东勋.数字乡村建设驱动智慧农业发展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J].*农业经济*,2026,(7):18-20.
- [3] 贾云飞,曹宇航,何泽军,等.数字乡村建设对畜牧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J/OL].*中国农机化学报*,1-12[2026-08-30].<https://link.cnki.net/urlid/32.1837.S.20260821.1407.008>.
- [4] 史美康,鲍欣然,叶舜.人工智能赋能畜牧产业数字化转型:理论机制与创新路径[J].*饲料研究*,2026,49(11):196-200.
- [5] 谭学想,刘学文.数智金融与畜牧业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及赋能路径[J].*家畜生态学报*,2025,46(12):120-128.
- [6] 梁小军.数字科技促进宁夏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对策及建议[J].*宁夏农林科技*,2024,65(5):94-96.
- [7] 罗应萍,徐磊.新质生产力赋能贵州山地肉牛产业数字化发展[J].*中国农村科技*,2025,(11):43-45.
- [8] 王晓丽.数字赋能乡村产业韧性提升调研报告——以肉牛产业为例[J].*畜牧产业*,2025,(6):50-56.
- [9] 吴彬,张兵兵.欧盟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世界农业*,2026,(6):36-48.
- [10] DHIR S B, MISHRA G. Digital agriculture mission: unlocking opportunities and overcoming challenges for farmers using smartphones[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Ethics in Society*, 2026, 24(3): 380-399.
- [11] 孙亚琼,李喬,丁宝隆,等.六盘山肉牛大数据平台赋能固原市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与思考[J].*畜牧业环境*,2026,(17):307-309.
- [12] 杜慧.乡村振兴背景下生态畜牧业赋能三产融合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中国饲料*,2025,(24):165-168.
- [13] 温楚淇,曹智清,严雪晴.数字乡村背景下云南生态畜牧业发展路径研究[J].*畜牧产业*,2026,(1):29-37.

Exploration of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 for Rural Beef Cattle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Empowerment

Zhou Hongxue¹, Yang Yuhan¹, Zhang Guangyu¹

1. Harbin Finance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China

Abstract: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core foundation for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raditional beef cattle farming generally faces problems such as extensive operation, weak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low value-added industrial chains.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s modern agriculture and offers a new pathway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livestock industry. Based on the strategic requiremen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rogress in the dig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smart agriculture. Taking the smart cattle farming model as a case study, it analyzes the fourfold dilemmas fa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rural beef cattle industry, namely lagging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loos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shortage of compound talents, and tightening ecological constraints, and proposes a "four-in-one" development path of "digital empowerment + industrial foundation building + talent cultivation + ecological symbiosis." It further envisions the expected outcomes in promoting farmers' income growth, ensuring food safety, and expanding rural employment,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ral beef cattle industry.

Keywords: digital empowerment; beef cattle industry; full industrial chain; rural revitalization

“十五五”时期制度型开放：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的路径与机制

李若瑜¹

(1.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北京 100044)

摘要：自贸试验区作为对外开放“试验田”，承载着先行先试、制度创新、风险测试、经验复制等重要功能，是“十五五”时期破解开放进程难题、推进全域制度型开放的核心载体。“十四五”时期，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实现全域拓展，积累了大量制度创新成果，为制度型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立足“十五五”时期全球经贸规则重构与国内新发展格局的双重时代语境，应从空间布局、产业融合、规则创新三重维度系统构建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的实施路径，进一步搭建区内区外双向辐射、开放安全统筹平衡的长效协同保障机制。为我国依托自贸试验区全域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构建高标准开放型经济体制提供坚实基础。

关键词：“十五五”规划；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制度型开放；高标准经贸规则

DOI: doi.org/10.70693/202608047761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国对外开放实现了从政策性开放到制度性开放、从局部试点开放到全域系统性开放的阶段演进，开放的深度、广度、维度持续拓展。进入新发展阶段，传统以关税减免、税收优惠等为核心举措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已难以适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代需求，边境后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深层次制度改革成为对外开放的关键所在。制度型开放不仅是对当前国际贸易规则深度重塑的回应，更是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的有力抓手，对全面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系具有重要意义。^[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验”，为“十五五”时期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事实上，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是扩大高水平开放的重要环节，因为这不仅是深化国内体制机制改革的关键举措，也是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具体表现，自贸试验区提升同时兼具对内和对外两种属性，是连接内外循环的重要渠道。^[2]

二、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型开放中的角色定位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战略定位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3]“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本质是推动自贸试验区功能的系统性跃迁，摆脱传统开放形式的功能局限，确立其在制度型开放中的核心枢纽地位。结合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需求，自贸试验区已形成制度创新高地、高标准规则压力测试场及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枢纽三重定位，构成其引领制度型开放的主要功能体系。

（一）从政策优惠洼地转向制度创新高地

我国自贸试验区的发展演进先后经历了政策红利驱动、单点制度创新、系统制度集成三个发展阶段，“十四五”时期已迈入制度创新高地建设的全新阶段。在初期探索阶段，自贸试验区建设关键依靠税收减免、关税优惠、外资准入放宽、贸易通关便利化等差异化政策性红利的倾斜形成了区域开放洼地，快速吸引了相关要素集聚并激活了区域开放活力，属于典型的要素流动与政策驱动型开放模式。这一时期制度创新依附于政策落地，缺乏系统性、自主性的制度供给能力，政策红利具有临时性、区域性和难复制等特征。

“十四五”时期，自贸试验区开放模式实现根本性转型，核心逻辑从政策赋能、单点改革转向制度赋能、系统集成。这一时期自贸试验区开始以系统性、首创性制度改革为核心，聚焦市场准入、监管体系、营商环境、要

作者简介：李若瑜(2002—)，男，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国际投资与贸易。

通讯作者：李若瑜

素配置等全领域制度重构,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现代制度供给体系。如我国出台的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版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加快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有效提升了跨境服务、境外消费等非商业存在服务贸易方式的开放水平。^[4]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来看,这一跃迁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转型,通过先行先试探索适配高质量发展的制度范式,形成可复制推广、可制度化的改革成果,为全国层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制度样本。

相较于传统政策洼地模式,制度创新高地具备三大核心特征。一是制度供给的系统性,即突破单一领域和环节的碎片化改革,实现投资、贸易、金融、数据、科创、监管等多领域制度的协同集成。二是改革成果的可复制性,摒弃区域专属政策红利,以通用性、标准化的制度创新成果赋能全国市场化改革。三是发展动能的内生性,自贸试验区依托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形成了可持续的内生开放动能,成为全国深化市场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开放的策源地。

(二) 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压力测试场

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在于融入、引领全球高标准经贸规则体系,而高标准规则的落地涉及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变革,存在一定的改革与适配风险。2025年7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试点措施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对自贸试验区推行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试点措施、责任分工与推广方位都做出了具体部署,明确了服务业扩大开放、货物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等领域的开放方案。如表1所示,自贸试验区依靠其局部试点、风险可控等制度优势,承担了规则测试、风险测评、经验积累等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必要前置环节,已成为我国对接CPTPP、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关键压力试验场所。

表1 自贸试验区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试点措施复制推广任务

序号	试点措施	具体内容	推广范围
1	加快服务贸易扩大开放	深化金融开放创新,开展跨境资金、数字人民币等试点,优化电子支付、金融数据跨境管理,规范电信相关服务	自贸试验区至全国
2	提升货物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优化货物通关、物流、知识产权监管,放宽酒类标签、商用密码进口限制,推进标准共建、单一窗口跨境数据互通与区港一体化	自贸试验区至全国
3	率先实施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	探索便利化数据跨境流动,推广电子商事凭证,开展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汽车试点,完善数字经济相关治理与竞争监管。	自贸试验区至全国
4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强化商标、地理标志、专利、农用化学品数据保护,严厉打击商标侵权,完善商业秘密保护,健全知识产权维权机制。	全国
5	推进政府采购领域改革	规范政府采购适用范围、招标时限与竞争规则,推进采购信息公开与电子化,畅通供应商维权渠道,扶持中小企业参与。	自贸试验区至全国
6	推动相关“边境后”管理制度改革	完善劳动权益保障机制,推进氢能、储能绿色发展,规范国企治理,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产业国际合作。	自贸试验区至全国
7	加强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建立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强化金融防控与跨境监管合作,落实安全审查,创新监管方式,构建协同高效综合监管体系。	全国

当前,全球高标准经贸规则体系更加聚焦边境后的深层次制度改革,形成了知识产权保护、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绿色低碳贸易、劳工权益保护、政府采购透明化等全新规则体系,这无疑对我国现有制度体系提出了系统性挑战。自贸试验区的核心任务,就是针对相关高标准规则开展精细化的先行先试,通过局部试点探索适配的规则规制。从试验价值来看,自贸试验区的压力测试具有多重价值。一方面,通过有限区域和有限范围的试点改革,规避了全国层面对接国际规则可能引发的制度冲突与产业冲击。另一方面,通过试点调试与磨合,积累起了适配中国实际与全球标准的改革经验,为我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参与高标准经贸协定谈判和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了坚实的实践支撑。如自贸试验区在跨境数据流动制度创新、市场准入开放机制优化、营商环境改善的实践,在提升了贸易自由化水平的同时,也为我国制度型开放下与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的衔接奠定了基础。^[5]

(三) 缩小区域差距、优化区域开放格局的关键枢纽

长期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呈现显著的空间非均衡特征,沿海地区依托区位产业及政策优势形成了较高水平的开放格局,而内陆、沿边地区的开放载体较为稀缺,“东强西弱、海强陆弱”的开放区位失衡问题制约了我国全域开放体系建设。“十五五”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的重要内涵,就是发挥自贸试验区的枢纽功能,弥合区域开放

差距,构建沿海、内陆、沿边协同联动开放的空间布局。

从区域功能定位来看,沿海自贸试验区主要聚焦于对标国际高水平标准,打造全球高端要素、高端产业集聚的开放高地,承担了引领全国制度型开放的核心任务。内陆自贸试验区则立足腹地资源优势,关注产制融合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打造内陆地区开放的核心枢纽。沿边自贸试验区依靠其跨境区位的特殊优势,聚焦于跨境经贸合作与产业链构建等,打造面向周边国家的开放合作门户。从战略价值来看,自贸试验区的区域枢纽功能能够有效破解内陆沿边地区的开放短板,推动中西部与东北沿边等地区深度融入开放型经济体系,实现从开放大后方向开放主前沿的转型。全域自贸试验区网络的构建,推动了要素资源、制度红利与产业动能跨区域高效流动,优化全国区域开放布局,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高水平开放新格局。

三、“十五五”时期自贸试验区发展的现实困境

“十四五”时期是自贸试验区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我国已分批次设立22个自贸试验区,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的开放格局。但从制度型开放的高标准和系统性要求来看,当前自贸试验区建设在空间布局、产制匹配和制度创新等方面仍存在深层次困境,制约了其创新效能的释放,这也是“十五五”时期继续坚持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推动自贸试验区提质升级的必然要求。

(一) 布局碎片化,规模集聚与全域辐射效应不足

空间布局是自贸试验区发挥产业集聚和区域赋能功能的基础载体。当前,我国自贸试验区空间布局碎片化问题突出,“面广点多、小而分散”的特点制约了自贸试验区的规模经济效益与全域开放效能的释放。

第一,单区载体规模偏小,片区布局较为分散。我国多数自贸试验区采用“一区多片”的布局模式,片区之间地理空间相聚较远,资源配置分散化,难以形成协同发展的整体格局。自贸试验区“小而散”的特点在其设立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长期内狭小的空间制约了其长远发展潜力,难以充分发挥应有的辐射带动效能。^[6]碎片化布局导致自贸试验区无法承载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布局,高端要素集聚受限,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难以形成。同时,分散化的片区布局大幅提升了行政管理与监管运维的成本,导致制度创新资源分散重复投入,利用效率偏低。

第二,区域覆盖存在断层,开放载体供给缺失。当前我国西部大量地区具备一定产业基础、区位优势与开放潜力,但仍尚未设立自贸试验区。这种布局断层导致西部、中部及东北部分地区缺乏高水平对外开放试点平台,难以承接高标准制度型开放的试点任务,不仅制约了全域制度型开放的推进,也会导致区域制度创新能力差距持续拉大,影响区域开放发展、区域平衡发展与区域重大战略的实施。

第三,缺少片区联动机制,尚未形成高效的联动开放网络。现有自贸试验区多为单个独立试点,片区之间缺乏常态化的联动协同机制,沿海、内陆、沿边自贸试验区间相对独立,其制度经验、监管标准等资源难以跨区域共享互通,制度红利仅局限于单个片区内部,难以向外辐射扩散。此外,自贸试验区与国内国际的联动发展机制尚不健全,通过自贸试验区联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和扩大中国对内对外开放的通道还不畅通,^[7]尚未形成链式开放格局,从而制约了自贸试验区引领全域制度型开放核心功能的发挥。

(二) 产制相对脱节,制度创新与产业发展不匹配

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的内在逻辑在于,制度创新能够赋能产业升级,产业升级亦倒逼制度创新。因此,只有实现制度供给与产业需求的动态匹配,才能真正释放制度创新赋能实体经济的效能。但当前自贸试验区存在产制适配不足、区内外割裂等问题,制度创新与产业发展不协调,成为制约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短板。

第一,试点创新同质化频繁,缺乏产业适配能力。^[8]当前,多数自贸试验区的试点创新存在明显的复制和简单照搬问题,如内陆自贸试验区照搬沿海自贸试验区贸易通关、外资准入等通用型便利举措,未能结合本地资源禀赋和实际产业结构开展差异化制度创新。东部地区自贸试验区聚焦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的改革举措,与内陆工业制造、绿色产业、现代农业的发展需求适配度较低,导致部分制度创新虽成果丰富,但难以破解阻碍本地产业发展的恶性循环,制度供给与产业需求产生错配。

第二,制度创新的结构矛盾逐步显现。从创新形态来看,具备全局牵引作用的集成性、系统性制度创新供给较少,而聚焦单一环节、单个事项的碎片化创新增多;从协同维度来看,能够统筹多方、跨领域联动的整体性创新较为稀缺,局限于特定环节、单一部门推进的局部性创新供给较多。^[9]此外,创新举措之间协调联动能力不足,政策叠加效应未能得到充分释放,制约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能级的跃升。

第三,前沿领域制度创新滞后于高端产业发展需求。随着各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诸如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金融等新兴产业蓬勃崛起,产生了大量新型制度缺口。企业发展是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重要关注领域,但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却存在创新成果与市场需求错位的问题——自贸试验区制度主

体的供给缺乏对市场主体需求的精准把握。^[10]这难以适配高端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国际化发展需求,未形成制度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倒逼制度创新的良性循环,制约了自贸试验区的高质量发展与制度型开放的进一步深化。

(三) 被动对标国际规则, 风险防控体系不完善

经过多轮试点改革,我国自贸试验区在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比,试验区在规则对接、制度改革、开放适配层面仍存在深层次问题,不仅制约了自贸试验区自身开放能级的提升,也在很大程度上阻滞了我国制度型开放的纵深推进。

第一, 对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对接仍存在表层化、局部化与碎片化等问题, 实质性制度适配不足。当前多数自贸试验区的规则对标停留在流程优化、手续简化、政策公示等表层合规层面, 并未触及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跨境数据流动政府采购等核心规则的机制内核。不少改革举措局限于在现有政策框架内进行微调, 而未形成突破性和引领性的制度变革, 且既有创新成果中程序性与技术性成果远超政策性与体制性成果。^[11]在数字贸易、跨境数据流动等前沿领域, 试点改革普遍呈现碎片化特征, 数据跨境分级分类管理、数据产权界定、跨境数据监管互认等核心制度尚未根本性突破, 与 DEPA 中数字贸易高标准规则仍存在显著差距。

第二, 自贸试验区规则对接改革存在明显的“被动适配、跟随模仿”特征, 自主制度创新与规则塑造能力较弱。当前我国自贸试验区的规则试点整体呈现被动对标多、主动创新少的特征, 缺乏立足中国发展阶段、产业特色的自主规则设计能力。欧美等发达国家主导的高标准经贸规则, 本质是基于自身产业优势、制度优势形成的规则体系, 高度适配其高端服务、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的发展格局, 与我国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新兴产业迭代且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基本国情存在适配矛盾。从对标逻辑来看, 部分地区将规则对接简单等同于“政策对标”和“条款复刻”, 忽视了当地制度体系与产业结构的本土适配性, 从而出现改革偏差。

第三, 对接的风险防控体系滞后于开放试点节奏, 造成“开放不敢深”的改革难题。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涉及数据、金融、外资等多个敏感领域, 科学审慎的风险防控体系是深化规则试点的前提。当前多数自贸试验区的风险监管模式仍以传统事后监管和静态监管为主, 针对数据流动、绿色贸易、离岸金融、跨境竞争等新型开放场景的动态监测和风险预警制度尚未完善。诸如差异化监管、容错纠错等新型治理工具应用不充分, 风险识别精准度不足。风险防控体系的滞后, 使制度创新的供给方与需求方主体普遍存在改革顾虑, 在规避开放风险的刺激下刻意收缩试点范围或减小改革力度, 最终导致高标准规则试点难以突破, 制约了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的提质升级。

三、“十五五”时期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的实施路径

“十五五”时期, 自贸试验区的职能内涵进一步深化, 需担当起孵化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任, 驱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促进数据要素高效流转与配置、赋能产业链韧性跃升, 并推进开放域治理体系现代化。^[12]这一时期, 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的核心逻辑是通过系统性、全方位、深层次的提质升级, 破解空间、产业与制度核心制约, 构建布局优化、产制兼容、规则创新协同的系统路径, 实现自贸试验区从政策适配到全域赋能、从复制跟跑到自主创新的全面转型, 全面激活自贸试验区引领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效能。

(一) 分类布局, 构建全域链式开放体系

空间布局的优化是释放自贸试验区规模效应与辐射效应的前提。“十五五”时期, 应以分类布局、链式联动为核心, 完善全国自贸试验区的空间布局体系, 打造陆海统筹、东西联动、全域协同的制度型开放空间载体。

一是实施分层级精准扩容, 完善区域开放载体。针对当前自贸试验区区域覆盖断层问题, 优先在具备产业基础、区位优势与战略价值的省份新设自贸试验区, 填补当地开放载体空白, 优化全国自贸试验区全域布局。同时, 对现有布局分散和规模偏小的自贸试验区实施适度的扩区整合, 形成整体发展的空间格局, 提升自贸试验区载体规模, 使其能支撑完整产业链、创新链布局, 充分释放规模集聚效应。

二是推行差异化布局, 构建三位一体空间体系。制度型开放的定制化特点, 决定了各自自贸试验区的战略定位、试验任务等都不相同, 是非标准化的制度措施。^[13]因此, 应立足我国各区域资源禀赋与发展定位, 摒弃同质化布局模式, 构建沿海对标型、内陆产业型、沿边跨境协作型三类自贸试验区差异化发展体系。沿海自贸试验区可聚焦全球高端要素与产业开放, 以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开展首创性制度创新为核心, 打造全国制度型开放标杆。内陆自贸试验区可立足当地产业优势, 以产制融合、产业升级为主, 打造绿色产业、科创转化的制度赋能平台。沿边自贸试验区则可依靠其跨境区位优势, 以跨境贸易投资、跨境产业链合作为核心, 打造面向周边的跨境开放合作枢纽。立足地方比较优势探索首创性差异化制度创新, 有利于因地制宜发挥自贸试验区政策创新效应。

^[14]

三是打造链式通道, 形成全域开放网络。依托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东北沿边通道等构建沿海、内

陆、沿边、沿江四种自贸试验区联动廊道,打通陆海开放、沿边开放的空间通道。研究表明,自贸试验区在城市经济韧性提升过程中具有显著的“头雁”效应,正向辐射半径可达350千米左右,且这溢出过程与城市间实际交易关联紧密相关。^[15]因此,建立跨区域自贸试验区常态化联动机制,实现片区资源共享、经验互通、监管互认,打破区域行政壁垒与空间割裂,推动不同自贸试验区的制度红利和要素资源能够跨区域自由流动,形成链式联动、全域覆盖的高水平开放网络,彻底破解空间碎片化困境。

(二) 供需适配,深化自贸试验区与产业链融合发展

产制融合是破解制度与产业不协调,夯实制度型开放中实体经济根基的关键路径。“十五五”时期需构建产业需求导向的制度创新机制,推动制度供给与产业发展动态适配、深度融合,依托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能力,赋能产业链高端化、国际化升级,实现制度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协同共进。

第一,建立产业链需求导向的常态化制度创新机制。应彻底扭转“制度先行、产业后配”的被动创新模式,构建产业需求梳理、定制制度创新的闭环发展机制。各自贸试验区应常态化开展对本地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调研,精准梳理产业发展升级中的制度堵点和监管难点,围绕产业实际需求推出定制化、差异化的制度创新举措。通过产制深度融合,实现制度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倒逼制度迭代的良性循环,夯实制度型开放的实体经济基础。

第二,立足区域定位,分类赋能特色产业体系。依靠三类不同自贸试验区布局,精准匹配当地产业发展方向,构建特色产制融合模式。沿海对标型自贸试验区重点聚焦数字贸易、跨境金融、高端服务、科创服务等现代高端产业,围绕数字要素流动、服务贸易开放、金融创新试点等领域开展先行先试,推进服务业领域开放的扩大升级。内陆自贸试验区应深耕先进制造、绿色低碳、新材料、现代农业等实体产业,聚焦通关便利化、绿色贸易规制、产业要素集聚等领域改革,助力内陆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沿边跨境协作型自贸试验区应重点发展跨境加工贸易、跨境物流、跨境文旅等特色产业,创新跨境监管、边境通关等合作制度,构建完善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第三,打通区内区外产业传导通道,释放全域开放红利。针对区内区外空间割裂问题,应继续推行自贸试验区联动建设,以自贸试验区为、联动创新区和其他对外开放合作平台为基础,构建合理的产业传导体系。如在自贸试验区之间可以构建立体开放的跨区域分工体系,将制度创新嵌入产业链条并在区域内外构建产业矩阵,形成区域经济增长极,打破自贸试验区的政策边界限制,^[16]推动创新制度红利能够准确覆盖全域产业链条。

(三) 自主攻坚,实现制度体系完善升级

规则创新是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内核,也是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的关键任务。“十五五”时期,自贸试验区的规则创新需摆脱被动跟随和简单复制的传统模式,实现从对接、适配到创新、输出的跃升,通过存量优化、增量攻坚等方式,构建出既适配中国国情,又对接全球标准的制度话语体系。

一是推进存量规则深入优化,形成标准制度供给体系。系统梳理“十四五”时期自贸试验区在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商事制度改革、外资监管等领域的成熟创新成果,对同类制度和关联政策进行系统整合与标准定型,形成覆盖贸易、投资、营商环境、市场监管等领域的系统性制度集合。通过制度集成优化,将碎片化的试点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制度体系,为全国自贸试验区及各地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改革提供制度样本,夯实制度型开放的存量根基。

二是完善新兴领域规则试点,开展高标准压力测试。聚焦全球规则博弈前沿与我国产业升级关键领域,依托自贸试验区开展突破性规则试点。赋予自贸试验区在跨境数据流动、知识产权保护、数字贸易规制、绿色贸易、政府采购、劳工环境标准等领域更多制度创新权限,助力自贸试验区进行更多“首创式”创新,首创性的关键在于“先做一步”,而在于能否围绕国家未来较长时间内的竞争优势培育和识别具有前瞻性、牵引性与外溢性的制度议题,并通过试验性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供给。^[17]应针对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业态,探索适配我国产业发展实际的监管规则与开放标准,破解新兴领域存在的制度空白、规则滞后等问题,补齐制度型开放的增量短板。

三是强化自主规则输出,提升国际规则话语权。国际自贸试验区实践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五个方面:一制定综合而连贯的战略规划、打造营商环境并提供创新的激励机制、吸引头部企业投资、吸引关联产业与培育繁荣社区。^[18]因此,要托自贸试验区试点实践,系统总结出适配中国国情与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兼顾安全与发展的成熟制度经验,将地方试点创新成果上升为国家制度规则与行业标准,进一步增强我国参与全球经贸规则谈判与国际标准制定的能力。推动我国从被动对标国际规则向主动参与并引领全球经贸规则的方向转型,提升我国在国际经贸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实现高水平开放的层级跃升。

四、自贸试验区引领制度型开放的协同保障机制

立足“十五五”制度型开放的系统性、全域性、安全性等要求，需构建区内区外双向辐射、开放安全统筹两大长效协同机制，解决制度红利辐射不足、开放风险管控薄弱的关键问题，形成“制度赋能、安全可控”的较更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一）区内与区外双向辐射机制

制度型开放的核心目标是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实现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从而赋能全国高质量发展。因此，制度型开放不会局限于自贸试验区的单个试点。构建区内区外双向联动的辐射机制，就是要加快各试点优秀成果的复制推广，破除区域联动壁垒，实现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从单个试点向“全域赋能”的转化，最大化释放制度创新红利。

第一，构建“自贸试验区—其他开放合作平台—全省全域”的梯度推广机制。建立标准化、常态化的制度创新成果筛选、评估、落地与迭代体系，对自贸试验区试点成熟、成效显著的制度创新举措，可进一步简化复制推广审批流程，优先在其他开放合作平台开展推广试点，经过二次调试优化后进一步向全省、全国推广。要区分通用制度与特色制度，通用型便利化、市场化改革举措适合全域统一推广，而特色产业适配制度则需要因地制宜，不能简单照抄照搬，从而实现制度创新成果精准高效扩散，构建梯度升级、分层赋能的制度传播体系。

第二，搭建跨区域自贸试验区协同联动机制。建立全国自贸试验区常态化资源共享、监管互认与政策协同等机制。推动沿海、内陆、沿边、沿江自贸试验区打破行政区域壁垒，共享制度创新经验、开放合作平台并互通产业资源信息、统一监管服务标准。通过跨区域协同，缩小东西部、沿海与沿边开放制度差距，破解区域开放失衡问题，推动全国自贸试验区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的发展格局，助力全域制度型开放均衡推进。

第三，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联动机制。通过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打破内外贸体制壁垒，推动自贸试验区跨境贸易规则、监管模式与标准体系向国内市场延伸，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通通道。依托自贸试验区探索的市场化、国际化的先进制度，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等体制机制障碍，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深层次改革的协同并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二）开放与安全统筹平衡机制

在新的复杂外部环境下，制度型开放必然伴随新风险，如数据跨境流动、金融市场开放、产业链国际化布局等改革措施都会对国家经济安全、数据安全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出全新挑战。“十五五”时期推进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必须坚持开放与安全并重，构建全方位、全链条的开放安全统筹机制，实现释放活力与安全底线的有机统一。

第一，建立分类审慎监管机制。针对不同风险层级的开放领域实施差异化的审慎监管模式。如在数字贸易、跨境数据流动、外资并购等高风险领域，应划定试点边界，限定其试验或准入范围并进行动态实时监管，保障在可控范围内开展制度创新。在传统货物贸易和一般服务业等低风险领域，可以进一步放宽监管限制，最大化释放开放活力。同时，建立分层级企业信用监管体系，依据信用等级实施分类监管，做到既“放得开”又“管得住”。

第二，构建系统性风险防控体系。主要聚焦跨境资本流动、跨境数据传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关键领域，搭建智能化、动态化的监测预警平台。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对跨境要素流动、市场波动、产业发展隐患进行实时监测与风险研判，建立从识别到预警再到处置的全流程防控手段。针对开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制度适配、产业冲击等突发风险，制定专项处置预案，确保各类风险能够在早期被发现化解，筑牢制度型开放的安全底线。

第三，完善改革容错与配套法律法规体制。制度型开放属于深层次改革创新，需要一定的试错空间。为充分激发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活力，需建立标准化改革容错清单，明确创新试错与违规边界，对符合改革方向的试错行为予以容错，打消地方与市场主体的创新顾虑。应加快在出台国家层面的自贸试验区立法，明晰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和片区在自贸试验区发展过程中的权责关系，确定自贸试验区的法律地位和开放权限。^[19]同时，配套建立严格的问责机制，对突破安全底线、具有重大隐患的行为进行问责。通过容错与问责机制双向平衡，在充分释放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的动能的同时守住开放安全底线，实现开放活力与安全动力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 [1] 肖宇,夏杰长.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重点领域与推进路径[J].新视野,2025,(1):18-27.
- [2] 赵蓓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中国自贸试验区体制机制创新[J].世界经济研究,2025,(4):3-9+134.
- [3] 钱学锋.以制度型开放引领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22):77-89.

- [4] 李大伟.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动能塑造——“十五五”开放合作模式创新与全球治理变革考察[J].开放导报,2026,(1):19-27.
- [5] 李星瑶,王晓玲.制度型开放背景下中国自贸试验区对接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研究[J].理论月刊,2026,(6):85-96.
- [6] 李秋然,刘帅.“十五五”时期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的对策[J].广西社会科学,2026,(2):140-146.
- [7] 张森.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差别化探索:现实困境与提升策略[J].理论月刊,2025,(6):63-71+157.
- [8] 邓富华,倪铭杰,姜玉梅.新发展格局下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的现实约束、演进逻辑与政策取向[J].国际贸易,2024,(9):41-50.
- [9] 裴长洪,倪江飞.我国制度型开放与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实践创新[J].国际贸易问题,2024,(3):1-14.
- [10] 钱学锋,高婉.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特征、问题及对策[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3):103-124.
- [11] 钱学锋,高婉.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特征、问题及对策[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3):103-124.
- [12] 符正平,江英.从“单点突破”到“系统集成”:自贸试验区首创性、集成式探索的逻辑重构与实践进路[J].经济学家,2026,(5):56-65.
- [13] 崔卫杰.制度型开放的特点及推进策略[J].开放导报,2020,(2):36-43.
- [14] 诸竹君,施逸帆,刘乐易.赋能型自主开放与中国式创新——基于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J].金融研究,2026,(3):75-94.
- [15] 肖兴志,王振宇,章立.制度型开放与经济韧性:来自渐进式自贸试验区设立的证据[J].财贸经济,2025,46(2):5-20.
- [16] 张永旺,赵敏娟.制度型开放背景下自贸试验区赋能“双循环”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湖南社会科学,2026,(1):102-109.
- [17] 符正平,江英.从“单点突破”到“系统集成”:自贸试验区首创性、集成式探索的逻辑重构与实践进路[J].经济学家,2026,(5):56-65.
- [18] 廖佳,黄建忠.国际自贸试验区新实践、新规则与我国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J].国际贸易,2024,(6):45-53.
- [19] 桑百川,王殿杰.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效、路径与发展思路[J].国际贸易,2023,(9):3-12.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Pathways and Mechanisms for Upgrading Pilot Free Trade Zones

Li Ruoyu¹

1.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eaching and Research, Beijing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School, Beijing, China

Abstract: As the "testing ground" for opening-up, pilot free trade zones (FTZs) undertake critical functions including pilot trial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risk testing, and experience replication. They serve as the core vehicle for breaking through opening-up bottlenecks and advancing nationwide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ina's FTZs achieved nationwide expansion and accumulated substantial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Against the dual context of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 restructuring and the new domestic development paradigm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is paper proposes a systematic upgrading strategy for FTZs along three dimensions—spatial layout,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rule innovation—and further establishes a long-term collaborative safeguard mechanism that enables two-way radiation between zones and non-zones while balancing openness with security. This provide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advancing high-level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nationwide and building a high-standard open economic system through FTZs.

Keywords: 15th Five-Year Plan; FTZ upgrading strategy;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high-standard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城市老公园的可持续更新路径：杏林湖公园景观改造实践

焦子芮¹

(1.黑龙江大学 艺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在城市建设发展中,“可持续”理念被提出,“可持续性”的概念通过设计、规划、改造、维护等多个方面展现出来,它既是一种发展理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在公园的规划设计中,可持续设计理念的运用让我们们在满足功能要求的前提下,通过生态技术手段有效地控制水的污染、土地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保证公园景观的可持续性发展。本研究通过佳木斯杏林湖公园的可持续设计案例,可持续设计在公园景观中的运用。

关键词: 可持续设计; 城市公园; 景观更新; 生态修复; 杏林湖公园; 雨水利用

DOI: doi.org/10.70693/202608057126

城市快速扩张背景下,水土资源损耗、绿地生态退化等问题日益凸显,可持续设计成为统筹城市生态、人居休闲、长效运维的核心手段。水作为万物生命本源,是城市滨水空间景观营造的核心基底,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提出“水为万物之源”,水体既支撑人类生产生活基础需求,也承载居民精神疗愈与情感寄托。佳木斯市素有“华夏东极”的地域标识,地处黑龙江省东部,是国内赫哲族主要聚居地,民族文化底蕴深厚;城市曾为解放战争时期合江省首府,孕育并传承抗联精神与北大荒精神,兼具北疆寒地生态底色与开放发展活力。^[1]

杏林湖公园坐落于佳木斯市向阳区西南片区,是区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城市生态公园,总用地 24.3 hm²,水域面积 15.4 hm²,规划采用“一湖两带”空间结构,北至杏林湖北岸、南抵前进路、西接向阳路,深度嵌入城市建成区。项目是佳木斯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推进全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工程,承担区域生态修复、城市风貌美化、居民文化游憩多重职能。公园建成后可补齐城区绿地生态短板、优化人居环境品质、塑造城市特色景观风貌,对佳木斯中心城区有机更新与国土空间优化具备重要现实价值。本文以更新改造为设计主线,依托可持续设计理论,开展杏林湖公园全维度景观规划与改造研究。

1 项目概况与设计基础

1.1 课题研究背景

粗放式城市建设持续加剧生态破坏,生物栖息地缩减、水土污染、资源低效利用等问题频发,直接威胁人居环境健康与区域生态平衡。可持续设计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目标,强调场地资源循环利用、原生基底低干扰改造,是摆脱城市绿地生态困境的有效路径。本次设计以更新改造为主题,充分保留场地原有地形、植被、水系基底,依托生态修复、雨洪管控、本土植物营造等可持续技术,整合场地景观要素,平衡生态保育、居民休闲、长效运维三重目标,实现杏林湖公园存量空间生态活化。

1.2 场地现状与资源基底

杏林湖公园周边分布密集居住小区、中小学与医疗机构,服务人群覆盖全年龄段市民。场地原生植被包含垂柳、杨树、樟子松等乔木,紫叶李、连翘、山杏等灌木,搭配银杏、枫树落叶树种与冬青、龙柏常绿苗木,寒地适生植物资源丰富,但原有场地存在功能分区混乱、雨水直排、水岸生态破碎、本土植物应用不足等短板,生态稳定性较差。^[4]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1.3.1 研究目的

作者简介: 焦子芮(200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与公共艺术设计。

立足寒地城市气候与场地基底,以生态优先、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准则,重构杏林湖公园空间布局;搭建集雨净水、生态修复、资源循环一体化景观体系;分区设置适配全年龄段的游憩空间,平衡生态保护与市民使用需求;提炼适配北方滨水公园的可持续景观营造方法。^[5]

1.3.2 研究意义

理论层面,丰富寒地城市滨水公园可持续设计实践案例,完善北方雨水花园、生态水岸、本土植物群落的应用体系;实践层面,修复杏林湖退化水生态,提升区域生物多样性,完善城市公共休闲空间,为同类存量城市公园更新改造提供可落地的设计范式。^[6]

2 总体设计构思

2.1 设计目标

(1) 生态目标:依托本土耐寒植物构建稳定复层植物群落,搭配雨水花园、生态缓冲带实现雨水蓄渗净化,削减面源污染,修复湖泊水生态系统;^[3] (2) 功能目标:划分儿童游乐、青年休闲、老年康养、户外综合活动等分区,满足全年龄段居民游憩、健身、社交、观赏需求; (3) 长效运维目标:优先选用低养护、本土化景观材料与植物,降低后期养护成本,实现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协同统一。

2.2 核心理念

可持续设计统筹环境、社会、经济三大维度,追求人与自然、城市与绿地长效协调。本项目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底层支撑,以水系为景观脉络,弱化人工硬质干预,因地制宜利用场地原有地形水系;融合赫哲民族文化、北大荒红色地域文脉,打造兼具生态韧性、人文特色、游憩价值的寒地滨水公园,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三位一体。^[2]

2.3 场地功能布局

结合周边居住、文教、医疗用地分布与人群活动特征,采用曲线式滨水空间布局,细分多元功能板块:儿童活动区配置趣味游乐设施;青年休闲区设置滨水观景平台与花艺景观;康养健身区布置休闲步道、棋牌交流空间;阳光草坪区承载野餐、户外展览、集体晨练等综合活动。整体遵循生态导向、以人为本、因地制宜三大原则,实现功能分区清晰、人流流线互不干扰。^[6]

3 景观结构与专项设计

3.1 整体景观结构

项目整合场地资源,形成一轴一带三区整体景观格局,划分六大特色功能片区:主入口景观区、生态岛屿区、康复景观区、运动健身区、日光草坪区、儿童游乐区,由环湖慢行步道串联各节点。针对原有场地规划缺陷,从四方面优化提升:重新梳理功能分区,覆盖全年龄段使用需求;大量运用本土耐寒植物,降低建设与养护成本,凸显北疆地域风貌;采用生态透水铺装,协调人、景观与水环境关系;优化全园交通流线,提升各景观节点可达性与使用效率。

3.2 分区专项设计

(1) 生态岛屿区:配套雨水花园与开放式滨水缓冲带,构建近自然水岸植被群落,发挥水体净化、生物栖息功能,营造沉浸式自然疗愈空间; (2) 日光草坪区:改造微地形构建阶梯式集雨空间,通过绿地、道路、水系联动完成雨水吸纳、渗透、净化,实现场地水资源内部循环; (3) 康复景观区:打造疗养型特色花带,布置休憩廊架、棋牌互动设施,依托植物嗅觉、视觉景观实现身心舒缓; (4) 运动健身、儿童游乐、入口景观区配套轻量化可持续景观设施,兼顾实用性与生态低干扰。

3.3 水系与结构设计

全园以“水”为核心脉络,以“绿”为生态基底,构建亲水、低耗、和谐共生的滨水园林格局。^[4]六大功能分区均贯彻可持续设计逻辑,弱化硬质驳岸,采用生态石笼、水生植物缓冲带替代硬化堤岸,强化水土保持与水体自净能力。^[2]

3.4 交通组织规划

园区道路分两级路网实现人车分流：一级主路连通园区主次入口，保障应急通行；二级慢行步道环湖串联各景观节点，仅供行人通行，规避人车混杂安全隐患。项目分两期落地实施，一期完成道路系统、基础景观与配套设施搭建；二期优化功能分区，完善生态循环系统，统筹场地资源利用，同步释放生态与综合社会效益。

3.5 景观元素设计

方案以曲线形态为统一设计语言，贯穿整体平面布局、环湖步道、滨水台地、景观长廊等构筑物，贴合水体流动的自然韵律，弱化硬质人工边界，增强场地灵动性，使市民在自然绿地中获得舒适、松弛的游憩体验。植物配置坚持乔灌木复层混种，选用垂柳、杨树、白蜡等本土耐寒树种为主基调，搭配常绿、彩叶植物丰富季相变化，最大化发挥植被滞尘、降温、净化水体的生态服务功能。

4 结语

本文以佳木斯杏林湖公园为实践对象，以可持续设计为核心指导，结合寒地场地水文、植被、人文基底，从生态水系、植物群落、空间布局、交通系统、景观元素多维度完成景观更新设计，构建集生态保育、公共游憩、地域文化展示于一体的复合型城市公园。^[1]方案创新融合景观空间与人的感官情绪体验，从地域历史、红色文脉、自然美学、生态科学多维度统筹场地设计，打造具有温度、辨识度与生态韧性的北疆城市绿地。本次实践可为北方寒地存量滨水公园可持续更新、雨水资源化利用、本土生态景观营造提供可借鉴的设计思路与实施路径。^[2]

参考文献：

- [1] 刘好,王琳.认知发展理论视角下佳木斯市杏林湖公园自然教育景观改造设计[J].农业与技术,2026,46(5):175-178.
- [2] 张少伟,庞依扬.低碳视角下的城市公园绿地景观设计研究[J].美与时代(城市版),2025,(12):80-82.
- [3] 王怡璇.基于“双碳”政策下的城市公园改造设计——以鄂尔多斯市伊克昭公园为例[D].内蒙古农业大学,2025.
- [4] 刘阳阳.“城市双修”理念下的综合性公园更新改造研究：以禹州市夏禹公园为例[D].河南农业大学,2022.
- [5] 刘可欣.基于可持续理念的滨水旧工业区景观更新设计研究——以上海杨浦滨江公园为例[J].园林,2020,(8):74-80.
- [6] 周成玲.城市旧公园改造设计研究[D].南京林业大学,2008.

Sustainable Renewal Pathways for Urban Old Parks: The Landscape Renovation Practice of Xinglin Lake Park

Jiao zirui¹

1.School of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China

Abstract: In urba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ility' has been proposed. The idea of 'sustainability' is reflected through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design, planning, renovation, and maintenance. It is not only a development concept but also a way of life. In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parks, the application of sustainable design concepts allows us to effectively control issues such as water pollution, land resource wast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through ecological technologies while meeting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ensur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ark landscapes. This study, through the case of sustainable design in Jiamusi Xinglin Lake Park, briefly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sustainable design in park landscapes.

Keywords: Sustainable Design; Urban Parks; Landscape Renewal; Ecological Restoration; Xinglin Lake Park; Rainwater Utilization

数字普惠金融对长江中下游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田丽¹, 杨伶俐¹, 姚春美¹, 袁一君¹

(1.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401331)

摘要: 数字普惠金融是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支撑, 长江中下游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核心路径是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长江中下游7个省市地级市2011-2023年的面板数据, 研究发现: 数字化普惠金融在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等方面都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能够显著提升区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从作用机制上看, 通过推动农业技术创新, 扩大农业规模经营, 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机制已经显现; 通过异质性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的赋能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表现得更加突出。据此, 应完善农村数字金融配套设施, 推行差异化涉农金融服务, 释放数字金融惠农效能, 助力长江中下游农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数字普惠金融; 农业全要素生产效率; 长江中下游;

DOI: doi.org/10.70693/202608071226

一、引言

在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 我国农业发展从单纯追求产量转向提质增效, 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成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长江中下游地区水土条件优越, 农业根基扎实, 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与农产品供应基地, 在全国农业布局中占据关键地位。但区域农业发展仍存在明显短板: 小农分散经营模式普遍, 土地细碎化问题突出, 传统粗放生产方式难以搭建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农业体系, 农业生产效率提升速度受限。

与此同时, 传统农村金融体系长期存在供给短板, 金融资源大量集中于城市, 涉农贷款门槛高、流程烦琐、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广大农户、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长期面临资金约束, 无力引进先进农机、流转连片耕地、开展农业技术研发, 资金短缺持续制约区域农业效率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利用互联网与大数据相关的技术, 将金融服务所能触及的范围向外拓宽, 这一服务具有贷款门槛低、业务办理速度快、服务人群覆盖面广等特点, 农业经营主体产生的各类资金需求都能精准对接, 农村经营主体借钱难、贷款难、贷款农业产业也可以获得全新的资金支持, 以便完成升级改造。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生产效率的关联, 目前已有文献进行探讨, 但尚有研究空白: 大部分研究选取的是针对长江中下游地级市专项实证较少的全国省级面板资料; 现有成果大多只是对单一传导路径的检验, 没有对农业技术创新和规模经营的双重机制进行同步考察, 也缺乏分层异质性的基于市场层面的分析。因此, 利用2011年至2023年长江中下游七个省市的地级市面板数据, 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总体影响、传导机制以及市场化差异性。丰富对粮食主产区数字金融支农的研究, 为地方优化数字惠农金融政策和推进区域农业现代化提供实证依据。

二、文献综述

数字普惠金融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重构传统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打破物理网点、地

作者简介: 田丽(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

杨伶俐(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

姚春美(1997—),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

袁一君(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

通讯作者: 田丽

域条件的限制,以低门槛、低成本、广覆盖为核心特征,面向农户、家庭农场、涉农企业等经营主体提供信贷、保险、支付结算等多元化金融服务。郭峰等(2020)编制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是目前国内应用最为广泛的测度工具^[1]。国际层面 Tok 等(2022)指出金融科技虽拓宽金融普惠边界,但城乡、阶层数字鸿沟问题依旧客观存在^[2],Sinha(2024)基于印度数字支付发展经验,证实数字化金融服务能够快速下沉乡村市场,但低收入群体金融获得感提升有限^[3]。唐建军等(2022)从要素流动与技术扩散视角出发,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农业技术扩散,加快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收敛^[4]。胡宗义等(2025)基于广义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创业、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5]。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农业生产效率的核心指标,指在各类生产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林青宁等(2023)系统梳理其演化脉络,提出该指标经历了索洛余值、内生增长到绿色包容的发展阶段^[6]。OECD(2022)发布权威指南,提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代表以更少投入换取更多产出的能力,包含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改善两大内核^[7]。海外学者 Sheng(2025)依托 18 个 OECD 国家长面板数据,证实技术进步是农业效率提升核心驱动力,但技术偏向性会拉大区域生产效率差距^[8]。Tekiner-Mogulkoc(2022)对土耳其区域农业数据测算后,同样验证技术变革是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因素^[9]。李伟等(2024)证实农业技术扩散可显著拉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10]。吴国松等(2021)则发现土地、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会显著抑制农业生产效率提升^[11]。长江中下游作为核心粮食产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能够直观反映区域农业现代化发展成色,是评判农业提质增效的核心依据。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学界形成了差异化研究结论。张启文等(2023)基于面板数据证实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且使用深度的促进作用最强^[12]。但 Liu 等(2021)持相反观点,认为数字普惠金融会拉大非农与农业效率差距,降低农户务农积极性^[13]。机制层面,任健华等(2022)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农业资本深化赋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14],唐勇等(2023)验证农村人力资本发挥门槛约束作用^[15]。赵锦春(2024)结合跨国面板数据佐证,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依靠农业科技创新、资本深化双重路径提升农业生产效率^[16]。赵丹玉等(2023)提出数字普惠金融可依托数字乡村建设间接改善农业生产效率^[17]。由此可见,现有文献针对二者的作用效果、传导路径尚未形成统一结论,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究。

目前相关研究仍存在明显不足:现有文献多选取全国省级样本,针对长江中下游七省市地级市的专项研究较少;多数研究仅单一检验某一条传导路径,未综合考察农业技术创新、规模经营多重机制;同时缺少基于市场化水平的分层异质性分析。基于此,本文依托 2011—2023 年长江中下游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总体效应、三维度差异、传导路径与市场化水平异质性,丰富粮食主产区数字金融支农的实证研究,为区域完善数字惠农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3.1 数字普惠金融对长江中下游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

传统农村金融体系存在服务覆盖不足、信贷门槛偏高的现实短板,广大农户和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长久以来都会受到资金借贷方面的限制,无法充足购置农机、流转连片耕地、配套节水灌溉等生产资料,要素投入不足直接抑制农业产出效率提升^[18]。数字普惠金融依托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搭建线上金融服务渠道,简化涉农贷款审批流程、压缩线下交易成本,有效缓解农业生产阶段的流动性约束,为土地、劳动力、农资等基础要素合理配置提供稳定资金支撑^[19]。同时,数字化征信系统可以实现差异化的信贷投放,将金融资源更多地倾斜到拉长区域农业产业链、减少要素错配现象的农产品加工等高附加值行业和特色种养行业;以一扶一控的双向机制,共同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效率,直接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0]。对粗放型经营主体适度收紧授信额度,倒逼农业生产模式转型升级。据此提出假设:

H1: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3.2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除产生直接促进效应外, 依托两条核心中介渠道形成间接驱动作用, 分别通过农业技术创新、农业规模经营传导至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其一为技术创新传导渠道。良种研发、智能农机普及、绿色耕作模式推广具备投入成本高、回报周期长、经营风险突出的特征, 传统金融工具难以充分对冲创新投入风险, 无法满足农业科创资金需求^[21]。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农业科创贷、涉农科技保险等专属金融产品, 分散技术落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降低经营主体创新融资成本, 加速先进农业技术大范围普及应用。先进技术能够优化生产要素配比, 减少化肥、人力等无效投入, 向外拓展农业生产前沿边界, 已有研究证实技术进步是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路径^[12]。由此提出假设:

H2: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农业技术创新, 间接提升长江中下游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其二为规模经营传导渠道。连片土地流转、规模化农机作业、标准化种养前期资金投入大, 普通农户依靠自有资金难以开展规模经营, 细碎化土地持续制约生产效率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户、家庭农场提供低门槛土地流转信贷, 缓解土地整合、连片经营的资金约束, 推动小农户分散耕地集中连片, 扩大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面积; 规模化生产便于统一引入智能农机、标准化耕作方案, 摊薄农业生产固定成本, 充分释放土地要素生产潜力, 进而提升区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据此提出假设:

H3: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扩大农业规模经营, 间接提高长江中下游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四、研究设计

4.1 模型构建

(1) 基准回归模型:

为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直接作用, 本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基准模型, 同时控制地区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 规避各区域先天农业条件、历年宏观经济与涉农政策扰动引发的估计偏误, 模型形式设定为:

$$ATFP_{it} = \alpha_0 + \alpha_1 phjr_{it} + \sum \alpha_2 Controls_{it} + \mu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ATFP_{it}$ 表示下标*i*个省市第*t*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phjr_{it}$ 为第*i*个省市第*t*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Controls_{it}$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 α_0 为常数项; α_1 、 α_2 分别为各变量对应的待估系数; μ_i 、 γ_t 、 ε_{it} 依次代表地区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与随机扰动项。

(2) 中介效应模型:

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传导路径, 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 分别以农业技术创新、农业规模经营作为中介变量 M_{it} 分步检验, 模型设定如下:

$$M_{it} = \beta_0 + \beta_1 phjr_{it} + \sum \beta_2 Controls_{it} + \mu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ATFP_{it} = \varphi_0 + \varphi_1 phjr_{it} + \varphi_2 M_{it} + \sum \varphi_3 Controls_{it} + \mu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 (2) 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M_{it} 为中介变量, 依次指代农业技术创新、农业规模经营三类指标; β_0 为常数项; β_1 、 β_2 为各变量待估系数; 其余变量含义与基准回归模型保持一致。(3) 将核心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同时纳入回归方程:

φ_0 为常数项; φ_1 、 φ_2 、 φ_3 分别为对应变量的待估系数; 其余变量定义与前文相同。模型同步控制省市、年份双向固定效应, 缓解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偏差, 若 (2) 中的 β_1 、(3) 中的 φ_2 均显著, 则表明存在中介传导效应。

4.2 数据来源

本文把 2011 至 2023 年划定为研究时段, 选取长江中下游七个省市当作分析样本, 其中包含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文章衡量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时, 采用北京大学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整体指数, 同时搭配覆盖范围、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三项分项指数, 这些指数的原始资料, 都来源于对外开放的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库; 想要算出农业综合生产效率 $ATFP$, 就要收集七类农业投入相关数据, 分别是务农劳动力、耕种土

地、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膜、有效灌溉面积，种植业总产值作为测算时的理想产出指标，以上所有投入、产出数据，均整理自各个省市逐年发布的统计年鉴与农村统计年鉴。

4.3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ATFP）。该变量是指农业要素投入下的综合产出效率。它是通过超效率 SBM 模型进行测量的，它能够有效克服传统 DEA 模型由于输入松弛而造成的测量错误。测算构建完整的投入产出体系，投入维度包含劳动力投入、土地投入、农机投入、化肥投入、农药投入、农膜投入、灌溉投入等七大农业基础生产要素，产出只设定种植业总产值作为预期产出，完整的测算指标如表 1 所示。

(2)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phjr）。本文选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核心解释指标，整体分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细分维度，能够完整反映长江各省市金融服务的普及和发展情况，如信贷、农业保险、数字支付等在涉农线路上的应用情况。基准回归使用指数总体数值，同时将指标滞后一期带入模型，缓解二者双向因果带来的内生偏差；拓展分析阶段分别对三个子维度回归，对比不同维度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数据取自公开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库。

表 1 ATFP 的投入和产出指标

指标类型	变量名	变量说明	单位
投入指标	劳动力投入	种植业从业人员数	万人
	土地投入	农作物播种总面积	千公顷
	农业机械投入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化肥投入	农用化肥投入	万吨
	农药投入	农药使用量	万吨
	农膜投入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	吨
	灌溉投入	农业有效灌溉面积	千公顷
产出指标	农业总产值	种植业总产值	亿元

(3) 中介变量。本文设置农业技术创新、农业规模经营两类中介指标，采用逐步回归中介模型检验内在传导机制。第一类是农业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缓解农业经营主体的研发资金压力，降低技术交易的信息壁垒，激活区域农技市场，利用各地的技术市场成交额进行测算；第二类是农业规模经营。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户连片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种植提供信贷支持，缓解土地整合资金压力，衡量农业规模化发展水平的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与种植业从业人员的比值。

(4) 控制变量。模型计算结果容易出现偏差，偏差大多来自部分变量没有纳入模型，基准回归里一共设置六项控制指标来缓解这类问题：粮食播种面积和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值，用来代表当地农业结构，区域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对应城镇化发展水平，农林水务财政支出在地方财政总支出中的占比，可以体现财政对农业的扶持力度，耕地总面积除以务农从业人数，能够得到人均耕种土地规模，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用来衡量农村人口文化水平，农机总动力经过对数转换后，代表当地农业机械化发展情况；后续拓展回归分析中，文章额外增加农村金融发展、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城乡收入差距三类控制指标，全部控制变量对应的原始数据，都从 CSMAR、CNRDS 数据库中收集整理。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文章里全部核心变量的描述统计相关数值，都在表格 2 当中完整展示出来。被解释变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ATFP 均值为 0.526，整体农业生产效率水平偏低，区域间极值差距较大，说明各地农业提质增效进度分化明显；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 phjr 均值 212.503，但标准差达到 80.177，反映长江中下游各地市数字金融发展不均衡，区域数字鸿沟问题突出。其余城镇化率、财政支农、人均受教育年限等控制变量取值均处于合理区间，无极端异常数值，样本数据满足后续实证回归要求。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ATFP	1027	0.526	0.194	0.263	0.479	1.037
phjr	1027	212.503	80.177	27.080	221.705	373.221
城镇化率	1027	0.591	0.117	0.234	0.589	0.896
财政支农力度	1027	10.478	1.536	4.110	10.817	12.881
GDP	1027	10.966	0.577	9.592	11.007	12.097
人均受教育年限	1027	9.256	0.395	8.367	9.282	10.654
农业土地流转率	1027	0.453	0.135	0.145	0.472	0.665
成灾受灾率	1027	0.055	0.046	0.001	0.050	0.285

5.2 基准回归结果

这一部分搭建基础回归模型,通过实证计算,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会对长江中下游各个地级市的农业综合生产效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为规避双向因果引致的内生偏差,将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滞后一期处理,模型同步控制地区、年份双重固定效应,并纳入城镇化、财政支农、土地流转等多类控制变量,剥离其他因素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干扰。整体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带来的综合作用,只会在基准回归部分做相关检验,是全文实证分析的基础核心结果,用于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存在显著正向提升效应,为后续分维度、机制、异质性检验奠定实证基础。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1)	(2)
	ATFP	ATFP
phjr	0.0008*** (5.00)	0.0007*** (4.52)
城镇化率	-0.3420*** (-4.39)	0.2057** (2.48)
GDP	0.0940*** (5.56)	-0.0689*** (-3.42)
财政支农力度	-0.0701*** (-14.81)	-0.0329*** (-12.81)
人均受教育年限	0.1228*** (4.44)	0.0286** (2.63)
农业土地流转率	-0.0667 (-0.92)	-0.4278*** (-9.29)
成灾受灾率	-0.0933 (-1.39)	-0.1478*** (-8.37)
常数项	-0.8324*** (-3.31)	1.2826*** (5.26)
年份	NO	YES
地区	NO	YES
N	1027	1027
R2	0.8066	0.9600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下同。

5.3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变量 X 分解效应

基准回归采用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进行分析,为区分不同维度的差异化影响,同时佐证结论稳健性,将总指数拆解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分项指标分别回归,结果如表 4。回归结果显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的系数分别在 1%、5%、10% 的水平显著为正,三个维度均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推动作用,与基准回归所得核心结论保持一致。

表4替换变量X

	(1)	(2)	(3)
	ATFP	ATFP	ATFP
覆盖广度	0.0003*** (2.84)		
使用深度		0.0007** (2.17)	
数字化程度			0.0002* (1.99)
城镇化率	0.2676** (2.46)	0.2747** (2.40)	0.2729** (2.45)
财政支农力度	-0.0316*** (-12.59)	-0.0312*** (-12.35)	-0.0305*** (-11.94)
GDP	-0.0794*** (-3.64)	-0.0789*** (-3.51)	-0.0774*** (-3.50)
人均受教育年限	0.0312** (2.53)	0.0292** (2.30)	0.0284** (2.26)
农业土地流转率	-0.3938*** (-7.11)	-0.3617*** (-6.23)	-0.3643*** (-6.29)
成灾受灾率	-0.1701*** (-8.35)	-0.2162*** (-10.30)	-0.1937*** (-8.93)
常数项	1.4068*** (5.87)	1.3040*** (5.29)	1.4024*** (5.80)
年份	YES	YES	YES
地区	YES	YES	YES
N	1027	1027	1027
R2	0.9579	0.9583	0.9578

(2) 滞后一期

为缓解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双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得到 L.phjr 重新回归,结果如表 5。样本量缩减至 948 组,无论是否控制双向固定效应,滞后一期数字普惠金融的系数均通过 1% 水平显著性检验,各控制变量的回归规律也与基准回归基本吻合,再次验证二者正向关系稳定存在。

表5滞后一期

	(1)	(2)
	ATFP	ATFP
L.phjr	0.0007***	0.0005***

	(3.84)	(3.65)
城镇化率	-0.3206***	0.2695***
	(-3.93)	(2.79)
财政支农力度	-0.0668***	-0.0297***
	(-12.10)	(-12.00)
GDP	0.0958***	-0.0822***
	(5.42)	(-3.68)
人均受教育年限	0.1272***	0.0366***
	(3.99)	(3.04)
农业土地流转率	-0.0040	-0.4366***
	(-0.05)	(-9.84)
成灾受灾率	-0.0843	-0.1896***
	(-0.99)	(-7.54)
常数项	-0.9390***	1.3712***
	(-3.38)	(5.14)
年份	NO	YES
地区	NO	YES
N	948	948
R2	0.7971	0.9586

5.4 中介效应检验

(1) 农业技术创新机制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中介模型检验农业技术创新的传导路径,回归结果见表6。列(1)验证数字普惠金融总效应显著为正;列(2)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推动农业技术创新;列(3)同时纳入核心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二者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农业技术创新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2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可降低农业科创融资成本、分散技术落地风险,加速良种、智能农机等先进农业技术普及,拓宽农业生产前沿,进而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表6 农业技术创新机制

	ATFP	农业科技专利	ATFP
phjr	0.0007***	0.0015*	0.0007***
	(4.52)	(1.68)	(4.71)
农业科技专利			0.0205***
			(2.88)
城镇化率	0.2057**	-0.3364	0.2126**
	(2.48)	(-1.22)	(2.53)
财政支农力度	-0.0329***	0.0108	-0.0331***
	(-12.81)	(0.59)	(-13.32)
GDP	-0.0689***	-0.1728	-0.0653***
	(-3.42)	(-1.39)	(-3.22)
人均受教育年限	0.0286**	0.2619***	0.0233**
	(2.63)	(7.02)	(2.36)
农业土地流转率	-0.4278***	3.5674***	-0.5009***
	(-9.29)	(9.06)	(-14.55)

成灾受灾率	-0.1478*** (-8.37)	1.0326*** (4.63)	-0.1690*** (-9.48)
常数项	1.2826*** (5.26)	5.7865*** (4.70)	1.1641*** (4.42)
年份	YES	YES	YES
地区	YES	YES	YES
N	1027	1027	1027
R2	0.9600	0.9486	0.9605

(2) 农业规模经营

同理检验农业规模经营的中介传导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7。列 (1) 总效应显著为正；列 (2) 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扩大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列 (3) 中核心解释变量与农业规模经营系数均显著，证实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假设 H3 成立。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户土地连片流转提供低成本信贷支持，缓解土地细碎化约束，规模化生产摊薄固定生产成本，充分释放土地要素产出潜力，最终改善区域农业生产效率。

表 7 农业规模经营

	(1)	(2)	(3)
	ATFP	农业规模经营	ATFP
phjr	0.0007*** (4.52)	0.0138** (2.31)	0.0007*** (4.56)
农业规模经营			0.0020** (2.43)
城镇化率	0.2057** (2.48)	5.2240 (1.39)	0.1953** (2.47)
财政支农力度	-0.0329*** (-12.81)	0.3992** (2.20)	-0.0337*** (-13.99)
GDP	-0.0689*** (-3.42)	-0.5748 (-0.55)	-0.0677*** (-3.39)
人均受教育年限	0.0286** (2.63)	-1.0758 (-1.25)	0.0308*** (2.99)
农业土地流转率	-0.4278*** (-9.29)	3.0816 (0.98)	-0.4340*** (-9.91)
成灾受灾率	-0.1478*** (-8.37)	-15.6431*** (-6.93)	-0.1167*** (-5.85)
常数项	1.2826*** (5.26)	21.6290 (1.40)	1.2395*** (5.23)
年份	YES	YES	YES
地区	YES	YES	YES
N	1027	1027	1027
R2	0.9600	0.8026	0.9605

5.5 异质性分析

基准回归只能体现数字普惠金融给农业生产综合效率带来的平均影响水平，本文引入市场化水平交互项开展异质性检验，结果见表 8。控制双向固定效应后，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水平交互项 $phjr \times market$ 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市场化水平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赋能效果越强。高市场化区域土地流转、农资

交易、涉农投融资机制更为完善,数字信贷资金可顺畅投入农机购置、连片种植与农业技术研发;市场化程度偏低地区要素流通存在壁垒,数字金融惠农红利难以充分释放,完善农村要素市场是放大数字金融支农效能的重要配套条件。

表 8 异质性

	(1)	(2)
	ATFP	ATFP
phjr	0.0006*** (5.45)	0.0005*** (2.80)
phjr × market	0.0002*** (11.53)	0.0001*** (5.59)
market	0.0017 (0.20)	-0.0120*** (-2.97)
城镇化率	-0.2797*** (-3.64)	0.1952** (2.37)
财政支农力度	-0.0462*** (-15.96)	-0.0256*** (-7.19)
GDP	0.0685*** (4.00)	-0.0611*** (-2.89)
人均受教育年限	0.1317*** (7.44)	0.0384*** (4.03)
农业土地流转率	-0.1127 (-1.44)	-0.2845*** (-7.48)
成灾受灾率	0.1391** (2.51)	-0.1777*** (-8.80)
常数项	-0.8776*** (-4.35)	1.0196*** (4.29)
年份	NO	YES
地区	NO	YES
N	1027	1027
R2	0.8617	0.9628

6. 结论和建议

本文基于 2011—2023 年长江中下游地级市面板数据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维度均能显著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多重稳健检验证实结论可靠;机制检验显示农业技术创新、农业规模经营发挥显著部分中介作用,市场化水平存在正向调节效应,市场环境越好数字金融支农效果越突出。据此,应完善农村数字金融服务,推出适配农业科创、土地流转的专项信贷,同时健全农村要素流通市场,破除流转壁垒,针对市场化薄弱地区加大配套扶持,差异化下沉数字金融资源,引导资金流向新型经营主体,依托技术升级与规模发展,持续推动长江中下游农业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郭峰,王靖一,王芳,等.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J].经济学(季刊),2020,19(04):1401-1418.
- [2] Tok Y W, Heng D, Kee S H. Fintech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Is there a digital divide?[R]. Asian Development Bank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658, 2022.

- [3] Sinha A. Digital payment revolution in India: The role of UPI and JAM trinity[J].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2024, 59(12): 45-53.
- [4] 唐建军, 龚教伟, 宋清华.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要素流动与技术扩散的视角[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07): 81-102.
- [5] 胡宗义, 闫建超, 李毅, 等. 数字普惠金融的统计测度与时空演化特征[J]. *经济学动态*, 2025(12): 169-188.
- [6] 林青宁, 毛世平.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演化过程、测算方法与未来展望[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3, 28(04): 248-256.
- [7] OECD.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the environment: A guide to emerging best practices in measurement[R]. OECD Food,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Paper No. 177, 2022.
- [8] Sheng Y.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OECD countries: Technological change,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input scale[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25, 76(1): 45-68.
- [9] Tekiner-Mogulkoc H. Using Malmquist TFP Index for evaluat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griculture of Turkiye NUTS2 regions[J]. *Sigma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Natural Sciences*, 2022.
- [10] 李伟, 董涵, 石贝贝. 农业技术扩散与市场集中度对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J]. *南方农业学报*, 2024, 55(07): 2192-2200.
- [11] 吴国松, 姚升. 要素市场扭曲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空间影响效应分解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 42(12): 217-227.
- [12] 张启文, 田静.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异质性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J].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1(01): 45-56.
- [13] Liu Y, Liu C, Zhou M. Doe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promot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or rural households in China? Research based on the Chinese family database (CFD)[J].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21, 13(2): 475-494.
- [14] 任健华, 雷宏振. 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深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J]. *社会科学家*, 2022(06): 86-95.
- [15] 唐勇, 吕太升. 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J].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03): 3-16.
- [16] 赵锦春.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 *现代经济探讨*, 2024(03): 109-121.
- [17] 赵丹玉, 崔建军.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缩小城乡多维差距吗——基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中介效应的视角[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44(08): 81-93.
- [18] 周月书, 苗哲瑜.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生产经营投资的影响[J]. *中国农村观察*, 2023, (1): 40-58.
- [19] 罗光强, 王焕.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粮食主产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J]. *经济纵横*, 2022, (7): 107-117.
- [20] 李杰义, 胡静澜. 数字普惠金融、农业产业链延伸与农民增收[J]. *统计与决策*, 2024, 40(3): 81-85.
- [21] 唐勇, 胡宇威. 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与农业高质量发展——以我国粮食主产区为例[J]. *新疆农垦经济*, 2025, (4): 23-34.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ian Li¹, Yang Lingli¹, Yao Chunmei¹, Yuan Yijun¹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Abstrac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modern agriculture to improv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nd improving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the core path to realiz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ed on the prefecture-level panel data of seven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from 2011 to 2023, the study finds tha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improving regional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its coverage breadth, usage depth and digitalization degree all play positive driving roles. In terms of mechanism,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an boos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by promoting agricultur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xpanding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operatio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mpowering effe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s more significant in regions with higher marketiz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rural digital financial supporting facilities,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agriculture-related financial services, release the efficiency dividend of digital finance benefiting agriculture,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Keyword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在地性视角下休闲农场的空间重构与文化转译研究 ——以“之野知也”农场为例

张 岩¹

(1. 黑龙江大学 艺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在地性作为当代乡村设计实践的核心议题, 强调空间营造对本土自然条件、材料资源与文化基因的深层回应。本文以河南中牟“之野知也”农场为例, 探讨休闲农场如何在空间重构与文化转译中实现在地性表达。”针对当前设计中普遍存在的空间趋同、文化表达浮于表面以及材料应用粗放等现象, 本文以河南中牟“之野知也”农场为例, 剖析乡土资源向复合文旅空间转化的实践路径。研究立足于在地资源的系统挖掘: 提炼黄河民居建造原型, 建立“控制性网格与弹性单元”的空间组织层级; 同时提取高粱、秸秆画及皮影等地非遗传符号, 探索本土材料的真实肌理表达与文化符号的几何转译机制, 使设计语言与在地基因形成深层呼应最终依托“生产—体验—服务”的三重衔接, 达成乡村休闲空间形态的灵活重构与地域文化的深度表达。

关键词: 在地性; 休闲农场; 空间重构; 文化转译; 乡土材料

DOI: doi.org/10.70693/202608049028

一、引言

在地性作为衡量设计是否根植于本土环境的重要标尺, 近年来在乡村建筑与景观设计领域受到持续关注。肯尼斯弗兰姆普敦在《现代建筑: 一部批判的历史》中提出的“批判性地域主义”, 为在地性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先声^[1]——它主张建筑应从本土气候、光线和构造方式中汲取营养, 而非沉溺于肤浅的符号游戏^[2]。它要求设计不仅回应场地的自然地理条件, 更需深入挖掘本土的材料资源、建造传统与文化基因^[3]。然而, 当前的休闲农场设计实践中, 普遍存在对“在地性”的表面化理解——或简单移植外地成功案例的“网红”模式, 或对传统元素进行符号化的生硬拼贴^[4], 导致空间缺乏真实的场所精神。针对这一困境, 本文以河南“之野知也”休闲农场为例, 从在地资源挖掘、空间组织重构与文化符号转译三个维度展开探讨, 旨在为乡村休闲空间的在地性设计提供一种可参照的实践路径。

二、项目概况与空间规划逻辑

(一) 项目背景

“之野知也”农场坐落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关家村, 北临黄河生态廊道, 处于郑州主城区一小时交通圈内, 具备承接城郊休闲需求的区位优势。在产业基底上, 项目顺应当地规模化的彩色高粱种植, 打通“种植—酿造—酒糟养分循环”的闭合产业链, 形成兼具生产属性与游赏体验的农事景观。本案的设计探索, 正是以回应场地的“在地性”为出发点, 系统整合自然、产业与文化三重资源^[5]。上述空间策略并非孤立的形式操作, 其深层逻辑在于将“在地性”从一种抽象的设计理念, 转化为可操作的空间组织语言——即通过控制性网格承接场地的自然肌理, 通过弹性单元容纳在地产业的季节性变化, 通过材料与陈设转译在地文化的视觉基因空间建造则聚焦黄河流域传统民居, 提炼“黄泥墙、草苫顶”的建造原型并完成现代转译, 以保持乡村场所的真实野趣; 同时引入秸秆画与皮影戏两项在地非遗, 将皮影的光影叙事融入界面构图与剧场设计, 促成非遗资源向空间体验要素的转化。

作者简介: 张 岩(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环境与公共艺术设计。

通讯作者: 张 岩

终期规划整合了前厅接待、农耕科普、非遗展示、阅读休憩、露天剧场及手工研学等功能，搭建起多业态复合的乡村公共空间体系。

(二) 空间重构原则

本案以“控制性网格与弹性单元”为底层设计逻辑。同类项目中，金沙酒业文旅区同样采用“控制性网格”作为空间划分的组织骨架，在 70 亩核心用地范围内构建了“秩序清晰且充满弹性”的规划控制系统^[9]。本案在此基础上，将五项重构路径织入同一张逻辑网络，使各环节之间彼此呼应而非孤立堆叠。在形态与材料表达上，设计从黄河沿岸民居中提取了“黄泥墙、木梁架、草苫顶”这一组带有集体记忆的空间符号，通过几何抽象与现代构造方式的介入，使之褪去仿古的刻板，转入当代乡村建筑的语言体系。空间布局上引入模组化控制网格，既建立起清晰的秩序，也保留了足够的“余地”——接待、吧台等固定功能安放在网格骨架之中，而露营、集市等弹性场景则可随时嵌入、移动或重组，使同一场地在不同时段呈现差异化的使用状态。

在体验组织与效益生成上，设计不仅关注动线效率，更关注如何让使用者“自然地走进”文化内容：通过尺度收放与家具形态的微调，非遗体验与农耕科普被串联成一条无需刻意引导的体验路径。这条路径最终通向了多重关系的衔接——生产与体验不再隔阂，产业与社区彼此滋养，经济回报与文化价值在同一片土壤中共生。由此形成的，不再是功能孤立的物理空间，而是一个兼具共享温度与文化厚度的乡村生活场景。上述空间策略并非孤立的形式操作，其深层逻辑在于将‘在地性’从一种抽象的设计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空间组织语言——即通过控制性网格承接场地的自然肌理，通过弹性单元容纳在地产业的季节性变化，通过材料与陈设转译在地文化的视觉基因

三、 农场空间装饰材料的设计应用

装饰材料作为空间物理界面的构造基础，遵循“质朴、环保、耐用、属地”原则。针对墙面、地面、顶面实施差异化建构，具体选型与建构表达见表 1。

表 1 “之野知也”农场三维界面装饰材料选型与建构表达矩阵

界面 维度	应用 空间	核心装饰材料	构造节点	功能与建构表意
墙面	前厅	半透明纤维板、实木格栅	轻钢龙骨企口拼接（留 5mm 阴角缝）	兼顾采光与木质温润体验
	吧台	黄泥肌理艺术涂料	手工批刮工艺	还原黄泥墙质感，强化地域识别
	通道	暖色生态乳胶漆	微孔透气面涂	防潮抑菌，提升空间人文温情
	研学区	玻璃砖、白色釉面瓷砖	砂浆砌筑结合防水填缝	改善深进深采光，便于清洁维护
地面	通道	黑色抛光砖、灰色防滑岩板	密缝铺贴、防滑处理	高强耐磨抗渗，满足高频通行需求
	中庭	30mm 青石板、白色卵石	青石板干铺、隐蔽式排水沟	自然渗水，重构乡村庭院铺装意趣
	书吧	质感实木复合地板	龙骨铺设加吸音垫层	声学吸收降噪，提升触感舒适度
顶面	前厅	实木吊顶、藤编网格、阻燃防腐处理 风干麦穗艺术装置	悬挂式钢骨架、隐蔽暖光灯带	农艺作物装置化，营造野趣氛围
	吧台	暗光不锈钢板、悬挂实木条	金属底板结合悬挂实木模组	借漫反射拓宽视觉，消解梁体沉重感
	书吧	粗糙肌理实木板	复原传统双坡屋顶结构	保留原生质感，展现传统建造意蕴
	中庭	木格栅、长虹玻璃、金属条	装配式复合悬吊体系	传统材料与工业材质的时代对话

（一）三维界面的建构逻辑与空间响应

本案在空间界面的材料处理上，并非材料的拼贴与叠加，而是基于功能属性与氛围营造的双重需求，形成差异化的建构策略。墙面采用轻质透明材质与本土泥土肌理并置的手法，在轻与重、通透与质朴的对照中形成界面张力，使材料自身的物性成为空间表情的表达媒介^[7]；地面依据硬度与防滑性能的差异化设计，在行进与驻留之间建立可被感知的分界，从而自然引导人流与行为模式；顶面则通过模块化悬吊结构的置入，既化解了原建筑梁体的压迫感，又将农耕意象抽象转化为空间中的装置语言。墙、地、顶三个维度由此形成统一的材料逻辑与视觉秩序。

四、 农场空间软装陈设的设计转译

软装陈设是塑造场所精神与文化记忆的关键介质。本案以“现代新乡野”为风格基调，依托“提取—解构—重构”路径，实现实用功能与文化意蕴的协同。

（一）复合空间配置与光影叙事表达

在内部空间的材质与陈设层面，以原木接待台、榫卯屏风及悬挂的斗笠农具作为本土意象的定调元素，辅以书吧区域低饱和原木与棉麻软装，形成温馨质朴的空间底色；露天剧场的皮影展示墙在承担科普功能的同时兼为场景背景，进一步延展了空间的文化叙述维度。照明设计统一采用 2700K—3000K 暖色温光源，并针对秸秆画、皮影等非遗展示节点，引入 30° 窄角光束进行重点投射，通过高对比度的明暗关系凸显手工艺品的微观肌理与阴影层次，使光环境从基础照明功能上升为参与空间叙事表达的视觉媒介^[8]

（二）在地文化符号转译机制

为避免本土元素的公式化堆砌，建立“提取—解构—重构”转译路径（见表 2）。

表 2 在地文化符号在软装陈设中的现代转译路径矩阵

文化要素	原始形态	现代转译介质	解构与重构手法	光影与空间效果
秸秆画	传统农作制画	装饰画、屏风饰面	模块化悬挂、亚克力封存	30°窄角光强化麦秸金属质感与立体感
河南皮影	雕镂人物/舞台	透光艺术墙、造型灯罩	提炼轮廓线条、整合 LED 光源构件	光影交错动态呈现戏曲文化意境
黄河民居	黄泥墙/草苫顶/榫卯	艺术涂料、草编软饰	提取泥墙质感与榫卯节点，去繁就简	2700K 暖光营造乡愁记忆与归家感
高粱文化	作物与农艺工具	悬挂装置、陈设主色调	高粱穗装置化、高粱红作点缀色	重点照明突出产业特色与视觉层次

五、 案例对比与行业启示

（一）案例对比分析

金沙酒业文旅区从国营农场转型为文旅综合体的实践表明^[6]，大型文旅更新项目往往依赖重型构筑物的空间叠加与刚性网格体系的整体统筹。相较于此类依赖大规模资金投入的项目，本案所代表的城郊中小型农场面临更为严苛的预算与用地约束，这决定了其在地性表达必须走一条‘轻量化’的路径——即以本土材料的微观肌理取代宏大叙事，以灵活可变的单元网格替代刚性空间结构。然而，两者在具体实施路径上呈现出明显分化：大型更新项目通常依赖重型构筑物的空间叠加与刚性网格体系的整体统筹，以应对工业遗存自身的结构强度与体量惯性；而中小型农场受限于资金预算与用地条件，难以复制此类重型模式，因而转向以轻量原型为基础的软性转译，借助微观层面的材料肌理表达与“乡村客厅”式的社区功能衔接，在有限条件中寻求更为灵活的空间策略，进而构建起一种适应性更强、响应更敏捷的乡村空间微循环体系。

（二）行业启示

本案的实践为同类乡村空间在地性设计实践提供了以下启示：在地域符号的当代转译上，应摒弃传统元素的具象堆砌，将文化意象沉淀为空间骨架与场所氛围，实现从“符号拼贴”向“抽象空间叙事”的跨越；在材料与建构策略上，需构建天然低碳的材料应用体系，以材料自身的真实肌理与可持续建造方式奠定空间的生态底色；在功能与场景赋能上，应推动文化展示、生产体验与公共服务的深度嵌套，通过多元功能的复合共生，将抽象文化内涵转化为可感知、可传播的具象情境，实现乡村空间文化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激活。

六、 结论

本研究以“之野知也”农场为例，探讨了中小型休闲农场在空间重构、材料应用与文化转译方面的设计路径。研究发现，将传统建造原型与非遗资源融入现代设计体系，结合低碳材料策略与“生产—社区—效益”复合运营模式，能够有效应对乡村休闲空间同质化及文化表达表层化的困境，为同类微型乡村空间在地性设计可参照的实践样本。

参考文献：

- [1]成辉,李欣,张群,等.肯尼斯·弗兰姆普顿的地域建筑观[J].工业建筑,2014,44(6):31-33+56.
- [2]李建.读 Frampton 对批判的地域主义的七点态度随感[J].中外建筑,2009,(9):102-104.
- [3]张雨薇,范文兵.在地的建筑:乡村营造的几种路径分析[J].建筑与文化,2019,(1):172-174.
- [4]乔泽元,才雨申,卢国新.地域文化在休闲农业园区景观设计中的合理表达[J].现代园艺,2021,44(16):141-142.
- [5]谷军,左光之,刘学群.基于在地性理论的城市近郊乡村公共空间在地性设计策略——以合肥市大圩镇圩西村为例[J].城市建筑空间,2022,29(3):190-192.
- [6]史洋,黎少君.从国营农场到文旅综合体——金沙酒业文旅区规划与建筑设计[J].中国建筑装饰装修,2026,(5):36-43.
- [7]孙瑜,王天莲.历时性的视角下探析乡土材料的“本性”与“原真性”的演化历程[J].世界建筑,2024,(12):86-90.
- [8]王勇,程瑞强,张施泉.场所精神理论视角下的乡村公共空间设计——以黄南村村民活动中心改造设计为例[J].设计艺术研究,2023,13(2):5-9.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of Leisure Fa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ity: A Case Study of "Zhi Ye Zhi Ye" Farm

Zhang Yan¹

1.School of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China

Abstract: Locality, as a core issue in contemporary rural design practice, emphasizes the deep response of spatial construction to local natural conditions, material resources, and cultural genes. Addressing common problems in current design such as spatial homogenization, superficial cultural expression, and extensive application of materials, this paper takes the "Zhi Ye Zhi Ye" Farm in Zhongmu, Henan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to analyze the practical path of transforming vernacular resources into composite cultural tourism spaces.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excavation of local resources, this study extracts the prototypes of Yellow River vernacular dwellings and establishes a spatial organization hierarchy featuring "controlling grids and dynamic units." Simultaneously, by extracting loc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ymbols such as sorghum, straw painting, and shadow puppetry, it explores the authentic texture expression of local materials and the geometric translation mechanism of cultural symbols, thereby enabling a deep resonance between the design language and local genes. Ultimately, relying on the triple linkage of "production-experience-service," the flexibl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leisure space forms and the deep expression of regional culture are achieved.

Keywords: Locality; Leisure farm; Spatial Reconstruction; Cultural Translation; Vernacular Materials

环滇池传统村落艺术文化体验园景观设计 ——以海晏村为例

弓子涵

(黑龙江大学 艺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传统村落的文化景观保护与活化利用, 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重要议题。昆明市海晏村作为环滇池流域首个市级历史村镇, 面临着生态保护红线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双重约束。本研究基于海晏村独特的“山—村—古渡口—河—湖—田”空间格局与“一颗印”民居风貌, 探讨在“双限”条件下建设艺术文化体验园的景观设计策略。研究提出“轻介入、重体验、续文脉”的设计原则, 从文化基因提取与空间转译、景观叙事与沉浸式体验建构、在地材料运用与场所营造、生态韧性提升与基础设施优化四个维度展开, 探索文化遗产活化与生态空间修复协同共生的设计路径, 旨在为同类传统村落的保护性开发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 海晏村; 艺术文化体验园; 景观设计; 传统村落保护; 生态红线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 51668025); 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项目编号: 2020YFD1100705)

DOI: doi.org/10.70693/202608104307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 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与旅游潜力日益受到重视。然而, 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之间的张力、经济发展与生态约束之间的矛盾, 已成为制约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命题。海晏村自2016年被列为昆明市首个历史村镇以来, 因其独特的滇池湖滨风光与保存完整的传统聚落形态, 迅速成为环滇池区域的文旅热点。但游客激增也带来了生态压力、文化空间异化与社区活力消解等问题^[1]。

在此背景下, 海晏村艺术文化体验园的规划建设, 不仅要回应文化遗产与产业发展的需求, 更需在滇池“两线三区”的生态管控框架与历史村镇保护规划的双重约束下寻求设计突破。根据《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大渔街道海晏村历史村镇保护规划(2021-2035)》, 海晏村约85%的区域位于湖滨生态红线内, 保护工作须遵循真实性、整体性、可持续性与最小干预四项原则。如何将“限制”转化为“特色”, 在保护中实现活化, 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2]。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实现手段, 各个村落出现了村村旅游、户户接待的现状。但透过其中我们发现许多乡村旅游建设存在模式化的搬套, 没有将本地丰富独特的文化资源充分利用表现, 最终也导致在同类乡村旅游中缺乏竞争力^[3]。

二、海晏村景观资源与价值困境

2.1 独特的景观资源禀赋

海晏村位于环湖东路以西, 西侧紧邻滇池, 北与主城区隔滇池相望, 海晏村地势平坦, 南面存在地势起伏的小山地, 海拔1840米^[4]。

海晏村的景观价值首先体现为“山水聚落”的宏观格局。村落南面背靠梅家山、北望滇池, 形成“山—村—古渡口—河—湖—田”递次展开的独特滨水聚落空间格局, 其滨水区域因落日景观而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在微观层面, 村落保存了“一主两辅多分支”的鱼骨状街巷格局, 以及“一颗印”式传统民居建筑群, 包括石龙寺、萧氏宅院、关圣宫、吕祖阁、西寨门等6处历史建筑和2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外, 村落还保留了40处古井、2处码头、5处石阶等历史环境要素, 以及瓦猫制作、刺绣、龙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艺术体验园提供了丰厚的叙事素材。

作者简介: 弓子涵(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环境设计。

通讯作者: 弓子涵

2.2 “双限”格局下的设计困境

海晏村约 85% 的区域位于滇池湖滨生态红线内,这决定了任何新建、扩建行为均受到严格管制。同时,作为市级历史村镇,其街巷肌理、建筑风貌与空间尺度均需遵循真实性、整体性与最小干预的保护原则。这意味着艺术文化体验园的设计无法采取“大拆大建”的常规模式,而必须在存量空间中通过“轻介入”的方式实现功能置换与文化表达。村落中部分空间已被旅游商业占据,村民日常活动空间受到挤压,如何在游客体验与社区生活之间寻求平衡,是设计面临的重要挑战。城边村落内部社会迅速进行现代化转型,传统村落的发展潜力吸引了更多外来资本的入驻,在缺乏引导的情况下,城边村落的社区、产业和空间的建设往往趋向不均衡的发展^[5]。

三、艺术文化体验园的景观设计策略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境生象外,文脉续存”的核心设计理念——以环境为载体,将文化意象融入空间体验之中,在延续历史文脉的同时创造新的场所精神。原本滇池流域的原生性聚落中传统的“一颗印”民居建筑逐渐变形,海晏村的立面风貌发生重大的变化:传统与现代、发展与保护在海晏村中产生激烈碰撞^[6]。

3.1 文化基因的提取与空间转译

设计应对海晏村的多元文化进行系统性梳理与分级提取。物质层面,将“一颗印”建筑形制、鱼骨状街巷、古渡口码头、青石板街等纳入空间设计资源库;非物质层面,将渔耕传统、瓦猫技艺、民间信仰等转化为体验内容。在空间转译上,可借鉴“渔灯”造型设计景观灯具,将“渔网”编织工艺转化为景观小品和标识系统的设计语言,使文化符号在细节中自然流露。已有相关设计实践对此进行了探索,例如以“沉浸式体验”为核心理念,将海晏村历史文化转化为可感知的空间场景。

3.2 景观叙事与沉浸式体验建构

依托海晏村青石板街串联的“码头—西寨门—关圣宫—吕祖阁”历史文化轴线,可构建一条串联重要节点的文化叙事动线。在这一线性序列中,艺术文化体验园可承担“文化展示与体验中枢”的功能,利用闲置民居或历史建筑,设置以渔耕文化、滇池生态为主题的微型展馆与沉浸式体验空间。通过“修旧如旧”的方式保留建筑的历史信息,同时植入当代展陈技术,实现“老房子里的新体验”,避免新建大体量建筑对村落天际线的破坏。

3.3 在地材料运用与场所营造

景观设计中应优先采用本土材料与乡土植物,以维护村落风貌的整体性。在铺装、座椅、标识牌等景观元素设计中,可广泛使用当地石材、竹材及传统工艺,与周边传统民居形成材质上的对话。植物配置应选择滇池流域的乡土物种,遵循“以自然修复为主、工程措施为辅”的生态修复原则,兼顾景观美学与生态恢复功能。已有实践表明,采用乡土植被恢复滇池岸线植物生境是可行的技术路径。

3.4 生态韧性与基础设施提升

设计须直面生态红线约束,将“环湖截污”与“生态湿地修复”纳入景观设计范畴。根据保护规划要求,体验园应配套建设生态化的雨水管理系统,实现雨污分流与农田尾水零排放。同时,可结合村落废弃地、滨湖荒地建设兼具休闲与生态净化功能的湿地花园,使景观设施同时发挥生态效益。此外,应保证村落沿湖空间的公共性与可视性,不得违法占用林地、草地、湿地空间。

四、展示利用体系与主题游览策划

4.1 展示主题分区

根据保护规划的展示利用规划,海晏村可划分为五大主题功能区:

古村文化体验区:以青石板街两侧传统民居集中区域为主,集中展示传统营造美学和民俗文化,建设市井民俗文创区、老客事房乡村书屋、匠人工坊、吕祖阁村史展览馆、艺术展陈空间等精品工程。艺术文化体验园的核心区域宜选址于此。

生活配套区:以原住民居住功能为主,重点整治改造现状民居,完善公共服务和市政基础设施。体验园的配套服务设施可结合该区域布局。

森林秘境区:位于环湖路西侧林地,结合滇池绿道建设湿地森林景观,引入自行车运动、写生等活动。可作为体验园的生态拓展区。

田野观光区:位于环湖路西侧耕地,通过彩色稻田打造大地景观,与高校合作举办艺术建造节、户外

写生等活动。可纳入体验园的艺术实践基地。

环滇湿地和滨水驳岸带：在生态保护红线内以观赏功能为主，恢复植物生境，铺设嵌草青石板作为步行空间。是体验园与滇池生态对话的界面。

4.2 双主题游览线路

保护规划策划了“古村遗韵”与“生态景观”两大主题游览线路：古村遗韵主题游览：以青石板街为主要展示线路，沿线串联码头、石龙寺、西寨门广场、老客事房乡村书屋、磨坊、吕祖阁村史馆、关圣宫等重要文化场所，打造集古村秘境、农旅聚落展示、非遗体验于一体的文化体验空间。生态景观主题游览：以滇池绿道为主要展示线路，沿湖和稻田栈道为次要展示线路，串联森林、稻田等自然景观，打造集健康骑行、农业观光、艺术研学于一体的生态体验空间。艺术文化体验园的设计应嵌入这两条主题线路之中，作为文化展示与生态体验的交汇节点发挥作用。

五、结语

昆明市海晏村艺术文化体验园的景观设计，是传统村落在“生态保护”与“遗产保护”双重约束下实现文化活化的一次积极探索。设计的重心不在于“增量扩张”，而在于“存量优化”。通过文化基因的精准提取、景观叙事的巧妙建构、在地材料的真实表达以及生态基础设施的韧性提升，有可能在不突破底线约束的前提下，创造出具有文化深度与空间品质的艺术体验场所。这种“轻介入、重体验、续文脉”的设计模式，对于环滇池区域乃至全国同类传统村落的保护性开发，为日后景观体验园区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 [1] 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 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大渔街道海晏村历史村镇保护规划（2021-2035）（公示稿）[EB/OL]. (2024-09-09).
- [2] 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大渔街道海晏村历史村镇保护规划（2021-2035）》公布[EB/OL]. (2024-11-15).
- [3] 高爽. 昆明市海晏村旅游景观交互设计[D]. 昆明理工大学, 2024.
- [4] 李立优, 安蓉, 王玲, 王滢, 赵贝贝, 董怡辰. 基于社会学视野的海晏村乡土建筑调查与研究[J]. 山西建筑, 2022(48): 37-38.
- [5] 吴依璠. 昆明市城边传统村落活态保护发展策略研究[D]. 昆明理工大学, 2023.
- [6] 李晓同, 韩启, 邹洲. 历史村落提升建筑立面风貌策略研究——以昆明市海晏村为例[J]. 艺术与设计(理论), 2025, 2(1): 79-82.

Landscape Design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Art and Culture Experience Park

Around Dianchi Lake — Taking Haiyan Village as an Example

Gong Zihan

School of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China

Abstract: The protec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s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aiyan Village in Kunming, as the first municipal-level historic village in the Dianchi Lake Basin, faces dual constraint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lines and historic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This study, based on Haiyan Village's unique 'mountain – village – ancient ferry – river – lake – field' spatial pattern and the distinctive 'One Seal' style of its residential houses, explores landscape design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an art and cultural experience park under these dual constraints. The study proposes the design principle of 'light intervention, heavy experience, and continuing cultural context,' and approaches the design from four dimensions: extracting cultural genes and translating them into space, constructing landscape narratives and immersive experiences, using local materials and creating a sense of place, and enhancing ecological resilience while optimizing infrastructure. It seeks to explore design paths where cultural heritage revitalization and ecological space restoration coexist,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protective development of similar traditional villages.

Keywords: Haiyan Village; Art and Culture Experience Park; Landscape Design; Traditional Village Preservation; Ecological Red Line

可沟通城市视域下体育空间媒介性的生成机制研究 ——以东莞“篮球城市”为例

张慧文¹, 吴云², 张朝霞³

(1.东莞城市学院, 广东 东莞 523419; 2.东莞广播电视台, 广东 东莞 523419; 3.东莞日报社, 广东 东莞 523419)

摘要: 针对当前“可沟通城市”研究“重连接轻沟通”的基建化倾向, 重塑城市作为多元群体对话与认同建构的公共空间价值。以“全国篮球城市”东莞为个案, 透视其从职业赛场到“村BA”等丰富的篮球空间网络, 探究参与式影像实践将场地经验转译为城市叙事的全链条机制。提出“空间嵌入—实践组织—叙事转译—情感共建”的机制链条。发现体育空间媒介化是物理空间、参与实践与媒介叙事持续耦合的过程; 个体的生命经验与叙事使篮球空间成为情感接口, 推动了从“资源密度”到“沟通密度”的实质性转化。城市更新应超越单一经济逻辑, 转向以“记忆的再生产”为核心的包容性路径, 为在发展中维系文化脉络、塑造可沟通的城市认同提供重要启示。

关键词: 可沟通城市; 体育空间; 空间媒介; 媒介化

基金项目: 广东省质量工程项目大学生社会实践教学基地“东莞城市学院—东莞报业传媒集团大学生社会实践教学基地”, 东莞城市学院大学与城市发展研究院开放课题项目“智媒驱动下“东莞篮球城市”品牌资产的数字化解构与全场景传播策略研究”(2026KF005)

DOI: doi.org/10.70693/202608132517

城市传播研究正由“城市中的媒介”转向“作为媒介的城市”。在这一转向中, 城市不再只是信息传播的背景, 而是由道路、广场、场馆、技术平台和日常实践共同构成的关系网络。所谓可沟通城市, 关键不在设施数量或传播声量本身, 而在不同主体能否借助城市空间实现相遇、表达、协商并形成公共意义。体育空间因高频身体参与、稳定组织关系和强烈情感动员而成为检验城市可沟通性的重要场域。

现有城市传播研究较多讨论广场、公园、商圈、书展、文旅场景与“网红城市”, 体育场地则通常被归入公共服务、体育产业或城市品牌研究。这样一种学科分置容易遮蔽一个事实: 篮球场不仅容纳运动, 也持续发生围观、交谈、训练、代际传承和社区协作; 当这些实践被赛事制度、纪录片和平台内容组织后, 场地便从“被使用的空间”转化为“能够传播关系与意义的空间媒介”。

东莞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具有理论张力的案例。一方面, 篮球场馆(地)数量大、基层覆盖深, 职业篮球、镇街联赛、村社赛事和校园篮球并存; 另一方面, “篮球城市”的公共认知并非仅由硬件或冠军构成, 还来自长期在场的普通参与者及其被记录、被讲述的生活经验。因此, 本文关注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东莞篮球空间具备怎样的物质与组织基础? 参与式影像实践如何把场地经验转译为城市叙事? 这一过程如何推进并修正可沟通城市的理论解释? 激发创造潜能, 同时增强情感体验与社会归属感。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 体育城市研究

国外研究早期多以NBA等职业联盟为对象, 讨论商业运营、赛事全球化和城市营销, 关注体育资源如何转化为消费与品牌价值。近年来, 数字平台和直接面向用户的内容分发推动研究转向球迷参与及传播结构。空间生产研究则把体育场馆理解为社会关系生成的场域。^[1]媒介化研究进一步指出, 媒介会进入日常实践的组织逻辑,

作者简介: 张慧文(1981—), 女, 硕士, 副高级, 研究方向为智媒传播、媒体融合;

吴云(1983—), 女, 记者, 导演, 研究方向为媒介融合;

张朝霞(1977—), 女, 硕士, 主任编辑, 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

使场馆不再只是赛事容器。^[2]由此,评价篮球城市不能只看竞技成绩、商业收入和平台流量,还要考察运动空间能否嵌入社区日常、维持重复交往并形成可共享的地方叙事。

国内研究与地方实践更多围绕体育强市建设、职业俱乐部、赛事品牌、设施供给和产业融合展开。东莞具有较强代表性:职业篮球、镇街与村社赛事、校园联赛和密集场地构成多层实践体系。2022年新闻发布会公布全市篮球场地设施6664个。^[3]同年末官方答复统计为6918个。^[4]2025年篮球馆与室外灯光篮球场合计7009个。^[5]村BA进一步把镇街与村社带入公共观看。^[6]中学生联赛中的逐年增多的女子队伍也显示出青少年与女性参与的扩展。^[7]这些材料证明了东莞的资源基础和赛事动员能力,但既有评价仍较多停留在数量增长、竞技成绩、产业拉动与形象曝光层面,对场地如何经由日常使用和叙事生产转化为公共交往关注不足。

(二) 可沟通城市理论

“可沟通城市”作为城市传播研究的核心概念,强调城市作为交往网络、意义网络与地理网络的复合体。“可沟通城市”研究的早期问题与城市信息基础设施、社会连接和公共生活密切相关。格雷厄姆和马文对城市基础设施分化的讨论表明,技术网络并不天然带来整合,反而可能制造新的空间区隔。^[8]因此,评价一座城市是否“可沟通”,不能只看接入规模,还要考察基础设施如何分配沟通机会。国内研究进一步将空间、媒介和个体实践纳入同一分析框架。钟怡通过人民广场案例指出,城市可沟通性生成于空间、媒介与多元主体的互动。^[9]杨家明、赵永华强调空间媒介的可编程性以及实体设施、技术装置和媒介行为的共同作用。^[10]

这一脉络为体育空间研究提供了两点启示:其一,场地是沟通发生的条件,但设施覆盖不等于主体真正获得表达与参与机会;其二,城市沟通不是纯粹的信息传递,而是日常交往、身体在场和公共意义生成的综合过程。篮球场上的比赛、训练、旁观与闲谈,正是可沟通城市在微观层面的具体实践。

(三) 从设施供给到社会关系

列斐伏尔把空间理解为社会关系生产的结果,并以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性空间说明物质使用、制度规划与生活体验之间的张力。^[11]据此,篮球场既是规划和统计中的设施,也是运动者反复使用的行动空间,更是承载地方记忆和身份认同的体验空间。体育空间研究若只比较场地数量、面积与服务半径,便难以解释同等设施为何会形成不同程度的城市认同。

既有体育城市与城市品牌研究注意到重大赛事、职业俱乐部及体育地标对城市形象的塑造作用,但较容易形成“赛事—曝光—品牌”的线性解释,基层场地和普通人的日常实践常被视为品牌资源而非意义生产主体。东莞案例提示,职业荣耀固然提供高辨识度符号,但篮球城市的持续性更多依赖村社球场、校园训练、基层联赛、球迷组织和家庭支持等细密关系。体育空间的理论价值正在于把宏观城市品牌重新放回身体与地方生活。

(四) 从空间再现到实践重组

卡斯特以“地方空间”和“流动空间”的区分解释网络社会中的空间重组:具体地点承载身体行动,信息网络则使符号、资本和情感跨越地域流动。^[11]媒介化研究进一步指出,媒介并非外在传播工具,而是逐渐进入社会实践的组织逻辑。^[12]黄显从数字地理角度说明,技术、关系和地理空间的交汇构成中介化空间。^[12]张雪、杨向荣指出,城市形象会在媒介符号化中被持续建构。^[13]金圣钧等对“网红城市”的研究进一步说明,在线影像和用户参与能够重组城市想象。^[14]

不过,将体育空间媒介化简单理解为“球场被拍摄”仍显不足。平台不仅扩散既有内容,还改变赛事节奏、人物选择和可见性分配;反过来,能够进入平台的内容又必须以真实的身体行动和地方关系为基础。苏书杰、孙仰锡关于城市漫游的研究强调,媒介介入的具身实践能够重建地方感。^[15]这为理解体育空间提供了重要方向:媒介化应被视为物理空间、参与实践与叙事生产的共同重组。

(五) 研究缺口与分析框架

现有研究已经揭示城市空间的传播属性、地方空间向流动空间的转换以及平台对城市符号的放大,但仍存在三点不足:一是重视地标、赛事和平台声量,对基层体育设施的重复性使用关注不足;二是强调平台编码,较少进入内容生产现场,难以解释人物、情感和信任如何被具体建构;三是设施研究与叙事研究相互分离,缺少从场地可达、组织参与到影像传播的连续机制。本文摒弃“空间—平台—情感”的抽象并列,而将分析推进为“空间嵌入—实践组织—叙事转译—情感共建”的过程模型。

二、东莞篮球空间媒介化的经验过程

(一) 空间可达的物质前提

公开资料显示, 2022 年东莞市篮球城市文化节新闻发布会公布, 全市篮球场地设施总量为 6664 个, 其基层覆盖特征可概括为“平均每条村 10 片以上”及“村村有篮球场、镇镇有篮球馆”。^[3]同期行业资料进一步将此设施细分为室外篮球场 6102 个、室内篮球馆 493 个以及三人制篮球场 69 个。^[17]另据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一份公开答复, 截至 2022 年底, 全市篮球场统计数量为 6918 个。^[4]上述数值差异源于统计时点与分类标准边界的不同, 不宜进行简单算术平均, 但可共同作为观测后续变迁的历史基线。

依据 2026 年 5 月发布的《2025 年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这一最新官方口径, 至 2025 年末, 全市拥有各类体育运动场地 21734 个 (座), 其中包含篮球馆 461 座、室外灯光篮球场 6548 个, 二者合计 7009 个; 同期常住人口为 1080.04 万人。^[5]而 2024 年的数据显示, 全市篮球馆为 445 座, 室外灯光篮球场为 6414 个, 合计 6859 个, 常住人口为 1057.08 万人。^[18]由此可见, 2024 年至 2025 年间, 两类主要篮球设施数量增加了 150 个, 增幅约为 2.19%, 同期常住人口增幅约为 2.17%。经换算, 这两年间每约 1541 名常住人口即对应一处篮球馆或室外灯光篮球场。这表明场地供给规模与人口增长基本保持同步, 人均设施占有率的粗略密度维持稳定。

表 1 东莞 2022—2025 年篮球场地、场馆及人口数量统计

年份	篮球场地/场馆数据	常住人口 (万人)	数据来源
2022 年	篮球场地设施 6664 个。其中篮球场 6102 个、篮球馆 493 个、三人制篮球场 69 个。	1043.70	2022 东莞篮球城市文化节发布; 2022 年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3 年	篮球场地设施 6895 个。其中篮球馆 434 座、室外灯光篮球场 6461 个。	1048.53	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2023 年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4 年	篮球场地设施 6859 个。篮球馆 445 座、室外灯光篮球场 6414 个。	1057.08	媒体报道; 2024 年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5 年	其篮球场地设施 7009 个。中篮球馆 461 座、室外灯光篮球场 6548 个。	1080.04	媒体报道; 2025 年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以上篮球场地数据因为平台和媒体差别, 数据并不统一。此外宏观数据仅作参考, 并不能直接推导出居民实际步行可达时间、设施开放程度或特定群体可达性已得到改善的结论。数据的理论意义在于划清“供给密度”与“真实可达”的边界。前者可由统计总量和人口换算观察, 后者还受道路网络、开放时段、收费方式、学校场地开放及不同人群使用门槛影响, 必须依赖 GIS 服务区分析和使用者调查。因而, 东莞“市级专业场馆—镇街篮球馆—村社与校园球场”的多层结构可以证明可达性的物质前提, 却不能替代对空间公平和实际使用的检验。

(二) 从场地存量到日常交往

场地供给并不自动生成日常公共交往。数据显示, 2025 年东莞市共举办全民健身活动 3080 次, 参与人数达 398 万人次。^[5]在篮球领域, 已形成职业联赛、城市联赛、村级赛事与校园竞赛并存的组织化网络。以 2025 年第三届“莞篮村 BA”为例, 该赛事汇聚了全市 32 个镇街的冠军村 (社区) 队伍及 456 名本土球员, 历时逾一个月, 共进行了 69 场比赛; 自 2023 年创办以来, 该赛事累计覆盖观众已超百万人次, 相关话题讨论量超过 1500 万次。^[6]

2026 年“粤 BA”赛事覆盖广东省 21 个地市, 整个赛季规划了 125 场比赛, 并将参赛年龄范围扩展至 16—45 岁, 着重突出其群众属性与城市主场特色。^[20]在东莞, 该赛事并非仅停留在竞技层面, 而是在东莞市文广旅体局的统筹下, 将政府资源、高校力量、社会团体与企业主体纳入同一公共空间: 从球队组队环节即整合宏远青训、东莞四中、广东工业大学等本土培养力量; 赛场服务联动大湾区大学、东莞理工学院等高校的志愿者团队与文艺演出队伍; 基层文艺团体、球迷联盟与快递小哥、医护、教师等一线劳动者共同参与主场暖场与快闪合唱; 赞助商与各镇街将本土产业特色融入赛场展销。文广旅体局同步联动超 500 家商户推出“票根优惠联盟”, 将赛事流量转化为“莞吃、莞住、莞购”的消费增量。由此, 赛事以篮球场为节点, 将原本分散的社会元素编织进“为城市而战”的共同叙事之中, 使体育空间转化为承载多元主体对话与认同建构的城市沟通平台。

校园赛事进一步表明, 基层篮球活动并非仅集中于少数重点学校。2025 年东莞市小学生篮球比赛于 8 天内完成了 189 场比赛, 共有 75 支队伍、1070 名运动员参与。^[21]同年举办的东莞市中学生 (初中组) 篮球比赛设立了四个赛区, 共有 84 支队伍参赛, 其中男子组 45 支、女子组 39 支。^[7]赛事运作同步调动了学生、教师、家庭、裁判、志愿者及学校组织等多方主体; 村级赛事同样联结了球员、邻里关系与现场观众。篮球场因此转化为具有较高交往密度的“城市客厅”, 其媒介属性首先源于身体的共同在场、规则的协同遵守、情绪的即时交换与集体记

忆的持续生成，随后方通过直播、短视频及新闻报道等形式向更广泛的社会空间延展。

（三）小人物经验的叙事化

由东莞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篮球纪录片《不止是篮球》，为“场地如何生成叙事”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阐释路径。该片有意规避单一的冠军叙事范式，将叙事焦点转向东莞本地处于关键人生阶段的学生运动员、承载竞技遗憾的追赶者、经历从校园到社会转型的毕业生，以及维系城市篮球生态的球迷与从业者。第一集《远投》记录了15岁的杨卓衡远赴美国就读高中前，因伤病困扰及与家庭告别所引发的复杂情感体验；《加时》呈现了罗康鑫、袁诗颖在竞技目标、高考压力与复读抉择之间所面临的多重张力；《落位》通过卢健豪、曾茂洲、邵炜昀的个案，展现了校园篮球人才流向中学教师、高校岗位及职业球员等不同发展路径；《轮转》则将球迷组织、社区训练营、商业经营者及退役草根球员纳入城市篮球生态的基层网络进行考察。

这些人物并非独立于体育空间之外的附加叙事，而是该空间内部社会关系的具体承载者。长达三年的跟踪拍摄，使得摄制者从外部观察者逐渐转变为具有“在场性”的陪伴者与参与者：宿舍内的闲暇交谈、赛区酒店中的家庭讨论、机场送别以及首次站上讲台等非竞赛时刻，唯有通过长期的田野走访与信任关系的建立方能被有效记录。纪录片由此揭示，篮球空间的意义生产不仅关联于赛场上的得分与胜负，更广泛地嵌入升学、伤病、离别、就业、家庭支持及代际传承等社会过程之中。本文作者部分地参与了前期的走访、访谈及内容协作，这使得对此片的理解不仅源自对成片的文本分析，更包含了对叙事生成过程的实践认知与反思。

四集标题以篮球术语隐喻关键人生阶段：《远投》意指青少年的地域跨越与成长，《加时》喻指人生路径的重新抉择与努力延续，《落位》指向职业身份与社会坐标的确立，《轮转》则象征着城市篮球生态系统中各类角色的持续接替与互动。创作者通过交织人物时间线、深度访谈、家庭场景与赛事影像，系统解读了训练、伤病与比赛节奏等专业术语，使其同时获得了运动技能层面与社会生活经验层面的双重意涵编码。借此，原本局限于特定群体的体育空间内部经验，得以通过媒介叙事转化为具备公共性的城市文化文本，从而为更广泛的社会公众所认知与进入。

（四）篮球空间的多维参与实践

地方空间的媒介化进程肇始于电视文本，并延伸至网络平台与赛事直播。纪录片《不止是篮球》将专业训练馆、校园球场、职业主场与社区篮球空间并置，使离散场景整合进统一的城市叙事框架；借助短视频切片、话题设置与用户互动，地方经验进一步嵌入更广阔的线上观看网络。空间由此获得超越物理现场的流动性，但线上流量本身并不直接等同于有效沟通。

若仅以发帖量或点赞数作为衡量尺度，则可能低估女子篮球在东莞篮球文化中的结构性位置。事实上，女性参与已深度嵌入东莞篮球从职业到基层的全链条体系，构成这座城市篮球运动多维拓展的重要维度。

在职业与顶级赛事层面，东莞女篮的成绩并不逊色于男篮。东莞新彤盛女篮于2019年与2025年两度登顶WCBA；2025年更实现WCBA联赛、国际篮联亚洲女子篮球联赛与第十五届全运会“一年三冠”。亚洲女子篮球联赛亦落地东莞市体育中心。2025—2026赛季WCBA全明星票选中，东莞队后卫杨力维以224706票当选总“票王”——这一数据直观反映了女子篮球在球迷群体中的号召力。2025年亚洲女子篮球联赛中，杨舒予一人砍下23分并荣膺赛事MVP；其抖音单条视频播放量达1800万，抖音粉丝528万+、微博粉丝320万，影响力已溢出球场延伸至时尚与商业领域。

在基层与群众赛事层面，东莞市篮球联赛设有男女甲乙丙三级，2026年甲级男女各12支队伍参赛；2025年联赛覆盖33个镇街（园区）男女代表队，全年激战200余场。镇街层面，大朗女篮在东莞市联赛中豪取四连冠，加冕“十冠王”；松山湖女篮在2026年镇BA揭幕战中以78:69战胜卫冕冠军大朗女篮；谢岗女篮、黄江女篮在丙级赛事中分获冠亚军并双双晋级乙级。省联赛层面，东莞女篮实现八连冠，与东莞男篮十连冠共同构成“男女双冠辉映”的独特格局。

在校园与青少年层面，2025年东莞市小学生篮球比赛中，凤岗镇中心小学女篮实现三连冠；同年东莞市中学生（初中组）篮球赛中，光明中学女篮实现三连冠；高中组亦有东莞女篮时隔四年重返八强。东莞理工学院于2025年举办首届莞工UBA女子篮球联赛，共开展15场赛事。2026年广东科技学院女篮在东莞市高校“班超”中以全胜战绩夺冠。从小学到高校，女子篮球的赛事网络已覆盖校园体育的全年龄段。

在观赛文化与公众参与层面，粤BA东莞主场为女性观众准备了5000支康乃馨；赛场女鼓手队伍从1人扩展至6人，母女球迷追随着球队奔赴主场与客场。女子篮球已形成差异化的粉丝生态——女篮球迷群体中女性占比显著高于男篮，且应援热情与专业度不逊于男篮，与男子篮球构成互补而非取代关系。

既有赛事资料表明，外围镇街、女性群体及校园层面的篮球参与并非整体性“隐身”。然而，“已有赛事”

并不等同于“均衡可见”——女子篮球的日常训练、伤病与失利等普通经验并未获得与男篮同等的媒介持续关注。

三、体育空间媒介化的生成机制

（一）空间嵌入：基础设施向日常互动节点的转化

“空间嵌入”机制阐释了体育设施如何融入城市日常生活。场地数量为居民提供了基本的物理可达性，然而，只有当专业场馆、镇街篮球馆以及村社与校园球场切实位于居民日常生活半径之内，并具备可持续的开放性与可及性条件时，这些设施方能从抽象的规划指标转化为实质性的社会交往节点。东莞 2024—2025 年人均场地粗密度保持基本稳定，但一数据仅能回应“是否存在”的问题，而道路可达性、开放时段、使用成本以及潜在的群体性准入壁垒，才是决定居民“是否能够实际进入”的关键因素。

（二）实践组织：重复使用构建社会关系网络

“实践组织”机制将个体的、分散的到场行为，转化为稳定的、重复性的社会关系。村 BA、校园联赛、职业球队主场赛事以及日常训练活动，通过其固有的赛制安排、队伍建制、家庭参与及志愿者网络，促使同一物理场地被持续性地、有组织地使用；身体层面的协作、对共同规则的遵守以及集体情绪的交汇与交换，由此逐渐累积并固化为地方性社会信任。因此，沟通密度并非人流量或到场人次的同义替换，而是参与频率、参与主体的多样性以及所形成社会关系的延续性这三者的综合性表征。

（三）叙事转译：地方性实践经验获得跨空间流动性

“叙事转译”机制使得产生于特定地方的社会实践与经验得以突破地理限制，实现跨空间流动。纪录片的功能并非对球场活动进行简单再现，而是通过特定人物的遴选、时间线的叙事化组织，以及篮球术语被赋予运动专业与日常生活经验的双重编码，将伤病、升学、离别、职业选择等个体生命历程，转化为即便非篮球观众也能理解与共情的普遍性生活议题。电视、网络传播平台及赛事直播进一步拓展了此种经验的流动范围，但需指出，平台提供的流量数据仅能说明信息传播的触点数量，无法替代对叙事内容本身及其背后可见性资源分配结构的深入分析。

（四）“情感共建”：多元主体可见性与城市认同的协商性构建

“情感共建”机制指向可沟通城市的公共性生成过程。城市认同并非由冠军队伍、官方机构或传播平台进行单向度的灌输与塑造，而是在内容创作者、直接参与者、其家庭、所在社区以及广大观众的解释、反馈与持续回应中，被动态地协商与构建。^[23]聚焦普通人物的叙事策略，其价值并非在于将个体装饰为城市品牌的符号化元素，而是在于承认并赋予其日常生活经验以解释城市、定义城市的合法性资格。上述四个环节并非线性递进，而是构成了一个相互反馈、彼此强化的循环系统：既有的叙事影响后续对人物与资源的选择，而新生的组织化实践又持续为空间赋予新的意义，从而不断改写城市体育空间的媒介化内涵。

四、结论

本研究以广东省东莞市“篮球城市”为案例，探讨体育空间的媒介化进程。研究表明，该进程并非体育设施建设与媒体平台传播的线性叠加，而是一个包含空间嵌入日常实践、赛事与社群组织化实践反复进行、影像完成经验转译以及参与者共同建构城市意义的连续性社会过程。2024-2025 年间篮球设施数量与相关人口近乎同步的增长，仅能证明物质供给基础的扩大；而由村 BA、校园联赛及职业赛事构成的基层组织网络，以及纪录片《不止是篮球》所实施的长期影像跟拍，进一步表明，单纯的“资源密度”唯有转化为持续性的社会关系与有效的叙事能力，方能构成实质性的“沟通密度”。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将“可沟通城市”的内涵从信息层面的连通性，拓展至身体在场的实践性、社会关系的生成性以及多元主体的可见性；其二，通过引入参与式创作的田野材料，连接了设施研究与叙事研究两个领域，进而提出“空间嵌入—实践组织—叙事转译—情感共建”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本研究亦存在三方面局限：跨年度场地统计口径存在差异；所观察的社交媒体平台内容仅为横截面样本；纪录片访谈主要服务于创作目的，且研究者仅部分参与其中。后续研究可结合统一的场地台账数据、GIS 服务区分析、平台内容概率抽样以及对不同群体的分层深度访谈，以检验各群体在空间使用机会与叙事可见性上可能存在的结构性差异。

参考文献:

- [1]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 Blackwell, 1991.
- [2] COULDRY N, HEPP A. 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M]. Cambridge: Polity, 2017.
- [3] 东莞市人民政府. 2022 年东莞篮球城市文化节新闻发布会[EB/OL]. 2022-07-08.
- [4] 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关于东莞市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第 20230099 号建议答复的函[EB/OL]. 2023.
- [5] 东莞市统计局. 2025 年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6-05-12.
- [6] 东莞市农业农村局. 家门口的乡村体育盛事, 东莞第三届“莞篮村 BA”激情开打! [EB/OL]. 2025-09-15.
- [7] 南方都市报. 双冠加冕! 光明中学“称霸”东莞市中学生(初中组)篮球赛[EB/OL]. 2025-10-23.
- [8] GRAHAM S, MARVIN S. Splintering Urbanism: Networked Infrastructures, Technological Mobilities and the Urban Condition[M]. London: Routledge, 2001.
- [9] 钟怡. 多元传播视角下的城市沟通: 上海人民广场“可沟通性”研究[J]. 现代传播, 2018(9):56-62.
- [10] 杨家明, 赵永华. 空间媒介与城市支离主义实践的转向——基于可沟通性的视角[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5(5):28-34.
- [11] CASTELLS M.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M]. 2nd ed.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0.
- [12] 黄显. 数字地理研究中的媒介和传播: 人与技术的会遇[J]. 新闻记者, 2021(6):15-25.
- [13] 张雪, 杨向荣. 符号化: 空间媒介视阈下的城市形象建构[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1):156-163.
- [14] 金圣钧, 李江梅, 李宇皓, 等. 空间漫游与想象生产: 在线影像中“网红城市”的媒介化建构[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3(5):53-71.
- [15] 苏书杰, 孙仰锡. 城市漫游: 再造青年地方感与媒介化空间生产[J]. 青年记者, 2025(5):25-31.
- [16] 吴云. 共情传播视域下体育纪录片小人物叙事的路径建构——以纪录片《不止是篮球》为例[Z]. 2025.
- [17] 前瞻产业研究院. 2022 年东莞各镇街篮球场馆分布情况[EB/OL]. 2024-10-28.
- [18] 东莞市统计局. 2024 年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5-04-24.
- [19] 东莞市统计局. 2023 年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4-04-12.
- [20]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粤 BA”“粤超”来了: 全民草根尽享低价观赛[EB/OL]. 2026-03-16.
- [21] 南方日报. 摘金夺银! 东城篮球=====

"Communicative City" Perspective on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s of Sports

Space Mediatization: A Case Study of Dongguan as a "Basketball City"

ZHANG Huiwen¹, WU Yun², ZHANG Zhaoxia³

¹ Dongguan City University, Dongguan, Guangdong, China; ² Donggu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Dongguan, Guangdong, China; ³ Dongguan Daily, Dongguan,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prevailing infrastructure-oriented tendency in "Communicative City" research that emphasizes "connectivity over communication," this study reasserts the value of cities as public spaces for dialogu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among diverse groups. Taking Dongguan—a "National Basketball City"—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examines its rich basketball spatial network, ranging from professional arenas to "Cun BA" (village basketball) tournaments, and investigates the full-chain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participatory video practices translate on-site experiences into urban narratives. The study proposes a mechanistic chain of "spatial embedding – practical organization – narrative translation – emotional co-construction." It finds that the mediatization of sports space is a process of continuous coupling among physical space, participatory practices, and media narratives. Individual life experiences and narratives transform basketball spaces into emotional interfaces, facilitating a substantive shift from "resource density" to "communicative density." Urban renewal should transcend a singular economic logic and move toward an inclusive approach centered on the "reproduction of memory," offering important insights for sustaining cultural continuity and shaping a communicative urban identity amid development.

Keywords: Communicative City; sports space; spatial media; mediatization

五育并举视域下成都市小学体育课实践研究

吴常宇¹, 罗宇浩²

(1.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106; 2.四川省邛崃市第一中学校, 四川 邛崃 611530)

摘要:五育并举是新时代基础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理念。“五育并举”的理念下,小学体育课不只是完成身体锻炼、学习技能的任务,而且具有了立德、启智、育美、促劳的综合育人功能。近些年来,成都市不断推进体教融合、学校体育改善以及校园运动空间更新工作,给小学体育课由“技能训练课”转变为“综合育人课”赋予了操作根基。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在梳理出“五育并举”与体育课程核心素养的关系之后,分析了成都市小学体育课实践中的目标融合不深、课堂结构单一、资源利用不足、评价方式狭窄等现象,并提出了以核心素养为指导思想、以“学练赛评”一体化为主线、以校本特色项目为载体、以过程性评价为保障的实践途径。经过研究得出结论,在保证运动负荷和技能学习质量的基础上,把德育、智育、美育、劳动教育融入到体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之中去,使学生在参加体育活动的过程中得到身心的发展、品格的培养以及综合能力的提高。

关键词:五育并举; 小学体育; 成都市; 体育与健康课程; 体教融合

基金项目:2025年度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项目“五育并举视域下成都市小学体育课实践研究”。项目编号: TCCXJY—2025—B15

DOI: doi.org/10.70693/202608179056

一、引言

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重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体育属于“五育”之一,它既是学生身体健康发展的方式,又是培养学生规则意识、合作精神、审美感受、劳动习惯以及健康生活方式的手段。就小学阶段来说,体育课处在学生运动兴趣、基本运动能力以及体育品德形成的黄金时期,其教学质量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学生今后的运动习惯和身心发展。

近些年来,成都市就体教融合、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保障、学校体育特色项目建设等展开持续性的推进工作,使得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体育课时、课间活动、校内外锻炼以及赛事活动变得愈加繁多^[1]。小学体育课不再是简单的跑、跳、投、球类等基本教学任务的完成,而逐渐成为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场所。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课堂上出现的“五育”目标标签化、运动技能碎片化、评价结果单一化的问题。怎样在五育并举的视角之下提升小学体育课的育人效果,是成都市小学体育教学改革必须回答的一个现实问题。

二、五育并举与小学体育课的内在关联

(一) 体育是“五育并举”的基础性支撑

五育并举就是指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不能偏废。体育在五育体系里有特殊的地位,它既指向学生的身体发展,又具备明显的实践性、情境性以及交往性特点,在真实的运动环境当中可以促使学生形成规则意识、团队合作精神、意志力和责任感等品质^[2]。小学体育课中队列练习、游戏竞赛、合作挑战、器材整理等环节都有很多的育人价值。

作者简介:吴常宇(2003—),男,硕士,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

罗宇浩(2002—),男,学士,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

通讯作者:王莎莎

传统的体育课往往被当作“练身体”或者“学技术”的课程来对待。该种认识虽然突出了体育的学科特性，但是削弱了体育综合育人的作用。五育并举视域下体育教学由原来的单向度技能传授转变为“以体育人”，即用运动学习、身体感受、集体活动等方式促进学生体能、认知、情感、审美、劳动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

（二）体育核心素养是五育融合的课程抓手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3]明确指出，体育与健康课程所要培养的核心素养有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运动能力指学生掌握并运用运动技能，健康行为指学生养成科学锻炼、健康生活的习惯以及安全防护意识，体育品德指学生在运动过程中形成的规则意识、合作精神、坚强意志和公平竞争观念。三者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共同成为小学体育课落实五育并举的主要途径。

从五育关系来讲，运动能力属于体育本身的目标准备工作；健康行为同智育、劳动教育有联系，因为学生要懂得健康知识，学会自我管理并且参加实际锻炼；体育品德同德育相联系；动作表现、节奏感、身体姿态、运动美感等都和美育相关联。因此，小学体育课推进五育并举，并不是简单的在体育课上加德育、美育、劳动教育的口号，而是在体育核心素养的基础上重新构建课堂的目标、内容以及评价方式。

（三）成都小学体育课具有区域实践基础

成都市有较好的城市体育文化、赛事资源和学校体育改革的基础。随着成都世界赛事名城建设、体教融合推进、中小学体育活动时间保障要求的落实，学校的体育资源环境和社会关注度也不断提高。一些学校用晨间体育、大课间活动、社团课程、校内联赛、特色项目等方式创建起独具成都特色的校园体育实践活动。

就成都而言，小学体育课的区域优势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体育资源丰富、学校体育改革氛围浓厚、城市社区、公园绿道、公共体育场所较多。这三种条件给小学体育课落实五育并举提供现实依据。

三、成都市小学体育课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教学目标中“五育”融合不够深入

部分小学体育课虽然在教案里有德育、智育、美育、劳动教育的目标，但是课堂上主要就是技能示范、重复练习和达标测试。五育目标容易停留在文本上，没有变成具体的教学任务。以篮球运球为例，教师会提出“培养合作精神”的要求，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大多进行的是个人练习，并没有小组合作、规则讨论以及比赛反思等环节的出现，德育目标也就无法实现。

（二）课堂内容存在碎片化倾向

小学体育课时延长之后，教学内容的量也变大了，但是如果没有大单元的设计，就会造成今天学一点、明天换一项这样的现象。学生虽然接触的项目很多，但是不能真正地掌握一项运动技能。五育并举不是指课堂上内容越多越好，而应该做到教学内容有连续性、结构化、实践性的特点，在不断的学练过程中形成运动的理解、技能的迁移和品格的体验。

（三）学生差异与运动兴趣关注不足

小学阶段学生身体发育、运动基础、性格特点都有很大的差别。一些课堂实行统一的任务、统一的负荷、统一的评价，造成运动能力强的学生“吃不饱”，运动能力弱的学生“跟不上”。时间久了就会产生参与兴趣的分化现象。五育并举是面向全体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所以小学体育课要依靠分层任务、弹性评价和多样的项目来达成不同的学生都可以得到成功的体验。

（四）体育评价仍偏重结果

体育评价在实际的教学当中主要看重速度、距离、次数、分数这些结果性的指标，而忽略学习的过程、合作的表现、规则的遵守、健康的行为以及努力的程度。评价导向过于单一，容易把体育课变成达标训练课。五育并举视角下体育评价要突出发展性、过程性，评价可以体现学生身体素质的变化，也可以反映学生运动习惯、体育道德以及全面发展的情况^[4]。

（五）校内外资源协同仍需加强

成都市一些学校已经对边角空间进行了改造，开放了操场，并且开发了晨间体育活动等来增加运动场所。但是各个学校之间存在着场地、器材、教师、项目等各方面的差别。部分学校的课后服务同家庭体育作业以及社区

体育资源相脱离,导致体育课的育人成效无法延续到课外生活当中去。体育习惯养成要依靠课堂、校园、家庭和社会等多方面来支持,仅仅依靠每周或者每天的课堂教学是远远不够的。

四、五育并举视域下成都市小学体育课的实践路径

(一) 以“健康第一”为核心,重构体育育人目标

成都市小学体育课应该坚持健康第一的思想,把五育目标具体化成可以观察、可以实施、可以评价的课堂行为。体育目标不能被忽视,运动负荷、技能学习、身体锻炼要得到保证;同时德育、智育、美育、劳动教育要融入运动中去,不能只是外加。

就具体的教学目标来说,教师可以采取三维融合的方式进行设计,即第一,技能目标强调“学会什么”,即掌握跳绳、传接球、投掷、跑跳组合等技能;第二,素养目标强调“形成什么”,即规则意识、合作意识、安全意识、坚持精神等;第三,迁移目标强调“用到哪里”,即课间锻炼、家庭运动、班级比赛、健康生活管理等。这样就不会出现五育目标空洞无物的情况了。

(二) 以大单元教学推进“学练赛评”一体化

小学体育课落实五育并举,应该由原来的单课思维转变为大单元思维。教师可以就一个运动项目来安排一系列的学习任务,让学生完成从学技术到勤练再到会赛最后是会评的过程。以四年级“花样跳绳”大单元为例,可以设置基础跳、组合跳、合作跳、创编展示和班级挑战赛等环节。学生在学习动作技术的时候,还要懂得节奏的变化、队形的美、合作的规则以及器材的管理,进而达到体育、美育、德育和劳动教育的结合目的^[5]。

“学练赛评”一体化的核心就是把比赛和评价作为学习的手段。小学阶段的比赛不能过于竞技化,应该以全员参与、分层挑战、团队合作为原则^[6]。评价可以是跳绳次数、动作质量的评定,也可以是小组合作、创编展示、规则遵守、自我反省等多方面内容的考查。既增加了课堂的趣味性又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

(三) 以成都地域资源开发校本体育特色

成都市的小学体育课可以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以及地域文化的特色来开发出具有地方特色的体育课程资源。城市学校可以利用操场、架空层、楼顶运动区、边角空间等开展跳绳、体能循环、趣味跑、软式棒垒球等活动;靠近公园绿道的学校可以组织定向运动、健步走、自然观察和体能活动;有传统文化基础的学校可以推广武术、舞龙舞狮、空竹、棋类等中华传统体育项目。

校本特色项目建设不能只为了展示而存在,应该以全员普及、日常课堂为主。每所学校根据自身师资、场地等条件选择1-2个稳定的普及项目,把它们纳入到体育课、大课间、社团活动以及校内竞赛当中去。经过不断推进之后,学生既可以学会运动技术,又能在项目的文化氛围里产生审美感受、规则观念以及文化认同感。

(四) 以情境化课堂促进德智体美劳融合

小学体育课有天然的情境优势。教师用游戏情境、问题情境、竞赛情境和生活情境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以障碍跑为例,可以创设出一个城市小消防员的情境,在这个情境下完成跨越、钻爬、搬运、合作救援等一系列的任务。学生在运动中锻炼速度、力量、灵敏性的同时也学会安全知识、合作分工、承担责任。

在球类教学中,用小教练、小裁判、小记录员等角色分工来让学生认识规则、观察动作、记录表现、整理器材。这样的一堂课就不再是单纯的传授知识的过程了,它会以学生作出判断、做出决定、做出反思的形式出现;劳动教育也不再是课后的打扫卫生,而是在器材摆放、场地维护和服务同伴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美育也不再只是艺术课上的活动,而是在动作协调、队形变换、运动精神之美中体现出来。

(五) 以分层教学保障全体学生参与

五育并举的基本指向就是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得到全面发展并且具有个性。成都市小学体育课要考虑到学生运动基础的不同,创建起分层的任务体系。教师可以把同一个项目的任务分为基础任务、提高任务和挑战任务。以跳远为例,在基础层上关注起跳、安全落地,在提高层上关注助跑节奏,在挑战层上关注完整的动作和技术以及成绩的提高。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水平来挑选任务,在教师的引导下慢慢提高。

分层教学还要考虑到体弱、肥胖、运动焦虑或者残障的学生能否参与进来。教师可以采用降低器材难度、缩短距离、改变规则、安排同伴帮助等方法来使每一个学生都能有存在感和成功的体验。体育课的公平不是指所有学生完成同样的任务,而是在不同的学生之间找到适合他们的挑战去促进他们的成长。

(六) 以过程性评价完善体育育人反馈

成都市小学体育课应该创建起一种包含结果评价、过程评价以及表现评价的综合评价模式。结果评价是针对学生的体质健康和技能水平展开评定,过程评价是对学生出勤情况、参与状况、努力程度、合作情况以及安全行为等方面的考察,表现评价则是对学生在比赛中所表现出的竞技水平、创作作品等进行评价,并且还要考量学生在生活中所践行的健康生活方式。教师可以创建学生体育成长档案,记载学生一个学期里技能的进步状况、运动的习惯养成情况、课堂上的表现以及自我反省的过程。

评价主体也要多元化。除了教师评价之外还可以采用学生自评、小组互评以及家长反馈的方式。在家庭跳绳或者亲子跑步的任务里,家长可以记录下学生参加的情况,在课堂上学生也可以由同学之间互相打分,从动作是否标准、是否能合作、是否有创意等角度出发给同学评分。多元评价有利于学生认识自己的进步,并且会得到家庭对于学校体育的支持。

(七) 以家校社协同拓展体育育人空间

体育习惯的养成不能单靠课堂来完成。成都市的小学可以依靠社区的运动场所、公园的绿道、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以及公共的比赛场地来创建起家校社三者共同参与的教育体系。学校可以布置适量、易行、低风险的家庭体育作业,比如亲子跳绳、周末健步走、家庭柔韧练习、运动安全知识打卡等。需要注意的是,家庭体育作业不能给学生增加负担,也不能用视频打卡代替真实的锻炼,应该注重兴趣、陪伴、习惯的培养。

同时学校可以邀请社区教练、优秀运动员、体育社团等参加校园体育活动,但是要以教育性、安全性为原则,不能让校外培训逻辑渗透到学校体育当中去。家校社协同的目的并不是将体育课外包出去,而是在课堂教学之外给学生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

五、实践设计示例:小学“花样跳绳”五育融合单元

以成都市某小学四年级“花样跳绳”单元为案例,可以设计出8课时的教学。第一二课时学习单人短绳的基本动作,主要培养学生有节奏感以及安全意识;第三四课时进行双人合作跳和小组接力比赛,主要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规则意识;第五六课时做动作组合和队形创编,让学生感受运动美和团队展示美;第七课时举行班级挑战赛,学生轮流担任运动员、裁判员、记录员和器材管理员;第八课时完成成果展示和成长评价,学生填写自评表并与同伴交流运动收获。

本单元体育目标是跳绳技能和身体素质的提高,德育目标是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坚持练习,智育目标是了解节奏、统计次数、分析动作改善的方法,美育目标是动作协调、队形变换、音乐配合,劳动教育目标是器材整理、场地布置、服务小组。因此五育融合不是削弱体育课的运动属性,而是在高质量的运动学习过程中产生综合育人的效果^[7]。

六、保障机制

首先加强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学校可以通过校本教研、区级公开课、课例研磨、跨学科教研等方式来提高教师五育融合的设计能力。体育教师要会教技能,也要会创设情境、组织比赛、评价学生、保障安全。

其次就是改善校园运动场地。学校可以根据成都校园的空间特点来盘活边角地、廊道、架空层以及小型空地,创建起微运动区、跳绳区、体能训练区等地方,从而把体育活动从单一的操场中解放出来。空间优化要为常态教学服务,不能只是景观化的建设。

再次,健全学校体育管理机制。学校要统筹安排好体育课、大课间、课后服务、社团活动和校内比赛等各方面的体育活动,形成一条完整的育人链条。校内运动会不能只是为少数运动能力强的学生服务,应该设置一些全员参与的项目,让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展示的机会。

最后是加强安全与健康管理工作。小学体育课应该做到适宜负荷、循序渐进、安全教育三者并重。教师要注意天气、场地、器材以及学生的身体状况,在运动前做热身运动,在运动过程中观察学生的情况,并在运动结束后做放松活动来培养学生的科学锻炼意识。

七、结论

五育并举的视角之下,成都市小学体育课改革的重点不是单纯地增加体育课时,而应该提升课堂育人的质量。小学体育课要以体育核心素养为线索,在真实的运动情景里达成德智体美劳的共同进步。成都市有较好的体教融合基础和校园体育改革条件,应该继续推进大单元教学、“学练赛评”一体化、校本特色项目、过程性评价和家校社协同,使小学体育课由“活动型课堂”转变为“素养型课堂”。只有学生在体育课上真正动起来、学进去、赛起来、评得准、爱坚持的时候,才能发挥出体育在五育并举中基础性、融合性的价值,促进小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杨宁,兰林.成都市中考体育改革背景下小学体育创新破局的思考[J].体育教学,2022,42(3):26-28.
- [2] 郝志军,刘晓荷.五育并举视域下的学校课程融合:理据、形态与方式[J].课程.教材.教法,2021,41(3):4-9+22.
- [3] 季浏.我国《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解读[J].体育科学,2022,42(5):3-17+67.
- [4] 王姗姗,李乐虎,王健.大概念统摄下体育与健康课程大单元教学的内涵价值、现存问题及纾解路径[J].体育学刊,2025,32(1):140-149.
- [5] 孙跃银.大单元教学视域下小学篮球“学、练、赛、评”一体化教学的策略研究[J].体育视野,2024,(19):146-148.
- [6] 林聪辉.小学体育“学练赛评一体化”教学策略[J].亚太教育,2024,(19):79-81.
- [7] 周珂,高雨,周艳丽,等.体育与健康课程大单元教学中情境学习的应然取向与实践路径[J].上海体育大学学报,2025,49(8):11-20.

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in Primary Schools of Chengd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Five Aspects

Wu Changyu ¹, Luo Yuhao ²

1.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China; 2 Qionglai No.1 Middle School, Qionglai, Sichuan,China

Abstract: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fiv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for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virtue in bas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Under the concept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five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s is not only a task of physical exercise and skill learning, but also has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functions of cultivating virtue, promoting intelligence, developing aesthetics, and promoting labor. In recent years, Chengdu has continuously promoted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the improvement of school sports, and the renewal of campus sports spaces, providing operational foundations for transforming physical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s from a "skill training class" to a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class".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logical analysis, and case analysis, after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five education and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analyzes the phenomena such as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goals, single classroom structure, insufficient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narrow evaluation methods in the practi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s in Chengdu, and proposes a practical approach guided by core competencies, with "learning, training, competition, and evaluation" as the main line, using school-based characteristic projects as the carrier, and process evaluation as the guarantee. After the research, the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on the basis of ensuring the exercise load and the quality of skill learning, integrating moral education, intellectual educ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labor education into all aspect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can enable students to develop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cultivate character, and improve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in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ng in sports activities.

Keywords: Developing five types of education simultaneously; Prim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Chengdu City;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ourses;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数字政府建设中数据更正的法定职责

——周某诉南京市溧水区民政局、南京市民政局不履行行政登记职责及行政复议案评析

康 璆 垚

(苏州大学, 江苏 苏州 215000)

摘 要: 数字政府建设中, 政务数据共享是提升治理能力的关键路径。然而, 共享过程中难免发生错误, 当错误数据影响公民权益时, 由于数据更正的法定职责现行制度尚不明确, 问题难以顺利解决。本文以周某诉南京市溧水区民政局、南京市民政局不履行行政登记职责及行政复议案为切入点, 分析政务数据共享中职责归属不清、数据质量欠佳、救济渠道不畅三重困境。政务数据更正责任的模糊性来源于数据共享过程涉及的多个部门之间责任边界尚未厘清, 数据质量保障机制缺失, 公民申请更正的程序性权利缺乏制度支撑。为此, 应从明确职责归属、提升数据质量、完善履职标准、拓宽救济渠道四个维度构建系统化的数据更正制度, 将内部问责机制作为责任追究的终点。

关键词: 政务数据共享; 数字政府; 数据更正

DOI: doi.org/10.70693/202608279706

一、引言

随着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基础和牵引的各类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了智慧治理时代。在推进数字府建设的背景下, 政务数据共享作为其中的基础性工程也在快速推进, 政务信息数据的共享整合也被视为提升治理能力的关键路径。对于“政务数据共享”的内涵, 不同研究者和实践者的理解不尽相同,²一般政务数据共享指的是数据在行政机关之间跨越层级、跨越地域、或跨越部门的传输、共享和利用的法律制度。政务数据共享的外延涵盖面较广, 既包括行政机关之间的数据共享, 也包括行政机关面向其他公权力部门、公用企事业单位甚至私主体的数据共享, 而本文讨论的就是行政机关与其他公权力机关的数据共享。

数字政府时代下, 通过政务数据共享, 大量数据汇集在政务数据平台或者 APP, 行政机关之间利用数字平台实现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 完成行政程序并作出行政行为, 加强了政府的管理服务能力。³但是, 如果政务数据错误, 那极有可能导致行政职能的不能履行或错误履行, 给相对人带来权益损害。在政务数据平台的业务办理过程中, 往往一个前置要求不符便可能就无法再往下推进。特别是在自动化行政下, 数据的不准确将导致无法通过系统自动审批, 相对人进而无法使用数据平台系统实现业务办理。当政务数据的质量不能满足社会利用的需求, 甚至影响公民行使权利, 社会公众能否请求行政机关更正信息? 更正的责任主体是谁? 而责任不明也会导致政务

作者简介: 康璆垚 (2001—),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² 在地方立法实践中, 《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2017 年) 第 2 条: “本条例所称政府数据共享, 是指行政机关因履行职责需要使用其他行政机关的政府数据或者为其他行政机关提供政府数据的行为。”此后的《贵州省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湖北省政务数据资源应用与管理办法》《安徽省政务数据资源管理办法》《黔南州政府数据共享开放管理办法 (试行)》等也采取了类似的区别于政府数据开放的方式来定义政务数据公布共享。理论界, 王锡锌认为政务数据共享或称政务数据汇集, 即“各行政机关或部门将其收集的数据在不同行政机关之间传递、移转、汇集, 使数据资源从分到合, 构成整体性的政务数据”。参见王锡锌: 《政务数据汇集的风险及其法律控制》, 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4 年第 3 期, 第 24 页。

³ 参见徐继敏: 《数字时代行政法的发展》, 载《行政法学研究》2024 年第 3 期, 第 87 页。

数据共享推进受阻。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的政务数据共享尽管已经有丰富的实践,但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亟待寻求破解之道。

下文将围绕以周某诉南京市溧水区民政局、南京市民政局不履行行政登记职责及行政复议案(以下简称周某案)为例进行分析,明确数字政府建设中数据更正的法定职责归属,加强数据的动态性和准确性,采取措施保障政务数据更新更正,这对于保障公民权益、提升政府行政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二、案件事实和判决的整理

(一) 事实概要

周某于2016年6月在被告南京市溧水区民政局(以下简称溧水区民政局)登记结婚,于2020年8月在江苏省江宁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开区法院)调解离婚,法院作出了民事调解书,并且已生效。

2020年11月25日,周某通过“我的南京”手机APP办理公积金业务时,发现公积金系统显示其为已婚状态,导致其不能线上办理提取公积金事项,须本人现场带离婚资料才能办理。周某遂拨打南京12345政务热线反映情况,要求公积金账户可以联网查询到婚姻状况,于是工作人员回访答复周某称:经联系相关业务部门,反馈目前数据在各部门间无法共享,线上暂时无法查询和办理。

2021年初,周某通过手机支付宝APP查询“江苏政务婚姻登记信息”发现,其婚姻登记查询结果仍为“结婚登记”并有配偶身份信息,办理机关为溧水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并备注:所查询信息为在江苏省内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的当前记录,不作婚姻记录证明用途。于是周某再次通过南京12345平台反映,经法院判处的离婚信息,婚姻登记系统数据没有更新,其仍然需要带着离婚调解书办理各项事宜等问题。溧水区民政局回访答复周某,认为周某是需要法院将离婚信息与其他部门共享,遂反馈至江开区法院办理。

2021年5月20日和5月28日,周某又两次投诉溧水区民政局,要求更改婚姻登记系统信息,均被溧水区民政局答复并拒绝要求。

为此,周某向南京市民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但南京市民政局驳回了周某的行政复议申请,认为周某的诉求不属于溧水区民政局职责范围。周某遂向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江北新区人民法院判决周某胜诉,撤销被告南京市民政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责令被告溧水区民政局根据法院调解离婚信息对婚姻登记信息系统中周某的婚姻信息采取更正措施。后南京市民政局不服一审判决,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 案件争点

本案主要诉讼争点是根据法院判决调解离婚信息更改婚姻登记系统的对外共享的婚姻信息是否是溧水区民政局的职责。

被告方行政机关认为,原告周某的诉求不属于被告的职责范围,原告的诉求涉及法院判处的离婚信息对外与其他部门共享的问题,不属于被告的职责范围。同时《婚姻登记条例》中也无由民政部门对法院调解离婚进行登记的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婚姻登记系统中的婚姻信息实质上是婚姻登记档案记载内容的呈现,并非当事人真实、客观的婚姻状态,可能与当事人实际婚姻状况信息不一致。民政部门仅对外共享其婚姻登记信息,并不对外共享法院判决调解离婚信息,没有按照法院调解书更改婚姻登记信息的职责。

一审法院则认为,《婚姻登记工作规范》中民政部加强了婚姻登记规范化管理,法院判决调解离婚信息属于婚姻登记档案的一部分,所以婚姻登记机关应将法院生效文书复印件存档并将相关信息录入婚姻登记信息系统,所以原告周某的诉求属于被告溧水区民政局的职责范围。此外,根据《民法典》规定,溧水区民政局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负有保证个人信息准确、完整的义务,因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信息处理活动导致其个人信息不完整时,个人请求更正、补充其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对予以核实,并及时更正、补充。所以溧水区民政局应当按照原告周某的诉求,据实登记周某的婚姻状况,将婚姻登记系统中婚姻状态更正为离婚。

三、周某案反映的政务数据共享问题

前文对周某案的案件事实与争点进行了梳理,透过该案可以发现,政务数据共享中的错误数据更正并非个别问题,而是折射出制度层面的系统性困境。以下从职责归属、数据质量和救济渠道三个维度,逐一剖析周某案所暴露的深层问题。

（一）职责归属不清

在周某案中，复议机关与法院对更正错误数据是否属于民政部门职责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反映出制度层面在政务数据共享中数据更正的义务主体缺位，整合更新的职责归属划分不清。本案中，面对相对人更新更正错误数据的请求，溧水区民政局在面对周某请求，提出了多种理由来表明本机关不具有此职责，无法更改系统数据。相关机关的多次推诿，导致最终没有具体公权力主体回应相对人需求、承担处理数据的责任。

本案最终判决要求在婚姻登记领域，婚姻登记机关应当负有对婚姻信息管理的义务。但类似的数据错误问题不仅只存在于婚姻登记领域，只要涉及政府数据共享的领域，都有可能出现，比如吸毒领域和养老保险领域。那么只要有错误的数据出现，就必然涉及到更正数据的责任归属问题。当政府数据信息出现问题影响了相对人权益实现，行政机关是否需要对此承担责任？在王莉诉昭通市公安局昭阳分局公安行政管理案中，王莉因身份信息被案外人冒用，被昭阳分局误录入吸毒人员信息库。昭阳分局在核实错误后，将信息从本级管理的信息库中删除。但由于吸毒人员信息库实行全国统一管理，信息已被共享至户政、交通等其他子系统。昭阳分局先后三次按照内部程序提请上级公安机关删除错误信息，均未获成功。⁴在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检察院诉阜阳市颍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不履行养老保险金监管职责公益诉讼案中，颍东区人社局没有依照规定及时停发部分死亡人员的养老保险并进行更新注销，存在冒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情形。此保险金案最终由人社局承担与其他部门沟通协调，定期提取死亡、户籍注销、领取职保待遇等数据并持续进行更新的职责。⁵但以上案例都说明，现行制度在数据更正的职责归属上仍存在模糊地带，尤其是当使用政府共享的数据涉及多个部门时，原始生成机关、数据使用机关与整合管理机关之间的责任划分缺乏明确规范，数据更正的法律职责归属不清。

（二）数据质量欠佳

在周某案中切实体现了政务数据的更新滞后直接影响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导致数据质量下降，无法满足社会公众的实际需求，其实本案最直接的解决方式就是更新数据。政务数据需要定期更新以保持其时效，但实际操作中可能因为人力、物力资源限制、相关机关更新意愿消极不重视、数据更新工作复杂等原因，导致数据更新不及时，质量下降。此外，周某案中二审法院查明溧水区民政局当时使用的江苏省婚姻登记管理信息系统中的“法院记录查询”模块里，录入了周某的生效调解书。但溧水区民政局并未对外公开跟其他部门共享此模块的信息，导致公民和其他部门平台无法联网查询到此信息。这说明导致数据质量不佳还有两个原因：首先，数据系统的模块栏目设置存在问题，过于细化类型，信息没有进行全面整合，不便于日常工作使用，这也给了行政机关推诿责任的理由。第二，行政机关对外公开范围过窄，政府部门间数据共享不畅，导致其他部门能获得的或者数据平台公开显示的信息并不完整。数据的完整性、一致性也是影响数据质量的重要因素。在实践中，政务数据出现质量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系统平台本身设置可能出错，信息对外开放共享不够充分，原始数据本身错误等等。行政机关之间难以实现完全的实时共享，必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数据共享载体、格式及数据更新周期的标准规范，不同部门对政务数据的整理方式、收集标准和存储格式并不一致，对政务数据共享的理解和配合程度，也存在显著差异，这些都导致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最终无法互验、互校、互用。⁶缺乏相对应的数据质量保障机制，容易导致数据的完整性、一致性、及时性出现问题，进而使使用该共享数据的相关主体在履职过程中损害相对人权益的实现。

（三）救济渠道不畅

为了避免因为政府数据质量不佳影响相对人权益，行政机关应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相对人又应当如何才能解决问题、获得救济？周某历经六次投诉、一次行政复议、两审诉讼才获得救济，维权成本过高。这一困境反映出，当前当政务数据错误影响公民权益时，缺乏高效的救济途径和便捷的更正程序。从各地现有制度来看，对于政务数据错误，投诉、申诉等救济形式使用频率较高。因其耗时短、程序简单、主体限制较小，在相对人对政府机构工作不满意或认为工作违法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均可通过上述方式维权。然而，由于效力层级较低，

⁴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2018）云0602行初98号行政判决，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6行终82号行政判决。

⁵ 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法院（2020）皖1203行初66号行政裁定书。

⁶ 参见游路：《政府部门信息共享的现实难题与法治保障》，载《行政管理改革》2022年第8期，第66页；彭鐸：《论政务数据共享的推进与边界》，载《交大法学》2023年第6期，第65页。

成效不够显著,较难达到申请人的预期结果。正如周某案所示,相对人往往还需要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其他救济渠道来全面保障合法权益。随着《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的修订,信息公开已被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政务数据错误的救济途径也进一步拓宽。但在实践过程中,行政复议的维持率仍然居高不下,周某案中复议机关便未实现自我纠正的成效。

当前我国政务数据共享领域,对数据提供部门与数据使用部门在数据共享过程中究竟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拥有哪些权力、因数据共享产生的问责究竟由谁启动等问题均缺乏明确的相应法律规定,这种法律模糊导致一些政务部门在数据共享中出现数据错误、数据泄露、数据误用等问题,可能无法明确追责或追责过度。7周某案中,溧水区民政局正是借助这种法律模糊,反复以“不在职责范围”为由拒绝处理周某的更正申请,而复议机关亦以同样理由维持,致使周某不得不诉诸法院。并且,仅仅依靠传统行政复议和诉讼的事后救济,难以满足相对人及时更正错误数据的需求,有必要在传统救济途径之外,构建更为便捷高效的数据更正申请渠道。

四、政务数据共享问题的制度完善

针对上述三重困境,亟需从制度层面予以回应。周某案的判决为数据更正职责的界定提供了司法参照,但个案裁判的效力有限,有必要在此基础上构建系统化的制度方案,以下从职责归属、数据质量、履职标准和救济渠道四个方面展开。

(一) 明确数据更正的职责归属

政务数据共享涉及数据的收集、提供、接收、使用等多个环节,不同环节中的不同机关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当共享数据出现错误时,首先需要明确谁负有更新义务。

周某案最终判决溧水区民政局承担对周某婚姻登记信息进行更正的法定职责。判决明确法院判决调解信息属于婚姻档案信息的一部分,而溧水区民政局作为行政机关民政部门,也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依据《婚姻登记工作规范》和《民法典》,对于其主管范围内的婚姻信息,在当事人持生效裁判文书申请更正婚姻登记信息时,应当及时处理婚姻登记信息的变更。并且,信息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更新联网平台系统,实现不同部门间的信息共享。我们可以从周某案的最终判决中总结出政务数据共享的以下原则:行政机关不仅是信息共享的接受者,将职责范围内的信息登记录入并整合完善是其基本职责;同时,作为信息提供者,将更新后的信息及时联网共享给其他部门,一网共通,也是其不可推卸的义务。

从更广的视角看,这也启示如何合理构建政务数据提供部门和使用部门等部门之间的责任分担规则。在政务数据共享的背景下,数据更正责任的确立应当遵循“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数据的原始提供机关负责信息的初始录入,保障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确保所提供的信息与本部门所掌握的信息一致;而数据的管理机关,一般也是数据平台的管理者,则负有对汇集在其平台上的信息进行动态更新、整合和存储,确保对外共享数据准确性的职责。⁸数据主管机关与行政机关内部具体部门的职能分工具有同构性,正如民政部门负责全部婚姻登记信息的管理,公安机关负责吸毒人员信息的管控。这意味着,“主管”责任与“提供”责任应当适度分离,提供机关对其采集数据的真实性负责,主管机关则对汇集在其平台上的全部数据的动态准确性负责。当数据错误涉及跨部门流转时,主管机关应主动协调原始提供机关核实更正,而非以“数据非我生成”为由将申请人拒之门外。合理的责任机制架构,有助于打消行政机关的共享顾虑以及社会公众的维权焦虑,确保数据共享有序展开。

(二) 保障政务数据质量

周某案明显体现出政务数据质量深刻影响公众权益实现,而提高政务数据质量与增强数据的及时性息息相关。在政府信息公开上,我国地方政府很多省市专门制定了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等专项立法。在数据信息质量保障方面,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信息化标准建设行动计划(2024—2027年)》,旨在完善国家信息化标准体系,其中包括对数据质量标准的规定,通过标准化手段提升数据质量。为了确保政府数据信息的有效管理和利用,笔者认为应当进一步完善政务数据法治保障体系,从零散的政府数据信息的相关政策法规到成体系的保障制度的转换。

具体讨论政府数据质量问题,结合周某案,笔者认为应当明确数据的完整性、一致性、及时性为要求政府数

⁷ 参见邢会强:《政务数据共享与个人信息保护》,载《行政法学研究》2023年第2期,第11页。

⁸ 参见游路:《政府部门信息共享的现实难题与法治保障》,载《行政管理改革》2022年第8期,第71页。

据质量的核心原则和标准。完整性要求数据信息必须是全面的,没有遗漏,这对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全面的分析和决策尤为重要。一致性则确保在不同的系统和报告中,相同的信息保持一致,避免因数据冲突或重复而引起的混淆。及时性保证数据信息保持最新状态,确保相关部门在需要时可以依赖最新数据作出反应。这些原则的制定不仅促进了数据的标准化处理,也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对于提升政府数据的质量和公众信任至关重要。

另外,笔者认为针对于某一专项政务主题的数据,应当在垂直领域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数据库。专项数据库,比大而全的数据库,更能精准对接此领域涉及到的相关公权力部门,加强数据互联互通。建立此类专项数据库,既方便该领域主管机关统一更新数据,确保数据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也便于优化精简系统,删去冗余模块设置,帮助数据整合。在专项数据库基础上,可以建立数据矫正的协同机制,由该政务主题涉及的相关部门上下级共同参与数据更新工作,各部门在系统上提交更新的数据,主管机关“一对多”统一整合数据进行最终的更新登记,确保系统数据实时更新、实时共享。这样将减轻数据更新工作,避免增加信息更新成本和工作量,才能提高政务数据变动主体主动配合更新的意愿。⁹

同时,还需要完善政务数据系统的对外平台或 APP,使其他部门和社会公众都能联网查询准确的信息并使用,加强政务数据的互联互通,进而给公民提供更精准更便利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在涉及个人信息的领域,应确保数据流通畅通无阻,对外公开也能方便公民查看确认政务数据中涉及个人信息的部分,督促相关行政机部门及时更正,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和及时性。

(三) 完善数据更正的履职标准

在周某案中,法院以该行政机关未及时更正信息,认定该单位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那么该单位在进行政府数据共享时,应该如何避免错误数据问题的发生,错误发生后又应如何解决问题,以至于满足履行法定职责的要求。

首先,行政机关应当实现建立对政务数据的监督和评估机制。监控数据信息收集流程,评估数据质量并作出调整。利用计算机系统与自动化技术,定期审查现有数据,检测发现的异常和错误,自动进行数据矫正。也就是说,在各部门手动执行矫正之外,一定程度上开发利用自动化技术,利用算法提高校正的效率和准确性。从数据的录入当下和共享之前,就尽量避免政务数据出现问题。

政府相关部门应就政务数据更正规定统一的事项办理流程,明确对申请受理、核查、答复等各处理流程环节的办理方法,统一规定答复的时限等内容。而对于个人申请发起的数据更正,可根据个人信息主体意欲修改的个人信息的重要性、敏感性等方面特点合理划分核查标准,对数据更正进行分级处理。若个人信息主体请求更正补充的信息比较简单,且提交的证据能够使受理机关独立判断信息真实性的,受理机关可核实后径自进行数据更正。这样,相对人根据公开的核查标准准备证明材料,既可提高其请求通过核实的成功率,也避免办事“跑断腿”情况发生,更好地响应国家“一件事、一次办”的政务服务要求。

(四) 拓宽数据更正的救济渠道

拓宽政务数据共享的公民救济途径,尤其在涉及个人信息的领域,建立数据更正的个人申请渠道。笔者认为可以在投诉、复议、诉讼等救济途径之外,建立一条公民直接对行政机关的反馈渠道。对于政务数据中涉及个人信息的部分,通过公众参与发现数据信息中的问题,直接反馈给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行政机关,凭借有效的证明材料申请改正,行政机关及时矫正以避免损害进一步扩大。公民能够通过便捷的途径请求更正,避免通过复杂的行政复议或诉讼程序进行维权,有利于减少政府信息数据错误带来的争议和纠纷。打通行政机关直接更改的程序的同时,也要明确个人申请更正数据的流程参照上文的数据更正流程规则。对于政务数据共享中的个人信息数据建立个人申请更正渠道,既保障了个人信息的程序性权利,避免权利停留在纸面,也加强社会公众对政务数据共享的参与和监督,以便在发现违法或不当处理时及时纠偏。¹⁰

行政机关在解决相关问题后,应调查问题原因进行内部追责。鉴于政务数据共享具有体量大、事后纠错难度高的特点,建基于行政系统之上的问责机制更具有优势。将问责机制沿用到政务数据共享工作中,加强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严格遵循“谁开放,谁负责”“依法问责,有责必改”的责任原则,防止踢皮球现象发生。对于在

⁹ 参见彭铮:《论政务数据共享的推进与边界》,载《交大法学》2023年第6期,第65页。

¹⁰ 参见王正超:《涉个人信息政务数据共享活动中比例原则的适用》,载《法学》2026年第2期,第60-61页。

数据开放过程中未按照规定履行职责的，在立法上可以有以下方式来进行规定：情况较轻的由政府数据主管机关进行诫勉谈话和批评教育，责令相关人员限期整改并反馈整改情况；5 日内未按要求整改的，由主管机关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造成恶劣的影响或者重大损失的，由主管机关提请本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五、结语

周某案是一起因政务数据共享中数据错误引发的典型案件，集中揭示了数据质量保障机制缺失、数据更正法定职责不明、公民救济渠道不畅等深层次问题。本案判决确认了行政机关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对主管范围内数据的法定更新义务，为同类案件提供了有益参照。然而，个案判决的示范效应终归有限。从根本上解决政务数据共享中的数据质量问题，需要真正解决整体政务数据共享中更正数据的法律责任问题。数字政府建设不应仅仅追求数据流动的效率，更应关注数据的准确性与公民权益的保障。唯有在法治框架下厘清数据更正的责任边界、完善质量保障机制、畅通救济渠道，方能推动政务数据共享从“量”的积累走向“质”的提升，真正实现便民利民的制度初衷。

参考文献：

- [1] 王锡锌：《政务数据汇集的风险及其法律控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4 年第 3 期。
- [2] 徐继敏：《数字时代行政法的发展》，载《行政法学研究》2024 年第 3 期。
- [3] 游路：《政府部门信息共享的现实难题与法治保障》，载《行政管理改革》2022 年第 8 期。
- [4] 彭鐔：《论政务数据共享的推进与边界》，载《交大法学》2023 年第 6 期。
- [5] 邢会强：《政务数据共享与个人信息保护》，载《行政法学研究》2023 年第 2 期。
- [6] 王正超：《涉个人信息政务数据共享活动中比例原则的适用》，载《法学》2026 年第 2 期。

Legal Duties of Data Correction in Digit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Zhou v. Nanjing Lishui Civil Affairs Bureau and Nanjing Civil Affairs Bureau for Failure to Perform Administrative Registration Duties and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KANG Miaoyao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government data sharing has become a key pathway to enhancing governance capacity. However, errors inevitably occur during data sharing. When such errors adversely affect citiz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existing legal framework fails to clearly define the statutory duties for data correc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to rectify such errors smoothly. Taking the case of Zhou v. Nanjing Lishui Civil Affairs Bureau and Nanjing Civil Affairs Bureau for Failure to Perform Administrative Registration Duties and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as the point of entr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ree intertwined dilemmas in government data sharing: ambiguous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ies, inadequate data quality, and ineffective remedy channels. The ambiguity of responsibility for data correction stems from unclear boundaries among multiple departments involved in the data-sharing process, the absence of data quality assurance mechanisms, and the lack of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citizens' procedural rights to request correction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a systematic data correction regime should be constructed along four dimensions: clarifying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improving data quality, refining performance standards, and expanding remedy channels, with internal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serving as the ultimate point of liability pursuit.

Keywords: government data sharing; digital government; data correction

健康中国背景下城市社区老年体育服务供给困境与优化路径 ——基于政策文本与相关文献的分析

梁积铭¹, 韩晨¹, 罗俊杰¹, 吴炫轶¹

(1.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要: 在健康中国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 城市社区既是老年人日常体育参与的重要生活场域, 也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向基层延伸的重要载体。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政策文本分析法和逻辑分析法, 在梳理健康中国、全民健身、老年体育公共服务及体卫融合相关政策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构建“需求适配—服务能力—健康协同—多元治理”分析框架, 对城市社区老年体育服务供给的现实基础、主要困境及优化路径进行分析。分析认为, 当前城市社区老年体育服务供给已由单纯场地设施配置逐步向健康促进与综合服务拓展, 但仍面临老年群体需求分层与服务供给同质化并存、设施适老化与专业指导能力不足、体育服务与基层健康管理衔接不充分、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此, 应完善需求识别与分层分类供给机制, 推进适老化空间与专业指导协同建设, 构建体卫融合的老年运动健康服务链, 并健全政府引导、社区落实、社会组织参与、医疗机构支持和家庭协同的治理机制, 以提升城市社区老年体育服务供给的精准性、专业性与可持续性。

关键词: 健康中国; 城市社区; 老年体育; 公共体育服务; 体卫融合

DOI: doi.org/10.70693/202608175751

一、引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 老年群体的健康维护、社会参与和生活质量提升已成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议题。体育锻炼具有参与门槛相对较低、日常可持续性较强和兼具身体活动与社会交往等特点, 在促进老年人主动健康、延缓身体机能衰退和拓展社会交往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对多数城市老年人而言, 社区及其周边公园、广场、健身步道和基层公共服务设施具有距离近、使用成本低、日常可达性强等优势, 因此, 城市社区是老年体育公共服务落地的重要基层空间。

国家层面的健康、全民健身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为社区老年体育服务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强调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推动健康服务模式由疾病治疗向健康促进转变^[1]; 《全民健身计划 (2021—2025 年)》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增加群众身边的健身场地设施供给, 提高健身设施适老化程度, 推广适合老年人的健身体闲项目, 并推进科学健身指导与体卫融合^[2]。此后, 《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进一步要求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提升老年文化体育服务质量^[3]; 《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强调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纳入社区服务体系、推动优质资源向基层延伸, 并提出全龄友好和深化体卫融合^[4]; 2024 年出台的《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又将丰富老年文体服务、完善适宜老年人的体育活动和场地供给纳入老年福祉提升的重要内容^[5]。由此可见, 老年体育服务的政策目标已不再局限于“有场地、能活动”, 而是逐步转向更加安全、便利、精准、科学和健康导向的综合服务。

现有研究从老年体育参与、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智慧服务和体卫融合等不同侧面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杨凡等从体育锻炼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入手, 揭示老年人体育参与受到个体、家庭与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6]; 范成文等通过比较发达国家老年体育服务社会支持体系, 强调政府、社会组织和社会支持网络在老年体育服务中的作用^[7]。在社区服务层面, 刘玉围绕社区老年智慧体育服务系统展开研究, 突出信息技术对老年人需求识

作者简介: 梁积铭 (2002—), 硕士, 研究方向为: 老年体育;
韩晨 (1988—),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 体育人文社会学;
罗俊杰 (2003—), 硕士, 研究方向为: 体育教学;
吴炫轶 (2001—), 硕士, 研究方向为: 体育教学。

通讯作者: 韩晨

别、资源整合和服务供需衔接的支撑作用^[8]；张小沛等从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出发，提出应将服务供给端与居民运动健康需求端有效衔接，并通过多元共治、科技赋能和监督评估提升服务效能^[9]。在健康协同层面，姜桂萍等梳理体卫融合的发展脉络与现实困境^[10]；李璟圆等以运动处方门诊为例讨论体医融合的内涵与实施路径^[11]；龙佳怀、刘玉从全生命周期视角探讨体医融合服务系统平台构建^[12]；李治等则直接聚焦体卫融合服务老年群体常见慢性疾病防治，指出需求多元、精准供给不足以及跨部门协同等仍是深化服务的重要问题^[13]。上述研究为本文从需求、服务、健康与治理四个维度展开分析提供了较为扎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但从本文所梳理的代表性文献看，既有研究较多分别讨论老年人体育参与、设施供给、社会支持或体卫融合，对城市社区这一具体基层场域中“需求识别—服务供给—健康支持—协同治理”之间的内在联系仍缺乏整合性分析。尤其是在老年群体内部差异扩大、慢性病管理需求增加以及基层治理强调多主体协同的背景下，仅从增加设施或丰富活动项目的角度讨论社区老年体育服务，已难以完整回应服务质量提升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政策文本分析法和逻辑分析法，以相关政策文件和代表性研究成果为主要依据，从需求适配、服务能力、健康协同和多元治理四个维度分析城市社区老年体育服务供给的现实困境，并提出相应优化路径。

二、城市社区老年体育服务供给的现实基础

（一）政策支持由基本健身保障向全生命周期健康促进延伸

健康中国、全民健身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持续强化体育在健康促进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强调健康服务由疾病治疗向健康促进转变^[1]，《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进一步把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科学健身指导、适老化服务和体卫融合纳入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内容^[2]。《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推动优质服务资源向老年人的身边、家边和周边聚集，并明确提升老年文化体育服务质量^[3]；《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则进一步要求夯实社区全民健身基础、落实全龄友好理念、提高健身运动专业化水平并深化体卫融合^[4]。这一政策演进表明，社区老年体育服务的目标已经由提供基本锻炼条件，逐步扩展到改善运动环境、提升服务可及性、降低参与风险、提供科学指导和促进慢性病健康管理等方面，为基层老年体育服务提质升级提供了更加完整的制度依据。

（二）社区成为老年人日常体育参与和社会交往的重要空间

相较于专业体育场馆，社区及其周边公共空间更符合老年人日常活动半径和生活节奏。广场、公园、健身步道、小区公共空间和老年活动中心等场所，既承担身体锻炼功能，也承载邻里互动和社会交往功能。相关研究表明，老年人体育参与受场地设施、休闲空间和社会支持等因素影响^[6,7]。因此，城市社区老年体育服务的价值并非单纯增加运动机会，而在于将体育活动嵌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网络，使其能够以较低时间和经济成本持续参与。

（三）服务内容呈现由活动组织向健康支持拓展的趋势

随着主动健康理念普及，老年体育服务的内容正在由传统的器材配置和群众性活动组织，逐步拓展至科学健身指导、运动风险评估、慢性病运动干预和康复辅助等健康支持领域。《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提出推动体卫融合，探索体育和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的运动促进健康模式，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也将运动促进健康、慢性病运动干预和医疗机构运动康复能力建设作为重要方向^[2,4]。相关研究进一步指出，体卫融合不能停留在部门合作层面，而应通过运动处方、风险分层、信息共享和专业转介等环节形成连续服务^[10,11]；全生命周期体医融合研究则提示，应根据不同年龄与健康阶段配置差异化的运动健康支持^[12]。这为社区老年体育服务从“活动供给”向“运动健康服务”转型提供了现实基础，同时也对基层专业人员、组织协同、技术标准和服务规范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城市社区老年体育服务供给的现实困境

（一）需求分层与服务供给同质化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

老年群体并非内部同质的服务对象。不同年龄阶段、身体机能、慢性病状况、运动经验和兴趣偏好的老年人，对体育项目、运动强度、服务时间和专业指导的需求存在明显差异^[6,8]。相对健康、运动能力较强的低龄老年人可能更倾向于健步走、乒乓球、气排球、游泳和骑行等项目；高龄老年人、慢性病老年人以及行动能力受限者则更需要低冲击、可控强度和具有康复辅助属性的活动。现有相关研究已注意到老年居民休闲体育活动与社区设施、活动内容和个体差异之间的联系^[6,8]。

然而，从现有研究和基层实践讨论看，部分社区的体育活动供给仍以广场舞、太极拳、健步走等组织成本

较低、覆盖面较广的常规项目为主,对不同群体的需求识别和分类供给不足。这种供给方式能够满足基本参与需求,但容易出现“项目有供给、个体不匹配”的情况。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研究强调,供给端只有与居民运动健康需求端形成稳定连接,才能真正提升服务效能^[9];社区老年智慧体育服务研究也表明,需求信息的持续收集、整理与反馈是实现精准供给的重要前提^[8]。现实中,社区体育服务仍较多关注活动是否开展和参与人数等显性指标,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风险水平、运动偏好和持续参与意愿缺乏动态识别。由此,服务供给容易停留在一般化、标准化层面,难以实现由普惠覆盖向精准适配转变。

(二) 设施适老化水平与专业服务能力尚未同步提升

场地设施是老年体育参与的基础条件,但“有设施”并不等同于“适合老年人安全使用”。部分社区健身设施在器材强度、操作说明、地面防滑、夜间照明、休息座椅、扶手、无障碍通行和紧急处置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对于平衡能力下降、关节功能受限或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而言,普通成人健身设施若缺乏适老化设计和风险提示,可能增加使用难度和运动风险。因而,社区老年体育设施建设需要从数量供给进一步转向安全性、便利性与可使用性的综合评价^[2,4]。

与此同时,专业指导服务不足是影响老年体育服务质量的重要环节。老年人的运动方式、强度和时间应当与身体状况相适应,尤其是慢性病人更需要专业风险提示和个体化建议^[11,13]。当前部分社区体育活动仍主要依靠居民自发组织,社会体育指导员、运动康复人员和基层健康专业人员的持续参与不足。设施建设可以通过一次性投入较快完成,而专业服务需要稳定的人力配置、培训机制和经费支持,二者投入逻辑不同。若硬件建设与专业服务不同步,就容易形成“设施可见、指导不足”的供给落差。

(三) 体育服务与基层健康管理衔接仍不充分

老年体育服务与普通群众健身服务的重要区别,在于其对健康风险识别和慢性病管理具有更高要求。对于高血压、糖尿病、骨关节疾病等常见慢性病老年人,运动既具有健康促进价值,也需要明确适宜强度、禁忌事项和风险边界^[11,13]。因此,社区老年体育服务不宜停留于单纯“组织活动”,而应与健康评估、运动建议、过程观察和效果反馈形成必要衔接^[10,11,13]。

从体卫融合相关研究看,体育与医疗卫生部门之间仍存在管理体系、专业标准、资源配置和服务流程等方面的衔接难题^[10]。面向老年常见慢性疾病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当前体卫融合服务还存在技术普及和复制难度较大、重治疗轻预防、供给粗放而精准服务不足等问题,说明老年运动健康服务不仅需要“有合作”,更需要可操作的专业流程与质量控制^[13]。落实到社区层面,体育活动组织者通常难以获得必要的健康评估信息,基层医疗机构也未必建立将适宜运动指导嵌入日常健康管理的稳定机制。由此形成的结果是,体育服务与健康服务在同一社区内并行存在,却未形成连续的运动健康服务链。体卫融合若缺乏明确的工作边界、转介机制、技术标准和责任主体,容易停留在理念倡导层面。

(四) 多元主体参与尚未转化为稳定的协同治理机制

城市社区老年体育服务涉及政府部门、基层社区、体育社会组织、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和志愿者等多类主体。范成文等对国外老年体育服务社会支持体系的研究表明,多主体支持和社会网络是提升老年体育服务的重要条件^[7]。从公共服务治理角度看,多元主体参与的价值不仅在于增加资源数量,更在于形成专业分工、资源互补和稳定协作。

但在实际运行中,部分社区老年体育活动仍较多依赖社区工作人员或老年人自发组织,体育社会组织、医疗机构和家庭的参与具有一定临时性。政府部门偏重政策和资金支持,社区承担组织协调,医疗机构掌握健康专业资源,体育社会组织具备项目与师资优势,不同主体之间如果缺乏明确的职责边界、信息沟通和常态化合作安排,就难以形成稳定的服务闭环^[9]。由此可见,当前需要解决的并不只是“参与主体不够多”,而是如何将分散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协同供给能力。

四、健康中国背景下城市社区老年体育服务供给的优化路径

(一) 建立需求识别与分层分类供给机制,提升服务适配度

提升城市社区老年体育服务质量,应首先改变以项目供给替代需求识别的传统逻辑。社区可结合老年人口结构、日常参与情况和健康服务需求,建立基础体育服务清单与需求动态反馈机制,在尊重隐私和自愿参与的前提下,掌握不同老年群体在项目类型、活动时段、场地使用和专业指导等方面的基本需求。需求识别不宜仅依赖一次性登记,而应通过日常活动反馈、社区议事和定期更新形成持续调整机制^[8,9]。

在此基础上,可按照身体活动能力和健康需求进行分层分类供给。对于身体状况较好、运动经验较丰富的老年人,可增加乒乓球、气排球、健步走等兼具锻炼和社交功能的项目;对于高龄或活动能力下降者,可提供太极拳、八段锦、柔力球、平衡练习和低强度力量训练等项目;对于存在慢性病风险或康复需求者,则应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安排适宜运动^[11,13]。可借鉴社区老年智慧体育服务研究的思路,将基础信息、锻炼偏好、健康风险和服务反馈纳入持续更新的需求信息体系,用于辅助项目匹配、课程安排和资源调度^[8]。但数字化应当服务于精准供给而不是替代面对面服务,平台可用于发布课程、预约场地和收集需求,同时应保留线下登记、电话咨询、纸质告知和志愿者协助等渠道,并注意个人健康信息的必要性、授权范围与安全管理,避免数字化服务形成新的参与门槛。

(二) 推进适老化空间与专业指导协同建设,强化安全服务能力

社区体育设施适老化改造应从“器材增量”转向“空间整体可用”^[2,4]。在器材选择上,应优先考虑动作幅度可控、操作说明清晰、风险较低的健身器械;在环境改造上,应同步完善防滑地面、休息座椅、扶手、照明、无障碍通道、清晰标识和必要的应急设施对于空间资源有限的老旧社区,可通过微更新方式盘活边角空间和闲置场地,形成小型、分散、步行可达的老年体育活动点,使适老化真正落实到完整的使用过程。

硬件建设之外,应提升基层科学健身指导的稳定性。社区可依托社会体育指导员,并根据条件引入运动康复人员、社区医生等专业力量,围绕动作规范、运动强度、风险识别和常见慢性病运动注意事项开展常态化指导^[2,11,13]。对于专业人员不足的社区,可通过片区共享、定期巡回指导和集中培训等方式提高专业服务覆盖率。其核心不是让每项活动都实现高度医疗化,而是建立与老年人风险水平相匹配的基本安全指导和专业转介机制^[10,11,13]。

(三) 构建体卫融合的老年运动健康服务链,推动服务由健身向健康促进延伸

体卫融合应从部门合作口号转化为可执行的基层服务流程。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体育服务资源,可探索建立“健康评估—风险分层—运动建议—过程指导—效果反馈”的老年运动健康服务链^[10,11,13]。全生命周期体医融合研究所强调的平台化、连续性思路对社区具有启示意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重点承担健康风险识别、慢性病管理和必要的医学建议,体育服务主体负责适宜运动项目组织、动作指导与参与反馈,社会体育指导员、运动康复人员等在明确资质与职责边界的基础上参与服务,各主体通过信息沟通、双向转介和阶段性评估实现功能互补^[10,12,13]。对服务效果的评价也不应只看活动次数和参与规模,还应关注参与持续性、运动安全、健康改善和服务满意度等结果。

需要强调的是,运动处方、康复训练等专业性较强的服务应由具备相应资质和能力的专业人员承担,社区体育组织不宜替代医疗判断^[11,13]。对于一般健康老年人,可提供基本科学健身建议;对于慢性病稳定期或存在较高运动风险的老年人,应在基层医疗专业人员评估基础上进行个体化指导^[11,13];对于出现不适或风险变化者,应及时停止运动并转介医疗服务。通过明确责任边界,可以在避免服务越界的同时,提高体育促进健康的精准性和安全性。

(四) 完善政府引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增强服务供给可持续性

城市社区老年体育服务具有明显的公共服务属性,同时又需要专业组织、医疗资源和家庭支持共同参与,因此应建立政府引导、社区统筹、社会力量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7,9]。政府部门应加强政策统筹、基本经费保障和服务标准建设,推动体育、卫生健康、民政等相关资源在基层合理衔接;社区应承担需求识别、场地协调、活动组织和服务反馈等日常工作;体育社会组织可提供项目设计、师资培训和赛事活动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负责健康评估、风险提示和必要的专业转介;家庭成员则通过陪伴、提醒和支持增强老年人持续参与的条件。

多主体协同还需要稳定的运行规则。可结合社区实际建立定期沟通、项目共建、资源共享、安全责任和信息反馈机制,对活动组织、人员资质、突发情况处置和服务评价作出清晰安排。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研究提出的价值共创、多元共治、科技赋能与监督评估思路,对老年体育服务同样具有适用性:既要通过协商机制让老年人真实需求进入项目设计,也要通过专业标准和过程评价约束服务质量。对由政府购买服务或社会组织承接的老年体育项目,应更加关注需求响应、服务过程、实际参与、安全效果和持续改善,而非只以活动次数作为评价依据^[9]。通过从“临时合作”转向“机制协同”,才能把分散的场地、人力、医疗、数字技术和社会资源转化为持续稳定的社区老年体育服务能力。

五、结论

在健康中国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城市社区老年体育服务正在由基本健身条件保障向综合健康促

进转型。基于相关政策文本和代表性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当前制约服务质量提升的关键已不只是场地和活动数量问题,而是需求适配、专业服务、健康协同和治理机制之间的系统性衔接问题。具体而言,老年群体内部需求差异与同质化供给之间存在矛盾,设施适老化与专业指导能力仍需同步提升,体育服务与基层健康管理尚未形成稳定服务链,多元主体资源也有待通过制度化协同转化为持续供给能力。

因此,城市社区老年体育服务优化应坚持以老年人的真实需求和安全健康为导向,建立分层分类供给机制,完善适老化空间与科学健身指导,推动体育服务与基层健康管理有序衔接,并健全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医疗机构和家庭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只有将“便捷可达”与“安全适配”、“体育参与”与“健康管理”、“多元参与”与“责任协同”统一起来,才能进一步提升社区老年体育公共服务的精准性、专业性与可持续性。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依据政策文本和既有研究进行规范性分析,未对不同城市、不同类型社区开展一手实地比较,因此相关结论主要用于构建问题分析框架和提出政策启示。后续研究可结合典型社区案例、访谈或其他实证材料,对不同地区老年体育服务供给模式及其实际效果进行进一步检验。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Z].2016.
- [2] 国务院.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Z].2021.
-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Z].2021.
- [4]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Z].2022.
- [5]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Z].2024.
- [6] 杨凡,潘越,邹泽宇.中国老年人体育锻炼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2019,55(10):10-21,40.
- [7] 范成文,金育强,钟丽萍,等.发达国家老年人体育服务社会支持体系及对我国的启示[J].体育科学,2019,39(4):39-50.
- [8] 刘玉.我国社区老年智慧体育服务系统构建与推进策略研究[J].体育科学,2021,41(1):51-64.
- [9] 张小沛,戴健,张瑞林.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科学内涵、创新动力与现实路向[J].体育学刊,2021,28(5):23-29.
- [10] 姜桂萍,李良,吴雪萍.我国体卫融合发展的历史脉络、现实困境及疏解策略[J].体育学刊,2023,30(1):47-53.
- [11] 李璟圆,梁辰,高璨,等.体医融合的内涵与路径研究——以运动处方门诊为例[J].体育科学,2019,39(7):23-32.
- [12] 龙佳怀,刘玉.全生命周期体医融合服务系统平台构建与推进对策研究[J].体育科学,2023,43(8):79-89,97.
- [13] 李治,刘天宇,邬建卫,等.体卫融合深度服务老年群体常见慢性疾病防治的实践思考[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4,39(5):581-588.

Dilemma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Urban Community Sports Service Supply for Older Adults in the Context of Healthy China: An Analysis Based on Policy Texts and Related Literature

Liang Jiming¹, Han Chen¹, Luo Junjie¹, Wu Xuan Yi¹

¹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Healthy China initiative and active responses to population aging, urban communities are both important everyday settings for older adults' participation in physical activity and key carriers through which public fitness services extend to the grassroots level.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policy text analysis,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study reviews policies and research related to Healthy China, national fitness, public sports services for older adult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health, and develop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comprising demand adaptation, service capacity, health coordination, and multi-actor governance. The study analyzes the practical foundations, major constraint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sports service supply for older adults in urban communitie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such services are gradually shifting from the provision of venues and facilities toward health promotion and integrated services, yet problems remain, including the coexistence of differentiated needs and homogeneous service supply, insufficient age-friendly facilities and professional guidance, weak links between sports services and primary-level health management, and underdeveloped coordination among multiple actors. Accordingly, urban communities should improve mechanisms for demand identification and tiered service provision, coordinate age-friendly space renewal with professional guidance, build an integrated sports-and-health service chain for older adults, and strengthen a governance mechanism led by government, implemented by communities, supported by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coordinated with families, so as to enhance the precision, professionalism, and sustainability of service supply.

Keywords: Healthy China; urban community; sports for older adults; public sports services;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health

清后期古州厅聚落分布与民族交往研究

杨妍

(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古州厅地处都柳江中上游枢纽地带, 置厅后受“改土归流”政策推行与水陆交通改善的推动, 苗、侗、汉等民族在此进一步交汇融合, 至清后期已成为聚落空间建构与民族交往的典型区域。本文依托方志资料建立聚落信息库, 考察清后期古州厅的聚落空间分布与形态特征。研究发现, 侗、苗、水、瑶、汉等民族在聚落高程分布上呈现垂直分层特征, 近半数聚落以山水方位命名, 折射出不同族群的空间认知差异。都柳江水道与古驿道网络构成区域交通骨架, 盐运与木材贸易推动了“沿路聚居”格局的形成。经济交流与市场网络的构建、文化交融与信仰空间的共享, 则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关系的深层整合。清代古州厅民族交往的不断深化, 为此后该地区形成多元一体民族格局奠定了空间与社会基础。

关键词: 聚落分布; 民族交往; 古州厅; 清后期

DOI: doi.org/10.70693/202609018276

榕江, 地处都柳江中上游枢纽地带, 其前身为清雍正年间设置的古州厅。清雍正七年(1729年), 贵州巡抚张广泗剿抚古州, 次年正式置古州厅, 隶黎平府, 为清廷开辟“苗疆六厅”之一。民国二年(1913年)改厅为县, 更名为榕江县, 此后榕江之名延续至今。置厅之后, 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与水陆交通条件的改善, 外地移民陆续迁入, 苗、侗、汉等民族在此交汇融合, 至清后期已发展成为西南民族地区聚落演变与民族交往的典型区域。

今黔东南州分南北两大水系, 北为清水江、潯阳河所在的沅江水系, 南为都柳江干流所在的柳江水系。学界关于明清黔东南民族地区的研究, 长期以来主要集中于北部清水江流域, 依托大量清水江文书, 已形成较为系统的“清水江学”。相比之下, 对南部都柳江流域的关注较少, 且研究偏重下游区域, 代表学者有黄瑜、王彦芸等。近年来, 关于都柳江中上游段的成果逐渐增多。李金兰、吴美桃指出, 清代以来以古州为中心的道路开辟拓展了王朝治理空间, 并强化了沿线各族的国家认同;^①王政、张应强认为, 光绪年间“千三”组织定款立碑为公山确权, 反映了清代古州山场确权中的地方逻辑与官民互动;^②杨正文、龙宁东则以榕江“宰牙四寨”为例, 揭示了古州置厅后多民族共居中小区域共同性的形成机制。^③总体来看, 现有成果从不同维度丰富了对都柳江中上游区域社会的认识, 但从聚落空间角度审视民族交往的研究仍相对薄弱。有鉴于此, 本文以清后期古州厅为研究范围, 在梳理其历史地理基础之上, 依托方志资料建立聚落信息库并绘制相关图表, 并从经济往来与文化交融两个层面, 分析清后期古州厅民族交往的具体形态与内在机制, 以期都为柳江中上游的民族交往研究提供一个区域性案例。

一、清后期古州厅历史地理基础与区位特征

榕江县地处湘黔桂交界地带, 都柳江及其支流寨蒿河、平永河在古州镇交汇, 三条河流在县域内连接南北、贯通东西。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高越山、八万山、月亮山三座主要山脉分布其间, 地形复杂。今榕江县民族构成多样, 苗、侗、水、瑶等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近八成, 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县。

榕江县昔称古州, 据光绪《古州厅志》的记载, 古州有内有外。清雍正年前建寨设州置长官司皆外古州, 榕江县境属里古州。^[1]清雍正七年(1729年), 贵州巡抚张广泗剿抚古州, 八年(1730年)置古州厅, 是年冬置古州镇, 雍正九年(1731年)次第剿抚上下两江及东、北各路苗寨, 最终圈定四路苗寨纳入古州厅辖。《黎平

作者简介: 杨妍(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学。

^① 参见李金兰、吴美桃:《清代以来都柳江中上游的道路开辟与国家认同》,《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3年第3期。

^② 参见王政、张应强:《从〈千三碑记〉碑看清代古州都柳江流域的山场确权问题》,《贵州民族研究》2023年第6期。

^③ 参见杨正文、龙宁东:《多民族小区域社会共同性的形成——以贵州榕江县“宰牙四寨”为例》,《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府志》记载,“古州厅在府治西,在省城东南,其地与清江、台拱、八寨、丹江、都江同时建置,为新疆六厅。东至府属增营寨……界西北至丹江厅属牛皮箐……枕山面江,川原平衍,榕都二水两岸皆山帷,车江自乐乡以下至厅城几三十里之遥,迤迳潏洄,榕树参天,榕城所由名也。”^[2]结合此段记载以及今榕江县州内毗邻雷山、剑河、黎平、从江四县,另与丹寨、台江等县区也相距较近,东南部、南部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三都水族自治县、荔波县相接的地理位置情况可看出,榕江联络四方,占据关键的枢纽位置。

光绪《古州厅志》记载其疆域,“岗峦四绕,三江潏环,襟带楚粤,生苗巢穴,为黔省东南锁钥,新疆第一要区”,^[3]足见榕江县在交通布局及民族管理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民国《榕江县乡土教材》对榕江历史的记载,同样体现出清王朝对此地战略地位的充分认可:

(榕江)在前清雍正初年,仍为苗、夷、水、洞诸边胞“不识不知”所在。当时有黎平府知府张广泗先生蓄意开拓边疆,乃以赴贵阳省会为名,假道榕江,侦察地形。于雍正七年(公元一七二九年)始行开辟,定名为古州。雍正八年(公元一七三〇年)设古州厅,驻黎平府同知,即今之榕江县。^[4]

这段记载简单清晰地梳理了榕江在真正意义上纳入清朝西南边疆治理长远规划的时间节点。同一事件的记载,更早可见嘉庆《古州杂记》中“雍正七年,张经略广泗守黎平,以金币贿生苗,假道入省,因密记其道里山川险阻形势,呈请大帅购募通事,统兵安抚,留定其地,遂入版图”^[5]的记载。其中“假借榕江,侦查地形”以及“密记其道里山川险阻形势”体现了掌握榕江复杂地形构造之于开拓苗疆整体战略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余泽春在《古州厅志》疆域部分的“论”环节以“若网在纲”与同时期贵州省仍较为普遍的插花地状况进行对比,对张广泗开拓苗疆的周密规划深表认同,并感慨其平定苗疆功业实永垂不朽,即“辟地之初,经画井井,一时之瘁,贻百世休”。^[3]

榕江县山峦绵延、江河纵横,地形构造复杂。嘉庆《古州杂记》载,“崇山密菁,鸟道羊肠,瘴疠繁兴,天时人事,迥与世殊”,^[5]山峦连绵,山路蜿蜒,加之气候影响下林木葱郁,瘴气萦绕,使榕江笼罩上一层神秘面纱。光绪《古州厅志》载,“古州蓊尔,地广轮斜,掬角各百数十里”,^[3]记录了古州虽为弹丸之地,但其疆域南北斜长、东西狭窄,各延展百数十里的地理情况。民国《榕江乡土教材》在榕江地理这一章节中,介绍了榕江县域内的平原区域,即县城附近以及由县城至忠诚堡、安乐乡一带以及朗洞一带的滨水之区。对榕江县山脉河流情况的描述为“全境山岭,均为苗岭南支,漫延于平永河与都江河流域之间”,^[4]并先后从走向、途经地等方面介绍了榕江县内主要山脉及三大河流的基本情况。在此需补充解释,平永河一名榕江河,蒿江即寨蒿河,一名车江,县核心农业区和人口聚居区——车江万亩大坝便是主要由寨蒿河冲积形成。

都柳江、寨蒿河、平永河贯通东西、连接南北,构建起榕江域内交通的基本格局。山峦与河流交错,奠定了榕江聚落“依山傍水”的分布特色。得益于八方通达的地理区位以及经渐次开发而便利的水陆交通,清代古州厅的人员迁徙、驿路建设、经贸往来与民族融合也在不断地蓬勃发展。

二、清后期古州厅聚落空间分布与形态特征

(一) 地名分类的空间表征

都柳江沿河两岸居住人群以“侗苗”为主,“高坡苗”、水族和汉人移民村寨交错分布于高山与平地之间。民间俗语描述为“侗住河边,汉住屯堡,苗、水住山坡”,呈现出高原山地中的沿河“峒地”(俗称“坝子”)居民与“山地”人群共居共生的现象。^[6]民国《榕江乡土教材》梳理了志书中关于榕江县村寨及人丁户口的内容,指出在清雍正六年(1728年)为571寨,有31526户;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为455寨,有27289户。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为14644户,52899丁口。《榕江县志》收录的东、南、西、北四路苗寨的名录与光绪《古州厅志》中苗寨的名录完全一致。经统计,光绪《古州厅志》中记录的有具体名称的苗寨共276个,与方志中“571”及“455”数字出入较大,《榕江县志》在编纂时,在四路苗寨分布对应的村寨名录最后均加上了“等寨”来处理该问题。

借助1987年版《贵州省榕江县地名志》、新修《榕江县地名志》初稿、《古州厅志》2024年点校本、榕江文史资料系列书籍以及从江、黎平等榕江周边县的地名志等方志资料;以及“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和“百度地图·拾取坐标系统”等相关地名及定位数据网站,笔者整理出“清后期古州厅聚落信息库”,以呈现聚落位置、朝向、经纬度坐标、形状、地形、主体民族归属、地名分类等信息,并作为后续系列分析的基础数据来源。光绪《古州厅志》收录的四路苗寨中,部分村寨有特殊标注,其中标注最多的信息为“生苗”,标有该信息的村寨有19个,在“清后期古州厅聚落信息库”中考证出今在榕江县辖境内的有俾柳、分引、加溪、赧冷、加坳、俾勤、加早、乌将、俾拉、俾亡、拉力、岩寨、水彭、水尾、拉已、滚通共16个村寨。此外,还有部分关于设汛、关卡、驻地、界属等的标注。结合《古州厅志》2024年版点校本对苗寨部分的校注可知,光绪《古州厅志》收录的东、南、西、北四路苗寨中,岭转、归你、下绍、上绍、归七、岑门、岑梗、归西8寨今属黎平县辖境,俾九和俾打2寨今属从江县辖境,其中俾打寨在光绪《古州厅志》中就有标注“下江界连”。《古州厅志》收录有具

体名称的 276 个村寨中,笔者通过多方信息印证及部分合理推测,可复原聚落有 210 个,占比约 76%,可依据地名解读进行分类的聚落有 188 个,占比 68%。两项比例均超过三分之二,达到可进行总体分析的标准。

在“清后期古州厅聚落信息库”中,笔者主要结合《贵州省榕江县地名志》中对应的地名解读内容及“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网站对部分地名由来的详细解释,笔者将 188 个依据地名解读进行分类的聚落,在地名类型上总体上分为姓氏居民、建筑、位置、规模方位、动植物、寓意、地形地势、事件传说、建立时间 9 个大类,其中“位置类”又可细分为山、水、田、石、其他 5 个小类。由于部分村落名称的选用融合了两个类别的内容,如母香寨的地名释义为,“侗语“母”为每个人,相传很久以前,这里的每个人都会制作敬神用的香,且居住在溪水的上方,故名”。涉及事件、方位两种类别,故在进行数据分析时,将其拆分为 0.5 个以事件命名的聚落和 0.5 个以方位命名的聚落,以尽量保证分析结果的客观性。分类工作完成后,通过比对不同类别村落地名数量在总体村落数量中所占比例,发现位置类地名在聚落地名选用时出现概率最高,约为 49.5%,其中又以位置(山)类占比最高,在位置类地名中占比 50%,其次是位置(水)类,在位置类地名中占比约 30%。这两类位置地名中,“山”类型集中表现在中带“高”“岑”“格”“岭”“俾”等苗语、侗语当中表示“山”的标志性字词的聚落地名,如高冈寨、岑归寨、高格寨、岭倍寨、俾计寨等。“水”类型集中表现在中带“孖”“江”“旧”“雅”“赧”等苗语、侗语、水语当中表示“水”的标志性字词的聚落地名,如孖萎寨、江边寨、高旧寨、高雅寨、高赧寨等。另有与位置(山)类有所关联的地形地势类,在整体地名中占比 12.5%。人文地理类,即主要包含上述 9 个类别中的姓氏居民、建筑、寓意、事件传说等,对应聚落整体占比约为 33.5%,而其中又以含汉族主居的聚落为主,地名选择也受到汉族历史习惯的深刻影响。如孟潘寨,即对应今古州镇头塘村,《贵州省榕江县地名志》对其的地名释义为,“《古州厅志》称此寨名孟潘,置左营孟潘塘,称左营“第一塘”,头塘称谓由此而来”。^[7]另有地名网上对怎丢寨地名释义可作为汉族移民入居榕江的直接体现,光绪《古州厅志》称“怎丢”。苗语“丢”为客家,“怎”为寨,意即主要为汉族居住的寨子。

总体而言,榕江县聚落分布与自然环境关联密切,大多数情况下以山水位置为基地择地而居。细化计算结果可推导出,清后期古州厅聚落命名差异映射出当地族群空间认知不同范式,即苗侗族群依托山川河流构建空间认知坐标,汉族则侧重社会关系与集体记忆的符号化表达。

(二) 高程分布与族群分层

榕江县地形地貌复杂多样,结合“清后期古州厅聚落信息库”中收录的源于《贵州省榕江县地名志》诸多村落的高程信息及地理环境记载,对应村落主居民族归属并结合此前地名释义部分的解读,可看出,聚落的高程分布呈现出显著的族群垂直分层特征。

表 1 榕江县少数民族特色村落高程及位置信息表

编号	村寨名称	主体民族	高程	位置
1	大利村	侗	750 米	大利溪边
2	定弄村	侗	890 米	山脚
3	票寨村侗寨	侗	615 米	山谷溪边
4	晚寨村	侗	645 米	山间脊地
5	乌公村	侗、苗	380 米	溪边
6	卡寨村	苗	565 米	山脚
7	宰荡村	侗	900 米	狭长稍坦谷地,溪流穿过
8	苗兰村侗寨	侗	830 米	山间
9	归柳村	侗、苗	730 米	山间
10	滚仲村	苗	470 米	山岭
11	脚车村苗寨	苗	680 米	溪边
12	怎东村瑶寨	瑶	620 米	山腰
13	八蒙村	水	300 米	河岸
14	摆贝村	苗	650 米	山岭
15	加宜村	苗	760 米	孔明山西侧,山腰
16	丹江村	苗	680 米	河岸
17	三盘村	苗	700 米	山间
18	高兴村	水	620 米	半坡、谷地冲沟处
19	寿洞村	侗	370 米	溪边
20	乔勒村	侗	775 米	半山
21	大瑞村	侗	490 米	溪边
22	本里村	侗	800 米	较平坦的本里坝上
23	保里村	侗	780 米	岑命坡脚
24	高略村	苗	870 米	山岭
25	纯厚村	汉、侗	680 米	山脊
26	高鸟村	苗	680 米	山岭
27	同流村	水	850 米	山脊
28	计水村	苗	570 米	山脊
29	硐里村	侗	625 米	沿溪

数据来源：榕江县人民政府：《贵州省榕江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7年。

结合表1可知，汉族主居聚落则主要分布在交通便利的低地河谷，如位于都柳江右岸的八吉寨，通舟楫，与下江厅接界。乾隆二年（1737年）在古州厅安屯置堡，大量汉民迁入古州。后来，一些商贾、削官为民者或逃荒者、投亲靠友者相继进入古州定居。^[1]乾隆三年（1738年）设八吉、腊亮塘及铺进，为王岭左营辖地。^[7]体现出汉族聚落注重经贸交通区位的特征。侗族聚落集中分布于海拔300~600米的河谷地区，如寨蒿镇乌公侗寨位于溪流环绕的幽谷中，栽麻镇大利侗寨顺利洞溪而建，显现出亲水定居倾向。这一区位选择也使得侗族聚落伴有稻作经济优势，例如车江万亩坝区水田，极大地支撑了糯稻种植。结合图表内容，可看出水族聚落多分布于海拔300~500米的都柳江支流河谷及河岸台地，如兴华水族乡八蒙水寨依山而建，傍水而居，保留干栏式木屋群落与水上花桥，其选址体现出渔耕并重的生计策略。瑶族聚落则集中于海拔600~800米的山区，如塔石瑶族水族乡的怎东村瑶寨，多建于山腰平台且保留梯田耕作系统，瑶族有着长期依山游耕的传统，月亮山区的地理环境符合瑶族自身的生计传统和文化适应。苗族聚落则多分布于海拔700米以上的山脊地带，如计划乡加宜村海拔826米，房屋依山而建。结合清代开拓苗疆剿抚苗寨的历史背景以及清廷屯堡政策，可进一步理解榕江县苗族聚落高山避患的防御策略。光绪《黎平府志》记载：^[2]

古州自开辟以来，于雍正六年清理苗疆等事案内，原招抚苗民五百七十一寨，计三万一千五百二十六户。十三年，逆苗包利、红银结众悖叛，大兵剿抚后，将逆苗绝产议堡安军，是以寨分户数与原报之数不符。熟苗曩亦不驯，渐摩日久，悉安耕凿。“十三年，逆苗包利、红银结众悖叛，大兵剿抚后，将逆苗绝产议堡安军”。

清廷将参与反抗的苗民的土地视为“逆产”没收，并用于安置屯军。在这一时期清廷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和“屯堡安军”措施的影响下，低地的驿道节点和肥沃坝区被屯军占据。如海拔约250米，作为都柳江航运起点的古州厅城以及海拔约370米，控制寨蒿河粮道的寨蒿汛，均成为汉族屯军的关键据点。这些据点交通便利，有利于军事控制和商贸活动。与之相对，原居于较低海拔地区的苗侗族群，其土地被侵占，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被迫向生存条件更为艰难但易于防御的高海拔山区迁移。如《良化杨氏清白堂家谱》中就有杨氏先祖于清中叶由江西吉安迁到贵州黎平，而后从榕江乌婆（杨安冲）迁到良化的记录。乌婆和良化均属平江镇辖，乌婆地处溪边坝区，而良化地处山区。反映了这一时期军事策略对榕江县聚落空间分布格局的历史影响。

总体而言，高程分布本质是各族群资源博弈的空间投射，苗族以高度换取安全防御，侗族以亲水换取农耕优势，汉族以区位换取商贸便利，而水族与瑶族则分别沿袭河谷渔耕与山地游耕的传统模式，清代屯堡政策通过土地分配制度强化了这一垂直分层格局。

（三）聚落密度的交通导向

明朝建设驿道的主要目的是军事，也以驿道为主线营建卫所聚落，使得原住少数民族村落分布在建设辐射区域之外，但由于驿道的经济属性促使黔东南传统村落靠近，形成的顺势相持的分布形态。^[8]伴随着区域安定环境下，经济往来需求的逐渐增大，驿道的经济属性逐渐凸显，甚至在特定时期特定区域承担主要功能。据光绪《古州厅志》中记载，古州地处万山丛中，尽占天然险要，朝廷在此设官驻军，规制极其森严完备，然而“芦笙一吹，箐狐四应，将帅奔命，久乃克之”，^[3]由此感慨固守险要之地，与严密的军备相比，更关键的在于合理的治理。这一论断的现实依据就包括滚仲苗民在清雍正八年及咸丰五年两次爆发苗民起义。第一次起义具有反清抗暴性质，是由苗王构磨糯带领的滚仲十二寨苗民对开辟新疆过程中暴虐征讨苗民，攻入“嘎良”（今榕江县城所在地）和“固虾”（今车江）^[9]的武力反抗。第二次起义具有反阶级压迫与反民族压迫性质，是由苗王构顾带领的滚仲汛苗民掀起又一次武装抗争行动，是对这一时期“新疆六厅”以苗民为主的各少数民族人民不堪清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的现实回应。由此可知，哪怕是有军事机构塘汛的设置，也不能靠武力征服实现长久治理，铺递驿道对长久统治的深刻贡献更在于其对于人员物资的服务性功能。

依托光绪《古州厅志》收录的铺递、塘汛、场集名录，结合多方资料对对应位置的考证，笔者绘制了图1以直观呈现清后期古州厅铺递、塘汛、场集的分布情况。由图1可看出，清代古州厅的聚落密度与交通网络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耦合特征。在上述三类要素中，铺递作为驿道系统的核心节点，主要沿都柳江干流及寨蒿河、平永河等支流布设，形成了“一纵三横”的交通骨架，这一骨架与今天榕江县主要道路格局大致相当。由在城铺、口月铺、乐乡铺、塘冷铺、岭贾铺、寨蒿铺、高婆铺、高表铺、色同铺、巨里铺、朗洞铺、孟潘铺、都江铺、八旧铺、八开铺、寨比铺、革椒铺、定旦铺、高长铺、高孖铺、高旧铺、俾倍铺、平宇铺共23处铺递构建起的榕江县交通网络，在清后期不仅承担着“通滇达粤”的军事驿传功能，更成为连接各民族的物质通道。“沿路聚居”模式在榕江县都柳江航运节点表现尤为突出，如八吉寨物产富庶，水旱两路四通八达，系“古州门户，粤盐入黔首站”，沿江形成了较长的商贾聚落带，侗族“临水结寨”的传统与汉族商埠在此交融共生。

木材贸易的繁荣则进一步强化了水道导向的聚落集聚。榕江沿河两岸、岭上岭下，漫山遍野都栽有郁郁葱葱深受各地用户欢迎的优质杉木。自月亮山集市贸易开始后，汉人进入山区腹地采伐木材增多，山区的高同寨、沿江的腊西、八开、庙友、定旦都相继开设店铺。^[10]咸同苗民起义时期，迫使土司及汉人撤离山区，集市贸易也随之萧条。光绪初年，土司衙门重建，汉人木材商复入山区采伐，这里的贸易集场又相继兴起，较为新、近些的生活用品，源源不断地运进山区，大大地吸引了苗、水人民对贸易集场的兴趣，更多的农副土特产品上集市交易逐年增多，月亮山区的集场贸易又一次出现繁荣。^[10]月亮山区木材贸易的案例表明，交通路线在串联起地理通道之外，同样承担起了民族经济网络的建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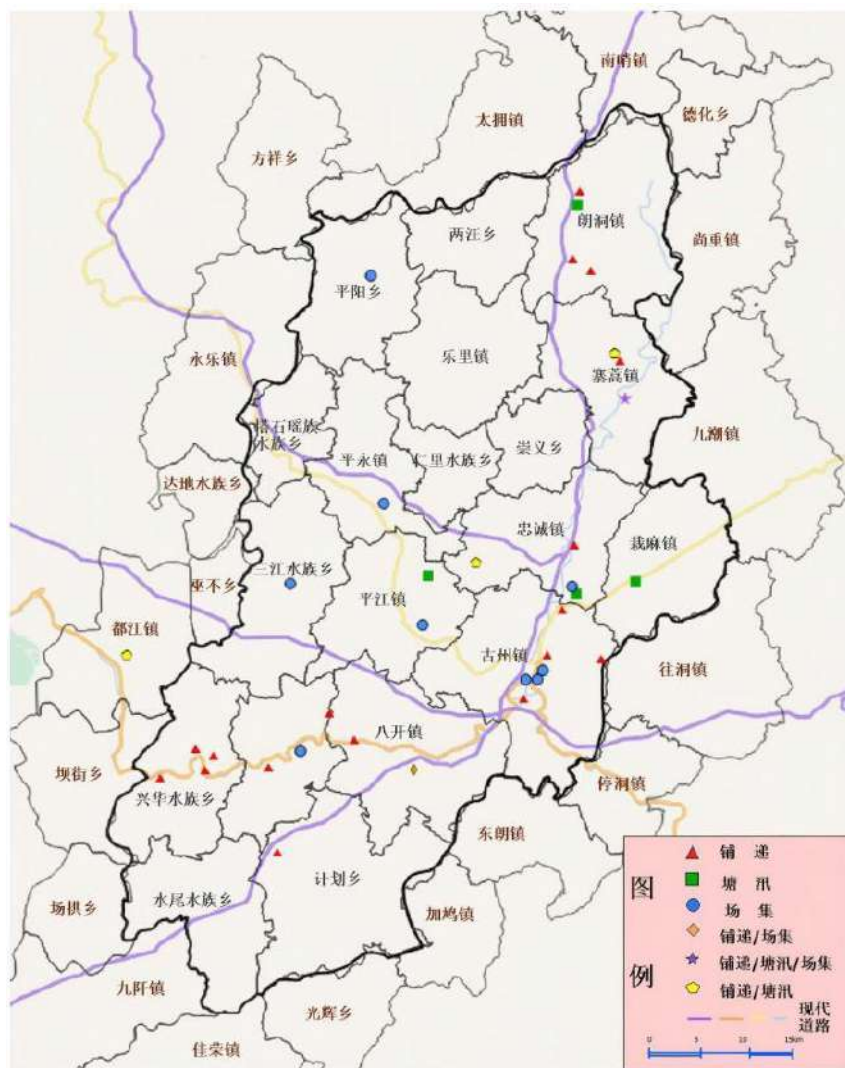


图 1 清后期古州厅铺递、塘汛、场集分布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三、清后期古州厅民族互动交往形式与互动机制

(一) 经济交流与市场网络构建

清代古州厅的民族交往首先表现为深度的经济交流。据嘉庆《古州杂记》记载，雍正年间开辟苗疆后，贵州省由食川盐改食粤盐，粤盐由广东经水运至古州。乾隆年间，清廷在古州设有总埠，在黎平，丙妹、三脚屯设子埠。这一时期，“境内，除镇标兵丁及屯军外，悉系苗人流寓，汉民绝少”，^[5]故合时宜地推行“苗汉一体行銷”政策，直到咸同年间（1855—1873年），苗族农民起义，古州“官盐”停止，到清末食盐仍是官办专卖。稳定的供需平衡、严格的物流管控，盐道成为多民族贸易的重要走廊。

清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鄂尔泰上奏请令兴立市场。于是，八开土司通晓各寨规定“卯、酉”在八开设厂，“巳、亥”日在定旦设厂，进行集市贸易。^[10]清乾隆年间，各省会馆相继在古州建立，古州地区以古州市场为中心的城乡市场贸易进入繁盛阶段。正如《古州厅志》所述：“水陆通衢的古州，有粤、桂、楚、闽商人来

往日增，贸迁成市，各省俱建会馆，衣冠之物，日渐饶庶”。^[11]光绪《古州厅志》记载了 11 个场集，即南门外城、外厂、旧米厂、新米厂、忠诚堡、定旦厂、平永厂、平江厂、寨蒿厂、八开厂、怎冷厂和羊色厂，对应的分布情况可见图 1。由图可知，清后期古州厅场集呈现出以厅城为枢纽，主要沿境内三条主要河流分布的态势，且部分场集的区位选址与铺递、塘汛有所关联。如寨蒿厂、寨蒿铺、寨蒿汛三重功能的机构集中设置在寨蒿城，市场功能辐射周边广大区域。忠诚堡场“苗侗售米，汉商鬻布”，八吉场“水族贩鱼，瑶民输药”，榕江县市场运作逐渐显现出专业化的民族分工。

咸同战乱延绵长达十八年之久，殃及古州大部分地区。光绪初期十年，战乱停息，古州农工商业逐渐复苏，这时“古州商贾汇聚，百货流通，城内商肆鳞次栉比，镇外设有场坝，按行互市”。^[11]清后期古州厅多民族市场上，语言使用方面呈现混合特征，如侗语称“斤”为“斤”，苗语称“元”为“贯”，却在交易中统用汉语“斤两”“银钱”计价。在忠诚，除常年经营的商铺外，更有如棉花场、梨场等独具特色的时令场，这类市场一般以特定物产的生长期为依据，择其成熟期开设场市，^[12]侗、苗、汉、水等多族人群在此期间互通有无，交易买卖。伴随着多民族市场网络的形成，清后期古州厅民族交融也得以进一步深化。

（二）文化交融与信仰空间共享

“清后期古州厅聚落信息库”地名释义部分包含了许多少数民族之间的事件传说，例如上绍寨与下绍寨的地名记载，“绍洞原为苗族聚居之地，后来，侗族由镇蒙迁来相邻，因与苗族协商不下，双方以弓箭射鹭（鹭称白绍）比武定之。结果侗族射中飞鹭眼，苗族只射中飞鹭身，苗族只好履行诺言，让侗族为邻定居，绍洞侗语原称‘绍蒙’‘镇绍’”。^[13]射鹭比武的仪式与贵州山地少数民族狩猎传统相关，这一案例生动说明了不同民族之间交融混居的历史渊源。

在侗乡有句俗话：“gaeml mags sax, gax mags miiuh”。意思是“侗家萨大，客家（汉族）庙大”。其中，“萨”即萨坛，“庙”即庙宇，意为客家崇拜庙，侗家崇拜萨；侗家萨坛的神威和汉族庙宇的神威同样大。三宝侗寨中的侗族，除传统大姓杨、吴、石等姓氏外，诸多外姓姓氏居民是清代开辟“新疆六厅”之后迁入的。属于三宝“中宝”的口寨，至清道光年间，当地祭祀“萨玛”场所的建筑空间和形制经历了由山腰至平地、由神坛向祠宇转变的多重演变过程。其中，“鸡卦神坛”形制，即与都柳江下游寨稿村中“苗人”迁移后留下来的“萨坛”极为类似，又与明代官方规定的，即汉人传统的“社坛”形制十分相似。清代“萨玛”坛祠形制的变化过程，也正是外来移民逐步进入“侗苗”村寨在信仰层面上的一种折射。^[6]这一案例，印证出当地民族交往交融，在文化层面还表现为仪式空间的重叠与共享。

榕江县多民族文化交融还体现在纹饰图像与信仰礼俗方面。经实地调研发现，与清水江中上游一样，榕江县苗族银饰中的许多部件与图像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运用如龙、凤鸟、狮子等神兽图像，毳路纹、鱼纹、石榴纹、麒麟送子、野鹿衔枝等吉祥纹样，八仙、福禄寿等仙道图像，寿字纹、“长命富贵”等汉字纹样^[14]，苗族银饰的元素日趋多元。这不仅顺应了市场发展，也持续丰富着其自身的艺术与文化内涵。信仰礼俗方面，当地汉族吸收了侗族的“树神”观念，在古州文庙旁植“风水林”并效仿侗俗礼俗定期祭祀，正对应了乾隆《百苗图》所记述的“苗汉渐通，俗相染”的民族交融状况。这种双向的文化采借，同样可在都柳江流域广为流传的《海八》古歌中得到印证。“各族在一起，汉女嫁苗人，苗女嫁汉人，来树个崖理，治理好村寨，治理好村寨……苗死汉也哭，汉死苗也哭”^[15]。《海八》古歌歌词所对应的叙事情感，正是对这类多民族共生性文化心理的文学性表达。

四、结语

清后期古州厅的聚落分布与民族交往，是在特定的自然与历史条件下展开的。本文基于方志文献建立的聚落信息库，从空间分布、高程分层和交通导向三个层面，梳理了聚落形态与民族互动的内在关联。研究表明，古州厅聚落呈现大散居小聚居的总体格局，其空间分布深受自然地理与交通网络的双重影响。地名分类统计显示，近半数聚落以山水方位命名，反映出苗侗族群依托自然环境构建空间认知的特点；而汉族聚落的命名则更多地体现了社会关系与集体记忆，两者形成了鲜明对照。聚落高程分析进一步揭示了族群垂直分层现象：侗族聚落多集中在河谷地带，利于稻作经济发展；苗族聚落则分布于山脊高地，具有较强的防御色彩；汉族聚落多据守驿道节点，便于掌控商贸脉络；水族与瑶族则分别延续了河谷渔耕与山地游耕的传统。在民族互动方面，都柳江水道与驿道网络构成了交往的物质基础。铺递、塘汛与场集的空间耦合，推动了沿路聚居模式的形成。盐运贸易催生了“苗汉一体行销”的政策，木材流通则带动了山区集市的繁荣，场集中语言的混用现象是多民族市场网络形成的生动写照。文化层面的交融同样深刻，三宝侗寨萨玛祠形制的演变，融入了汉、苗、侗等多民族元素，体现了不同神明信仰间的相互借鉴；古歌唱词所呈现的跨族群共感，同样印证了当地文化共生的历史事实。综上，清后期古州

厅的民族交往,以经济交流为基础,以文化交融为纽带,以制度调适为保障,塑造了依路聚居、因市成簇的空间格局,催生了多民族共存共生的社会意识,为理解都柳江中上游地区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形成提供了一个重要区域性案例。

参考文献:

- [1] 《榕江县志》编纂委员会.榕江县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1,137.
- [2] (清) 俞渭修,陈瑜纂.光绪黎平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17.成都:巴蜀书社,2006:16,191
- [3] (清) 余泽春修,余嵩庆等纂.古州厅志[M].北京:团结出版社,2024 (点校本) :25,61.
- [4] (民国) 李绍良.榕江县乡土教材[M]//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民国贵州文献大系:第二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325,328.
- [5] (清) 林溥.古州杂记[M]//榕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榕江文史资料:第2辑.内部资料,1986:236-237.
- [6] 黄瑜.“社祭”传统与“萨玛”坛祠——都柳江流域的村寨空间、生计变迁与国家制度[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6(4).
- [7] 榕江县人民政府.贵州省榕江县地名志[M]. 内部资料,1987:19,61.
- [8] 杨光磊, 范金煜, 杨霖, 等. 明代军事建设对黔东南村落分布特征影响研究[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24(5).
- [9] 周年荣.清溪仲苗民起义[M]//榕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榕江文史资料:第3辑.内部资料:148.
- [10] 杨国刚.月亮山区集市贸易概况[M]//榕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榕江文史资料:第6辑.内部资料,1993:36-37.
- [11] 龙见霖.榕江集市概况[M]//榕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榕江文史资料:第6辑.内部资料:2-3.
- [12] 周光奇.忠诚商业的前前后后[M]//榕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榕江文史资料:第6辑.内部资料:148.
- [13] 黎平县人民政府.贵州省黎平县地名志[M].内部资料,1985:311.
- [14] 王星星,陈敏.以图表意:清水江中上游苗族银饰的图像基因[J].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2).
- [15] 融水苗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局.融水苗族十二大古歌[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12.

Study on Settlement Distribution and Ethnic Interaction in Guzhou

Subprefecture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Yang Y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Guzhou Subprefecture was located in the pivotal area of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the Duli River. After its establishment, driven by the gaitu guiliu(replacement of native chieftains with regular officials) polic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water-land transportation, ethnic groups including the Miao, Dong, and Han achieved further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in this region. By the late Qing Dynasty, Guzhou Subprefecture had become a typical region of settlement spatial construction and ethnic interaction. Based on local gazetteer data,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settlement information database and examin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ettlements in Guzhou Subprefecture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ethnic groups including the Dong, Miao, Shui, Yao, and Han exhibited vertic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elevation distribution of settlements, and nearly half of the settlements were named after the orientation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reflecting differences in spatial cognition across ethnic groups. The Duli River waterway and the ancient post road network constituted the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framework, while salt transportation and timber trade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a "settlement aggregation along transportation routes" pattern. Economic exchang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rket networks, along with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the sharing of religious spaces, further facilitated the deeper integration of ethnic relations.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ethnic interaction in Guzhou Subprefectur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laid the spatial and social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a pluralistic and integrated ethnic pattern in this region in subsequent periods.

Keywords: settlement distribution; ethnic interaction; Guzhou Subprefecture; late Qing Dynasty

直播电商对南通农产品品牌塑造的影响机制及实证研究

王文静¹, 邹继陈^{1, 2}

(1.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管理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0; 2.南通大学 商学院(管理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0)

摘要: 本文聚焦直播电商对南通农产品品牌塑造的影响机制展开系统研究。首先, 通过梳理直播电商的互动性、即时性与场景化等特点, 结合南通农产品品牌发展现状, 构建涵盖品牌知名度提升、美誉度塑造与消费者忠诚度培养三个维度的理论模型。其次, 运用实证研究方法, 收集南通地区农产品直播电商的运营数据与消费者调研数据, 借助统计分析验证模型的有效性与适用性。研究结果表明, 直播电商对南通农产品品牌塑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尤其在缩短品牌传播链路、增强消费者信任感方面表现突出。

关键词: 直播电商; 南通农产品; 品牌塑造; 影响机制; 实证研究

基金项目: 江苏省职业院校教师访学研修(南通大学商学院)(计划编号:2025GRFX051)阶段性成果; 中国服务贸易协会研究课题“数字服务贸易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证研究”(编号:CATIS-PR-260164)阶段性成果;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乡村振兴与南通农产品电商研究所”阶段性成果。

DOI: doi.org/10.70693/202606160055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与移动终端的全面普及, 直播电商作为一种新兴电子商务模式迅速崛起, 深刻改变了传统农产品的销售方式与品牌传播路径, 已成为推动农产品上行和品牌建设的重要力量。^[1] 南通作为江苏沿海开放城市, 坐拥江海交汇的独特地理优势, 孕育了丰富且极具地域特色的农产品资源, 如南通长江河豚、如皋白萝卜、狼山鸡、海门山羊等, 这些产品品质优良、文化底蕴深厚, 具备打造区域品牌的良好基础。然而, 当前南通农产品品牌在全国市场上的知名度与竞争力仍显不足, 品牌溢价能力较弱, 消费者认知度有限, 制约了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直播电商凭借其直观展示、实时互动、场景化体验等特点, 能够有效拉近消费者与农产品产地之间的距离, 为南通农产品品牌塑造提供了全新机遇。

系统研究直播电商对南通农产品品牌塑造的影响机制, 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直播电商在农产品品牌知名度提升、美誉度塑造及消费者忠诚度培养中的具体作用路径, 还能为南通农产品借助新媒体渠道实现品牌升级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与可操作的实践指导。

二、南通农产品直播电商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

2.1 发展现状

南通市高度重视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 出台系列扶持政策, 鼓励提供技术引导, 推动各类农业市场主体积极开展直播电商业务, 大力推进“一村一品一店”模式, 以特色产业发展带动农产品销售和农民创业致富。近年来, 南通农产品电商发展势头强劲: 2017年农产品电商网络店铺新增238家, 累计达935家, 年交易总额近31.5亿元, 连续多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2020年, 南通限额以上零售行业通过互联网实现零售额58.1亿元, 同比增长61.7%, 增速显著。2021年“双十一”期间, 南通市线上零售额达50.2亿元, 创下历史新高, 网络零售额位居江苏省第4位, 充分彰显了南通农产品电商的发展潜力与市场活力。

2.2 存在问题

2.2.1 宣传力度不够

南通农产品大多产自乡镇和村庄, 以小农户分散经营为主, 碎片化的生产模式导致农产品供给无序、分布分

作者简介: 王文静(1995—), 女, 硕士, 助教, 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与转战略管理;
邹继陈(1986—), 男, 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创新创业, 农产品电商。

散,难以实现初步标准化生产,产品品质和质量缺乏稳定保障,可预知性较低。同时,多数农产品缺少注册商标和专业品质认证,品牌辨识度不高,导致大型电商平台因品控风险较大而不敢大力宣传与销售,制约了线上渠道的拓展。此外,多数农民生产者长期处于传统销售思维中,品牌宣传意识薄弱,普遍认为宣传活动耗时耗力且费用较高,投入产出比不确定,因而主动忽视宣传推广环节,进一步加剧了南通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被动局面。

2.2.2 品牌潜在价值有待开发

南通虽已涌现出一批直播热销的品牌农产品,如"南通长江河豚"、"如皋白萝卜"、"狼山鸡"等,在局部市场具备一定知名度,但从整体来看,南通农产品的品牌影响力仍然十分有限。多数农产品尚未形成系统性的品牌体系,品牌知名度不高,市场覆盖范围较窄,品牌效应不明显,难以在全国市场中建立起稳固的消费者认知。与此同时,消费者对南通农产品的品牌附加值认可度较低,普遍更关注价格因素而非品牌价值,导致产品溢价空间有限,品牌竞争力不足。这种"有品类、缺品牌"的局面,严重制约了南通农产品在直播电商等新渠道中的品牌变现能力与可持续发展潜力。

2.2.3 电商专业人才匮乏

直播电商作为新兴产业,对复合型人才需求旺盛,不仅要求从业者具备一定的网络运营与数据分析能力,还对实操性和实践性提出了较高要求。^[2]然而,南通市现有直播电商企业普遍规模较小,盈利模式尚不成熟,发展前景不够明朗,难以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与职业发展空间,导致专业人才"招不来、拢不住"。与此同时,乡村地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相对落后,交通、物流、网络等条件与城区存在明显差距,加之乡村工作环境和生活配套不够完善,年轻人留在乡村从事直播电商的意愿普遍不高,纷纷向城市流动,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直播电商领域的人才流失问题,成为制约南通农产品直播电商发展的关键瓶颈之一。

2.2.4 直播技术不够成熟

南通市农产品直播电商主要依托两种形式开展:一是借助淘宝直播、快手等第三方直播平台进行带货,二是在抖音、视频号等短视频平台开展内容营销。然而,无论在哪个平台,整体直播技术水平都较为欠缺。一方面,直播音视频架构不够完善,部分企业或个人主播仅使用手机进行简单直播,缺乏专业灯光、收音及画面调试设备,导致画质模糊、音频嘈杂,严重影响消费者的观看体验与购买信心。另一方面,实时交互技术架构明显不足,直播间与后台网店之间的链接操作不够流畅,消费者在观看直播时难以快速完成下单、咨询等操作,无法有效满足实时互动和批量用户同时访问的需求,制约了直播转化效率的提升。

2.2.5 冷链技术和物流体系难以匹配

南通市大多数物流企业因农村网点分布分散、返程空载率较高,运营成本居高不下,缺乏在乡镇地区投入资本构建完善物流体系的积极性。乡镇地区用户居住分散,单次快递量较小,导致"快递下乡"和"农产品运出镇"的双向物流性价比均较低,企业难以通过规模效应摊薄成本。^[3]此外,乡镇末端配送网络覆盖不足,冷链物流设施匮乏,生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损耗率较高,进一步推高了物流费用。多重因素叠加,使得南通农产品直播电商面临的"最后一公里"配送问题尤为突出,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收货时效与体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直播电商对农产品销售的促进作用,成为制约南通农产品电商发展的重要短板。

三、直播电商对南通农产品品牌塑造的影响机制理论模型构建

3.1 品牌知名度提升机制

直播电商通过视频直播方式,将南通农产品的生长环境、种植工艺、产品特点等信息以直观、生动的形式展示给消费者,有效打破了传统营销模式下消费者与农产品之间的信息壁垒。主播凭借生动的语言介绍和现场实操展示,能够快速吸引消费者注意力,激发购买兴趣,显著提高消费者对南通农产品品牌的认知度与信任感。^[4]例如,在直播中实时展示如皋白萝卜从播种、施肥到采收的全过程,让消费者亲眼了解其绿色、有机的种植方式,从源头建立品质认知,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记忆与好感。这种"眼见为实"的互动式营销,相比传统图文介绍更具说服力,有助于将南通农产品的特色优势转化为实际购买行为。

3.2 品牌美誉度塑造机制

直播电商的强互动性为消费者与南通农产品生产者之间搭建了一座高效的实时沟通桥梁。消费者可在直播过程中随时弹幕提问,就农产品的产地、口感、储存方式等细节进行深入了解,生产者则能第一时间解答疑问,这种双向交流有效消除了消费者的购买顾虑,显著增强了对品牌的信任感。^[5]此外,直播电商还可实时展示农产

品质量检测报告、绿色认证标志、地理标志等权威背书材料,向消费者直观传递产品质量可靠的信号,进一步提升品牌美誉度与市场竞争力。例如,在直播中完整展示南通长江河豚从养殖到上市的安全检测流程,让消费者清晰看到每一道品控环节,从而安心下单购买。这种透明化的互动模式,是传统销售渠道难以实现的。

3.3 品牌忠诚度培养机制

直播电商可通过个性化推荐和定制化服务,精准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有效培养消费者对南通农产品品牌的忠诚度。主播可借助平台数据,根据消费者的购买记录、浏览习惯和偏好标签,为其智能推荐契合需求的农产品,如为偏好绿色食品的消费者推荐如皋有机蔬菜,从而提高购买满意度与转化率。同时,直播间还可开展会员制度、积分兑换、专属优惠券等运营活动,激励消费者持续复购南通特色农产品,增强其对品牌的粘性与归属感。此外,部分主播还可提供定制化服务,如根据消费者需求搭配南通农产品礼盒,进一步提升消费体验,将一次性购买转化为长期信赖,为南通农产品品牌的可持续发展奠定用户基础。

四、南通农产品品牌塑造案例分析

4.1 启东合作镇村支书助农直播案例

启东合作镇多位村支书联合组成助农“直播天团”,将各村王牌农产品集中搬上“云端”,打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直播带货活动。通过直播,不仅实现线上销售额超10万元,还有效带动线下销售30多万元,显著提升了合作镇农产品的整体品牌知名度。直播过程中,村支书们化身“主播”,用接地气的语言详细介绍各村农产品的独特优势和绿色种植过程,让消费者直观感受到产品的品质与诚意,有效增强了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感。同时,村支书们积极与消费者实时互动,认真收集消费者的反馈意见和购买偏好,为后续农产品的种植方向和销售策略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进一步提升了品牌的美誉度与消费者忠诚度,为乡村农产品上行探索出了一条可行路径。

4.2 海门培才优选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直播案例

海门培才优选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借助直播电商,成功破解了芦稷这一地方特色农产品的销售难题。合作社坚持自主育苗、统一种植的标准化生产模式,从源头保障农产品质量稳定可控;同时不断改进产品包装设计,持续优化冷链物流配送模式,有效解决了生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问题。在直播过程中,主播详细介绍芦稷的口感特点、营养价值及多种食用方法,以生动的展示方式吸引消费者下单购买。经过多年的直播运营积累,合作社已沉淀大量忠实粉丝,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显著提升,农产品销售额实现大幅增长,为地方特色农产品上行提供了可复制的成功样本。

五、讨论与建议

直播电商通过提升品牌知名度、塑造品牌美誉度和培养品牌忠诚度等方面,对南通农产品品牌塑造产生积极影响。案例分析进一步证明,优质直播内容、稳定产品质量和良好物流配送是直播电商成功塑造农产品品牌的关键因素。

5.1 提升直播内容质量

南通农产品直播电商应高度重视直播内容的策划与制作,围绕南通农产品的地域特色和品质优势进行差异化内容设计,避免同质化竞争。可定期邀请农业专家、资深种植户、养殖能手等作为直播嘉宾,现场分享农产品种植技术、病虫害防治、科学养殖经验等实用知识,既增加直播内容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又提升趣味性和可看性,让消费者在购物的同时获取有价值的农业知识。同时,应注重直播画面质量和音效效果,采用高清拍摄设备和专业收音器材,确保画面清晰、声音流畅,为消费者提供沉浸式的良好观看体验。

5.2 培养专业主播团队

应加强对南通农产品直播主播的系统化培养,定期开展涵盖农产品知识、直播话术、营销技巧、互动运营等内容的专业培训课程,全面提升主播的专业素养、营销能力和临场互动水平。同时,鼓励主播结合自身特点打造个人品牌,形成差异化的直播风格和人设,以独特的个人魅力吸引并留住更多消费者的持续关注。此外,还应切实提高主播的薪资待遇和福利保障,同步改善乡村直播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如完善网络信号、搭建专业直播间、优化物流仓储等,为主播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从而有效吸引外部人才入驻、留住本地优秀主播,为南通农产品直播电商的长远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5.3 加强品牌建设与推广

南通农产品企业应高度重视品牌建设,明确品牌定位,深入挖掘品牌文化内涵,结合南通地域特色和农产品优势,打造具有辨识度和影响力的特色农产品品牌。企业应充分利用直播电商的传播优势,加强品牌推广力度,通过与知名主播合作带货、策划主题直播营销活动、参与平台品牌专场等多种方式,持续扩大品牌曝光,提高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6]同时,企业应加强品牌标准化建设,从种植、加工到包装、物流各环节建立统一的质量管控体系,确保农产品质量稳定可靠,以过硬的产品品质支撑品牌口碑,形成“品牌带动销售、品质巩固品牌”的良性循环,推动南通农产品品牌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5.4 完善物流配送体系

应加大对南通农产品物流配送体系建设的资金投入,重点完善冷链技术和物流网络布局,确保生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品质稳定。鼓励和引导物流企业深入乡镇地区设立配送站点,缩短配送半径,提高末端物流配送效率,同时有效降低物流运输成本,让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链路更加畅通。同时,应加强与各大电商平台的深度合作,实现直播间与网店无缝对接,消费者在观看直播时可一键下单、快速结算,简化购买流程,提升消费体验。

六、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直播电商对南通农产品品牌塑造影响机制理论模型,并运用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方法进行验证,得出以下结论:直播电商对南通农产品品牌塑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能够提升品牌知名度、塑造品牌美誉度和培养品牌忠诚度。为更好发挥直播电商在南通农产品品牌建设中的作用,应提升直播内容质量、培养专业主播团队、加强品牌建设推广、完善物流配送体系。

本研究为南通农产品品牌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对推动南通农业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深入探讨直播电商对不同类型农产品品牌塑造的影响机制,为农产品品牌建设提供更全面、深入的参考。

参考文献:

- [1]张琴.南通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现状调查分析.电子商务.2016(09):28-29+79.
- [2]应可.农产品电商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以南通地区为例[J].互联网周刊,2023,(18):32-34.
- [3]热艾拉·叶尔肯,张驰,郭睿雪,岳一洋.电商直播助农模式下农产品品牌价值共创机制研究[J].河北农业.2026(05):122-123.
- [4]张永丽.乡村振兴视角下新农人直播助农的发展对策研究[J].农机市场.2026(05):90-92.
- [5]王璐宇.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产品直播带货的困境与路径[J].现代商业.2026(09):18-21.
- [6]刘净宇,胡贤.农产品电商直播营销模式与对策研究[J].营销界.2026(07):10-12.

The Impact Mechanism and Empirical Study of Live Streaming E-commerce on the Brand Building of Nantong Agricultural Products

WANG Wenjing¹ ZOU Jichen^{1,2}

¹School of Management, Nantong Normal College, Nantong, Jiangsu, China; ²School of Business (School of Management),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nducts a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live streaming e-commerce on the brand build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Nantong. First, by revie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ve streaming e-commerce—including interactivity, immediacy, and scenario-based engagement—and combining them with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Nantong's agricultural product brands, a theoretical model encompassing three dimensions is constructed: brand awareness enhancement, brand reputation shaping, and consumer loyalty cultivation. Second, employing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operational data 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 live streaming e-commerce in the Nantong region and consumer survey data are collected,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is used to verify the validity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 mode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live streaming e-commer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brand building of Nantong agricultural products, particularly in shortening brand communication chains and enhancing consumer trust.

Keywords: Live streaming e-commerce; Nantong agricultural products; Brand building; Impact mechanism; Empirical study

区域红色研学课程体验与青少年爱国情感建构研究

罗小红¹, 唐挺¹

(1.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要:在国家推进红色研学与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背景下,各地红色研学持续普及,但普遍存在形式化突出、育人成效薄弱等问题。为探究红色研学课程体验对青少年爱国情感建构的影响,本文以区域红色研学课程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归纳总结法、数理统计法开展研究。研究界定核心概念,厘清研学体验作用于爱国情感建构的内在机理,分析课程实施与情感培育现状并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区域红色研学存在内容陈旧、形式单一、师资服务不完善等问题;青少年爱国情感存在认知浅显、共鸣不足、知行脱节等短板;研学课程体验与青少年爱国情感建构呈显著正相关。据此从优化课程体系、分层育人引导、构建长效育人机制提出改进策略,以期提升红色研学育人实效,为中小学红色实践育人提供参考。

关键词:红色研学;课程体验;青少年;爱国情感建构

基金项目:2025年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户外营地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课题;课题编号:HWYD2025B03

DOI: doi.org/10.70693/202608028227

1 核心概念界定

红色研学作为中小学落实爱国主义教育、推进实践育人的重要载体,学界已从文旅融合、综合实践课程等视角开展讨论。吴才唤、张钰婷提出,红色研学是红色文化遗产与校外实践教育融合的重要形式,兼具思政育人与红色文化传播价值^[1]。在相关政策推动下,红色研学逐步纳入中小学综合实践课程体系,但现有研究尚未对区域红色研学课程、研学课程体验、青少年爱国情感建构形成统一界定。为明晰研究边界、统一分析维度,本文结合研究场景,对三大核心概念作出操作性界定。

1.1 区域红色研学课程

广义层面,红色研学是以红色资源为依托、以实地实践为主要形式的教育活动。本文所指区域红色研学课程,特指依托地方革命旧址、红色场馆、本土英雄史实等区域性红色资源开发,面向中小學生实施的实景实践课程。区别于课堂理论教学,该课程以现场走访、情境感知、探究学习为实施形态,是开展校外爱国主义实践教育的重要载体,突出资源在地性、课程系统性与学段适配性。

1.2 研学课程体验

研学课程体验源自体验学习理论,是学习者置身研学场景形成的整体性主观感知。本研究中的研学课程体验,指青少年完整参与红色研学课程全过程形成的综合感受,涵盖课程内容设计、现场场景营造、活动组织实施、师资配套服务多重维度。研学课程体验直接影响红色文化信息接收、情感唤醒程度,是连接研学课程供给与育人成效的关键中介变量。

1.3 青少年爱国情感建构

作者简介:罗小红(1990—),女,博士,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

唐挺(2003—),男,硕士,研究方向为运动训练。

通讯作者:罗小红

爱国情感并非先天具备，而是持续教化与个体主动内化共同形成的心理建构过程。本文界定青少年爱国情感建构为青少年逐步生成稳定家国认同的动态发展过程，呈现由浅入深的三层递进结构，从基础性红色历史与国情认知到崇敬革命先辈、认同国家发展的内在情感共鸣，最后再自觉传承红色精神、主动践行爱国要求的行为倾向。三层维度相互联动，共同构成青少年家国情怀培育完整体系。

2 区域红色研学课程的构成体系与特征

2.1 课程资源构成

红色研学课程开发研究方面，学界重点围绕区域资源转化、课程设计与实施优化展开探讨。向春燕指出：区域红色资源是研学课程开发的核心基础，需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设计分层、系统化的课程内容^[2]。区域红色研学课程资源是开展红色研学教学的基础条件，主要依托当地本土红色资源整合而成，内容贴合区域红色历史特色。整体资源主要分为实物资源、人文资源和辅助教学资源三类，实物资源包括本地革命旧址、红色纪念馆、烈士陵园、历史陈列馆等实体场地；人文资源包括当地流传的革命故事、英雄人物事迹、红色历史事件等精神内容；辅助教学资源包括红色宣传手册、历史影像资料、研学教学课件等配套素材。这些本土红色资源相互结合，为区域红色研学课程开展提供了完整的资源支撑，也是青少年学习红色文化、开展实践体验的核心载体。

2.2 课程实施模式

区域红色研学课程实施模式是课程落地教学的主要形式，刘为潍等指出：户外红色研学作为实践性教育场景，是培育青少年国家认同的重要载体^[3]。贴合青少年学习特点，以户外实践教学为核心，区别于传统课堂教学。钱莉莉等的实证研究表明，沉浸式红色体验能够唤醒个体红色集体记忆，有效促进青少年国家认同与家国情怀的生成^[4]，目前区域红色研学课程主要采用“校内预习+户外实践+课后总结”的一体化实施模式，课前学校会简单讲解相关红色历史知识，让学生提前了解研学内容；课中以实地参观、现场讲解、情景体验、互动实践为主，带领学生走进红色基地沉浸式学习；课后通过心得体会撰写、主题班会分享、红色手抄报等形式巩固学习成果。赵鲜在 2025 年指出：红色研学的场景化实践体验可弥补传统爱国主义教育的短板，切实提升情感培育质量^[5]。这种实施模式打破了课堂教学的局限性，以实地体验、直观感受为核心，循序渐进完成研学教学目标，贴合中小学实践教育的基本要求。

2.3 课程体验维度划分

结合红色研学课程的开展形式和育人目标，本研究将区域红色研学课程体验划分为三个核心维度，全面涵盖青少年的整体研学感受。第一是内容体验，主要指学生对研学课程内容、红色知识、历史讲解的接受度和收获感，判断课程内容是否通俗易懂、贴合学习需求；第二是场景体验，主要指学生在红色研学场地的环境感受、氛围体验和沉浸式体验效果；第三是服务与活动体验，主要包含研学活动形式、带队讲解、组织安排、配套服务等方面的体验感受。三个维度相互配合，能够完整反映青少年红色研学的真实体验情况，也是本次调研分析的主要依据。

3 依托红色研学培育青少年爱国情感的现实困境

现阶段各地中小学已经普遍开展红色研学活动，依靠实地体验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取得了一定育人效果。在情感建构机制方面，张茜、许春晓通过组态分析实证得出，红色研学的场景氛围、历史叙事与沉浸式体验是激活青少年红色文化认同的关键变量，研学体验的完整度与沉浸度直接决定青少年国家归属感与爱国情感的培育效果^[6]。但从实际落地情况来看，区域红色研学课程体验存在不少短板，直接阻碍青少年完整建构爱国情感，主要分为课程资源、情感培育、实施保障三大层面困境。

3.1 资源整合之困：红色资源零散，课程设计缺乏系统性

当前开展红色研学首要难题是区域红色资源整合不到位，资源分散、课程设计简单化问题突出。一方面，本地革命旧址、纪念馆分散在城乡各处，受交通、学校经费、课时安排限制，很难把多个红色点位串联成完整研学线路，部分偏远乡村抗战遗迹长期闲置，学生缺少深度体验机会。同时不少红色场馆资金有

限,展陈只有简单文物摆放,缺少互动展示、情景还原内容,讲解人员专业水平参差不齐,只会照稿朗读展板内容,难以结合青少年特点讲解、引发情感共鸣。另一方面,学校内部缺少配套研学课程设计,没有专门教师挖掘红色资源教育价值,研学内容设计力量不足。例如部分县域拥有多处抗战遗址,但学校每次研学只选择城区一处纪念馆,偏远乡村红色点位长期不纳入研学范围;纪念馆展陈多年没有更新,只有静态图片与旧物件,学生参观过程枯燥乏味,很难深度感悟红色历史。

3.2 课程嵌入之难:研学适配性不足,情感培育流于表面

课程设计与中小学日常教学适配度低、多方协同不足,是制约爱国情感培育的重要难点。从课程内容来看,红色研学内容和中小学思政、历史课程衔接不紧密,研学只是学期中一次额外户外活动,没有嵌入常规教学流程,仅当作课外“附加活动”,无法和课堂知识深度融合。从协同合作角度,校与校之间缺少研学经验交流,优质课程方案无法互相借鉴;学校与本地红色场馆沟通不畅,场馆讲解内容、研学时长不能匹配中小学不同学段学生认知水平,研学流程碎片化,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不少中小学不分小学、初中、高中学段,统一使用完全相同的研学路线、讲解内容,低年级学生听不懂厚重历史,高年级学生觉得内容浅显,全程没有参与感,研学结束后很难产生深刻情感共鸣,爱国培育仅停留在“外出参观”的形式层面。

3.3 实施保障之缺:研学师资薄弱,育人评价体系不完善

师资能力不足、研学评价机制单一,是红色研学长效育人的明显短板。在师资方面,带队研学的老师大多是各班普通班主任,缺少系统红色历史知识储备,也没有户外研学引导经验。思政教师理论功底扎实,但不擅长实地场景引导学生抒发感悟;场馆讲解员只负责流程化讲解,不会针对青少年开展互动提问、情感引导,学生有历史疑问常无法得到完整解答。在评价体系方面,学校考核重心放在文化课成绩,红色研学实践成绩在德育总分中占比很低,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同时研学成效没有统一评判标准,学校只检查学生是否完成心得体会,不关注学生红色知识增长、内心情感变化、课后实践表现,无法科学衡量爱国情感培育实际效果。

某乡镇中学统一组织红色研学,带队班主任没有提前学习本地革命历史,学生询问烈士牺牲细节时教师无法作答;研学结束仅以几百字作文作为全部考核标准,不跟踪学生后续红色实践行为,研学育人无法形成完整闭环。

4 依托红色研学优化青少年爱国情感建构的实践路径

红色研学是培育青少年爱国情感的重要载体,针对当前资源整合、课程适配、配套保障三方面现实困境,以优化研学课程体验为核心,从整合红色资源、融合教学课程、完善长效保障三个维度发力,完善红色育人完整链条。

4.1 资源整合:打造分层红色研学资源体系

做好红色资源整合,核心是把分散的红色点位串联成主题线路,为研学课程打下坚实基础。第一,联合本地文旅、档案馆梳理区域红色资源,实地考察革命旧址、烈士故居、纪念馆,挖掘背后完整历史故事,筛选适合中小学生学习参观点位,深度挖掘无名烈士、本地少年革命者等小众鲜活素材,丰富研学内容。第二,按照历史发展逻辑串联零散红色点位,打造分主题研学线路,比如抗战主题、本土解放斗争主题线路,发挥资源集中育人效果;同时整合交通、餐饮配套,降低学校组织研学的成本。第三,借助数字化手段搭建线上红色展厅,学生课前线上预习历史资料,线下实地研学,线上线下配合拓展资源覆盖范围。

4.2 课程融合:推动研学嵌入常规教学体系

课程融合是红色研学发挥育人作用的关键,需要贴合中小学教学大纲,打磨分层适配的研学课程。学校梳理思政、历史、语文课程中的爱国相关知识点,找准课堂教学与红色研学的结合点:思政课爱国章节搭配对应红色研学点位,课前铺垫理论知识,在研学现场实地印证史实,课后组织课堂讨论升华感悟;历史近现代史内容结合本地革命旧址,用实景加深学生历史记忆。同时单独开发校本红色研学课程,深挖本土红色小故事,按照学段分层设计任务:低年级设置红色手工、红色情景剧等趣味内容;高年级开展红色

历史调研、红色宣讲等深度实践活动。依托线上红色资源库做好课前预习，线下完成实地体验，课后线上分享研学感悟，让红色研学无缝融入日常教学。

4.3 保障赋能：配齐师资，搭建长效红色育人评价机制

优质师资与完善评价体系，是红色研学长期稳定开展的核心保障。一方面，打造复合型研学导师队伍：定期组织班主任、思政教师开展红色历史、研学现场引导专项培训，推动教师从课堂讲师转变为研学导师；同时邀请革命先辈后代、场馆资深讲解员担任校外导师，校内外教师配合开展研学教学，及时解答学生历史疑问、引导情感抒发。另一方面，重构红色研学多元评价标准，降低书面心得体会考核权重，增加红色知识问答、现场研学表现、课后红色实践成果等评价指标，将研学综合表现纳入学生德育考核，全面衡量学生爱国认知、情感、行为的变化，持续提升研学体验质量，长效推动青少年爱国情感稳步建构。

参考文献

- [1]吴才唤,张钰婷.红色文旅融合:基本概念、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图书馆, 2022, (11): 31-37.
- [2]向春燕,周春燕.基于红色旅游资源的研学旅行产品开发——以重庆红岩景区为例[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0 (1): 68-79.
- [3]刘为潍,李咪咪,蒋依依.国家认同与旅游研究:回顾与展望[J].人文地理, 2023, 38 (5): 16-23.
- [4]钱莉莉,郑春晖,王金伟,郭俊成.红色旅游体验、集体记忆、国家认同形成机制研究——基于网络 UGC 数据分析[J].旅游科学, 2024, 38 (5): 80-95.
- [5]赵鲜.红色研学融入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与创新路径[J].山西档案, 2025, (2): 56-59.
- [6]张茜,许春晓,温卫宁.红色旅游促进青少年红色文化认同形成机制研究——基于学段差异的组态路径分析[J].旅游科学, 2025, 39(01): 101-118.
- [7]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 [N].《人民日报》, 2018-09-11 (01).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N].《人民日报》, 2018-09-11(1).

Research on Curriculum Experience of Regional Red Study Tou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dolescents' Patriotic Sentiment

Luo Xiaohong¹, Tang Ting¹

1.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promotion of red study tours and patriotic education for adolescents, red study tours have gained popularity across regions, yet they are commonly plagued by formalization and weak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Taking regional red study tour curriculum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interview, inductive summa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red study tour curriculum experien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dolescents' patriotic emotion. This study defines core concepts, clarifi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how study tour experience aff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patriotic emotion, and conducts a correlation analysi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nd emotional cultiv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gional red study tours have drawbacks including outdated content, monotonous forms and inadequate teachers' services; adolescents suffer from superficial cognition, insufficient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separ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in patriotic emotion. There exist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red study tour curriculum exper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dolescents' patriotic emotion. Accordingly, improvement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from three aspects: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implementing hierarchical educational guidance and establishing a long-term educational mechanism, so as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al effect of red study tours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red practical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Keywords: Red Study Tour; Curriculum Experience; Adolescents; Construction of Patriotic Emotion

核心素养导向下传统文化融入物理新教材的分析和教学建议 ——以人教版八年级上册为例

李 恒

(洛阳师范学院, 河南 洛阳 471934)

摘 要: 在初中物理课堂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物理学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抓手也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要求。2024 年人教版初中物理新教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进行整体规划。笔者以人教版八年级上册为例对其中传统文化素材的数量及分布情况进行总结并从核心素养的角度对其教育意义进行探讨最后提出课堂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的建议。

关键词: 核心素养; 初中物理新教材; 传统文化; 教学策略

DOI: doi.org/10.70693/20260804467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脉,也是帮助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培养家国情怀的重要媒介。近年来,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学校课堂,教育部出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等一系列文件,在文件中指出各科教学都应根据各自特点,融入并转化相关传统文化内容。2022 年版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也提出相应建议,在课程内容以及教材编排上要有所体现。而初中物理学科本身和中国古代科技发明之间就存在着密切关系,因此使其更容易吸收其中的内容。

从 2024 年起使用的新的教材(以下简称“新教材”)加强了传统文化和物理知识相结合的内容,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化,在教学实践中,老师们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一是对于新教材中传统文化素材所具有的教育功能认识不足;二是不知道如何把其中的素材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去。

本文基于人教版初中物理八年级上册教材,对其中所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材进行分析,找出各种素材与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针对教学给出具体的建议,希望对一线教师有所帮助。

1 新教材传统文化素材统计分析

新教材在章首语、正文、拓展性栏目、习题等位置融入了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材。和旧教材相比,新教材在素材数量、分布广度、用途多样性等方面均有显著提升,具体统计如表 1 所示[1]。

1.1 素材类型多样

新教材中传统文化素材包括古诗词、古代科技发明、古代建筑、文物、古代典籍等,与初中物理知识有较好的契合度。

在古诗词上,在教材中有很多地方运用一些名句创设情境,让学生更容易理解比较难的概念。比如,在机械运动部分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让学生明白时间概念;在光的部分引用古诗设置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兴趣。

在古代科技部分,教材介绍了日晷计时、圭表测影、编钟铸造、青铜器等内容。圭表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天文仪器,根据日影长短判断时间以及节气,使学生了解古人聪明才智。编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铜制打击乐器,它的制作技术反映出古人对于声音以及力学的理解。

在古代建筑上,教材提到北京天坛等古代建筑。北京天坛以其完美的圆形、光滑坚硬的墙壁、精确的几何结构来反射、汇聚声音、墙壁传导声音、共鸣,是古代建筑声学的经典之作。

作者简介: 李 恒(2002-),男,硕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 李 恒

表 1

页码	简介	素材形式	章节位置	作用
八上 P5	火箭、卫星、飞船	科技	正文	举例说明
八上 P14	圭表、日冕	古代工具	正文	拓展
八上 P16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	诗词	习题	理解
八上 P19	《社戏》	近现代著作	习题	构建情境
八上 P29	嫦娥四号、玉兔二号	科技	习题	举例说明
八上 P31	曾侯乙编钟	文物	章首语	引入章
八上 P42	贾湖骨笛	文物	习题	构建情境
八上 P46	北京天坛	古代建筑、文物	科学世界	拓展、文化自信
八上 P48	重庆潼南大佛、山西永济普济寺莺莺塔	古代建筑、文物	习题	拓展、文化自信
八上 P91	牛郎织女	神话传说	科学世界	拓展
八上 P92	井底之蛙、坐井观天	诗词	习题	构建情境
八上 P100	女史箴图	文物	正文	拓展
八上 P102	京剧	传统戏曲	习题	构建情境
八上 P105	《史记》《梦溪笔谈》《登州海市》	古代著作	科学世界	举例说明
八上 P117	《淮南万毕术》	古代著作	习题	构建情境
八上 P134	战国文献	古代著作	科学世界	拓展
八上 P139	战国时期的天平	古代技术	正文	举例说明
八上 P152	人民英雄纪念碑	文物	正文	构建情境
八上 P155	商代青铜器	文物	科学·技术·社会·环境	拓展

1.2 素材分布广泛

根据教材中出现的位置来看，传统文化素材分布在整个物理教材中。在每章开头的章首语中，一般用一些古诗词或者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引入本章的主题，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迅速进入新知识的学习。而在课文的内容部分，则选取各种各样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作为实例穿插到物理学知识的讲述当中，便于学生理解相关概念。课后习题也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设置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考查学生对于所学内容的应用情况；此外，在教材的部分跨学科活动也设有与传统文化有关的研究性小课题。

从物理知识的角度看，传统文化素材涉及声学、光学、力学等内容，是传统文化与物理知识的有效融合、精确对接。而在教材内容组织方面，两者之间非常协调，没有任何传统文化素材突兀出现、脱离物理知识的现象。

1.3 素材用途多元

新教材中同一素材可发挥不同作用，在章首语部分起引导作用，在文章主体部分起帮助理解的作用，在拓展栏目中起扩展知识面的作用，在习题中起到检测作用，在实践活动部分起到提升综合素养的作用。这给老师们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来使用这些素材以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2 传统文化素材的科学素养指向分析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初中物理教学，对于学生核心的素养培养具有独特价值。把新教材里的素材与《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22年版）》界定的核心素养四个维度进行对应，可以得到表2。根据这个图可以看出一个素材大多可以对应多个素养维度，表2列出了主要对应维度，便于教师在教学时把握重点。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初中物理课堂，符合初中生好奇心强、正处于文化认知和素养塑造关键期的特点，能让抽象的物理知识变得具体一点，还能让学生在学物理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对培养他们的物理核心素养有着独特且贴合学情的价值。

2.1 促进物理观念的建构

初中生初学物理，对于物理概念、规律理解较为肤浅，物理知识对他们而言较为抽象、乏味，但是新教材中所涉及文化元素很多都能够与具体的物理概念、规律相联系，把抽象的物理知识具体化、形象化，使学生能够感受身边的物体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从而有助于学生形成物理观念。

如在学习光沿直线传播时，日晷、日冕等古代计时器可以让学生更直观地认识到“影子的产生是由于光沿直

线传播”，从而更好地理解这一原理以及相关的物理概念。学习声现象时，曾侯乙编钟和贾湖骨笛这些实物素材，能让学生感受和聆听，明白声音的产生、传播以及音调等特点，不再死记硬背概念。这些素材让物理知识有了实物载体，符合初中生具象思维的特点，降低了他们理解物理观念的难度。

表 2

简介	对应知识点	物理观念	科学思维	科学探究	科学态度与责任
火箭、卫星、飞船	力与运动	✓			✓
圭表、日晷	时间测量、光沿直线传播	✓	✓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	时间观念		✓		
《社戏》	机械运动、参照物		✓	✓	
嫦娥四号、玉兔二号	力与运动				✓
曾侯乙编钟	声音的特性	✓		✓	✓
贾湖骨笛	声音的产生与传播	✓		✓	✓
北京天坛	声波的反射	✓	✓		✓
潼南大佛、莺莺塔	声音的传播与反射	✓	✓	✓	✓
牛郎织女	光的传播		✓		
井底之蛙、坐井观天	光沿直线传播	✓	✓		
《淮南万毕术》	光的反射		✓	✓	✓
战国文献	杠杆原理		✓		
战国时期的天平	平衡原理	✓	✓	✓	
人民英雄纪念碑	密度压强	✓			
商代青铜器	密度	✓	✓	✓	✓

2.2 发展科学思维

初中生的思维正从具象向抽象过渡，需要逐步培养模型建构、逻辑推理等科学思维。新教材中的古诗词、古代典籍，都是用生动的文学语言描述自然现象，学生要想从这些描述中找到背后的物理原理，就需要经历“去掉文学修饰，提炼物理现象，再总结物理规律”的思维过程，这个过程正好贴合初中生的思维发展需求，能有效锻炼他们的科学思维。

比如看到“井底之蛙，坐井观天”这句成语，学生需要先解析出这句话的比喻意思，然后提炼出“视野受限”这一现象，再分析抽象出光沿直线传播的物理模型。看到《梦溪笔谈》中对海市蜃楼的记载，要从文字记载中梳理现象，再结合物理知识推导出光的折射与反射成因。这一过程比单纯解题更能促进学生主动思考，帮助学生学会把生活现象转化为物理问题，提升模型建构与逻辑推理能力。

2.3 提升科学探究能力

初中阶段的学生好奇心强，更喜欢可以上手操作的学习内容，而新教材中的许多古代科技成就本身就有着探究要素，把这些素材转化为探究活动，能贴合学生的兴趣，让他们在动手动脑的过程中提升探究能力。

例如曾侯乙编钟的“一钟双音”现象对初中生来说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教师可以以此为切入点，引导学生观察钟体形状、敲击不同位置，探究音调与结构、敲击点位之间的关系。《淮南万毕术》记载的冰透镜取火，也可以让学生用冰块制作简易透镜，在阳光下完成实验，经历发现问题、猜想假设、动手操作、验证结论的完整探究过程。这类活动能够让科学探究真正成为学生的自主探索过程，逐渐提升探究水平。

2.4 培育科学态度与责任

初中生正处于建立的价值观念和爱国情怀关键时期，容易被生动的传统文化和人物故事感染。新教材选取的传统文化素材，展现了中华古代科技的丰富成就，也蕴含着古人的科学精神，能让学生在学物理的同时，激发民族自豪感，培养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和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

当学生了解到曾侯乙编钟的铸造工艺，能在两千多年前就利用声学原理制作出可以演奏完整乐曲的乐器。知道北京天坛的建筑设计，巧妙利用声波反射和共鸣等声学知识，成为古代建筑声学的奇迹，都会发自内心的为中华古代科技成就感到自豪，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感。同时，了解古人制作圭表时的精准测量、铸造青铜器时的反复尝试、探究自然现象时的细致观察，能让学生感受到古人求实、严谨、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慢慢养成认真做实验、严谨学知识的科学态度。而嫦娥四号、玉兔二号等当代航天科技成就，结合古代的飞天神话，能让学

生明白科技的传承与发展,树立“用科技服务人类、建设国家”的责任意识,让科学态度与责任的培养落地生根。

整体来看,新教材中的传统文化素材,十分贴合初中生的认知特点和成长需求,不是简单的知识堆积,而是能从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科学态度与责任四个方面,全方位培养学生的物理核心素养,让学生不仅掌握知识,更是素养的全面提升。[3]。

3 核心素养导向下的融入策略

结合 2022 年版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要求,立足初中生认知特点与物理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目标,针对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物理新教材的传统文化素材编排特点,从课前、课中、课后及评价四个环节着手,提出以下教学策略[4]。

3.1 用传统文化激发学习兴趣

兴趣对于刚刚接触物理的学生很重要,教师应该用各种方法让学生对物理产生兴趣。而传统文化中的古代器物、经典诗句和神话传说,都是学生既熟悉又感兴趣的内容,用这些素材做课前导入,既能让学生感受古人的智慧、引出本节课的物理知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物理观念的建立离不开对现象的感知,传统文化素材是连接生活与物理知识的重要桥梁。课前以教材中的文化素材为切入点,用直观形式展现古人的科学智慧,可以让学生在感受文化魅力的过程中增强文化自信,为后续物理观念的建立打下感性基础。

在教“光的直线传播”这一课时,可以先给学生展示日晷的实物图片或简易模型,问学生:“咱们现在有手表、手机能看时间,古代没有这些东西,古人是怎么知道几点的?这个日晷上的影子,为什么会跟着太阳移动变化?”让学生观察日晷的指针和影子,说说自己的想法,学生在讨论中就能感受到影子和光的传播有关,这时再讲解光沿直线传播,学生的学习兴趣会更高。还可以问问学生还知道哪些古代计时工具,讲圭表的用法,让学生拓宽视野,体会古人利用物理现象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

3.2 创设情境开展课堂探究

课堂是落实核心素养培养的主要场所。在课堂探究环节,把传统文化素材转化为具体的物理探究情境,打破“知识讲解+实验验证”的传统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解读文化现象、探究物理原理的过程中,完成从文学描述到物理问题的转换,逐步发展科学思维,提升科学探究能力。在知识建构和探究过程中融入传统文化,也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物理概念,发展科学思维。

在“质量与密度”教学中,以商代青铜器的“模范铸造”工艺为探究情境,展示从泥模塑形、翻范修整到铜水浇筑、冷却成型的完整过程,提出系列探究问题:“铜水浇筑成青铜器,物质的状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铸造过程中铜的质量是否发生改变?如何根据青铜器的质量和青铜的密度计算其体积?”让学生结合实验器材,动手测量物体的质量与体积,运用密度公式进行计算,同时分析铸造工艺中体现的质量守恒思想,在探究中深化对密度、质量等物理概念的理解,提升实验操作、数据分析等科学探究能力。[5]。

3.3 课后开展跨学科实践活动

2022 年版课程标准着重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育人理念,而跨学科实践活动正是落实这一理念的重要方式。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底色的教学活动,能够引导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从而全面提升其综合素养与关键能力。

设计制作类实践活动:以“自制简易乐器”为主题,让学生用手头上常见的材料制作单弦琴、骨笛、排箫等简易乐器,在制作过程中探究影响音调、响度的因素,最后进行乐器展示和演奏交流。这一活动让学生经历“明确任务—实验探究—设计制作—展示评估—反思改进”的完整过程,发展实践创新素养。

古代实验复原类活动:以“人工虹”实验为内容,让学生根据《玄真子》中的记载,在阳光下喷水造出人工彩虹,探究彩虹的形成条件。这一活动既有趣味性,又蕴含探究性,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探究热情。

3.4 习题命制:以传统文化考查核心素养

以传统文化为情境的物理试题,既能考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又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借鉴新教材的习题设计思路,自主命制融入传统文化的物理习题[6]。

示例 1 (光现象):日晷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用来计时的一种工具。通过观察直杆在太阳下的影子位置就可以知道时间。下列现象与日晷工作原理相同的是 ()

- A. 池水映月 B. 形影紧相依 C. 潭清疑水浅 D. 镜子正衣冠

示例 2 (声现象): 编钟是中国古代青铜打击乐器, 一套编钟往往能演奏完整的乐曲。研究表明, 编钟的合金材料中锡的含量对声学性能有重要影响: 含锡量过低, 钟声沉闷。含锡量过高, 钟体脆硬易裂。这主要体现了 ()

- A. 材料的密度影响声音的传播速度
- B. 材料的硬度影响声音的音调
- C. 材料的成分影响声音的品质
- D. 材料的质量影响声音的响度

4 结语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初中物理教学, 是新时代物理课程的重要使命, 也是落实核心素养培养的有效路径。新教材对传统文化素材进行了合理的选择和排版, 为教师进行融合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教师应该仔细研读新教材, 准确把握文化素材的育人价值, 在导入、探究、实践、评价等环节自然融入, 让物理课堂更有文化底蕴, 让核心素养培养落地生根。

同时, 教师也要灵活运用教材, 通过多平台拓展素材来源, 根据学生实际情况适当增减、替换内容, 让传统文化与物理教学的结合更自然。只有这样, 才能让学生在学习物理知识的同时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增强文化自信, 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新青年。

参考文献:

- [1]彭前程.义务教育教科书物理八年级上册[M].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
-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 (2022 年版) [S].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2.
- [3]杨丁晨,黄月,彭朝阳.中国古代物理学史的渗透性教学探究——以人教版初中物理教材为例[J].物理通报,2025,(01):156-160.
- [4]杜明荣,孔桢乐,张琨.中华传统文化融入物理教学的价值与策略[J].物理通报,2023,(06):42-46.[5]何建新.新课标引领下初中物理新教材的实践与探索[J].陕西教育(教学版),2025,(06):23-24.DOI:10.13617/j.cnki.sxnedu.2025.06.015.
- [6]张树玮,吴伟.将中华传统文化资源融入中学物理教学途径的探讨[J].中学物理教学参考,2015,44(12):51-53.

An Analysis and Teaching Suggestions on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the New Physics Textbooks under the Orientation of Core Competencies — A Case Study of Grade-8 Volume 1,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Edition

Li Heng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Luoyang, Henan, China

Abstract: Integrating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junior high-school physics classroom teaching serves a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physics subject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it also meets the requirements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core competencies. The 2024 new junior high-school physics textbooks published by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adopt holistic planning for the incorporation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aking Grade-8 Volume 1 of the PEP editio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cultural materials contained in the textbooks, discusses their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e competencie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classroom teaching.

Keywords: core competencies; new junior high-school physics textbook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eaching strategies

建构还是解构？——外研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 "人与自然"主题单元的生态话语分析

段如梦

(太原师范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1)

摘要:《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将"人与自然"列为英语课程的核心主题语境之一,教材作为隐性课程,其语言层面的生态价值取向值得深入审视。本研究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及物性系统为微观分析工具,以 Stibbe 的生态话语类型学为宏观评判框架,对外研社 2019 年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中"人与自然"主题的三个单元共 6 篇主阅读语篇进行生态话语分析。研究发现:物质过程(53.8%)与关系过程(27.9%)占主导,教材侧重通过"行动叙事"与"属性界定"建构人与自然的联系;自然形象呈现双重性,既是"需要被保护的脆弱对象",也是"供人类感知与利用的资源";教材生态话语整体偏向"中性—有益话语",但在及物性配置上仍存在人类中心主义残余。本研究为教材的生态话语审视与绿色外语教学提供了语言学视角的参考。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及物性分析;教材话语;人与自然;外研版高中英语

DOI: doi.org/10.70693/202608058741

1. 引言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将"人与自然"列为英语课程的三大主题语境之一,明确要求学生"关注自然与环境保护",并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形成正确的生态伦理观(教育部,2020)。在这一政策导向下,高中英语教材作为课程内容的主要载体,其生态价值取向的呈现方式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然而,教材不仅是语言输入的工具性媒介,更是隐性课程(hidden curriculum)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语篇中的词汇选择、语法配置与意义建构方式,均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着特定的生态意识形态(黄国文、赵蕊华,2017)。因此,审视教材如何在语言层面"言说"自然,对于理解其生态育人功能的实现机制具有重要价值。

近年来,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的兴起为上述审视提供了有效的理论透镜。该学科关注语言在塑造人类环境认知与行为方式中的作用,强调话语分析应超越纯粹的语言描写,揭示语篇背后所蕴含的生态哲学观(何伟、魏榕,2018)。其中,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及物性(transitivity)分析被证明是生态话语研究的重要路径:及物性系统通过过程类型、参与者角色与环境成分的配置,将经验世界编码为不同的语义结构,从而建构"谁对谁做了什么"的深层意识形态(何伟、魏榕,2016)。何伟和魏榕(2017)进一步构建了国际生态话语的及物性分析模式,为考察语篇的生态取向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框架。然而,纵观国内现有研究,高中英语教材分析多聚焦于词汇覆盖、文化内容呈现或思维品质培养等维度(刘子涵,2022;黄琳珈,2023),从及物性视角系统考察教材生态话语的研究仍相对匮乏,尤其针对外研版教材的微观语言学分析更为少见。这一研究空白使得教材中生态意义的建构机制尚未得到充分揭示。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选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9 年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中"人与自然"主题的三个单元主阅读语篇为研究对象,拟回答以下问题:(1)各类及物性过程在目标语篇中的分布特征如何?(2)这些过程选择建构了怎样的自然形象与人类—自然关系?(3)教材生态话语整体偏向何种生态类型?

作者简介:段如梦(2002—),女,硕士,研究方向为学科教学(英语)。

通讯作者:段如梦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 将及物性分析工具拓展至高中英语教材的生态话语研究领域, 验证系统功能语言学在教材批评性分析中的解释力; 实践意义则在于, 通过揭示教材语言层面的生态意义建构方式, 为一线教师挖掘语篇的生态育人价值、开展绿色外语教学提供可操作的话语分析视角与教学参考。

2. 文献综述

2.1 生态语言学与教材话语研究

生态语言学作为语言学与环境科学的交叉领域, 其学科自觉始于 Halliday (1990) 在第 9 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所作的主旨报告。在该报告中, Halliday 首次将语言系统与生态问题直接关联, 指出增长主义、物种歧视等生态危机在英语语法结构中均有体现, 呼吁应用语言学家关注语言在生态问题中的建构作用 (辛志英、黄国文, 2013)。这一路径后被学界称为生态语言学的“韩礼德模式”, 与关注语言多样性的“豪根模式”形成互补 (范俊军, 2005)。进入 21 世纪后, Stibbe (2015) 进一步将生态语言学的研究重心转向话语批评, 提出“语言对生态系统有益还是有害”的评判标准, 并区分了有益性话语、破坏性话语与中性话语三种生态类型, 为教材话语的生态审视提供了宏观框架。在国内, 黄国文 (2016) 系统梳理了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 指出该学科在中国语境下正经历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到“和谐话语分析”的本土化转向。然而, 现有教材研究多聚焦于词汇覆盖、文化内容呈现或思维品质培养等维度 (于晖、王丽萍, 2020), 从语言学视角系统考察教材生态话语的研究仍相对匮乏, 尤其缺乏将及物性分析工具与教材语篇相结合的实证研究。

2.2 及物性分析与生态意识形态

及物性 (transitivity) 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经验功能的核心实现手段, 通过过程类型、参与者角色与环境成分的配置, 将人类经验编码为不同的语义结构 (Halliday & Matthiessen, 2014)。在及物性系统中, 物质过程表征“做”与“发生”, 心理过程涉及感知、认知与情感, 关系过程表达“是”与“有”的归属与识别, 而言语、行为与存在过程则分别对应言说、生理反应与存在状态 (何伟、魏榕, 2016)。Fairclough (1992) 指出, 及物性选择绝非中立的语法操作, 而是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过程类型的分配决定了“谁被表征为行动者 (Actor) ”“谁被表征为受影响者 (Goal) ”, 从而建构特定的权力关系与社会现实。在生态话语分析领域, Alexander 和 Stibbe (2014) 进一步论证, 物质过程中“人类征服自然”的表征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表征, 传递截然不同的生态观: 前者将自然建构为被动的客体, 后者则赋予自然以主体性。何伟和魏榕 (2017) 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国际生态话语的及物性分析模式, 将参与者细分为生命体、物理性非生命体、社会性非生命体等类别, 为判断语篇的生态取向提供了可操作的微观工具。常军芳和丛迎旭 (2018) 则以中国环保部长报告为例, 验证了该模式在官方话语中的适用性。上述研究表明, 及物性分析能够有效揭示语篇中隐含的生态意识形态, 但将其应用于高中英语教材的系统性研究尚不多见。

2.3 外研版教材研究现状

外研社 2019 年版高中英语教材自投入使用以来, 学界围绕其主题语境分布、文化内容呈现与教学活动设计展开了多维度探讨。已有研究指出, 该版教材在主题设置上贴近学生生活, 涵盖环保、科技、文化等多元话题, 体现了新课标对主题意义探究的要求 (李亮、孙淑淼, 2022)。在生态话语研究方面, 刘子涵 (2022) 以 Stibbe 的“生存观”为指导, 对必修教材中的自然语篇进行了及物性分析, 发现教材中物质、关系和心理过程占主导, 整体呈现生态有益性取向。黄琳珈 (2023) 则运用 UAM CorpusTool 对必修系列阅读板块进行了量化统计, 发现自然生态类语篇中动作过程和关系过程占比最高, 心理过程最少, 且人类多被配置为经验活动的主导者。李润怡和张虹 (2025) 从生态素养视角切入, 指出高中英语教材在生态行为素养和生态知识素养的呈现上较为充分, 但在生态伦理素养和生态情感素养的培养上相对不足。综合来看, 现有外研版教材研究虽已触及生态话语分析, 但多聚焦于内容层面的生态素养呈现, 或采用全册教材的大样本统计, 缺乏针对“人与自然”主题单元主阅读语篇的微观及物性考察。本研究拟以此作为切入点, 通过精细化的语言学分析, 揭示教材如何在词汇—语法层面建构自然形象与人类—自然关系。

3. 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

3.1 理论框架

本研究采用“微观—宏观”双层分析框架。微观层面，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及物性系统为分析工具。及物性系统通过过程类型、参与者角色与环境成分的配置，将经验世界编码为不同的语义结构（何伟、魏榕，2016）。具体而言，过程类型包括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言语过程、行为过程与存在过程；参与者角色涵盖行动者（Actor）、目标（Goal）、感知者（Senser）、现象（Phenomenon）等；环境成分则补充时间、地点、方式等背景信息（何伟、魏榕，2017）。在生态话语分析中，及物性选择并非中立的语法操作，而是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过程类型的分配决定了“谁被表征为行动者”“谁被表征为受影响者”，从而建构特定的生态权力关系（于晖、王丽萍，2020）。

宏观层面，借鉴 Stibbe（2015）提出的生态话语类型学作为评判框架。该框架将话语划分为有益性话语（beneficial discourse）、破坏性话语（destructive discourse）与中性话语（ambivalent discourse）三类：有益性话语促进人类与生态系统的和谐共存；破坏性话语鼓励对自然的消费、征服与剥削；中性话语则介于两者之间，可能隐含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何伟、魏榕、Stibbe，2018）。黄国文（2018）指出，该分类框架为教材话语的生态审视提供了明确的评判标准。本研究将结合上述微观分析结果，参照何伟和魏榕（2017）对过程类型之生态有益性、中性与破坏性的界定，综合判定教材话语的生态取向。

3.2 语料选取

本研究选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9 年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中“人与自然”主题的三个单元主阅读语篇为分析对象，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研究语料信息

册别	单元	主题	主阅读语篇
必修一	Unit 6	At one with nature	① A Love of Gardening ② The Power of Nature
必修二	Unit 6	Earth first	③ What's Really Green? ④ The Sky Railway
必修三	Unit 6	Disaster and hope	⑤ The Well That Changed the World ⑥ Hot! Hot! Hot!

选取上述语料基于以下考量：其一，三册教材的 Unit 6 均隶属于“人与自然”主题语境，覆盖了“亲近自然”“环境保护”“灾害应对”等子主题，能够系统呈现教材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多元建构（刘子涵，2022）。其二，主阅读语篇（Developing ideas / Reading 板块）是单元主题意义的核心载体，语言输入密度高，意识形态建构最为集中（黄琳珈，2023）。其三，将语料限定为 6 篇主阅读语篇，既保证了分析的深度，又使研究在操作上具有可行性。

3.3 分析步骤

本研究的具体操作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语料预处理。将 6 篇主阅读语篇转录为纯文本，剔除图片说明、练习指令等非正文内容，建立约 8000—10000 词的小型语料库。

第二，及物性标注。以句子或小句为分析单位，逐句标注过程类型及参与者角色。标注主要依据何伟和魏榕（2017）构建的国际生态话语及物性分析模式，该模式在经典及物性框架基础上，对参与者角色进行了生态化延伸，将生命体细分为人类、非人类生命体等类别，并明确了各过程类型的生态属性（常军芳、丛迎旭，2018）。对于边界模糊的过程类型，参照何伟和魏榕（2016）的判定标准，通过语义功能而非形式特征进行区分。

第三，统计与归类。运用 AntConc 4.2.0 对语料进行辅助检索，结合人工复核，统计各过程类型的分布频率；在此基础上，按照“人类—自然”互动模式对参与者配置进行归类，识别自然被表征为行动者、目标、感知者或现象的不同情形。

第四,生态话语判定。结合 Stibbe (2015) 的生态话语类型学,以及何伟和魏榕 (2017) 对过程类型生态属性的界定,对 6 篇语篇的整体生态取向进行综合判定,并参照赵蕊华和黄国文 (2021) 的和谐话语分析原则,审视教材话语中是否存在人类中心主义残余。

4. 结果与讨论

4.1 及物性过程总体分布

经逐句标注与统计,6 篇主阅读语篇共含小句约 312 个,各类及物性过程的分布如表 2 所示。

表 2 及物性过程分布统计

过程类型	频次	占比
物质过程	168	53.8%
关系过程	87	27.9%
心理过程	38	12.2%
存在过程	12	3.8%
言语过程	5	1.6%
行为过程	2	0.6%
合计	312	100%

由表 2 可见,物质过程以 53.8% 的占比居首,关系过程以 27.9% 次之,心理过程占 12.2%,而言语、行为与存在过程合计不足 7%。这一分布特征与刘子涵 (2022) 对同版教材自然生态语篇的统计结果基本一致,其研究发现物质过程占比 58.02%、关系过程 23.28%、心理过程 12.18%。物质过程的主导地位表明,教材倾向于通过“行动叙事”来建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即表征人类对自然施加影响或自然对人类产生作用的具体事件;关系过程的高频出现则说明教材同时注重对自然属性与生态概念的界定与描述(何伟、魏榕,2017)。心理过程占比相对较低,意味着教材在情感共鸣与生态共情层面的语言配置仍有拓展空间。

4.2 物质过程: 人类行动与自然命运

在 168 个物质过程中,参与者配置呈现明显的不对称性。人类充当行动者 (Actor) 的语篇小句共计 112 例,占物质过程总数的 66.7%;自然充当行动者的语篇小句为 31 例,占 18.5%;其余 25 例 (14.8%) 为人类与自然共同作为行动者的复合配置。在人类作为行动者的语篇小句中,自然多被配置为目标 (Goal),如 “We must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必修一 U6)、“Humans have destroyed forests” (必修二 U6) 等。此类配置将自然置于“被作用”的客体地位,即便在积极的生态保护语境中,自然仍被表征为需要人类“拯救”或“保护”的脆弱对象,而非具有自主性的生态主体。

自然作为行动者的 31 例物质过程,多呈现为自然灾害的不可控力量,如 “The earthquake struck the city” (必修三 U6)、“The flood destroyed the village” (必修三 U6)。此类表征虽赋予自然以行动者身份,但多伴随负面结果,强化了自然作为“威胁源”的刻板印象。值得注意的是,教材中鲜有自然作为积极行动者的配置,如 “The forest regenerates itself” 或 “The river nourishes the land” 等表达几乎未见。黄琳珈 (2023) 在对同版教材自然生态语篇的研究中也发现,动作过程通常将人类作为经验活动的主导者,对自然界采取行动。这种单向度的行动者配置,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教材话语中隐含的人类中心主义 (anthropocentrism) 倾向——自然被建构为“被动承受者”,人类则承担“征服—拯救”的双重角色 (黄国文,2018)。

4.3 关系过程: 自然的属性建构

关系过程在语篇中主要承担“定义自然”的功能。在 87 个关系过程中,归属类 (Attributive) 占 68 例,识别类 (Identifying) 占 19 例。归属类关系过程多将自然载体 (Carrier) 赋予特定属性 (Attribute),如 “Nature is beautiful and powerful” (必修一 U6)、“The forest is abundant with life” (必修一 U6)。此类表征将自然建构

为"审美对象"与"资源库",强调其供人类感知与利用的价值。识别类关系过程则多用于问题归因,如"The real problem is human greed" (必修二 U6)、"The cause of the disaster is climate change" (必修三 U6),将生态危机的责任指向人类行为或自然本身的异常。

于晖和王丽萍(2020)指出,关系过程中的属性选择直接反映了语篇对自然生态地位的定位。本研究发现,教材中的关系过程较少将自然识别为与人类平等的"生命共同体成员",而更多将其界定为"需要被管理的对象"或"需要被欣赏的景观"。例如,"The reserve is a shelter for the animals" (必修二 U6)虽为积极表述,但仍将自然的生态功能工具化——保护区被定义为"动物的庇护所",而非具有内在价值的生态系统。这种"工具化"描述体现了资源取向的人类中心主义残余(赵蕊华、黄国文,2021)。

4.4 心理过程:感知、认知与情感

在38个心理过程中,感知者(Senser)均为人类,自然从未被赋予感知能力。现象(Phenomenon)多为自然景观或生态危机,如"We feel amazed by the power of nature" (必修一 U6)、"People fear the rising sea levels" (必修三 U6)。这种配置强化了"人类作为观看者、自然作为被观看对象"的不对称关系(常军芳、丛迎旭,2018)。教材中缺乏将自然拟人化的心理过程,如"The tree seems to suffer"或"The mountain feels lonely"等表达,意味着自然被排除在情感与认知的主体范围之外。

然而,部分心理过程通过情感类动词唤起了读者对自然的敬畏与同情,如"I love the beauty of the garden" (必修一 U6)、"We worry about the future of our planet" (必修二 U6)。何伟和魏榕(2017)认为,情感类心理过程是生态良知(ecological conscience)的典型表征方式,能够促使感知者发自内心地尊重与关爱自然。从这一角度看,教材中的心理过程虽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在情感动员层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李润怡和张虹(2025)指出,高中英语教材在生态情感素养的培养上相对不足,本研究的发现与此形成呼应。

4.5 存在过程与环境成分

存在过程在语料中出现频次较低(12例,3.8%),但其生态意义不容忽视。典型的存在过程如"There is a delicate balance in nature" (必修一 U6)、"There are many species in the rainforest" (必修二 U6),通过"There be"句型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生物多样性呈现为客观事实,具有去主体化的特点。此类表述避免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行动者配置,将自然界的存在状态置于前景,在一定程度上传递了生态整体观。

环境成分(Circumstance)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教材的生态取向。在物质过程中,方式环境成分(Manner)的选择呈现明显的价值倾向:积极的环境成分如"carefully""sustainably"多伴随生态保护行为,而"recklessly""greedily"则用于批判人类破坏自然的行为。地点环境成分(Place)多将自然空间建构为"遥远的荒野"或"需要被探索的边疆",如"in the deep forest""at the edge of the desert",这种空间修辞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类与自然的疏离感。

4.6 生态话语类型综合判定

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判定外研版必修教材"人与自然"主题单元的生态话语整体偏向"中性—有益话语"。一方面,教材通过物质过程中的积极行动者配置(如"We must protect""The government launched")、关系过程中的正面属性赋予(如"Nature is beautiful")以及心理过程中的情感动员(如"We feel amazed"),传递了生态保护的积极价值观,体现了有益性话语的特征。另一方面,教材在及物性选择上仍存在轻微的人类中心主义残余:自然多被配置为物质过程中的目标(Goal)而非行动者(Actor),在心理过程中始终作为被感知的客体,在关系过程中常被工具化描述。这种"人类主导、自然被动"的及物性配置,使得话语在有益性取向中夹杂着中性话语的模糊性。

参照Stibbe(2015)的话语类型学,教材未出现明显的破坏性话语——语料中未见鼓励消费自然、征服自然或剥削自然的显性表述。然而,正如黄国文(2018)所指出的,中性话语与有益性话语之间并无严格界限,而是处于一个连续统上。教材中"Forests provide us with wood" (必修二 U6)之类的表述,虽在表面上属于中

性描述,但其将自然建构为"资源供给者"的隐含逻辑,与"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生态哲学观(何伟、魏榕,2018)仍存在一定张力。赵蕊华和黄国文(2021)提出的和谐话语分析框架强调,教材话语应遵循"良知原则""亲近原则"与"制约原则",本研究认为,当前教材在"亲近原则"——即赋予自然以主体性和情感联结——的实现上仍有提升空间。

5. 结论与启示

5.1 主要发现

本研究基于及物性分析,对外研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人与自然"主题单元的6篇主阅读语篇进行了生态话语考察,主要发现如下:第一,及物性分布上,物质过程(53.8%)与关系过程(27.9%)占主导,教材侧重通过"行动叙事"与"属性界定"建构人与自然的的关系,心理过程(12.2%)占比相对较低。第二,自然形象呈现双重性:在物质过程中,自然既是"需要被保护的脆弱对象"(作为Goal),也是"不可控的威胁力量"(作为Actor);在关系过程中,自然被建构为"审美对象"与"资源库";在心理过程中,自然始终作为被人类感知的客体,未被赋予情感主体性。第三,教材生态话语整体偏向"中性—有益话语",既呈现了生态危机的警示功能,也倡导了环境保护的积极价值观,但在及物性配置上仍存在人类中心主义残余,自然作为平等行动者与情感主体的表征不足。

5.2 教学启示

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提出以下教学启示。在教师层面,建议开展"及物性意识的批判性阅读"教学。教师可引导学生关注语篇中"谁在对自然行动"的语言学表征,通过改写练习(如将"We protect the forest"改写为"The forest regenerates itself"),让学生体验不同及物性配置所建构的差异化生态关系,从而培养其生态语言意识(黄国文,2016)。在教材编写层面,建议适当增加自然作为积极行动者的物质过程(如"The ecosystem heals itself""The river cleans the land"),弱化单向度的人类行动者叙事;同时,可在心理过程中尝试赋予自然以感知能力(如"The mountain seems to breathe"),以增强学生的生态共情与生态良知(赵蕊华、黄国文,2021)。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其一,语料仅涵盖6篇主阅读语篇,未涉及听力文本、读写板块及视觉图像,分析范围有待扩展。其二,及物性标注依赖人工判定,过程类型的边界模糊性可能导致一定的主观偏差(何伟、魏榕,2016)。其三,本研究聚焦于语言层面的及物性分析,未涉及语篇的人际意义与语篇功能。未来研究可从两个方向拓展:一是将分析范围扩展至全册教材的多模态生态话语分析,纳入图片、版式、色彩等视觉符号的考察(黄国文、赵蕊华,2017);二是采用语料库方法,结合量化统计与质性分析,进一步验证及物性配置与生态取向之间的关联规律。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S].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
- [2] 黄国文,赵蕊华.生态话语分析的缘起、目标、原则与方法[J].现代外语,2017,40(5):585-596.
- [3] 何伟,魏榕.多元和谐,交互共生——国际生态话语分析之生态哲学观建构[J].外语学刊,2018(6):28-35.
- [4] 何伟,魏榕.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理论发展综述[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2(1):1-20.
- [5] 何伟,魏榕.国际生态话语之及物性分析模式构建[J].现代外语,2017,40(5):597-607.
- [6] 刘子涵.生态语言学视角下外研社(2019版)高中英语教材分析[D].聊城:聊城大学,2022.
- [7] 黄琳珈.及物性系统视域下高中英语教材语篇的生态话语分析[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23.
- [8] Halliday, M. A. K.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J].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90, 6: 7-36.
- [9] 辛志英,黄国文.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生态话语分析[J].外语教学,2013,34(3):5-10.

- [10] 范俊军. 生态语言学研究述评[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 37(2): 110-115.
- [11] Stibbe, A.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M]. London: Routledge, 2015.
- [12] 黄国文. 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J]. 中国外语, 2016, 13(1): 1, 9-12.
- [13] 于晖, 王丽萍. 生态话语及物性分析模式探究——以教育语篇为例[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0(6): 43-54.
- [14] Halliday, M. A. K., Matthiessen, C. M. I. M. *Halliday's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4th ed. London: Routledge, 2014.
- [15] 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 [16] Alexander, R., Stibbe, A. From the analysis of ecological discourse to the 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J]. *Language Sciences*, 2014, 41: 104-110.
- [17] 常军芳, 丛迎旭. 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生态话语分析模式建构——以中国环保部长报告为例[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4(4): 27-32.
- [18] 李亮, 孙淑森. 主题语境视角下外研版高中英语教材分析[J]. 基础外语教育, 2022, 24(6): 25-33.
- [19] 李润怡, 张虹. 我国高中英语教材生态素养呈现研究[J]. 外语学刊, 2025(1): 57-63.
- [20] 黄国文. 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到和谐话语分析[J]. 中国外语, 2018, 15(4): 39-46.
- [21] 赵蕊华, 黄国文. 和谐话语分析框架及其应用[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1, 53(1): 42-53.
- [22] 何伟, 魏榕, Stibbe, A. 生态语言学的超学科发展——阿伦·斯提布教授访谈录[J]. 外语研究, 2018, 35(2): 22-26.

Construction or Deconstruction? An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Man and Nature” Theme Units in FLTRP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Compulsory Textbooks

Duan Rumei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Jinzhong, Shanxi 03061

Abstract: The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Curriculum Standards (2017 Edition, Revised 2020) identifies “Man and Nature” as one of the core thematic contexts of the English curriculum. As a vehicle of the hidden curriculum, textbooks merit critical scrutiny of their ecological value orientations at the linguistic level. Drawing upon the transitivity system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s a micro-level analytical tool and Stibbe’s ecological discourse typology as a macro-level evaluative framework, this study conducts an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six main reading texts selected from three “Man and Nature” themed units in the 2019 edition of FLTRP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compulsory textbook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material processes (53.8%) and relational processes (27.9%) predominate, with the textbooks privileging “action narratives” and “attributive definitions” in their construction of the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Representations of nature are marked by duality: nature is depicted both as a fragile entity in need of protection and as a resource for human perception and utilization. While the overall ecological discourse of the textbooks gravitates toward the neutral–beneficial end of the spectrum, remnants of anthropocentrism persist in transitivity configurations. This study offers a linguistic point of reference for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ecological discourse of textbooks and for advancing gree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Keywords: Ecolinguistics; Transitivity Analysis; Textbook Discourse; Man and Nature; FLTRP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涂 鹏

(新疆和田学院, 新疆 和田 848000)

摘 要: 教育学作为教师教育体系中的基础课程, 对于师范生专业素养养成具有原理性和奠基性的重要意义, 结合时代发展诉求和课程教学建设愿景, 亟需进行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从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来看, 主要聚焦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基础本体问题研究、教学模式的多维创新研究、课程内涵式建设与育人转型研究等方面, 并探讨当下研究存在的局限, 据此提出未来路向: 强化理论建构, 探索本土化学科体系; 深化实证研究, 完善多元评价体系; 推进分类改革, 细化差异化建设标准; 深化技术融合, 促进教学形态深层变革。

关键词: 教育学课程; 教学改革; 研究主题; 展望

基金项目: 2025 年度新疆和田学院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基于知识图谱的教师教育课程教育学混合式教学改革与实践”(编号: XJJGP20250504), 2024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编号: 24YJCZH212)。

DOI: doi.org/10.70693/202608106264

2025 年 1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 明确提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筑牢教育强国根基”, 新时代基础教育课堂形态、育人逻辑、评价体系等方面也正发生深刻变革, 作为教师培养核心载体的教育学课程亟需开展系统性教学改革, 以更好的回应时代诉求和促进教育发展。教育学作为教师教育体系中一门基础课程, 对于师范生专业素养养成具有原理性、奠基性意义, 国内不同院校中的教育学课程教学大多沿用传统教学模式, 不利于学生主体性发展, 未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 在新时代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背景下, 立足于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 学界对教育学课程进行了教学改革探索, 呈现出相关研究成果, 现有研究尚未对该领域成果开展系统性梳理与评析。基于此, 本文以“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为检索主题, 在中国知网搜集相关文献, 开展研究主题归类、问题反思与未来展望, 以期今后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相关研究提供参鉴。

一、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的主要议题

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面对教育学课程自身学科体系的完善与发展诉求、国家政策的推动、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新时代社会人才培养的要求与教育变革等系列挑战与机遇, 学界对教育学课程也进行了相应的回应与思考, 教学改革研究成果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核心议题。

(一) 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基础本体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环境的变化, 一些涉及教育学课程的基础性和本体性问题被提上日程, 教育学课程的指导思想、内容体系、原则方法、目标定位等需要进一步明确和优化。在指导思想方面, 肖世民(1994)认为当前教育学课程在教材建设方面应贯彻落实“双百方针”, 要注重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还需科学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本质内涵。^[1]在内容体系方面, 王道俊等(2001)基于世纪之交重要际遇, 面向 21 世纪的教育学课题体系和教学改革应该适应时代诉求, 对公共教育类课程体系、教育学教材体系

作者简介: 涂鹏(1996—), 男,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

等进行了积极探索并相应提出建设性意见。^[2]邓双喜（2003）分析了高师公共教育学课程的教学现状，认为存在较大问题，需要对其进行理性思考和全方位分析，应从正确界定教学目标、优化课程体系、改革教学内容、建立课程考核方案、加大教学投入等方面构建学生“懂”教、“愿”教、“乐”教、初步“能”教的课程教学改革体系。^[3]此外，学界还紧跟教育前沿教学方法，王晓萍（2001）和刘德华（2003）从案例的视角出发，认为运用案例教学这种内隐教育研究的理论性和教育活动的实践性方法，能有效改善教育学课程教学效果。^{[4][5]}

在教育学课程培养目标和教学目标方面，罗岩（2007）强调应该明确教育学课程目标的重要性，根据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需求，遵循为基础教育长远发展服务的原则，建立“三位一体”课程目标。^[6]刘德华（2001）指出教育学课程改革要面向 21 世纪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发展，需从将来基础教育中小学教师的理想形象设计入手，建构新的教学目标体系。^[7]为打破“一刀切、统一模板”的同质化改革路径，不同类型院校、不同师范专业纷纷开展差异化课程定位探索，例如有些研究以地方高师院校（于慧慧，2012）、^[8]高职院校（刘业文，2019）、^[9]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束仁龙，2019）^[10]为例分析公共课教育学课程存在的问题，并结合院校实际对其进行教学改革。钟颖（2025）当前高校教育学课程对于艺术类（如舞蹈）师范生，缺乏与未来教学场景的链接，需要以学科知识理论和情境教学理论为基础，探讨了舞蹈师范专业学习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这可为其他实践类师范专业的教育学课程改革提供实践借鉴。^[11]这些成果都从不同方面、角度对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进行了不懈探索，但研究者们大多基于教育学课程自身本体发展的角度，结合时代发展和实践诉求来回应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奠定了今后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基础框架。

（二）教育学课程教学模式的多维创新研究

1. 政策导向下的教育学课程教学模式探索研究

在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如火如荼的背景下，邱小健等（2010）认为应在新课程改革三大新理念的指导下，在公共教育学课程教学中进行“三个结合”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探索，此外在教学改革过程中要注重三个重要原则，以更好的实现教学改革成效。^[12]崔云花（2018）在新课改理念指导下，认为高等师范院校的公共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要多参考借鉴外部理念和经验，并进行多元化优化改革实践。^[13]此外，面对教育学课程教学尤其注重理论性，缺乏实践操作内容，麦茂生（2008）提出加强实践性教学是当今教育学课程改革的主方向。^[14]2014 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政策文件，对我国大中小学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各级各类教育的课程教学改革与发展。裴英竹（2017）认为当下教育学课程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教育存在背离的现实困境，应基于“核心素养”，深入挖掘教育学课程的内涵与潜力，创新教育教学实践，要“学、思、悟、行”有效联动。^[15]2016 年全国多数省份取消教师资格证省级自主考试，实施师范生、非师范生统一国考制度，国考考核标准倒逼教育学课程开展针对性改革调适，吴芳等（2019）基于师生访谈实践，认为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应从教学目标、内容、方法等，以及搭建学习共同体和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方面入手提升教学实际效果。^[16]

2. 信息技术赋能教育学课程教学模式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和迅猛发展，现代化数字技术和教育教学呈现深度融合趋势，一些在线平台、软件、网络资源等驱动教育学课程教学模式创新变革，王剑兰（2005）基于网上资源利用进行公共教育学课程教改试验，将信息技术融入公共教育学课程教学之中，有利于改变传统教学模式。^[17]杨璐（2020）认为当前我国网络互动应用软件的普及给教育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可以通过互动软件构建新的教学模式。^[18]孙涛等（2020）在 MOOCs 视域下，以教育学课程为例进行教学改革探索，指出运用 MOOCs 资源有助于实施翻转课堂，对转变学生学习态度、优化学生学习方式能够起到良好促进作用。^[19]崔兴佳（2023）则积极探索将 MOOC、SPOC 及翻转课堂结合起来，形成了“三位一体”混合式教学模式，为高校教学改革可以提供新思路、支持个性化教学。^[20]

3. 参与式体验式教学模式的实践探索

教学模式的改革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促进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传统的教学模式在传授学生知识、培养学生能

力、涵养学生情怀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为了突破传统教学模式藩篱,一些研究者创新性选择从不同视角出发打破传统讲授式课程教学模式,凸显学生主体地位,充分调动课堂参与主动性,回归“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育人根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唐如前等(2005)指出必须重视开展以学生为主体的研究性学习,开展研究性学习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教育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强调高师教育学课程教学中的研究性学习可以采用多种模式。^[21]丁一等(2013)则以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为例,结合院校及学生的特点分析了开展研究性学习的可行性,并进行了研究性学习理论探索和初步实践。^[22]还有一些学者诸如运用PI(Peer instruction)方法(张金辉等,2016)、^[23]工作坊学习(谭天美等,2020)^[24]对公共教育学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重构与创新,这些教学改革实践一定程度上有效凸显实现学生主体地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激发学生的创新性。

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大多都是紧跟国家时事政策,结合社会发展趋势,从教育实际出发对教育学课程教学提出改革诉求,是为了更好的立德树人,使教育学课程的知识体系与学生的成长发展规律更切合,从而培养出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合格人才。

(三)新时代教育学课程内涵式建设与育人转型研究

在课程本体重构、教学模式多元创新基础上,伴随系列国家教师教育政策落地,教育学课程改革进入以质量育人为核心的内涵建设新阶段,相关研究集中围绕师范专业认证、课程思政两大主线展开。张衡山等(2025)从当前教育学课程教学遭遇的困境出发,基于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提出优化课程目标、更新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改进评价体系策略性建议,以期满足新时代对教师培养的多样化需求。^[25]为加强课程的思政引领力、感染力和影响力,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重要文件,提出所有课程都要创新性发挥育人功能、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形成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携手并进、同向同行的良好局面。教育学课程作为教师教育课程中的基础课程,对于师范生专业素养和教育情怀养成具有奠基性重要作用,必须坚持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教育教学理念,有效实施教育学课程思政。张有龙等(2020)从公共教育学课程与其他课程相比较,认为教育学课程具有显著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要结合课程的性质、教学目标、内容、方法评价,加强教学保障以顺利推进公共教育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顺利实施。^[26]杨洪波(2021)则从领导、教师、学生和评价四个方面积极探索课程思政理念下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多维路径。^[27]房艳梅(2023)认为需从课程思政目标、内容、方法、育人渠道、评价体系这些方面着力推进公共教育学课程思政实施。^[28]王蓉等(2025)则基于OBE教育理念开展教育学课程思政教学方法的创新与实践,通过设计教学阶段、整合资源、案例等,以期达成教育学课程思政教学目标。^[29]处于内涵式深化发展阶段的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越来越紧密结合教育理论与实践,综合不同因素的影响,注重教学改革的价值内核,从形式创新走向质量提升,关注课程育人的实效性和专业适切性,不断推动教育学课程动态发展,为时代新人全面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研究反思与未来展望

(一)现有研究局限

通过对学界关于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的相关成果梳理与分析,发现当前研究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研究的理论深度建构欠缺,同质化研究较多。学界对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多从院校开设的教育学课程现状问题出发,进行经验式总结,所提出的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教学内容等建议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深层理论研究方面突破较少,而且北大核心和CSSCI论文数量也较为稀少。另外学界的成果较为缺乏对教育学课程教学的规律进行本土化理论探索,未能深度解构与建构,在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课程教学自主体系方面有待进一步强化。

二是实证研究薄弱,课程教学改革效果评估需要加强。当前的研究成果多为理论层面的探索,围绕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长期追踪研究更是匮乏,教学改革的效果评估也是缺乏相关机制

建构, 评价体系未能细化和科学化, 如此教学改革的效果就得不到动态跟进和保障完善。

三是分层分类研究不够深入。关于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成果多以普通高等师范院校的教育学课程为研究对象, 而其它诸如应用型本科院校、高职、师专、非师范专业教育学课程的研究深度不足, 相关成果还不够丰富, 改革成果存在普适性与院校差异化适配性失衡问题。

四是技术赋能表层化, 未触及教学本质。虽说现今已进入数字化时代, 可以借助信息技术赋能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 但从现有成果来看, 多数教学改革停留在工具浅层应用, 线上线下课堂融合流于形式, 未能依托数字技术对课程教学结构、师生互动关系、课堂实施模式、教学内容设计、多元评价体系开展系统性深层变革。

(二) 研究展望

一是强化理论建构, 探索本土化学科体系。今后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要立足于中国教育发展实际, 扎根大地构建适配我国教师教育体系的教育学课程理论, 避免照搬照抄西方模式, 另外, 还要根据学生身心成长规律和教育学科自身发展规律, 推动教育学课程从碎片化知识点堆砌, 转向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一体化课程设计, 实现教育学课程和学生成长成才双向提质跃升。

二是深化实证研究, 完善多元评价体系。在研究方法层面可以尝试量化与质性相结合, 开展长期动态追踪研究, 建立“过程+结果”“知识+素养”的多元评价机制, 提升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的科学性和效果保障。

三是推进分类改革, 细化差异化建设标准。针对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 可以打破单一的聚焦对象, 走出普通师范院校藩篱, 围绕不同办学类型院校、不同方向师范专业, 分层分类研制差异化教育学课程标准、课堂教学指南与配套评价方案, 切实提升教育学课程的专业适配性。

四是深化技术融合, 推动教学形态深层变革。进行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可以有效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 着力探索个性化学习、智能评价、虚拟教研等新业态, 真正实现数字技术赋能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目标。

三、结语

本文较为系统整理与分析了学界关于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相关研究成果, 并探讨了当下学界研究存在的不足和未来研究路向。教育学课程对职前教师的培养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完善课程知识体系、创新课堂教学模式、重构课程内容与评价体系, 能够为师范生未来职业发展筑牢教育理论根基。学界对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 但尚有诸多问题还需深入探索解决, 后续研究者应坚持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 持续深挖课程改革现实痛点, 探索创新性解决路径, 以取得更好成效。

参考文献:

- [1]肖世民.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理论思考[J].唐都学刊,1994,(4):53-57.
- [2]王道俊,王坤庆.面向 21 世纪师范院校公共教育学课程体系与教学改革探索[J].课程.教材.教法,2001,(7):56-59.
- [3]邓双喜.我国高师公共教育学课程教学现状及改革构想[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125-128.
- [4]王晓萍.教育学课程“案例教学”改革的理论和实践[J].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2):69-72.
- [5]刘德华.教育学课程改革与案例研究[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6):49-52.
- [6]罗岩.高师教育学课程目标的建构与教学有效性的提升[J].教育科学,2007,(3):25-28.
- [7]刘德华.确立新的教学目标建构新的教学模式——教育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设想与实践[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1,(1):117-120.
- [8]于慧慧.地方高师院校教学方法改革之尝试——以公共课《教育学》课程为例[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8):91-92.
- [9]刘业文.高职院校教育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与改革策略[J].南方职业教育学刊,2019,9(3):37-42.
- [10]束仁龙.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公共教育学课程定位与教学改革[J].池州学院学报,2019,33(5):145-147+160.
- [11]钟颖.基于学科融合的高校教育学课程改革实践路径——以舞蹈师范专业为例[C]//重庆市继续教育学会.新时代教育与创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25:630-633.
- [12]邱小健,胡雯,袁安璎.新课改理念下高师公共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31(4):131-13

4.

- [13]崔云花.试析高师公共教育学课程在新课改理念下的教学改革[J].教育教学论坛,2018,(17):146-147.
- [14]麦茂生.加强实践性:高师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的主方向[J].高教论坛,2008,(1):19-21.
- [15]裴英竹.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学课程的教学改革[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7,34(6):150-152.
- [16]吴芳,吴才鑫.教师资格证国考背景下基于师生访谈的公共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J].西部素质教育,2019,5(11):170-171.
- [17]王剑兰.基于网上资源利用的公共教育学课程教改试验探讨[J].课程·教材·教法,2005,(11):80-83.
- [18]杨璐.基于网络互动应用软件支持的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J].教育观察,2020,9(6):65-66.
- [19]孙涛,高清晨.MOOCs 视域下的大学教学改革探析——以教育学课程为例[J].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19(5):29-32.
- [20]崔兴佳.“三位一体”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教育学”课程中的应用[J].教育教学论坛,2023,(9):161-164.
- [21]唐如前,欧小松.研究性学习与高师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156-157.
- [22]丁一,荣亚军,朱雅琴,等.地方高等师范院校“教育学”课程研究性学习的教学实践及研究[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3,(13):54-55.
- [23]张金辉,郎琦.基于 PI 理念的职前教师教育研究——以公共教育学课程为例[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2(6):109-113.
- [24]谭天美,欧素菊.基于工作坊学习的教师教育教学模式改革——以《教育学》课程为例[J].高教论坛,2020,(8):38-41.
- [25]张衡山,丁洁,任园园.师范类专业认证导向下《教育学》课程建设的实践研究[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5,41(9):160-162.
- [26]张有龙,赵爱荣,赵海.公共教育学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改革路径[J].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20,38(6):135-139.
- [27]杨洪波.课程思政理念下高校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路径探析[J].大学,2021,(40):82-84.
- [28]房艳梅.课程思政视域下师范院校公共教育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3,43(6):54-57.
- [29]王蓉,胡卫东.“教育学”课程思政教学方法的创新与实践研究[J].豫章师范学院学报,2025,40(5):65-70.

Research Status and Prospects of Pedagogical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Tu Peng

Xinjiang Hetian College, Hotan, Xinjiang, China

Abstract: As a foundational course in the teacher education system, pedagogy holds principled and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ormal student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Given the demands of the times and the vision for curriculum teaching development, pedagogical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is urgently needed. A review of existing research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reveals that studies primarily focus on three areas: fundamental ontological issues of pedagogical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multidimensional innovation in teaching models, and connotativ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longside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limitations of current research and, on this basis, proposes future directions: strengthening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o explore an indigenous disciplinary system; deepening empirical research to improve diversified evaluation systems; promoting classified reform with refined differentiation standards; and deepening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to facilitate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f teaching forms.

Keywords: pedagogy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research themes; prospects

中华体育精神融入体育课程思政的 政策契合、理论耦合与价值阐释

汪 诚¹, 周 利¹

(1. 贵州医科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00)

摘 要: 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国体育事业发展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华体育精神融入体育课程思政, 是当前体育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本文从政策契合、理论耦合和价值阐释三个维度分析二者融合的依据和意义。政策层面, 课程思政建设纲要和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等文件形成了双重政策支持。理论层面, 二者在育人目标、身体实践基础和文化遗产功能上存在内在一致性。价值层面, 融合能帮助学生培养爱国情怀和坚韧意志, 能提升体育课程的育人地位, 也能服务体育强国和立德树人的国家目标。

关键词: 中华体育精神; 体育课程思政; 政策契合; 理论耦合; 育人价值

DOI: doi.org/10.70693/202608263115

1 前言

体育课程是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课程不只是教学生运动技能, 它还承担着价值引领和品格塑造的任务。近年来, 课程思政建设在全国高校全面推进。体育课程因为自身的身体实践特点, 在思政教育方面有独特优势。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国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包含“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等丰富内容^[1]。把中华体育精神融入体育课程思政, 是当前体育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2 中华体育精神的内涵与发展脉络

中华体育精神的形成有深厚的文化根源。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周易》中“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 是顽强拼搏精神的文化源头。中华文化中“和合”与“群体”的价值取向, 孕育了团结协作的精神。近代以来, 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过程中, 体育被赋予了“强种强国”的使命。这种历史记忆深刻塑造了中华体育精神的爱国主义品格。中华体育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概念。它有明确的提出过程和丰富的内涵演变。1996年, 国家体委正式提出“中华体育精神”这一表述^[2]。此后, 这一概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2013年8月31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广大体育工作者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以六个方面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体育精神^[3]。这一概括成为目前学界和政策领域引用最广泛的定义。

进入新时代, 中华体育精神的内涵继续拓展。2024年8月, 相关论述进一步丰富了中华体育精神的谱系。新时代女排精神以“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为核心。北京冬奥精神以“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为主要内容。这些精神形态与原有中华体育精神一脉相承, 又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它们共同构成了更加立体、多维的中华体育精神谱系。

3 政策契合: 国家政策对二者融合的推动

3.1 课程思政建设的顶层设计

2020年5月28日, 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这份文件是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明确提出, 课程思政建设要在全国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文件指出,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

作者简介: 汪 诚 (2001-),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

通讯作者: 周 利 (1982-), 女, 博士在读,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

建设,就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4]。其中对不同学科专业的课程思政建设提出了分类指导要求。在教育类专业中,文件强调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教师观和学生观。体育学属于教育学门类,体育课程自然被纳入课程思政建设的整体框架。还要求高校充分挖掘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这一要求为体育课程挖掘中华体育精神等思政元素提供了政策依据。体育课程不需要变成理论说教课,它应该在运动技能教学和身体锻炼过程中自然融入精神培育。

3.2 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

2019年9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这份文件从国家战略高度对体育事业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文件专门设立“促进体育文化繁荣发展,弘扬中华体育精神”部分。它明确提出要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深入挖掘中华体育精神,将其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5]。其中还要求传承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加强优秀传统体育项目的保护和推广。它提出要完善中国体育荣誉体系,鼓励社会组织和单项体育协会打造褒奖运动精神的各类荣誉奖励。这些要求为中华体育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提供了制度保障。体育课程作为学校体育的核心环节,是落实这些要求的重要阵地。把中华体育精神融入体育课程思政,正是学校层面落实体育强国战略的具体行动。

2024年11月,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民委、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体育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导意见》。文件提出要做强做大“中华体育精神颂”文化品牌,广泛开展中华体育精神和爱国主义教育。它要求充分发挥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等优秀运动员的带动引领作用,走进民族地区讲述祖国培养、为国争光的体育故事^[6]。这份文件虽然聚焦民族工作,但它再次确认了中华体育精神在育人中的重要价值,也为体育课程思政提供了更多可利用的教育资源。

2026年发布的体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相关文件中,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再次被列为重点任务。文件提出要传承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做大做强“中华体育精神颂”文化品牌,坚决抵制庸俗、低俗思想侵蚀,培育健康向上项目文化^[7]。这表明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是一项长期持续的政策任务,不是一时的工作重点。

3.3 教育方针与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8]。“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方针中,体育占有重要位置。体育课程不仅是“育体”的课程,也是“育德”的课程。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所有课程都应该承担育人责任。体育课程因为自身特点,在立德树人方面有特殊优势。

从政策逻辑来看,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体育强国建设要求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这两条政策线索在体育课程中交汇。把中华体育精神融入体育课程思政,同时回应了两项政策要求。这种政策上的高度契合,为二者融合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明确的方向指引。

4 理论耦合:中华体育精神与体育课程思政的内在联系

4.1 育人目标的一致性

中华体育精神与体育课程思政有共同的育人目标。二者都致力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体育课程思政的目标是在体育教学中融入价值引领,帮助学生在增强体质、掌握技能的同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的品格。中华体育精神所倡导的为国争光、无私奉献、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等品质,正是体育课程思政希望学生养成的核心素养。

体育课程思政要求施教者深入挖掘体育运动中蕴含的丰富思政内涵,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规则意识、奋斗精神、诚信友善等价值观念有机融入课程教学,实现“以体育人”目标。中华体育精神的丰富内涵与体育课程思政倡导的价值观高度契合^[9]。这种契合不是表面的相似,而是深层价值取向的一致。具体来看,“为国争光”与爱国主义教育相贯通。从古代“射御”之艺与礼乐教化相结合,到近代“奥运三问”所承载的民族复兴梦想,再到新中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奋勇争先,“为国争光”始终是中华体育精神最核心的内容。它为体育课程思政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最生动的素材。“团结协作”与集体主义精神相呼应。团队项目中的默契配合和相互支持,是培养学生集体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切入点。“顽强拼搏”与意志品质锤炼相融合。学生在体育训练中克服困难、挑战自我的过程,就是培养坚韧品格的过程。“遵纪守法”与规则意识培养相统一。体育竞赛对规则的严格要求,有助于学生形成契约精神和诚信品格。

4.2 身体实践的共同基础

体育课程区别于其他课程的根本特点是身体练习。学生在体育课上不是静坐听讲,而是通过身体运动来学习。这种身体实践性是中华体育精神与体育课程思政能够深度融合的关键基础。身体练习是体育课程区别于其他课程的根本特点。体育的身体实践性内含“潜移默化”的育人功能。体育课程思政要以体感为逻辑起点,实现“以体育德”的新路径。

从哲学角度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体育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其过程中的意志磨砺和社会交往,正是思政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实践基础^[10]。杜威的“做中学”理论也能解释这一点。杜威强调知识的获得源于直接经验。体育教学中“在竞争中学会尊重”“在失利中学会坚韧”的体验,比课堂讲授更易促成价值认同。中华体育精神融入体育课程,不是把精神内容当作知识来灌输,而是让学生在运动实践中自然体验和内化。这种“做中学”的方式,符合体育教育的规律,也符合品德形成的规律。

4.3 文化传承的内在关联

中华体育精神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与中华文化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合共生等价值理念一脉相承。体育课程思政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文化传承和文化自信教育。把中华体育精神融入体育课程,就是在体育教育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体育课程是学生接触体育文化的主要渠道。在体育课上讲述中国体育人的故事,介绍中华体育精神的文化渊源,能让学生在身体锻炼的同时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这种文化熏陶是其他课程难以替代的。中华体育精神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它不同于西方体育精神中强调个人英雄主义的倾向,更注重集体、国家和奉献。这种民族特色使中华体育精神成为培育学生家国情怀的重要资源。体育课程思政要培养有文化自信、有民族自豪感的学生,中华体育精神是最贴切的教育内容。

5 价值阐释:融合的育人价值与现实意义

5.1 对学生成长的价值

第一,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体育是最能激发民族自豪感的领域之一。中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的事迹,对青年学生有很强的感染力。把这些内容融入体育课程,能让学生在运动中感受国家荣誉的分量。第二,它有助于锤炼学生的意志品质。当代大学生成长在相对优越的环境中,很多人缺乏面对困难和挫折的经验。体育训练天然包含吃苦和挑战。中华体育精神中的“顽强拼搏”要素,能引导学生在身体极限面前学会坚持。第三,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很多体育项目是集体项目。学生在篮球、排球、足球等团队项目中学习配合、沟通和互助。中华体育精神中的“团结协作”要素,能帮助学生理解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第四,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和法治观念。体育竞赛有严格的规则。学生在体育课上学习遵守规则、尊重裁判、公平竞争。中华体育精神中的“遵纪守法”要素,能引导学生从遵守体育规则延伸到遵守社会规则和法律。这种从具体到抽象的规则意识培养,比单纯的理论说教更有效。

5.2 对体育课程发展的价值

第一,它能提升体育课程的育人地位。长期以来,体育课程在高校中处于边缘位置。把中华体育精神融入体育课程思政,能展现体育课程在价值引领和品格塑造方面的独特作用。第二,它能丰富体育课程的教学内容。传统体育课程偏重技能教学和体能训练,内容相对单一。中华体育精神的融入为体育课程增添了文化和精神维度。这使体育课不再是单纯的身体训练,而是兼具身体锻炼、知识传授和精神培育的综合性课程。第三,它能推动体育教学方式的改革。中华体育精神的传承不能靠简单灌输。它要求教师创设情境,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这推动体育教师从单纯的技能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品格成长的引导者^[11]。第四,它能促进体育教师队伍的专业发展。体育课程思政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不仅要懂运动技能,还要理解中华体育精神的内涵,掌握价值引领的方法。这推动体育教师加强理论学习,提升综合素养。

5.3 对国家人才培养的价值

第一,它服务于体育强国建设。体育强国不仅需要竞技体育的成绩,也需要全体国民体育素养的提升和体育精神的弘扬。高校体育课程是培养青年一代体育素养的重要渠道。把中华体育精神融入体育课程,能让更多学生理解体育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成长为体育强国建设的积极参与者。第二,它服务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教育的根本目标。体育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环节。中华体育精神为体育课程思政提供了优质内容。通过体育课程培育学生的爱国情怀、奋斗精神、团队意识和规则观念,能为国家培养更多品格健全、素质全面的人才。第三,它服务于文化自信建设。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体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在体育课程中传承和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能增强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在全球化背景下,青年学生容易受到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中华体育精神所代表的中国体育文化,能为学生提供文化根脉和精神支撑。

6 结语

中华体育精神融入体育课程思政,是政策要求、理论必然和实践需要的统一。从政策层面看,课程思政建设的全面推进和体育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为二者融合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依据和制度保障。从理论层面看,中华体育精神与体育课程思政在育人目标、身体实践基础、德体融合逻辑和文化遗产功能等方面深度耦合。从价值层面看,这种融合对学生意志品质的锤炼、体育课程育人功能的提升和国家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都有重要意义。

推进中华体育精神融入体育课程思政,需要体育教师转变观念,把精神培育纳入课程目标;需要创新教学方法,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和内化;需要改革评价体系,关注学生精神品质的成长。只有这样,中华体育精神才能真正走进体育课堂,成为学生成长的精神养分。体育课程也才能真正实现从“育体”到“育人”的升华,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迈向体育强国之路——习近平关于体育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与世界启示》智库报告发布[N].人民日报,2024-08-28(004).
- [2]黄莉. 中华体育精神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学理基础与实践路向[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4,47(8):23-34.
- [3]林德韧,许仕豪.弘扬体育综合价值促进物质富裕精神富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两会期间关于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五[N].新华每日电讯,2026-03-25(003).
- [4]石建勋,付德波,李海英. 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建设重点是“三观”教育[J].中国高等教育,2020,(24):38-40.
- [5]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J].中国民族,2019,(9):29.
- [6]《关于体育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导意见》发布[N].新华每日电讯,2024-11-27(004).
- [7]范佳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系统部署体育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6-07-23(004).
- [8]张强军.高校“大思政课”协同育人研究[D].湖南大学,2024.
- [9]杨小明,顾晓英. 钱伟长体育教育思想融入体育课程思政教学的价值内涵与实践路径[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25,24(8):53-58+87.
- [10]陈志文,陈治.认识、价值、实践:中华体育精神融入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三重向度[C]//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第十四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学术成果汇编——论文专题报告(学校体育分会).2025:1165-1167.
- [11]赵富学,陈蔚,王杰,等. “立德树人”视域下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五重维度及实践路向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0,54(4):80-86.

The alignment of policies, theoretical synergy, and value interpretation in integrating the Chinese sports spirit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mponent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Wang Cheng¹, Zhou Li¹

1.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sports spirit represents a valuable spiritual asset forged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sector. Integrating the Chinese sports spirit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mpon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a is a significant direction for current reforms in phys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ationale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integrat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 policy alignment, theoretical synergy, and value interpretation. At the policy level, documents such as the Outlin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Outline for Building a Strong Sports Nation provide dual policy support.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ese two approaches share an inherent consistency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the foundation of physical practice, and the function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t the value level, this integration helps cultivate students' patriotic sentiment and resilient willpower, enhances the educational role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a, and serves the national goals of building a strong sports nation and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Keywords: Chinese sports spiri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a; policy alignment; theoretical synergy; educational value

青少年中长跑运动员下肢运动损伤史与运动功能测试的关联性研究

刘锦鹏¹, 张 婕^{2*}

(1. 贵州医科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2. 遵义医科大学, 贵州 遵义 563000)

摘要: 目的 探讨青少年中长跑运动员下肢运动损伤史与简易运动功能测试指标的关联性, 为基层损伤防控筛查提供实证参考。方法 选取遵义市级体校 27 名 11-17 岁青少年中长跑运动员, 按近 1 年有、无下肢损伤史分为有损伤组 ($n=11$) 与无损伤组 ($n=16$), 完成 Y 平衡测试、单足跳测试等 6 项功能测评,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组间差异并计算 Cohen's d 效应量。结果 有损伤组 6 m 计时单足跳不对称指数 ($16.11\% \pm 11.60\%$)、单足三级跳不对称指数 ($11.31\% \pm 4.96\%$) 显著高于无损伤组 ($P < 0.05$), 效应量均达大水平 ($d=0.87, 0.93$); 其余指标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 初步证据表明, 下肢爆发力双侧不对称性是与该人群损伤史关联度较高的简易指标, 建议作为基层体校重返运动评估的辅助筛查工具之一, 未来需前瞻性研究验证其预测效能。

关键词: 青少年; 中长跑; 运动损伤; 运动功能测试; 下肢功能双侧不对称性

基金项目: 遵义市工业和科学技术局、遵义医科大学联合资金 (遵市科合 H2 字 (2025) 287 号)

DOI: doi.org/10.70693/202608268285

中长跑项目是一项下肢周期性、高重复性的运动, 青少年中长跑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长期承受较高的地面反作用力, 处于肌肉骨骼快速发育期的青少年中长跑运动员下肢运动损伤发生率居高不下^[1]。Hollander 等^[2]的系统综述指出, 下肢损伤史是青少年跑者发生跑步相关损伤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 损伤所致的停训与功能异常, 不仅会影响运动员专项成绩提升, 还可能对其运动生涯造成长期影响。

简易运动功能评价指标利用便携设备在训练现场就可以完成运动能力测评, 具有成本低、操作简捷、可重复性好等优点, 目前已被广泛用于运动损伤预防、康复及重返运动的决策中^[3], 但现有常用测试 (如 Y 平衡测试、单足跳测试、LESS 评分等) 的损伤识别效能存在显著项目特异性^[3]。上述测试能否有效区分青少年中长跑运动员有无下肢损伤史, 目前仍缺乏针对该特定人群的系统性对比研究。

基于此, 本研究以体校青少年中长跑运动员为对象, 对比近 1 年内有、无下肢损伤史运动员的多项简易功能测试指标差异, 明确与该群体下肢损伤史关联最密切的功能测试指标, 旨在为基层体校开展青少年中长跑运动员损伤后重返运动评估提供实操性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 选取遵义市级体校 27 名中长跑项目青少年运动员为研究对象, 年龄范围 11-17 岁, 其中男 15 人, 女 12 人。经体校专职队医与主教练共同核实, 将受试者分为有损伤组 ($n=11$) 和无损伤组 ($n=16$)。所有受试者均自愿参加本研究, 了解研究目的, 并在知悉测试流程和潜在风险后签署知情同意书, 且受试者监护人同样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作者简介: 刘锦鹏(1997—),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竞赛组织、体能康复;

张 婕(1986—), 女,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体能训练、运动康复。

通讯作者: 张 婕

1.2 功能测试指标及方法

所有测试人员均经过统一培训,测试均在实训中心室内完成,测试前由研究人员统一讲解测试流程与动作要领,受试者完成标准化热身,按固定顺序完成全部测试,每项测试间隔 2 分钟避免肌肉疲劳,出现动作失衡、未达标准的无效测试均按规范重测。

1.2.1 动态平衡能力

采用 YBT 评估受试者下肢动态平衡能力。测试流程与指标计算参照 Xie 等^[4]和 Eckart 等^[5]的研究方案,使用 YBT 测试套件使受试者单足站立完成前、后内侧、后外侧三向的最大伸展测试,每侧每方向测试 3 次取最大值,经同侧腿长标准化后取均值并换算为百分比形式,再将双侧综合值的绝对差值除以较大值得出 YBT 双侧差异值。

1.2.2 爆发力与对称性测试

采用 6 m 计时单足跳和单足三级跳评估下肢爆发力及双侧对称性。6 m 计时单足跳要求受试者单腿连续跳跃 6 米,左右腿各测试 2 次取最快值;单足三级跳要求受试者单腿连续三次向前跳跃,左右腿各测试 2 次取最远距离^[6]。此测试核心评价指标参照 Bishop 等^[7]推荐的百分比差异法,先计算左右腿测试值的绝对差值,再除以两者中的较大值并换算为百分比。

1.2.3 动作模式与落地质量测试

LESS 评分采用跳跃落地动作质量评分^[8],受试者从 30 cm 高台跳下后立即垂直起跳至最大高度,使用两台手机分别从矢状面和冠状面进行慢动作录像,由 2 名经过统一培训的专业人员进行评分,取平均分。

团身跳测试参照 Read 等^[9]的标准,但为适应基层场景,本研究同时记录 10 秒内成功完成的次数作为辅助指标。

1.2.4 运动参与水平

采用 Marx 等^[10]开发的量表评估受试者近一年的高强度运动参与水平。调查受试者过去 12 个月内完成跑步、变向、跳跃、减速 4 类高强度动作的频率。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7.0 分析数据。针对测试缺失数据按符合方案集 (PP) 原则处理,以有效样本量统计。计量资料以均值±标准差 ($\bar{x} \pm s$) 表示,经正态性与方差齐性检验合格后,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 (百分比)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检验水准 $\alpha=0.05$,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同时计算 Cohen's d 值评价组间效应量。

2 结果

2.1 两组基本特征比较

共纳入 27 名体校中长跑青少年运动员,其中男性 15 人,女性 12 人;年龄 14.1 ± 1.7 岁 (范围 11-17 岁);训练年限 1.6 ± 1.1 年 (范围 0.25-4 年)。根据过去 1 年内是否有下肢运动损伤史,分为有损伤组 ($n=11$) 和无损伤组 ($n=16$)。

两组受试者的基本特征对比见表 1,有损伤组与无损伤组的年龄、训练年限、性别构成均无统计学差异 ($P>0.05$)。测试完成情况方面,有损伤组成员在测完单腿爆发力与对称性测试后,1 名受试者因旧伤不适未能完成 YBT 测试 (有效样本 $n=10$),3 名受试者因无法完成落地动作未完成团身跳和 LESS 评分测试 (有效样本 $n=8$),无损伤组所有受试者均完成全部测试项目。因此,涉及这些指标的后续分析中,样本量有相应减少,后续相关指标分析按实际有效样本量进行统计,未进行数据插补,避免对损伤人群的真实功能水平造成结果偏倚。

表 1 有损伤史与无损伤史青少年中长跑运动员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有损伤组 (n=11)	无损伤组 (n=16)	统计值	P 值
年龄/岁	14.18±1.47	14.00±1.90	$t=0.267$	0.792
训练年限/年	1.48±1.10	1.63±1.10	$t=-0.343$	0.735
性别 (男/女)	7/4	8/8	$\chi^2=0.339$	0.560

2.2 各项功能测试指标比较

两组受试者各项简易运动功能测试指标的对比结果见表 2。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下肢爆发力双侧不对称指标与青少年中长跑运动员下肢损伤史存在显著正向关联：有损伤组 6 m 计时单足跳不对称指数 ($16.11\% \pm 11.60\%$) 显著高于无损伤组 ($8.08\% \pm 7.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228$, $P=0.035$, $Cohen's d=0.87$)；有损伤组单足三级跳不对称指数 ($11.31\% \pm 4.96\%$) 显著高于无损伤组 ($6.67\% \pm 5.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569$, $P=0.026$, $Cohen's d=0.93$)。按照 $Cohen's d$ 效应量判断标准，两项指标的组间差异均达到大效应量水平 ($d \geq 0.8$)。

其余次要结局指标均未检出与下肢损伤史的显著关联。有损伤组 YBT 双侧差异值 ($4.89 \pm 3.52\%$) 低于无损伤组 ($6.35 \pm 5.50\%$)，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455$)， $Cohen's d=0.32$ ，仅为小效应量。有损伤组 LESS 评分 (7.00 ± 2.27 分) 高于无损伤组 (5.94 ± 2.35 分)、团身跳完成次数 (15.57 ± 2.94 次) 高于无损伤组 (14.69 ± 1.14 次)，但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效应量均为小到中等水平；两组 MARX 运动评分几乎无差异，组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P=0.784$)， $Cohen's d=0.11$ ，效应量极低。

表 2 有损伤史与无损伤史青少年中长跑运动员下肢运动功能指标对比 ($\bar{x} \pm s$)

指标	有损伤组	无损伤组	t 值	p 值	Cohen's d
动态平衡能力					
YBT 双侧差异值 (%)	4.89±3.52 (n=10)	6.35±5.50 (n=16)	0.760	0.455	0.32
下肢爆发力不对称性					
6m 单足跳不对称性 (%)	16.11±11.60 (n=11)	8.08 ± 7.18 (n=16)	2.228	0.035*	0.87
单足三级跳不对称性 (%)	11.31 ± 4.96 (n=11)	6.67 ± 5.01 (n=16)	2.569	0.026*	0.93
动作模式与功能评分					
团身跳 (次)	15.57±2.94 (n=8)	14.69±1.14 (n=16)	1.000	0.330	0.40
Marx 评分 (分)	6.09±1.92 (n=11)	6.31±2.12 (n=16)	0.277	0.784	0.11
LESS 评分 (分)	7.00±2.27 (n=8)	5.94±2.35 (n=16)	1.055	0.303	0.46

注：* 表示与无损伤组比较， $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青少年中长跑运动员下肢损伤史与简易功能测试指标的关联性，筛选适配基层场景的损伤后重返运动评估工具。结果显示，仅 6 m 计时单足跳和单足三级跳的双侧不对称指数能有效区分有无损伤史的运动员，且两项指标的效应量均达大水平 ($d=0.87$ 、 0.93)，其他指数均未表现出显著性。这一结果也印证了功能测试的损伤识别效能具有高度项目特异性，必须结合专项动作特征与损伤机制选择评估工具，不能无差别套用其他项

目的成熟体系^[2]。

3.1 下肢爆发力双侧对称性与损伤史

目前,下肢功能不对称与损伤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成年运动员,专门针对青少年中长跑人群的多指标同步对比研究仍较为缺乏^[11]。本研究发现,有损伤史运动员的6 m计时单足跳不对称指数($16.11\% \pm 11.60\%$)和单足三级跳不对称指数($11.31\% \pm 4.96\%$)分别为无损组组的2.0倍和1.7倍,且均达到大效应量水平,表明下肢爆发力双侧不对称是青少年中长跑运动员损伤后高度敏感的功能标志,可有效区分该人群有无下肢损伤史。

从生物力学机制分析,中长跑以下肢矢状面周期性重复蹬伸为核心,每一步支撑期需承受2.5-3倍体重的地面反作用力,双侧对称发力是分散局部负荷、维持动作经济性的核心基础^[2]。当双侧爆发力出现显著不对称时,健侧会通过过度负重代偿伤侧的蹬伸不足,可能增加胫骨疲劳性骨膜炎、肌肉拉伤等慢性过度使用性损伤的发生风险^[12]。本研究所用的两项测试均为连续水平蹬伸动作,与中长跑专项力学特征高度契合,能够有效放大双侧下肢的细微功能差异。研究表明,单足跳测试不仅能反映下肢爆发力水平,还能综合评估神经肌肉控制能力和动作协调性,是识别损伤后隐匿性功能异常的有效工具^[11]。

值得注意的是,单纯的运动表现并不等同于功能完全恢复。现有研究证实,跳跃距离往往会掩盖异常的下肢生物力学模式,即使运动员主观疼痛消失、常规功能评估达标,健侧神经肌肉代偿导致的双侧不对称仍可能长期存在^[11]。单腿跳运动质量实时评估工具的开发也进一步表明,动作模式异常是比距离差异更隐蔽的损伤后残余功能缺陷^[12]。D'Hondt等^[13]针对中长跑项目的系统综述显示,下肢双侧不对称性与跑步表现的关系并不一致,多数研究为负相关或无相关,提示不对称性对损伤风险的预测价值尚需更多纵向研究验证。因此,当前将不对称指数作为损伤风险的替代标志物时应保持谨慎。大样本系统综述显示,单侧下肢功能测试是运动损伤后远期膝关节相关结局的可靠预后指标,纳入13150例受试者的Meta分析证实,单足跳测试不对称性与前交叉韧带术后2年膝关节功能障碍显著相关^[14]。国际OPTIKNEE共识也指出单足跳测试是目前最有前景的功能评估工具之一,但尚缺乏足够的测量学证据支持其作为重返运动的单一准入标准^[15]。

此外,Jones等^[16]的研究表明,在青少年运动员中采用对侧肢体比较的方法评估功能恢复,比采用绝对能力值更能准确反映损伤后的残余功能异常。这一结论与本研究结果高度一致,进一步支持将双侧不对称指数作为青少年中长跑运动员损伤后功能评估的核心指标,而非仅关注伤侧单腿的绝对运动表现。

3.2 其他测试指标的适用性

Y平衡测试、落地错误评分系统、团身跳及MARX运动评分均与损伤史无显著组间差异,根本原因在于其设计与中长跑专项的损伤机制和动作需求不匹配。动态平衡测试主要评估多方向姿势控制能力,适用于篮球、足球等以变向、急停动作为核心的项目,而中长跑为矢状面内的直线运动,对冠状面、水平面的动态平衡能力需求极低^[5]。落地错误评分针对跳跃落地导致的非接触性前交叉韧带急性损伤设计,而中长跑损伤以胫骨疲劳性骨膜炎、肌肉拉伤等慢性过度使用性损伤为主,二者损伤机制存在本质差异^[1,8]。团身跳反映垂直方向的超等长收缩能力,与中长跑水平蹬伸的专项需求匹配度较低^[9]。主观运动参与量表则聚焦对抗性项目的爆发性动作,难以反映耐力项目运动员的真实功能状态^[17]。

3.3 实践价值

本研究结果与李伟等的国内核心综述观点高度一致:运动功能测试的选择必须紧密结合项目的动作特征与损伤机制,不能无差别地套用其他项目的成熟评估工具^[3]。本研究筛选出的6 m计时单足跳、单足三级跳两项指标,高度匹配层体校的现实场景需求,两项测试仅需秒表、卷尺即可完成,无需专业的生物力学设备,测试流程简单易操作,1名测试人员即可完成单人测试,单人次测试时长不超过3分钟,成本低、可重复性好,适合在基层体校大规模推广使用。

当前基层体校在青少年中长跑运动员损伤后重返运动评估中,多存在仅以伤侧单腿绝对能力恢复、主观疼痛消失为准入标准,忽视双侧功能不对称的评估。本研究结果证实,下肢爆发力双侧不对称是青少年中长跑运动员损伤后残余功能异常的核心,建议将两项测试的双侧不对称指数作为重返专项训练与比赛的辅助筛查工具之一^[14]。

参考本研究无损伤组运动员的水平,结合青少年中长跑人群专项评估的共识,建议青少年中长跑运动员重返完全专项训练前,需满足下肢双侧爆发力均衡方可准予重返赛场,最大限度规避功能缺陷导致的再损伤风险^[15]。

青少年运动员正处于肌肉骨骼与动作模式的快速发育期,双侧功能不对称在常规训练观察难以精准识别^[1]。建议将两项测试纳入青少年中长跑运动员的常规体能筛查体系,结合项目训练周期设置固定筛查节点,建立运动员个人双侧不对称指数的专属基线数据库^[3]。针对下肢损伤后的康复期运动员,建议将两项测试的双侧不对称指数作为康复效果的核心监控指标,替代基层场景中难以实现的专业测试(如速肌力测试、三维生物力学测试等)。康复期内每周完成1次复测,以同年龄段无损伤组的基线水平为康复目标,以不对称指数的动态变化判断康复方案的有效性,避免仅以主观疼痛缓解、关节活动度恢复作为康复终点,实现康复训练的精准化、量化调整,确保运动员重返训练前已从根源上纠正双侧功能失衡问题^[11,12]。

3.4 局限性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且样本量较小($n=27$),未提前进行样本量估算,同时横断面设计无法判定因果关系,不对称性究竟是损伤的前置风险因素还是损伤后的残余结果尚不明确。此外,损伤史为回顾性可能存在回忆偏倚,部分指标因测试过程中旧伤腿出现不适而未能完成(如团身跳),存在缺失数据。未来需扩大样本量、多中心的前瞻性研究,追踪青少年中长跑运动员损伤前后功能指标的动态变化,明确下肢爆发力不对称与损伤发生的因果关系,确定损伤风险的临界阈值。还可以进一步细分损伤的部位、类型与严重程度,筛选针对不同损伤类型的特异性评估指标,开发适配基层体校的损伤预防与康复干预方案,验证其在降低青少年中长跑运动员损伤发生率、复发率中的实际效果。

4 结论

有1年内下肢损伤史的青少年中长跑运动员,在6m计时单足跳和单足三级跳中均表现出显著的双侧不对称性,而Y平衡测试、LESS评分、团身跳及MARX评分均未显示与损伤史的相关性。因此,在青少年中长跑运动员的损伤后重返运动评估中,建议关注下肢爆发力的双侧对称性,而非仅依赖单腿绝对能力或主观功能评分。6m计时单足跳和单足三级跳操作简便、成本低廉,比较适合在基层中应用,可以用于日常康复效果监测作为参考。未来研究可开展大样本、多中心的前瞻性队列研究,追踪运动员损伤前后功能指标的动态变化,同时应细分损伤部位与类型,构建项目专属的评估体系,验证运动功能测试在损伤中的实际效果。

参考文献:

- [1] 母应秀. 青少年中长跑运动员身体运动功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在下肢运动损伤的实证研究[D]. 北京:首都体育学院, 2022.
- [2] Hollander K, Rahlf A L, Wilke J, et al. Risk factors for running-related injury in high school and collegiate cross-country runners: a systematic review[J]. *Journal of Orthopaedic and Sports Physical Therapy*, 2024, 54(2):1-13.
- [3] 李伟, 丁杰, 宋洪强, 等. 常用简易运动功能评价方法及其在运动损伤防控中的应用[J].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 2022, 41(2):142-158.
- [4] Xie M, Zhang R, Gong Y. Risk assessment of FMS and YBT on sports injuries in collegiate athlet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2025, 46(3):189-195.
- [5] Eckart A C, Ghimire P S, Stavitz J, Barry S. Predictive utility of the functional movement screen and Y-balance test: current evidence and future directions[J]. *Sports*, 2025, 13(2):46.
- [6] Williams M, Squillante A, Dawes J. The single leg triple hop for distance test[J].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Journal*, 2017, 39(3):94-98.
- [7] Bishop C, Read P, Chavda S, et al. Asymmetries of the lower limb: the calculation conundrum in strength training and conditioning[J].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Journal*, 2016, 38(6):27-32.
- [8] Padua D A, DiStefano L J, Beutler A I, et al. The landing error scoring system as a screening tool for an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injury-prevention program in elite-youth soccer athletes[J]. *Journal of Athletic Training*, 2015, 50(6):589-595.

- [9] Read P J, Oliver J L, De Ste Croix M B, et al. Reliability of the tuck jump injury risk screening assessment in elite male youth soccer players[J]. *Journal of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Research*, 2016, 30(6):1510-1516.
- [10] Marx R G, Stump T J, Jones E C, et al.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n activity rating scale for disorders of the knee[J]. *American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2001, 29(2):213-218.
- [11] Simon J E, Yom J, Grooms D R. Symmetry does not indicate recovery: single-leg hop before and after a lower extremity injur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2021, 42(4):344-349.
- [12] Herron A, Yom J, Grooms D R, et al. Development of a real-time single-leg hop movement quality assessment to identify lower-extremity biomechanical risk factors[J]. *Journal of Sport Rehabilitation*, 2025, 34(2):e20230399.
- [13] D'Hondt J, Chapelle L, Bishop C,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inter-limb asymmetry and determinants of middle- and long-distance running performance in healthy populations: a systematic review[J]. *Sports Medicine - Open*, 2024, 10(1):45.
- [14] West T J, Bruder A, Crossley K, et al. Unilateral tests of lower-limb function as prognostic indicators of future knee-related outcomes following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injur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13 150 adolescents and adults[J].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2023, 57(12):855-863.
- [15] Berg B, Urhausen A P, Iestad B E, et al. What tests should be used to assess functional performance in youth and young adults following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or meniscal injury? A systematic review of measurement properties for the OPTIKNEE consensus[J].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2022, 56(24):1454-1464.
- [16] Jones E, Jochum J, Corn H, et al. Are functional performance test scores better when compared to baseline or contralateral limb scores following LE injury in adolescent athlet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s Physical Therapy*, 2024, 19(5):892-901.
- [17] Ganley T J, Luhmann S J, Schoenecker P L, et al. Marx activity rating scale: reliability in patients younger than 18 years with injuries to the knee and lower extremities[J]. *Journal of Pediatric Orthopaedics*, 2020, 40(5):e352-e356.

Association between History of Lower Extremity Sports Injury and Motor

Function Tests in Adolescent Middle-distance Runners

Liu Jinpeng¹, Zhang Jie^{2*}

1.College of Sports and Health,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iyang, China; 2.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Zunyi Medical University, Zuny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history of lower extremity sports injuries and simple motor function test indicators in adolescent middle-distance runners, so as to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grassroots injury prevention and screening. **Methods:** A total of 27 adolescent middle-distance runners aged 11 to 17 years from Zunyi Municipal Sports School were recruited and divided into an injury group (n=11) and a non-injury group (n=16)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y had a history of lower extremity injuries in the past year. Six functional assessments, including the Y Balance Test and single-leg hop tests, were conducted. An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intergroup differences, and Cohen's d effect sizes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The asymmetry index of the 6-meter timed single-leg hop ($16.11\% \pm 11.60\%$) and the single-leg triple hop asymmetry index ($11.31\% \pm 4.96\%$) in the injur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on-injury group ($P < 0.05$), with large effect sizes ($d = 0.87$ and 0.93 , respectively).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tergroup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the other indicators ($P > 0.05$). **Conclusion:** Preliminary evidence suggests that bilateral asymmetry of lower extremity explosive power serves as a practical indicator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injury history in this population. It is recommended to be applied as an auxiliary screening tool for return-to-sport assessment in grassroots sports schools. Prospective studies are needed to verify its predictive efficacy.

Keywords: adolescents; middle-distance running; sports injury; motor function test; bilateral asymmetry of lower extremity function

生涯适应力视域下专升本学生就业观、能力观、发展观的协同重构 ——基于普通本科院校的考察

詹榕榕¹, 赵燕¹

(1.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66)

摘要:在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增长与就业市场不确定性加剧的新形势下,普通本科院校专升本学生面临“学历补短”与“能力重构”的双重压力,成为就业研究中易被忽视的边缘群体。本文以生涯适应力理论为核心框架,整合行为经济学、本土化生涯观与国际经验,对专升本学生就业观、能力观、发展观的现实困境与生成机制进行理论阐释与逻辑建构。研究表明,专升本学生就业困境是观念偏差、能力错位、发展缺失三维嵌套的系统性问题,其“求稳焦虑”、学历依赖与短期主义倾向,本质是生涯关注不足、生涯控制偏弱、生涯好奇匮乏、生涯自信不足的集中体现。据此,本文构建“观念重塑、能力重构、发展引领”三位一体协同重构模型,明确就业的三个观之间“观念引领、能力支撑、发展续航”的循环耦合机制,并提出以生涯适应力四要素为主要内核、以具身体验为方式、以资源整合与数字赋能为具体支撑的实践路径。研究旨在为普通高等院校专升本生涯教育课程改革提供理论参照与可操作方案,推动学生从“被动求职”转向“主动生涯建构”。

关键词:专升本学生;生涯适应力;三观协同;普通本科院校

DOI: doi.org/10.70693/202608278197

随着高校毕业生规模逐年攀升,从2024届1179万人次增长至2025届的1222万人次,后续还将持续走高。^[1]就业市场呈现结构性矛盾与总量压力并存的现象格局。新质生产力发展与人工智能技术普及对地方本科高校人才培养提出通用能力应用升级、复合人才结构转变和创新素养迭代更新的刚性要求,突出表现为人才培养实质与产业需求脱轨,学生思维模式与素养要求匹配不符^[2]。传统“人职匹配”导向的就业指导难以应对当下边界不明,即时变动且不确定性较强的职业环境。生涯教育向适应力、发展及主动建构三个导向驱动的转型已成必然。本文旨在通过梳理以往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桎梏及其生涯适应力在后续发展中的占比。

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中,限定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应用型本科院校中的专升本学生。最主要的接收主体。三二分段专升本与普通专升本作为推进职普融通的重要制度安排,在实践中仍面临一些压力。^[3]即便已经开始统一招考,但公众并不清楚考核模式,导致转段考核存在公信力不足这一现象。此外,由于专科和本科校际之间对于培养方案的设置不同,培养侧重点也不同,致使专本培养衔接不够顺畅。同时,由于专升本两个学段之间不能转专业,若培养方案有一致的情况就存在课程同质化的情况,不利于多元知识体系构建。在两个学段之间、校际差异之中并未有效衔接,也存在实践教学薄弱的问题。

一、新形势下高校专升本学生生涯教育时代性使命及就业复合型挑战

生涯教育承担着连接个体与环境,当下成长与未来发展的核心使命,是缓解毕业生就业焦虑,提升生涯适应力的关键环节与重要载体。^[4]当前高校生涯教育主要面临三重困境。一是难以迅速有效地回应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二是难以提升育人导向,专业设置无法及时转向导致与国家人才需求衔接不够;三是课程教学模式局限,容易体验性不足而精准服务学生需求程度低。这些桎梏都与专升本同学这一群体的适配性较弱。以生涯适

作者简介:詹榕榕(1995—),女,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赵燕(2006—),女,本科生在读,研究方向为广告学。

通讯作者:詹榕榕

应力为抓手稳步推进课程优化与分类指导,成为能够破解现实困境的必然与重要发展方向。

此外在求职中高校专升本学生往往面临双重边缘化处境。一方面,带有专科出身这一身份标签,求职遭遇学历偏见与机会排斥屡见不鲜。另一方面,相较于普通本科生相比学业基础薄弱,学习周期较长且社会资本助力小都是相对劣势。基于此其就业主动性不足,畏难情绪较强。在迷茫情绪的影响下也会造成职业定位模糊的现象。^[1]在求职就业市场中,这一背景也会导致其抗风险能力偏弱。相较于其他重点高校,学校就业支持资源更紧缺且生涯教育体系更不完善。这些都令专升本同学进一步矫正求职观念、加强通识能力培养与未来转型前瞻性展望更加紧迫并存在研究价值。

基于上述使命及挑战,本文旨在围绕以下核心问题展开:首先在针对普通高校专升本学生就业观、能力观、发展观层面呈现何种典型困境存在何种生成逻辑;然后在生涯适应力四要素如何分别作用于就业观、能力观和发展观,并推动三者实现协同重构;最后如何立足双非高校资源约束,构建既可落地又能执行且具备可行评估的生涯教育支持路径。在理论层面,本研究将生涯适应力理论引入普通高校的专升本群体,建立“生涯适应力训练,就业三观协同,实现高质量就业”这样一个相对完备的整合分析框架,推动中国特色生涯教育理论的本土化与场景化发展,弥补现有研究针对特定群体和特定院校关注不足的短板。在实践层面,面向双非高校资源现实,提出可落地方案。本文为理论建构与路径设计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理论逻辑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旨在系统梳理涉及生涯适应力,专升本就业和生涯教育及教育评价相关的数字化等领域成果,不涉及一手问卷,实验或访谈数据。全文表述严格遵循理论研究规范,以理论推断,逻辑推演与路径建构为基调,不使用实证性论断。

二、专升本就业困境、生涯适应力与就业的三个观协同

根据既有研究,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普遍存在两个学段之间由于公众不了解所导致的转段考核公信力不足。^[2]在针对普通考生和退役复学大学生等政策扶持群体存在考核内容片面的情况。此外,两个学段之间尽管专业一致,也有课程重复,培养方案脱节和产教融合表层化等问题。比如,公安类和法学类专升本群体同样面临目标培养模式泛化,实践教学演练薄弱,相较于同一院校的普通本科存在资源倾斜不足等较突出短板。^[3]在职业本科与应用型本科生涯教育中普遍存在评价功利化,专业教育与生涯教育融合度不够,社会参与不足等明显堵点。

相关研究也指出,专升本学生存在以下问题:在专业知识层面,现实实践基础较好但理论薄弱,存在专业知识系统搭建周期短而导致社会认可度较低。在求职者就业能力层面,缺乏系统性思维导致对生涯规划不足。可供选择的就业通路较为局限导致就业动力不足,学生就业主动性偏弱。在社会发展层面,来自新质生产力的冲击,传统产业转型也极大程度地压缩了社会资本。在就业市场上,专升本同学普遍面临学历偏见,人岗匹配度较低,就业岗位稳定性不足等压力。此外,学校层面上,普通高校毕业生整体呈现就业能力结构单一,求职策略趋同与长期发展意识薄弱等特征。^[6]

(一) 生涯适应力理论及其对生涯教育的启示

生涯适应力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核心分析框架。该理论将生涯适应力界定为个体应对生涯任务、角色转换与职业挫折的核心心理资源和行动能力,具体由四个维度构成:生涯关注即未来规划意识与时间洞察力,生涯控制即自主决策与自我管理能力,生涯好奇即探索意愿与持续学习倾向以及生涯自信即解决问题与应对失败的自我效能感。^[8]在求职行为方面,已有实证研究提示,生涯适应力与求职主动性和求职质量均存在显著正向关联,并在求职行为与就业结果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同时,包含校友,导师和同学在内的业缘关系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合学历差距,提升市场化求职效率与从业稳定性。上述结论为本研究中的理论参照用于逻辑推演,而非实证结论。基于上述理论内涵与关联,生涯适应力导向的生涯教育强调:需要接纳未来的不确定性,主动强化自主适应,大胆推动具身体验,坚持完成全程化跟踪并完成整合多方资源。上述才能实现从“知识讲授”向“能力赋能”,从“被动咨询”向“主动介入”的转变。

(二) 多元理论视角下的三观协同重构分析框架

为拓展理论视角,本文引入行为经济学,本土文化资源及国际经验并整合分析框架。从行为经济学来看,就业决策受损失厌恶、羊群效应、信息不对称、过度悲观或过度自信等认知偏差影响,导致专升本学生呈现风险规

避、求稳偏好、盲目从众、自我设限等特征，这是“求稳焦虑”形成的重要微观心理机制。在本土化视角下，“修齐治平”提供了具有文化契合度的生涯价值框架。修身对应的是自我认知与生涯自信，齐家对应的则是责任意识与生涯控制，治国是对应社会服务与职业价值，而平天下对应长期发展与使命引领，上述四个层面能够实现传统智慧与生涯适应力的内在对接，增强价值引领的文化认同。^[9]借鉴国际经验，针对美国盐湖城社区学院的经验，面向弱势学生群体的生涯教育应实现四大转变：从学生被动响应到学生主动介入，从大水漫灌式的普世教育到精准滴灌式的个性化辅导，从标准化引导到个性化指导，从职业规划单次咨询到生涯规划的全生涯跟踪，为双非高校专升本同学就业辅导提供重要参照。^[10]基于上述理论视角，本文构建“三观协同重构模型”：就业观、能力观、发展观就业三观不再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以观念引领，能力支撑和发展续航的循环耦合关系，即就业观决定发展方向，能力观决定就业底气，发展观决定就业持续性，三者以生涯适应力为共同心理基础，相互强化并协同演进。



图 1. 协同目标：生涯适应力提升“三观协同重构模型”

三、专升本学生就业三观困境的生成逻辑与现实表征

（一）信息不对称引发就业观中自我设限

在就业观层面，专升本学生面临风险规避与认知偏差的双重困境。一方面表现为“求稳焦虑”，即普遍存在的身份焦虑和第一学历敏感。在行为经济学层面体现为强损失厌恶心理即倾向于将更为稳定的用工形式并将其视为最小风险选择。而面对新兴行业和民营企业存在过度排斥。造成这一决策逻辑的本质是生涯关注不足与生涯控制偏弱。通俗而言就是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致使未来视野狭窄，在做选择时趋向于无法做出自主选择和能力怀疑导致的信心不足。另一方面也体现在“自我设限”。海量的求职信息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加剧人岗错配，令部分学生陷入过度自卑或虚假自信。^[11]而此类两极谬误和自我认知偏差均会导致同学主观上放弃对未来可能性的探索与潜在新职位的尝试。以上都会让代际学生的就业选择高度趋同，进一步加剧内卷。而新兴职位可能会面临损失人才，特殊人才也损失了更多专项发展可能性。

（二）能力供需错配致使能力观结构失衡

在能力观层面，专升本学生面临学历本位与结构错位的双重困境。一则表现为学历信号衰减，即便实现学历提升，两年学完四年专业计划本身就培养周期短，且两个学段课程重复率高或面临课内外实践不够。进一步导致核心职业能力提升滞后，进而最终形成学历升级但能力平级这一现象。在求职时学生普遍会将学历作为竞争力核心，而非可迁移能力与实战技能。此外也会存在能力供需错配现象。人工智能时代强调拥有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具备一定数字素养，强调理论实践的协同创新和理论知识跨界融合。^[12]这一背景下，现有人才培养模式理论识记仍占主要权重，然实践教学占比较低，本专业同生涯教育融合不足等问题都会导致学生能力结构与新时代岗位要求严重脱节。

（三）短期主义影响发展观路径规划

在发展观层面，专升本学生面临就业短期主义和发展路径模糊的双重困境。短期主义体现在学生过度关注工作起薪，稳定性和地域等即时收益，而无视从事行业的发展前景及成长空间，工作带来的平台资源和长期竞争力也不在考虑范围内。存在该现象的本质是生涯适应力系统性认知不足，导致缺乏对未来规划的中长期规划与可持

续发展意识的培养。目标断裂表现为多数学生将“升本”视为未来发展终点。在生涯规划中,学历并非唯一影响因素所以不应该成为发展重点,因而缺乏连续性成长设计,没有阶梯式持续性发展路径。在反馈调整中也存在体制机制不足的现象。学校对于这一群体的个性化指导不,无法做到一对一全程跟踪,这些都会带来职业发展方向模糊,未来发展动力不足的劣势。

四、三观协同重构的可能性实践路径

(一) 从求稳转向价值创造助力重塑就业观

运用多模态模式拓宽其生涯视野。以朋辈可参考案例进一步强化自主决策为核心来纠正认知偏差,为同学稳定就业心态。在教学内容上,可以选择学历补偿转向价值创造的内容,进一步拓展职业认知边界。将个人职业选择同所处地域的区域发展相结合,结合专业特点并联动关注政策及基层服务,将区域发展、专业特性同自身发展相结合。此外还可以通过结合个人成长,专业优势和深挖产业升级的可能性三者相结合,将小我的自我成长融入“修齐治平”责任意识。在日常教学方法上可以多鼓励、多引导、多增加具身体验,如将岗位见习,生涯人物访谈,模拟决策和小组研讨加入在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还能实施主动介入式辅导,在职业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进行提前干预,从而减少盲目从众情况。

(二) 运用素养本位淡化学历本位再造能力观

为提升生涯自信进而激发探索动机的能力,从而建立在就业市场上能力优于学历这一成长性认知。需要聚焦同学可迁移核心素养,走上职业道路面对复杂沟通能够从容应对,对待单一性问题有批判性思维,在日常沟通协作中经验学习助力能力迁移并为己所用,结合发展背景进一步磨练数字技能以此来提升问题解决能力。这些通识技能还能够借助普通高校资源实现推进以证促能,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能够运用可落地项目驱动,实现短平快实训进一步提升学生自我技能来降低实践门槛。此外,还能够利用现有资源充分激活业缘关系,通过导师,校友,校企合作等模式进一步弥合学历差距,增强实战体验,充分激发自我效能。^[13]

(三) 从短期择业到终身成长再创发展观

提升生涯适应力并非一蹴而就的,也不能够一次性见到即时成效。基于此,将其作为目标,构建阶梯式发展路径让其切实可行,可以分三步走:0—3年积累期,这一阶段支持同学投身职场了解自身优劣势,从做中学在实践中反复验证。3—5年壁垒期,这一阶段有了前期对自身的充分了解和实践经验积累可以将其用作未来职业道路当中,去粗取精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阶段,找到将长板,发展建优,进而提升自身综合竞争能力。5年及以上跃升期,这一阶段有了前期积累和攻坚在充分认知自我和未来发展路径的前提下,进一步审视未来发展路径并及时调整,将自身成长寓于时代发展之中。三步走推动学生思维从找一份工作转向建一条生涯道路转变。

五、客观条件资源约束下的制度设计可能方向研讨

普通高等院校存在资源约束,需从三方协同、评价督导与师资建设三个层面共同推进协同机制与制度保障机制。在三方协同层面,高校可将生涯适应力纳入各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进一步简化流程,将其以可实行的方式嵌入课程。^[14]

属地政府可通过规范化考核的方式来进一步提升公信力,拓展基层和区域性岗位。企业可以利用见习与讲座等低成本方式加强毕业生参与,降低校企合作门槛,共同实现三方联动的协同目标。在评价与督导层面,可以运用数字化方式来统一数据标准,并建立动态预警机制,实行教考分离,提升效率。可以在资源有限条件下,建立简易生涯档案,运用线上测评工具和信息共享平台,从轻量化的层面着手进一步提升跟踪的精准度。在师资建设层面,普通高等院校应重点提升辅导员与专业教师的基础生涯辅导能力。通过主动介入,认知矫正,活动设计体验等方式提升生涯引领力。以“可用、实用、通用”为原则,实现师资建设目标,进一步降低实施成本与阻力。

针对普通高校专升本学生就业困境是就业观、能力观、发展观三维嵌套的系统性问题,观念偏差导致方向偏误,能力错位带来竞争力不足,发展缺失影响可持续性薄弱。此外,摆脱三观困境是提升生涯适应力的统合性心理基础,生涯关注与控制矫正就业观,生涯自信与好奇重构能力观,四要素整合引领发展观,三者缺一不可。同

时“三观协同重构”并非简单叠加,而是观念引领,能力支撑,发展续航三者的循环耦合关系,也是高质量就业实现的内在运行逻辑。双非高校路径设计必须坚持资源适配,成本可控,可供操作的轻量化原则,走“主动介入,精准滴灌,具身体验与数字赋能”相结合的普惠式生涯教育道路。

六、结语

生涯适应力模块应嵌入专升本培养全过程,推行分级分类体验式指导,优先解决求稳焦虑与学历依赖的核心,强化能力构建。同时,监管部门应进一步完善专升本转段考核与质量监管,消除学历歧视,扩大区域认可度高,应用型强的基层岗位供给。针对专升本学生更应采取提前主动介入,重要节点干预、成本可控实践及数字工具使用的务实策略强化成果落地。

通过对于现有研究的总结,结合普通高等院校专升本学生在面临就业选择和职业发展存在的现状和发展困境进行剖析。从专升本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存在的求稳现状入手,运用可知可感的实践朋辈案例助力其就业观转向可以运用自身能力和专业背景同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价值创造相结合进而拓宽自身发展阈而非一味追求稳定进而导致自身能力发展上限受限。此外,在就业市场上看重的能力绝非文凭而是求职者本身能力及其能够创造的价值本身。综合素养在就业选择中占比大于学历本身,因此应该在发展中始终以自身素养为出发点,提升自身同所处地域发展、新兴产业及国家发展大势的能力培养,增强自身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面对职业选择时,作为动作主体也应该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从看重短期利益的职业选择转向能够实现终身成长的就业发展路径,将个人成长同社会发展及世界于国家发展大势紧密结合。

而本文属于纯理论建构与路径设计研究,未开展实证调研与数据检验,结论的普适性有待后续实证支持。未来可开展专升本学生生涯适应力、三观现状问卷调查或焦点小组访谈,开发适配量表,进行准实验干预研究;进一步深化“修齐治平”本土化转化,形成更具中国特色的生涯教育理论与课程体系研究。

参考文献:

- [1] 对做好 2024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进行部署会议[C].教育部,人社部,2023.
- [2] 范文亮,姚海燕.应用型本科高校专升本大学生就业现状和对策分析——以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为例[J].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2024,7(1):100-103.
- [3] 张小春.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模式的现状、问题和策略研究[J].职业教育,2024,23(34):7-11.
- [4] 吴红,刘取芝,姜莉.生涯适应力视角下高校生涯教育课程优化[J].教育教学论坛,2022(15):9-12.
- [5] 杨世昌.法学专业警辅方向专升本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以河南警察学院为例[J].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24,24(3):66-69.
- [6] 李妍,陈嘉玲.大学生求职主动性、生涯适应力与求职结果的关系探究——基于 516 名高校毕业生的实证分析[J].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5,26(3):83-92.
- [7] 赵小云,郭成.国外生涯适应力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10,18(9):1503-1510.
- [8] 代志新.如何更好促进大学生就业?一个行为经济学视角[J].财贸经济,2022(4):78-92.
- [9] 贾利军.修齐治平——谈谈中国人的生涯发展观[J].思想教育研究,2021(5):11-16.
- [10] 汪旭,毛晓灿,胡茂波.主动介入:美国盐湖城社区学院的生涯教育[J].高教发展与评估,2025,41(5):86-98.
- [11] 林金珠,倪天伟.人工智能时代地方本科高校高质量就业路径研究[J].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综合版),2026(1):1-4.
- [12] 金劲彪,许松,章清.教育评价数字化转型的挑战及实现路径[J].贵州社会科学,2024(4):111-117.
- [13] 赵可惠,王静.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培养现状调查及路径探究——以成都中医药大学为例[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2023(4):156-159.
- [14] 张学秋.地方院校大学生就业保障制度创新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7,16(14):782-783.
- [15] 刘雨桐.对职业本科生涯教育的实践探索与反思——以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为例[J].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2025,8(6):120-123.
- [16] SAVICKAS M L. Career construction: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vocational behavior [M]//Brown D, Lent R W. Career development and counseling.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13:149-174.

- [17] 侯志瑾, 梁宇颂, 李西营. 生涯适应力量表中文版的修订 [J]. 心理科学, 2011,34 (2):450-454.
- [18] 傅红, 段万春.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大学生就业决策偏差及其矫正 [J]. 高教探索, 2020 (6):117-121.
- [19] 李政涛.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本质与路径 [J]. 教育研究, 2022,43 (4):19-28.
- [20] 张抗私, 刘姿巾. 专升本毕业生就业状况与学历歧视问题研究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3 (5):90-98.
- [21] 魏戈. 主动介入式辅导: 弱势大学生生涯发展的支持模式 [J]. 高等教育研究, 2022,43 (7):89-95.
- [22] [21] 黄天骥, 李娟. 双非地方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结构与提升路径 [J]. 高校教育管理, 2024,18 (2):89-97.

The Collaborative Reconstruction of Employment Outlook, Ability Outlook, and Development Outlook of Students Upgrading from Junior College to Undergraduate Le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reer Adaptability: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Gener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Zhan Rongrong¹, ZhaoYan¹

1.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tinuous growth in the number of college graduates and escalating uncertainties in the job market, students who have transitioned from junior colleges to undergraduate programs at regular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are confronted with the dual pressures of “academic qualification enhancement” and “ability restructuring,” thereby constituting a marginalized group that is often overlooked in employment research. This thesis adopts career adaptability theory as its core framework, integrating behavioral economics, localized career outlooks,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to theoretically elucidate and logically construct the realistic dilemmas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the employment, ability, an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among these student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employment challenges faced by these students represent a three-dimensional, intertwined systemic issue involving conceptual discrepancies, ability misalignment, and developmental deficits. Their “anxiety for stability,” reliance on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and short-term orientation are essentially concentrated reflections of inadequate career attention, diminished career control, a lack of career curiosity, and insufficient career confidence.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thesis constructs a “conceptual reshaping, ability restructuring, and developmental guidance” trinity collaborative restructuring model, clarifying the cyclical coupling mechanism of the three part among the three employment perspectives. Furthermore, it proposes a practical pathway centered around the four key elements of career adaptability, utilizing embodied experiences as the approach, and leveraging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digital empowerment as specific supports. The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actionable strategies for the reform of career education curricula for students transitioning from junior colleges to undergraduate programs at regula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facilitating their transition from “passive job seeking” to “proactive career construction.”

Keywords: Students upgrading from junior colleges to universities; career adaptability; synergy among outlook on life, values, and worldview; gener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学科融合视域下我国体育教育与心理健康交叉研究图景、热点 演进及实践路径——基于 2018—2026 年 CNKI 文献的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

罗俊杰¹, 韩晨¹, 梁积铭¹, 吴炫轶¹, 付晓鑫²

(1.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106; 2.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延安医院检验科,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 体教融合政策持续推进背景下, 推动心理健康教育与体育学科深度融合, 是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培育青少年健全人格的核心抓手。本文以 CNKI 数据库 2018—2026 年 3062 篇相关文献为样本, 运用文献计量法与 CiteSpace 6.4.R1 可视化软件, 构建作者、科研机构、关键词三重知识图谱, 多维解析该领域文献时序分布、科研合作格局与热点演化脉络。研究表明 2018—2026 年领域发文总量持续稳步增长; 科研主体合作网络松散, 未形成稳定跨学科高产研究共同体; 研究力量集中于专业体育院校, 跨区域、理论与实践机构协同研究供给不足; 当前热点集中于中小学跨学科教学、体教融合落地、学生健康行为培育、分学段课程融合设计。现有研究存在学科融合流于表层、标准化实证干预稀缺、跨学科协同机制缺失、融合教学路径同质化四大短板。未来需打通体育学与心理学研究壁垒, 搭建跨机构联合科研平台, 深耕基础教育体育课堂融合实践, 开发本土化分层教学干预方案, 充分释放体育“育体+育心”一体化育人价值。

关键词: 学科融合; 体育教育; 心理健康; 体教融合; 知识图谱; CiteSpace

DOI: doi.org/10.70693/202608172810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2020 年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 明确要求重构“育体+育心”一体化育人体系, 破解体育、心理健康教育长期分治割裂的教育困境。现阶段青少年焦虑、人际敏感、抗压能力薄弱等心理问题频发, 单一心理课堂辅导难以实现常态化干预, 而体育课堂的团队竞赛、合作练习、挫折体验等场景天然具备情绪疏导、塑造心理韧性的育人功能, 是开展浸润式心理教育的优质载体。

现有学界成果已证实二者融合具备理论与实践可行性: 罗朝军搭建体育与心理健康融合三维分析框架^[1]; 韩昭、周立勇分别依托中小学、小学课堂案例验证融合教学实操路径^[2,3]; 石霞、范玉芳将融合研究拓展至高职院校、中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场景^[4,5]。但现有成果多为碎片化单学段课堂总结, 缺乏宏观层面大样本量化梳理, 难以形成体系化融合教学范式。基于此, 本文借助 CiteSpace 知识图谱开展全样本文献计量分析, 弥补现有研究宏观图景梳理的空白。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作者简介: 罗俊杰(2003—),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

韩晨(1988—), 女,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

付晓鑫(2001—),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青少年抑郁症;

梁积铭(2002—),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运动训练;

吴炫轶(2001—),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

通讯作者: 韩晨

第一, 依托 3062 篇大样本文献客观还原近九年领域整体发展样貌, 弥补现有小样本定性综述主观归纳的局限; 第二, 立足学科融合视角完善体教融合、学校体育交叉理论体系, 填补体育学科心理健康跨学科融合理论空白^[6,7]; 第三, 通过图谱量化指标识别核心作者、机构与前沿热点, 为后续交叉学科研究明确细分方向。

1.2.2 实践意义

一是提炼中小学、高职院校体育融合课堂实操思路, 为一线体育教师提供教学参考^[2,3]; 二是明确科研碎片化、实证研究不足等领域痛点, 帮助科研人员找准创新切入点; 三是依托文献时序演化数据, 为教育行政部门优化体教融合配套政策提供实证支撑。

1.3 国内外研究述评

1.3.1 国外研究现状

欧美运动心理学发展成熟, 多采用随机对照、长期追踪实验证实持续体育运动可降低青少年焦虑抑郁水平、提升自尊与心理韧性, 课堂侧重分层教学、户外拓展培养学生社会适应能力。但国外无“体教融合”顶层政策导向, 缺乏体育与心理健康一体化课程融合设计, 研究结论难以适配我国基础教育国情, 仅可作为理论参考。

1.3.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现有研究分为三类: 一是理论思辨类, 以罗朝军三维融合框架、马超超体育与生命心理健康一体化框架为核心^[1,5]; 二是分学段实践类, 覆盖小学、中学、高职院校课堂与校园赛事场景^[2,3,4]; 三是核心素养培育类, 将心理健康培育纳入体育学科核心素养育人链条^[4]。

横向对比语文、道德与法治、美术等学科^[6,7,8], 体育领域融合研究存在明显短板: 现有成果多为一线教师零散教学经验, 缺少大规模文献计量宏观分析, 尚未厘清领域科研合作格局与热点演化规律, 这也是本文核心创新切入点。

2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与检索策略

数据来源为 CNKI 数据库, 检索时段 2018 年 1 月 1 日—2026 年 8 月 2 日, 检索式: 主题=体育教育 AND 心理健康, 检索范围包含期刊论文、硕博学位论文、学术会议论文, 剔除报纸、征稿通知、重复、无摘要无效文献。初检得文献 3217 篇, 人工筛选剔除无效文献 155 篇, 最终有效样本 3062 篇。将文献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 导入 CiteSpace 完成数据预处理。

2.2 CiteSpace 参数设置

时间切片 2018—2026, 切片长度=1; 筛选算法 g-index, k=25; 采用 Pathfinder 寻径算法并开启切片网络剪枝; 分别生成作者、机构、关键词三类图谱; 聚类采用 LLR 对数似然率算法, 开启突现词检测功能识别前沿热点。

2.3 图谱核心指标释义

节点代表作者、机构或关键词, 节点直径与发文/共现频次正相关; 连线代表合作或共现关联, 连线粗细表征关联强度; 网络密度取值 0~1, 数值越低合作关系越松散; 中心性 ≥ 0.1 为领域关键枢纽节点; 聚类模块值 $Q > 0.3$ 代表聚类结构显著, 平均轮廓值 $S > 0.5$ 代表聚类内部主题统一。

3 体育教育与心理健康文献时空分布特征

3.1 年度发文量时序分布

2018—2026 年领域发文呈阶梯式持续上升, 依据政策节点与研究重心划分为两阶段:

1. 2018—2021 平稳起步探索期: 年均发文 200—320 篇, 以理论思辨、现状相关性调查为主, 融合课堂实操研究较少; 马超超 2022 年一体化融合框架为阶段转型标志性成果^[5]。

2. 2022—2026 融合深化高速增长期: 体教融合配套改革落地后发文量快速上涨, 2024 年发文突破 500 篇, 2025—2026 年维持产出, 研究重心全面转向分学段课堂融合教学设计^[2,3,9]。

国家教育政策、青少年心理健康现实需求是领域发展核心外部驱动力, 体育育心相关研究仍具备长期拓展空间。

3.2 文献来源分布特征

第一，期刊载体以普通教育期刊、地方体育院校学报为主^[1,3,10]，核心期刊载文占比不足 12%，多数成果为一线教学经验总结，深度实证类高质量成果供给不足；第二，文献结构：期刊论文 76.4%、硕博学位论文 15.2%、学术会议论文 8.4%；第三，研究主体分为两类：中小学、高职院校一线教师擅长课堂实操但缺乏跨学科理论支撑；专业体育院校科研人员具备理论基础，但缺少常态化一线教学实践场景，两类研究群体成果割裂、缺少联动。

4 科研主体合作网络可视化分析

4.1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作者图谱计量参数：节点 $N=268$ ，连线 $E=30$ ，网络密度 0.0008，合作关系极度松散。领域无大型稳定学术共同体，仅存在 2—3 人校内师生微型合作集群，集群间无学术联动；高产作者独立分布，跨校、跨学科联合署名成果稀缺；体育学、心理学研究者、一线教师分属不同学术圈层，交流壁垒显著。根源在于跨院系学术平台缺失、跨学科课题申报门槛高、基层教师科研时间有限。



图 1 2018—2026 年体育教育与心理健康领域作者合作网络图

节点为发文作者，直径代表发文频次，连线代表合作关系；整体密度极低，跨校、跨学科合作稀缺。

4.2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机构图谱计量参数：节点 $N=284$ ，连线 $E=29$ ，网络密度 0.0007，机构协同研究匮乏问题更为突出。

4.2.1 发文机构层级与空间分布

第一梯队为北京、南京、武汉、广州等独立专业体育院校，是领域理论研究核心供给主体；第二梯队为各省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侧重基础教育融合教学研究；第三梯队为地方院校、中小学、高职院校，产出课堂实践类成果。区域发展失衡，东部、中部体育强省发文量占总量 67%，西部院校相关研究产出极少。

4.2.2 机构合作核心特征

超 90% 机构节点孤立无合作连线，仅同城高校、校内院系存在微弱协作；跨省、跨院系联合研究几乎空白；理论类体育院校与基层中小学、高职院校无稳定合作平台，理论模型难以落地、一线实践经验无法上升为体系化理论^[2,3]。



图2 2018—2026年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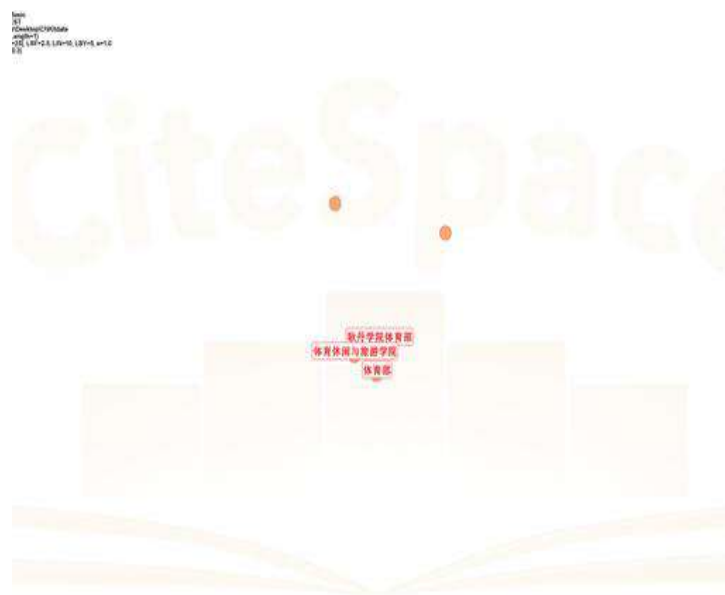


图3 重点体育院校局部放大图谱

节点代表发文机构，直径表征发文总量，连线代表机构合作；整体合作密度极低，核心体育院校彼此独立，无跨区域协同连线。

综合作者、机构图谱数据可知：该领域科研合作全面碎片化，跨区域、跨学科、理论-实践双向协同机制严重缺失，是制约研究纵深发展的核心阻碍。

5 关键词共现与研究热点演进分析

5.1 关键词共现网络整体特征

关键词图谱参数：节点 $N=280$ ，共现连线 $E=326$ ，内容关联度显著高于作者、机构网络。高频关键词依次为：体育教育、心理健康、学科融合、体教融合、中小学体育、青少年、健康行为、跨学科教学、心理韧性、教学设计、高职院校、校园赛事，明确研究对象、场景与核心主题^[1,4,10]。

5.2 关键词聚类五大主流热点集群

聚类模块值 $Q=0.412>0.3$ ，平均轮廓值 $S=0.627>0.5$ ，聚类划分有效，五大稳定研究集群如下：集群1：学科融合、跨学科教学。领域核心理论聚类，围绕罗朝军三维融合框架^[1]，探讨目标、内容、实施、评价四维融合路

径, 小学体育课堂实践为核心案例支撑^[3]。集群 2: 中小学体育、小学体育。发文规模最大的实践聚类, 聚焦全学段体育课堂心理渗透方案, 依托竞赛、合作练习构建分层教学模式^[2,9]。集群 3: 体教融合、健康第一。以国家政策为切入点, 围绕体育核心素养搭建青少年体质与心理健康协同培育体系, 覆盖中小学、普通高校场景^[11,12]。集群 4: 立德树人、课程思政。挖掘体育竞赛、挫折训练的人格培育机制, 将心理健康品质纳入体育课程思政育人链条。集群 5: 高职院校、校园赛事。拓展非基础教育场景, 以操舞、体能赛事实证体育对高职学生情绪、人际适应的正向作用^[10,13]。

5.3 研究演进阶段划分

依据突现关键词时序变化分为两大阶段:

1.2018—2021 基础理论探索期: 突现词为“相关性、运动干预、青少年”, 研究以问卷、理论思辨为主, 侧重验证体育运动与心理状态关联, 缺少完整融合教学设计。

2.2022—2026 融合深化实践期: 突现词更新为“学科融合、跨学科教学、中小学体育、教学设计、高职院校”, 研究重心全面转向分学段落地式课堂方案^[2,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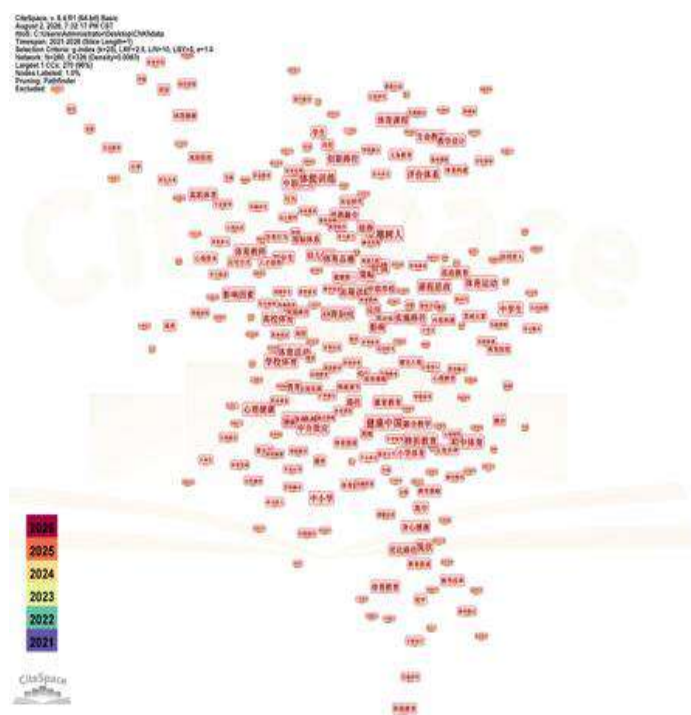


图 4 2018—2026 年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

节点为核心关键词, 直径代表共现频次, 分区区块为 LLR 算法划分的五大研究聚类。

6 当前体育教育与心理健康学科融合研究存在的问题

6.1 学科融合表层化, 多学科理论交叉深度不足

多数研究仅停留在“体育课堂可渗透心理教育”浅层结论, 同质化严重。一线实践文献仅罗列课堂手段, 缺少运动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理论支撑; 对比语文、道法、美术成熟跨学科理论体系^[6,7], 体育领域仅存在单一三维基础框架^[1], 缺少适配不同学段的分层融合理论模型, 体育学与心理学内核未实现深度交叉。

6.2 科研合作网络碎片化, 跨学科协同机制缺失

作者、机构图谱极低密度数据证实协同短板: 体育院校、心理学院、中小学无常态化联合科研平台; 东西部区域研究资源无法互通; 理论研究机构与基层实践单位割裂, 理论成果难以落地, 一线实践无法转化为标准化理论范式。现有课题申报、科研管理机制缺少跨学科、跨院校联合研究扶持政策。

6.3 研究范式失衡, 标准化实证干预研究供给匮乏

3062 篇文献中,理论思辨、课堂经验、简易问卷类文献占比超 82%,随机对照实验、纵向追踪、混合质性量化实证文献不足 18%。现有干预研究多为短期单节课尝试,缺少长期学年追踪与对照组设计;研究对象集中于普通中小學生,留守儿童、心理高危青少年、特殊教育群体研究稀缺;高职院校研究局限于操舞赛事^[10],课外体育、户外拓展场景挖掘不足。

6.4 融合教学路径同质化,分层、多元场景设计创新不足

现有教学设计集中于常规体育課,课后社团、校园运动会、户外拓展、家庭体育等场景育人价值挖掘不足;课堂手段局限于小组游戏、赛后谈话,缺少分层心理量表评价、挫折干预、家校协同方案^[14];多数研究直接套用小学模式至中学、高职,未结合各年龄段心理发展特征设计差异化教学体系。

7 学科融合视域下领域未来发展展望

7.1 推动体育学与心理学深度融合,构建分层跨学科理论体系

以罗朝军三维融合框架为基础^[1],结合小学、中学、高职学生心理发展特征搭建分学段融合理论模型;推动体育课程论、运动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交叉对话,厘清不同运动项目对青少年心理品质的差异化作用机制;借鉴其他学科成熟跨学科理论框架^[6,7,8],搭建体育融合心理健康标准化评价体系。

7.2 搭建多层次跨机构协同平台,重构一体化科研合作网络

依托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增设跨学科融合专项论坛,打通体育、心理、基础教育研究者交流渠道;优化纵向课题申报规则,增设跨院校、跨区域联合申报专项,推动东西部院校结对共建研究基地;建立“高校科研团队+中小学实践基地”共同体,实现理论建模与课堂实证双向转化^[2,3]。

7.3 丰富多元化实证研究范式,拓宽研究对象与体育场景

推广随机对照干预、学年纵向追踪、课堂行动研究等规范实证范式,量化验证融合教学干预实效;拓展研究对象,增加留守儿童、特殊学生、心理易感青少年专项研究;挖掘课后体育、户外拓展、课余运动队、家庭锻炼等多元场景心理育人价值,区分集体、个人、舒缓类运动的差异化疏导功能。

7.4 紧扣体教融合政策,开发本土化分学段分层教学方案

遵循“健康第一”政策导向,依据学段特征设计差异化课堂模式:小学侧重趣味游戏培育积极情绪^[3],中学依托竞赛训练提升心理韧性^[4],高职院校借助文体赛事缓解学业就业压力^[10,13];构建“课堂体育+家庭锻炼+线上心理跟踪”家校协同育人链条^[14],收集一线优秀教学案例形成标准化教学设计库,加速学术成果教学转化。

8 结论

本文以 2018—2026 年 CNKI 3062 篇文献为样本,运用文献计量与 CiteSpace 可视化工具,系统解析体育教育与心理健康交叉领域研究图景、合作格局与热点演化,得出四点核心结论:第一,2018—2026 年领域发文持续阶梯式上涨,体教融合政策、青少年心理健康需求是核心外部驱动,研究重心完成从理论相关性探讨向分学段课堂融合实践转型^[3,5];第二,领域科研合作整体碎片化,作者、机构合作网络密度极低,无稳定跨学科学术共同体,专业体育院校、中小学、高职院校研究主体割裂,跨区域、跨院系协同机制缺失;第三,领域形成五大稳定研究聚类,整体发展分为 2018—2021 基础理论探索期、2022—2026 融合深化实践期两大阶段;第四,当前研究存在融合表层化、科研协同薄弱、实证范式不足、教学路径同质化四大短板。

未来该领域需推进体育、心理、教育学多学科理论深度交叉,搭建跨区域联合科研平台,丰富标准化实证研究,开发适配不同学段的本土化融合教学方案,充分发挥体育“育体育心”双重育人价值,助力体教融合政策落地与青少年身心健康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 [1] 罗朝军,蒋珊珊.体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的三个维度[J].四川教育,2025,(17):40-41.
- [2] 韩昭.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与体育学科教学的融合实践研究[C]//陕西省体育科学大会论文集.西安:[出版者不详],2026:577-581.
- [3] 周立勇.小学体育跨学科融合教学的实践路径[J].田径,2026,(7):4-6.
- [4] 范玉芳,陈恒兴,李明恩.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导向下中学生健康行为培养路径研究[C]//全国体能训练科学大会论文集(上).2025:377-381.

- [5] 马超超, 王慧琳. 后疫情时代学校体育与生命教育学科融合框架 [C]// 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 2022:89-91.
- [6] 韦代杰. 心理健康教育融入美术教育的实践探索 [J]. 中学课程资源, 2026,22 (6):117-120.
- [7] 杜元培. 健全人格视域下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融合心理健康教育的浸润式路径研究 [J]. 试题与研究, 2026,(22):82-84.
- [8] 陈颖, 张颖, 金顺玉, 等. 五维赋能视域下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跨学科实践 [J].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2025,(S1):65-69.
- [9] 韩秋芝. 基于体教融合理念的小学体育与健康核心素养的培养 [J]. 新课程, 2026,(22):157-160.
- [10] 石霞, 贺丽娟. 职业院校操舞赛事体教融合与学生心理健康互动 [J]. 冰雪体育创新研究, 2026,7 (8):43-45.
- [11] 刘述友. 体教融合视角下小学生体质健康提升路径探索 [J]. 冰雪体育创新研究, 2026,7 (7):19-21.
- [12] 黄钊林. 体教融合视域下高校学生体育锻炼行为与体质健康协同提升路径研究 [C]// 国际数字体育科学大会论文集 (上). [出版者不详], 2026:15-20.
- [13] 温亚娟. “健康第一” 视域下高职美育赋能模式探索与实践 [J]. 艺术设计学刊, 2026,(8):242-244.
- [14] 刘凌云. 基于真实情境的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家校协同育人实践 [J]. 新课程, 2026,(22):177-180.

Research Prospect, Hot-spot Evolu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A CiteSpac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Based on CNKI Literature from 2018 to 2026

Luo Junjie¹, Han Chen¹, Liang Jiming¹, Wu Xuanyi¹, Fu Xiaoxin²

1.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106, China; 2.Clinical Laboratory, Yan'a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00,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sports-education integration policy, promoting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mental-health education and physical education is a core measure to implement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Health First” and foster adolescents’ sound personality. Taking 3062 relevant papers retrieved from CNKI database from 2018 to 2026 as samples, this paper adopts bibliometrics and CiteSpace 6.4.R1 visualization software to construct triple knowledge maps of author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keywords. It multidimensionally analyzes the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literature, patter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evolution context of research hot-spots in this fiel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this field keeps growing steadily from 2018 to 2026. The scientific-research subject cooperation network is loose, and no stable interdisciplinary high-output research community has been formed. Research force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specialized physical education universities, while collaborative research supply among cross-region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stitutions is insufficient.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s focus on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mplementation of sports-education integration,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health behaviors, and curriculum integration design for different school stages. Existing studies have four major shortcomings: superficial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scarcity of standardized empirical interventions, lack of interdisciplinary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and homogenization of integrated teaching paths.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break the disciplinary barriers betwee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build cross-institutional joint scientific-research platforms, deepen integrated teaching practice in basic physical-education classrooms, develop localized hierarchical teaching intervention programs, and fully release the integrated educational value of “physical fitness plus mental cultiv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Keywords: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Mental health; Sports-education integration; Knowledge map; CiteSpace

科技型小微企业赋能高校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研究： 现状、问题与优化策略

刘杰

(应急管理大学 应急国际交流学院, 河北 廊坊, 065201)

摘要: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 科技型小微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 与高校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互补关系。科技型小微企业赋能高校学生创新创业, 对于破解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平台短缺、市场脱节以及小微企业人才匮乏、创新成本高等双向困境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与资料收集, 系统梳理了科技型小微企业赋能高校学生创新创业的现状与问题, 探究了赋能过程中的障碍与资源匹配困境, 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优化策略。研究发现, 科技型小微企业赋能学生创新创业面临需求对接不畅、各方参与动力不足、能力匹配错位、服务生态薄弱等核心障碍; 破解路径在于以“微创新”为突破口、以真实项目为载体、以服务平台为支撑。本研究为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深化产教融合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科技型小微企业; 高校学生; 创新创业实践; 企业赋能; 产教融合

基金项目: 河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计划人文社会科学类青年基金项目 (编号: QN2026471)、廊坊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自筹经费项目 (编号: 2025029138)

DOI: doi.org/10.70693/202609072917

一、引言

当前, 国家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将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科技型企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 而高校则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前沿阵地, 二者之间的互补关系日益受到关注。科技型企业提供的真实场景不但能促进理论知识向实际应用能力的转化, 也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与创业热情。相较于大型企业, 科技型小微企业机制灵活、反应迅速, 能为学生提供参与核心技术研发、项目管理及市场运营的宝贵机会, 有效弥补高校教育中实践性不足的短板。与此同时, 部分科技型小微企业受制于高端人才短缺与创新资源匮乏的瓶颈, 也需要借助高校的人才与知识资源实现发展。因此, 科技型小微企业赋能学生创新创业, 不仅是学生成长的需要, 也是企业发展的内在需求。

已有的研究多从校企合作平台、大学科技园建设等角度对企业与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之间的联动方式进行了探讨^[1-3], 但总体来看, 对科技型小微企业如何基于其独特优势系统性地赋能学生创新创业的专门探讨尚显不足。本研究聚焦于“科技型小微企业赋能高校学生创新创业”这一核心议题, 在系统收集资料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剖析了科技型小微企业在赋能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可操作的优化策略与对策建议。

二、科技型小微企业赋能学生创新创业的概念与主要方式

(一) 概念的界定

科技型小微企业是以科技人员为主体, 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发、生产与服务的中小经营主体, 具有创新迭代快、市场响应灵活、组织架构扁平化等典型特征。高校学生创新创业实践, 是大学生依托专业理论知识, 通过产业项目研发、顶岗实习、创业孵化等实践载体, 系统性培育创新思维、实践操作能力与商业综合素养的育人过程。本文所指科技型小微企业赋能高校学生“双创”的实践, 即企业向在校学生开放实践场景、真实研发课题、技术指导与孵化配套资源, 激活学生创新潜能, 最终达成校企协同发展的双向互动过程。

从创新范式演进视角来看, 企业创新模式逐步由封闭自主研发转向开放式创新, 企业需整合内外部多元知识

作者简介: 刘杰 (1987-), 女, 山东高密, 讲师, 硕士, 应急管理大学, 研究方向: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创新创业与就业指导。

资源，同步加快技术研发与成果商业化进程^[4]。对科技型小微企业而言，依托学生群体开展赋能实践，能够以较低成本吸纳外部创意与人力资本^[5]。外部知识资源的系统化利用已成为企业加速创新进程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产学研联盟作为协同创新的高阶形态，是三螺旋理论在产教领域的典型应用，依托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实现多方协同创新^[6]。以三螺旋理论为支撑，分析“大学—产业—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发现校企间各主体在功能上存在一定的重叠与互补^[7]。罗鄂湘等（2007）^[8]认为，科技型中小企业与在校大学生的“互动”，是以两类主体为核心开展知识、信息与实践行为互通，实现科技资源共建共享的协同活动。

因此，科技型小微企业赋能高校学生双创并非企业单向输出资源，而是互利共赢的赋能共生关系：小微企业作为赋能者，为学生提供真实产业问题与实践场景；学生作为被赋能者，在项目实践中实现综合能力提升，同时以创意与技术方案反哺企业技术改良。该赋能共生模式的本质，是开放式创新外部知识整合逻辑与三螺旋理论产学研功能互补特征在微观校企合作场景中的具体体现。

（二）主要模式与实施方式

科技型小微企业赋能学生创新创业，本质上是一种双向互益的过程。从企业角度看，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快速技术发展和数字化变革中面临日益增长的知识和财务压力，可以借助高等教育机构的外部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开发新技术和新流程。从学生角度看，通过参与企业真实项目，学生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从需求分析、方案设计到成果交付的全流程，在实战中培养创新思维、技术能力和商业素养。基于对现有文献的系统梳理，科技型小微企业赋能高校学生创新创业主要呈现以下几种方式。

表1 科技型小微企业赋能学生创新创业的主要方式比较

赋能方式	具体做法	学生收获	企业收获
实习实训培养	提供实习岗位、实践指导	积累实践经验、提升就业能力	获得人才储备、解决用工需求
技术交流指导	企业导师指导、教师入企交流	获得产业视角、提升实践能力	获得知识输入、提升技术水平
创业孵化支持	提供场地、资金、导师支持	降低创业门槛、获得孵化服务	培育合作伙伴、获取创新项目
项目委托攻关	发布课题、提供攻关机会	项目驱动学习、成果可转化	低成本获取解决方案

（1）实习实训培养方式

学生进入小微企业进行顶岗实习或参与联合培养项目。通过实习实训，学生能够在真实工作环境中应用所学知识，积累实践经验，提升就业竞争力。面向科技型小微企业的高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指出，小微企业是高职院校学生顶岗实习和毕业就业的重要阵地，校企合作已成为提升应用型人才实践能力的关键途径^[9]。

（2）技术交流指导方式

校企之间通过双向人才互通实现技术协同赋能。一方面，科技型小微企业选派一线技术骨干担任校外企业导师入校，全程指导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实操；另一方面，高校专业教师以“科技副总”身份派驻企业，将学科前沿理论与实验室技术成果落地至产业场景，形成常态化双向技术交流闭环。在校企导师协同育人层面，尹姣等（2025）构建的创新创业导师素质模型表明，企业导师在实践操作技能与创新思维培育方面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10]；基于此，由高校教师与企业导师组成的双导师团队依托真实产业孵化项目开展全过程指导，能够显著提升创新创业教学实效。而“科技副总”制度作为校企人才柔性流动的重要载体，在满足企业技术革新与高校人才培养双向需求的同时，有效打通了校企实训资源的信息壁垒，凝聚了应用型人才培育合力^[11]。该制度还为工程科研人员搭建了常态化交流通道，为小微企业技术瓶颈攻关提供了可持续的解决路径^[12]。

（3）创业孵化支持方式

科技型小微企业可联合大学科技园或产业研究院，共同为学生创业团队提供场地、启动资金、企业导师及商业模式验证等孵化服务。罗嘉文等^[13]提出的前孵化器发展路径，将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管理重心前移至项目早期阶段，为资源整合与全链式技术孵化提供了系统化服务框架。在此基础上，弓迎宾等（2024）进一步探讨了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载体与平台建设的具体路径，为多方主体协同推进孵化服务提供了实践参考^[14]。

（4）项目委托攻关方式

项目委托攻关以“企业发榜、学生揭榜”为核心运行逻辑。小微企业立足生产经营中的技术痛点发布攻关课题，学生自由组队完成方案设计与评审答辩，立项后进驻企业开展全流程技术研发。当前“揭榜挂帅”机制的榜方多为高校、科研机构或企业研发团队，学生通常作为成员参与其中。但近年来共青团系统主办的“挑战杯”等

赛事已专设“揭榜挂帅”专项赛道，明确以学生团队为独立参赛主体，为这一模式提供了实践先导。整合校企研发力量组建联合项目组，能够围绕企业真实技术需求设计产学研创新实践项目，实现项目全流程规范化管理。依托学生小型创新团队承接企业榜单课题，可有效破除校企之间的资源阻隔，为轻量型校企协同创新提供可行路径。基于对现有文献的系统梳理，科技型小微企业赋能高校学生创新创业主要呈现四种方式（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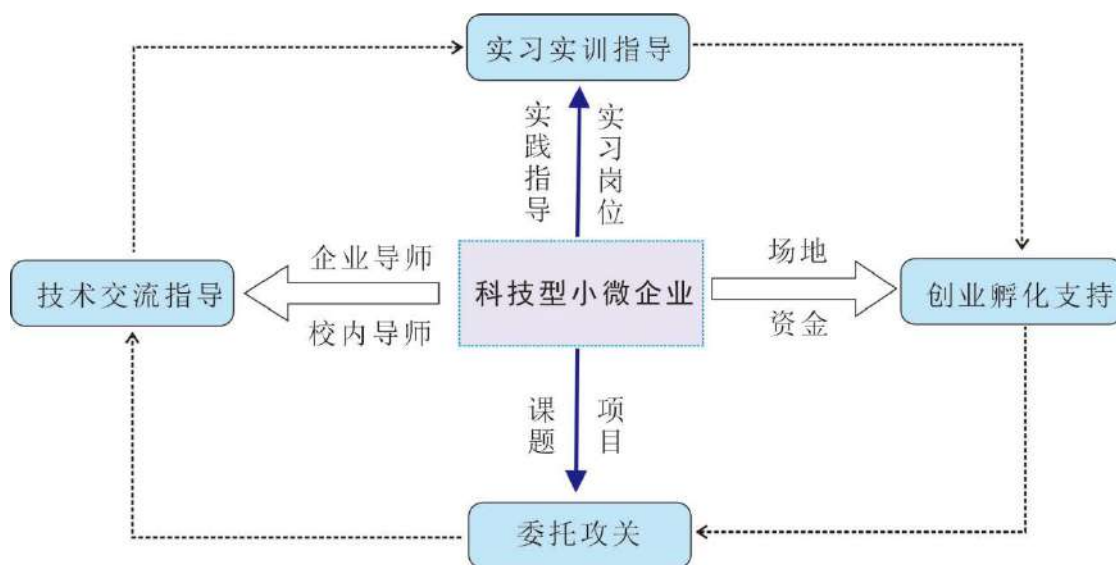


图1 科技型小微企业赋能学生创新创业示意图

三、科技型小微企业赋能学生创新创业的现实困境

（一）企业实际需求缺乏有效匹配渠道

科技型小微企业赋能学生创新创业的首要障碍是需求对接不畅，呈现出典型的“协同浅层化”特征。一方面，小微企业往往忙于日常经营，缺乏时间和精力去梳理和发布可供学生参与的技术需求；另一方面，高校虽有丰富的学生资源和科研能力，但缺乏精准获取企业需求的信息渠道。双方处于“企业不知道学生能做什么、学生不知道企业需要什么”的信息不对称状态。有学者认为，当前的创业孵化基地建设普遍缺乏顶层设计，呈现出“碎片化发展”态势，“重规模、轻内涵”现象突出，是导致双创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出现“两张皮”现象的主要原因^[15]。谢丹琳（2024）的研究也证实，信息不对称是制约校企协同的核心障碍之一^[16]。

从实践来看，大量影响生产效率和效益的实际问题，恰恰源于工艺改良、服务优化等小规模改进。这类需求技术门槛未必最高，但解决后效益显著，且能为青年学生提供宝贵的实践场景。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征集与匹配渠道，这些实际需求往往被忽视或无法有效传递至高校，造成“企业有赋能意愿、学生有参与需求、对接无渠道”的尴尬局面。

（二）各方投入意愿不足

企业方面动力不足。科技型小微企业参与赋能的直接经济收益不明显，且面临知识产权归属、商业机密保护等顾虑，赋能意愿受到抑制。对于资源本就有限的小微企业而言，投入人力物力参与学生培养需要明确的预期收益作为支撑，而当前缺乏足够的激励措施。

高校方面支持不足。现行评价体系偏重学术论文和纵向课题，教师参与指导学生开展企业实际项目的激励不足。在职称评审、绩效考核中，横向合作和产学研成果的权重远低于学术论文，导致教师缺乏参与赋能活动的动力。

学生方面参与动力不足。学生参与企业赋能项目面临时间投入大、成果不确定性高等问题，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学生在校期间面临繁重的课业压力和考研、就业等多重任务，投入额外时间参与企业项目需要明确的学分认定、奖项或就业机会作为激励。刘懿等（2016）调查研究发现，超过70%的大学生不了解企业创办流程，80%以上认为资金是主要障碍。大学生创业意愿到创业行为的转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需要建立有效的转化机制和激励机制^[17]。

（三）学生知识结构与实际需求错位

赋能效果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能力匹配效率低下。从能力角度看，高校学生的知识结构与小微企业的实际需求存在错位，即学生掌握的往往是通用性、理论性知识，而企业需要的是场景化、应用性技能。这种错位的根源在于现有课程体系与产业前沿需求之间的鸿沟，未能形成“学科交叉-产教融合-能力导向”的闭环。解决这一问

题的关键在于缩短从“学”到“用”的距离，通过定制化培训内容、真实项目分解、一线场景实训等环节，提升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

此外，从运行机制看，当前赋能活动普遍缺乏长效化的匹配渠道。现有合作多为“一事一议”的项目形式，缺乏制度化、常态化的对接方式；赋能成果的持续跟踪与应用反馈不够健全，难以形成“赋能-反馈-改进-深化”的良性循环。基于能级跃迁的小微企业孵化路径研究为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理论视角。

（四）全过程专业化服务缺失

从需求对接、项目匹配到成果转化的全过程专业化服务不足，是制约科技型小微企业赋能的重要障碍。小微企业普遍缺乏与高校打交道的经验，不熟悉项目申报、合同签订、成果归属等流程；高校也缺乏专门对接小微企业的服务机构和人员。这种“服务鸿沟”进一步加大了赋能活动的交易成本，制约了双方的参与意愿和效率。

具体而言，服务支撑的薄弱主要体现在：缺乏专业的技术经纪机构承担校企对接职能；缺乏标准化的赋能合作协议模板，每次合作都需要从头谈判；缺乏知识产权快速确权和纠纷解决渠道，企业担忧核心技术外泄。这种服务生态的薄弱，使得本就资源有限的小微企业在合作中顾虑重重，合作关系脆弱且难以持续（详见表2）。

表2 科技型小微企业赋能学生创新创业的困境分类与表现

困境类型	具体表现	主要影响	主要原因
需求对接困境	企业需求难以有效传达；学生能力难以精准匹配	赋能启动困难；匹配效率低下	信息渠道不畅；缺乏专业中介服务
参与动力困境	企业赋能收益不明确；教师激励不足；学生缺乏制度保障	赋能意愿不足；参与积极性低	评价体系偏向学术；知识产权保护顾虑
能力匹配困境	学生知识结构与企业需求错位；技能转化效率低	赋能效果不佳；成果落地困难	产教融合深度不足；课程设置滞后
服务支撑困境	全过程服务缺失；交易成本高；法律风险顾虑	赋能周期延长；合作关系脆弱	服务机构缺位；标准化程度低

四、优化策略与政策建议

（一）构建多方激励体系，强化制度保障

高校方面应推动将学生参与小微企业赋能项目的成果纳入学分认定体系，将教师指导学生开展企业实际项目纳入绩效考核。具体措施包括：设立“企业赋能实践学分”，认可学生参与企业项目的实践成果；建立“项目-实习-就业”的贯通通道，让学生通过赋能项目获得实习机会甚至就业推荐；在职称评审中增加产学研合作成果的权重，鼓励教师主动对接小微企业。

企业方面可以对积极参与学生赋能活动并产生效益的小微企业给予财政补贴或政策倾斜。具体措施包括：在“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对积极参与赋能活动的企业予以加分；建立“赋能示范企业”荣誉制度，提升企业参与的社会声誉；对赋能活动中产生的知识产权申请费用给予补贴。

政府方面应发挥引导作用，可以设立“小微企业赋能学生创新创业专项基金”，为赋能项目提供小额、快速的启动资金支持。同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例如探索建立惩罚性赔偿机制，降低科技型小微企业与高校合作中的成果泄露风险。此外，应建立由科技部门牵头、经信、教育、财政等多部门联动机制，统筹推进赋能活动。

（二）打造全过程服务支撑体系，实现数智赋能

针对当前科技型小微企业赋能学生创新创业过程中存在的对接渠道不畅问题，应着力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数智化信息对接平台。线上平台需具备企业需求发布、学生能力展示、智能匹配推荐及项目进度跟踪等核心功能，界面设计应遵循简洁易用原则，充分降低小微企业的使用门槛与技术适应成本。可借鉴“五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中“通过大数据分析 with 云平台构建精准的供需映射通路”的思路^[6]，利用 AI 算法实现需求与能力的智能撮合，降低信息不对称。同时，线下定期组织对接会、项目路演等活动，为企业和学生创造面对面深度交流的机会，增进双方了解与信任，提高项目对接的成功率。

在知识产权保护与权益分配方面，需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服务平台。该平台应制定清晰、简便的成果归属划

分指引,为学生参与企业项目提供标准化的赋能合作协议模板,从而有效降低法律风险和谈判成本,明确学生成果的归属与使用权限。此外,平台还应提供快速确权通道和纠纷解决服务,及时化解合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知识产权争议,保障各方合法权益。

为形成完整的服务闭环,还需整合法律咨询、财务服务、技术经纪等专业服务机构,打造一站式、低成本的专业服务支撑体系。应重点培育专业化的技术经纪机构和技术经理人队伍,承担需求挖掘、项目撮合、过程管理、成果转化等全流程职能,帮助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降低参与赋能活动的门槛,提升校企合作的效率与可持续性。

(三) 培育赋能共生的良好氛围,构建协同生态

(1) 加强优秀案例的宣传推广。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赋能学生创新创业过程中存在的认知不足与观念偏差问题,应首先加强优秀案例的宣传推广工作。有关部门和高校应联合遴选一批运行良好、成效显著的企业赋能学生创新创业典型案例,通过编印案例集、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利用各类媒体报道等多种形式,系统传播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这有助于让更多小微企业和在校学生直观了解赋能合作的实际价值、操作路径与预期收益,从而激发各方参与热情,形成示范引领效应。

(2) 培育校园赋能文化。在校园文化建设层面,应着力推动形成以赋能共生为特色的校园文化氛围。借鉴傅梅烂(2025)提出的基于创业环境要素分类法的建设策略,通过“生生协创、校友助创、名师领创”形成闭环生态^[18]。高校可通过邀请企业导师进校园开展专题讲座、举办创新创业竞赛、组织创业训练营和孵化营等多种形式的活动,让学生在真实的产业场景中感受创新创业的魅力和挑战。同时,这些活动也能够增强小微企业参与学生培养的社会责任感与荣誉感,使企业更加主动地开放资源、提供指导,形成校企双方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

(3) 引导学生职业认知转型。人才流动意愿是维系小微企业赋能双创长效运行的关键。高校需依托专业课程、典型案例宣讲、产业政策解读等多元载体,重塑学生职业认知,破除“偏好大型企业、集中于大城市”的固有择业思维,引导学生树立科技型小微企业同样具备广阔成长空间的职业理念,推动其完成从“被赋能者”到“赋能者”的身份转型。唯有实现择业认知的根本转变,方可打通人才向科技型小微企业流动的渠道,为校企协同赋能生态提供持续的人才支撑。

五、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对科技型小微企业赋能高校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的系统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科技型小微企业赋能高校学生创新创业,其本质在于通过“企业出题、学生答题、校企共导”的方式,实现企业创新需求与学生成长需求的双向满足与“赋能共生”。这是校企合作的一种重要形式。第二,小规模实际改进是破解科技型小微企业赋能学生创新创业“有心无力”困境的有效路径。相较于大型合作项目,小规模实际改进具有门槛低、周期短、见效快的特点,更契合小微企业的资源条件和学生的实践能力水平。第三,当前科技型小微企业赋能学生创新创业面临需求对接不畅、各方参与动力不足、能力匹配错位、服务支撑薄弱四重核心障碍,破解之道在于构建精准对接的信息渠道、激发各方积极性的激励措施、覆盖全过程的服务支撑体系。

未来研究可在以下方向深化:一是开展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验证本研究所提策略的有效性;二是比较不同类型科技型小微企业(如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赋能学生的不同方式;三是跟踪研究赋能项目的长期效果,包括对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小微企业创新能力增强的持续影响。

参考文献

- [1]宿桂红,常春水.“双创”背景下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路径与建议——以吉林省高校助力小微企业创新创业为例[J].人才资源开发,2023(7): 51-52.
- [2]姚瑶,韩娜娜,沈通,等.创新创业教育与企业孵化器的互动模式研究[J].创新创业理论与实践,2025,8(3): 191-194.
- [3]黎鲲.中小微企业与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途径[J].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18(6): 48-49.
- [4]后锐,张毕西.企业开放式创新:概念、模型及其风险规避[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6,23(3): 140-142.
- [5]陈钰芬,陈劲.开放式创新:机理与模式[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 [6]朱学红,谌金宇,伍如昕.基于三重螺旋理论的高校产学研合作联盟模式研究——以中南大学为例[J].现代大学教育,2012,(4)62-67+112-113.
- [7]陈红喜.基于三螺旋理论的政产学研合作模式与机制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26(24)6-8.

- [8]罗鄂湘,谢保同,樊一阳.科技型中小企业与在校大学生的互动[J].经营与管理,2007,(7)18-19.DOI:10.16517/j.cnki.cn12-1034/f.2007.07.010.
- [9]李清平,傅幼萍,徐丹.面向科技型小微企业的高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J].南方职业教育学刊,2016,6(5)15-20.
- [10]尹姣,罗先喜,刘树博,等.高校创新创业导师综合素质模型构建及其要素耦合协调机理分析[J].创新与创业教育,2025,16(6)78-86.
- [11]赵雷雷,于曰伟,王明波,等.以“科技副总”为纽带的应用型人才实训模式构建与实践——以车辆工程专业为例[J].大学教育,2023,(21)90-92+96.
- [12]蒋永文,夏天添,王玉光,等.“科技副总”政策促进高校工程科研团队创新增效——基于复杂组态模型的研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5,(3)93-99+106.
- [13]罗嘉文,谢耀雯,张光宇.前孵化器发展模型及路径构建——基于战略生态位管理理论的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2019,39(23)213-218.
- [14]弓迎宾,李彩艳,任建萍.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载体和平台建设研究[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24,22(10)203-206.
- [15]张洪梅,张倩,马福骁.创业孵化基地推动创新创业教育生态体系构建的路径研究[J].现代科技研究,2025,5(7). DOI:10.12373/xdkjy.2025.07.21438.
- [16]谢丹琳.新质生产力下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内涵特征、形成逻辑及实践旨向[J].军事高等教育研究,2024,47(3)50-57.
- [17]刘懿,刘昊,肖紫兰.在校大学生创办小微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现状分析——以武汉市属高校为例[J].今日财富,2016,(15):91-92.
- [18]傅梅烂.基于创业环境要素分类法的大学生创业园产教融合建设策略[J].创新与创业教育,2025,16(2)97-107.

Research on Technology-based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Empoweri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Liu Jie

Universit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Langfang,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technology-based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as important subject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ve a natural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with university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Empoweri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technology-based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olving the two-way dilemmas of students' lack of practice platforms and disconnection from the market, as well as enterprises' shortage of talents and high innovation costs.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data collection,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echnology-based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empoweri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xplores the obstacles and resource matching difficulties in the empowerment process, and proposes operabl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echnology-based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face four core obstacles in empowering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oor demand matching,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capability mismatch, and weak service support. The solution lies in taking “micro-innovation”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real projects as the carrier, and service platforms as the support.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enhancing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apabilities and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Keywords: Technology-based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University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Enterprise empowerment;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从“Avant Garde”到“逆经典化” ——关于《湍流》诗群思想之隅见

高若栋¹

(1.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香港 999077)

摘要: 作为兼具地方文化属性、整体时代意识的诗人集群, 关于《湍流》的发展, 已事实上形成了一部近十余年中国诗坛罕有的流派艺术史。本世纪以来, 面临以“知识分子写作”为代表的文人进入所谓“中年”阶段, 且若干“民间诗坛”人物或被外物所收编, 或在商业秩序内逐步丧失探索意识, “湍流诗群”成为近乎孤独的高度独立的文学力量。细窥其创建及演进的更迭脉络、理论及精神的价值建构, 本质正是对“先锋”概念的继承和扩变、面朝“经典化”浪潮的抵御和重塑。诗群思想所展露的对历史、命运的凝视与转译, 对诗歌价值的呼唤与拱卫的姿态, 正逐步或必然引发当代诗史的颤动。

关键词: 当代诗学; 《湍流》诗刊; 先锋思潮; 跨越性

DOI: doi.org/10.70693/202607317142

关于“先锋”的诠释、争辩、沉寂和重振, 是百年新诗史上反复出现的重要问题, 尤其是20世纪晚期“新诗潮”及“第三代”诗歌运动阶段, 无论“今天派”诸君, 或更晚发轫的“非非主义”等百家争鸣的民间流派, 都以各自的理解和主张镌刻着各异的意涵。而《湍流》创刊及诗群的建设, 则是发生在其数十年之后, 毫无疑问对前人存在大量的经验继承与汲取、价值反思和追索, 在盛宴旧址或废墟上加固独立和探索的精神。进入2010年后, 诗坛呈现出上层口径中的繁荣局面, 在大量精英文人进入所谓收获时节, 安坐于“中年写作”的方寸时, 曾经激昂挥斥的“民间写作”若干代表也逐步在商业游戏中失去“前沿”的胆略与视野, 开始默许甚至享受作品的“经典化”过程。《湍流》诗群的诞生发展, 正是对“先锋”意识和“诗歌”尊严的唤醒或延续。在路径上, 再次复现从地区到全国的交互轨迹, 从思想上, 不断强调独立和深掘的前进精神。这既是继承业已萧条的“旧先锋”的某种衣钵, 也是对文学新问题及时代新生态的阐释或批评的开拓, 为历史的深渊划出一道今日的鳞波。

一: 荆湖与中国: 地方诗群的嬗代史

具备浓郁现代性意识的诗群, 实则拥有着深刻的古典化背景, 湍流激起的第一捧浪花, 携带着某种隔代的温情。追溯“湍流诗群”的诞生, 首先维系于其核心刊物《湍流》的发展之上, 而此刊之精神及初创团队的雏形, 则应当锚定在“后语言主义”的萌芽史之中, 在2010年秋, 野梵为代表的几位湖北公安籍诗人在历经酝酿后, 正式提出这一概念。因此诗群的身世族谱中, 存在着两项重要的价值烙印, 即围绕公安地区的地缘属性, 以及“后语言主义”思想的核心驱动力。在当代新诗史上并未存有太多镜头的公安地区, 在更为宏阔的纵深历史维度上, 却拥有一条甚为悠久和多元化的诗学根脉, 其与荆湖地区的楚文化、秦汉时期的诗赋艺术, 乃至整个南中国的文事传统, 都存在着亲密复杂的关联。在屈、宋掀起骚体艺术的时代, 孱陵县还尚不具备独立的文艺属性或政治光谱, 在汉江腹地与长江中游的楚国核心区域内, 长期作为郢、鄢、都三座都城的附属概念存在, 在顷襄王迁都于陈郢、寿春之前的多数时间内, 孱陵县因紧邻王都的地理优势得以沐浴到楚文化的大量光辉。进入汉末, 曹军南下、赤壁鏖兵, 刘备集团在经略荆襄地区时将治所选在了孱陵县, 自此地名变换, 公安之称得以出现。其后岁月中政权变更、区划调整虽时有调整, 但“公安”之名被多次采纳, 继而沿用至今。

正如《湍流诗丛》总序中所指出“朝向多种可能性的诗学创艺建构和愈益个人化的书写生态”[1]的追求一般,

作者简介: 高若栋(2003—), 男,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兼任《社科前沿》《大湾区发展研究》及 Multidimensional Culture & Arts 编委, 主要从事当代诗学批评、中国文化思想史研究。

在五百余年前的同一片土地上,袁宏道通过《与江进之》指出了“世道既变,文亦因之”[2]的行文著诗之理念,在这份对社会变迁、时代变革等综合因素的更迭环境下开展对文学创作的调整和拓展的思想脉络之上,湍流众人与前贤展现出惊人的相似。而《叙小修诗》中记载的另一条源自万历时期箴言,即“独抒性灵,不拘格套”[3],同样直指向对“个人化书写生态”的推崇,在公安的城垣边,当代诗人与故去前辈之间,达成一条隐秘而不可割裂的继承链条,这既是明中晚期“公安派”留给诗坛的遗泽,也是当今“湍流诗群”对历史的回应与肩负。事实上,两者在诗学上的关联远不止于此,细窥诗册,一种古老的“先锋”精神和对“语言价值”变构的逻辑能够被析出。曾几何时,面临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王九思及李攀龙、王世贞等人所罗织的价值迷雾,文坛的整体气象与发展追求,在此辈权威文人与官僚士林的倡议中走向“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及“大历以后书勿读”[4]的偏颇境地,诗歌的发展跌入复古的单调路线,意象与语言必生于秦砖汉瓦、前唐阙顶,而对其后的文脉发展之结晶、历史变更之经验,乃至置于当下的最真实也是最为迫切的时代意识不加重视。海内鲜少有能挥袖而反抗者,直到“公安派”的崛起彻底形成对此潮流的逆向一击,立足公安的“三袁”及江盈科、陶望龄等诗人在16世纪明帝国文坛的一派作为,本质上已经高度契合后世所谓“先锋”的艺术精神。

作为20世纪后期中国诗坛极负盛名的理论家,同时也是“湍流诗群”所谓“诗友圈”或“顾问团”的重要成员,周伦佑曾指出“领先于时代的审美观念”[5]是“先锋”的重要特质。诚如是,在此概念之中去反溯“公安派”的若干主张,似乎能够看到其对“理”的解构,和关乎“民间”的重视,正是超出同期的审美追求。在诗人的笔端,从一元走向多元、由“个我”走向“他我”的标志清晰可见,这种近乎于自觉的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反思、对当下时代问题(或称之为“在场性”)的注重,与“湍流诗群”在21世纪曝露的部分内核,能够产生深刻的映射与共鸣。在晚明时代,“公安派”的影响逐步从地方走向全国。一代本土文人的故去,并未代表文学精神上休止符,其后同属荆湖地区的“竟陵派”对其由些许继承,但更为重要的是,公安文人的文思早已不受地域出身、乡梓关联所束缚,已然成为凭借价值感染力,散射更宽阔境地甚至是融入历史经验的力量。而“湍流诗群”从公安一城走向中国诗坛的发展印记也几近于此。

大概以2014年为分界点,在此之前的诗群,作为本土班底所建设的文学组织,其发展与波折主要聚集于公安地区之内,因其地缘属性,与“公安派”为代表的古典文论土壤之间存在着深厚联系,此阶段的诗群几乎可以视作“新公安派”的旗帜。作为荆州籍(包含公安县)出身的诗人野梵、黑丰、蓝冰及许晓青组成了诗群最核心的创始团队,对其整体理论构筑和刊物、书系等项目及衍生品的策划具备决定性影响。其中蓝冰拥有偏向于乡土色彩和民间写作的底色,虽在诗群发展过程中不断完成语言向内探索的迭变,但基础质地仍在潜意识中留存,这一点与更早期的公安地区诗人,如陈应松、邹平、魏宁等人存在共性。许晓青则是荆州作家协会体系出身的诗人,具备体制文人所一贯的持重稳定风格,因而在对现代性与历史信息的接续研究中,为诗群的理论版图丰盈化,做出了较为关键的贡献。野梵和黑丰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诗学出身,以及二者之间所发生的创作与理论意识上的龃龉或矛盾,则堪称诗群中前期最大的分水岭。前者深受“第三代”诗歌运动中以“非非主义”“整体主义”为代表的对语言解构或重释路径的影响,对1985年后的若干批评家关于诗学语言的判断或实验深有掌握。后者则有相对明显的学院气质,具有跨学科或整体联动性质的综合视阈,对以左翼倾向为代表的文化理论批评、社会乃至政治凝视存在兴趣,同时逐步走向德勒兹(gilles deleuze)式的“持续向内”的书写状态。因此,若扁平化看待,野梵与黑丰之路径矛盾,似乎也能概括为对诗歌文本探究的执着,和对整体文化层面的批评欲望之间的分歧。在《湍流》诗刊的第三期黑丰卸任联合主编职务并宣布脱离流派之前,几乎维持了三年的两人共掌枢机的阶段,在此期间,包括袁小平、仪桐、冬羽、龚道军等诗人相继加入。他们普遍具备两个特点,首先是公安或泛荆州籍贯出身,笔端近乎天然携带地理单元的烙印;其二,则是多数无前置的流派意识或参与经历,长期在地方刊物及圈层活动发表,并未深度参与任何一全国性的诗歌集群,也因此加入“湍流”之后,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即接受了“后语言主义”的改造,成为诗群中前期形态下的中坚力量。

处于“地方阶段”的诗群,将两个主要特点不断洗刷、延续了下去,在其后长期的扩张、变革发展中成为难以撼动的基因。其一,是对地缘及历史身份的重视,这种深刻的所谓“姿态(Cesture)”或“语境(Context)”的概念或可阐释为“有意味的形式,或形式化的内容”[6],处于江汉平原南端,抵近或交汇于洞庭湖平原的公安地区,河泽密布、大江穿流,其土地之肥沃和物产之稳定,在多数历史时期远胜于北方多地区,对比更西端的巴蜀腹地也不遑多让,如此环境所孕育的楚人介乎于神祇和知命、现实与虚妄之间的美学意识,以及流动于豁达和慎思、清孤及入世的思想传统,深刻浸染着每一代文林,而“湍流诗群”的成员也并不例外地有所承袭。如此的对历史信息和古典价值的注重,让野梵创造诸如“借重冒领的月光/我几乎摸到一丝嵇康的旧梦”[7]的诗句,成为

相当自然的事情。其二，是以野、黑、蓝、许为主的核心班底所展现的对世纪末诗歌浪潮的关注、流派意识的检索、语言价值的汲取，诗群彼时的众多“价值观”或“纲领”字缝之间似乎都能看到发祥于多处的“先锋”印记，譬如许晓青曾在论章中，将生命体验的追求描述为“刀锋上完成句法转换”[8]的境界，而这一“刀锋概念”与“非非主义”创始人周伦佑的代表作高度吻合，而其所提倡的“体制外写作”姿态及“反暴力修辞”[9]的创作路径，对湍流众人同样产生着影响。甚至时至今日，诗群理论架构中，仍然能够清晰看到对“非非化”语言意识的继承。

在2014年之后，诗群陆续开始吸纳来自全国的加盟成员，那些拥有着学院背景、精英底色、文化领域职业身份的诗人逐步成为蓬勃的力量，他们中的部分人携带着浓烈的后现代主义或各种先锋思想，助推着诗群从始于公安一隅、活跃于荆湖一地的文学沙龙，扩变为在整个中国大陆地区拥有影响力和关联性的诗歌流派，为其后的诗坛交际、诗学活动铺垫了强力基础。来自上海、深圳、聊城、南京等多地的诗人，有着不同的地域出身、文化背景，共同相聚，充分印证了尤涅斯库(Eugene Ionesco)所说的“就是自由”[10]的“先锋派”的定义。诸如吴长青为代表的具备文艺研究功底成员，由于熟稔1980年代以来中国诗坛（主要是知识分子写作）的思想路径与文本剖析，得以对诗群的理论版图进一步丰盈和修正提供助力。冰马为代表的诗人，具备1990年代“地下写作”的重要经历，属于活动于江苏等地民间诗坛的先锋代表。而与此同时，默雷、老非等诗人，则是较为典型的北方民间先锋诗歌的创作者。另有微紫、陈晓岚等，为诗群提供了较为都市化的创作经验，及女性视角的先锋意识、精神异化的价值视阈。在不断凝合、汲取成员的过程中，具备编辑、批评家、诗人三重角色的梁雪波的加入，或可视之为一个关键点。

二：舶来或跨越：先锋文化的氏族志

关于“先锋”概念，毫无疑问“湍流诗群”是伫立于前人肩头观望并试图改变世界的后继者，而至于彻底揭开“前人”的身世，则需要层层追溯，甚至跨越语种、国境、学科才能抵达最深邃的本源。这一概念在中国漫长的发展过程内并未产生意涵上的新突破，尤其是对文化与文学层面的介入几乎不见踪影，中国的诗家与批评学者似乎如司空图一般更偏爱将诗歌领域所谓的对现世环境的突破、语言或意识的超出、理论界限的探索或文本深层的追逐，用更抽象化或本属于文化词汇内的语言概括，譬如“超以象外，得其环中”[14]的作品风格往往被视之为“雄浑”气质内的一种体现。东方语境下的“先锋”完整或以超越性的姿态进入文化及文学场域的时间应该锚定在20世纪上半叶，彼时西方在19世纪后率先完成了对这一词意的突破与扩变，继而伴随知识及战争的多向“全球化”浪潮，与中土的古老词语完成赋能、合流或新生。

当下英文场域内惯用的“Avant Garde”一词，其本身出自法语，属于经典的融创词汇，由象征“前方”或“前”的“Avant”一词，与代表“守卫”或“卫”的“Garde”一词拼凑而成，因此在其后漫长的传播岁月中，“先锋”的概念似乎也可以称之为“前卫”。这一代称译入汉语后，曾在中国社会一时风靡。追溯欧陆的“先锋”概念，其在18世纪及之前多数情况下，也与东方类似，属于较为普遍的军事术语，其代表的“先头部队”的原意，直到1852年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在《关于文艺的意见》中首次将其挪用，提出“以先锋的姿态”[15]形容艺术家之时，这个古老的法语词汇，才开始对文化领域产生介入，其意涵也随之扩充。近乎于同期，在社会哲学领域，傅立叶(Franç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及蕾德汶(Robert Owen)等人在阐释“超前性社会制度”的过程中，亦将“先锋”的概念引入其中，用以暗指对传统或现状的叛逆性特质，这份包含政治色彩的“先锋”意蕴，后来被不断延续和扩张，最终成为在文学艺术界众口纷纭、热衷讨论的特质，活跃于当代的“湍流诗群”的理论体系中，便能够充分体现此类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先锋”元素。库贝尔(Gustave Courbet)是首个将“先锋”意识付诸实践的艺术创作者，在其“与主流文化对抗的创作倾向”[16]的精神之中，基本奠定了绘画等领域的一条不断衍生的流派路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运动”的性质与“先锋”的概念得到深度捆绑，自此所谓“先锋”的作家、诗人、艺术家等，似乎都拥有着另一层形影不离的特征，即是热衷于号召、结社、宣言、集体亮相的活动模式。

正如洪治纲“只要文学活着，先锋就不会消亡”[17]的论断，纵观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几乎无处不在应验着这一点。以今视昔，或可将中国近现代的“先锋诗歌”进程划分为粗略的三个阶段，以1900年代至1930年代之间视之为第一部分，主要以晚清文学的潜在思想、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的激烈意识、新诗肇始后的诸流派探索争鸣为主要内容。以1978年至1980年代末视之为第二阶段，其中包含在思想、经济、社会形态等诸多领域的改革开放环境下，中国诗学与国际生态、域外价值的重新接轨和交流，大量吸纳甚至效仿其“先锋”姿态。以1990年代及其之后视之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中年写作”逐步涌现，大量具备代表性的

地下写作开始消散,有影响力的民间诗人或失去才华和意识,或在资本生活中被收编,而“湍流诗群”的生命自此刻开启。解读三个阶段,其本质正是对中国从“先锋文化”到“先锋文学”及“先锋诗歌”的递进式研究,也是对“先锋诗歌”这一概念的溯源,而最为重要则是,对“先锋文人”的姿态和价值观,做出尽量精确的判定。

事实上,在文化与文学领域,中国的“先锋”概念从发轫时期开始,即具备强大的破坏或激烈的价值,封建末期那种“被压抑的现代性(repressed modernities)”[18]在进入民国相对宽松和开放的文化环境之后,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被转换为爆炸式的、大变革式的思想风潮,在五四一代新诗的理论中,能够窥见对语言变革、形式颠覆的深刻倾向,而抬升到五四岁月的文化立场时,更为扩大化的、夸张的对整体文化价值、政治理念甚至是体制的冲击,成为近乎于家常便饭的事情。这似乎也奠定了百年来中国的“先锋诗人”所不断传递或暗自流淌的锋利的文化基因,陈思和将其概括为“一种以激进的文学态度,使文学与社会发生裂变、发生解构的撞击”[19]的逻辑。直到1930年代之前,中国诗坛的整体环境都处于各向探索和互相搀扶、质疑、攻讦及合作的复杂状态,或有朝向白话化一路狂飙的诗人,力主持续解构汉语的严肃性和经典价值,或有如“学衡”诸君开展对古典根脉的复苏与遴选,另有“新格律”及“象征”等主张的诗人集群若干,这一切延续到抗战时期方才陆续偃旗。在20世纪上半叶的最后20年间,中国诗坛多元的“先锋”姿态不断遭受事实上的降调或瓦解,待到改革开放之后的1980年代,方才在上述所言的“第二阶段”内复苏,甚至汹涌生长。

对“湍流诗群”而言,那批20世末的文学发展、文化转徙的时代经验,是几乎奠定当代中国“先锋”流派理论体系的重要养分。时隔近数十年,在诗群众人的诗歌文本或批判观念中,似乎仍然能参透曾经思想界所热衷探讨或屏息的特殊话题,能窥见“今天派”时期的若干元素,能抉发出诸多“第三代”时期喧嚣一时或落寞沉寂的特质,能清晰看到对“知识分子”与“民间立场”的论战遗骸中所收殓的精神遗骸。诗群的“先锋”意识,非止于对现状的审视和深思,另有前置的,对于文坛前人“生存”选择、姿态、去向和代价的思考。正如李泽厚在1986所提出的“启蒙”与“救亡”这两项“相互纠缠、相互形成辩证关系的重要命题”[20],直到今日依然可以用来刺破“湍流诗群”的一项底层逻辑,即穿透诗群所呈现的神秘的“应和”或“漩涡”状的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环境的观点密集阵,能够看见一种始终周旋或挣扎的矛盾,作为理论体系所不断阐释的难以消弭的问题。诗群力求独立精神,保持对权力的警惕、资本的防范、尊严的拱卫和价值的探索,但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权力的来源和价值的走向、汉语生长或畸变所依赖的客观时代背景,以及几乎所有中国文人都不可逃避的受到“匹夫有责”的笼罩。诗群在事实上受制于诸多因素,也难以摆脱对其的注意乃至主动介入,诚如李泽厚所言,那份“启蒙”概念内包裹着中国知识分子对开启民智、调和分歧、有序发展的一面主张,而“救亡”则意味着“革命”的路径,往往走向相对激烈、暴力的运动方式。而诗群的“先锋”意识正是介乎于对秩序的调和、沉着的处理,与激烈的博弈和运动之中的状态,诗群高举的反对“语言污染”“犬儒”等旗帜之下,是一颗对时代、政治、热点关注的内心,看似在诗坛的边缘地带自居一室,实则难以抑制对“中心”的瞻望或凝视。

不在少数的“第三代”诗人不断尝试解构权威、消弭不可言说之物事,开展对社会庸常关系、日常生活情状的书写的初衷,在世纪之交逐步开始发生偏移,不断拔升对口语的尊崇,以至于修辞的出现如同一种恶疾,中国传统诗学所讲究的雕琢之美,也被一概而论地批作无足轻重甚至具备反噬效果的不必要之物。在“湍流诗群”的文本思想中,即能够看到对这一问题近乎彻底的不认同,正如袁小平的长诗《词与命的个人行走》一般,通过对《诗经》等古典文化及历史信息的追索和化用,不断往返于古今诗境之间,直到打通为一体,而这样的对古典诗歌美学的处置,恰是海量的口语诗人所主观上摒弃、客观丧不可想象也无力做到的。在语言技法上,一种“壮夫不弃雕虫之功”[21]的特质,也超越了粗糙、泛化的庸碌口占。在1990年代后,其中一部所谓的“先锋诗人”陆续走上彻底的庸俗化泛滥的境地,开始将“非诗”的概念模糊化,对诗歌的理论进行破坏性批判,其为本世纪以来结合互联网诗坛而产生的诸种文字乱象展开媾和。所谓“以语言和观念为导向的跨平面设计的文本实验”[22]被畸变为对文学严肃性的瓦解、对汉诗道统的质疑。因此“湍流诗群”的发展,非止是对“第三代”诸多优秀贡献的继承和延伸,更为重要的是重新洗净、翻新“先锋”的徽标,使其重回具备壮肃意义、历史价值和哲学内涵的状态。重拾并拱卫汉语的尊严和价值,维持屹立的姿态。

参考文献:

- [1] 野梵. 僭越的语言在汉诗多变的远景中出场[J]. 湍流, 2024(9): 417-417.
- [2] 袁宏道, 著. 钱伯城, 笺校. 袁宏道集笺校: 卷十一《解脱集之四·江进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515-515.
- [3] 王小梅. 王学左派对袁宏道散文创作的影响[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2): 58-58.

- [4] 薛泉. 李攀龙的结盟意识与文学权力复归郎署[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1): 56 – 56.
- [5] 周伦佑. 当代先锋诗歌流派谱系考察——兼论 20 世纪 80 年代诗歌运动的流派学意义[J]. 文艺争鸣, 2018(3): 122 – 122.
- [6] 吴晓东. 临水的纳蕤思: 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母题[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37 – 137.
- [7] 野梵. 野梵的诗 (六首) [J]. 长江丛刊, 2018(12): 120 – 120.
- [8] 许晓青. 独立苍茫自吟诗——从公安派到新公安派, 从灵性说到后语言主义[J]. 湍流, 2024(9): 337 – 337.
- [9] 林贤治. 论周伦佑[J]. 当代作家评论, 2010(2): 162 – 162.
- [10] 陈吉德. 新世纪中国先锋戏剧的民间精神[J]. 戏剧艺术, 2011(1): 56 – 56.
- [11] 杨四平. 元诗观念影响下中国当代先锋诗写作理论之省思[J]. 中国比较文学, 2025(3): 92 – 92.
- [12] 梁雪波. 修灯的人[M]. 后语言主义诗学基地, 2023: 111 – 111.
- [13] 高若栋, 尚仲敏. 先锋写作中古典意识的杂糅或复归——关于梁雪波诗歌思想的研究[J]. 燕赵中文学刊, 2026(1): 124 – 124.
- [14] 陈友康. 司空图著作权被质疑后《诗品》的价值和地位问题——以《“二十四诗品”诗歌美学》为中心进行讨论[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4): 146 – 146.
- [15] 乔国强. 论波焦利的先锋理论[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2): 156 – 156.
- [16] 王蕾, 段运冬. 认知转向与话语创新——“十月主义”的先锋影像观及其影响[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22(10): 35 – 35.
- [17] 洪治纲. 先锋文学聚焦之十八——永远的先锋[J]. 小说评论, 2022(6): 16 – 16.
- [18] 王德威. 晚清小说新论: 被压抑的现代性[M]. 台北: 麦田出版社, 2003: 15 – 15.
- [19] 陈思和. 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6): 2 – 2.
- [20] 刘悦笛. “启蒙与救亡”的变奏: 孰是孰非[J]. 探索与争鸣, 2009(10): 36 – 36.
- [21] 胡亮. 诗珠[M].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6: 45 – 45.
- [22] 朱其. 20 世纪先锋艺术和诗歌中文字主义的视觉实验[J]. 装饰, 2025(7): 106 – 106.

From "avant garde" to "anti classicalization"

——on the thoughts of poetry group in turbulence

Gao Ruodong¹

1.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As a group of poets with both local cultural attributes and the overall sense of the times, the development of turbulence has in fact formed a rare genre art history in Chinese poetry in the past decad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the literati represented by "intellectual writing" have entered the so-called "middle-aged" stage, and a number of "folk poetry" figures have been incorporated by the system and colleges, or have gradually lost the sense of exploration in commercial activities. The "turbulent poetry group" has become a highly independent literary force close to loneliness. A close look at the context of its creation and evolution, the value construction of its theory and spirit, is essentially the inheritance and expansion of the concept of "pioneer", and the resista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lassic" wave. The poetry group thought reveals the gaze and translation of history and destiny, the calling and defending posture of poetry value. It is gradually or inevitably causing the vibr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poetry.

Keywords: Contemporary poetics; Turbulence poetry journal; Avant garde thoughts; Leapfrogging

二十四节气中的生态文明智慧及其当代价值

张涵¹, 刘丽淼¹

(1. 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农耕文明进程中创造出的独特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 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文明智慧。从发展脉络看, 二十四节气经历了从观象授时到制度化时间体系的演进, 其形成本身就是先民认识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实践。从生态智慧的内涵看, 二十四节气以“天人合一”为哲学根基, 以阴阳流转的平衡观念为认知框架, 以取法物候的生态知识为实践依据, 以应时安排的节律生活为行为准则, 构建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完整生态文化系统。在当代, 二十四节气所蕴含的生态文明智慧依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它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历史参照与本土方案, 为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时间指引与哲学遵循, 为当代生活方式的重建提供了自然节律与文化底蕴, 为讲好中国生态故事、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文化载体与话语资源。本文旨在系统发掘二十四节气中的生态文明智慧, 阐释其当代价值, 为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支撑。

关键词: 二十四节气; 生态文明; 天人合一; 生态智慧; 可持续发展

DOI: doi.org/10.70693/202608015780

一、绪论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 如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生态智慧, 成为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学术课题。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华文明独特的时空坐标系, 不仅承载着农耕文明的物候密码, 更凝聚着中国古人对天人关系的深邃思考。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时间制度、知识体系及社会实践, 作为自然时间, 其取法自然的时间命名和择取物候的时间标识, 铺陈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 作为文化时间, 其“以自然为根”的文化特质, 形塑着热爱自然生活、顺乎自然流变、崇敬自然万物、尊重自然规律的文化品格。然而, 长期以来学界对二十四节气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天文历法价值或民俗文化层面, 对其所蕴含的生态文明智慧的系统发掘尚有拓展空间。本文旨在系统阐释二十四节气中的生态文明智慧及其当代价值, 为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资源。

(二) 研究综述

国内外学界关于二十四节气与生态文明相关的研究可从以下维度加以梳理。

其一, 二十四节气生态哲学思想的研究。学者们从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等哲学范畴出发, 探讨二十四节气所蕴含的宇宙观与自然观。春分、清明、夏至三个关键节气体现出完整的生态智慧体系——春分是对时空平衡的精准把握, 催生出“阴阳和合”的生态平衡观; 清明时节的“气清景明”指向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 而夏至“阳极阴生”的物候转折揭示出能量转换的临界法则。

其二, 二十四节气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学者们关注二十四节气作为“农业气候历”对传统农业生产的指导作用, 及其对当代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的启示意义。二十四节气逐渐完善并于战国时期完整形成, 体现了古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中国人根据节气安排春耕、夏耘、秋收、冬储等农事活动, 确保了农业生产的时序性与高效性。

其三, 二十四节气生态智慧当代应用的研究。部分学者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角度

作者简介: 张涵(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与数字艺术设计。

刘丽淼(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与数字艺术设计。

探讨二十四节气生态智慧的当代转化。二十四节气文化作为农耕文明的时间密码，其蕴含的“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顺天应时”的生产理念、“社群共契”的文化认同，能够为乡村文化振兴、产业发展、生态建设注入新动能。

然而，既有研究多从单一学科出发，对二十四节气生态文明智慧的整体性、系统性阐释仍有拓展空间，特别是如何将二十四节气的生态哲学思想与其当代应用价值贯通起来，仍是一个值得深化的学术课题。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系统梳理二十四节气相关的古代文献与当代研究成果；运用哲学分析法，深入解析二十四节气生态智慧的思想内核；采取案例分析法，以具体节气为例阐释生态智慧的多维呈现。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追溯二十四节气的发展脉络，第三章系统阐释其生态文明智慧的内涵，第四章探讨其当代价值，第五章为结语。

二、从观象授时到生态实践：二十四节气的发展脉络

（一）天文观测的起源：立表测影与节气划分的科学基础

二十四节气的发端与中国古人观测天象的活动密不可分。中国先民经过长期观察，发现日影长度在一年中呈现出特定的变化规律，于是开始尝试运用“立竿见影”的原理来判断四时更迭。考古发现为这一历史进程提供了坚实的物证。陶寺遗址距今约 4300 年，其古观象台通过 13 根夯土柱形成 12 道观测缝，先民可借此观测日出方位、捕捉星辰轨迹，精准划分 20 个节令，被认为是传统二十四节气的主要源头。陶寺遗址出土的圭尺和木立表合称“圭表”，木立表直立于地面，圭尺是水平放置的刻度，用于测量太阳影长。登封告成镇周公测景台见证了古人圭表测影定节气的科学实践。

文字学的研究同样印证了这一历史。甲骨文中的“阜”“甲”“中”等字的本意都取自“立表测影”，并且与时间相关的甲骨文大多带有“日”字。通常认为，至迟在殷商时期，中国古人已经能够通过圭表测日的方法来确定夏至和冬至。二十四节气的形成源于古人长期严谨的科学观测，从陶寺遗址古观象台到汉代候气法尝试，印证了这套体系的实践根基。

（二）从四时八节到二十四节气：生态认知的逐步深化

二十四节气的形成经历了从两至、两分到四时八节，再到二十四个节气逐步完善的过程。根据《尚书·尧典》《周礼·春官·大司农》的记载，至迟在西周时期，先人就已经测定了四个节气——夏至、冬至、春分、秋分。春秋中叶，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个节气被确定下来。战国时期，二十四节气基本成形。秦汉时期，二十四节气完全确立，刘安所著《淮南子》中记述的二十四节气名称和顺序延续至今。

这一发展过程本身即是一部生态认知不断深化的历史。古人不仅需要认识东、西、南、北四方，更要认识东北、西北、东南和西南四维，空间知识才算完整。在八方的空间背景下规划时间，除与四正方向对应的分至四气之外，还要建立与四维对应的时间体系。这种时空一体化的认知模式，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系统整体性的深刻理解——时间不是孤立的线性刻度，而是与空间、气候、物候紧密交织的生态整体。

（三）知识体系的生态化：从时间标尺到生态文化系统

二十四节气从单纯的时间标尺发展成为综合性的知识体系及其实践，经历了一个由简约至丰富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二十四节气逐渐与天象、历法、气候、物候、农事、音律等方面产生关联，进而构筑起一个生产与生活、农事与民俗、时间与文化相结合的完整体系。

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充分考虑了季节、气候、物候等自然现象的变化，并综合了天象、气象与物象。元代农学家王祯《授时图》由内而外共有八层：北斗七星、天干、地支、四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逐月农事。这一结构清晰地展现了二十四节气在古人知识体系中的核心位置——它既是天文观测的成果，也是气候变化的刻度，更是农事安排的依据。二十四节气作为“简明物候历”，其命名直接源于特定时节的物候特征，集中反映气候的周年周期性变化。正是在传承和演变的过程中，二十四节气逐步从时间标尺演化为承载着丰富生态智慧的文化系统。

三、取法自然与和谐共生：二十四节气的生态文明智慧

（一）天人合一：生态智慧的哲学根基

二十四节气所体现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其生态文明智慧最核心的哲学根基。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华文明独特的时空坐标系，不仅承载着农耕文明的物候密码，更凝聚着中国古人对天人关系的深邃思考。二十四节气起源于农耕实践，它不仅是农耕社会的时间坐标，更是天人合一智慧的集中体现，凝聚了中国人顺应自然、敬畏天地

的深沉哲思。

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一方面强调天地自然有其运行规律,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将人与自然定位在一种积极的和谐共生的关系中,既强调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又强调合理利用自然。二十四节气正是以“天人合一”为内核的文化系统,既包括历法体系和农耕经验,也包括民风民俗和民间艺术,其影响已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古人基于整体的宇宙观,认识到季节流转与气候变化、植物生长、动物生息和人们生活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这种“因时而动、顺势而为”的时令哲学立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认知,体现着中国人尊重自然规律和生命节律的哲学智慧。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人时间观念的核心组成部分,跨越两千余年的历史长河,早已融入民族集体的文化记忆与日常生活实践。

(二) 阴阳流转与生态平衡:生态智慧的认知框架

二十四节气建构了一个四季轮转、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时间系统,形成了一个变化的“圆”。各个节气的交替推动着阴阳的流转,这种阴阳流转的观念构成了中国人理解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认知框架。

春分是最具代表性的例证。“春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春分太阳直射赤道,昼夜平分,寒暑均衡,此时阴阳之气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春分时节,万事万物运行需维持动态平衡,气候的冷暖交替、能量的输入与消耗、物种的繁衍与消亡,皆需遵循阴阳平衡的原则,追求和谐稳定的发展状态。因此,春分时节在阴阳和合协调运作下产生的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是中国古人将自然现象转化为哲学符号的独特智慧。

夏至同样体现了深刻的生态智慧。夏至之日阳气达到极盛,但“万物负阴而抱阳”,阳极之时,背阴的湿地中反而有半夏等阴性植物开始萌发生长。夏至“阳极阴生”的物候转折,揭示出能量转换的临界法则。阴阳交替、物极必反的朴素辩证法,在节气的流转中得到最为生动的呈现,它告诉人们生态系统中的任何要素都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极端之后必然走向转化。

清明作为二十四节气中唯一兼具节令与节日的双重文化身份,其“气清景明”的物候特征背后蕴含着中国古代独特的生态修复智慧。清明时节,北半球进入气温持续回升阶段,寒冬的余威已逐渐消散,降水增多,空气变得格外清新,植被进入快速生长阶段。“清明风至”季风系统推动大气环流实现污染物扩散的自我净化和修复机制,此时“天地俱生,万物以荣”,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在清明时节加速进行,促进了生态系统的新陈代谢,展现出生态系统内在的修复禀赋。这种周期性自愈修复机制被中国古代农学家提炼为“时禁”理论。

(三) 取法物候与应时安排:生态智慧的实践智慧

二十四节气不仅是一套认知框架,更是一套指导实践的生态智慧体系。古人将二十四节气中的每个节气划分为三候,“候应”多描述动植物和大自然的变化,这种取法物候的认知方式,体现了对生态系统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尊重。

在农业生产方面,二十四节气作为一套基于长期观测的气候时间参考体系,其蕴含的物候规律认知为理解气候挑战提供了历史视角。古人总结的“惊蛰闻雷米似泥”“霜降杀百草”等谚语,本质是基于经验的生态预警机制,直观反映气候、物候与农业生产、生态环境的内在联系。“清明断雪,谷雨断霜”为农业规避冻害提供指引,“小满不满,麦有一险”提醒防范干热风灾害。这种顺应自然节律的生产方式,既有助于降低极端天气影响,又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实现生态保护与农业生产双赢。

在水资源管理方面,二十四节气同样蕴含着严密的水事活动节律——何时观凌、何时疏浚、何时蓄水、何时放流,皆循节气而动。这种因时制宜的水资源管理智慧,体现了古人将人类活动纳入自然能量平衡体系的生态自觉。

在民俗实践方面,春分“竖蛋”习俗中鸡蛋椭圆造型暗合“天圆地方”的宇宙认知,象征着阴阳二气在春分时刻的精确平衡。北京日坛现存的明代祭日遗址,其建筑群的方位布局精准对应春分日出方位,主祭者穿赤色祭服,手持苍璧,通过色彩与礼器的阴阳符号系统,实现“天人交感”的象征性沟通。这种仪式化的生态实践,将人类活动纳入自然能量平衡体系。

(四) 生态伦理与文化认同:生态智慧的价值维度

二十四节气不仅是一套知识体系,更是一套蕴含着深层生态伦理的文化系统。围绕二十四节气形成的习俗经过千百年的锤炼,承载着中国人敬重自然、睦邻友群的精神文化内核。

二十四节气所体现的“顺时”原则,不仅是时间知识、物候知识,更可以转化为道德知识,为人们提供修养心性、提高德性的规范性建议。节气词以其高度概括性与文化渗透性,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顺应天时、敬畏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理念。

二十四节气文化浓缩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农耕文明的精华,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哲学和文化内涵,彰显中国文化天地人和的生态智慧,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识。作为“活态遗产”,二十四节气以自然节律为核心、农耕实践为基础、民俗文化为外延,形成贯穿生产生活与精神信仰的完整体系。这种“生活化传承”模式,融入饮食、服饰、节庆、农事等日常,适配时代变迁,使生态智慧得以在代际之间持续传递。

四、从传统到现代：二十四节气生态智慧的当代价值

（一）应对气候变化的古老参照：生态预警的历史智慧

在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背景下，二十四节气作为一套基于长期观测的气候时间参考体系，其蕴含的物候规律认知为理解气候挑战提供了历史视角。

二十四节气所表达的尊重客观规律、顺应自然规律的核心思想，对于应对气候变化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现代气象数据分析证实，在气候相对稳定时期，二十四节气的物候规律在特定区域仍具有参考精度。河南作为粮食主产区，农民至今仍参考这份传统智慧安排农事。这种顺应自然节律的生产方式，有助于降低极端天气影响，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实现生态保护与农业生产双赢。

与此同时，气候变化也导致传统二十四节气与农业生产节律出现错位，形成“节气时差”现象。这一现实提醒我们，二十四节气的生态智慧需要在尊重其核心原理的基础上，结合当代气候变化的新情况加以创造性运用。二十四节气作为认识自然、顺应自然的智慧结晶，其“观象授时”的方法论——即持续观察、及时调整——本身即是应对变化的最重要思想资源。

（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时间指针：生态农业的哲学遵循

二十四节气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农业指导价值，尤其在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其蕴含的生态智慧提供了深厚的哲学遵循。

千百年来，二十四节气始终是农民普遍使用的“农业气候历”。农民根据节气安排农事活动，涉及耕地播种、田间管理、粮食收储等各环节。农民常言“种田种地，全凭节气”“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立夏快锄苗，小满望麦黄”，这些谚语充分诠释了节气对农业生产活动的时间规定性。二十四节气所表达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循环发展的科学理念与哲学思想，与当前中国农业正在大力推进的绿色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一脉相承。

春分节气揭示的阴阳和合中的生态平衡观，本质是一种“执中致和”的生存智慧。现代生态农业提倡的“间作套种”模式是对春分“因时制宜”的耕作传统的科学化延续，现今推行的轮作制度、立体养殖、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等均是对春分阴阳和合中生态平衡观的沿用或借鉴。二十四节气文化作为农耕文明的时间密码，其蕴含的“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顺天应时”的生产理念，能够为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生态建设注入新动能。

（三）当代生活方式的重建：自然节律的文化回归

在人类社会正在迈向工业化、城市化的今天，有些人“生活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漠视自然已经太久了”。二十四节气作为认识自然的时间尺度，为当代人重新建立与自然的联结提供了重要路径。

二十四节气代表着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其蕴含的“尊重自然时间、尊重生命节律”的传统文化智慧，具有生活节奏的提示与生活方式调节的指导意义。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人时间观念的核心组成部分，从古至今，节气文化温润和滋养着人们的生活，并在传承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在当代生活中，二十四节气对健康养生、饮食调理、运动健身等方面持续发挥着指导作用。节气所蕴含的顺应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与当代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对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有着深刻的启迪。在教育领域，二十四节气更是贯穿大中小学各阶段教学的宝贵素材，让学生在学习农业科学知识的同时，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

（四）讲好中国生态故事：文明互鉴的文化载体

二十四节气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产物，更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与“顺时而为”的文化伦理。其独特的文化辨识度与亲和力，使之成为讲好中国生态故事、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文化载体。

二十四节气的国际影响日渐显著。它的科学性和普适性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参鉴意义，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二十四节气跨越文明界限，成为亚洲多国共享的时间知识体系，在马来西亚、日本、越南等国家以不同形式存在和发展。二十四节气早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便传入朝鲜半岛等东亚地区。

二十四节气的核心农耕理念是“不违农时”“顺天应时”，背后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二十四节气是一宗兼具自然与人文、包括理念与实践的重大文化遗产，深入挖掘弘扬其蕴含的时间观与生态文明智慧，不仅表征着其在激发自觉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存在的巨大潜能，也昭示着其在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具有深远意义。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二十四节气所蕴含的尊重自然、顺应规律、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能够为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遵循。

五、结语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农耕文明进程中创造出的独特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文明智慧。从发展脉络看，二十四节气经历了从观象授时到制度化时间体系的演进，其形成本身就是先民认识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实践。从生态智慧的内涵看，二十四节气以“天人合一”为哲学根基——它不是人为强加于自然的规则，而是对自然内在规律的发现与顺应；以阴阳流转的平衡观念为认知框架——春分的阴阳和合、夏至的阳极阴生、清明的生态修复，共同构成了理解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完整视角；以取法物候的生态知识为实

践依据——七十二候对动植物和自然变化的精细描述，体现了对生态系统的深入观察与尊重；以应时安排的节律生活为行为准则——从农事活动到日常生活、从资源管理到民俗仪式，皆循节气而动。

在当代，二十四节气所蕴含的生态文明智慧依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它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历史参照与本土方案，为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时间指引与哲学遵循，为当代生活方式的重建提供了自然节律与文化底蕴，为讲好中国生态故事、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文化载体与话语资源。二十四节气不仅是中国人的文明成果，更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挖掘二十四节气中的生态文明智慧，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于建设生态文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战略价值。

参考文献：

- [1] 隋斌, 张建军. 二十四节气的内涵、价值及传承发展[J]. 中国农史, 2020, 39(06): 111-117.
- [2] 冯时. 二十四节气的文化哲学与时代意蕴[J]. 人民论坛, 2024(01): 102-106.
- [3] 刘晓峰. 论二十四节气的命名[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02): 93-101.
- [4] 董学玉, 肖克之. 二十四节气[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2.
- [5] 中国农业博物馆.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二十四节气” 科普丛书[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9.
- [6] 萧放. 二十四节气与民俗[J]. 文化遗产, 2017(01): 1-7.
- [7] 王加华. 二十四节气: 中国人的时间刻度[J]. 民俗研究, 2017(06): 5-12.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sdom in the Twenty-Four Solar Terms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Zhang Han¹, Liu Li Miao¹

1. School of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China

Abstract: The Twenty-Four Solar Terms represent a unique system of temporal knowledge and practice created by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out thousands of years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hey embody rich and profound ecological wisdo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Twenty-Four Solar Terms evolved from the observation of celestial phenomena and the regulation of agricultural time into an institutionalized temporal system. Their formation itself reflects the ecological practices of ancient Chinese people in understanding, respecting, and adapting to nature. In terms of ecological wisdom, the Twenty-Four Solar Terms are rooted in the philosophical concept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Tian Ren He Yi), guided by the cognitive framework of balance and circulation between yin and yang, supported by ecological knowledge derived from phenological observations, and expressed through a lifestyle rhythm based on timely adaptation. Together, these elements have constructed a comprehensive ecological cultural system that emphasizes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sdom embedded in the Twenty-Four Solar Terms continues to demonstrate significant value. It provides historical references and indigenous approaches for addressing global climate change, offers temporal guidance and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for promoting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ntributes natural rhythms and cultural foundations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lifestyles, and serves as a cultural carrier and discourse resource for telling China’s ecological stories and promoting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This paper aims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sdom contained in the Twenty-Four Solar Terms, clarify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and provide intellectual support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words: Twenty-Four Solar Term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Ecological Wisdo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面向Z世代的“福禄寿喜财”吉祥文化价值重释与传播路径研究

刘丽淼¹, 张 涵¹

(1. 黑龙江大学 艺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福禄寿喜财”是中国传统吉祥文化中具有广泛社会认知的复合性表达,集中承载了民众对生活圆满、社会发展、生命康宁、情感愉悦与物质保障的基本期待。在数字媒介深度嵌入青年生活的背景下,传统吉祥文化获得了新的传播空间,同时也出现符号表层化、价值功利化、历史语境弱化和传播方式同质化等问题。本文以Z世代的媒介经验与文化参与方式为切入点,运用文献研究、概念分析和跨学科综合研究方法,对“福禄寿喜财”的文化形成、价值结构、符号机制和社会功能进行梳理,进而分析其面向青年群体传播时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研究认为,“福禄寿喜财”并非自古固定不变的五项并列范畴,而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吉祥观念在民俗生活和图像传播中逐步汇合形成的现代复合表达;其当代传承应从单一的趋吉求利叙事转向对美好生活、个人成长、身心健康、社会关系和合理富足的综合阐释。面向Z世代的传播不宜把代际标签绝对化,而应把握其移动化、视觉化、互动化和社群化的媒介环境,通过核心价值重释、生活情境重建、分层内容传播、参与式文化实践、文化边界治理和效果评价机制,形成兼具历史连续性、现实解释力与公共文化价值的传承体系。本文旨在为传统吉祥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青年文化认同建构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传播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Z世代; 福禄寿喜财; 吉祥文化; 文化认同; 传播路径

DOI: doi.org/10.70693/202608059849

一、绪论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吉祥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日常生活的重要方式。它借助语言、图像、器物和仪式,将人们对平安、团聚与富足的愿望转化为文化形式,广泛存在于节令、礼仪和民间艺术之中,具有生活性与情感性。周星指出,传统吉祥图案不仅是装饰形式,也是乡土社会建构生活意义的民俗资料。“福禄寿喜财”既是文化符号,也是民众理解幸福生活的通俗表达。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组合并非自古固定。《尚书·洪范》中的“五福”为寿、富、康宁、攸好德和考终命,与现代组合不同。今天的“福禄寿喜财”是民间信仰和民俗观念长期汇合的结果。数字平台使青年参与文化意义再生产,但网络传播容易将其简化为福字、元宝、祥云等重复符号,遮蔽其伦理内涵。因此,应在尊重文化源流的基础上重释其当代价值,构建贴近Z世代生活的传播机制,避免符号堆砌与代际刻板化。

(二) 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传统吉祥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民俗学、艺术史和文化传播三个方向。民俗学研究强调吉祥观念的社会基础、仪式语境与民众幸福观。周星从民俗艺术遗产角度分析吉祥图案的传承性、意义结构和生活功能,指出文字图案化、谐音双关、象征比拟与吉祥语组合构成其基本表达“语法”。王海霞以吉祥年画为对象,梳理福、禄、寿、喜观念的生命意蕴与民间认同,认为相关观念长期植根于社会生活,并借助木版年画等媒介广泛传播。沈利华则从传统价值取向出发,讨论“福禄寿”三星所体现的幸福、功名与生命追求。

艺术史与图像研究主要关注吉祥符号的造型机制和视觉谱系。王树村归纳历代吉祥图案的题材与构成,杨广银从汉语谐音角度分析传统造型中“以音通意”的表达方式。相关研究表明,吉祥文化并非图

作者简介: 刘丽淼(2002—),女,硕士,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与数字艺术设计;

张 涵(2002—),女,硕士,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与数字艺术设计。

通讯作者: 刘丽淼

形与寓意的自然对应，而是由语言习惯、历史叙事、宗教信仰和民俗情境共同编码的符号体系。这为理解蝙蝠与“福”；鹿与“禄”；桃、鹤与“寿”；喜鹊与“喜”等传统关联提供了依据，也说明传统图像的阐释不能脱离具体文化语境。

近年来，青年文化与数字传播研究开始关注Z世代参与传统文化建构的方式。宋辰婷、宋祎祎指出，Z世代在传统文化网络传播中兼具接受者、解释者和传播者角色。国外研究多从技术环境、消费行为与社会交往讨论Generation Z。Turner强调技术连接对其行为方式的影响，Priporas等关注其对互动性、便利性和自主体验的期待，Djafarova和Bowes分析社交媒体对青年消费决策的作用。Jenkins的参与式文化与融合文化理论，则为理解用户生产内容、跨媒介传播和社群协商提供了理论框架。

部分Z世代研究容易将媒介偏好和价值观概括为一致的代际特征，忽视群体内部差异。传统吉祥文化传播研究则较重视视觉更新、市场开发与平台流量，对价值重释、文化边界、公共性及传播效果评价关注不足。本文尝试在历史辨析、代际反思与传播机制之间建立完整的理论联系。

（三）研究方法与伦文框架

本文主要采用三种方法。第一，文献研究法。通过民俗学、艺术史、传播学和青年研究成果，梳理“福禄寿喜财”的历史来源、符号机制和社会功能。第二，概念分析法。辨析“五福”“福禄寿三星”“吉祥图案”“Z世代”等概念的适用边界，避免把现代组合追溯为单一而固定的古代传统。第三，跨学科综合研究法。将民俗生活、符号传播、文化认同和数字媒介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讨论传统吉祥文化由历史资源转化为当代公共文化内容的条件。全文第二部分分析“福禄寿喜财”的文化结构，第三部分讨论Z世代的接受语境与传播困境，第四部分提出价值重释和传播路径，第五部分总结研究结论与不足。

二、从多元祈愿到复合表达：“福禄寿喜财”的文化结构

（一）“福”：总体性幸福观与伦理内涵

“福”在传统吉祥观念中最具总体性与包容性，既指生活顺遂，也包含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德行完善和生命善终。《尚书·洪范》所列“五福”为寿、富、康宁、攸好德和考终命，说明早期“福”并非偶然好运或单纯财富，而是物质条件、身心状态、道德实践与生命归宿之间的协调。后世通过贴福字、祈福仪式等形式，使抽象幸福观进入日常生活。

（二）“禄”：社会承认与发展机会

“禄”原指俸禄、官位及其象征的社会身份。鹿与“禄”谐音，鹿纹、禄星等图像成为功名仕进的象征，科举制度也强化了“禄”与读书入仕、光宗耀祖之间的联系^[3]。在当代，若仍将“禄”仅理解为官位与等级上升，便难以回应多元职业结构。其价值可由身份性资源转向发展性资源，强调教育机会、职业能力、社会承认和自我实现。对于Z世代而言，学习、创新、公共服务和自由职业均可能成为价值实现方式，因此应更重视公平机会、能力成长与社会贡献。

（三）“寿”：生命康宁与代际责任

“寿”是传统吉祥文化中较稳定的主题，寿星、寿桃、松柏、龟鹤和寿字纹共同构成长寿符号系统。它既源于人们对疾病与死亡风险的回应，也体现对老人、家族延续和生命秩序的重视。传统“寿”文化不只追求生命长度，还包含康宁、善终和德行积累。置于当代，可延伸为身体健康、心理稳定、生活节律和代际照护。青年同样面对压力、失眠与家庭照护问题，因此“寿”可连接青年健康观、老龄社会伦理与公共保障。

（四）“喜”：积极情感与关系确认

“喜”与婚嫁、添丁、团聚、节庆和丰收等事件密切相关，双喜字、喜鹊和灯彩等符号多在特定礼仪中发挥作用。与“福”的总体性相比，“喜”更强调可被感知、表达和共同见证的积极情绪。传统社会通过宴饮、贺礼、祝词和装饰，将个人喜悦转化为家庭与社区共同参与的关系事件，从而确认亲属、邻里与社会网络。其当代意义在于重建情感表达、关系联结与公共参与。

（五）“财”：物质保障与合理丰足

“财”最容易被功利化理解。财神、聚宝盆和金元宝等符号表达了改善生活、获得收益和抵御风险的愿望。在农业与商业社会中，财富不仅意味着个人占有，也关系家庭生计、交易信用和灾害储备。因此，财文化的基础并非单纯贪欲，而是对生活保障与资源稳定的需求。当代传播若只突出暴富和即时收

益，便会遮蔽劳动、节制、信用与共享。面向青年，应将“财”解释为依靠诚实劳动、专业能力和合理规划获得保障，并形成节约资源、管理风险和承担责任的财富伦理。

（六）复合结构：理想生活的五个维度

总体而言，“福禄寿喜财”可视为现代大众文化对理想生活的五维概括：福指向生活质量与归属，禄指向成长机会与社会承认，寿指向生命康宁与持续，喜指向积极情感与关系联结，财指向物质保障与资源能力。五者相互联系，缺乏健康的财富积累或公平机会，都难以构成完整幸福。将其置于统一框架，有助于超越简单祝词，揭示物质、精神、关系与生命之间的综合结构。同时，现代阐释必须坚持历史边界，明确哪些含义源于古代文献和民俗传统，哪些属于当代价值重构。只有区分“传统所固有”与“当代所赋予”，文化创新才具有学术依据与解释限度。

三、Z世代的文化接受语境及吉祥文化传播困境

（一）Z世代概念的分析价值与使用限度

“Z世代”通常用于指称在互联网、移动终端和社交媒体普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不同机构对其出生年份划分并不完全一致，Pew Research Center曾将1997年以后出生者作为新的代际分析对象，同时强调代际界线不是精确科学，而是用于理解共同历史经验的分析工具。2023年该机构进一步提醒，代际标签容易产生过度概括和刻板印象，应尽可能结合年龄、生命周期、时期事件和具体社会背景进行分析。

因此，本文使用“Z世代”并不是断言所有青年具有一致价值观，而是指向一种具有较高普遍性的媒介社会化背景：青年从较早年龄接触网络搜索、智能手机、即时通信和算法平台，文化内容往往在多任务、跨平台和持续连接中被接收。中国青年内部仍存在城乡、阶层、教育和地域差异，其传统文化态度也受到家庭教育、学校课程、地方文化和个人兴趣影响。学术研究应避免把“喜欢国潮”“追求个性”“注意力短”等市场话语直接当作稳定代际本质。

（二）移动化、视觉化与碎片化的文化接触

数字原生环境改变了青年接触传统文化的入口。过去，传统文化主要通过家庭礼俗、学校教育、博物馆、书籍和电视节目传播；当前，短视频、社交平台、网络游戏、数字展览和知识社区成为重要补充。Turner指出，技术并不是Z世代生活之外的工具，而是其社会联系与信息获取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环境中，图像、声音和短文本具有较强的注意力优势，文化内容常以碎片形式被快速浏览和重新组合。

碎片化并不必然导致浅薄，它也可能成为深入学习的入口。问题在于传播者是否建立从简要信息到系统知识的连接机制。若一个福字纹样、财神形象或祝寿图像只提供“寓意吉祥”的单句解释，用户很难理解其历史来源和使用语境；若进一步提供文献依据、器物信息、地域差异和相关仪式，则碎片可以成为知识网络的节点。因此，传统吉祥文化传播需要设计层次清晰的内容结构，而不是在“长篇说教”和“短平快娱乐”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

（三）身份表达、情感共鸣与文化真实性

青年接触传统文化不仅是知识学习，也与身份表达和情感经验有关。网络平台使用户能够通过头像、服饰、音乐、收藏、话题和节日仪式展示文化偏好，并在社群互动中获得认同。传统吉祥文化天然包含祝福、陪伴、团聚和希望等情感内容，具有进入青年日常生活的潜力。宋辰婷、宋祎祎的研究表明，Z世代青年能够在网络化传统文化建构中主动选择解释框架，并通过互动和再传播强化文化参与。但身份表达越依赖符号，越需要文化真实性作为支撑。真实性不等于完全复制古代形式，而是要求传播者诚实说明材料出处、历史变化和现代改编。如果把所有传统纹样都解释为固定吉祥寓意，把现代流行搭配包装成“千年传统”，短期可能提高传播效率，长期则会削弱公共信任。青年用户具有较强的信息检索和比较能力，当宣传叙事与史料明显不符时，文化内容容易被视为营销话术。因而，真实性应表现为可追溯、可解释和允许讨论，而非以权威口吻制造唯一答案。

（四）参与式文化与意义共创

融合媒介环境下，文化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边界日益开放。Jenkins所讨论的参与式文化强调，用户通过创作、分享、评论和协作参与意义生产。在传统文化传播中，青年可能以方言改写祝福语、记录家庭年俗、制作数字贴纸、讲述地方财神故事或比较不同地区的寿礼习惯。这些活动使文化从静态展示转为社会实践，也能补充正式叙事难以覆盖的个人记忆和地方经验。

（五）传统吉祥文化面向青年传播的主要困境

第一，历史语境被压缩。部分传播把“福禄寿喜财”描述为自古统一的传统体系，忽略其不同来源和时代变化，使复杂文化被简化为五个固定标签。第二，符号表达表层化。红色、金色、祥云、蝙蝠、鹿、寿桃、喜鹊和元宝被高频重复，却缺少关于谐音、象征、仪式和地方差异的解释，形成“看似传统、实际空泛”的内容。第三，价值阐释功利化。禄被等同于升职，财被等同于暴富，寿被等同于年龄增长，福和喜则被转化为抽象好运，难以回应青年对公平、健康、关系、劳动与生活质量的综合关切。第四，传播内容同质化。不同机构往往使用相近的节庆海报、网络祝福和文创话术，缺少地方生活、家庭记忆和真实人物经验，导致文化表达失去具体性。第五，商业逻辑过度前置。部分内容以销售、引流和平台热度为首要目标，文化知识只承担包装功能，容易使吉祥文化沦为消费刺激。第六，代际想象刻板化。传播者可能以“年轻人只喜欢可爱、潮流和短视频”为前提，刻意压缩内容难度，反而忽视青年对严谨知识、历史细节和价值讨论的需求。第七，数字参与缺乏治理。用户二次创作和社群讨论能够扩大影响，但若没有引用规范、版权规则和专业纠错，错误信息也会被算法快速放大。第八，效果评价单一。阅读量、点赞量和销售额只能说明可见度，不能证明用户形成了准确理解、情感认同或持续实践。上述困境说明，传统吉祥文化的青年传播不是简单更换媒介和语言，而是需要重新组织历史知识、价值内容、参与机制与公共责任。

四、面向 Z 世代的价值重释原则与传播路径

（一）坚持历史辨析，构建可追溯的知识基础

传统文化创新首先需要准确的知识基础。对于“福禄寿喜财”，应分别说明其概念来源、主要象征、仪式场景和历史变化，并明确“五福”与现代五项组合的区别。传播内容可以引用经典文献、民俗志、博物馆藏品说明和学术研究，形成基本证据链。对于存在多种说法的内容，应呈现其差异，而不是为了叙事完整而强行统一。

（二）从功利祈愿转向美好生活的综合价值

价值重释不是取消吉祥文化中的现实愿望，而是把这些愿望放入现代生活和公共伦理中重新理解。福可以阐释为物质与精神协调、个体与关系平衡的总体幸福；禄可以指向教育成长、职业尊严和社会贡献；寿可以关联身心健康、代际照护与生命质量；喜可以强调积极情感、共同庆祝与关系支持；财可以强调诚实劳动、合理保障、风险意识与资源责任。五者共同构成对美好生活的多维理解。

这种阐释有助于减轻传统吉祥文化的等级性和功利性印象。例如，对“禄”的解释不必否定传统功名理想，但应说明现代社会的成就路径具有多样性；对“财”的解释也不必回避财富需求，而应区分正当生活保障与无节制占有。价值重释的标准不是是否“时尚”，而是能否把传统愿望与当代社会普遍关心的公平、健康、劳动、家庭、环境和公共责任联系起来。

（三）以生活情境重建文化意义

吉祥文化原本就产生于具体生活，传播创新也应回到生活情境。相比反复展示孤立符号，围绕春节返乡、家庭团聚、毕业求职、婚育庆贺、老人寿辰、社区互助、劳动收获等真实场景展开叙事，更能说明福禄寿喜财如何在社会关系中发挥作用。情境化传播能够将抽象寓意转化为人物行动和情感经验，也有助于呈现同一观念在不同地区和家庭中的差异。

生活情境还应包括当代青年面临的新问题，如异地生活、职业选择、心理压力、代际沟通和经济不确定性。传统吉祥文化不能替代现实制度和专业支持，但可以提供情感语言、家庭记忆和价值反思。例如，以“寿”讨论健康生活时，应避免神秘养生和无依据疗法，而可连接科学健康知识和照护伦理；以“财”讨论青年经济安全时，应避免鼓吹投机，而可关注劳动权益、理性消费和风险管理。

（四）建立“轻入口—深内容—再实践”的分层传播

面向移动媒介环境，传统文化内容需要不同深度的传播层级。第一层是轻量入口，通过短视频片段、图文卡片、音频和互动问答建立兴趣，但内容必须准确，不以猎奇代替知识。第二层是深度内容，通过专题文章、数字展览、公开课程和学术讲座解释历史脉络、符号机制和地方差异。第三层是实践转化，通过家庭访谈、节日记录、社区展览、学校课程和公共文化活动，使用户把知识转化为观察、表达和社会交往。

三个层级之间应当相互连接。短内容需要提供进一步阅读的入口，深内容应使用清晰语言降低专业壁垒，实践活动则应把用户生成的资料重新纳入知识整理。这样的传播结构既适应碎片化接触，也维护系统性学习。它避免把青年简单视为缺乏耐心的受众，而是承认兴趣形成具有渐进过程：用户可能从一

个熟悉的福字开始，逐步进入文字学、民俗学、图像史和家庭记忆。

（五）鼓励参与式传承，强化代际与地方经验

青年参与传统文化建构，应从转发既定内容转向生产具有来源和情境的文化资料。学校、博物馆、图书馆和社区可以组织“家庭吉祥物件口述史”“地方祝福语采集”“年俗影像记录”等活动，引导青年采访长辈、整理旧照片和记录仪式变化。此类实践能够把宏观文化叙事与家庭生活连接起来，也能使不同代际在共同回忆和解释中建立交流。

参与式传承应尊重地方差异。福禄寿喜财的表达在南北地区、城乡社会 and 不同族群中并不完全相同，统一模板可能遮蔽文化多样性。传播平台可允许用户提交地方材料，但需设置基本审核标准，区分个人记忆、民间传说和可验证史实。对于涉及宗教信仰、少数民族文化和神圣仪式的内容，应与相关社区和研究者协商，避免脱离语境的娱乐化使用。参与的目标不是把所有文化变成可任意改编的素材，而是形成尊重来源、鼓励交流的知识共同体。

（六）完善文化边界、平台治理与公共伦理

数字传播扩大了传统文化的可见度，也增加了错误解释、商业挪用和文化冒犯的风险。传播者应建立三类边界。第一是知识边界，明确有文献依据的传统事实、地方传说和现代创意解释。第二是伦理边界，避免把祭祀对象、宗教神圣物和特定族群身份符号随意萌化、戏仿或商品化。第三是商业边界，公开说明公益传播、品牌营销和付费产品之间的关系，防止以传统文化权威掩盖纯粹促销。

平台治理同样重要。算法更容易放大情绪强烈和形式简化的内容，专业机构应通过权威账号、专题标签、辟谣说明和知识合作提高准确信息的可见度。对于用户创作，可以提供引用模板、开放授权说明和纠错渠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传播不仅是内容创新问题，也是公共知识治理问题；其目标应包括维护文化尊严、提高社会理解和促进平等参与，而不只是形成流量热点。

（七）建立超越流量指标的传播评价体系

评价面向 Z 世代的吉祥文化传播，应同时考察可见度、理解度、认同度和实践度。可见度包括触达人数、传播范围和内容停留；理解度关注用户能否区分“五福”与“福禄寿喜财”、能否说明主要符号的形成机制；认同度关注用户是否认为相关价值与现实生活具有联系。

评价还应重视负面结果，如是否强化功利主义、是否造成文化误读、是否排斥某些群体、是否诱导不理性消费。传播效果不能仅以“年轻化”视觉获得多少点赞判断，而应考察文化内容是否形成稳定而准确的公共理解。未来研究可以在不同地区和平台开展实证比较，分析何种叙事方式、内容深度和参与机制更有利于青年文化认同，从而把理论路径转化为可检验的研究模型。

五、结语

“福禄寿喜财”是中国传统吉祥文化在长期民俗生活中形成的复合性表达。其五个范畴具有不同的历史来源，不能被简单追溯为自古固定的完整体系，但它们在现代社会的并置并非毫无根据，而是集中反映了民众对总体幸福、社会发展、生命康宁、积极情感和物质保障的基本期待。吉祥文化的学术价值，正在于它把宏观价值观转化为日常语言、图像和仪式，使人们能够在生活实践中表达愿望、确认关系并形成文化认同。

面向 Z 世代的传承需要同时避免两种倾向：一是把传统文化封闭为不可变化的古老形式，二是把青年传播简化为视觉包装、网络流行和商业消费。Z 世代概念可以帮助研究者理解移动化、视觉化、互动化和社群化的媒介背景，但不能替代对青年内部差异和具体社会条件的分析。青年并非只追求快速娱乐，也具有寻找文化来源、讨论价值意义和参与知识生产的能力。

参考文献：

- [1] 周星. 作为民俗艺术遗产的中国传统吉祥图案[J]. 民族艺术, 2005(01): 52-66.
- [2] 王海霞. 福禄寿喜吉祥观念探源——以吉祥年画为例[J]. 民艺, 2020(03): 68-72.
- [3] 沈利华. “福禄寿”三星与中国传统社会价值取向[J]. 古典文学知识, 2006(06): 100-105.
- [4] 王树村. 中国历代吉祥图案管窥[J]. 中国文化, 1990(01): 41-46.
- [5] 杨广银. 图必有意，意必吉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谐音造型[J]. 文艺研究, 2009(07): 158-160.
- [6] 宋辰婷, 宋祎祎. 传统文化网络化建构中 Z 世代青年的角色和作用——以《国家宝藏》和《典籍里的中国》为例[J]. 中国青年研究, 2024(08): 76-83.

- [7] 陈丽君, 李纾. “福”的心理结构与社会功能[EB/OL].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4-07-31.
- [8]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 [9] 乌丙安. 中国民俗学[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5.
- [10]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Z]. 2017-01-25.
- [1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Z]. 2022-08-16.
- [12] UNESCO.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Z]. Paris: UNESCO, 2003.
- [13] Turner A. Generation Z: Technology and Social Interest[J]. The 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2015, 71(2): 103-113.
- [14] Priporas C V, Stylos N, Fotiadis A K. Generation Z Consumers' Expectations of Interactions in Smart Retailing: A Future Agenda[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7, 77: 374-381.
- [15] Djafarova E, Bowes T. “Instagram Made Me Buy It”: Generation Z Impulse Purchases in Fashion Industry[J]. Journal of Retailing and Consumer Services, 2021, 59: 102345.
- [16] Jenkins H.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7] Dimock M. Where Millennials End and Generation Z Begins[EB/OL]. Pew Research Center, 2019-01-17.
- [18] Pew Research Center. 5 Things to Keep in Mind When You Hear about Gen Z, Millennials, Boomers and Other Generations[EB/OL]. 2023-05-22.

Value Reinterpre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Pathways of the Auspicious Culture of Fu, Lu, Shou, Xi and Cai for Generation Z

Liu Limiao¹, Zhang Han¹

1.School of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China

Abstract: The expression “Fu, Lu, Shou, Xi and Cai” is a widely recognized composite form of Chinese auspicious culture. It conveys popular expectations concerning overall well-being, social development, health and longevity, positive emotions, and material security. In a media environment deeply shaped by mobile platforms, short videos and online communities, traditional auspicious culture has gain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circul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faces problems such as superficial symbolism, utilitarian interpretation, weakened historical context and homogeneous communication.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conceptual analysis and interdisciplinary synthesi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value structure, symbolic mechanisms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Fu, Lu, Shou, Xi and Cai. It then analyzes the structural difficulties involved in communicating this cultural complex to Generation Z.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five terms did not constitute a fixed and unified system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Rather, they emerged from different auspicious concepts, beliefs and ritual practices and were gradually combined in modern popular expression. Their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should therefore be reinterpreted beyond the narrow pursuit of luck, official promotion and sudden wealth. Fu may be understood as comprehensive well-being and belonging; Lu as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social recognition; Shou a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sponsibility; Xi as positive emotion and relational connection; and Cai as material security, labor ethics and responsible use of resources. The concept of Generation Z is useful for describing a media environment characterized by mobility, visibility, interaction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but it should not be treated as an essential and homogeneous generational identity.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built on historical clarification, contextual storytelling, layered content, participatory cultural practice, ethical governance and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The purpose is not simply to make traditional symbols appear younger, but to establish credible connections between inherited cultural memories and contemporary life. This framework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auspicious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youth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digital communication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Generation Z; Fu Lu Shou Xi Cai; Auspicious Culture; Cultural Identity; Communication Pathways

舞蹈为何越来越短？

短视频平台中舞蹈实践的模板化与参与式转向

罗悦阳

(马来亚大学, 马来西亚 吉隆坡 50603)

摘要: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发展,舞蹈的传播形态正在从相对完整的作品逐渐转向十几秒至几十秒的短舞蹈片段。本文以抖音平台中的舞蹈挑战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平台公开的参与人数与播放数据,并通过对舞蹈参与者及舞蹈博主的访谈,考察舞蹈片段如何从作品中的局部结构转化为可被反复调用的“模板”,以及这一变化如何影响用户的参与方式。研究借助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的参与式文化理论与哈蒙尼·本奇(Harmony Bench)的社交舞蹈与媒介研究,将舞蹈的短时化、模板化与身体参与联系起来。研究认为,舞蹈的“变短”并不只是时长变化,而是传播单位、创作逻辑与观看关系的共同转变。具有高识别度、易模仿并能够与音乐节奏形成稳定对应的动作片段,更容易在平台机制中被提取、教学和再生产,并由此形成“短—模板—参与”的传播机制。用户也由传统意义上的观看者转变为模仿者、再创作者和传播者,舞蹈因而获得了更强的参与性与社交属性。

关键词:短视频舞蹈; 抖音; 模板化; 参与式文化; 舞蹈实践

DOI: doi.org/10.70693/202608125736

第一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短视频平台的发展,舞蹈正在逐渐进入一种不同于传统舞台和影视媒介的传播环境^[1]。过去,舞蹈通常以相对完整的作品形式存在。无论是剧场中的舞蹈作品、电视节目中的舞蹈表演,还是音乐影像中的编舞,其基本逻辑都是由编舞者或表演者完成作品,再由观众进行观看^[2]。舞蹈的完整性、艺术性和表演质量构成了传统舞蹈传播的重要评价标准。然而,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中,这种以“完整作品”为中心的舞蹈传播逻辑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舞蹈不再需要完整呈现,而是以十几秒、二十几秒或三十秒左右的动作片段进入平台,并通过模仿、教学、挑战和再发布不断扩散。舞蹈的传播单位因此从完整作品逐渐转向具有高度识别度和可复制性的动作片段^[3]。

这种变化并不只是视频长度的缩短。短视频平台所改变的,是舞蹈从“被观看的作品”向“可参与的内容”转化的方式。相关研究指出,短视频平台通过便捷的拍摄工具、音乐资源、话题机制和算法推荐,使普通用户能够较低成本地完成内容生产,并在观看、模仿、发布和互动中参与传播^{[1][4]}。舞蹈在这一过程中也不再只是被观看的视觉内容,而成为用户能够直接调用的身体实践。舞蹈短视频既可以用于展示,也可以用于教学、模仿、社交和自我表达,其社会功能已经超出了传统舞蹈作品传播的范围^[5]。

抖音上的“舞蹈挑战”尤其能够体现这种变化。平台中大量舞蹈挑战围绕特定音乐片段和动作结构展开,用户可以直接使用相同音乐,并按照已有动作进行模仿,也可以在原有结构上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由此形成的并不是单一视频的重复传播,而是一种由原始动作、教学视频、模仿视频和再创作共同构成的持续生产过程。相关研究将这种内容概括为高度模板化和高度参与性的“音乐舞蹈类挑战”,认为其传播过程呈现出“模仿—再创作—模仿”的循环特征^[3]。这一观察与本文所关注的“片段—模板—参与”变化具有直接关联,但本文更关注的是:为什么一个原本属于某一作品或某一舞者的动作片段,能够逐渐脱离原作品,成为普通用户反复调用的公共舞蹈结构。

作者简介:罗悦阳(1994—),女,硕士,研究方向舞蹈人类学/民族志。

通讯作者:罗悦阳

从抖音平台公开数据也可以看到这种传播规模。在流行舞和古典舞类挑战中,《Badboy》(约24秒,8396人参与,2.7亿次播放)、《爱的主打歌》(约21秒,4328人参与,2亿次播放)和《精卫》(约18秒,2350人参与,1.5亿次播放)均以十几秒至二十几秒的片段获得了数千万至数亿的播放量。K-pop舞蹈挑战的传播规模更为突出:EXO《Love Shot》的高潮副歌片段约18秒,吸引3.4万人参与,播放量达12.2亿次;(G)I-DLE《Queen Card》约30秒,参与人数达14万,播放量高达58.4亿次。抖音平台原生舞蹈挑战则呈现出更大的参与规模,《醋意摇》约15秒,有9.1万人参与,播放量13.9亿次;《星奇摇》约24秒,参与人数高达89.9万,播放量达142.2亿次。这些数据来自抖音平台公开页面,统计时间节点各有不同,本文仅以这些数据说明舞蹈片段在平台中已具备独立传播能力,而不将其作为不同舞蹈之间传播效果的严格比较依据。需要指出的是,部分艺人、歌手和舞蹈博主的参与进一步扩大了这些挑战的可见度,但本文并不将明星参与视为传播的主要原因,而是将其视为平台传播过程中增加可见性的一个因素。

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解释了短视频舞蹈的传播。一方面,舞蹈短视频的传播依赖于动作、音乐、视觉形象等多种因素;另一方面,平台的推荐机制、创作工具以及挑战话题也会影响内容的可见性和用户参与^{[1][3]}。针对舞蹈视频传播潜力的研究也表明,舞蹈视频的传播表现并非由单一的身体动作决定,而是与身体动作、整体外观、面部表情和场景等多种视觉线索共同相关^[6]。这意味着,一个舞蹈片段能否获得较高传播度,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动作简单”或“视频较短”,而需要结合动作本身的识别性、音乐结构、视觉呈现以及平台环境进行理解。

本文由此关注一个看似简单但具有传播学和舞蹈学意义的问题:当舞蹈从完整作品转向十几秒、二十几秒的可复制片段之后,舞蹈的传播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进一步而言,这种变化如何影响舞蹈的作品形态、观看关系以及普通用户的身体参与。

1.2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以抖音平台上的舞蹈挑战和短视频舞蹈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观察具有明确动作片段、音乐片段和模仿机制的舞蹈内容。研究材料主要包括抖音公开的舞蹈挑战数据、平台中的典型舞蹈视频,以及对舞蹈参与者和舞蹈博主的访谈。

本文选取了流行舞、古典舞、K-pop原舞蹈以及抖舞等不同类型的舞蹈挑战作为观察材料,并不以比较不同舞种的传播特点为主要目的,而是希望通过不同类型案例观察一种跨舞种存在的共同现象,即舞蹈作品中的高识别度部分被提取出来,以较短的形式进入平台,并在用户模仿和再创作中获得新的传播生命。典型案例包括《Ggez》、《Badboy》、《爱的主打歌》、《精卫》、《Love shot》、《Queen Card》、《醋意摇》和《星奇摇》等舞蹈挑战。案例的选择主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具有较高的公开参与和播放数据;二是舞蹈片段具有较明确的动作识别点;三是在平台中能够观察到教学、模仿、再发布等较为完整的参与过程。

除平台数据和视频材料外,本文还访谈了10位具有不同舞蹈经历的参与者,其中普通舞蹈参与者6人,K-pop舞蹈参与者2人,具有专业训练背景的舞蹈博主2人。访谈重点围绕参与动机、学习方式、舞蹈难度、模仿经验、平台曝光以及社交感受展开。受访者均以匿名方式编号。访谈材料并不用于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推断,而主要用于理解用户为什么愿意参与短视频舞蹈,以及他们如何理解“简单”“好看”“容易学习”“有参与感”等经验。

研究同时采用案例观察与半结构式访谈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对抖音公开舞蹈挑战数据进行整理,记录挑战名称、视频时长、参与人数、播放量等基本指标;其次,对选取的典型舞蹈片段进行动作观察,重点记录动作结构、重复方式、音乐节拍与身体动作之间的关系;再次,通过访谈了解普通参与者、K-pop舞蹈参与者以及舞蹈博主对短视频舞蹈的实际使用和参与经验。最后,将平台数据、视频观察和访谈材料放在参与式文化与数字舞蹈研究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综合分析,而不是单纯以播放量判断舞蹈的传播效果。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使用的抖音公开数据主要来自平台公开展示信息,数据反映的是特定时间节点的平台统计结果,而非经过第三方验证的长期追踪数据。因此,本文将其作为描述传播规模和案例差异的材料,而不将其等同于严格意义上的传播效果评价。

1.3 理论视角与研究问题

本文主要借助参与式文化和数字舞蹈研究理解短视频舞蹈中的用户参与。美国传播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提出的“参与式文化”强调,数字媒介环境中的受众不再只是文化产品的接受者,而能够通过创作、分享、模仿和再生产进入文化生产过程^[7]。这一理论为理解短视频舞蹈提供了重要视角:用户观

看舞蹈之后,不必停留在观看层面,而可以通过身体模仿直接进入内容生产。

在舞蹈研究领域,哈蒙尼·本奇(Harmony Bench)进一步将参与式文化与数字舞蹈实践联系起来,关注社交媒体如何改变舞蹈的生产、传播和观看方式。数字平台上的舞蹈不再完全依赖剧场、专业舞者和传统舞蹈机构,而能够通过网络媒介进入普通用户的日常生活。舞蹈因此成为一种可以被不断观看、学习、模仿和重新发布的媒介化身体实践^[8]。将詹金斯的参与式文化与本奇的数字舞蹈研究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一个重要变化:短视频舞蹈中的“参与”并不仅仅意味着用户对内容进行评论、转发或二次创作,更意味着用户直接以自己的身体进入原有的舞蹈结构之中。

基于这一理论视角,本文主要讨论三个问题:第一,抖音短视频如何将传统意义上的完整舞蹈作品转化为具有高度识别度的短舞蹈片段;第二,一个舞蹈片段如何在教学、模仿和再创作中逐渐成为可被公共调用的舞蹈模板;第三,当观看者通过身体模仿进入传播过程时,舞蹈的观看关系、作品关系和参与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本文并不试图证明“舞蹈越短越容易流行”这一简单判断,而是希望进一步说明,短视频平台真正改变的是舞蹈作为传播对象的基本单位。当一个动作片段能够脱离原作品,被不同用户重复调用时,舞蹈便从相对封闭的作品形态进入了一种开放的、持续生产的传播结构。

第二章 从作品到模板:短视频舞蹈的形态变化

2.1 从完整作品到高识别度片段

传统舞蹈作品强调完整的结构和连续的动作发展。作品通常具有相对明确的开始、发展和结束,舞蹈意义也依赖于整体编排、音乐结构、空间调度以及舞者之间的关系^[2]。短视频平台则改变了这种观看条件。由于用户浏览内容的方式更加快速,舞蹈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识别点,因此作品中的某一个动作段落、音乐高潮或者具有视觉辨识度的身体姿态,可能比完整作品更适合进入平台传播。

已有研究对抖音舞蹈短视频的观察也表明,舞蹈在平台中已经形成不同于传统舞台的呈现方式,舞蹈表演、教学和创作都可以被压缩到短视频结构中,并承担展示、自娱和社交等多种功能^[5]。短视频并不是简单地把完整舞蹈缩短,而是重新选择什么内容值得被留下。能够迅速被识别、记忆和模仿的动作,因此更容易成为传播单位。

从这一角度看,“片段”首先是一种内容选择。它可能来自完整舞蹈作品中的高潮部分,也可能原本就是为短视频平台设计的动作组合。比如K-pop舞蹈挑战通常选择歌曲副歌或最具有辨识度的部分,抖舞则经常围绕一个持续重复的身体动作展开。部分舞蹈博主也会主动截取自己作品中最具有技术表现力或视觉效果的部分进行发布。受访者4提到,二十多秒或三十多秒的短视频舞蹈能够把“punch line”(点睛之笔)或者“killing part”(高光片段)等最精华的部分直接呈现出来。对专业舞者而言,短并不意味着简单,而可能意味着将身体技术集中到有限的时间之中。

受访者3的经验进一步说明了这种差异。他具有较强的舞蹈基础,认为自己除了可以参与简单舞蹈之外,也能够挑战难度较高的舞蹈,并通过平台获得更多曝光。他提到,自己曾发布过敦煌舞作品《精卫》,这类作品虽然参与模仿的人较少,但能够直接展示专业舞者的技术和舞姿,“参与者少,但是精华,关注度变得集中,热度就高了”。因此,平台中的短舞蹈并不只有“降低难度”一种作用,它也可以成为专业舞者压缩和展示身体技术的媒介。

有学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一点。其研究通过多模态模型预测舞蹈视频的传播潜力,将身体动作、整体外观、面部表情和场景等因素共同纳入分析^[6]。这一研究并不能直接解释某一个具体舞蹈为什么流行,但能够说明舞蹈视频的传播表现并非只由动作时长决定,而与多种视觉信息共同相关。本文所讨论的“高识别度片段”,也因此不能简单理解为“越短越好”,而应理解为一种能够在有限时长中集中呈现动作、音乐和视觉特征的内容结构。

2.2 参与式文化与舞蹈的身体参与

当舞蹈从完整作品转向可复制片段之后,观看者与舞蹈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传统舞蹈传播通常将舞者和观众区分为表演者与观看者,而短视频平台中的舞蹈挑战则不断削弱这种界限。观看者可以在看到舞蹈之后立即进入学习和模仿过程,并将自己的身体重新放回视频之中。

詹金斯的参与式文化理论为理解这种变化提供了基础。参与式文化并不意味着所有用户都拥有相同程度的生产能力,而是强调文化参与门槛的降低以及用户之间持续的内容交流^[7]。在短视频舞蹈中,用户可能只是观看,也可能点赞、收藏、学习、模仿、拍摄并发布视频,不同参与行为之间存在明显的层级差异。

本奇进一步将这种参与关系放入数字舞蹈环境中考察。她关注社交媒体如何使舞蹈从专业舞台进入网络空间,并使身体实践成为数字文化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8]。在这一意义上,短视频舞蹈的特殊之处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跳”,而是平台提供了一条从观看到身体实践的低门槛路径。

访谈材料中这种变化非常明显。受访者1认为,短视频舞蹈“很帅气,很美”,简单的动作也能够让自己看起来很好,并获得自信;十几秒或二十几秒的动作“不用学习特别久,一个人也能拍视频”。受访者5则认为,大家都在跳相同的舞蹈,使自己“没有独自跳舞的羞耻感”,陌生人的点赞和鼓励也进一步增加了参与信心。受访者8的表述更加直接:“大家都在跳,因为很简单,也没有舞蹈羞耻症。”这些经验说明,短舞蹈的参与门槛不仅来自动作难度,也来自一种“别人也在做”的社会心理环境。

K-pop舞蹈参与者的经验则进一步体现了线上与线下的连接。受访者6表示,随机舞蹈(一种在公共场所随机播放K-pop歌曲副歌、参与者自由加入的舞蹈活动形式)通常选取K-pop歌曲中的高潮部分,既可以发布到抖音,也可以参与线下活动^[9]。对其而言,最大的感受是“有很多人隔着网络在一起跳舞”,同时又有人观看他们的舞蹈。这种线上观看、身体模仿和线下参与交织在一起,使短视频舞蹈并不只是一个屏幕中的内容,而成为连接不同参与者的媒介。

这一点与数字舞蹈研究中关于“微表演”和媒介化共在的讨论相呼应。相关研究发现,舞蹈挑战能够使身处不同空间的人通过学习相同动作形成一种身体上的关联,即使参与者并不真正处于同一物理空间,也能够通过模仿相同动作产生某种“共在感”^[10]。抖音舞蹈中的参与因此不仅表现为内容生产,也表现为身体之间通过媒介建立联系的过程。

2.3 从片段到模板:一个概念区分

在进入具体分析之前,有必要先厘清本文中三个密切相关但层级不同的概念:“片段”指从完整作品中截取出的、尚未脱离原作品语境的舞蹈局部;“短舞蹈”指以该片段为核心形成的平台视频形态;“模板”则指在经过大量用户模仿、教学和再生产之后,被平台和参与者共同确认为一种可供反复调用的稳定动作框架。模板不等同于某一个原始视频,而是多重模仿实践中抽象出来的结构性存在。

因此,本文所说的“模板化”并不是指每一个用户都完全复制原舞者的动作,而是指一个动作结构逐渐获得了相对稳定的识别方式。用户可以在这一结构中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包括改变服装、场景、表情、身体风格甚至动作细节,但只要核心动作仍然能够被识别为同一挑战,它就仍然属于同一个模板。

这种模板化与平台的音乐和创作机制密切相关。于可心认为抖音“音乐舞蹈类挑战”通常围绕固定音乐片段、标准化身体动作和话题机制形成,并在“模仿—再创作—模仿”的过程中不断扩大参与规模^[3]。这一研究为本文理解“模板”提供了重要基础,但本文更强调模板作为舞蹈结构的身体属性:模板并不是单纯的传播标签,而是一个可以被用户身体重新执行的动作框架。

访谈也显示,教学视频在模板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访者2表示,热门舞蹈挑战通常有很多舞蹈博主制作教学视频,不需要专门去培训班,在家就能够学习。受访者5也提到,热门舞蹈容易找到教学视频,而且可以通过不同舞者的处理方式了解动作,从而学习对方的优点。教学由此成为连接原始动作与普通用户身体实践的重要环节。

舞蹈博主在这一过程中处于较为特殊的位置。他们既是模板的参与者,也是模板的解释者和传播者。一方面,他们通过自己的视频展示动作;另一方面,又通过教学将动作拆解成普通用户能够理解和模仿的形式。模板并不是在原始视频发布之后自动形成的,而是在原舞者、舞蹈博主、普通参与者以及平台推荐机制的共同作用下逐渐稳定下来。

第三章 短—模板—参与:抖音舞蹈的传播机制

3.1 从片段到高识别度动作

短视频舞蹈能够成为平台内容,并不意味着完整作品中的任意片段都具有同样的传播能力。能够进入挑战机制并被大量用户模仿的片段,往往具有较强的动作识别度,并且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形成清晰的视觉和音乐记忆点。

以《Queen Card》的舞蹈挑战为例,平台中广泛传播的片段主要集中在副歌部分,约30秒。该片段的核心动作为双手在头顶做出“皇冠”形状并伴随胯部律动,动作与音乐重拍高度同步。这一动作具有三个有利于平台传播的特征:第一,上肢动作为主,不要求复杂的脚步移动,降低了身体协调性门槛;第二,动作与歌词直接对应(“Queen Card”与“皇冠”手势形成视听同步),增强了记忆点;第三,动作在22秒内重复4次,为用户提供了反复确认和模仿的机会。这一动作之所以容易被识别,与其动作结构相对集中

有关：上肢动作占据主要视觉位置，身体移动范围有限，动作本身具有明显的象征性，同时音乐中的关键词与身体姿态形成对应。用户即使没有完整学习整支舞，也能够通过一个核心动作识别并参与这一挑战。

《星奇摇》呈现出另一种形式。其核心动作主要由肩部、胸部的律动和胯部摆动构成，例如一个八拍四次顶肩动作、一个八拍四次胸部律动、一个八拍四次胯部摆动，动作单一难度小且具有明显的重复特征。对于没有专业舞蹈训练的参与者而言，这种相对简单的动作结构减少了动作记忆的负担，也使用户可以通过镜像方式快速学习。

这些动作特征虽然不能单独解释一个挑战的最终传播规模，但它们能够说明为什么某些片段更容易被用户识别和学习——舞蹈视频的传播潜力与身体动作以及其他视觉模态共同相关^[6]。因此，本文并不将“短”视为流行的充分条件，而是把短时长看作动作结构能够被集中呈现的媒介条件。

平台公开数据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种传播现象。《Queen Card》约30秒，有14万人参与，播放量达到58.4亿次；《星奇摇》约24秒，有89.9万人参与，播放量达到142.2亿次。两者均不是完整舞蹈作品的形态，而是以具有较强识别性的动作部分进入平台传播。相较完整作品，用户无需掌握整个编舞，只需要掌握能够被识别的核心动作，就可以完成一次参与。

3.2 从动作片段到公共模板

当一个动作被反复模仿之后，它的意义便开始发生变化。最初它可能只是某位舞者作品中的一部分，之后却逐渐成为一个不依赖原舞者存在也能够被识别的公共动作结构。此时，用户模仿的不再只是某一个视频，而是在调用一种已经被平台和用户共同确认的舞蹈模板。

这类内容通常围绕音乐片段与标准化身体动作形成，并通过“模仿—再创作—模仿”的循环不断扩大参与规模^[3]。这一判断与本文的观察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但二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相关研究更多从平台化视角解释音乐、内容、技术与用户之间的互动，而本文则进一步将这一互动落到身体层面，关注动作如何在反复执行中从“一个片段”变成“可以被调用的模板”。

访谈材料显示，教学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中介。受访者2认为，热门舞蹈挑战通常能够找到舞蹈博主制作的教学视频，因此即使没有舞蹈基础，也可以在家学习。受访者5则注意到，同一舞蹈可以通过不同舞者的处理方式呈现出来，学习者能够通过比较这些版本理解动作特点。舞蹈博主因此不仅扩大了模板的传播，也参与了模板的标准化过程。

与此同时，模板并不要求所有人完成完全一致的动作。受访者3作为具有专业训练背景的舞蹈博主，更倾向于利用平台展示自己的专业能力；受访者7则是因为喜欢的艺人经常跳抖舞，希望通过参与获得类似的表现感；受访者9则注意到，一些K-pop舞蹈的高潮部分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记忆点，例如《Love shot》中的充满韵味和技术要求的标志性顶跨动作，但难度较高的舞蹈仍然会受到参与者技术水平的限制。不同用户对同一个模板的处理方式存在差异，模板因而不是对动作的机械复制，而是在稳定结构基础上的持续再生产。

这也意味着，“模板化”并没有消除舞蹈的差异性。相反，它把差异从“是否跳同一支舞”转移到了“如何跳同一个结构”。普通参与者可能关注动作是否完成、是否好看，舞蹈博主更关注动作处理和技术表现，专业舞者则可能将模板作为展示身体能力的平台。相同的动作结构因此容纳了不同层次的身体实践。

3.3 从观看到参与：身体实践的层级变化

短视频舞蹈的传播并不是所有观看者都成为参与者。平台数据中极高的播放量与相对有限的参与人数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以《星奇摇》为例，其约89.9万人参与、142.2亿次播放，若以参与人数除以播放量进行粗略计算，比例约为0.0063%；《Queen Card》约14万人参与、58.4亿次播放，对应比例约为0.0024%。这一比例不能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参与转化率”，因为播放量可能包含重复观看、算法推荐以及其他统计因素，但它至少说明，真正完成身体模仿并发布视频的用户，只占观看者中的很小部分。

因此，短视频舞蹈中的参与并不是一个“观看者全部转化为舞者”的过程，而更接近一种层级结构。大量用户停留在观看层面，部分用户进一步点赞、收藏或评论，少部分用户学习动作并进行模仿，更少的用户完成拍摄和发布，而舞蹈博主和专业舞者则可能进一步通过教学、编舞和持续发布成为内容生产者。参与式文化的意义正是在这种不同程度的参与中体现出来，而不是简单地以“参与人数”衡量。

受访者1、5和8的经验说明，较低的动作门槛能够降低参与者进入舞蹈的心理和身体成本。受访者1认为十几秒或二十几秒的舞蹈不需要学习很长时间，一个人就可以拍摄；受访者5认为大家都在跳相同的舞蹈，使自己减少了独自跳舞时的羞耻感；受访者8则直接将“简单”“方便学习”“有热度、有关注、

有鼓励”视为参与的重要原因。

这种参与又不仅仅是为了学习舞蹈。受访者4提到,通过参与舞蹈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并获得了支持自己的粉丝;受访者6认为,网络中“很多人隔着网络在一起跳舞”,这种体验增强了自己展示身体的信心。舞蹈因此同时承担了身体表达和社交功能。

对于舞蹈博主而言,参与逻辑又有所不同。受访者3认为,舞蹈挑战能够提供较高曝光度,使自己精心录制的舞蹈更容易被观看,从而积累粉丝。受访者4也认为,模仿的人越多,短视频舞蹈越容易获得曝光。由此看来,同一个舞蹈模板对普通参与者和舞蹈博主具有不同意义:前者主要借助模板进入参与,后者则借助模板获得可见性,并进一步展示自己的身体能力和个人风格。

3.4 平台可见性与“短—模板—参与”的形成机制

短视频舞蹈的传播不能脱离平台环境。舞蹈动作本身具有可模仿性,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获得大规模传播;动作需要通过音乐、话题、教学、用户模仿以及平台推荐进入一个不断扩大的可见性网络。相关研究已经指出,抖音的音乐库、创作工具、推荐算法和数据反馈共同构成了音乐舞蹈挑战的技术环境,平台并非只是内容传播的中性空间,而会参与内容生产和流行路径的形成^[3]。

从这一角度看,“短—模板—参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舞蹈片段因为时长较短、动作集中而降低了学习成本,但是否能够成为模板,还取决于动作是否具有识别性、音乐是否形成记忆点、是否有教学内容帮助用户学习,以及平台是否给予足够的可见性。模板形成之后,大量用户的模仿又进一步增加内容数量,使这一动作获得更多曝光,并反过来强化其作为“热门舞蹈”的身份。

但从本文的舞蹈观察来看,这一循环还具有明显的身体属性:用户不是简单复制一个文本,而是用自己的身体重新执行一个动作结构。每一次模仿既保持了模板的可识别性,也可能产生新的动作风格、空间环境和身体表达。因此,平台上的内容循环同时也是身体实践的循环。

另外,有研究认为通过多模态模型预测舞蹈视频的病毒式传播潜力,说明身体动作、整体外观、面部表情和场景等多种视觉线索都会影响传播预测结果^[6]。这一研究支持了本文对“高识别度片段”的观察,但不能据此推断某个具体动作必然流行。真正形成平台热度的,是动作结构与音乐、视觉呈现、用户模仿以及平台分发机制之间的共同作用。

平台数据也显示了观看与参与之间的差距。不少舞蹈挑战的播放量动辄高达到数十亿,但参与人数的差距跨越几千人到几十万人不等。巨大的观看基数与有限的身体参与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层级结构。短舞蹈并不是要求所有观看者都成为舞者,而是在大量观看者中不断产生少量模仿者,再由其中部分人成为稳定参与者、教学者或舞蹈博主。

这种机制也解释了为什么部分艺人的参与能够扩大挑战的影响力。艺人、偶像和专业舞者本身具有较高的关注度,其参与能够迅速增加某一动作的可见性,但普通用户仍然需要通过学习、模仿和发布完成进一步传播。明星参与因此更适合被理解为可见性放大器,而不是整个传播机制的起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短视频舞蹈的传播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传统舞蹈传播更多是“作品—表演者—观众”的关系,而短视频舞蹈逐渐形成“动作—模板—参与者”的关系。作品仍然存在,但它不再是传播过程中唯一稳定的单位。能够被反复调用的动作结构,开始成为连接创作者、舞蹈博主、普通用户和平台的重要中介。

第四章 结论

本文讨论的并不是舞蹈单纯“变短”这一现象,而是短视频平台如何改变了舞蹈的存在方式。抖音中的舞蹈逐渐从以完整作品为中心的展示逻辑,转向以高识别度片段、动作模板和用户参与为中心的传播逻辑。舞蹈的价值因而不只体现在作品的完整性和表演质量上,也体现在动作是否容易被记住、学习、模仿和再次使用。

这种变化同时改变了舞蹈的传播关系。观众不再只是观看者,而可以通过模仿、拍摄、发布和再创作进入舞蹈的传播过程。模板在其中成为连接作品与参与者的重要形式:它保留原有舞蹈最具辨识度的动作,又将完整作品中较高的学习门槛降低,使舞蹈能够脱离原始表演情境,在不同用户的身体中持续出现。访谈中,多位参与者提到“简单”“容易学习”“大家都在跳”等体验,也有舞蹈博主将短片段视为展示个人技术、积累关注的重要方式,这说明模板化并不意味着参与者之间完全趋同,不同身体仍会在模仿过程中形成不同程度的表达。

从参与式文化的角度看,短视频舞蹈并不是传统舞蹈作品的简单压缩,而形成了一种新的身体参与方

式。舞蹈越容易被调用和复制，越可能进入更多人的日常实践；而持续的模仿、教学和再创作，又进一步强化其作为公共模板的存在。由此，舞蹈传播逐渐由“作品—观看”的关系转向“动作—模仿—再生产”的循环，观看与参与之间也不再存在明确而固定的界限。

这也意味着，短视频中的“短”本身并不是最终结果，而是舞蹈适应平台传播条件的一种表现。被截取的动作需要具有足够的识别度，能够在有限时间内形成记忆点，并能够被不同水平的参与者重新完成。平台的数据传播、算法分发以及用户之间的模仿实践，共同决定了某些动作能否从一个具体表演片段转变为具有公共属性的舞蹈模板。

因此，短视频平台带来的变化并非只是舞蹈时长的缩减，而是对舞蹈作品观、传播关系和参与方式的一次重新组织。舞蹈从相对固定的完整作品，逐渐转向可以被观看、调用、模仿和再生产的文化实践。其意义也由“完成一个作品”进一步延伸到“让更多人进入舞蹈”。这或许正是“舞蹈为何越来越短”这一现象背后更值得关注的变化。

参考文献：

- [1] 陆佳漪. 数字时代舞蹈短视频的参与式传播——以抖音短视频平台为例[J]. 新闻世界, 2024(3): 57-61.
- [2] 符彬靖. 舞蹈叙事中的动作动机发展与符号化表达[J]. 艺术研究, 2026, 3(1).
- [3] 于可心. 音乐传播的平台化：基于抖音“音乐舞蹈类挑战”内容生成机制的考察[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 2026.
- [4] 张冰洋. 短视频内容生产与传播研究——以抖音平台为例[J]. 视听, 2020(5): 163-164.
- [5] 黎婕. 舞蹈短视频的传播现状研究——基于抖音平台的实证分析[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24(5): 10-17.
- [6] WANG J, WANG Y, WENG N, et al. Will you ever become popular? Learning to predict virality of dance clips[J]. ACM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 Computing, Commun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2022, 18(2): 1-24.
- [7] JENKINS H.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 [8] Bench H. Perpetual Motion: Dance, Digital Cultures, and the Common[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20.
- [9] 张羽瑄. 随机舞蹈的结构主义叙事与后人类属性研究[D].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4.
- [10] GRIFFITHS L E. Dancing through social distance: Connectivity and creativity in the online space[J]. Body, Space & Technology, 2023, 22(1): 65-81.

Why Is Dance Getting Shorter? Templatization and the Participatory Turn of Dance Practices on Short-Video Platforms

Luo Yueyang

Universiti Malaya, Kuala Lumpur, Malaysia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short-video platforms, dance has increasingly shifted from relatively complete works to short segments lasting between ten and thirty seconds. Focusing on dance challenges on Douyin,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such segments are extracted from choreographic works and transformed into reusable templates, and how this process reshapes user participation. The analysis draws on publicly available participation and viewership data, as well as interviews with dance participants and bloggers. Framed by Henry Jenkins's theory of participatory culture and Harmony Bench's work on social dance and media,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shortening of dance is not merely a reduction in duration, but a fundamental shift in the unit of circulation, creative logic,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ewer and performer. Segments that are highly recognizable, easy to imitate, and closely aligned with musical rhythms are more likely to be extracted, taught, reproduced, and circulated as templates. This gives rise to a “shortening–templatization–participation”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users increasingly move from viewers to imitators, re-creators, and disseminators, thereby endowing dance with stronger participatory and social dimensions.

Keywords: Short-Form Dance; Douyin; Templatization; Participatory Culture; Dance Practice

元代聘财研究——以《元典章》为中心

黄彩莹

(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元代通过多次颁布和调整法规, 对不同阶层和民族的聘财数额、支付形式及婚姻程序进行了细化规定, 并针对赘婿婚这一婚姻形态制定特殊条款。在婚姻变故中, 聘财纠纷集中于订婚未嫁娶和已嫁娶两类情形。面对婚姻中与聘财相关的纠纷, 元代司法判决遵循特定的原则, 兼顾契约精神与民族习俗差异, 体现了元代婚律的多元性。下聘财不仅是经济行为, 更是社会秩序、民族政策与伦理观念的集中体现, 对维护元代婚姻制度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元代; 《元典章》; 聘财

DOI: doi.org/10.70693/202608119230

元代婚姻制度中的聘财钱体系, 作为连接礼法传统与多元社会现实的重要纽带, 历来受到史学界与法学界的关注。对于元代聘财的关注主要从礼制角度与法制角度展开。

从礼制角度看, 成果丰硕。陈高华、史伟民《中国风俗通史》中《家庭与婚姻》一节讨论了元代的聘财情况, 作者认为元代重聘之风盛行且官方多次试图调整但收效甚微^[1]。王晓清《元代社会婚姻形态》中专有《聘财等第》一节讨论元代的聘财问题。王晓清通过对比分析元朝多次颁布的聘财相关法例, 结合当时的经济情况进行分析, 得出元代重聘风气盛行的结论。且通过结合具体的实例分析, 认为聘财律文格例是现实婚姻行为的反映, 但它毕竟不能反映社会生活实际的全貌, 实际上元朝的重聘有可能要超过聘财律文格例^[2]。高楠《宋元婚姻财产问题初探——以聘财与奁产为中心》一文, 将宋元两代婚姻财产具体形式做对比, 得出宋代重奁产, 元代重聘财的结论。高文认为蒙元时期, 文人士子的地位因草原文化的冲击而一落千丈, 被挤出了元朝政治领域的中心, 成为政治上的边缘人。政治地位的下降使士阶层失去了对官员和富有阶层的吸引力, 反映到婚姻财产关系上, 即表现为元代缔姻时奁产的式微和聘财之风的盛行。可见, 这一变化与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阶层价值取向等方面有着内在的联系, 是社会转型的产物。^[3]杜鹃《元代汉人聘婚制研究》, 从婚姻仪式——纳币这一环节的角度关注元代汉人婚姻中的聘财, 认为元代汉人的婚聘受到蒙古重聘习俗的影响, 因而形成了重聘财的风气。^[4]

聘财作为婚姻财产, 在婚姻的缔结和解除中都受到关注, 因聘财引发诉讼是元代常见的现象。《元典章》作为元代的核心法律文献, 为研究元代婚姻纠纷提供了丰富案例。从法制角度研究元代的聘财, 亦有不少成果。徐适端《元代婚姻法规中的妇女问题初探》中主要以《元典章》为史料, 探讨了元代对于婚姻中的聘财问题。徐文认为元代法规条文将聘财提到了最为重要的地位, 强调聘财以男方为主, 甚至以聘财的归属作为裁决或处理婚姻犯的手段。在婚姻的缔结过程中, 妇女完全被物化, 人格全然丧失。^[5]柏清韵《Marriage and the law in the age of Khubilai Khan: cases from the Yuan dianzhang》(忽必烈时期的婚姻与法律——来自〈元典章〉的例子) 主要以《元典章》中婚姻诉讼为例, 具体分析了涉及婚姻纠纷是如何审判的。柏清韵认为元代司法实践高度依赖先例, 地方法官常因缺乏系统成文法而陷入“判例援引”的困境, 这一现象在《元典章》中“照得”“若比”等表述中得到印证。^[6]另有柏清韵的《元代婚姻与财产法律转变》一文, 将聘财放在婚姻财产的范围内审视, 重点讨论了收继婚中的聘财处置问题。^[7]

从既有研究来看, 关于元代聘财研究视角大多集中在婚姻礼仪中的一部分, 元代对聘财的多次立法和管理是为了抑制重聘习气, 以求社会安稳。而在法制角度下的研究, 对因聘财引发的诉讼的关注度较少, 更多的是集中于收继婚这一特殊婚姻形式下产生的婚姻财产纠纷。

作者简介: 黄彩莹(2001—), 女, 硕士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为元史。

上述研究成果为理解元代聘财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对其法律实践中的多元性与矛盾性研究还有一定空间。本文试以《元典章》为例,通过整合制度文本与司法案例,试呈现元代婚姻治理中“礼法合一”的复杂面相,为元代社会史与法律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元代婚聘中聘财相关规定

元朝的婚姻礼制主要继承了宋代的形制。在至元八年(1271年)所颁布的《婚姻礼制》中,明确说明:“据汉儿旧礼体例,照得朱文公《家礼》内《婚礼》,酌古准今,拟到各项事理。”按照元廷所颁发《婚姻礼制》的规定,婚礼的程序分别为议婚、纳采、纳币、亲迎、妇见舅姑、朝见、婿见妇之父母。每个步骤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功能,从议亲到聘财的商定,再到仪式和家庭融入,最后是双方家庭的互动,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婚姻确立过程。在上述规定的婚聘环节中,“纳币”这一环节处于第三个环节,下承亲迎,纳币的顺利与否关系着这桩婚姻能否成功缔结。纳币又称为“下财”,纳币以男方家为主,会请女方诸亲为客,先入座。男方到门外陈列币物等,令媒人向女方通报,由女方主人出门迎接,行礼,待女方先入,男方再带着币物进门。接着,举酒请女方纳币,后饮酒,女方受币。女方主人邀请男方进入做客,待男婚主与女婚主相见,纳币这个流程才结束。^[8]

男女之事,人之大伦。早在至元六年(1269年),元廷官方就注意到财礼钱在婚姻缔结中的重要性。当时立婚书这一程序尚未统一化,“已订婚书者,少有相违”,亦有“男家为无婚书,故违元议,妄行增减财钱”。在争论之间,因无婚书,只凭媒妁之人的偏向,导致诉讼不停。在此背景下,至元六年(1269年)所颁布的《嫁娶写立婚书》,明确规定了立婚书是婚姻缔结过程中必要的步骤,尽可能减少因财钱不治,徒生争论的情况。

在至元八年(1271年),元廷就针对纳币这一环节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名为《嫁娶聘财体例》,该体例主要规定了民间嫁娶聘财的数额和筵席的规模。《嫁娶聘财体例》中有关聘财的具体数额,针对品官和庶人嫁娶的规定不同。其中品官中也按照品秩的高低进行分类规定,庶人则分成上户、中户和下户。根据《嫁娶聘财体例》,一品官和二品官为五百贯,三品官为四百贯,四品官和五品官为三百贯,六品官和七品官为二百贯,八品官和九品官为一百二十贯。庶人中的上户为一百贯,中户为五十贯,下户为二十贯。筵席的规模也作了相关的规定。即以男方为主,品官不得超过四味,上户与中户不得超过三味,下户不得超过两味。^[9]值得注意的是,该体例最后处注明“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蒙古人不在此列。”^[10]元廷在作出统一化规定的同时,还提出蒙古人为“特例”,并不需要按照上述规定来进行婚聘,可体现蒙古人这一群体在元朝统治中的特殊性。

赘婿是元代婚姻中常见的一个群体,然而婚姻制度的制定则需要考虑到其特殊性。“养老、出舍女婿各有定例,外有钱财,为无定例,往往多余索要,耽误引讼未便”这一现象的出现让元廷意识到《嫁娶聘财体例》尚未涉及赘婿这一群体,亟须颁布新的定例。至元八年(1271年)七月,元廷新颁布了《女婿财钱定例》,进一步完善了聘财相关规定。《女婿财钱定例》主要面向的人群为养老女婿与出舍女婿。养老女婿,顾名思义要承担女方的养老责任,按照原定婚约,听从养老。出舍女婿,又称为年限女婿,即按照原定婚约中写明的年限出离,另行住处。根据《女婿财钱定例》,养老女婿依照嫁娶聘财中的等第减半,须明立媒妁婚书成亲。出舍女婿的财礼钱则需要在双方商量的情况下,明立婚书,依照年限,按照嫁娶聘财等第,验数以三分中不过二分。^[11]

元中期,重聘之风盛行,有甚者“倾资破产,不能成礼”,因而“争讼不已,以致嫁娶失时。”^[12]元朝非常重视婚嫁行为,认为男女婚嫁之事为人之大伦。为了抑制因重聘导致男女无法成礼的风气,元廷于大德八年(1304年)颁布了《嫁娶聘财体例》。蒙古人、色目人依照本俗,品官另行定夺。《嫁娶聘财体例》主要面向庶人中的上、中、下户,由此可管窥民间奢靡之风盛行,因而亟须修改条例。《嫁娶聘财体例》规定:上户为金一两、银五两、彩段六表里、杂用绢四十匹;中户为金五钱、银四两、彩段四表里、杂用绢三十匹;下户为银三两、彩段一表里、杂用绢十五匹。^[13]对比前后两次嫁娶条例不难发现,前者面向的群体更为广泛,包括品官和庶民;而后者则只面向庶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至元八年所颁布的《嫁娶聘财体例》规定财富可折充,计量单位为元宝钞,而大德二年(1298年)所颁布的条例则以金银和其他实物作为计量单位。王晓清认为:“至元、大德聘礼两相比照,元中期聘财比元初期增加了近十倍,并且大德聘礼中规定的锦缎与杂用绢数额是至元聘礼所没有限定的。这显然是以聘物替代聘金的趋势在增长的缘故。至元聘礼纯粹是以中统钞贯确定庶人聘财等第,这说明元宝钞在元初期具有法定的流通职能,到了元中期这一职能已基本失去了。大德聘礼,完全以金银数额定品第,以实物权高下,一方面是纸币(主要是至元宝钞)信誉低,

通货膨胀严重,更重要的是婚聘重财之风的奢靡。元政府两次颁布聘财等第前后只相距三十多年,重聘风习便如此盛行,足见元代婚嫁重聘风盛于两宋。”^[14]

即使元廷两次对民间婚聘的财钱进行立法和调整,但定亲不嫁、定亲别嫁之风仍未停止。皇庆二年(1313年),礼部认为,“定婚改嫁”的行为不符合伦理纲常,若任由随意毁婚风气生长,则会让一些小人产生侥幸心理,利用彩礼钱来助长其贪鄙之心,扰扰官府,有伤风化。在《元典章》所载《定婚不许毁亲》一例中,可以注意到元律参照唐律中“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辄毁者,杖六十。虽无许嫁婚书,但受聘财,亦是”的规定。^[15]可见,纳币这一环节并非只是七礼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完成基本上宣告了婚姻的缔结,具有法律上的意义。根据元廷在皇庆二年(1313年)出台的法律:今后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或受财而辄悔者,笞三十七下。若更许它人者,笞四十七下。已成者,五十七下。后娶者知情,减一等。女归前夫。男家毁者,不坐,不追聘财。^[16]经此规定,不守契约精神之人,不但要受身体之刑,其中所涉及的财物亦无法收入囊中。官方法律往往偏向遵守契约的一方,此行有利于敦促民风。从严格要求婚书中写明聘财数量到明确办法具体的聘财体例,元廷对于婚姻中的聘财钱作出明确的规定,并划入法律范畴,可见元朝的政治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缩影。

二、婚姻纠纷中的聘财钱

两姓结好,盼长长久久,这是古往今来人们对于婚姻的朴素愿景。但总有不可避免的非常情况,使婚姻的缔结被迫中止。前文所关注主要为元廷对民间聘财多次立法规定,元廷多次令行禁,调整法律以达敦促民风之效。无论是至元八年(1271年)还是大德八年(1304年)所颁行的相关婚聘嫁娶条例,都仅针对未订婚未嫁娶之民众,而定婚未嫁娶和已婚嫁两种中所涉及的聘财并未作统一规定。^[17]关于元朝的立法特点,元人郑介夫曾称之为“有例可援,无法可守”。^[18]在尚未有成文法典的情况下,《元典章》所载的民众在婚姻缔结过程中发生的“特例”,只能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司法判案。《元典章》和《通制条格》中曾记载多例定婚未嫁娶和已婚嫁婚姻纠纷,主要争讼的问题为聘财的去向判决。

(一) 元代定婚未嫁娶聘财纠纷

《元典章》中元代定婚未嫁娶的案例较多,主要分为违背契约精神与其他人订婚和因出现意外无法成婚。纳币仅仅是双方订下婚约,并未标志着婚姻流程的完成。亲迎这一流程的完成,才算求娶,即元人所言之“过门”。所谓过门,即将新妇迎进门。从纳币到亲迎,其间存在较多不确定性,而某些意外的发生极大程度导致婚姻缔结的曲折甚至中止。

在《母在子不得主婚》一案中,至元五年(1268年)十月王二与田盈,二男争夺赵家女儿赵速儿。其中王秀才已下财,将聘礼送至女方,而女方兄长却自作主张在外吃嗜酒,将妹妹嫁给田盈为妻。该行为不符合当时的礼仪,母亲还在世,兄长等人不得主张姐妹的亲事。未婚之间,赵速儿与别的男子通奸在逃。经判定,若原定婚男子王二不愿意娶该女子,原下聘的财物将悉数归还男方。^[19]元人重聘之风盛行,一些无法支付女方聘财的男子只能延长定婚的年限,导致嫁娶失时。《定婚奸逃已婚为定》中的案例正说明了这个现象。史延寿带定婚妻子刘瑞哥在逃通奸,双方已订婚,不待聘财足够,双方背着父母私通在逃。经官方定夺,向史延寿追要原先欠的财钱,并交给刘瑞哥父亲收管。待财足则迎娶私通的定婚妻子,量情拟决各二十七下,准许成婚。^[20]

在元代相关案例中,如果男方在定婚期间因偷窃被捕入狱,则双方解除婚约,女方归还聘财钱。如《通制条格》中所载一例:菊花与王道道订婚,已下聘财钱。然王道道杀害王何臧,违法被收监,难以与菊花成婚。经官府判决,拟合听离,原下聘财归还男方。^[21]除此之外,如果遇到男女其中一方不幸身亡,婚约的缔结亦中止。假若是女方订婚未嫁,遇意外身死,男方所给予女方的财钱不予归还。发生于至元二十一年的一例纷争中,男方因女方为娶身死,欲讨要原给予财物。经官方评议:“元代定婚妇女未娶身死,元下财钱不合追还。”^[22]若男方因意外在定婚期间身亡,处置的方式有差别。发生于至元二年(1265年)的一起诉讼案例中,经过媒人,阿余与狗儿订婚。同年七月,婿狗儿身死。在元朝婚姻相关法律中,遵循尊重各族旧例的原则,即“各随本俗”。阿余与狗儿为回回人,两人的婚姻纠纷应按照回回体例。回回大师不鲁溪等称:回回体例,女孩儿不曾娶过、死了的孩儿,若小叔接续,女孩儿底爷娘肯收呵,收者。不肯收呵,下与财钱回与一半。^[23]从这一旧例可看出,元朝回回人的婚姻中保留了收继婚的传统。在当时

重聘之风的背景下,一家若有多个儿子,娶妻恐怕亦是难事。兄死弟收继未过门的嫂子,既能解决婚姻大事,又能省下一笔聘财钱,这样的现象在元朝盛行亦有男方家庭的考量。如若是元朝汉人婚姻中,婿意外身亡,也有女方不归还钱财的例子。因不同的婚姻纠纷案相关的细节有所差异,官方只能针对具体情况给出判决,并非能形成一个定例,因而元代婚姻纠纷中的聘财去向亦呈现出一个复杂多元的面向。

(二) 订婚已嫁娶聘财纠纷

相较于订婚未嫁中涉及的财礼钱纠纷,订婚已嫁娶财礼钱相关纠纷的情况则更为多元,涉及的人员更多,关系亦更为复杂。从《元典章》和《通制条格》中所记载的纠纷案例来看,主要分为女方不遵守婚姻中的契约精神逃婚或与他人通奸,男方另娶他人,父母受财将女改嫁与丈夫受财将妻改嫁这三类情况。

在至元六年(1269年)《娶逃妇为妻》一案中,涉及了订婚女再嫁的财钱处置问题。订婚女高唤奴由父母主婚,通过立媒、下财,嫁给李伴姐为妻。两年后出逃,通过立媒、下财嫁给胡闰。李伴姐诉求追还原下财钱,经中书省定夺,高唤奴依旧吩咐给李伴姐为妻执行,不归还财钱。^[24]又有《通奸成亲断离》这一例,军户赵阿叶因丈夫赵十南出征在逃,通过媒人赵十嫂说合,招易千三为婿,后离异。后又听易阿彭说合,接受钞二十五两,克丝一定,再次成亲。经定夺,赵阿叶应当与奸夫离异,所受财钱没入官府。媒人易阿彭因年老不受责罚。^[25]除了订婚女逃婚再嫁的情况,亦有招到女婿再娶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赘婿在元代是比较常见的。根据《女婿财钱定例》中的规定,无论是作为养老女婿还是出舍女婿,所要付与女方的都要比娶妻所应付的财钱要少得多。然而赘婿不作为,不绍家业者不在少数,更有甚者抛弃妻子,另娶他人。有这样一例:刘阿高将张荣招为出舍女婿,后张荣不绍家业,一年后抛弃原妻寺奴,另娶智先儿,另居十四年,不曾给予原妻衣食。经定夺,拟让张荣准备中户等级的财钱五十两,求娶刘寺奴出舍。^[26]

相较于上文两种情况,父母受财将女改嫁与丈夫受财将妻改嫁的例子更为普遍。其中,丈夫将妻改嫁的行为称为“典妻”。无论是父母将女儿改嫁,还是丈夫将妻子改嫁,所求多为其中的经济利益。其中原因复杂,或许是人性的贪婪,抑或家庭的贫穷所导致等。在《领讷财礼改嫁事理》一例中,人户杨千六经过立媒将女儿杨福一娘嫁给陆千五为妻,曾二次受讷财礼,各因贫困,未曾成就。后杨千六隐瞒女儿已受讷陆千五财礼事宜,将女儿改嫁于陈千十二为妻。杨福一娘与陈千二生活十年,并育有两个儿女。经定夺,杨福一娘有未定婚亲的妹妹,令陆千五下财求娶。如无,杨千六原受陆千五裙缎等物品与所下财钱应归还,给付陆千五别娶妻室。^[27]又有郭季二、刘子明,受讷他人财钱,将妻假作妹,经媒人嫁与他人为妻。虽存在“家贫嫁妻”的无奈,但这类情况仍属于违律,经官方定夺往往让女方归宗,断绝婚姻关系。^[28]改嫁过程中,丈夫所受他人财钱则由官府追没。经上述多则案例可看出,订婚已嫁娶中发生的婚姻纠纷更为复杂。

三、元代聘财相关案例司法实践的特点以及影响

元代聘财相关案例丰富多元,其中的司法判决亦体现多方的博弈。因此,元代聘财相关案例是研究元代婚律的重要切口。经过笔者对《元典章》中相关案例的分析,发现元代聘财相关案例的司法具有其特殊的一面,展现了元朝在统治中的多元性。

(一) 援引先例

元朝在制定法律上经过多重的努力,《元典章》《通制条格》等法律文书中的各类案例为元朝官员判案提供了参考。在《元典章》中常见“照得”“若比”之类的字眼,可见元代相关部门在判决婚姻中相关纠纷时,如若遇到曾出现过的案例,往往采用先例原则。柏清韵认为:“《元典章》中的案例揭示了地方法官对在没有成文法的坚实基础或没有适用先例情况下作出决定的潜在不安全感。‘尚未有类似案件的裁定作为先例’或‘我们尚未收到普遍适用的先例’等短语在《元典章》中经常出现。”^[29]在《受财将妻转嫁》一例中,刘子明转嫁妻子一案的判决参考潭十八嫁妻一例,即女方归宗,所生儿男归生父,所受财礼钱被官府没收。^[30]再有如《领讷财礼改嫁事理》中,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黄三七趁女婿外出将女儿黄鹤姐改嫁他人一例,则参照同样情况下的杨千六改嫁女儿案例。^[31]婚姻中涉及的纠纷颇多,不同个体情况亦有细微差别。因此,元朝按照先例来判决婚姻中的纠纷实属无成文法的优先选择,但亦有呆板不懂变通之嫌。

（二）尊重不同民族习俗

元朝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多元。入主中原的蒙古族统治者不得不面对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的差异，在婚姻案例的判决中，元朝统治者同样存在着协调多方的困境，因而往往容易出现同一类型事件却有不同判决结果。为了突围上述困境，在元朝婚姻财礼钱相关案例中，元廷秉持的是尊重不同民族习俗的原则。在嫁娶聘财、筵席等级相关规定中，元廷提出“诸色人同类相婚姻者，各随本俗法。互相婚姻者，以男家为主，蒙古人不在此列。”^[32]在具体的聘财纠纷上，元廷的判决同样遵循“各随本俗法”的原则。如同样是丈夫死亡财礼钱的处置问题，则有着“夫死回财钱一半”与“婿死不回财”的区别。在《未过门夫死财钱一半》一例中，提及该类案件旧例为“娶妻财毕未成者，男女丧，不追财”。^[33]而实际的判决则按照回回体例则为女方若不愿意被小叔收继，则需要退回男方一半财钱。换言之即若女方同意小叔收继，则彩礼钱不退还，而小叔亦不需要重新下聘财求娶。该判决不仅回应了如何处置聘财问题，还涉及了收继婚这一婚姻类型。这意味着元廷的判决不仅仅在尊重不同民族的习俗，还试图协调不同民族的婚姻观念。柏清韵认为，正如蒙古习惯所规定的那样，聘礼的支付为夫家“购买”了新娘的一生，并为丈夫的亲属所继承。这强调了收继婚的经济基础。礼部必须平衡汉人对收继婚的厌恶与蒙古人婚姻的买卖观念。^[34]而另一起类似财礼钱纠纷中，关于财礼钱的处置则颇为简单，婿死即按照旧例，不予归还原有财钱。

（三）以婚书和媒人为载体的契约精神

婚书这一载体在婚姻缔结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婚书的历史来源悠久，早在《礼记·昏义》记载周代婚姻“六礼”，虽无明确“婚书”之名，但“问名”“纳吉”等环节需通过文书交换生辰信息，可视为婚书的前身。经过秦汉唐宋多代发展，婚书的写定基本走向成熟因婚书承载着契约关系，婚书的制定是婚姻缔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元廷对婚书的写立，同样给予重视，婚书的内容是婚姻纠纷中的重要物证。至元六年（1269年），中书户部所颁行的《嫁娶写立婚书》中说明了元代存在不立婚书，导致增减财钱、赘婿养老、出舍争差年限方面的纠纷。因而规定在婚姻议定后必须立婚书，写清相关事宜。在聘财钱相关纠纷中，婚书主要在订婚未嫁娶的情况下发生其作用。如《订婚奸逃已婚为定》一例中，郝伴姑与百儿的婚事要按照原定婚书施行，按照原定财钱聘娶。^[35]

媒人在中国的婚姻史中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两姓结好中，媒人往往扮演着中间者的角色。在《元典章》的案例中，媒人是引人注目的。王晓清认为，元朝婚律将媒妁直接列入司法对象，规定媒妁具有对婚姻成立的担保责任。这就不仅仅是婚姻礼仪形制的问题了。当然，这只是对婚姻关系破裂以及牵涉财产分割时的一般性规定而已。^[36]即使是婚姻的“中间人”，亦需要对这一群体做一个规范。为了抑制媒人乱收钱的现象，元廷的解决方案是要选择德高望重的妇人作为婚姻缔结的担保人，并登记在册，这样的规定使得媒人有了官方化的性质。不难注意到，《元典章》中聘财相关的诉讼中，媒人的讼词将作为证词，直接影响判决。诚然，媒人也是一个有风险的职业。如果两方违律结婚，其中涉及的媒人亦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在《通奸成亲断离》一例中，媒人易阿彭说合军户赵十南的妻子赵阿叶与易千三，赵阿叶接受对方的聘财后结婚，违反婚律，但因易阿彭年事已高，后不予追究。^[37]元代通过婚书的强制契约化与媒人的责任法定化，构建起一套以法律保障为核心、兼具礼法传统的元代司法实践标准，折射出元代婚律对契约精神的实践与局限。

四、结语

元代婚姻制度中的聘财钱体系，通过《元典章》等法律文书的规范与实践，展现了多元文化交融下独特的治理逻辑。在婚姻变故的聘财纠纷处理中，元代司法实践呈现出“先例原则”与“民族习俗优先”的双重特点。一方面，在缺乏系统成文法的背景下，判例援引成为解决争议的重要依据，但亦暴露了法律体系的碎片化；另一方面，对蒙古、回回等民族婚俗的尊重，既缓和了民族矛盾，又导致司法结果的多元性。这种矛盾性恰恰映射了元代作为多民族帝国的治理困境——如何在统一法典与地方习俗之间寻求平衡。元代聘财制度不仅是经济契约的载体，更是政治权力渗透社会生活的缩影。通过规范聘财，元廷试图遏制奢靡之风、稳定基层秩序，但其过度依赖财礼约束，反而加剧了民间争讼与伦理危机。这一历史经验表明，婚姻制度的设计需兼顾经济理性与文化认同，单纯依靠法律强制难以根除社会痼疾。元代聘财钱制度的研究，为理解元代的婚律提供了独特视角，亦为当今多元社会中婚姻立法与伦理建设提供了历史镜鉴。

参考文献:

- [1]陈高华、史卫民:《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 [2]王晓清:《元代社会婚姻形态》,武汉:武汉出版社,2005年。
- [3]高楠:《宋元婚姻财产问题初探——以聘财与奁产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29-36页。
- [4]杜娟:《元代汉人聘婚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6年。
- [5]徐适端:《元代婚姻法规中的妇女问题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9年,第4期,第30-35页。
- [6]Bettine Birge, *Marriage and the Law in the Age of Khubilai Khan: Cases from the Yuan dianzha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 [7]柏清韵、刘晓:《元代婚姻与财产法律的转变》,《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9辑,2019年,第360-417页。
- [8]方龄贵点校:《通制条格》卷3《户令·婚姻礼制》,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39页。
- [9]《元典章》卷18《户部四·婚姻·嫁娶聘财体例》,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14页。
- [10]《元典章》卷18《户部四·婚姻·嫁娶聘财体例》,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14页。
- [11]《元典章》卷18《户部四·婚姻·女婿钱财定例》,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15页。
- [12]方龄贵点校:《通制条格》卷3《户令·婚姻礼制》,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43页。
- [13]《通制条格》卷3《户令·婚姻礼制》,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43页。
- [14]王晓清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元代的重聘之风。参见王晓清:《元代社会婚姻形态》,第13、18、31、48-52页。
- [15]《元典章》卷18《户部四·婚姻·订婚不许毁亲》,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31页。
- [16]《元典章》卷18《户部四·婚姻·订婚不许毁亲》,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32页。
- [17]参见:《元典章》卷18《户部四·婚姻·嫁娶聘财体例》,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14页。方龄贵点校:《通制条格》卷3《户令·婚姻礼制》,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43页。
- [18](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05页。
- [19]《元典章》卷18《户部卷四·婚姻·母在子不得主婚》,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16-617页。
- [20]《元典章》卷18《户部卷四·婚姻·订婚奸逃已婚为定》,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25页。
- [21]《通制条格》卷4《户令·嫁娶》,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65页。
- [22]《通制条格》卷3《户令·嫁娶》,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67页。
- [23]《元典章》卷18《户部四·婚姻·未过门夫死回财钱一半》,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50-651页。
- [24]《元典章》卷18《户部四·婚姻·娶逃妇为妻》,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18页。
- [25]《元典章》卷18《户部四·婚姻·通奸成亲断离》,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26页。
- [26]《元典章》卷18《户部四·婚姻·招到女婿弃妻再娶》,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20页。
- [27]《元典章》卷18《户部四·婚姻·领讷财礼改嫁事理》,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28页。
- [28]上述提及两例典妻事件,见于:《元典章》卷18《户部卷四·婚姻·夫嫁妻财钱革拨》,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35页;《元典章》卷18《户部卷四·婚姻·受财将妻转嫁》,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36页。

- [29] Bettine Birge, *Marriage and the Law in the Age of Khubilai Khan: Cases from the Yuan dianzha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54.
- [30] 《元典章》卷 18《户部四·婚姻·受财将妻改嫁》，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636 页。
- [31] 《元典章》卷 18《户部四·婚姻·领讫财礼改嫁事理》，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628 页。
- [32] 《元典章》卷 18《户部四·婚姻·嫁娶聘财体例<七款>》，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614 页。
- [33] 《元典章》卷 18《户部四·婚姻·未过门夫死回财钱一半》，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651 页。
- [34] 柏清韵、刘晓：《元代婚姻与财产法律的转变》，《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 9 辑，2019 年，第 360-417 页。
- [35] 《元典章》卷 18《户部四·婚姻·订婚奸逃已婚为定》，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625 页。
- [36] 王晓清：《元代社会婚姻形态》，武汉：武汉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7 页。
- [37] 《元典章》卷 18《户部卷四·婚姻·通奸成亲断离》，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626 页。

A Study on Betrothal Property in the Yuan Dynasty: Centered on Yuan

Dianzhang

Huang Caiying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e Yuan Dynasty issued and revised a serie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specify the amount of betrothal property, payment forms and marriage procedures for people of different social ranks and ethnic groups, and formulated special provisions for son-in-law residence marriages. When marital disputes arose, litigations over betrothal money mainly fell into two categories: cases where the engagement was settled but the wedding had not taken place, and cases where the couple had already married. When judging disputes involving betrothal property, judicial authorities in the Yuan Dynasty followed fixed principles, balancing contractual spirits and diverse ethnic customs, which reflected the plural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uan marital laws. As more than merely an economic transaction, the presentation of betrothal property embodied social order, ethnic policies and ethical norms, and played a vital role in stabilizing the marital system of the Yuan Dynasty.

Keywords: Yuan Dynasty; Yuan Dianzhang; betrothal property

红色文化在自媒体时代的传播困境与实践策略研究

弋昊誉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发扬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时代新风新貌”。短视频与自媒体生态的发展为红色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渠道与更高的触达率,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传播碎片化、内容同质化与形式化倾向等问题。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整合红色文化资源,优化技术与推荐机制,提高红色文化供给能力,构建有利于红色文化健康传承的生态系统,从而更有效地巩固政治认同并发挥红色文化在价值引领与道德教化方面的作用。随着自媒体时代的不断发展,公众对文化的认知与理解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并传承的先进文化,蕴含着坚定信仰、巩固信念与凝聚信心的精神力量,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与时代价值。在自媒体语境下,红色文化的传播既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遭遇传播方式多元化带来的挑战。为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在铸魂育人、增强文化自信方面的作用,亟需深入探讨自媒体时代红色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实践策略。

关键词: 自媒体时代; 红色文化; 实践路径

DOI: doi.org/10.70693/202608183174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当代背景下,如何从理论层面科学理解人类社会由“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发展逻辑,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根本线索,系统揭示了人类社会从分散走向整体、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发展规律,为认识世界历史进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1][8][9]。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随着生产方式的进步与交往范围的扩大,各民族之间原有的封闭状态不断被打破,历史逐渐转变为世界历史[1]。这一转变并非源于抽象的精神活动,而是以物质生产的发展为根本动力。进一步而言,《共产党宣言》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通过开拓世界市场,使生产与消费具有世界性特征,从而推动各民族之间形成广泛的相互依赖关系[2][4][5]。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不仅加速了全球市场的形成,也使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从而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与此同时,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指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冲突,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当生产资料的集中与劳动的社会化发展到与资本主义外壳相冲突的程度时,现存制度必然发生变革[3];而《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则进一步表明这一矛盾的现实表现[4]。这一矛盾运动不仅制约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孕育着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人民群众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通过实践不断推动社会结构的变迁与世界历史的发展。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强调,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是历史的创造者[6],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在历史变革中的重要使命[7]。随着历史的发展,人民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逐渐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与制度变革的关键力量[5]。

从整体上看,世界历史呈现出明显的整体性与矛盾性特征。一方面,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的推进,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逐步形成相互依存的整体结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也伴随着阶级剥削、民族压迫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等多重矛盾,这些矛盾在不同历史阶段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构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张力[8][9][11]。

在当代背景下,世界历史的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作者简介: 弋昊誉(200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通讯作者: 弋昊誉

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交织并存，各国联系更加紧密同时风险挑战也更加复杂[10]。在这一现实语境下，重新审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于把握全球发展趋势、理解世界格局演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基于上述理论背景，本文以马克思经典著作作为理论依据，系统梳理世界历史理论的内涵，从历史转变的根源、发展动力、主体力量及其本质特征等方面展开分析，旨在深化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解，并为认识当代全球化发展提供理论参照。

二、红色文化在自媒体时代的传播困境

随着互联网时代不断地发展，拓宽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在这个时代，人民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同时也是传播者。自媒体时代为红色文化的传播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给红色文化的传播增加了些许困难。

（一）红色文化传播内容碎片化

全媒体时代信息文本的非线性化和信息要素的零散性导致了事实性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受众观察视角的分散化和意见的分裂性带来了意见性信息传播的碎片化，信息碎片遍布各类终端。受时空条件限制，尽管受众每天通过不同媒介浏览大量信息，却未能深刻理解和记忆，对信息内容的关注也是碎片化的。当前许多自媒体平台出现把红色文化宏大的叙事切割成零碎片段的形式来传播红色文化，这是对红色文化内核的稀释。红色文化内容的切片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帮助用户在繁琐的生活中了解到红色文化的些许内容。但是，在碎片化的影响之下，人们无法理解完整的历史逻辑，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产生偏差，从而滋生误解，这对红色文化的传播形成了阻力。与此同时，碎片化传播还会造成受众对红色文化的“知识误差累积”。当受众长期接触零散甚至经过二次加工的信息时，其对红色文化的理解往往建立在片段化的认知基础之上，而非基于系统的历史知识结构。一旦碎片化内容在受众心中形成固化影响，就可能造成对历史事实的误读与对价值内涵的弱化，对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再生构成成长期的不良影响。因此，红色文化内容的碎片化并非仅仅是传播形式的变化，而是一种深层次的传播生态问题。它不仅关系到红色文化能否被准确理解，也关系到红色文化在年轻群体中能否形成情感认同与价值共鸣。若任由碎片化传播继续扩散，红色文化可能逐渐被娱乐化叙事淹没，其历史厚度与精神力量也将难以得到有效传递。

（二）红色文化传播技术不足

在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速度更快、内容呈现更加实时，信息共享程度也前所未有地提高。然而，在这一信息高度交互与流量逻辑主导的传播环境中，大量低俗化、娱乐化、博取眼球的内容被不断推向前台，这种内容的泛滥在客观上挤占了红色文化的传播空间。在这些被“异化”的信息之中，往往掺杂着消极甚至错误的价值导向，对红色文化形成多方面的冲击，不仅不利于红色文化的健康生长，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削弱红色文化传播的深度与效果，甚至试图瓦解其应有的传播影响力，从而大幅度影响红色文化应发挥的社会功能。“信息茧房”也是挤占红色文化生存空间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全民大数据下，信息平台发展沉浸式体验，就会出现用户偏爱某一方面内容，平台推送机制仅仅向其推送某一方面内容的现象，造成红色文化传播链断裂。

在算法推送的作用下，受众容易被困在自身兴趣圈层，形成封闭的信息回路，而红色文化由于自身具有历史厚度深、精神内涵丰富、理解门槛较高等特征，与用户的即时兴趣之间形成某种天然隔阂。这种隔阂在算法机制的强化下被不断放大，使得红色文化难以被有效触达，传播范围被逐渐压缩，传播效果也明显下降。更为严重的是，自媒体平台的内容竞争激烈，短平快的信息更容易获取流量，而红色文化所强调的历史厚度、精神内涵与价值深度，在算法主导的传播环境中处于相对劣势。红色文化传播面临被边缘化、被弱化的风险，其本应发挥的思想引领与价值塑造功能也受到挑战。

（三）红色文化传播供给能力与渠道不足

在自媒体时代，人人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当前成为自媒体博主的门槛极低，几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平台讲述历史故事，参与红色文化的传播。然而，是否具备必要的历史素养与专业背景，是否能够准确把握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却难以得到保证。这导致红色文化传播主体在同一平台上呈现出能力层次不齐的现象，也直接影响受众对红色文化精神、本质和价值的有效理解，形成传播质量上的结构性短板。部分自媒体博主为了获取所谓的“流量密码”，将红色文化与商业化、娱乐化内容进行不当拼贴，将深刻厚重的红色叙事消费为噱头化的传播元素。这种做法不仅削弱了红色文化的庄重性和严肃性，还可能造成内容的庸俗化与浅表化，使红色文化的传播更加困难。更为关键的是，红色文化本身具有深度思想价值和丰富历史内涵，其传播需要具备专业能力的讲述者进行阐释与普及。依靠缺乏专业性的创作者进行传播，往往难以保证内容的准确性与权威性，也难

以向公众呈现具有深度与厚度的红色文化形态。因此,在传播供给侧存在专业能力不足、内容把关薄弱、渠道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的背景下,红色文化的传播不仅受到平台机制的限制,也受到主体能力与供给结构的制约,影响其传播的深度、广度与质量。在红色文化传播的渠道方面,在自媒体时代也同样有着不足,一方面,在主流和权威平台对于红色文化的输出有一定的限制,形式相对有些落后,相对年轻的受众的使用习惯的平台存在一定的脱节。另外一方面,红色文化传播阵地还是线下大于线上,没有能够将红色文化的内容与现阶段短视频,直播等形式结合起来,导致红色文化在新媒体生态中渠道占有率不足、曝光度不高,进一步削弱其传播竞争力。

(四) 红色文化传播受众结构不足

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仅需要传播主体主动输出,也需要充分考虑受众的真实需求。当前,红色文化的传播仍以单向灌输式教育为主,受众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这不利于其传播效果的提升。仅依靠红色文化自身的吸引力难以形成良好的传播氛围,更需要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形成互动式、参与式的传播格局。从受众结构来看,红色文化的主要接受群体仍集中在中老年群体,即便在自媒体时代,这一特征依然明显。而对于 00 后、10 后乃至 20 后而言,他们成长于和平稳定的时代,与红色文化所承载的革命历史经验存在距离,难以从情感上产生共鸣。加之目前的红色文化内容呈现方式较为说教化、政治性和目的性较强,使得年轻群体的兴趣难以提升,进一步加大了红色文化传播的难度。长期来看,这可能导致红色文化的受众不断缩减,甚至出现受众流失的风险,使红色文化的代际传承面临挑战。与此同时,港澳台地区同胞以及国际社会对红色文化的认知也存在一定不足。虽然在自媒体时代信息交流更加便捷,但由于缺乏共同的思想与政治认知基础,红色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仍面临障碍,也为其“走出去”带来了不小压力。

三、红色文化在自媒体时代的实践策略

(一) 构建系统化叙事体系,整合红色文化资源

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赓续发展,离不开红色文化在精神塑造、价值凝聚与历史记忆中的独特作用。红色文化不仅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历程,更在当代社会中承担着培根铸魂、凝心聚力的重要使命。因此,保护、传承与创新性传播红色文化,是新时代文化建设中的基础性环节。然而,在自媒体迅速发展、信息快速流动的背景下,平台上充斥着大量碎片化的内容,红色文化常常被拆解成零散的节点,以猎奇、情绪化的方式呈现,甚至出现断章取义、过度娱乐化的倾向。这种传播方式削弱了红色文化本应具有的历史厚度与精神深度,使受众难以获得完整连贯的认知链条,进而阻碍了红色文化的健康发展。针对这一问题,迫切需要构建系统化的红色文化叙事体系,对现有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将分散在各类媒体中的历史事件、人物故事、精神价值与文化意蕴以结构化方式重新编织,形成内容完整、逻辑清晰、表达准确的叙事框架。只有通过系统化整合,才能让红色文化从“碎片化呈现”转向“整体性理解”,让受众在观看短视频、阅读图文或浏览专题时,能够沿着明确的历史脉络与价值线索建立起深层认知。这不仅有助于提升红色文化的传播质量,也能强化其在青年群体中的认同与感召力。

与此同时,自媒体平台作为内容的主要承载空间,也必须主动发挥责任与作用。平台应通过优化算法推荐机制、规范内容审核标准、搭建主题化知识链接等方式,为系统化叙事提供更友好的传播环境。通过平台、创作者与内容体系的共同作用,红色文化才能在自媒体时代实现更广阔、更深刻、更具影响力的传播,使其精神力量真正融入当代社会生活,成为推动中华文化赓续发展的重要源泉。

(二) 优化技术赋能机制,破解技术异化瓶颈

在自媒体语境下,红色文化正由传统的物质资源向丰富的线上精神资源转型,数字化传播与推荐机制既拓展了其触达路径,也带来了技术异化的风险。所谓技术异化,主要表现为算法驱动下的流量至上、内容扁平化与信息茧房效应,使得高质量的红色文化内容在竞争中被边缘化。为突破此瓶颈,必须从技术治理、算法优化与内容赋能三方面协同发力。首先,平台应承担技术治理责任,建立包含文化价值评价在内的推荐准则,对低俗化与史实扭曲内容加强审核,并通过流量倾斜、激励扶持等机制提升优质红色内容的可见度。其次,应增强算法的可解释性与透明度,将内容质量、教育意义等作为算法评分维度,避免单一以点击率为导向的权重分配。同时,倡导构建红色文化知识图谱与多模态识别体系,提高算法对红色语义的识别能力,进而实现更高匹配度的精准推送。再次,针对信息茧房问题,应在推荐策略中引入多样性与弱关联推荐机制,通过跨领域联动和纪念日专题等场景化推送,逐步将非关注群体纳入覆盖范围。最后,创作者应把算法视为传播工具而非流量压力,结合数据分析优化内容结构,提升叙事深度与情感共鸣,以技术赋能内容品质。综上,只有在平台治理、算法设计与内容生产三者并举的前提下,方能将技术从“异化因子”转化为红色文化传播的持续动力,促进红色价值在数字生态中的再

生产与社会认同。

（三）提高红色文化供给能力，拓宽传播渠道

优秀的文化供给是确保红色文化有效传播的前提，而多元化的供给渠道则是其广泛覆盖的关键条件。目前，自媒体环境下红色文化内容的供给能力仍存在明显不足：一方面，平台的准入门槛较低，缺乏统一、系统的审核机制，使得传播主体的专业素养参差不齐，导致部分内容难以准确诠释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甚至可能因理解偏差造成价值传递的弱化。对此，平台应从源头上强化治理，建立更严格的资质审核体系与内容质量评估机制，对传播者的文化素养、政治立场、价值导向进行必要的把关，以提升内容供给的整体质量。与此同时，强化红色文化传播队伍建设同样至关重要。在人人皆可成为内容生产者的时代，具备理论深度和文化理解力的教师队伍与党员干部队伍仍然是最核心、最权威的传播力量。他们不仅对红色精神具有系统的理解，也能够自媒体语境下将抽象理论转化为生动表达，更易实现内容的深度传播。此外，引入专业化人才、打造内容创作梯队，也是提升供给能力的重要途径。平台可通过流量扶持、创作激励、培训等机制，为高校学者、文化研究者、宣传工作者等专业群体提供展示平台，从而吸引更多高质量供给者持续参与红色文化内容的生产。

在传播渠道方面，除了传统图文与影像之外，还应积极拓展适应新媒体生态的表达方式。例如直播、短视频、互动问答、沉浸式虚拟空间等形式，都已在不同领域展现出强传播力和高触达率。以直播为例，其即时性、互动性和沉浸感能够增强受众参与度，使价值传播从“单向讲述”转变为“互动交流”。这种传播方式特别适合触达年轻群体，有助于缩短红色文化传播与年轻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综上，从供给端、队伍建设与渠道拓展三方面协同推进，才能构建起兼具专业性、吸引力与传播力的红色文化传播体系。

（四）完善红色文化传播受众结构，推动红色文化大众化传播

针对红色文化在自媒体时代受众不足方面，现在应让红色文化传播更加“年轻化”，在自媒体时代，受众结构呈现出多元化、年轻化和兴趣导向化的特点，因此完善红色文化传播的受众体系，需要从受众细分、内容适配以及互动机制等方面进行优化。首先，应根据年龄、教育背景、媒介使用习惯等对受众进行科学分层，为不同群体定制差异化的传播策略。对于中老年群体，可保持传统叙事方式的稳定性；对于年轻受众，则应通过短视频、动漫化叙事、故事化表达等形式增强吸引力，使红色文化以更轻松、更具代入感的方式被接受。其次，必须正视算法的双刃剑效应：利用推荐机制扩大优质红色内容触达的同时，要求平台优化推荐策略以避免“信息茧房”与同质化竞争。配套机制还应包括事实核查、权威来源标注与传播效果监测。最后，建立制度性支持与长期培育路径：在校园、社区及主题展演中与自媒体联动，开展红色主题 IP 打造与长期激励，以形成从接触、理解到认同和传播的闭环，最终在自媒体生态中形成稳固且可持续的红色文化受众基础。

五、总结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逻辑主线，系统揭示了人类社会由分散走向整体、由民族历史迈向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本文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从全球化的本质、利弊及其应对路径等方面，进一步阐明了该理论在当代的解释力与现实价值。

首先，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深刻揭示了当代全球化的内在本质。全球化并非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生产力发展和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在当代的具体体现。通过这一理论视角，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其背后仍然贯穿着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

其次，该理论为全面分析全球化的双重效应提供了科学工具。一方面，全球化推动了资源配置优化、技术创新扩散以及国际合作深化，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全球化也加剧了贫富差距、生态危机及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这种“进步与矛盾并存”的特征，体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辩证性。

再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应对当代全球化挑战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全球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各国必须突破封闭思维，积极融入全球发展体系，同时通过多边合作机制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问题。此外，该理论还为推动国际秩序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助于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最后，从更深层次来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不仅是分析全球化的重要工具，更是指导当代社会发展的理论指南。它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全球化深度演进与世界格局加速变革的当下，深入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于把握时代发展方向、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也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展现出持续的理论生命力与实践

指导意义。未来,应进一步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该理论的研究与创新运用,以更好地回应全球化进程中的复杂问题,推动人类社会向更加公平、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6-518.
- [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36.
-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74.
- [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7-38.
- [5]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2-43.
- [6]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5.
- [7]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
- [8] 秦龙,刘禹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耦合——历史、理论与实践[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52-62.
- [9] 王公龙.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语境中的全人类共同价值[J].学术月刊,2022,54(7):5-17.
- [10]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4.
- [11] 陈曙光.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改变世界[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2):75-88.

Research on the Dissemination Dilemmas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of Red Culture in the Self-Media Era

Yi Haoyu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Henan, China

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emphasized that “it is essential to preserve and make good use of red resources, strengthen education in revolutionary traditions and patriotism, guide cadres and the public to carry forward fine traditions, inherit the red gene, practice core socialist values, and cultivate new social trends for the new era.” The development of short-video platforms and the self-media ecosystem has provided broader channels and higher reach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red culture. However, it has also exposed problems such as fragmented communication, content homogenization, and formalistic tendencies. In this context,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red cultural resources, optimize technological and recommendation mechanisms, enhance the supply capacity of red cultural content, and build an ecosystem conducive to the healthy inheritance of red culture, thereby more effectively consolidating political identity and promoting the value-guiding and moral-educating functions of red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the self-media era, the public’s 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culture are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Red culture, as an advanced cultural form developed and transmit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rough its revolutionary,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practices, embodies spiritual strength in firm belief, strengthened conviction, and collective confidence, and carries rich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and contemporary value. Within the context of self-media, the dissemination of red culture faces both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diversified communication modes. To fully leverage the role of red culture in cultivating moral character and enhancing cultural confidence, it is imperative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its dissemination and explore effective practical strategies in the self-media era.

Keywords: self-media era; red culture; practical pathways

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价值意义研究

刘倩倩¹, 范秋茫¹

(1.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 文章深入剖析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探讨其在当代的价值意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的发展阐述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该理论不仅是理解全球化本质的关键, 为认识当代世界格局提供理论基石, 还对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对这一理论的研究, 能更好地把握时代发展脉络, 为解决当代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 马克思; 世界历史理论; 价值意义; 全球化

DOI: doi.org/10.70693/202608180020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当代背景下, 如何从理论层面科学理解人类社会由“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发展逻辑, 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议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根本线索, 系统揭示了人类社会从分散走向整体、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发展规律, 为认识世界历史进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1][8][9]。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 随着生产方式的进步与交往范围的扩大, 各民族之间原有的封闭状态不断被打破, 历史逐渐转变为世界历史[1]。这一转变并非源于抽象的精神活动, 而是以物质生产的发展为根本动力。进一步而言, 《共产党宣言》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通过开拓世界市场, 使生产与消费具有世界性特征, 从而推动各民族之间形成广泛的相互依赖关系[2][4][5]。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不仅加速了全球市场的形成, 也使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 从而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与此同时,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 指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冲突, 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指出, 当生产资料的集中与劳动的社会化发展到与资本主义外壳相冲突的程度时, 现存制度必然发生变革[3]; 而《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则进一步表明这一矛盾的现实表现[4]。这一矛盾运动不仅制约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也孕育着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 人民群众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 通过实践不断推动社会结构的变迁与世界历史的发展。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强调, 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是历史的创造者[6], 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进一步指出, 无产阶级在历史变革中的重要使命[7]。随着历史的发展, 人民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逐渐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与制度变革的关键力量[5]。

从整体上看, 世界历史呈现出明显的整体性与矛盾性特征。一方面, 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的推进, 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 逐步形成相互依存的整体结构; 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也伴随着阶级剥削、民族压迫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等多重矛盾, 这些矛盾在不同历史阶段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 构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张力[8][9][11]。

在当代背景下, 世界历史的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交织并存, 各国联系更加紧密同时风险挑战也更加复杂[10]。在这一现实语境下, 重新审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对于把握全球发展趋势、理解世界格局演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基于上述理论背景, 本文以马克思经典著作作为理论依据, 系统梳理世界历史理论的内涵, 从历史转变的根源、发展动力、主体力量及其本质特征等方面展开分析, 旨在深化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解, 并为认识当代全球

作者简介: 刘倩倩 (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范秋茫 (1989—),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通讯作者: 刘倩倩

化发展提供理论参照。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理解当代全球化的价值

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和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在当代,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贸易、资本流动、技术传播和人员往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帮助我们认识到,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生态环境恶化、文化冲突等。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这些矛盾依然存在并呈现出新的特点。理解这些矛盾,有助于我们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保持清醒认识,采取合理策略维护自身利益。

(一) 揭示全球化的本质

当代全球化现象的本质可以通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得到深刻揭示。全球化实际上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在当代的具体表现形式。从经济领域来看,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8]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组织生产和销售,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

然而,这种全球化的经济体系背后,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表现就是贫富差距的扩大、经济危机的跨国传导等问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让我们认识到,全球化并非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其本质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

(二) 分析全球化的利弊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分析全球化的利弊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该理论揭示了全球化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生产力发展与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全球化确实带来了诸多积极影响,其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表现,本质上是人类交往实践突破地域限制的重要体现。它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与产业链分工,促进了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以东南亚电子组装业为例,当地凭借丰富劳动力资源嵌入全球产业链,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在技术领域,全球化构建的开放创新网络加速了科技的传播和创新,国际空间站项目集合了16个国家的科研力量,充分彰显了全球化背景下协同创新的巨大潜力。

另一方面,马克思关于资本扩张逻辑的论断深刻解释了全球化的矛盾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蔓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导致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最富有的1%人口掌握着全球近50%的财富,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的人均GDP长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这种不平衡发展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低端锁定”困境,例如拉美国家因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在国际分工中逐渐被边缘化。同时,跨国资本主导的生产模式还引发了全球性生态危机,亚马逊雨林因商业伐木和农业开垦以每年约1.5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消失,印证了马克思“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矛盾在生态领域的尖锐化。

在文化层面,马克思强调的“世界文学”概念揭示了文化交流的双重性。当前,好莱坞电影、社交媒体平台等西方文化载体借助全球化实现强势传播,英语内容在互联网信息总量中占比超50%,导致非英语国家的本土文化面临被稀释的风险。但同时,世界历史理论也提醒我们,文化碰撞中蕴含着新的发展机遇,如韩国K-pop文化通过融合东西方元素,在全球掀起“韩流”热潮,展现了弱势文化在交流中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可能。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让我们能够全面、客观地看待全球化,既看到其积极的一面,也认识到其存在的问题,从而为制定合理的应对策略提供依据。在实践层面,这种辩证分析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时,既积极利用国际资源提升发展水平,又通过建立多边合作机制防范风险,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三) 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启示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曾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9]这种历史趋势在当代以全球化的形态具象化呈现。从18世纪蒸汽机推动的商品全球化,到21世纪数字技术驱动的生产要素全球化,历史发展的轨迹印证了马克思论断的前瞻性,因此我们必须摒弃封闭保守的思维定式,主动融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与价值链。

在应对全球性问题层面,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愈发凸显。以气候变化为例,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已升高1.4℃,这种生态危机本质上是资本全球化扩张导致的生产方式异化。

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的“异化劳动”理论，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将自然降格为掠夺对象，引发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连锁反应。破解这类跨国界危机，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巴黎协定》《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多边机制，推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变革。

在国际秩序重构方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批判更具现实意义。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仍带有殖民时代的权力印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机制中，发达国家仍掌握着70%以上的投票权，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常被边缘化。这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的“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的资本逻辑一脉相承。发展中国家应当依托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国际组织，构建更包容的全球治理架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破了传统国际分工中的中心-外围格局，为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实践样本。通过这些路径，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推动全球发展从失衡走向均衡。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在当代社会，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制定发展战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分析社会发展趋势和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支持。我们应不断挖掘和阐发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意义，将其与当代实践相结合，为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一）为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提供理论依据

理论强调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这为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在当代社会，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科技等联系越来越紧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因此，各国应该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观念，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在经济领域，要加强贸易往来和投资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在文化领域，中国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10]，各国要加强文化交流与互鉴，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融合。在科技领域，要加强科研合作，共同攻克全球性的科技难题。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各国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

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使得人类社会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在当代，生态环境问题、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控、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认识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和共同利益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思想基础。

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中的剥削和压迫关系，主张建立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在当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摒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各个领域的平等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例如，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各国应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携手应对气候变化，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

（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始终贯穿着对人的发展的关注，他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为个人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条件，它打破了地域和民族的局限，使人们能够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和思想，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人的发展又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只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世界历史的进步。在共产主义社会，世界历史将成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舞台，每个人都能够在社会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这种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标志着世界历史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该理论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发展的根本性束缚。在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体系中，私有制不仅造成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更通过异化劳动将人异化为资本增值的工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人的类本质及他人的四重异化，使劳动从“人的生命活动”蜕变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这种异化在全球化时代呈现出新特征——跨国公司的资本扩张将剥削关系延伸至世界范围，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在

国际分工中陷入“低端锁定”困境，进一步加剧了人的发展片面化。

马克思为破解这一困境指明方向：消灭私有制、变革旧式分工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根本路径。这一构想在巴黎公社的实践中初见端倪，工人阶级通过接管工厂、建立民主管理机制，初步展现了劳动者自主掌控生产资料的可能性。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通过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巩固与新型劳动关系的构建，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与市场经济活力相结合，为劳动者在价值创造中实现自我价值提供制度空间。

教育作为人的发展的关键杠杆，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占据特殊地位。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强调，教育应打破阶级垄断，成为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工业革命时期英国通过《工厂法》强制推行童工教育，德国建立全民义务教育体系，这些历史实践印证了教育普及对提升劳动者素质的积极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我国推进的“双减”政策、职业教育改革以及终身学习体系建设，正是通过教育公平化与多元化，培育兼具专业技能与人文素养的复合型人才。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还需系统性的制度保障。中国构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既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又通过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战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为个体发展创造更广阔的空间。历史与现实共同证明，唯有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理念转化为具体制度实践，才能真正构筑起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坚实基石。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透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思想工具。该理论通过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机制的系统性阐释，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资本扩张逻辑及人类实践主体作用三个维度，构建起理解当代全球化现象的理论范式。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置于世界历史的宏观视域下考察，揭示了个体解放与人类解放、特殊历史进程与普遍历史规律之间的本质关联。在全球化深度重构世界秩序的当下，深化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学术研究与现实观写照，不仅有助于把握人类文明演进的内在逻辑，更对破解当代社会发展困境、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核心作用的体现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不仅在理论层面对全球化现象作出深刻阐释，更在当代社会发展实践中展现出多维度的核心作用。其价值不仅体现在解释世界历史进程的规律性，更在于为认识现实问题、指导实践路径以及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根本性理论支撑。

首先，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核心作用体现为对全球发展趋势的科学引领。该理论以生产力发展和交往扩展为逻辑起点，揭示了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的历史必然性。这一理论框架使我们能够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视角理解当代全球化的演进逻辑，认识到各国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深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因此，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该理论有助于增强对世界发展方向的判断力，避免片面化和短视化的认识偏差。

其次，其核心作用体现在对现实矛盾的深刻批判与分析功能。马克思通过揭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构建了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理论工具。在当代，这一理论仍然能够有效解释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扩大、发展不平衡以及生态危机等问题的根源，使人们能够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这种批判性功能不仅有助于揭示问题，更为探索解决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

再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实践层面的核心作用表现为对社会发展路径的指导意义。该理论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突出人的实践活动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当代社会，这一思想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各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发展与公平、效率与正义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方法指导。同时，该理论关于世界整体性的思想，也为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重要支撑。

此外，该理论还在价值层面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马克思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最终目标，这一价值取向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了根本尺度。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不仅要追求经济增长，更应关注人的发展质量与社会整体进步，从而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这种价值导向，有助于推动全球发展从单一经济逻辑向更全面、协调与可持续的方向转变。

最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作用还体现在其理论的开放性与时代适应性。尽管该理论产生于19世纪，但其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和基本矛盾，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通过将其与当前全球化实践相结合，可以不断拓展其理论内涵，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持续发挥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核心作用，集中体现为对发展趋势的引领、对现实问题的批判、对实践路径的指导以及对价值目标的规范。这些作用共同构成了该理论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也进一步彰显了其跨越时空的理论生命力。

五、总结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逻辑主线,系统揭示了人类社会由分散走向整体、由民族历史迈向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本文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从全球化的本质、利弊及其应对路径等方面,进一步阐明了该理论在当代的解释力与现实价值。

首先,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深刻揭示了当代全球化的内在本质。全球化并非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生产力发展和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在当代的具体体现。通过这一理论视角,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其背后仍然贯穿着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

其次,该理论为全面分析全球化的双重效应提供了科学工具。一方面,全球化推动了资源配置优化、技术创新扩散以及国际合作深化,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全球化也加剧了贫富差距、生态危机及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这种“进步与矛盾并存”的特征,体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辩证性。

再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应对当代全球化挑战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全球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各国必须突破封闭思维,积极融入全球发展体系,同时通过多边合作机制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问题。此外,该理论还为推动国际秩序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助于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最后,从更深层次来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不仅是分析全球化的重要工具,更是指导当代社会发展的理论指南。它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全球化深度演进与世界格局加速变革的当下,深入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于把握时代发展方向、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也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展现出持续的理论生命力与实践指导意义。未来,应进一步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该理论的研究与创新运用,以更好地回应全球化进程中的复杂问题,推动人类社会向更加公平、协调与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8.
-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1-32.
-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74.
- [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6-27.
- [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3.
-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7.
-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
-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4.
-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94.
- [1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63.
-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2.

Research on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Marx's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Liu Qianqian¹, Fan Qiumang¹

1.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Henan,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Marx's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and explores its value and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Marx's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reveals the objective laws gov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expoun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y into world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dvance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communication. As a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of globalization, this theor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recognizing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attern; i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progress of human society and realizing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theory, we can better grasp the context of the time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solving many problems faced by contemporary society.

Keywords: Marx;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Value and Significance; Globalization

浅析徽派建筑风格的时代演变与文化基因

李凯奇

(黑龙江大学 艺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本文聚焦于徽派建筑风格形成原因并对此展开深入探讨。开篇对徽派建筑的外观造型、装饰艺术及空间布局进行简要介绍, 呈现其独特风貌。接着梳理徽派建筑在不同朝代的发展脉络, 东晋至唐为萌芽期, 宋到元为发展期, 明至清则达鼎盛阶段。随后着重分析儒家、道家、程朱理学及徽商文化对徽派建筑发展的深刻影响, 揭示文化因素在建筑风格塑造中的关键作用。最后阐述近代徽派建筑的发展状况, 涵盖新材料、新工艺的运用, 新文化的融入以及人们新需求的体现等方面。通过对徽派建筑从传统到近代的多维度研究, 力求全面呈现徽派建筑风格形成的复杂原因及发展演变过程。

关键词: 徽派建筑; 风格成因; 历史演进; 文化影响

DOI: doi.org/10.70693/202608237562

一、引言

徽派建筑是我国传统建筑中极具特点, 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类型之一, 凭借着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而为世人所知。徽派建筑主要聚集分布在古徽州地区, 也就是现在的安徽黄山市、绩溪县及江西婺源县, 其独特的建筑特点也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纵观徽派建筑的整个发展历程, 我们可以看出它风格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经过漫长演变, 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 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 根深蒂固的信仰, 曾经极度繁荣昌盛的徽商经济, 包括不断发展的技术工艺, 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 共同塑造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独特的徽派建筑的风貌, 这些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演变。本文则着重于从不同时期人们所受到的不同思想对徽派建筑形式的影响进行探究分析, 深入研究徽派建筑风格形成与演变, 旨在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 以及为现代建筑设计提供灵感和借鉴具有重要意义。

二、徽派建筑的风格特点

(一) 外观造型

徽派建筑最为标志性的特征是青瓦白墙和错落有致的马头墙。徽派建筑一般使用青瓦铺顶, 墙体多采用白色粉刷, 青色与白色的搭配, 给人一种简洁明快、清新淡雅的感觉, 营造出一种宁静、质朴的感觉。这种色彩搭配不仅仅与江南水乡湿润的气候环境相匹配, 同时又与周边的自然山水景观相得益彰, 远远望去仿佛一幅淡雅的水墨画, 这也充分地体现了古徽州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与融合。马头墙是徽派建筑的标志性元素之一, 又被人们称为是防火墙、防火墙。马头墙的建造最初则是为了防止火灾蔓延而设置。马头墙拥有众多丰富多样的造型, 有一阶、二阶、三阶甚至更多阶, 墙头通常呈阶梯状层层跌落, 墙头的端部因其酷似马头, 故而得名。马头墙除了防火这一实用功能之外, 马头墙的高低错落和起伏变化, 打破了建筑墙面的单调感, 从而使建筑轮廓更加富有韵律和节奏感。在徽州的村落中, 马头墙错落有致, 远远望去犹如万马奔腾, 气势恢宏。这也使得马头墙成为徽派建筑独特的视觉符号。

(二) 装饰艺术

除了建筑外部青瓦白墙这一特点之外, 徽派建筑的装饰艺术堪称一绝。木雕、石雕、砖雕被誉为“徽州三雕”, 是徽派建筑装饰的主要形式, 正是凭借着其精湛的工艺和丰富的题材, 为徽派建筑增添了浓郁的艺术气息和文化韵味。徽州工匠们运用地产的砖木、石等材料施艺于梁架、门窗、栏板、屋檐并赋予特定的思想内涵于其中形成了徽州建筑装饰精美细腻纤巧, 雅致的艺术风格^[1]。其中木雕主要应用于建筑的梁枋、斗拱、雀替、门窗等部

作者简介: 李凯奇(2001—),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历史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

位。匠人通过使用圆雕、浮雕、透雕等多种技法,将人物故事、神话传说、花鸟鱼虫、吉祥图案等题材雕刻在木质构件上。这些木雕作品线条流畅、造型逼真、层次分明,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还起到了很好的装饰作用。

徽州地区石材资源丰富,这也为石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石雕则体现在建筑的基础、门罩、栏杆、柱础等部位。石雕作品题材广泛,常见的有龙凤呈祥、狮子滚绣球、梅兰竹菊等传统图案,还有反映日常生活场景的作品。其雕刻风格粗犷豪放又不失细腻,与建筑的整体风格相协调。

砖雕则主要是装饰在建筑的门楼、门罩、屋檐、墙面等部位。砖雕是匠人在特制的青砖上进行雕刻,其制作工艺相对来说较为繁琐,需经过选砖、制模、雕刻、烧制等多道工序。砖雕作品的选材也是极其丰富,包括历史故事、戏曲人物、花鸟走兽等,其雕刻技法细腻,线条流畅,造型逼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徽州的许多古村落中,都能看到精美的砖雕门楼,它们往往是整座建筑的点睛之笔,展现了徽派建筑的精致与典雅。

徽派建筑在空间布局上也是极其讲究,十分注重与自然环境的融合,遵循着古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村落选址上,徽派建筑大多选择依山傍水的地方,利用自然地形地貌,对建筑布局进行巧妙规划,使建筑与山水、田园相互映衬,形成和谐统一的整体。除此之外,庭院空间也是徽派建筑空间布局的一大特色。徽州民居平面多作内向方形布局,面阔三间、明间厅堂、次间卧室,左右对称。围绕扁长形的天井构成三合院基本单元。三合院布局体现了封建制度的制约^[2]。庭院一般位于建筑的中心位置,既是承担是家庭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室内和室外空间过渡的关键区域。庭院的面积通常不大,但在布局上却极为精巧,往往能体现出一个家庭的品味。通过设置花坛、水池、假山、回廊等元素,营造出宁静、雅致的空间氛围。庭院的存在不仅为居住者提供了一个亲近自然、休闲娱乐的空间,同时还起到了采光、通风、排水等实用功能。庭院中的建筑装饰和植物配置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寓意,如在庭院中种植梅、兰、竹、菊等植物,也是房屋主人高尚品德和高雅情趣的象征。徽派建筑的内部空间布局也是非常严谨的,采用的是中轴线对称的形式,以厅堂为中心,向四周展开。厅堂是整个家庭举行祭祀、庆典、社交等活动的重要场所,通常位于建筑的正中央,整个空间高大宽敞,装饰精美。厅堂的两侧一般为卧室、书房、厨房等生活用房,各房间之间通过走廊、天井等相互连通,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空间布局极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和等级制度,强调了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伦理秩序。

三、徽派建筑在不同时期的演变和发展

(一) 萌芽时期(东晋——唐)

徽派建筑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北方士族为了躲避战乱,携带者家眷向南迁移,同时也为南方的居民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建筑技术和文化。这一时期,建筑最主要的功能还是仅仅为了满足人们的居住需求,房屋的建造极大程度的受当地自然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因此风格较为质朴。除了先进的技术之外,中原文化与当地的本土文化相互融合,这一隐性因素也为徽派建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建筑形式上,徽派建筑继承了中原传统建筑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四合院式的布局、中轴对称的设计等。同时,又结合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生活习俗,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徽派建筑风格。唐代时期,社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徽派建筑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唐朝的建筑风格雄浑大气,注重建筑的尺度和比例,对徽派建筑产生了一定影响,使得徽派建筑在规模上有所扩大。

(二) 发展时期(宋——元)

到了宋代,随着宋代理学的兴起,也为徽派建筑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在建筑布局和装饰上的体现逐渐明显,建筑布局开始注重对称和秩序,装饰题材更加丰富,体现了道德伦理和文化教育的内涵。同时,道家思想在建筑选址和与自然融合方面的影响也在不断深化。这一时期徽派建筑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特征,思想与建筑的融合更加紧密。元代时期,全国局势相对稳定,徽州地区虽远离政治中心,但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优势,较少受到战乱的直接冲击,社会经济得以平稳发展。这为徽派建筑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相对安定的环境和必要的物质基础。在这一时期,徽派建筑在继承前代建筑传统的基础上,逐渐融入当地的文化和自然元素。建筑整体风格较为质朴,造型简洁,注重实用性。受传统建筑理念的影响,木构架体系依然是建筑的主要结构形式,采用抬梁式和穿斗式相结合的方式,确保了建筑的稳定性和坚固性。建筑装饰方面开始出现一些简单的雕刻和彩绘。雕刻题材以几何图案、花卉等较为简洁的元素为主,雕刻工艺相对简单,刀法质朴,主要起到基本的装饰点缀作用。彩绘颜色也较为单一,多以青、绿等冷色调为主,色彩搭配相对简洁,与建筑整体的质朴风格相契合。这些简单的装饰手法,虽然在工艺和题材上不及后世丰富,但为明清时期徽派建筑精湛的装饰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 鼎盛时期(明——清)

明清时期徽派建筑达到鼎盛,商业文化的繁荣为建筑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持。儒家思想、程朱理学在建

筑中的体现更加深入和全面, 家族观念和道德规范通过建筑布局和装饰得到强化。徽商的财富使得建筑规模不断扩大, 装饰工艺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同时, 商业活动带来的文化交流使徽派建筑吸收了更多外来元素, 进一步丰富了其风格内涵。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对徽派建筑的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徽派建筑成为多种思想文化交织的结晶。明代中叶以后, 徽商逐渐崛起, 在他们致富后, 纷纷回乡大兴土木, 建造豪华的私宅、宗祠和牌坊等建筑, 为徽派建筑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持。建筑布局更加注重与自然环境的融合, 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

到了清代, 徽派建筑的发展更是繁荣鼎盛, 精益求精。清代, 徽商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 在商业领域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徽商对建筑的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们不惜重金打造各种建筑, 力求在规模、工艺和装饰上达到极致, 使得徽派建筑迎来了最为辉煌的鼎盛时期。建筑规模更加宏伟壮观, 不仅体现在单体建筑的体量增大, 而且在建筑群的布局上更加注重整体性和协调性。建筑类型也更加丰富多样, 除了传统的民居、祠堂、牌坊外, 还出现了许多园林、书院、会馆等建筑。这些建筑各具特色, 功能明确, 满足了不同的社会需求。

四、徽派建筑风格发展过程中的思想影响

徽文化涵盖了徽州建筑、徽州菜系、徽州戏曲、宗法礼仪、徽商文化、新安理学(程朱理学的分支之一, 该学派由徽州理学家建立)等各个方面。徽文化具有独特的人文思想及较强的伦理观念, 同时注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 这些文化内涵正是受到了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而皖南地区淳朴的民风也赋予了徽文化一定的地域特色。正是在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徽文化不断发展成熟^[3]。

(一) 儒家思想与徽派建筑布局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其深厚的思想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精神。徽州文化主要是一种移民文化。南迁的中原大族将中原文化移植到徽州, 成为当地主流文化。这些衣冠巨族本来就有着强烈的宗法观念、严密的宗族组织, 迁入徽州后, 出于生存的需要和文化的传承, 他们极力维护、巩固原有的宗法制度, 于是, 聚族而居、尊祖敬宗、崇尚孝道、讲究门第逐渐成为徽州社会风尚^[4]。儒家文化在徽州地区有着深厚的根基, 对徽派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强调尊卑有序、长幼有别, 这种观念在徽派建筑的布局和装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 在徽派民居中, 正厅是家庭活动的中心, 也是祭祀祖先和接待重要宾客的场所, 其位置往往处于整个建筑的中轴线上, 且建筑规模较大, 装饰最为精美。而晚辈的住房则分布在正厅两侧或后方, 规模相对较小。此外, 徽派建筑中的木雕、石雕、砖雕等装饰题材, 很多都取自儒家经典故事和历史传说, 如“二十四孝”“文王访贤”等, 通过这些装饰, 向家族成员和后人传递着儒家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

儒家思想强调“礼”, 注重社会秩序和家族等级。在徽派建筑布局中, 这种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徽派建筑多以家族为单位进行布局, 形成大规模的村落。村落中的建筑通常围绕祠堂展开, 祠堂是家族祭祀、议事的重要场所, 位于村落的中心位置, 体现了家族的核心地位。民居建筑则按照辈分、亲疏关系有序排列, 形成严格的空间秩序。例如黟县西递村, 整个村落以敬爱堂为中心, 其他民居沿道路向四周延伸, 布局规整。民居内部的空间布局也遵循儒家礼仪, 一般分为前堂、中堂和后堂, 前堂用于接待宾客, 中堂供奉祖先牌位, 是家族活动的核心区域, 后堂则是居住空间。这种布局体现了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家族伦理观念。

(二) 道家思想与徽派建筑的选址与环境融合

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其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亦对徽派建筑风格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徽派建筑注重与自然环境的融合, 巧妙地将山水、树木等自然元素引入建筑空间, 从而营造出一种宁静、和谐的氛围, 体现了道教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例如, 在徽派建筑中的园林设计, 就常常以自然山水为底, 通过山水的堆叠、植树种花等手法, 打造出小巧精致、富有诗意的园林景观, 让人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之中。除此之外, 道教中的风水观念也在徽派建筑的选址和布局中有所体现。徽派建筑在选址时, 往往会考虑地形、地貌、水源、风向等因素, 力求选择一个风水宝地, 以求得家族的兴旺发达。

道家主张“天人合一”,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徽派建筑在选址上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 多选择山水秀丽之地, 依山傍水而建。徽州地区拥有着丰富的山水资源, 徽派建筑巧妙地利用自然地形, 将建筑融入山水之间。建筑的白墙黑瓦与青山绿水相互映衬, 形成优美的田园风光。以宏村为例, 宏村的选址和布局就是道家思想的典型体现。宏村在建设时就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破坏, 如当时在建造人工水系时就顺应原有的水系而建成了水圳, 并没有挖掘破坏原有的河流水系。宏村中的古屋、院子、花园、河流、老树与周边优美的自然环境相互融合、相互渗透, 使宏村犹如一幅水墨画, 真正做到村落与自然的和谐统一^[5]。宏村背倚雷岗山, 前临南湖, 整个村落按照牛形布局设计。以雷岗山为牛头, 村口的两棵古树为牛角, 村内的月沼为牛胃, 水圳为牛肠, 南湖为牛肚, 民居建筑为牛身。这种布局不仅巧妙地利用了自然水源, 解决了村民的生活用水和灌溉问题, 还使整个村落与自然

环境融为一体，达到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境界。

（三）程朱理学与徽派建筑装饰

程朱理学在徽州地区影响深远，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徽州作为程朱理学的发源地，当地百姓对程朱理学有着深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南宋至明代前期，徽州传统学术文化由始兴而发展到极盛，形成了统一的学术文化理念。这一理念的内核，具体来说，就是朱子之学^[6]。因此在建筑营造中自然会融入理学理念。程朱理学强调道德伦理和纲常名教，徽派建筑装饰通过各种题材的雕刻、彩绘等艺术形式，将这些思想观念传达给人们。在建筑装饰题材上，出现了大量以儒家经典故事、二十四孝等为主题的图案，如“岳母刺字”“卧冰求鲤”等，这些图案雕刻在门楼、梁枋、斗拱等部位，时刻提醒人们要遵守道德规范，弘扬孝道。同时，徽派建筑装饰中也注重对文人雅士生活场景的描绘，如琴棋书画、梅兰竹菊等，体现了对文化修养和高雅情趣的追求，这也是程朱理学中重视文化教育思想的体现。

（四）徽商文化与徽派建筑的发展演变

除此之外，徽商文化对徽派建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商居四民之末，徽州商人没有显赫的政治地位，虽然腰缠万贯，盖房也不敢违背封建等级规定，只能在室内装饰上尽量讲究，从而使得徽州三雕艺术在建筑装饰中得到广泛应用与迅速发展^[7]。明清时期，徽商崛起，徽商积累了大量财富后，纷纷回乡建造豪宅，使得徽派建筑在规模和装饰上更加豪华精美。徽商十分注重家族荣耀和光宗耀祖，不惜重金打造建筑，以显示家族的财富和地位。因此在这一时期，徽派建筑的门楼、天井等部位的装饰更加精致繁复，采用了大量的木雕、石雕、砖雕等工艺，题材丰富多样，技艺精湛绝伦。例如黟县卢村的木雕楼，整座建筑的木雕装饰精美绝伦，从人物、花鸟到山水、楼台，无不栩栩如生，展现了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对建筑艺术的追求。

同时，徽商的商业活动也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流，徽派建筑吸收了其他地区建筑的一些元素，如在建筑结构上借鉴了江南园林的一些手法，使徽派建筑更加富有变化和特色。村落选址多依山傍水，巧妙利用地形地貌，使建筑与山水、田园相互映衬，形成和谐统一的整体。建筑造型上，马头墙开始广泛应用并逐渐成为徽派建筑的标志性元素。马头墙的出现不仅具有防火、防风等实用功能，还打破了建筑单调的天际线，使建筑轮廓更加富有变化和韵律感。随着建筑需求的增加和技术的不断进步，明代徽派建筑在技术方面有了显著创新。在木构架技术上，工匠们对梁、柱、斗拱等构件的制作和安装工艺进行了改进，使其更加精细和科学。同时，为解决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问题，建筑在防水、防潮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采用高地基、铺设防潮层等。此外，天井的设计更加完善，天井不仅能够采光、通风、排水，还蕴含着“四水归堂”的文化寓意，象征着财富的汇聚。

砖雕、木雕、石雕等装饰工艺逐渐成熟，题材更加丰富多样。除了传统的几何图案和花卉外，开始出现人物、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题材。雕刻技法也日益精湛，运用浮雕、透雕、圆雕等多种技法，使图案更加生动逼真，富有立体感。例如，木雕在梁枋、斗拱、雀替、门窗等部位广泛应用，工匠们通过细腻的刀法，将各种人物形象、场景刻画得栩栩如生，展现出高超的技艺水平。清代徽派建筑的装饰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三雕”技艺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无论是雕刻工艺的复杂性还是题材的丰富性都远超前代。砖雕在门楼、照壁、墙面等部位广泛应用，通过多层透雕和圆雕等技法，将各种人物、动物、花卉等图案雕刻得栩栩如生，细节之处更是处理得精妙入微。木雕在继承明代传统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细节的刻画和整体的艺术效果，雕刻内容丰富多样，从日常生活场景到神话传说，无所不包。石雕则主要应用于建筑的基础、柱础、栏杆等部位，以其雄浑大气的风格和精湛的雕刻技艺，为建筑增添了庄重和威严之感。在清代，徽派建筑不仅在本土发展繁荣，还随着徽商的足迹传播到其他地区，对周边地区的建筑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徽派建筑也不断吸收其他地区建筑文化的精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自身的风格特点。例如，在一些徽派建筑中，可以看到融合了江南园林建筑的精致小巧和北方建筑的大气庄重等元素，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五、近代徽派建筑的演变与发展

在近代中国，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中国社会的变革，传统的封建经济逐渐解体，徽商的经济实力也受到了严重削弱。这使得徽派建筑的发展失去了经济支撑，建筑规模和数量都大幅减少。同时，西方文化的传入也对徽派建筑产生了冲击，一些西方建筑元素开始出现在徽派建筑中，如欧式的门窗、栏杆等，使得徽派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中西合璧的风格。西方的建筑技术、材料和设计理念逐渐被引入到徽派建筑中。在建筑结构上，一些徽派建筑开始采用钢筋混凝土等新型材料，以增强建筑的稳定性和耐久性。在建筑装饰上，西方的几何图案、写实雕塑等元素也被运用到徽派建筑中，与传统的木雕、石雕、砖雕等装饰手法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随着时代的进步，建筑技术不断发展，这对徽派建筑风格的演变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古代，徽派建筑主要采用传统的木构架结构，这种结构形式具有抗震性能好、施工方便等优点。随着建筑技术的提高，徽派建筑在木构

架的基础上,逐渐采用了一些更加先进的结构技术,如抬梁式和穿斗式相结合的结构形式,使得建筑的空间更加开阔,稳定性更强。此外,在建筑施工工艺方面,也不断创新和改进,如木雕、石雕、砖雕等装饰工艺更加精湛,建筑的细节处理更加细腻。

新型建筑材料的出现和应用也对徽派建筑风格产生了影响。在传统徽派建筑中,主要使用木材、石材、青砖、青瓦等天然材料。这些材料具有环保、美观、耐用等特点,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新型建筑材料如钢材、玻璃、铝合金等逐渐被应用到徽派建筑中。这些新型材料不仅具有强度高、重量轻、施工方便等优点,还能为徽派建筑带来新的视觉效果和空间体验。例如,一些现代徽派建筑采用了大面积的玻璃幕墙,既增加了建筑的采光面积,又使建筑更加通透、时尚,与传统的徽派建筑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居住需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徽派建筑的布局和功能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现代人的生活需求。现代人更加注重居住的舒适性、私密性和功能性。因此,在现代徽派建筑的设计中,开始注重对空间的合理规划和功能的完善。例如,增加卫生间、厨房等功能空间的面积和数量,改善室内的通风、采光条件,采用现代化的家居设备等。同时,在保留徽派建筑传统元素的基础上,对建筑的外观和装饰进行创新设计,使其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念。

参考文献:

- [1] 臧丽娜.明清徽州建筑艺术特点与审美特征研究[D].山东大学,2005.
- [2] 陆林,焦华富.徽派建筑的文化含量[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2):163-171.
- [3] 高文麟.安徽徽州文化[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 [4] 梁德阔.儒家伦理与徽商精神——“韦伯式问题”的经验研究[D].上海大学,2010.
- [5] 邢益鸣.安徽黟县西递宏村风水格局与水文景观探析[D].上海交通大学,2014.
- [6] 周晓光.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D].复旦大学,2005.
- [7] 黄成林.试论徽商对徽州文化的影响[J].人文地理,1995,(04):36-39.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ultural Genes of Huizhou

Architectural Style

Kaiqi Li

School of Art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lves deep in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Huizhou architectural style. At the beginning, it briefly introduces the exterior appearance, decorative art, and spatial layout of Huizhou architecture, presenting its unique features. Subsequently, it comb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Huizhou architecture in different dynasties. The period from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to the Tang Dynasty was the embryonic stage, the period from the Song Dynasty to the Yuan Dynasty was the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reached the peak stage. Then, it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profound influences of Confucianism, Taoism, Cheng-Zhu Neo-Confucianism, and Huizhou merchant cultu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izhou architecture, revealing the crucial role of cultural factors in shaping the architectural style. Finally, it expound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uizhou architecture, covering aspects such as the application of new materials and new technologies, the integration of new cultures, and the manifestation of people's new demands.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research on Huizhou architecture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times, this paper strives to comprehensively present the complex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Huizhou architectural style and it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process.

Keywords: Huizhou Architecture; Causes of the Style Formation; Historical Evolution; Cultural Influence

身份建构视域下文旅宣传话语的中日比较研究

董炳达¹, 李智¹

(1.安徽师范大学,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 本文基于身份建构理论, 运用文献、话语及比较研究法, 从国别与受众维度解析中日文旅宣传话语的文本特征、叙事逻辑及身份建构路径。研究发现两国依托本土文化形成差异化内外传播策略, 话语异同源于历史文化与传播理念的分野。本文总结其建构规律, 提炼兼顾文化主体性与跨文化适配的宣传路径, 为我国文旅话语创新、国家文化身份建构及跨文化传播提供参考。

关键词: 身份建构; 文旅宣传话语; 跨文化交流; 中日语言比较

基金项目: 安徽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02510370374)

DOI: doi.org/10.70693/202608273555

1. 引言

在跨境文旅常态化、中日双向旅游往来持续升温的时代背景下, 文旅宣传话语作为塑造国家文化形象、构建跨文化认同的核心媒介, 其话语背后的身份建构逻辑值得深入探究。2024年中日出入境旅游政策相继放宽, 两国面向本国、外国游客推出海量线上线下宣传文本, 但宣传中话语表达、形象塑造存在明显文化差异, 时常引发受众认知偏差, 制约文旅传播效果。现有研究多从翻译、多模态单一视角分析旅游语言, 缺少以身份理论为核心的跨文化对比研究, 为本课题留下研究空间。

身份建构理论起源于社会建构主义学派, 区别于本质主义的身份认知, 该理论核心观点认为, 身份并非先天固有、一成不变的静态属性, 而是个体、群体乃至国家主体, 在社会互动、话语实践、文化传播过程中动态建构、持续重塑的社会性产物。话语作为社会实践的核心载体, 是身份生成、表达与传播的核心媒介, 特定话语范式对应特定的身份定位, 话语的生产、传播与解读过程, 本质上就是身份的建构、强化与迭代过程。

基于此, 在本研究中, 我们将以身份建构为分析框架, 选取中日旅行社官网、文旅短视频、景点宣传文案等多元语料, 区分对内、对外两类宣传场景, 横向对比中日文旅话语的身份建构策略, 纵向剖析两国内宣、外宣的身份调整差异, 挖掘中日文化内核如何作用于语言选择。使之更好地优化宣传用语, 减少两国因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和偏见, 为两国的旅游从业者提供具体的语言优化建议和创新思路。

2. 两国文旅宣传话语的共时性比较

2.1 中日对内文旅宣传话语比较

文旅宣传分为对外国际传播与对内国民传播, 对内以本国国民为核心受众, 旨在唤醒本土文化认知、强化文化自信, 更加贴合本国文化语境。中日均重视文旅的文化赋能作用, 但现有研究多聚焦文旅对外传播问题, 针对对内宣传话语的系统性对比比较为匮乏。已有研究显示, 中国文旅宣传偏向历史宏大叙事, 日本侧重日常微观体验, 差异根植于两国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本文立足对内场景, 依托两国官方原生文本, 从四个层面展开对比研究, 弥补现有研究重理论轻实证的短板。中国对内叙事以历史纵深建构集体价值, 将文旅资源纳入文明史框架, 范式高度统一。

部分宣传文案以朝代历史、文明载体、民族瑰宝为核心, 聚焦公共历史价值, 无个人体验与日常场景描写, 呈现“历史赋能、集体赋能”的宏大叙事特征。

以实例1为例:

“明朝(1368—1644年)和清朝(1644—1911年), 是中国封建王朝史上最后两个朝代。两朝宫廷, 既指是明清帝王使用的皇宫, 也是明清两朝最高统治核心的代名词。明清宫廷五百多年的历史, 作为整个明清史的一

作者简介: 董炳达(2005—), 男, 本科生,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李智(2005—), 男, 本科生,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部分,以对帝后活动,包括等级制度、权力斗争、宗教祭祀、饮食服饰等问题的研究,向人们展示这五百多年来明清帝后多姿多彩又冷酷残忍的生活画卷,同时,揭示了最高统治者统治权术、言行起居等对国家民族兴衰和社会生活走向的影响。”^[1]

也有一些宣传文案将自然山水直接绑定华夏文明、家国寓意、民族精神,是国内山岳文旅对内宣传的标准叙事范式,以宏大历史建构国民集体文化认同。

以实例2为例:

“泰山早在华夏文明初肇,便已凸现于历史舞台。先秦时期,已有部落君王在此进行频繁活动,《尚书·舜典》中言大舜“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四岳(后之五岳)制度由此确立。

.....

正如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中所说:“所谓东方主生,帝出乎震,于是泰山便威灵赫赫了。自秦汉以来,历代帝王封禅,也就是向泰山朝拜。比帝王还要高一等,因而谁也不敢藐视泰山了。”泰山从一邦之镇、一国之尊而发展为帝王封禅告祭之所。其历史延续之长,社会影响之大,确乎是其他诸山难以比肩的。”^[2]

日本则以微观日常承载个体情感体验。日本对内文旅宣传聚焦四季风物、市井日常、市民生活、细微治愈体验,叙事尺度极小、情感极柔,以服务国民个体审美与精神松弛为核心。

通过描写市民可亲身感受的流水、街巷、四季、日常漫步,完全立足个体生活化体验。

以实例3为例:

京都山紫水明の都といわれ、京都盆地を取り囲む低くならかな三方の山並み、鴨川をはじめ市内を流れる川などの豊かな水辺空間、史跡・名勝や、寺社、京町家などの伝統的な建造物からなる風情ある町並みなどが、美しい景観を織り成しています。

.....

京都市では、こうした美しい景観の保全・再生や、時代に応じた新たな価値を創造するため、6つの条例を制定し、新旧が融合した京都ならではの景観づくりに取り組んでいます。^[3]

另外,文案多以微观场景实现情感治愈,展现日本对内文旅宣传的典型叙事逻辑。

以实例4为例:

“夕景から夜景へと移ろう時間帯に、若草山の夜景(新日本三大夜景)が楽しめる山頂へ特別バスが運行します。

路線バスのため、先着順・予約不要でご乗車いただけます。バスガイドが同乗しますので、車内の時間も楽しめます。夕日×鹿のシャッターチャンスも。”^[4]

在价值导向核心特征上,中国更多侧重国民文化教育与认同感凝聚。中国对内文旅宣传的本质功能是公共文化育人、民族共识建构,所有宣传内容最终落点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通过文旅资源完成国民文化自信培育。

中国许多文旅宣传文案核心目标并非“提升游玩体验”,而是育人、传承、厚植自信,体现文化建设具有价值引导与社会教化等功能。^[5]

以实例5为例:

“‘来!听色彩讲故事’故宫教育体验展的开幕,是故宫博物院在建院100周年之际,‘让文物活起来’的又一次创新实践,也是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又一个生动案例。它通过色彩这一世界性语言,为青少年搭建了一座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桥梁,充分发挥了故宫博物院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重要作用。此次展览将于12月31日正式在故宫教育中心对外开放,延续至2026年3月31日,展期涵盖2026年寒假。”^[6]

日本则更多侧重关注国民生活审美与情绪治愈。日本对内宣传的核心价值是提升国民日常幸福感、丰富个体精神生活、滋养本土生活美学,通过设置宣传大使来提升城市影响力。

以实例6为例:

“2014年ソチ五輪・2018年平昌五輪2大会連続オリンピック金メダリストである羽生結弦さんに、本市の魅力発信にご協力をいただくため、仙台観光アンバサダーを委嘱しています。仙台市では今後も、観光アンバサダーとして羽生選手にご協力をいただき、国内外への観光PRに努め、本市への誘客促進や交流人口の拡大に努めてまいります。”^[7]

在动员文旅宣传的主体力量方面,日本许多地方在开展当地传统文化与文旅资源的宣传活动时,非常重视利用当地群众的文旅宣传积极性、荣誉感与责任感等,并为此采取了诸多的促进办法。比如,政府方面会聘请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市民担当本地的义务观光大使,赋予他们城市文化宣传的责任。而成为观光大使的群体,不仅有各界知名人物,更多的则是普通市民。^[8]

中日对内文旅宣传话语各有核心优势,中国话语价值厚重、主体性强,能高效建构国民文化认同、筑牢中华文明叙事根基,兼具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与公共教育价值;日本话语共情力高、接受门槛低,可推动文化融入日常生活、避免说教式传播,更易促使民众自发亲近本土风物、感知本土之美。

2.2 中日对外文旅宣传话语比较

对外文旅宣传话语是一国面向国际受众进行文化自我阐释、形象投射与身份建构的核心载体,其本质是通过符号化的语言叙事,向外国游客传递“我是谁”“我有何独特价值”的身份认知,是国家软实力对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9]中日同属东亚文化圈,均将文旅对外传播作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抓手,但二者话语策略与身份建构逻辑差异鲜明,中国以文明延续性为核心锚点构建“历史厚重、多元包容的东方大国”身份,日本以文化独特性为传播抓手塑造“传统与现代共生的精致岛国”身份,二者的话语实践既植根于各自的文化禀赋与发展路径,也折射出不同的国际传播定位。

中国立足以五千年文明为内核的“东方文明大国”身份进行对外宣传。中国对外文旅宣传的话语体系始终以“未中断的中华文明”为身份建构的基石。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官方海外传播品牌“你好!中国(NiHao!China)”与“美丽中国(Beautiful China)”,在其英文官网及国际旅游展会的主视觉文案中,均将文明延续性作为核心叙事主线,明确突出“五千年绵延不绝的文明”这一核心标识。

“As part of the ‘NiHao! China’ – 2025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Overseas Promotion Season, this online exhibition offers a rich visual journey through China’s cultural and natural treasures. Through curated videos and images, audiences will explore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breathtaking landscapes, and vibrant folk traditions of regions including Beijing, Tianjin, Hebei, Jiangsu, Shandong, Henan, Guizhou, Gansu, Ningxia, and Xinjiang, as well as the culturally significant cities of Wuxi, Luoyang, Lhasa, Yan’an, Quanzhou, Xinzhou, and Turpan. This immersive showcase invites the Australian audience to discover the depth, beauty, and diversity of China’s history and living culture.”^[10]

在面向全球推出的世界文化遗产主题海外推广活动中,官方宣传文本以“Timeless Heritage(永恒遗产)”为核心概念,强调中国文化遗产承载的文明深度与历史连续性,将文旅资源定位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具象载体。

从传播逻辑上看,这类话语通过提取中华文明的核心文化精髓,构建了一套具有高度辨识度的国家旅游形象符号系统,实现了传统文化价值的对外转译。

从身份构建的角度看,这类话语形成了两层身份定位:其一,文明权威身份,通过“unbroken civilization”“enduring spirit”等表述,强化中华文明的唯一性与延续性,在全球文旅市场中建立“东方文明核心标本”的身份认知,以历史纵深构建不可替代的文化竞争力;其二,大国包容身份,通过“从故宫到桂林山水、从上海都市到云南村寨”的地域与时空并置叙事,塑造幅员辽阔、层次丰富的大国形象,用多元性补充“古老”单一标签,构建“传统底蕴与现代活力兼备的文明大国”整体身份。

而日本则立足以二元共生为特征的“精致融合国度”身份进行对外宣传。日本国家旅游局(JNTO)的全球宣传核心口号为:“Visit Japan: Where Tradition Meets the Future(访问日本:传统与未来交汇之地)”,这一口号是日本针对欧美市场进行受众调研后确立的核心品牌概念,精准契合了西方受众对日本“传统与创新融合”的文化想象。其英文官网首页导语进一步阐释:“在日本,千年古寺与霓虹摩天平起平坐,传统茶道与前沿科技相融共生。探索一个在永恒文化与大胆创新间取得平衡的国度”。

日本的身份构建走“差异化质感”路线:一方面,以寺庙、茶道、温泉等符号承接西方对“神秘东方”的想象,构建“东方美学代表”的文化身份;另一方面,以科技、动漫、都市潮流贴合现代消费偏好,构建“时尚创意标杆”的现代身份。更关键的是,它将“细致、礼貌、精致”的民族特质转化为国家人格化身份,让服务品质与文化质感成为国家身份的核心标签,最终塑造出“小而美、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的精致岛国”身份认知。

二者的核心差异在于:中国的国家身份是“纵深式”的,以历史长度建立权威感;日本的国家身份是“并列式”的,以文化反差强化记忆点。前者依托文明规模构建大国辨识度,后者依托文化质感打造特色吸引力,这一分野也与两国不同的文化资源禀赋和国际传播定位直接相关。

从叙事逻辑看,中国的文旅宣传带有较强的国家形象塑造属性,身份构建偏向“国家本位”,以自我表达为核心;日本的文旅宣传更贴近市场导向,身份构建偏向“游客本位”,以受众的体验感知与情感共鸣为核心。这一差异也与两国文旅发展的顶层战略定位直接相关:中国以文化自信为核心框架,日本以“观光立国”为市场导向战略,二者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国家形象构建路径。

3. 两国文旅宣传话语的历时性比较

纵向比较以同一国家主体、不同传播受众为核心视角,分别探究中国、日本两国各自对内、对外文旅宣传话语的差异化特征、调整逻辑与身份建构的迭代规律,挖掘两国话语体系的受众适配机制。

3.1 中国对内外文旅宣传话语的差异

中国文旅宣传话语呈现对内重认同凝聚、对外重文明传播的纵向差异化特征,话语调整基于受众的文化认知基础与传播需求差异,形成了同源内核、不同表达的话语体系。

从叙事侧重点来看,对内话语深耕历史细节与民族情怀。面向国内受众时,话语会细化历史文脉、民族故事、红色文化、地域文化特色,深度绑定国民的集体记忆与家国情感,重点突出中华文化的传承脉络与当代价值,通过沉浸式文化叙事,强化国民的文化自信与民族共同体意识。例如国内文旅宣传会重点讲述文物背后的历史故

事、非遗传承人的坚守、山河发展的时代变迁，兼顾历史底蕴与时代温度。对外话语简化复杂内涵、突出核心符号。而由于海外受众对中国历史文化认知有限，存在文化隔阂，对外宣传会摒弃复杂的历史叙事与本土专属文化语境，提炼长城、熊猫、汉服、传统美食、山水风光等辨识度极高的核心文化符号，以简洁直观的叙事展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规避文化解读偏差。

从话语风格与价值导向来看，对内话语庄重厚重、兼具温度、侧重内部赋能，兼顾文化传承、精神引领与本土文旅市场激活，强调文化的延续性与民族的归属感。对外话语大气包容、简洁普适、侧重外部沟通，弱化内部价值引领，强化跨文化价值传递，突出中华文化和平包容、美美与共的核心特质，致力于打破文化壁垒、塑造良好国际形象。

从身份建构逻辑来看，中国对内宣传建构的是内生性民族文化身份，聚焦自我认同的强化，依托共同的文化记忆与民族基因，凝聚内部群体共识；对外宣传建构的是外向性文明大国身份，聚焦他者认知的塑造，通过普适性的文化表达，完成国际社会对中国文明形象的正向认知建构。整体而言，中国内外话语文化内核统一、叙事精度与传播导向差异化，始终坚守文化主体性，无本质性的话语割裂。

中国对内宣传：

(1) “荆楚大地，山川灵秀、人文厚重。神农架留存着炎帝神农尝百草的文明记忆；红安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核心，两百余位开国将军从这片土地走出；黄鹤楼承载千年诗词文脉，三峡镌刻大江奔流的时代变迁。古建遗存、红色旧址、非遗技艺交织，荆楚文脉代代相传。读懂这片土地的过往，方能读懂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11]

(2) “春日乡村，是自然与人文交织的斑斓长卷。从江南水乡油菜花海到雪域高原桃花秘境，从古典园林的雅集到梯田山野的风物。寻访乡土，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乡土习俗、农耕传承、世代延续的生活方式，藏着中国人刻在血脉里的家园情怀。守住乡土文脉，就是守住民族共同的精神原乡。”^[12]

中国对外宣传：

(1) “Meet China, a land of natural wonders and timeless culture. Experience the beauty of cherry blossoms and karst mountains, discover delicate handicrafts and millennia-old traditions. China embraces diversity and advocates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mong civilizations. Welcome to witness the beauty of China.”^[13]

(2) “From the iconic Great Wall and Terracotta Warriors to stunning natural landscapes of Zhangjiajie and Jiuzhaigou. China combines spectacular scenery with extraordinary cultural heritage, offering unique travel experiences for visitors across the globe.”^[14]

综上两者比较可得，面向国内受众，宣传文本大量展开线性历史脉络、红色叙事、地域专属民俗、非遗传承故事，依托国民共享的历史记忆激发家国情怀，叙事层次丰富、细节厚重，目标是强化内生性民族文化身份，实现文化自信与共同体意识建构。

面向海外受众，主动舍弃繁复本土历史语境、区域性小众叙事；统一筛选全球辨识度高的视觉文化符号，叙事简洁普适，突出人与自然、文明包容等共通价值，建构外向性文明大国身份。

3.2 日本对内外文旅宣传话语的差异

日本文旅宣传话语呈现对内重地域个性、对外重普适共情的纵向差异化特征，其话语调整幅度更大，形成了“本土深耕小众、国际适配大众”的双向话语体系，身份建构的场景化特征更为显著。

叙事侧重层面，日本对内话语极致挖掘地域小众特色与乡土记忆。面向国内受众时，话语聚焦各地区独有的民俗、历史、生活方式，深度绑定日本国民的乡土情感与本土生活体验，注重历史真实性与地域独特性，强调“本土专属、不可复制”的地域文化价值，以此唤醒国民对乡土文化的珍视与认同。例如地方文旅宣传会重点介绍本地小众的传统仪式、乡土美食、老街记忆等专属文化内容。对外话语弱化地域差异、提炼普适性治愈美学。面向海外受众时，日本刻意淡化国内地域差异化叙事与小众本土文化，统一提炼樱花、温泉、匠人精神、极简美学、治愈生活等全球普适的文化标签，消解地域文化的小众性与排他性，降低海外受众的认知难度。

话语风格与价值导向层面，日本对内话语细腻写实、本土化特征极强，立足日本本土文化语境，贴合国民的审美与认知习惯，核心服务于地域文化活化与内部社会治理。对外话语高度美化、普适化特征突出，主动贴合国际流行审美与跨文化传播规律，弱化本土文化的特殊性，强化情感共鸣与审美共情，核心服务于国际文旅引流与国家形象美化。

身份建构逻辑层面，日本对内宣传建构的是多元差异化的乡土国民身份，尊重地域文化差异，塑造丰富多元的本土文化形象；对外宣传建构的是统一标准化的柔性审美身份，整合全国文旅特质，打造全球统一的“精致治愈日本”文化标签。相较于中国，日本内外话语的差异化程度更高，为适配跨文化传播，对外话语对本土叙事进行了大幅度的简化与重构，形成了内外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

日本对内宣传：

“五箇山の下梨地区に代々伝わる麦屋節。国指定無形民俗文化財であり、この山里だけで歌い継がれる民謡と踊り。秋の山里に響く太鼓と唄は、古くから暮らした人々の思いを今に伝える郷土の音。”^[15]

日本对外宣传:

“Blessed with stunning natural beauty and a time-honored spirit of hospitality, Japan offers myriad destinations to provide a respite from the stress of modern society. Soak in rejuvenating hot spring waters and wash your worries away. Experience tranquil gardens, subtle seasonal aesthetics, delicate craftsmanship and quiet moments of peace.”^[16]

由上两者比较可知, 对外宣传内容中完全不提五箇山麦屋祭等各地小众独有民俗; 统一提炼“温泉、自然美学、静谧、匠人工艺”全球通用治愈符号, 消解地域差异化叙事, 是典型对外标准化话语。

4. 总结与启示

4.1 共性与差异

总之, 两者分别在本民族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下形成了不同的对内对外宣传话语, 两者既有共性, 又存在差异, 对各自民族文旅宣传具有重要影响。

首先, 两者在功能属性上均将文旅宣传话语视为文化身份动态建构的核心话语载体, 兼具对内凝聚本土文化认同、对外投射国家文化形象、赋能文旅产业发展的三重职能。同时, 两者均遵循受众分层的传播规律, 针对国内与海外受众设置差异化叙事策略, 依据受众的文化认知基底调整话语的信息密度与符号筛选标准。最后, 两者均以自然地理景观与人文民俗资源为核心符号素材, 通过话语叙事完成抽象文化身份的具象化表达与社会化传播。

而两者宣传话语又存在根本性差异。首先在叙事范式和传播主体上, 中国采用宏大历史与家国集体叙事框架, 将文旅资源嵌入中华文明传承的整体脉络, 突出其公共历史价值与民族共同体意涵; 日本采用微观日常与地域差异化叙事框架, 以乡土风物、市井生活为叙事核心, 锚定个体情感体验与地域文化身份。且中国形成多以官方主导的统一叙事格局; 而日本侧重构建官民协同的传播体系, 广泛吸纳民间主体参与地域文旅推广。

其次在对外传播场景和叙事视角上, 中国对外传播以“绵延不断的东方文明大国”为核心身份, 依托历史纵深构建文化权威性, 同时以现代化发展成果补充大国形象的现代维度; 日本以“传统与现代共生的精致岛国”为核心身份, 以差异化文化质感构建国际传播辨识度。且中国采用全景式集体叙事, 以“文明观察者”视角呈现文化整体风貌, 话语呈现国家本位特征; 日本采用场景化个体叙事, 以“生活参与者”视角拆解沉浸式文化体验, 话语呈现游客本位的市场导向。

再次在价值导向和现代性表达上, 中国以文化教化与民族认同凝聚为核心目标, 承载公共文化育人职能; 日本以生活美学滋养与国民情绪纾解为核心指向, 服务于地域文化活化与社会心态调适。同时, 现代中国侧重展示现代化发展活力, 承担破除国际刻板印象的传播使命; 日本侧重传递社会治理精细化与体验确定性, 输出成熟稳态社会的软实力。

最后两者还存在纵向分层差异, 中国文旅宣传的内外话语保持文化内核的高度统一, 对外传播仅对本土叙事进行符号提炼与语境简化, 身份建构呈现“同源异表”特征, 文化主体性贯穿传播全过程。日本文旅宣传的内外话语分化程度更高, 对内深耕地域小众文化与乡土记忆, 对外则对本土叙事进行标准化重构与普适化转译, 主动消解地域差异性, 身份建构呈现“内外分野”特征, 跨文化适配幅度更大。

4.2. 启示

通过在身份建构的视域下, 比较分析中日两国在文旅宣传话语, 得出了一定结论, 对当今文旅宣传话语以及中日对外宣传方面具有一定启示。

首先我们要在身份建构层面立足不同民族禀赋形成差异化传播定位。两国首先要依托自身文化资源禀赋确立身份建构的核心路径, 立足本民族文化, 避免同质化传播竞争; 同时依据国际传播语境动态调整话语策略, 实现文化身份稳定性与传播适配性的动态平衡。

其次我们要在话语方法层面构建分层协同的叙事体系。推动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互补, 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 以生活化场景叙事补充跨文化共情维度, 平衡文化厚度与传播亲和力; 实施精准化受众分层策略, 对内深耕本土文化深度以强化认同, 对外提炼共通性文化符号以降低认知壁垒; 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传播格局, 以民间叙事补充官方叙事的传播触达力。

最后我们要在社会功能层面实现多重价值的有机统一。对内文旅宣传应统筹文化遗产的公共价值与国民精神需求的个体价值, 将文化认同建构与国民生活品质提升相结合, 拓展其社会调适与文化育人的复合功能。对外文旅宣传应统筹文化自信表达与跨文化传播规律, 在坚守文化身份内核的基础上强化情感共鸣, 充分发挥文旅话语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与跨文化认同构建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故宫博物院. 宫廷历史[EB/OL]. <https://www.dpm.org.cn/explores/courts.html>.
- [2] 周郢, 张琰. 中华文化萃泰山[EB/OL]. (2026-06-26). <https://www.my0538.com/2026/0626/1034243.shtml>.
- [3] 京都市産業観光局観光 MICE 推進室, 公益社団法人京都市観光協会. 京都観光振興計画 2025: みんなでつくる京都観光[EB/OL]. 2023-08. https://www.kyokanko.or.jp/wp/wp-content/uploads/minna_de_tsukuru.pdf.

- [4] 公益社団法人奈良市観光協会. 奈良若草山トワイライト・夜景観賞バス【夏】[EB/OL].https://narashikanko.or.jp/event/detail_10433.html.
- [5] 郭丽. 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传播对策[J]. 新闻爱好者, 2020, (2): 82-84.
- [6] 故宫博物院. “来！听色彩讲故事” 故宫教育体验展[EB/OL]. (2025-12-31). https://www.mct.gov.cn/whzx/zsdw/ggbwy/202512/t20251231_963954.html.
- [7] 仙台市文化観光局観光戦略課. 仙台観光アンバサダー羽生結弦さん[EB/OL]. (2025-08-08). <https://www.city.sendai.jp/nigiwaisoshutsu/ambassador.html>.
- [8] 段毅琳. 中日对比视角下我国文旅宣传路径拓展研究[J]. 汉斯, 2024, 13(5), 670-676.
- [9] Huang, Y. (2025). Tourism Nation vs. Cultural Confidenc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Japan's and China's Strategies for Global Image Building. *Journal of Cultural Analysis and Social Change*, 10(3), 2204 – 2212.
- [10] 中国驻悉尼旅游办事处. “你好！中国” 2025 世界文化遗产主题旅游海外推广季[EB/OL]. 2025. https://cnto.org.au/nihao-china-2025-world-cultural-heritage-tourism-overseas-promotion-season/?f_link_type=f_linkinlinenote&flow_extra=eyJkb2NfaWQiOiI1YWJkOTA2ODJN2U2YTl0LTkYTk1M2M2MGJjMGRiOTkiLCJpbmVfZGlzcGxheV9wb3NpdGlvbil6MCwiZG9jX3Bvc2l0IjowfQ==.
- [11] 中央广电总台总经理室. 《知音湖北》宣传片登陆总台，全景呈现荆楚大地的缤纷夏日与文旅新貌[EB/OL]. (2025-08-11). <https://1118.cctv.cn/2025/08/11/ARTI4NE8MXjQgmf8PsVgJJbV250811.shtml>.
- [12] 文化和旅游部. 花漾乡村、不期而遇，文化和旅游部推出 32 条“花期乡遇”主题线路[EB/OL]. (2025-04-01). http://www.mct.gov.cn/wlbphone/wlbydd/xxfb/jiaodianxinwen/202504/t20250401_959154.html.
- [13] 文化和旅游部. “你好！中国” 中东北非地区发布仪式在阿联酋迪拜举行[EB/OL]. (2023-10-27). http://www.mct.gov.cn/wlbphone/wlbydd/xxfb/tpxw/20231027_949372.html.
- [14] China National Tourist Office London. World Travel Market 2025: Wandering in China and Witness the Beauty of Nature[EB/OL]. (2025-11-18). <https://www.cnto.org.uk/last-news-en/world-travel-market-2025-wandering-in-china-and-witness-the-beauty-of-nature/>.
- [15] 青木栄美子. 勇壮な麦屋節に心躍る！五箇山麦屋まつりに行ってきた！[EB/OL]. (2025-11-11). <https://www.info-toyama.com/articles/aokiemiiko-gokayamamugiya>.
- [16] 日本国家旅游局(JNTO). Relaxation[EB/OL]. <https://www.japan.travel/en/experiences-in-japan/relaxation/>.

A Sino-Japanese Comparative Study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Promotional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Bingda Dong¹, Zhi Li¹

1 Department of Japanes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Abstract: Based on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eory, this paper employs literature research,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analyze the textual features, narrative logic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pat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al and tourism promotion discourse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national context and target audienc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two countries, relying on their respective indigenous cultures, have developed differentiate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discourses originate from the divergence of historical cultures and communication philosophi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underlying construction rules and extracts promotion paths that balance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and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the innovation of China's cultural and tourism discourse,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Keywords: Identity Construction; Cultural and Tourism Promotional Discours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ino-Japanese Linguistic Comparison

中国大运河河南段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传承研究

郑奕琛¹, 徐高瀚¹

(1. 洛阳理工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23)

摘要: 在文化强国战略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双重背景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文旅深度融合成为新时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方向。中国大运河河南段沿线分布豫剧、河洛大鼓、河南坠子、商丘唢呐等丰富音乐类非遗资源, 具备极高的文化价值与开发潜力。本文以中国大运河河南段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 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实地调研法等多元研究方法, 系统分析其主要构成、价值所在、代表性剧目的发展现状等, 剖析其在当下发展中困境与痛点, 从跨区域资源整合、沉浸式文旅体验、数字化传播赋能、复合型人才培养等角度, 提出音乐类非遗的创新传承路径。

关键词: 中国大运河河南段;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旅融合; 活态传承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26 年度洛阳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1+2+4+N”框架下洛阳客家祖根地文化势能转化为经济发展动能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项目编号: 2026B447)

DOI: doi.org/10.70693/202608288330

一、前言

中国大运河属于世界级文化遗产, 是贯通我国南北、融合多元地域文明的线性文化廊道。自隋唐开凿至今, 这条千年水道除承担漕运、水利、商贸等基础功能外, 也在人口流动与文化交融的过程中, 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民俗文化与传统艺术。河南省位于大运河中游核心区域, 隋唐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贯穿境内, 串联洛阳、郑州、商丘、安阳等城市。南北民俗、方言与艺术在此交融碰撞, 孕育出众多极具中原特色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音乐类非遗根植于民众日常生产生活与民俗活动之中, 是运河文化极具代表性的听觉载体。河洛大鼓、河南坠子、商丘唢呐、豫北锣鼓等传统音乐经过数百年口传心授, 真实记录了运河漕运变迁、民间生活风貌与乡土人文理念, 是中原民间艺术的精华, 也是大运河文化体系的重要构成。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传统文化振兴的时代背景下, 系统梳理、保护并活化运河沿线音乐类非遗, 具备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然而, 随着城镇化推进、娱乐方式革新与社会结构变化, 传统民间音乐的生存空间持续萎缩。目前, 大运河河南段音乐类非遗普遍存在传承人老龄化、受众断层、内容形式固化、区域发展分散、市场化水平不足等问题, 严重制约其活态传承。传统静态保护模式已难以适应当代文化发展的现实需求。因此, 依托运河文化资源, 结合文旅融合、数字技术与现代教育手段, 探索非遗创新发展路径, 推动传统民间音乐融入现代社会, 是当下非遗保护的重点任务。

二、中国大运河河南段音乐类非遗的主要构成

1. 洛阳片区

洛阳作为隋唐大运河核心枢纽, 永济渠、通济渠在此交汇, 留存含嘉仓 160 号仓窖、回洛仓两大漕运仓储遗址。依托十三朝古都积淀的礼乐文明, 本地民间音乐融合宫廷礼乐风貌与乡土艺术特质, 形成多元非遗体系。片区音乐类非遗以说唱鼓曲、民间鼓吹器乐为核心, 河洛大鼓为标志性曲艺形式, 洛阳排鼓、洛宁扬琴、豫西民歌与传统民间曲牌等省市级项目共同构成完整传承脉络。大运河漕运体系塑造了河洛民间音乐的生存土壤, 含嘉仓、回洛仓带动运河沿线商贸流通, 说书鼓曲逐步成为民众核心文娱形式。河洛大鼓源于沿岸口头说书传统, 以洛阳方言演唱, 鼓、钢板伴奏, 曲风明快质朴, 题材多取自历史演义、民间忠孝叙事, 承载豫西民众伦理观念。民间锣鼓乐深度嵌入运河沿线庙会、岁时、婚丧等民俗活动, 与漕运催生的市井生态高度融合。整体来看, 依托大运

作者简介: 郑奕琛 (2004—), 女, 本科, 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徐高瀚 (1997—), 男, 博士, 博士后, 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河漕运遗存发展而来的洛阳片区音乐非遗，兼具叙事性与民俗性，是隋唐大运河都城市井文化活态传承的重要艺术载体。

2. 郑州片区

郑州地处大运河中游衔接地带，作为南北交通与文化交流枢纽，其地域文化兼具北方豪迈气质与中原温婉风格。该片区音乐类非遗以河南坠子为核心，同时包含中原民歌、民间合奏、戏曲伴奏曲牌、管城回族器乐等多元门类。河南坠子流传范围覆盖郑州全域及周边运河沿岸村镇，伴奏以坠胡为核心，唱腔婉转灵动、曲调丰富，表演形式灵活多样，适配单人、双人及集体演绎，既适合舞台展演，也可开展街巷流动演出。得益于运河便利的交通，河南坠子从郑州逐步向南北运河沿线传播，成为中原地区流传最广的说唱艺术之一。郑州作为现代都市，城乡结合部、运河古镇保留了大量传统演出形式，城市内部则出现传统音乐与现代舞台结合的尝试。相较于洛阳片区，郑州音乐非遗流动性、传播性更强，受南北文化融合影响更深，艺术表现形式也更加灵活多变。

3. 商丘片区

商丘地处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河南段东端，辖通济渠商丘南关段、通济渠商丘夏邑段两处核心河道遗存，地处黄淮平原交界，毗邻皖北、鲁西南，形成独具特质的黄淮平原民俗文化圈层，民间器乐传承根基深厚，其中商丘唢呐为本片区标志性非遗，花鼓戏唱腔、豫东琴书、民间锣鼓与乡土小调共同构成完整的区域音乐非遗体系。大运河通济渠沿线村落密布、农耕文明积淀深厚，唢呐深度嵌入地方各类民俗仪轨，是岁时节庆、婚丧祭祀活动不可或缺的器乐载体。商丘唢呐音色高亢通透，曲目兼具雄浑大曲与婉转小调，演奏技法丰富、流派脉络清晰；依托运河漕运商贸流通，民间乐班沿河道往来巡演，不同地域演奏技艺交融互鉴，催生了规模庞大的民间演奏群体。整体来看，商丘片区运河音乐非遗根植乡村日常生活，具备鲜明的实用性与群体性特质，是承载豫东乡土民俗与运河市井生活的活态听觉载体。

4. 安阳片区

安阳地处隋唐大运河河南段北部，境内永济渠遗存卫河滑县—浚县段纵贯区域，以道口古镇运河码头为核心空间载体，连通中原、冀南与鲁西文化圈层，孕育出兼具北方雄浑气韵与豫北乡土特质的音乐非遗群落。片区音乐非遗门类丰富，以道口大鼓、安阳四股弦、豫北小调为核心代表，辅以滑县坠子、民间鼓吹乐、祭祀专用曲牌等多级非遗资源，地域民俗特征鲜明。卫河（永济渠）河段历史水运通达，明清道口古镇漕运商贸繁荣，人口往来密集，催生了适配河神祭祀、岁时节庆、婚丧仪典、集市开市等场景的民间音乐形态。道口大鼓是豫北运河标志性锣鼓乐，编制庞大、鼓点铿锵、节奏规整，广泛运用于开河祭祀、庙会巡游等公共仪式与民间日常礼俗，是运河商贸文化与乡土祭祀民俗融合的典型艺术符号。安阳四股弦依托运河乡村社群发展，唱腔贴合豫北方言语调，伴奏形制简约，剧目聚焦市井乡土叙事，贴近沿岸民众精神生活。

四大片区依托大运河水系串联一体，地域分明、特色互补、交融共生：洛阳片区主打鼓曲说唱、兼具宫廷市井气韵，郑州片区以坠子曲艺为核心、南北融合流动性强，商丘片区深耕唢呐器乐、扎根乡村民俗生活，安阳片区立足豫北礼俗锣鼓、凸显古镇仪式文化。四大片区共同构筑起大运河河南段品类齐全、层次多元、地域特色鲜明、南北贯通的音乐类非遗整体体系，（见图例 1-1）。

三、中国大运河河南段音乐类非遗的价值所在

1. 文化价值

传统民间音乐本身就具备珍贵的史料属性，也常被学界誉为“活态史书”。河洛大鼓与河南坠子的传统唱词里，真实记载了大运河漕运的兴衰变迁、古代战事进程、市井日常百态以及各类民俗礼仪，而商丘唢呐留存下来的古曲牌，也完整延续着各个时代流传下来的民间曲调。这些依靠口头传承的艺术资料，可以有效弥补正史文献记载的疏漏与空缺，能够为运河发展史、中原民俗文化、地方方言演变等相关研究，提供十分珍贵的一手研究素材。一是地域标识价值。大运河河南段三大片区形成的差异化音乐风格，能够对应不同区域的人文特质，已经成为区分中原各大文化圈层的听觉标志，有效提升了河南本土文化的独特辨识度；二是文化交融价值。大运河本身就是贯通南北的文化走廊，沿线各类音乐艺术都会不断吸纳南北方曲艺与器乐的艺术特色，最终打磨出独属于中原地区的艺术风格，也能直观体现出中华文化兼容包容、多元一体的发展特质。

2. 社会价值

各类音乐类非遗早已深度融入到基层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起到凝聚社群人心、教化乡风民风的重要作

用。在广大乡村社区当中，非遗文艺表演一直都是集体民俗活动的核心内容，它可以有效聚拢乡村邻里、烘托热烈的民俗氛围，长期维系着乡土人情与乡村社群的稳定关系。传统非遗曲目大多传播忠义守信、敬老尽孝、勤俭向善的正向理念，能够在潜移默化当中端正民众思想、净化乡村风气。对于常年在外务工的运河沿岸居民来说，本土传统音乐承载着浓厚的乡土记忆，是寄托乡愁的重要载体，可以持续增强群众的地域归属感与文化认同感；与此同时，传统民间演艺也能为基层非遗艺人提供稳定的从业渠道与收入来源，持续维护乡村基层文化生态的平衡与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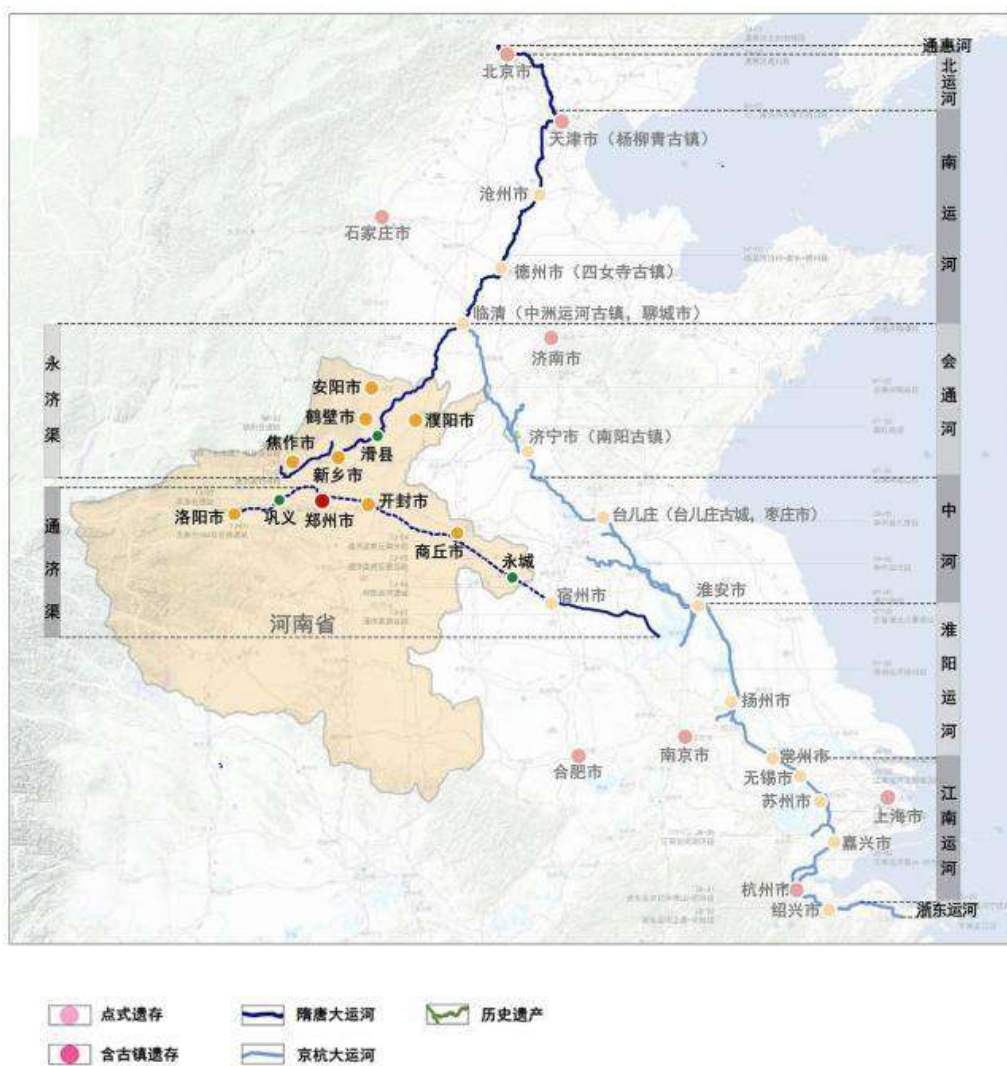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大运河河南段区位图（图片来源：河南地理地图网）

3. 教育价值

音乐类非遗能够同时承担艺术美育与传统文化普及的双重教育职能。一方面，河洛大鼓的唱腔韵律、河南坠子的演唱技巧、商丘唢呐的演奏技法，共同搭建起一套完整、成熟的中原民间音乐体系，它可以有效扩充现代音乐课堂的教学内容，弥补高校学院派音乐教学脱离民间艺术的短板，也能为声乐、器乐、曲艺课程提供贴合本土实际的教学素材；另一方面，非遗曲目本身承载着运河发展历史、地方民俗知识、传统礼仪文化等丰富内容，青少年在欣赏、学习传统音乐的过程中，能够直观、真切地认识中原地域文化，真正实现文化传承与思想育人的双向融合。

除此之外，非遗依靠口传心授、师徒承袭的传统传承方式，也能不断传递潜心钻研、踏实治学、尊师重道的匠人品质，对当代青年有着良好的精神引领与思想教育作用。中国大运河河南段音乐类非遗价值维度一览表如下（见表 1-2）：

表 1-2 大运河河南段音乐类非遗价值维度一览表

价值类型	核心内涵	具体体现
文化价值	历史记忆、地域标识、文化交融	记录漕运历史与市井生活；塑造中原地域文化符号；见证南北艺术融合
社会价值	社群凝聚、道德教化、情感寄托	维系乡村邻里关系；宣扬传统美德；强化民众乡土归属感
教育价值	艺术美育、文化普及、精神引领	丰富民间音乐教学资源；传播运河民俗与历史；传承匠人精神

四、中国大运河河南段音乐类非遗创新发展路径

1. 资源整合构建跨区域协同机制

大运河本身属于线性文化遗产，沿线分布的各类非遗文化本就是一个整体，因此打破各地的行政壁垒、整合全域优质资源，能够帮助区域非遗真正实现规模化发展与品牌化输出，这也是非遗突破发展局限的关键一步。

(1) 搭建大运河河南段音乐非遗协同保护联盟。以地方文旅主管部门为牵头单位，联动洛阳、郑州、商丘三地的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专业文艺院团以及在岗非遗传承人，搭建可以长期稳定运行的合作交流平台。各地可以统一梳理辖区内的音乐非遗资源、经典曲目内容、在册传承人员信息，搭建能够实时共享的非遗资源数据库，实现曲谱资料、演出影像、技艺档案等资源互通共用，避免重复保护带来的资源浪费。各地也可以常态化组织跨区域非遗展演、技艺交流、联合创排活动，推动河洛大鼓、河南坠子、商丘唢呐三类艺术形式互相借鉴、融合创新，打磨出更具运河特色的联合演艺节目。

(2) 统一规划全域非遗发展布局。结合大运河文化带的整体建设方向，针对河南段音乐类非遗制定适配的保护方案与发展计划，明确各个城市的特色发展定位；洛阳可以重点打造鼓曲说唱文化，建成区域性运河鼓曲传承基地，郑州可以持续做强河南坠子的文化 IP，打造中原说唱艺术核心阵地，商丘则能够深耕商丘唢呐民间器乐文化，建设特色民间器乐展演平台。三地通过错位布局、优势互补的方式，共同打造“大运河中原音乐非遗”的整体文化品牌。

(3) 统筹落实政策扶持与资金保障。整合省级、市级非遗专项保护资金以及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扶持资金，把资源更多倾斜到濒危非遗项目、偏远传承区域以及青年传承人群体当中。统一规范本地非遗扶持的相关标准，完善艺人生活补贴、传习场地建设、老旧曲目抢救整理等配套保障，慢慢缩小各地非遗发展差距，稳固全域非遗传承发展的基础条件。

2. 数字赋能推动非遗数字化传播

在互联网快速普及的当下，借助数字化技术和新媒体平台，可以有效拓宽传统音乐非遗的传播边界，让原本局限于乡村本土的民间艺术走向全网视野，精准对接青年受众群体，实现线上线下双向联动的传播效果。

(1) 完成非遗数字化建档与抢救保护。组建专业采编团队，针对全域范围内的老旧曲牌、独门演奏技法、濒临失传曲目、老人口述历史等内容，开展高清录音、专业录像和文字整理工作，搭建规范完整的非遗数字档案库，把珍贵的濒危技艺永久保存下来，真正实现非遗文化数字化留存。整理完成的曲谱资料、教学影像、历史档案可以对外开放，方便非遗爱好者、专业学习者随时查阅参考。

(2) 搭建新媒体传播矩阵，稳固线上宣传阵地。依托抖音、视频号、快手、B 站、音频平台等主流网络渠道，联合非遗传承人搭建官方宣传账号，搭配专职运营人员负责日常更新。摒弃完整长视频的传播形式，剪辑优质唱段、精彩演奏片段、技艺讲解、传承人日常故事等轻量化内容，更加贴合短视频用户的观看习惯。常态化开展线上直播演出、公益教学、传承人访谈互动，拉近非遗文化和年轻网友的距离，同时上线经典曲牌音频内容，打造可随时收听的运河非遗声频名片。

(3) 探索数字艺术创新应用模式。利用编曲软件、音频合成技术对传统民乐进行二次改编，把传统曲牌和国风曲风、现代流行元素相互结合，创作出适配当代审美的新编民乐作品。借助 VR、AR 虚拟技术打造线上虚拟剧场、云端演艺场景，打破时间、地域的传播限制。积极鼓励本土音乐人、自媒体创作者围绕运河音乐非遗开展二次创作，产出优质国风文艺作品，借助网络传播热度持续扩大非遗的社会影响力。

五、结语

通过对大运河河南段音乐类非遗资源现状与传承策略的分析,本论文得出以下结论:大运河河南段音乐类非遗在长期发展中实现了运河文化与中原民间艺术的高度融合,作品兼具鲜明的地域特色、丰富的表演形式与深厚的文化内涵,形成了兼具历史性、民俗性与艺术性的完整体系;在传承层面,各类项目普遍面临融合不深、创新不足、传播单一、人才断层等现实问题,对保护方式、传播渠道与发展模式均提出较高要求,体现出鲜明的活态传承属性与时代发展需求。该系列非遗不仅丰富了中原传统音乐文化的实践内容,更在文化标识塑造、民俗生态延续、文旅产业融合与地域文化传播上为中国线性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重要参照,具有突出的理论意义、实践价值与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
- [2]李桂玲.文旅融合视角下大运河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与发展研究[J].文物天地,2025(08):90-93.
- [3]崔师瑜.河南段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元化传播内容研究[J].文化产业,2021(12):48-49.
- [4]赵倩.中原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路径研究[J].艺术评鉴,2023(05):156-158.
- [5]孙浩.线性文化遗产视角下大运河非遗跨区域协同保护研究[J].遗产与保护研究,2022(11):23-27.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Inheritance of Music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Henan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Zheng Yichen¹, Xu Gaohan¹

1.Luoy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dual background of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cultural powe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the dynamic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have become important direction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long the Henan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there are abundant music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such as Yu Opera, Heluo Drum, Henan Zhuizi and Shangqiu Suona, which possess extremely high cultural value 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Taking the music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Henan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dopts multiple research methods including literature research, case analysi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its main composition, cultural value a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representative programs, and explores the dilemmas and pain points in its current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ross-regional resource integration, immersive cultural tourism experience, digital communication empowerment and cultivation of compound talen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innovative inheritance paths for music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Henan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Music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Dynamic Inheritance

AIGC 时代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嬗变与重构 ——基于《飘》梅静译本与 AI 译本的对比研究

马云龙

(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 10068)

摘 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软件对文学翻译的介入引发对译者主体性的重新审视。本研究选取《飘》第一章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比梅静译本与 Deepseek 译本在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及环境描写的翻译策略, 以谢天振创造性叛逆为理论视角, 分析译本在文化传递、语域再现及文学风格重塑上的差异。研究发现: 梅译本具有有意识的审美判断、文化自觉和语域敏感度; 而 AI 译本尽管在语义准确性和流畅度上表现良好, 但在文化意向的深层激活、语域差异的系统性再现以及叙事氛围的整体把握上具有很大的局限。于此, 本研究提出, AIGC 时代, 译者主体性应从执行者角色转换为策展人, 从而让机器翻译在提高人的生产力的同时, 更具人的生命力。

关键词: 创造性叛逆; 译者主体性; AIGC; 文学翻译; 《飘》

基金项目: 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科研立项基金

DOI: doi.org/10.70693/202608301057

1 引言

以 ChatGPT、Deepseek 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迅速发展, 致使文学作品的生成方式、传播路径以及意义结构发生变化 (吴赞, 2026)。文学翻译涉及审美意蕴重构、文化异质性再现, 以及人物性格与情感基调细腻捕捉, “是译者以原文为基础、以文学艺术性为原则的再创作” (党争胜, 陈洁, 2026), 这些都高度依赖译者主体性, 需要译者在理解原文、选择策略、重塑风格时所体现出的文化自觉、审美判断和创造能力。袁筱一 (2026) 指出, 人工智能在创造性、审美在线与文化传达上存在明显不足。

《飘》作为美国南方文学的标志性作品, 其语言兼具叙事典雅、景物精致和方言鲜活的多重层次, 是检验文学翻译质量的理想文本。自 1940 年傅东华首译本问世以来, 学界已从多元系统理论、翻译规范、性别视角、归化异化等角度对多个中译本进行了丰富研究, 但尚无研究将人工译本与 AI 译本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进行对比。

为此, 本研究选取《飘》第一章英文原文, 对比梅静译本与 DeepSeek 模型在特定提示词引导下生成的 AI 译本, 聚焦于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和环境描写三类典型文本, 从创造性叛逆视角分析两种译本在文化传递、语域再现和风格重塑上的差异, 进而归纳人工译者主体性的具体表征与 AI 译本的固有局限, 从而重构译者主体性。

2 创造性叛逆溯源

“创造性叛逆”由法国社会学家埃斯卡皮创立, 后由日本和美国的学者引介和接受, 又通过跨国、跨语言传播, 为中国比较文学界接受, 最终在翻译学界产生了巨大反响 (梁新军, 2022)。国内发展主要依赖于谢天振先生, 在继承发扬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探索出了属于中国的“译介学”。谢天振肯定了埃斯卡皮的观点, 但认为埃斯卡皮的观点过于浅显, 对其进行了新的发展。他认为“除译者外, 读者和接受环境同样是创造性叛逆的主体” (谢天振, 1992), 扩大了创造性叛逆的研究对象。

作者简介: 马云龙 (2002-),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英语笔译。

通讯作者: 马云龙

在《译介学》中,谢天振将创造性叛逆分为有意和无意两种,并进一步划分为“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谢天振,1999)。这意味着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融入自己的个性,对源语文本进行改动、节选甚至忽略,从而使译介体系内各组成部分的含义在目标语文化中产生改变。此后,译界对于创造性叛逆的研究便几乎与译者绑定起来,将译者作为研究创造性叛逆的主要承担者。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语料选择、提示词设计与研究方法等方面遵循了明确的操作规范。

语料来源:英文原文采用1936年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飘》初版文本,具体章节为第一章全文,涵盖人物外貌描写、对话语言、环境叙述等多元文体。这三类文本分别对应了文学翻译中不同的主体性诉求:外貌描写考验译者对形象再现的审美判断与语言雕琢能力;语言描写考验译者对语域差异的敏感与再现能力;环境描写考验译者对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氛围营造能力。通过这三组对比,可以较为全面地揭示人工译者与AI在创造性叛逆层面的本质差异,进而为AIGC时代译者主体性的嬗变与重构提供经验参照。梅静译本选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全译本。AI译本则由DeepSeek V3模型生成。

提示词设计:为避免AI翻译的随意性、确保AI译本的质量基准,本研究在启动翻译前向DeepSeek模型输入了明确的角色设定与翻译要求,提示词按照“基础描述+功能约束+风格定义”(吴京等,2025)的要求进行设计。提示词如下:你是资深文学译者,精通19世纪美国南方文学与英中文学翻译。要求:只翻译节选内容,不增删、不改写,忠实原文细节与语气;专有名词首次出现用通行译名,必要时括号保留英文;对话体现人物身份与语域差异,底层人物语言可略朴实,但不用中国方言;保持原文段落结构与标点逻辑,不加注译或译者注;译文风格典雅流畅,有19世纪南方庄园氛围,避免现代词汇和翻译腔。

分析方法:文本细读法,从微观的词语选择、句式安排、修辞再现入手,结合宏观的文化语境与叙事风格,对两种译文进行平行对照。重点考察两种译本在面临相同的原文文化要素与语言难点时所采取的叛逆方式,探寻哪些是有机的创造性转化,哪些是机械的偏离与缺失。

4 文化要点翻译对比

4.1 外貌描写

外貌描写在文学作品中承担着塑造人物形象、暗示性格特征乃至铺垫叙事走向的多重功能。译者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在目标语言中再现原文的视觉冲击力,同时传递形象背后隐含的审美判断与文化信息。

例 1

原文: In her face were too sharply blended the delicate features of her mother, a Coast aristocrat of French descent, ...cutting a startling oblique line in her magnolia-white skin-that skin so prized by Southern women and so carefully guarded with bonnets, veils and mittens against hot Georgia suns.

梅译:她的母亲是法国沿海地区的贵族后裔,父亲是面色红润的爱尔兰人。她的脸既有母亲的娇柔精致,也有父亲的深邃粗犷。这种融合虽不甚协调,却也自有迷人之处:下巴尖尖,颌骨宽宽。淡绿色的眼睛不带一丝褐色。浓密的睫毛又黑又直,眼梢微翘。两道又黑又浓的眉毛斜斜上挑,衬着木兰般的白净肌肤,格外显眼。这样的肌肤,南方姑娘们都会十分珍视,万分小心地用遮阳帽、面纱和手套保护起来,免得被佐治亚地烈日晒黑。

AI译:她脸上鲜明地糅合着两种特质:一种是母亲那纤细娇柔的容貌,她母亲是沿海贵族,有着法兰西血统;另一种是父亲那粗犷厚重的轮廓,他父亲是肤色红润的爱尔兰人。但这是一张令人过目难忘的脸,尖尖的下巴,方方的颌骨。她的眼睛是淡绿色的,不带一丝淡褐,眼周镶着粗硬的黑睫毛,眼角微微上翘。那两道浓密的黑眉斜斜地向上挑去,在她那木兰白的肌肤上划出一道醒目的斜线——那种肤色,正是南方女子引以为傲、不惜用遮阳帽、面纱和手套精心护着,以免被佐治亚灼热的日头晒伤的。

分析:AI将too sharply blended译为“鲜明地糅合着”,忠实于字面,但有欧化倾向;梅译将其转化为“虽不甚协调,却也自有迷人之处”,将原文的负面判断转化为一种矛盾统一的美感,体现了译者对人物形象的文学理解。AI将arresting face译为“令人过目难忘”,准确但略显生硬,梅译的“自有迷人之处”则在忠实原意的基础上赋予了译文以中文审美质感,更符合文学翻译的接受语境。

描写肤色时,原文以magnolia-white skin为核心意象,后接长句说明这种肤色在南方文化中的特殊价值。

梅译将 *so prized* 译为“十分珍视”，将 *so carefully guarded* 处理为“万分小心地……保护起来”，并通过“免得被佐治亚地烈日晒黑”这一因果句式，使文化语境自然浮现。AI 译虽然完整保留了信息链，但“引以为傲”与“精心护着”之间缺乏梅译那种从“珍视”到“保护”再到“免受伤害”的递进感，且句子过长，不符合中文习惯。

例 2

原文：On either side of her, the twins lounged easily in their chairs, squinting at ... booted to the knee and thick with saddle muscles... blue coats and mustard-colored breeches, they were as much alike as two bolls of cotton.

梅译：兄弟俩一左一右，慵懒地斜靠在她两边的椅子上，手里各端了个插着薄荷叶的高脚玻璃杯，有说有笑地聊着。阳光透过杯子，晒得他们眯起了眼。两双穿着齐膝高靴的长腿随意交叠着，小腿都因骑马而鼓鼓的。脸庞晒得黝黑，头发深赭色，眼睛神采飞扬、傲气十足。两人穿着相同的蓝上衣和暗黄色马裤，活像两颗一模一样、难以区分的棉桃。

AI 译：她两旁，那对双胞胎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举着高高的加了薄荷叶的玻璃杯，眯着眼迎着阳光，一边笑一边谈。他俩的长腿，靴子长及膝盖，因常年骑马而肌肉结实；晒得黝黑的脸上，深赤褐色的头发，眼神快活而傲慢；身上穿着一样的蓝外套和芥末黄马裤，两人像两朵棉桃似的，几乎一模一样。

分析：*lounged* 一词描述了南方绅士的闲适姿态，梅译以“慵懒地斜靠”搭配“随意交叠着”，赋予了人物以阶层身份与生活方式的暗示；AI 译的“懒洋洋地靠在”虽未出错，却缺少了那种教养与优越感的微妙传达。在 *thick with saddle muscles* 的处理上，AI 通用化处理为“肌肉结实”，可以形容任何运动造成的肌肉；梅译则精确为“因骑马而鼓鼓的”，不仅准确对应了 *saddle* 一词的语义场，也使种植园子弟善骑射的身份通过身体细节自然呈现。

4.2 语言描写

《飘》第一章中的对话描写具有鲜明的社会语言学特征。不同人物的语言反映了其教育程度、社会阶层、地域归属乃至种族身份。其中最典型的是黑人仆从杰姆斯的方言——其拼写变形、语法“错误”和词汇选择共同构建了一种特定的口语语域，是原文叙事声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不同语言系统中再现这种语域差异，是文学翻译中最能检验译者主体性的环节之一。

例 3

原文：“Nawshu, Ah din' notice y'all say anything ter mek her mad. Look ter me lak she sho glad ter see you an' sho had missed you, an'... Den she quiet down lak a bird w'en de hawk fly ober.”

梅译：“没有啊。我没觉得你们说了什么会惹她生气的話。依我看，她见到你们挺高兴，也很想念你们，叽叽喳喳，跟鸟儿一样快乐。直到你们说阿希礼先生要跟玫兰妮·汉密尔顿小姐结婚了，她才安静下来，变得像只看到头顶有老鹰盘旋的小鸟一样。”

AI 译：“不，先生，我没觉着你们说了啥惹她生气的話。瞧着倒像是她挺高兴见着你们，也挺念着你们的，她叽叽喳喳跟小鸟儿似的快活着呢，后来你们讲起阿什礼先生和梅利·汉密尔顿小姐要成亲的事，她就静下来了，像小鸟见了老鹰飞过似的。”

分析：原文中杰姆斯的方言包含一整套非标准英语特征：首字母脱落、元音变异、语法简化、词汇拼写变形以及特有的感叹词。这些特征建构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美国南方黑人奴隶的口头表达方式，使其区别于白人角色的标准英语。

面对这一翻译难题，AI 译本放弃了方言特征的任何形式再现，仅保留了“先生”这一称呼，将 *Nawshu* 处理为“不，先生”：这实际上是标准英语的翻译逻辑，而非方言的翻译逻辑。除了“觉着”、“啥”、“鸟儿”等少数口语词汇外，AI 译本的杰姆斯几乎与一个标准英语使用者没有区别。这种处理方式完全消解了原文中方言所承载的社会文化信息：杰姆斯的种族身份、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在译文中变得不可辨识。梅译本则表现出明确的方言再现意识。译者通过一组精心选择的语域标记来重建口语感：“没有啊”开头的语气词、“依我看”的口语化表达、“叽叽喳喳”的拟声叠词、“跟鸟儿一样快乐”与“像只看到头顶有老鹰盘旋的小鸟一样”的明喻再现，用很朴素的语言显示出说话人没有接受过教育，只是在朴素的描述事件。梅译本也未对语法结果做特殊处理，而是进行“标准化”，同时在词汇和修辞层面赋予足够的口语化特征和生动性，使译文读者仍能通过语感辨识出这是一个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黑人仆从的声音。这一策略体现了文学翻译中一种重要的创造性叛逆：当源语言的

特定语言变体在目标语言中缺乏对应的社会语言学对等物时，译者转通过语域的其他维度（语气词、句式、修辞方式）来补偿原文方言的交际功能和文化身份建构功能。这是一种有意识的、策略性的主体性选择。

例 4

原文：“Don't you call Abel Wynder 'po' white.' Sure he's poor, but he ain't trash; and I'm damned if I'll have any man, darky or white, throwing off on him. There ain't a better man in this County, or why else did the Troop elect him lieutenant?”

梅译：“竟敢说埃布尔·温德先生是‘白垃圾’。他的确穷，但绝不是垃圾；任何人，无论黑人还是白人，谁要敢说他坏话，我都不答应。全县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要不骑兵连怎么会选他做少尉？”

AI 译：“你别管阿贝尔·温德叫‘穷白人’。他固然穷，可不是下等货；我可不许谁——不管黑人白人——糟践他。这个县里再没比他更好的人了，不然骑兵队怎么会选他当副队长呢？”

分析：这一例中的核心翻译难点在于 po' white 与 trash 的文化对应。po' white (poor white 的缩写) 是美国南方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社会阶层标签，指没有土地、没有奴隶的白人贫民，在种植园社会等级中处于底层。trash 则是贬义更强的侮辱性称呼，意指下等人、废物。两个词之间存在语义张力：斯图尔特允许别人说艾布尔“穷” (poor)，但不允许说他是“垃圾” (trash)。

梅译以“白垃圾”对应 po' white，“垃圾”对应 trash，并通过“竟敢说”开头的句子传递了斯图尔特的愤怒语气。这一处理在中文中建立了清晰的语义梯级：“白垃圾”比“穷”更具侮辱性，因此斯图尔特的反驳——“他的确穷，但绝不是垃圾”——在逻辑上成立且有力。AI 译为“穷白人”与“下等货”，在语义对应上没有错误，但“穷白人”在中文中是一个描述性词汇而非侮辱性标签，与“下等货”之间缺乏“同根词”的修辞呼应，削弱了原文中 po' white 与 trash 之间的语义关联。此外，梅译“我都不答应”比 AI 译“我可不许”语气更强、更口语化，更能体现斯图尔特年轻气盛、仗义执言的性格。

4.3 环境描写

环境描写在《飘》第一章中承担着双重功能：一方面构建故事的地理空间与时代氛围，另一方面通过景物描写承载文化与象征意涵。南方种植园的红土地、山茱萸花、原始森林等意象不仅是视觉元素，更与南方的历史记忆、种族身份乃至叙事主题（土地的眷恋与失去）紧密关联。环境描写的翻译因此不仅要求语义的准确，更要求意象的传递和氛围的保留。

例 5

原文：Outside, the late afternoon sun slanted down in the yard, throwing into gleaming brightness the dogwood trees that were solid masses of white blossom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new green.

梅译：屋外，夕阳斜斜地照着院子，把一片新绿中簇簇饱满的白色山茱萸映得闪闪发亮。兄弟俩的马拴在车道上。

AI 译：屋外，午后的斜阳洒进院子，将山茱萸树照得明晃晃的——那一树树密密的白花，衬着新绿的背景，格外耀眼。

分析：late afternoon sun 这一时间状语，AI 译为“午后的斜阳”存在不准确之处——“午后的”在中文中通常指向正午过后不久，而 late afternoon 更接近“傍晚”，梅译的“夕阳”更为精准。这是一个细节性失误，但恰好暴露了 AI 在时间语义精确性上的局限。

例 6

原文：Spring had come early that year, ... far-off bloody glory of the sunset colored the fresh-cut furrows of red Georgia clay to even redder hues. The moist hungry earth, waiting upturned for the cotton seeds, showed pinkish on the sandy tops of furrows, vermilion and scarlet and maroon where shadows lay along the sides of the trenches.

梅译：这年春天来得早。下了一场温暖的阵雨，大片粉红桃花和星星点点的雪白山茱萸便骤然绽放，把幽暗的河沼和远处的群山点缀得花团锦簇。春耕已近尾声，夕阳血红的余晖也把佐治亚红土地上新开出的犁沟映得更红了。湿润的泥土饥肠辘辘、嗷嗷待哺，等着播下棉花种子。犁沟的沙顶粉粉的，畦沟两侧的阴影处却既有朱红，也有绯红，还有紫红。

AI 译：那一年春天来得早，暖和的急雨骤然而至，粉红的桃花忽然间繁花满树，山茱萸点缀着暗色的河沼和远处的山峦，如白星点点。春耕已近尾声，落日那血红的壮丽光彩，将新翻的佐治亚红土垄沟染得愈加殷红。

湿润而饥渴的泥土，翻敞着等待棉籽播下，垄沟顶端的沙土透着粉红，而沟侧的阴影里则泛着朱红、猩红和栗色。

分析：这一例中，AI 译本的语义完整性和流畅度较高，“繁花满树”、“白星点点”、“血红的壮丽光彩”此类表达都达到了不错的文学水准。然而，梅译本在某些关键节点体现了更深层的文化自觉与审美判断。

在 the bloody glory of the sunset ... to even redder hues 一句中，AI 译文准确传达了语义，但“红土垄沟染得愈加殷红”中，“染”字暗示外部色彩对土垄的作用，被动意味较强。梅译“映”字更强调光与土之间的交互关系，且“新开出的犁沟”比“新翻的土垄沟”更具有动态的时间感，暗示春耕正在进行中，与后文“等着播下棉花种子”形成更紧密的衔接。在色彩词的处理上，原文末尾连续呈现了 pinkish、vermilion、scarlet、maroon 四个层次，描绘夕阳投射在犁沟不同部位所产生的细微色差。AI 译“透着粉红”、“泛着朱红、猩红和栗色”，以“透着”与“泛着”分别对应顶端的明亮与沟侧的阴影，逻辑清晰。梅译“粉粉的，畦沟两侧的阴影处却既有朱红，也有绯红，还有紫红”，以“阴影处”为逻辑引导词，并用“既有……也有……还有……”的排比句式，将四种颜色的并列呈现转化为一种逐步展开的视觉勘探，使译文读者仿佛跟随叙事者的目光从垄顶移向沟侧，获得了更强的画面沉浸感。

例 7

原文：It was a savagely red land, blood-colored after rains, brick dust in droughts, the best cotton land in the world. ...Be careful! Be careful! We had you once. We can take you back again.

梅译：这是片红得耀眼的土地，雨后更是红得像血，旱时如砖尘遍地，……沙沙作响的松树仿佛已耐心地等待了很久，用轻柔的叹息威胁道：“小心！小心！你们曾经属于我们，现在我们能将你们收回。”

AI 译：那是一片蛮荒的红土地，雨后如血，旱时似砖尘，是世界上最好的棉田。……那飒飒低吟的松树，仿佛怀着亘古的耐心在等待，用轻柔的叹息发出警告：“当心！当心！我们曾拥有过你。我们还能再将你夺回去。”

分析：这是《飘》第一章环境描写中最具文学性和象征意味的段落。savagely red land 开篇定调。savagely 一词兼具“蛮荒”、“凶猛”与“原始”的多重意涵，暗示了这片土地美丽背后的暴烈历史。AI 译“蛮荒的红土地”精准捕捉了核心语义，梅译“红得耀眼的土地”则在字面忠实上有所偏离，但“耀眼”一词呼应了后文 blood-colored、brick dust 的视觉冲击力。这两种处理各有千秋，AI 在词义准确性上胜出，梅译在语感连贯性上占优。

两种译本最大的差异出现在段末的警告部分。原文以拟人化的松树口吻发出威胁，这句话指向南方种植园的历史，是一种关于殖民、占有与历史循环的深沉隐喻。AI 译文的“拥有过”暗示一种温和的占有关系，“夺回去”中的“回去”二字使方向明确指向“重返此前状态”。梅译的“属于我们”比“拥有过你”更具主体与客体的层级关系，更准确地对应了 we had you 中 had 一词在 19 世纪南方语境中所隐含的主奴关系张力；“将你们收回”比“夺回去”更贴近 take you back 的语义，且“收回”一词在中文中适用于土地等非生命物，比“夺回去”更为贴切。

更值得关注的是整体氛围的传递。AI 译“略带阴森”、“发出警告”，虽然语义准确，但在语体上偏于说明性，将森林拟人化的威胁直接陈述为“警告”。梅译“带着几分不祥”、“用轻柔的叹息威胁道”，将森林的态度从直接的“警告”转化为一种幽微的、弥漫的“不祥”感，更符合原文 a little sinister 与 soft sighs 所营造的神秘而克制的恐怖氛围。梅译在“叹息”之后保留了原文的引文格式，“小心！小心！”的重复和感叹号，使拟人化的威胁获得了直接的听觉感，比 AI 译的转述式“发出警告”更具文学感染力。

5 分析与重构

5.1 译者主体性差异分析

基于上述三类文本的对比分析，可归纳梅静译本的主体性特征与 AI 译本的固有局限。

梅译本的主体性特征主要包括：一，梅译在文化负载词与意象传递中表现出明确的文化传递意识，无论是南方肤色审美观的强化，还是“白垃圾”这一阶层标签的精准对应，均非语义层面的简单对译，而是在跨文化传递与本土接受间的有意权衡。二，在形象再现与氛围营造中，梅译不被动追随原文字面顺序，而通过词汇选择、句式调整与修辞强化主动介入，赋予译文独立审美价值。三，方言对话处理中，梅译借语气词、口语化表达与修辞方式补偿中文无法直译英语方言语法变异的空缺，以语域补偿语域策略，体现译者对社会语言学结构

的高度敏感与创造性应对。四，面对人物心理、叙事态度与象征性威胁，梅译不仅传递信息，更通过语调把控传达原文的情感温度与叙事姿态。

AI 译本的局限主要体现在：一，表层忠实与深层扁平的悖论，AI 译文在绝大多数词句层面实现语义对应与语法通顺，个别片段甚至展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措辞能力，但面对需要审美判断与文化背景填充的文学性表达时，往往选择最常规、中性的处理路径，致使语义完整但文学质感与文化深度减损。二，文化知识碎片化严重，AI 在处理语义梯级时未能建立修辞呼应，在处理主奴关系暗示时选择温和化表达，这表明其文化知识虽广却缺乏系统性，难以在具体语境中激活深层历史文化图式。三，缺乏情感判断与叙事姿态。AI 倾向于将一切叙述材料等量齐观地翻译为信息，难以识别叙事中的温度点。面对方言、口语与标准英语的变体光谱，AI 的默认策略是将非标准形式统一为规范中文，虽保证可读性，却牺牲了原文的社会语言学结构；面对复杂修辞，也倾向选择最简单直接的表达路径，而非主动强化或重组修辞效果。

5.2 成因分析与主体性重构

两类译本在主体性层面的差异，根植于知识结构、认知方式与价值立场三重结构性因素。

知识结构上，梅静作为文学译者，其储备不仅包括语言能力，更涵盖 19 世纪美国南方历史、种植园文化、种族关系及中文文学表达传统的长期浸润，能够根据原文的语言风格有意识地适配历史语境（崔峰，2024）。AI 的知识虽广，却在文学翻译所需的语境化知识层面呈现碎片化，所进行的分析也只是统计学计算过后的产物，包含了无意义联结内容（仲伟合，2026）。认知方式上，人类翻译是理解—阐释—表达的连续过程，译者进入原文文学世界后，基于对人物心理、叙事姿态、场景氛围的理解进行有意识的强化、淡化或转化。价值立场上，梅静具有明确的文化中介者身份意识，对原文文化内涵与目标读者理解体验负有双重责任感，这驱动她在翻译中主动阐释、补偿与调适。AI 则无对谁负责的主体意识，其翻译仅为文本序列生成任务，而非跨文化交际实践。

上述差异为 AIGC 时代译者主体性的重构提供了逻辑起点。传统译者的角色是“文本执行者”。当 AI 能承担大部分忠实转换工作时，译者正转向“翻译策展人”：不再从零制作每一展品，而是在 AI 初译基础上判断、修改、润色，在多方方案间比较择优，在文化难点处深度补偿，在整体层面把控文学品质与跨文化效果。

据此可提出一个主体性重构的基本框架：横轴为技术介入程度：全人工—AI 辅助—AI 主导—全 AI，纵轴为译者主体性维度：语言转换—文化阐释—审美判断—策略决策。传统人工译者位于横轴最左端，纵轴各维度全面发挥；AI 全自动翻译位于最右端，各维度能力趋于浅层匹配；而理想的人机协同译者位于中部偏右，但在纵轴上向高端移动——放弃底层的语言转换劳动，将核心精力集中于文化阐释、审美判断与策略决策。这并非主体性的削弱，而是向更高维度的迁移。

对实践而言，这意味着一套新工作范式的形成：译者将 AI 视为“译稿起草者”，在 AI 初译基础上进行系统性人工干预，在质量检验阶段由人类译者主导（李俊德，2026）。这既要求译者保有传统语言功底与文学素养，也要求其掌握提示词设计、输出评估、人机交互优化等新协作技能，也需对人机协同的认知过程、质量标准与伦理边界展开更深入的探索。

6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飘》第一章梅静中译本与 DeepSeek AI 译本的文本细读与平行对比，揭示了文学翻译中人类译者与 AI 在主体性层面的本质差异。研究发现，AI 在基础语义转换层面已具备较高准确性与效率，但在涉及审美判断、文化意象传递、方言社会身份编码及叙事氛围整体建构等核心维度上，其概率性生成机制无法替代人类译者的意向性阐释过程。

这一差异的理论实质在于：创造性叛逆的本质并非语言的任意变形，而是以文化自觉和语境敏感为前提的有意图的阐释性转化。人工译者的“偏离”是文化中介者的主动调适，而 AI 的“偏离”是非意图性的统计产物。将创造性叛逆的分析视野拓展至 AI 译文后，本文更清晰地界定了“创造性”在文学翻译中的边界。它植根于译者对源语文化的理解深度与对译入语文学传统的驾驭能力，而这恰恰是目前大语言模型难以跨越的认知鸿沟。

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提出，AI 时代文学译者的主体性不应在技术冲击下退却，而应实现从“语言转换执行者”向“翻译质量策展人”的转型，从而让 AI 译本更具有人的生命力和审美。在人机协同成为行业常态的背景下，译者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强化机器所匮乏的文化阐释、审美判断与语境敏感能力。唯有如此，文学翻译

才能在技术洪流中守住其艺术品格。未来研究也可进一步扩大语料规模,引入更多译本类型进行横向比较,亦可通过翻译质量评估量表对机译文进行量化分析,以深化对 AIGC 时代文学翻译规律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 吴赞. 文本的异质性与文化的可译性: AIGC 语境下文学翻译的新挑战[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6, 65(3): 148-158.
- [2] 党争胜, 陈洁. 人译还是机译? 文学作品翻译的独特性再思考[J]. 中国翻译, 2026, 47(3): 123-132.
- [3] 袁筱一. 人工智能与文学翻译批评原则的再思考[J]. 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 2026, (1): 1-13.
- [4] 梁新军. “创造性叛逆”的跨国旅行与内涵变迁——对比较文学译介学一个经典术语的考察[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2, 45(01): 95-102.
- [5] 谢天振. 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2(1): 30-37.
- [6] 谢天振. 译介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 [7] 吴京, 王沈策, 牛虹苏. 基于提示词优化的 AIGC 辅助产品设计方法研究[J]. 包装工程, 2025, 46(16): 186-201.
- [8] 崔峰, 彭嘉馨. 《三国演义》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翻译与传播——以曾锦文岑岑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为例[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4, 47(5): 69-81.
- [9] 仲伟合, 陈严春. 生成式人工智能汉英翻译实践的幻觉及其纾解路径[J]. 中国翻译, 2026, 47(2): 130-137.
- [10] 李德俊.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对译者任务的再思考[J]. 外语学刊, 2026, (1): 7-14.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the AIGC Er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i Jing's Translation and an AI Translation of *Gone with the Wind*

Ma Yunlong

Tianjin Foreign Study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Abstract: The involve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has prompted a re-examination of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This study selects Chapter One of *Gone with the Wind* as its research object. By comparing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used in Mei Jing's translation and the DeepSeek translation in rendering descriptions of appearance, speech, and environment, and by adopting Xie Tianzhen's theory of creative treason as it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ranslations in cultural transmission, register reproduction, and the reshaping of literary style. The study finds that Mei's translation displays conscious aesthetic judgment, cultural awareness, and register sensitivity. By contrast, although the AI translation performs well in semantic accuracy and fluency, it shows significant limitations in deeply activating cultural imagery, systematically reproducing register differences, and grasping the overall narrative atmosphere. On this basis,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in the AIGC era,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should shift from the role of executor to that of curator, so that machine translation can enhance human productivity while being endowed with greater human vitality.

Keywords: creative treason;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AIGC; literary translation; *Gone with the Wind*

《礼器碑》清代书风流变探赜

李安妮

(泉州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 福建泉州 362000)

摘要:《礼器碑》作为东汉隶书名碑,以瘦劲挺健、方圆兼备、平正寓险的艺术特征著称。清代金石学兴盛与碑学思潮的发展,使其重新受到书坛重视,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取法倾向。清初书家重在探寻汉隶法度,通过品评与临习确立《礼器碑》的经典地位;清中期书家逐渐由点画摹习转向对篆隶关系、金石意趣与整体神韵的体悟;至晚清,何绍基、杨岷等书家进一步融入个人笔法与审美追求,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由法度探寻、神韵体悟到化古为新,《礼器碑》在清代的书风流变,既体现了历代书家对汉隶传统的不断阐释,也折射出清代隶书由复古取法走向个性化创造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礼器碑》;清代书法;隶书;书风流变;碑学

DOI: doi.org/10.70693/202608313014

在探讨中国古代书法史时,我们常常会面临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一件古代艺术品在它诞生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往往会遭遇不同时代人群截然不同的评价与对待。这种后人对前人作品的理解、品评以及在自身创作中加以应用的过程,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接受史”。在清代波澜壮阔的书法变革中,汉代隶书名碑《礼器碑》的接受史,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古代经典如何被后世唤醒、误读、直至重铸的绝佳样本。明代中后期,书坛长期被帖学体系所笼罩,文徵明等人的书风虽名重一时,但大多带有程式化的疲态。当时的学者如王世贞等人,多以固化的“篆意”与“波磔”来衡量隶书,致使汉代碑刻的真面目与内在张力长期被遮蔽。直到明末清初,随着社会思潮的剧变与金石考据学的复兴,学者们开始走出封闭的书斋,探访荒野枯庙中的残石断碑。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复古运动中,立于东汉永寿二年(156)的《礼器碑》凭借其独特的形质与神韵,迅速成为清代书家关注的核心。清代书家对《礼器碑》的接受,绝非一场简单的描摹,而是一部跨越近三百年的风格解构与重塑。从清初的法度探寻,到中期的神韵捕捉,再到晚清的化古为新,一件汉代经典是如何被后人一点点拆解,最终孕育出带有强烈个人情绪的书写图景的?

《礼器碑》全称《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最初是用来记录鲁相韩敕修葺孔庙、增置祭器以及免除孔子后裔徭役的功绩。作为典型的“庙堂巨制”,它在诞生之初就承载着东汉时期“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其书写自然必须合乎礼制的庄重与严谨。然而,这块原本冰冷的记功石碑,在清代碑学兴起后,却成为了书家们魂牵梦绕的精神寄托。要理解这种“经典化”的过程,必须先剖析其本身的风格特征。其以方笔为主,起收笔多取斜切之势,如“造”(如图1)横画的落笔,干脆利落,奠定了整块碑瘦硬挺健的基调。但在转折处,如“君”字(如图2),它又会不经意地融入圆转笔意,这种“方圆兼备”的手法,使得线条在瘦硬的外表下,依然保留了圆融厚重的内在质感。更令后世痴迷的是它在规矩中潜藏的灵动。例如碑文中的“世”字(如图3),其左侧竖画被处理成优美的“S”形曲线,瞬间打破了汉隶横平竖直的沉闷样式;而像“青”字(如图4)或“在”字(如图5)的波磔,在线条末端突然重按并迅疾提锋,形成了所谓“细如发丝,粗如扫帚”的强烈反差。这种在平正中暗藏险绝的空间处理方式,极大地拓展了隶书的表现力。

但在漫长的唐、宋、元、明时期,《礼器碑》曾经历过长达数百年的孤寂。宋代的欧阳修虽在《集古录》中最早著录此碑,但其关注点更多在于史料考证,甚至对碑文中大量使用的谶纬之言颇有微词,认为其辞藻不如汉初自然。直到明末清初,万历年间《曹全碑》的出土像是一个引子,引发了对汉隶风格多样性的重新认识。在这种背景下,《礼器碑》重新进入了书家视野。

作者简介:李安妮(2001-),女,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书法创作研究。

通讯作者:李安妮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图 5

一、初期法度探寻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推手莫过于郭宗昌。他在《金石史》中提到：“以余平生所见汉隶，当以孔庙《礼器碑》为第一，神奇浑璞，譬之诗，则西京；此则风瞻高华，如建安诸子。其字画之妙，非笔非手，古雅无前，若得之神功，弗由人造，所谓星流电转，纤逾植发，尚未足形容也。汉诸碑结体命意，皆可仿佛，独此碑如河汉，可望不可即也。”^②其不惜辞藻地盛赞《礼器碑》为“汉隶第一”，同时肯定了其笔画之妙仿佛有神灵相助，也认为汉人结体命意错综变化，有一种洒脱不羁、自然流露的精神，这与明代刻意求工的隶书有着天壤之别。

真正将《礼器碑》从理论推向创作实践的人是郑簠，作为清初隶书复兴的先行者，郑簠曾亲自前往山东曲阜，在石碑下摩挲推拓。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该碑用笔险绝的特质，指出其纤细处若游丝，重笔处如铁骑方展。到了清初末期，王澐的推波助澜则为《礼器碑》的经典地位盖上了最后的印章。王澐在《虚舟题跋》中提到：“余谓褚公书实自汉韩敕孔子庙碑来，《圣教序》与此碑几如出一手。”^③其认为褚遂良的楷书正是脱胎于此碑，这一论断，彻底打通了汉代隶书与唐代楷书之间的壁垒，从而得出结论：《礼器碑》内在的“理”完全可以滋养任何一种书体。

回顾清初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早期碑学家们以极大的热忱和严谨的考据态度，成功确立了《礼器碑》的法度基准。然而，当王澐、郑簠等人将点画的“形似”推向极致时，也不可避免地触碰到了线条僵化的天花板。这种对“绝对法则”的执念，使得《礼器碑》在清初更多地扮演着一个威严的教科书角色，书家们“识其法”却难以“游于艺”。当技法不再是秘密，如何透过这层冰冷的石花去触摸汉人的“神韵与意境”？如何让沉睡的经典真正活在这个人的笔墨之中？这便成了留给清代中期学者们的全新命题。

二、中期神韵捕捉

当历史的指针拨到清代中期的乾嘉年间，社会学术风气发生了深刻转变。“朴学”的兴盛，促使书家们不再计较线条的长短粗细变化，开始思考文字的源流，篆书、隶书与后世书体之间那条隐秘的血脉。正是在这种宏大的学术视野下，《礼器碑》迎来了它在清代的升华。

既然追求的是“神韵”而非“法度”，清中期的书家们在书写《礼器碑》时便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个人面貌。其中，桂馥最具代表性。桂馥一生精研《说文解字》，他认为写隶书如果不明白篆书的结构，就无法领悟隶书的变通之处。基于这种修养，桂馥在临习《礼器碑》时，进行了一场“参以篆法”的变化。他大量借用了摩崖石刻和篆书的圆转笔意，来弱化《礼器碑》的方硬。他笔下的线条，少了几分犀利，却多了一种雄强浑朴（如图6）。

与桂馥同时代的金石大家黄易，则在《礼器碑》中读出了另一种味道——“金石气”。黄易一生痴迷于寻访古碑，对风化残破之石颇为了解，因此，黄易在临摹《礼器碑》时，刻意利用毛笔与纸张的摩擦，去模拟刻刀游走及岁月剥蚀留下的自然痕迹。他将《礼器碑》原本略带官方严肃气息的庙堂之作，转化成一种充满沧桑古意的文人表达。而在安徽歙县，另一位名家巴慰祖则从《礼器碑》中汲取了“劲险飞动”的特质，他保留了《礼器碑》中极具视觉张力的瘦劲用笔，特别是在处理标志性的捺画时，姿态雍容大方，节奏起伏极为鲜明（如图7）。

如果说，之前书家们是在实践上对《礼器碑》进行了升华，那到清中晚期，《礼器碑》则是在清代接受史上进行了升华。嘉庆道光年间的郭尚先从藏书家汪孟慈那里得到了一份三百年前的《礼器碑》精善拓本。在仔细揣摩之后，郭尚先在《芳坚馆题跋》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评价：“汉人书，以《韩敕造礼器碑》为第一，超迈雍雅，若卿云在空，万象仰曜，意境尚当在《史晨》《乙瑛》《孔庙》《曹全》诸石上，无论他石也。”^④其中他将其与《史晨》《乙瑛》《曹全》等汉碑进行横向比对，最终断言《礼器碑》的意境“超迈雍雅”，在所有汉碑之上，甚至将其奉为“神品”。郭尚先所谓的“超迈雍雅”，实际上是点出了《礼器碑》最难被察觉的一种气质。它虽然点画瘦硬，但在整体气息上却呈现出一种不染尘俗的高贵与从容。

综观清代中期的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礼器碑》已成功褪去清初那层令人敬畏的“法度外衣”，转变为可以任由书家根据自身学养去挑选、交融的“书学资源”。从桂馥的篆法注入、到黄易的金石斑驳、再到郭

② [明]郭宗昌《金石史》卷一，《汉韩明府叔节修孔庙礼器碑》四库全书本。

③ [清]王澐《虚舟题跋》卷九，四库全书本。

④ [清]郭尚先《芳坚馆题跋》[M]. 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12.

尚先的意境升华。中期书家用温和而深厚的笔触，完成了对《礼器碑》的个性化解读。然而，这种基于古典文人雅趣的作品，依然保留着对原碑的肃穆与敬意。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晚清，大兴碑学思潮，这种对传统的解读已无法承载时代所带来的激流勇进。一场对《礼器碑》进行的解构与重塑之风，即将在晚清书家笔下蔚然兴起。



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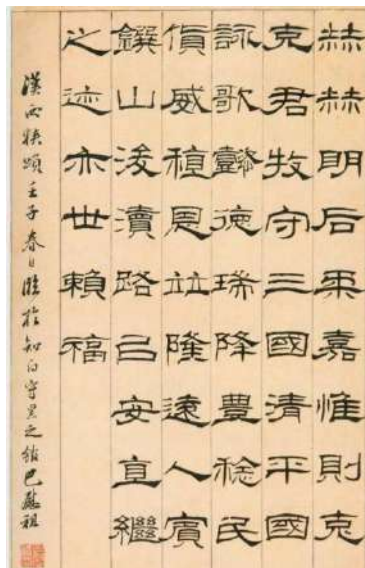


图7

三、晚期化古为新

晚清时期，碑学已经不再是少数文人书斋里的探赜考据，而是演变成了一场席卷整个书坛的艺术浪潮。在这个书家辈出的时代，被前人反复取法、深耕细研的《礼器碑》，迎来了声势空前的风格重塑。晚清书家对《礼器碑》的接受，彻底跨越了“形似”与“神似”的探讨，步入了一种带有强烈个人生命体验的“瓦解与重塑”阶段。在这场风暴中，何绍基与杨岷无疑是两座最为耀眼的高峰。何绍基被誉为清代碑学集大成者，他对待《礼器碑》的态度堪称痴狂。据其日记记载，他在咸丰年间辞官后定居济南，于泺源书院执教期间，对《礼器碑》和《张迁碑》各临摹了百通之多。马宗霍《书林藻鉴》中曾说道：“每临一碑，多至若干通，或取其神，或取其韵，或取其度，或取其势，或取其用笔，或取其行气，或取其结构分布。当其有所取，则临写时之精神，专注于某一端，故看来无一通与原碑全似者，味者遂谓蚩蚩以己法临古。不知蚩蚩欲先分之以究其极，然后合之以汇其归也。”^⑤精准地指出何绍基每次临摹《礼器碑》的侧重点都不同，有时求神，有时求气，有时求其结构。为了在柔软的宣纸上真正触及《礼器碑》骨子里的苍茫，何绍基采用了极为奇特的“回腕高悬”法，将全身力气灌注于笔端，往往不到半小时便汗透衣背。这种充满生气的书写方式，形成了大量干枯、战掣的线条，完美重现了硬石历经两千年风雨侵蚀后“金石斑驳之气”。更令人震撼的是他对内部空间的解读，何绍基将周秦篆书的圆浑气象注入隶书，把《礼器碑》原本严密紧凑的中宫拉开，使字形变得宽博散淡，带有一种奇妙的欹侧之美。（如图8）

如果说何绍基是向内挖掘，那么与他同时代的杨岷，则是向外扩张。杨岷深知学习此碑的难度，他指出《礼器碑》需要“运实于虚，笔笔凌空作飞舞势”，同时又必须“飞舞而仍沉着”。在创作中，杨岷极其敏锐地抓住了《礼器碑》中线条与波磔之间形成的强烈反差，并将其夸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他行笔速度极快，字的主体笔画被写得削瘦挺拔；而当笔锋运行到燕尾时，他会突然重按笔毫，疾速甩出，形成一个充满爆发力的收笔。这种极度克制与极度放纵的交织，彻底摧毁了汉隶四平八稳的特征。在杨岷的笔下，《礼器碑》被改造成了一种宣泄晚清文人孤高狂放情绪的利器。

在双峰并峙的余波中，曾熙与李瑞清等人继续拓宽着接受边界。曾熙继承了何绍基的认知，强调“得殷书秦篆三昧始可与言礼器”。^⑥李瑞清则在众多汉碑中“独喜《礼器》”，他不仅看到了此碑在上承甲骨、下启唐楷中的枢纽地位，更从经学角度高度赞赏了其碑文。通过出版其临摹字帖，《礼器碑》的经典地位在清末民间得到了空前的普及。这些重构之所以能够发生，离不开如“翁同龢本”这样保留了清晰锋劲细节的高质量拓本的广泛流传，它们为书家们的“借古开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⑤ 马宗霍. 书林藻鉴[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245.

⑥ 曾熙. 隶书课徒卷[M]//朱大可. 曾熙书论集.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36.

回顾《礼器碑》在清代近三百年的接受与传播历程,我们仿佛阅览了一部浓缩的中国传统艺术由古向今的思想演变史。清初学者带着对历史的敬畏,试图在方寸之间破解汉隶规范;清中期学者跳出技法层面,以意境和小学为尺度,为经典的演变扫清了理论障碍;而到了晚清,书家们则以古人为养料,在纸墨的剧烈摩擦与线条的极端夸张中,将个人的性情宣泄得淋漓尽致。一件古代碑刻之所以能够穿越两千年的岁月长河成为不朽的经典,绝不是因为它一成不变。相反,正如《礼器碑》所展现的那样,它内部蕴含的方与圆、刚与柔、平正与险绝的丰富矛盾,就像一个永不枯竭的泉眼,激发着后世书家不断地去汲取、融合、化用。清代书家们在《礼器碑》上所付出的实践智慧清楚地昭示了一个规律:在面对传统艺术时,一切有效的继承,最终都必须以破除它为代价,从而才能走向具有时代气息和强烈个人面貌的艺术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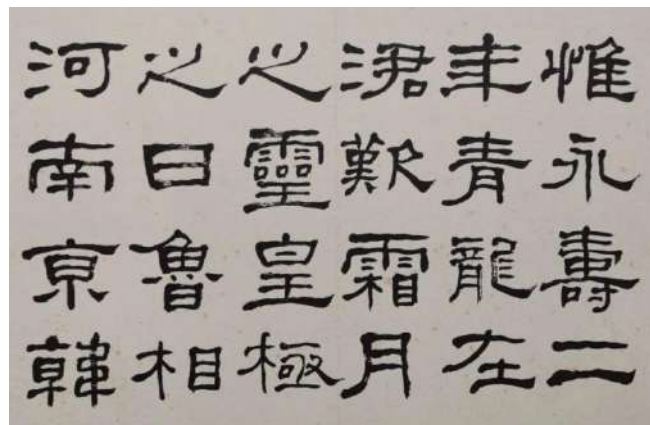


图 8

参考文献:

- [1] 郭宗昌.金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2] 王澐.虚舟题跋·卷九[M].四库全书本.
- [3] 郭尚先.芳坚馆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
- [4] 马宗霍.书林藻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245.
- [5] 曾熙.隶书课徒卷[M]//朱大可.曾熙书论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36.

An Explor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alligraphic Style of the Liqi Stele in the Qing Dynasty

LI Ann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China

Abstract: The *Liqi Stele*, a celebrated example of Eastern Han clerical script, is distinguished by its slender yet vigorous strokes, integration of angular and rounded brushwork, and balance between stability and dynamic tension. With the flourishing of epigraphic studies and the rise of the Stele School in the Qing dynasty, it became an important model for calligraphers. In the early Qing, calligraphers focused on exploring its formal principles; by the mid-Qing, attention shifted toward its epigraphic aesthetics and artistic spirit; and in the late Qing, calligraphers such as He Shaoji and Yang Xian transformed its brushwork and structure into individualized expressions. This evolution from formal emulation to spiritual interpretation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of Qing clerical-script calligraphy from revivalist study toward individual artistic creation.

Keywords: *Liqi Stele*; Qing Dynasty Calligraphy; Clerical Script; Evolution of Calligraphic Style; Stele School.

弱者的悲歌：《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的视听象征与悲剧叙事

陈 矿

(成都大学 影视与动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要：《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小说是由山田宗树完成于2003年，2006年由中岛哲也导演改编完成了电影作品。导演中岛哲也通过艺术手法使作品充满了导演个人独特的风格，用松子这一形象向观众展示了社会对人造成的精神危机的影响。通过分析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的视听象征，探讨中岛哲也在改编及电影创作中运用的悲剧叙事的手法。借以此分析松子这一人物角色塑造的成功之处，以及这一形象带给观众的思考与价值。

关键词：《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视听象征；悲剧叙事；中岛哲也

基金项目：川北健康人文研究中心项目“精神分析视域下弱者建构与文学需求研究”（编号：NC26CB04）；教育部跨学科课程教学改革创新改革虚拟教研室2026年度跨学科教学改革创新研究项“数智赋能戏剧影视文学跨学科教学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26JY02）

DOI: doi.org/10.70693/202609015227

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东曾指出：“小说与电影像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在交叉的那一点上，小说和电影几乎没有区别，可是当两条线分开后，它们就不仅不能彼此转换，而是失去了一切相似之点。”^[1]文学是通过字词的意象去描写，通过读者的想象来进行感知，电影通过屏幕直接成像去完成完整人物的形象以及故事情节的介绍。本文基于文学改编以及日本二战后的社会背景来研究日本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作为一部优秀的小说改编的影片，它既节奏明朗地道出了小说中的人物故事，同时也完美融洽了导演鲜明的个人风格。《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松子作为一个典型的受家庭影响最终走向扭曲亲密关系的案例，其身上所映射的家庭问题及环境问题，值得我们去挖掘反思自身的亲密关系。电影对于人生存在意义的追问极具哲学思辨精神，松子在荒诞世界中的挣扎是一种来自普通人的顽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不同时代人的生活与处境，面临的选择与虚无，不同男性与女性的转变也将促使我们对于自身的意义进行深刻思考。

一、日本女性电影和《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一）日本女性电影

在日本电影发展过程中，内容上总是会有家庭生活，女性则与家庭产生了不可缺少的关系。在小津安二郎的《东京故事》（1953）中，在最后一幕中，儿媳悲痛地捂着脸，承认自己心胸狭窄，被影评人士认为是小津哀婉、含蓄的美。根据川端康成上世纪70年代的小说《伊豆的舞女》（1974）改编的电影，则是跨文化传播，人们了解日本女性，了解日本文化的中介。在全球化的电影发展中，日本电影的传播出现了如安藤桃子，河濑直美等女性导演，她们表达更多与女性有关的故事。以女性的审美视角创造出许多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不同的导演对日本女性的形象会有一定的差异，但是从江户时期开始，日本女性的整体文化就受到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对于女性的要求是万事遵从男性的意愿，做好相夫教子的工作。同时，在日本古代神话中，天照大神是女人的化身，温柔善良，柔情似水，不仅具有伟大的神力，还具有坚忍的气质。正如《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中表达的：“日本的男人都是儿子，女人都是母亲。”^[2]在日本社会中，女性更多是被男性依赖，类似于母亲一般隐忍的。

这种对于理想女性的期待也在电影中可见一斑，以天照大神为原型的温柔隐忍的女性形象最先在日本引起广泛关注，“大和抚子”便是以此为原型的一个经典类型角色。“大和抚子”固然是温柔体贴，但是其背后的男性权利色彩却应摒弃。随着后期“恶女”形象的出现，也同样代表着日本文化。日本神话中的“恶女”伊邪那美抛弃自己畸形的孩子，追杀由于外貌而抛弃自己的丈夫，内心冷酷狠毒。在这种日本文化影响下，电影人为表达冷漠社会，也催生出了经典恶女形象。这些作品中的恶女形象也不乏一些反面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日本式的人物性格设计。同期还出现了一批“森女”形象，代表着清新与自然的女性形象。这是少女都是日本人信仰的体现，是对真善美的期盼。在不同类型的日本女性电影中我们也得以了解到日本的文化以及日本的社会状态和生活诉求。

（二）《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的女性弱者形象

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主人公松子从小便生活在父亲对于生病妹妹的偏爱中，为了获得父亲的关注与喜爱最终养成了忽略自身感受的讨好型人格，这也直接导致了松子充满悲情色彩的一生。松子从幼时起就学会了忍耐，她眼巴巴地望着父亲带回来的礼物，最终被送到了妹妹久美的房间。她不哭不闹，只是默默地站在楼梯下方，成长过程中也完全按照父亲的意愿学习工作，频繁使用唯一可以博得父亲一笑的小丑表情，只为父亲能像疼爱妹妹一样地疼爱自己，但是直到离家出走松子也未能等到父亲的温暖关怀。长大后的松子将这缺憾的爱寄托在爱情上，与一个个情人纠缠中，她忍受着来自情人的打骂，遭受着被利用后的抛弃。

生活在男性社会规则下的松子即使完全抛弃了自我也没能得到一丝善待，中年时期的松子变得粗鲁无礼，臃肿懒惰，抛弃了所有附着在女性身上关于“理想女性”的枷锁。她将自己从男权社会的期待中完全的剥离，失去目标的松子选择了一种非常消极的生活方式。她整日待在出租屋里，在垃圾遍布的房间里看电视，这种无尽的空虚，盲目的生活最终让她患上了精神疾病，并对自己的人生意义产生严重怀疑。电影中松子的性格形成展示了父权社会下原生家庭对孩子的伤害，通过展现男权社会下女性的悲哀处境，控诉日本社会的种种问题。

除了主角之外，电影里还有三种不同的女性形象。第一个是松子的母亲，她代表传统日本社会中的妇女，她们在家庭中几乎没有话语权，被家长制男尊女卑思维限制在家庭的边缘化。第二种是松子狱中的好友泽村惠，她做事干练，不在感情或经济上依赖男性。还有一类人物形象是主人公侄子阿笙的女友明日香，明日香作为日本新一代的年轻女性，在影片的开头如同众多年轻人一般对生活感到空虚与迷茫，找不到人生方向。明日香主动向阿笙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与阿笙在一起无聊的时光使他选择了分手，并且最后选择去国外当国际志愿者，也展示了年轻一代女性视野更广阔在追求自身价值的路上脚步坚定，这代表了导演对于新一代女性的追求理想的期待。

二、《松子》影视化之视听象征

影片中的虚拟世界与真实社会的物质世界之间的关联建立和发展时至今日，已然形成了对人们来说至关重要的精神文化的构成部分，因此影片中不但有对真实人、景观、事物、社会现象的浅层刻画，还能运用各种修辞和表现手法在故事和角色的心灵展现上，进行更深刻的镜像重构、剖析刻画和精神情感传达。^[3]根据同名小说所改编的影片《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描述了松子追求爱的一生中充满悲剧意味的黑色童话故事，从男权社会的压迫中探寻女性角色生存中的人文意义。

（一）符号化的意象表达

在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诞生了许多隐喻意象，这种隐喻意象正如能指和所指一般，由不一样的隐喻意象元素共同指向一个人情感表达，而且隐喻意象元素可以成为单一的个体，而在能指和所指间却又有着区别。画报一般用来装饰环境，在此电影中则是作为暗示作家八女川性格的隐喻。八女川家里的墙上挂着一张太宰治人像的画报，太宰治作为无赖派文学作家通过创作颓废的社会生活来反抗当时的日本社会，用文学作品进行抗争，渴求自由解放。通过墙上太宰治画像这一隐喻解释了八女川充满愁绪不满，容易暴躁的颓废生活，并且暗示八女川最终自杀的命运。

同时太宰治的人物影响在剧中也多次出现，八女川在自杀前在纸上留下太宰治《人间失格》中的一句“生而为人对不起”。松子为了追随八女川选择在太宰治自杀的河里寻死，并且在中年精神失常时也在出租屋外的墙上写满了“生而为人对不起”。太宰治的人物安排的影响也不仅仅是浮云表面的，细看松子与不同情人的相处模式其实也与太宰治的小说《维荣的妻子》中有所关联，这篇小说也是写于二战之后，男主人公大谷是一位诗人，虽有才华但收入少对妻子也并不关心。妻子为了赚钱去小酒馆工作，有时不得不笑脸相迎地陪着客人开些不入流的玩笑。在战后的一段时间内，社会治安很乱以致于民众的道德感很低，这也反映了战后日本男性对女性的物化。这里的活着一方面是因为战争的阴影另一方面也是太宰治借由这种颓废堕落的生活向社会的一种反抗。在影片中，松子为了得到龙洋一的陪伴，不惜成为女混混。这种在感情上的迁就与颓废的女性思维是男权社会心爱的衍生物，也是导演及作者想要从其中让观众醒悟的安排，用一种悲剧表达对于社会制度的反抗。

关门的重复性动态在电影中指引着截然不同的情境与状况。电影中冈野健夫曾两度背对着松子打开的房门，一次是冈野健夫因为才华上比不上八女川，并且因没法获得像松子那样的女子而心生妒忌，不愿正视八女川和松子的缠绵，于是带着挫败感转身关门离开。但第二次却彻底变了情况，当八女川死亡以后冈野健夫变成了具有信心并且占有松子的男性，这一次则是离开带着被老婆捅破和与松子私情的尴尬，同时更多的是抛弃松子的坚决与不屑。

小丑表情是松子为求得父亲关注的方式，最终却形成了应激反应，暗示了家庭对松子产生的心理影响之深，同时也成为了松子出现的标志与符号。影片中伴随着松子人物形象出现的标志性动作便是做小丑表情，照片中松子穿着整洁的和服，对着相机做小丑表情的这一形象也成为了电影的标志。电影中的雨雪天也都分别暗含了死亡与悲伤的氛围，影片中第一次出现雨天就是在松子的作家男友自杀的夜晩，此后两次的雨天中，坐在车里的合伙人小野寺；雨天与龙洋一拥吻的松子也全都去世。所以影片中雨天是一个信号也是一种预示，带有一种强烈的隐喻宿命感。

（二）歌舞剧式的配乐

影片中在塑造黑色童话故事上的配乐《弯弯腰，伸伸手》，这是影片中的主题曲，从影片的开始，身穿红色连衣裙的小女孩松子便在河边唱起这首歌，歌词中描写伸伸手就可以碰到星星。这种唯美的镜头语言以及充满童趣的歌词，却没有引领故事像一个童话般圆满进展。第二次再出现这首歌是由一堵墙分隔病房中备受疼爱的妹妹，以及病房外孤零零的松子，她边唱着歌谣边用坐在椅子上脚尖跳舞。这首歌谣再下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医院，中年松子拖着臃肿的身体，依旧在椅子上脚尖跳舞，同样没变的是她孤身一人。从影片开始的动人歌谣到最后一种落寞的画面，无不通过配乐展示出这是一部黑色童话故事的电影。

背景配乐也揭示了人物的心灵映射。唯一一次父亲带松子去游乐园，舞台上的童话公主演唱时，特效CG镜头在画面中添加了纷繁艳丽的花朵、以及闪闪发光的蝴蝶，梦幻般的场景配上甜美的歌曲Candy Tree，“没有人能恨我脸上的笑脸，我的每句话都如音乐般悦耳”，映射着松子内心深处的激动喜悦，也让父亲的陪伴显得愈发珍贵。第二次是在游乐场，沮丧的松子向弟弟借钱。尽管她被作家男友打得眼睛瘀青，裹着纱布，还是跟弟弟撒谎称男友温柔有才华对自己很好。舞台上的演员们唱着《爱是谎言》“这都是谎言，谎言，谎言”营造出一种难堪又无奈的悲惨处境。

电影音乐不仅可以起到增强情感、描绘气氛的作用，还可以起到描绘现实生活的作用。松子在整个童年时期都渴望得到父亲的爱最终没有得到，恋人一个个离去，幸福似乎已经离开了松子，背景音乐Love is bubble爱情是泡沫似乎是主观意愿的体现，希望与爱都成了泡沫。在监狱中与狱友以MTV形式演唱歌曲What Is A Life，女囚们因为充满压力且无力反抗的生活而机械地陷入绝望的监狱中，歌曲充满了愤怒、勉强和无助；松子也如女囚们一样找不到生活的希望，但在音乐的后半段松子唱到“如果有爱，生命就可以继续”，这是松子在牢狱生活的清醒反思，重新确定了她的生活目标，想要重新获得她的爱情，并为她出狱后找到岛津健二和积极生活创造条件。

（三）明艳饱和的色彩

光影和色彩不仅在在电影中表现画面和时空关系，对情绪和氛围也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影片中色彩的变化也隐喻着情节张力。影片中三次表达到松子觉得自己的人生要完了，每一次的画面颜色都揭示了松子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内心感触。第一次是在学校时，松子因为偷同事的钱为学生顶罪，同时还被这个学生诬陷自己百口莫辩的时候，松子觉得自己的人生可能要完了。这时的画面中除了一扇窗户透进来亮光，其他主体以及房间的颜色都是黑色的，松子穿着黑色的连衣裙，校长以及其他老师站在松子的对立面，黑压压的，黑暗一方面代表了松子高光的工作要告一段落，预示着松子将要被辞职，同时也暗示了教育环境的黑暗。第二次是在火车展台前，作家男友八女川自因为饱受内心对于无法反抗社会，自己的才华无人发现以及对于松子的愧疚而自杀时，倾盆的大雨几乎要将两人吞噬，这里的画面几乎全部是蓝色的，蓝色的光晕打在松子的身上，同时红绿灯的红光也一闪一闪地打在松子的脸上，危机与孤独悲伤在这个色调中被悄然诠释。第三次是在与合伙人小野寺同住的家里，松子面对着红色的血泊与尸体，红色的布光充斥在房间里，这是血腥与危险的信号，是触碰法律红线，是击碎松子理智的信号。浓郁饱满的颜色宣泄了松子内心的苦闷与憋屈，最终用一种壮烈般的方式爆发。

同时，《松子》这部影片采用了多种画面色彩，营造出一种童话般的视觉影像，当松子唯一一次与父亲在游乐场时，画面中充满了温暖的黄色及红色色调，画面上也处理成发光般的效果，营造出松子内心小鹿般的雀跃与童话般的美妙感受；在与理发师岛津相处过程中，画面都充满粉色的色调，童话般梦幻的粉色的甜蜜的，但也如同樱花般短暂；在迎接龙洋一出狱时，松子身着一身白衣站在雪地里，洋洋洒洒的大雪落下，画面中全部都是白色以及一束红色玫瑰的颜色，这种朦胧唯美的白无不展示着导演大胆使用色彩调动氛围的艺术功底；在影片结尾，松子被少年们打倒在暗绿色的草坪上，幽深暗蓝的湖水映照黑压压的天空，绝望从黑暗中爬出来将松子吞噬，松子用一种荒诞的死亡方式彻底离开了，她的一生也在电影色彩的调度下变成了一部令人心痛的黑色童话故事。

（四）流畅紧凑的节奏

整体节奏上，影片采取多个视角介绍松子的平生。首先是阿笙搜集松子的资料，然后根据故事中的线索，将松子的模样展现给观众。在电影中，阿笙被叫去收拾松子的遗物，因此他就在松子的生命历程中，从父亲、警员、邻居、泽村惠阿龙五人口中得知了有关松子的片段。大家都在说关于松子的故事，虽然各有其局限，但透过六人的角度，松子的人物与人物最终得以圆满。在父亲、警察、邻居、大姐、阿龙五个人的回忆里，运用顺叙、插叙、倒叙等多种方式，提升影片的戏剧性和可看性。

细微节奏上，影片采用了多次的交叉蒙太奇控制画面上的节奏，阿笙女友明日香提出分手后画面通过节奏感音乐扭转到阿笙在酒吧跳舞，酒吧动感的音乐，跳舞的画面与明日香冷静的画面相互跳接，整个情节更有趣味性同时表现出阿笙的无奈与尴尬；阿笙在去往松子住的屋子外看墙上的涂鸦时，镜头与松子当时写下这些话的画面相互交替，同时在松子的邻居大仓攸二向阿笙讲述松子时，画面也与邻居的描述相对应，这样的节奏补充了叙事者话语上的单薄，观众得以更为清晰地了解故事。同样的还有松子向妹妹讲起在学校喜欢的男老师佐伯时，对男老师的描述与人物的形象对应，这一情节的节奏把控与画面表现让影片呈现出喜剧效果。

影片中还通过梦境来丰富节奏，松子的侄子突然从梦中醒来，看见松子穿着和服站在夕阳下。松子的语气越

来越欢快,朝阿笙做了个鬼脸,阿笙从梦中惊醒,平静后发现是在睡梦中呼唤他的女朋友和松子的声音重叠。弗洛伊德提出:“梦的操作包括四个步骤,其中之一就是移情。”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都有抑制自己的功能,梦的出现打破突破口这一抑制功能,使其能够复制被压抑的物质或事物。^[4]这时,阿笙的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与空虚,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想法,于是在梦境中与姑姑松子重温了往事。在他的梦里,姑姑松子的歌声来自他现实生活中女友的歌声,阿笙两首歌之间的错位表现了他与松子沟通的内在需要,也揭示和释放了他长期压抑的内心想法。梦境的存在成为阿笙认识松子的又一媒介,也丰富了松子的情感表达和心理描写。

本片的叙事节奏突破了时间和空间关系的局限,使情节的讲述完全游离在了时间的局限以外。广告片中常见的拼贴化和碎片化的表现形式,在电影中往往具有把故事线索串起的效果,通过截然不同的故事角度在增加故事性的时候能很好地带动听众走进情节,并对松子的生活形成心理情感的共振。

三、《松子》之改编化悲剧叙事

(一) 悲凉的家庭环境:冷漠与依恋关系的失衡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废除了传统的父权制度,但日本社会仍然保持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由于历史影响,男性在这种模式中占主导地位。妇女在就业方面的明显劣势促使已婚女性选择做家庭主妇。日本家庭中的男女分工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因此家庭权力通常掌握在男子手中。松子的家庭就是这样一种男权中心主义传统家庭,父亲拥有核心地位是权利的拥有者。父亲帮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培养安全感,而母亲的角色则与自我认同感相对应。^[5]在松子的家里,父亲是一切的主导,掌握着全家人的生活,而母亲是个完全没有地位,没有话语权的人。在松子的家里,爸爸不仅支持着家里财政,也同时也是家里精神上的支柱。家庭中对于母亲这一角色是很忽视的,这也导致松子更加的对于女性这一角色的认知失调,并且无法真正的认同女性这一心理角色。母亲这一角色的缺失,使松子更加无法掌握正确的依恋关系及亲密关系。在这样一个男女地位不平等的家庭中长大,松子从小就从内心否定自己的女性角色,无法全心全意地认同自己的女性气质,导致她在后来的所有关系中都缺乏自信和自爱。

松子从国立大学毕业,又是学校的班主任,可以说是极为优秀。在学业和工作上的卓越表现并没有使松子成为家庭的宠儿。相反,妹妹久美因为长期卧病在床,受到父亲的关爱。松子将未能从家庭中得到的爱转化成对爱情对陪伴的追求,她极度的不安全,极度的恐惧,而她对爱情的偏执,就是由于小时候缺少父亲的关爱。不平衡的爱情最终酿成了悲剧。

(二) 恶化的工作环境:盲目与自我意识的失调

自我意识即自己对自己的观察与了解,对自己身心活动以及人际关系的关注。自我意识主要包括三种心理成分分别是自我认识、自我体验与自我监控。结合小说及影片得以总结松子在老师到浴池女郎再到理发师以及女混混的职业转换过程中自我意识逐渐失调过程。松子按照父亲期待成为一个中学教师,学校原本应当是一个温暖明亮的地方,但从小说描述中,当松子提到以后是一个男女平等的时代时,学校的老师及领导都投来凝视。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松子的女权意识在逐渐苏醒,但在日本,在男权观念的影响下,她并没有反驳,反而选择了退让。在这一环境中,松子的自我认识出现了偏差,自我认识是对客观自我的主观认识和评价,是对自身身心特征的认识,作为一个老师她足够爱护学生教学认真,但是对自己的身份不够明晰,无法认识到自己在社会和集体中的地位及作用,对于问题学生一味包庇,采取一种溺爱的方式教育学生。在解决这件事情的事情时忽视了应该对学生的道德培养与应予的教育。

自我体验是主体自我意识引起的内在情感体验,是主体对客观自我的一种主观态度,如自信、自卑、自卑、自满、内疚、羞愧等。自我体验通常与自我认知、自我评价以及三观理解联系在一起的,自我体验是自我监控的前提。自我监控是对自身行为的理性控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动行动,二是制止作用,即控制行动,约束与行动无关或妨碍行动的行为。^[6]在浴池女郎这一工作的自我体验上松子是麻木的,在跟小野寺之后加大的工作压力与身体精神的伤害使她精神状态更差。在小说中描述松子一天的服侍客人,从早到晚总共十一个。在这时松子的精神和肉体都已经达到了极限,几乎每天凌晨两点钟才结束工作。而这份工作上的压抑以及小野寺花光所有钱给别的女人甚至差点掐死松子的行为也最终引起了松子自我监控的失败。

(三) 失衡的教育环境:暴力与空虚迷茫的失控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青少年犯罪激增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日本青少年犯罪呈现出以下特点:一、青少年犯罪呈现出一定规模的集团化和团体化的发展到战后,青少年犯罪率又呈现上升的趋势。犯罪往往是一时冲动和自发的,包括且不仅限于盗窃斗殴纵火谋杀等。二是青少年犯罪人数逐渐上升,青少年犯罪人员主要集中在大学校园内,青少年犯罪人员主要是从事学习和生产的劳动者。三是青少年犯罪的心理上更多的是对于制度的无视,缺乏自制力且厌世思想弥漫。^[7]

影片的故事线中也暗示了当时社会上青少年犯罪的问题。松子在中学任教时龙洋一偷走旅店老板的钱拒不承认,且诬陷松子胁迫他,从而导致松子被辞退。在影片的开头松子带着学生在水上划船歌唱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一个过肩镜头，是龙洋一在与其它的青少年打架斗殴。龙洋一这一人物角色暗含了日本青少年的一个典型形象，年少时打架偷窃长大后成为了黑社会的一员，并且长期处于一个斗殴以及进行毒品交易等黑色产业的一个典型形象。同时，导演对于青少年暴力行为这一行为的关注还表现在影片最后，松子死于一群中学男女的棍棒之下的时候，也代表着导演对于日本当时青少年犯罪形象的控诉。家庭教育是个系统工程，父母的确与孩子的世界是不同的，但也并非全然相反，对于那些失足犯错的孩子，绝不该放任自流任其纵横发展。同时在当时的日本社会由于西方平等自由等观念的影响，许多家庭对孩子形成一种骄纵与溺爱的教育方式，这种教育方式不仅教不好，反而会使孩子目无法纪心理脆弱走上犯罪的道路。

结论

通过喜剧配乐和相应的剧情安排，影片向我们展示了松子悲苦的一生。通过悬疑到揭示松子死亡的真正原因，体现了其作品的深层伦理呼唤。《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无疑是一部成功的经典电影改编作品，山田宗树对于松子的叙事结构并没有束缚导演的创作，中岛用夸张的手法和多种视角将她神秘死亡后的生活碎片化，让故事保持悬念，一步步吸引观众关注松子的悲剧人生。这个多角度的故事赋予了一个看似普通女人传记式的故事一个创造性的转折。同时，还有绚丽多彩的视听风格，中岛哲还以极其生动华丽的影视风格传播浓郁的个性色彩。除了绚丽多彩、夸张的人物外，中岛还利用广告和CG动画来丰富影片的视觉元素。自成一体的电影创作在日本形成了一种新的电影风格。在改编思维电影作品与文学文本的关系上，电影改编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不再坚持“完全忠于原创”的信条，而是更加注重导演主体意识的培养和个人风格的表现。如何在小说基础上进行巧妙的影视化创作是中国电影改编市场一直需要探讨实践的事情。

参考文献：

- [1] (美)路易斯·贾内梯.认识电影[M].焦雄屏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 [2] (荷)伊恩·布鲁玛 张晓凌,季南 译.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 [3] 张志强.《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视听语言分析[J].电影文学,2020,(10):149-151.
- [4] (奥)弗洛伊德.梦的解析[M].刘徽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
- [5] (美)伯格.人格心理学(第8版)[M].陈会昌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
- [6] 邹红军.新时代高等教育质量观就是培养人的“自我意识”吗-与康翠萍教授商榷[J].高教发展与评估,2021,37(2):17-2610003.
- [7] 桑春.日本青少年犯罪及其原因[J].现代日本经济,1987(2):55-58.

The Melody of the Weak: On audio visual symbols and tragic narration in memories of Matsuko

Chen Kuang

Chengdu University School of Film and Animation, Chengdu, Sichuan

Abstract: The novel *The Life of the Despised Matsushiko* was completed in 2003 by Muneki Yamada and adapted for film by director Tetsuya Nakajima in 2006.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the audiovisual symbolism of the film *The Life of Disliked Matsuko* and explore the tragic narrative techniques used by Tetsuya Nakajima in the adaptation and creation of the film. In this way, it analyzes the success of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Matsuko, as well as the reflections and values that this image brings to the audience.

Keywords: Memories of Matsuko; Audio visual symbol; Tragic narratone; Tetsuya Nakashima

WISVORA 出版社：專注於學術出版管理，WISVORA 出版社提供期刊編輯、論文出版和國際索引、期刊創辦、期刊託管等服務，增強學術研究的全球傳播和影響力。

www.wisvora.com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刊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刊》是由香港 WISVORA PUBLISHING 出版、面向全球發行的國際中文學術期刊。本刊聚焦人文社科領域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應用，深耕學科核心議題與前沿研究，倡導跨學科、跨文化的多元研究視角，打通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的溝通壁壘，推動學術知識的傳播、共享與轉化，助力全球華語學術界交流與發展。

國際標準連續出版物號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52

網上出版 ISSN 3079-4560

ISSN 3079-4552



9 773079 455255



權責聲明

本期刊所刊載的評論、意見、觀點等均出自文章作者個人立場，不代表本期刊的觀點或看法。對於文章任何部分及文內引用材料給任何個人、機構、及其財產所帶來的任何損失及傷害，本出版社均不承擔任何責任。我們鄭重聲明，本出版社的出版業務，不構成對任何產品商業性能的保證，也不表示本社業已承認本社出版物中所述內容適用於某特定用途。如有疑問，請尋找專業人士協助。